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五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十五卷说明	IX—XXVI
卡·马克思。法国的状况	3—8
卡·马克思。英国的政治	9—14
卡·马克思。法英之间的新条约	15—19
弗·恩格斯。德国的军事改革	20—25
卡·马克思。英国的预算	26—30
弗·恩格斯。论线膛炮	31—44
一	31—35
二	36—40
三	41—44
卡·马克思。柏林的情绪	45—48
卡·马克思。西西里和西西里人	49—52
卡·马克思。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	53—62
一	53—57
二	58—62
卡·马克思。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	63—68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69—73
卡·马克思。普鲁士新闻	74—79
弗·恩格斯。英国的志愿兵部队	80—82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贸易	83—87
卡·马克思。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88—89
一	88—94
二	95—99
卡·马克思。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 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100—104
弗·恩格斯。不列颠的国防	105—109
卡·马克思。 [*] 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 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	110—114
弗·恩格斯。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115—120
卡·马克思。俄法同盟	121—126
卡·马克思。纸张税。——皇帝的信	127—131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运动	132—135
卡·马克思。 [*] 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 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	136—140
弗·恩格斯。奥地利病夫	141—144
卡·马克思。欧洲的收成	145—148
弗·恩格斯。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	149—156
卡·马克思。 [*] 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 备战。——东方问题	157—162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进军	163—167
弗·恩格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	168—171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贸易	172—176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弗·恩格斯。法国轻步兵	177—191
一	177—180
二	181—185
三	186—191
卡·马克思。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	192—195
卡·马克思。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 意大利	196—200
弗·恩格斯。志愿兵炮兵	201—204
卡·马克思。普鲁士备战	205—208
弗·恩格斯。步枪史	209—241
一	209—212
二	213—216
三	217—219
四	220—222
五	223—226
六	227—232
七	233—237
八	238—241
卡·马克思。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	242—243
弗·恩格斯。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	244—248
弗·恩格斯。奥地利革命的发展	249—252
弗·恩格斯。德国的运动	253—256
弗·恩格斯。法国的武装力量	257—261
弗·恩格斯。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	262—270
弗·恩格斯。“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序言.....	273

弗·恩格斯。志愿兵将军	274—279
弗·恩格斯。布莱顿和温伯耳登	280—286
弗·恩格斯。连队列教练	287—292
弗·恩格斯。步枪和步枪射击	293—298
弗·恩格斯。阿尔德肖特和志愿兵	299—302
弗·恩格斯。陆军部和志愿兵	303—306
弗·恩格斯。瓦德西论法国军队	307—317
弗·恩格斯。牛顿检阅的军事评论	318—320
卡·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	321—330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棉花贸易	331—334
卡·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335—340
卡·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	341—345
卡·马克思。北美内战	346—356
卡·马克思。美国内战	357—366
卡·马克思。英国的危机	367—370
卡·马克思。不列颠的贸易	371—376
卡·马克思。经济短评	377—380
卡·马克思。对墨西哥的干涉	381—385
卡·马克思。对墨西哥的干涉	386—393
卡·马克思。富尔德先生	394—396
卡·马克思。法国的财政状况	397—400
卡·马克思。弗里芒特的免职	401—403
弗·恩格斯。志愿兵军官	404—407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事件	408—411
卡·马克思。英美的冲突	412—415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	416—421
弗·恩格斯。美国战争的教训·····	422—426
卡·马克思。“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	427—430
卡·马克思。 [*] 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431—436
卡·马克思。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437—441
卡·马克思。奴隶制问题的危机·····	442—443
卡·马克思。美国近况·····	444—446
卡·马克思。一件诽谤案·····	447—450
卡·马克思。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	451—453
卡·马克思。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454—457
卡·马克思。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	458—459
卡·马克思。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	460—462
卡·马克思。英国的舆论·····	463—469
卡·马克思。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	470—471
卡·马克思。铁路统计资料·····	472—475
卡·马克思。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	476—479
卡·马克思。伦敦的工人大会·····	480—483
卡·马克思。反干涉的情绪·····	484—486
卡·马克思。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	487—489
卡·马克思。英国记事·····	490—493
卡·马克思。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	494—498
卡·马克思。墨西哥的混乱·····	499—504
卡·马克思。美国近事·····	505—508
卡·马克思。脱离派的朋友们在下院。——美国的 封锁被承认·····	509—51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美国内战	513—523
卡·马克思。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524—526
卡·马克思。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	527—530
卡·马克思。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531—53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美国战场的形势	533—537
卡·马克思。英国的人道与美国	538—541
弗·恩格斯。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	542—544
卡·马克思。中国记事	545—548
卡·马克思。一场丑剧	549—552
卡·马克思。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和同 法国的联盟	553—555
卡·马克思。评美国局势	556—559
卡·马克思。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 上涨。——意大利的状况	560—562
卡·马克思。美国废奴派的示威	563—566
弗·恩格斯。英国的志愿兵检阅	567—573
卡·马克思。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574—576
卡·马克思。英国工人的贫困	577—580
卡·马克思。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 的贫困	581—583
卡·马克思。北美事件	584—587
卡·马克思。面包的制作	588—591
卡·马克思。北美形势	592—595
卡·马克思。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	596—599
卡·马克思。 [*] 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	600—602

卡·马克思。麦克累伦的免职	603—606
卡·马克思。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	607—609
卡·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613
卡·马克思。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 的呼吁书	614—615
弗·恩格斯。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数	616—618
费·恩格斯。英国的反德兵力	619—624

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	627—643
一	628—631
二	632—634
三	635—643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	644—663
一	644—648
二	649—655
三	656—663

附 录

卡·马克思关于恢复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	667
卡·马克思就恢复其普鲁士国籍问题所作的声明	668—671
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	672—679
卡·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所得到的答复	680—681
卡·马克思关于入籍和居住柏林的申请	682—683
卡·马克思给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的信	684—685

注释	689—74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49—774
人名索引	775—812
期刊索引	813—816
地名索引	817—826
译后记	827

插 图

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进军图(1860年)	166—167
“志愿兵读物”一书的扉页	271
内战前夕的美利坚合众国图(1861—1865年)	358—359
美国内战的进程图(1861—1862)	520—521
卡·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611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一文手稿的第一页	645

第十五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1860 年 1 月至 1864 年 9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活跃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它接替了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在欧洲持续已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到六十年代初期，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涨的迹象。在德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仍然没有解决，因而重新展开了民族统一运动；在俄国和美国，革命形势正在形成；在波拿巴法国，革命风潮也在不断加强。

随着政治形势的活跃，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普遍提高。无产阶级运动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立斗争的道路。1857—1858 年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罢工斗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无产阶级根据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看到自由资产阶级背叛和小资产阶级无能领导革命运动，所以愈来愈坚决地力求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重新高涨起来；他们的群众性的斗争，特别是他们为抗议英法统治阶级企图保护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而举行的大会，都证明这一点。法国无产阶级日益坚决地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德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力求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

影响,在 1863 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不断在进步刊物上就国际生活的一切基本问题发表言论,不懈地宣传革命的科学的的世界观,教育了无产阶级去了解它的阶级利益,培养了它的国际团结精神。由于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增加和加强,终于在 1864 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在 1860—1864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注意的主要是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任务。本卷中很多文章就是阐述这些问题的。论述美国内战这一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中心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策略,是由无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下述基本客观任务决定的:完成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为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实现民主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主张在德国和意大利实现革命的统一,主张尽快采用革命方法进行美国内战和尽力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和俄国的沙皇制度是欧洲各民族在民族解放斗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特别重视这两个国家中的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的新高涨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危机的成熟,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扩大和加强自己与许多国家的革命家的联系,而且还给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以有效的实际援助。他们在进步刊物上进行反对干涉美国的积极斗争,把反对美国黑奴制度的斗争看做欧洲和美洲工人阶级的切身的事业。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即将到来的阶级搏斗中的阵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伦敦的各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建立更为密切

的联系,并且不疲倦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为了继续维护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击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诽谤性攻击和恐怖手段,马克思于1861年在报刊上组织了一次争取释放杰出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广泛运动。186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许多步骤给波兰起义以实际援助,同时还开展广泛的运动抗议欧洲列强支持俄国沙皇政府镇压起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密切地注意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针对着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拉萨尔为工人阶级规定的方向是,与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资产阶级,以期得到某些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阶级对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同时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畏首畏尾的政策。

为了训练无产阶级进行新的阶级搏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内非常重视进一步制订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继续致力于他所计划的经济学巨著,预计在这一著作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问题的总和,详尽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1861年,马克思着手撰写巨大篇幅的经济学手稿,这是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初稿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恩格斯在1860—1864年间继续深入地研究军事理论问题,特别是各种武器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于确定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阶级性质和目的,对于揭示武装斗争的规律性,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六十年代初的民主运动活跃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政论活动特别具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必须在这一

时期更加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影响舆论，以利于无产阶级，为此他们利用一切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手段，包括资产阶级报刊在内，来和反动势力作斗争。马克思除了继续为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之外，于 1861 年 10 月开始为维也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写稿，这家报纸在当时是最为流行的德文报纸之一。在这几年中，恩格斯也为英国的“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和德国的“军事总汇报”写稿。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欧洲问题的政论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文章主要是阐述德国及意大利的民族统一、消灭这两国的封建关系残余和变意大利为独立国家这项任务的。进步力量争取在德国和意大利恢复统一的斗争，遭到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动势力的反抗，也遭到支持它们的欧洲强国政府首先是沙皇俄国、波拿巴法国和英国的政府的反抗，这些国家的政府力图保持这两国的民族分裂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中坚持解决这一问题的革命民主道路，认为只有全民运动才能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无能为力，才能使皮蒙特保皇势力的王朝阴谋破产。他们指出，只有把封建专制制度的残余消灭干净，才能为德国和意大利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写道：“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国内实现统一和自由，它（德国。——编者注）必须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们。”（见本卷第 195 页）

马克思在“普鲁士备战”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普鲁士的腐朽透顶的反动统治、它的反民主的制度以及容克地主和军阀的横暴。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密切注意德国政治生活活跃的迹象和民主力量的积极化。1860 年初，马克思在“柏林的情绪”一文中指出普鲁士

的革命情绪大大加强。在这几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坚持统一德国的革命道路，反对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从上面”统一德国的计划，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普鲁士自由派的政治纲领，因为自由派拥护在普鲁士王朝的领导下统一德国的道路。马克思嘲笑普鲁士自由派关于“新时代”随着威廉亲王的摄政而到来的幻想，并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懦怯的叛卖的政策以及它向容克地主和保皇派权臣投降，巩固了反动努力的阵地。

马克思认定波拿巴法国的政策是德国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他揭露了第二帝国所采取的笼络手段，——第二帝国向德国北部各邦许愿，保证促成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国统一，用这种办法使莱茵河左岸归并于法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赞同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邦对法作战，认为这一战争会加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发展。

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考察了奥地利帝国由于内部矛盾而瓦解的过程以及奥地利帝国的各民族加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并且说明了奥地利政府为了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而不得不向匈牙利民族运动作出某些让步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非常注意意大利人民在六十年代反对内外敌人的英勇斗争。本卷中有不少文章论述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革命统一意大利。他们认为，从无产阶级和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领袖们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的行动，所有意大利的真正爱国者都团结在他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欢庆加里波第派志士们的每一个成就。恩格斯有几篇文

章(“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加里波第的进军”等)就是专门阐述加里波第派志士们的英勇斗争的。恩格斯对加里波第的革命策略,对坚决维护意大利人民利益的加里波第派志士们的战斗精神、自我牺牲和勇敢无畏,作了高度的评价。恩格斯认为加里波第是天赋卓越的勇敢的领袖,是真正的人民统帅。

为了揭露意大利革命的内外敌人的阴谋,马克思在“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等文章中,痛斥背着加里波第与拿破仑第三勾结的卡富尔所奉行的反人民政策。他指出,卡富尔强加给意大利人民的、在萨瓦王朝领导下统一意大利的道路,只会使意大利人民陷入新的奴役,使意大利受制于波拿巴法国。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深入地研究了俄国的国内状况,认为俄国农民争取废除农奴制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他们认为这一运动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是欧洲革命的强大后备军。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改革前的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在“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一文中阐明了俄国社会各阶级对当前废除俄国农奴制一事的态度,同时着重指出了沙皇政府想牺牲被压迫阶级——农民的利益而与地主协同一致的企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以真正科学地研究欧洲各国经济生活为基础的。马克思评述了法国的经济状况(“法国的状况”、“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法国的财政状况”以及其他文章),揭示出法国的农业和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衰落的原因,并指出,与拿破仑第三政府关于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骗人诺言相反,波拿巴制度只导致

了国家财政和经济的混乱。

马克思分析了英国的工业状况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揭示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及其子女的情景，描述了非人的劳动条件（“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他写道，在英国这个机器和蒸汽的国家里，还有些工业部门全部保存着手工劳动。这首先是那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工人干活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见本卷第58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非常关心民族解放运动而密切地注视着波兰人民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认定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问题是摧毁当时欧洲的反动堡垒沙皇制度的基本前提，也是通过民主道路统一德国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为1863—1864年波兰起义而写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揭示了波兰问题对德国命运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职责就是努力促进波兰的复兴。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其全部活动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美洲大陆各国首先是美国的经济、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本卷中有一大组论文就是用来论述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即1861—1865年内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这一战争的同时代人，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了与美国内战有关的问题，并且揭示了这次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这个题目的著作，大部分是马克思撰写并发表在1861—1862年的“新闻报”上。在“美国问题在英国”、“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等论文中，马克思根据对美国资料和文献的研究，全面地探讨了内战发生的原因，确定了已经展开的斗争的性质和动力。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马克思用大量的具体历史材料说

明,美国内战是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这两种对抗力量长期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后果;按马克思的说法,这一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见本卷第 32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北部和南部战争的真正原因,认为这次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在北部各州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美国南部占统治地位并阻碍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奴隶制度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政治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在自己的文章中阐明了美国种植场奴隶制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说明了它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保留着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和方法的情况下的紧密联系。马克思表明,尽管北部的金融资产阶级以及靠买卖棉花和买卖奴隶劳动的其他产品而发财致富的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希望保留奴隶制,但奴隶制的继续保存与北部各州的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不能相容。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奴隶制问题就是美国内战的实质:“所以十分明显,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 2000 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 30 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见本卷第 356 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确定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对美国内战的态度时,是从欧洲和美洲的革命运动的利益、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景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如十八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揭开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纪元一样,美国反对黑奴制的战争将

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纪元，因此，美国革命战争可以促进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并成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美国问题的论文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思想——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思想原则之一，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黑奴制的斗争看做劳动者阶级的切身事业。他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南部各州的奴隶制的存在阻碍美国工人运动的顺利发展。他们指出，只要黑人的劳动还带着可耻的奴隶制烙印，白人的劳动也不可能自由，因为，让一部分劳动者和另一部分劳动者对立，就能使美国资产阶级瘫痪美国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又指出，在美国南部保存黑奴制，成了加强剥削北部“自由”工人的理由，而奴隶主如果在战争中获胜，如果他们对整个联邦建立了统治，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贬低到无权奴隶的地位。马克思在阐述奴隶主寡头集团极端仇视美国工人运动时指出，就在这一时期，奴隶制的思想家“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见本卷第 363 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解决奴隶制问题同自由垦殖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土地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用革命民主主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是由美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美国工人运动的利益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团结一切希望彻底消灭奴隶制的进步力量，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用自己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上的言论，努力帮助北部革命民主

力量为全面彻底地解决战争所提出的任务而斗争。

马克思指出了战争从北部方面来说所具有的进步的革命的性质,并且在头几篇论述美国内战的文章中就指出,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即北部各州必将胜利。同时,他无情地揭露了领导着反奴隶制的联合但迟迟不敢宣布废除奴隶制的北美资产阶级的懦弱政策。马克思在“弗里芒特的免职”、“评美国局势”等文章中尖锐地批评北方政府,因为它害怕使战争成为彻底的、真正革命的反奴隶制的斗争。马克思评述了北部的作战方法,他在1862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从如此长久地盛行着欺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只能期待到”这样的方式。马克思揭示出北部初战失利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力求在与奴隶主妥协的基础上作战,他指出只有革命的作战方法才能保证北部各州的胜利。

e关于人民群众在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中。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重视北部和西北部各州及其工人和农民——奴隶制的最坚决的敌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马克思认为,战争进程中发生必然的转折,是由于“为军队提供主要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见本卷第558页)。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极为重视被奴役的黑人群众的斗争,认定他们是北部在与南部奴隶主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早在186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已指出,美国的奴隶运动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件之一。马克思特别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不让黑人有权加入北军与奴隶主作战。马克思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仅仅一个黑人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恩格斯强调说,

更坚决的作战方法还会使南部的白种贫民行动起来，这些人是破产的、备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他们仇视奴隶主寡头，但是还受着种族偏见的影响。

马克思在 1862 年写的许多文章中，指出了执政的共和党在主张立即消灭奴隶制的力量日益增强和团结的影响下逐渐分化的过程（“美国废奴派的示威”、“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第一次载入全集的文章“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明显地阐述了共和党内部的变化，该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在解放奴隶问题上采取较为坚决的立场。马克思根据对各州投票结果的分析，说明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失败首先是由于西北部农民对旧的作战方法不满。马克思在总结战争的第一阶段时写道：“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见本卷第 558 页）

马克思在也是第一次载入全集的“北美事件”一文中，热烈欢迎林肯关于解放属于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黑奴的宣言。这一文件“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标志着向战争新阶段即用革命方法作战的过渡。这篇文章以鲜明的笔调评定了林肯这个来自人民、平民的人。马克思着重指出，在林肯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姿态、漂亮的词句和虚假的激情。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林肯的某些法令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常常批判林肯的动摇和犹豫。尽管如此，马克思对林肯的活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强调说：“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见本卷第 586 页）

在论述美国内战的最后几篇文章（“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中，马克思根据对阶级力量的对比和交战双方的能力的深刻分析，指明各蓄奴州物质

后备和人员后备不足，离心力量增涨，因而它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马克思认为北部的胜利有巨大的意义，同时着重指出美国资产阶级纲领的温和性，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对保存奴隶占有制残余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马克思在关于北部各州选举结果的文章中写道，纽约市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和南部种植场抵押券持有者的巢穴”，它“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正是这个城市在美国内战前夕和内战期间成为力求与奴隶主妥协的民主党的主要支柱，这决不是偶然的（见本卷第 600 页）。马克思的这一指示对于理解美国事件的此后的进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美国黑奴制虽然消灭，北部各州虽然取得胜利，但种族歧视、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却保存下来了。

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论美国内战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阐述战争进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美国内战”和“美国战场的形势”以及其他文章中，揭示了对于军事科学十分重要的关于战争性质影响作战方法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判北军总司令麦克累伦提出的军事战略计划（“大蛇”计划），认为这是一个与革命战争性质背道而驰、在军事方面漏洞百出的计划。与这一计划相反，无产阶级的领袖们提出自己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是在考虑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基础上制定的。他们的计划是集中力量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并规定首先占领乔治亚州，这样南部同盟的领土将被切成两部分（见本卷第 521—523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清除北部军队中同情南军的反动军官是一项首要的军事措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预见的正确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61

年和 1862 年间指出的革命措施在内战第二阶段的实行,保证了战争进程的根本转变和北部的最后胜利。

本卷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论述美国内战对国际关系以及对欧美各国内部状况的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揭露资产阶级外交的阴谋,揭露统治阶级对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当美国军舰拦截英国“特伦特号”邮船事件使两国武装冲突很有爆发可能的时候,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英国执政寡头的对外政策,寡头们不顾英国自己宣布的中立,暗中支持南部叛乱分子,并准备武装干涉,以维护奴隶主。在马克思的“英美的冲突”、“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以及其他文章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英国统治集团及其欧洲大陆上的应声虫为煽起保护奴隶主的可耻战争而提出的论据,都是荒诞的,虚假的。关于英美冲突的文章,对于培养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文章向无产阶级教授了在国际冲突中制定和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的本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积极影响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因此,他们高度评价了英国工人阶级反干涉斗争。在“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伦敦的工人大会”、“反干涉的情绪”等文章中,马克思表明,虽然英国工人阶级处在卖身投靠的帕麦斯顿报纸所散布的沙文主义的乌烟瘴气中,但它始终是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马克思强调指出,即使是由于南部各州被封锁而停止输送棉花,从而引起了英国工人阶级物质上的极大的困苦,也没有能摧毁英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精神。马克思在评述英

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立场时写道：“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见本卷第 615 页）

马克思在“英国工人的贫困”、“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两篇文章中，描绘了失业的郎卡郡织工的触目惊心的赤贫景象，他们由于棉纺织工业的许多工厂关门而流落街头。马克思指出，“棉荒”对英国工厂主有利，因为它帮助他们出清生产过剩时期积存起来的货物，同时，马克思揭露了统治阶级企图把英国劳动人民的贫困说成仅仅是受了美国内战影响，并且痛斥资产阶级的一套可怜的慈善设施，这种设施只能使工人及其家庭饥饿而死。马克思愤怒地写到土地贵族和工厂贵族之间的“不寻常的吵闹”，指出他们争执的原因是：“争论他们当中谁较多地榨取了工人阶级的血汗，谁应该最少地援助贫困的工人”（见本卷第 579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从宪章运动低落时起就一直处在工联主义强烈影响之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的觉醒。除了工人阶级在美国内战时期的反干涉斗争之外，马克思还非常重视英国人民声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对外冒险的示威（“援救加里波第大会”等）。

还有一组关于英法西三国干涉墨西哥的文章（“对墨西哥的干涉”、“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等），论述了国际关系和欧洲列强殖民主义政策问题。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以各种各样虚伪借口为掩饰而合伙进行所谓“墨西哥远征”的国家的真正目的，从

而揭穿了这一远征的殖民主义性质。马克思把对墨西哥的干涉称为“国际史上的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见本卷第386页）。马克思着重指出，干涉者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墨西哥反动派反抗当时已为全国承认的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马克思指出，以整顿秩序为借口的墨西哥远征只能产生这样的直接结果：削弱宪法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刺刀支持下加强反人民的教权派，重新挑起已经平息的内战，而且情况必然如此。马克思的文章充满着对墨西哥人民及其解放斗争的深刻同情，他严厉地斥责干涉者背信弃义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论述干涉墨西哥的各篇文章，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反对较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奴役经济落后的附属国而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态度。

马克思还向国际无产阶级指出英法西三国的干涉所造成的另一种危险。马克思认为，“欧洲的武装的最高法庭”对美洲国家内政的干涉，乃是帕麦斯顿和波拿巴为了挑起同美国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一种“下策”。在“墨西哥的混乱”、“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英国统治集团想利用墨西哥的事件作为借口，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英国和法国站在南部各蓄奴州方面干涉美国内战的进攻基地。

马克思联系着拿破仑第三参加墨西哥远征揭露了他的冒险阴谋，强调指出，对路易·波拿巴来说，对外冒险是保存第二帝国反动的波拿巴制度的手段，是在欧洲特别是在瑞士获取某些领土的方法。此外，马克思指出，策动拿破仑第三对墨西哥冒险，是第二帝国金融界的直接需要，冒险的目的就是建立法兰西殖民帝国（“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马克思特别指出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发起者英国的反动作用，揭下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外交的假面具，指出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残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英国统治集团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中看出，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很久以来在欧洲事务中所起的反动作用显然地加强了。英国到十九世纪中叶变成了“世界工厂”，它力求保持自己的工业垄断和殖民垄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英国统治阶级成为不仅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的所有反动运动的堡垒。

马克思在揭露欧洲列强——英国、俄国、法国——旨在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奴役他国人民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严厉抨击了帕麦斯顿政府在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及其他国家中所奉行的殖民主义政策。马克思用数字和事实表明：1860年英国和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都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背着本国人民干的，是掠夺性质的。

本卷中还有一系列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为总结美国内战的经验而写的。恩格斯发展关于战争的学说，指出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精神因素在军事行动中的意义。恩格斯密切注视军事技术的发展，认为美国内战在这方面创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着重指出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指出军备的发展依赖于生产方式中的变化。

本卷中有一些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是他在1857—1860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的重要补充，这些文章已载入本版第十四卷。在“步枪史”、“论线膛炮”、“法国轻步兵”等论文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了各种武器改进的过程，各个不同国家的战术发展过程。发表在英国“郎卡郡和柴郡志

愿兵杂志”上的一组文章，深刻分析并批评了英国志愿兵部队的军事训练的组织和制度。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恩格斯“英国的志愿兵部队”一文，专门论述了志愿兵部队阶级成分的问题。恩格斯的未完手稿“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戳破了英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所制造的关于英军无往不胜、英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大建奇功的神话。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利用了许多俄国材料，对俄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英勇抵抗作了应有的评价。

本卷中恩格斯的军事历史著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军队和军事学术的学说的重要文献。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真正科学的军事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 * *

本卷所包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 章，有 15 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入。其中，有一些已在苏联刊物上以俄译文发表。“法国的状况”、“柏林的情绪”、“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不列颠的贸易”、“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富尔德先生”、“美国近况”、“铁路统计资料”、“英国记事”、“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等文章，以及马克思的“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一文的第二部分和列入附录的一些文件，都是第一次以俄译文发表的。

本卷中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但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根据发表他们文章的某些报纸的编辑部的特殊记号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本卷绝大多数文章已经肯定出自何人手笔。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以及其他报纸显然印错了的人

名、地名、数字、日期等等,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原材料一一核对,并作了更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篇文章和通讯的篇名,都是依照当时报纸上的标题印的。原件没有篇名的文章,则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标题前以星号为记。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60年1月—1864年9月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法国的状况¹

1860年1月17日于巴黎

路易一拿破仑皈依了自由贸易,并且准备宣布新的和平纪元到来。他差不多可以被接受入战栗教派²了,因而1860年将作为黄金时代的第一年载入欧洲史册。这些轰动整个伦敦报界的奇闻,来源应当归功于发表在1860年1月15日“通报”³上的路易一拿破仑致国务大臣富尔德先生的一封信。发表这封信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国家证券在巴黎跌价,在伦敦涨价。

首先,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也就是那封应该成为新纪元的整个大厦基石的皇帝的信。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必须设法进一步发展国民财富的各个部门,这样的时机已经来到。”类似的声明在1852年1月份的“通报”上出现过,那时, *coup d'état* (政变) 开创了 *crédit Mobilier*、*Crédit Foncier* 和其他的 *Crédits ambulants*⁴ 的纪元。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从这个多事的时代起,在法国暴君庇护下公布的每个年度财政报告,一直都用大量官方数字极力强调一个事实,即帝国履行了

自己的诺言,并且在它的悉心治理之下,国民生产的各个部门已经取得大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困境。要末是 coup d' état (政变) 时期所作的声明为时过早,而 coup d' état 之后发表的财政报告是捏造;要末是现在的声明纯粹是欺骗。

无论如何,根据新的皇帝宣言的自供,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法国社会从波拿巴制度的复活中所应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们且看一看,这些美妙的经济革新将借助于什么样的新发明来实现。

首先,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应当通过产品交换来发展”——真是了不起的至理名言,富尔德大概也会因自己主子的这个大发现而有点吃惊了。既然对外贸易是以本国产品交换外国产品,所以为了发展法国的对外贸易,就必须扩大法国产品的交换,这是无法否认的。路易·拿破仑从他设想的法国对外贸易的新发展中所预期的主要结果,是“在工人阶级中普及福利”;工人阶级的状况,正如 coup d' état 的英雄所默认的和现代法国作家(例如,参看已故的科兰先生的著作⁵)所指出的那样,近 10 年来已明显地恶化。不幸得很,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使最肤浅的观察家也为之震惊。从 1848 年到 1860 年,法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1848 年它达到 87500 万法郎,而 1859 年就增加了一倍多。在短短的 10 年间,贸易增长 100% 以上,这几乎是空前的现象。这种增长的原因,可以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合众国等等国家找到,当然在土伊勒里宫⁶ 的档案库里是找不到的。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 10 年来急剧增长——其原因在于整个世界市场的根本变化,这远在法国警察的琐屑监督的

范围之外——可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地恣意挥霍，那末，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雕敝的事实就暴露了这种轻松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末，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

奥地利皇帝用一道命令在本国消灭了赤字，为什么路易一拿破仑不用另一道命令实现增加法国的对外贸易呢？不过，他预感到在自己的道路上有障碍。

他说：“我们必须首先改善我国的农业，并且使我国的工业摆脱使之处于较低阶段的那些内部障碍。”

法国的农业状况极需改善，这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唠叨着的事情。但是路易一拿破仑打算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他将保证以不大的“利息”给农业贷款。大家知道，法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强。路易一拿破仑会向其余三分之一的居民征税，以便给全国大部分人提供“利息不大”的贷款吗？这种想法确实太没有根据，不足置信。另一方面，他的Crédits Fonciers（土地信用公司）公开声明的宗旨是把借贷资本送往农村。这个公司能达到的唯一结果，不是改善农业，而是使小农破产，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又是那个老牌的失效的万应灵丹——信用设施。谁都不会否认，第二帝国标志着法国信用事业发展的一个时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方面帝国走得太远了，它已经同自己的信用一起失去了鼓励信用的能力。看来，这里唯

一的新事物就是：半官方的信用机构太臃肿了，已经不中用了，所以路易·波拿巴现在想把政府本身直接变成贷款事务所。由于每一个这样的企图总是带有巨大的危险，所以这一企图也必然要遭到失败，就像他囤积粮食以提高粮价的企图失败了一样。排水、灌溉和整地——这全是很好的措施，各有其好处，但它们所带来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并不能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更何况根本没有提出过这种目的。即使路易·波拿巴奇迹一样地找到了在全国范围内这样来改善农业的办法，这些措施又如何才能消除近5年来法国农民一直苦于农产品不值钱的状况呢？所以路易·拿破仑要着手彻底改善交通工具。作这一建议时的冷硬心肠甚至超过了波拿巴的无耻。只要注意一下法国从1850年起的铁路发展就够了。这些“交通工具”的年度支出从1845年到1847年约17500万法郎，从1848年到1851年约12500万法郎；而从1852年到1854年几近25000万法郎（比1848—1851年的支出多一倍）；从1854年到1856年几近55000万法郎；从1857年到1859年约50000万法郎。在1857年爆发了普遍的贸易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在建筑的铁路仍然需要款项，再加上已经批准支出的款项，数目都大得异常，法国政府曾经大受震动。它禁止铁路公司用发行每年为数21250多万法郎的股票、证券等方式吸引新资本，禁止成立新公司并且对年工程量规定出了一定的限制。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路易·波拿巴说话的口气竟然像铁路、运河等等是现在才发明似的！他所暗示的强行降低运河航行税的办法，其结果无疑会破坏国家合同，吓跑这些企业的投资，而且，这个措施也根本不是要把新资本吸引到那些部门中去。最后，为了找到农产品市场，准备刺激工厂工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工厂工业在第二

帝国时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尽管如此,尽管输出空前增长,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大发展,信用系统在法国极度扩充,法国农业仍然处于衰落之中,法国农民仍然日益破产。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怎样解释呢?长期国家公债每年增加 25500 万法郎,这个事实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不用说为陆海军抽血税了。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民族的生产力长得更快的重担。

路易·波拿巴给法国工业开的药方,如果撇开那些空话或作不到的计划不谈,归根到底只是取消羊毛和棉花的关税,逐步缩减糖和咖啡的关税。这些都很好,但是只有像英国自由贸易派那样十分轻信的人,才能把这类措施叫做贸易自由。每一个懂得政治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取消农产原料的关税乃是十八世纪重商主义者理论中的主要点。压在法国生产上面的这些“内部障碍”,同 octrois (日用品入市税) 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octrois 把法国分成好些个独立区,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区,使国内交换瘫痪,福利不能建立,因为这种 octrois 是破坏国内消费的。但是在帝国的制度下这种 octrois 增长了,而且还要进一步增长起来。降低羊毛和棉花的关税,准备以取消减债基金来补偿,这样一来,增加国债的最后一个哪怕往往是有名无实的障碍就将消灭了。

另一方面,森林应砍伐,土丘须铲平,沼地要排水,其办法就是在三年之内拨出 16000 万法郎(据说相当于最近的战时公债中没有用掉的余额),每年平均不到 5400 万法郎。然而,皇帝的卡利奥斯特罗 5 年前郑重宣布的、从那时起人们已不再记起的卢瓦尔河岸的一项工程,用不了 3 个月就可以把这笔钱全部吃掉。在这种

情况下,宣言里还剩下什么呢?“和平纪元到来”,——就好像以前没有在波尔多宣布过似的。《L'Empire C'est la paix》⁷。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1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2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6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英国的政治

1860年1月27日于伦敦

在关于议会答词的辩论中，最引人注意的题目是第三次对华战争^①、对法商约和意大利纠纷^②。应当看到，中国问题不仅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牵涉到一个极端重要的宪法问题。按照帕麦斯顿勋爵的独断命令而进行的第二次对华战争^③，曾经先招来议会对他的内阁投不信任票，接着就是他解散下院；新下院虽然是由他一手包办选举出来的，但是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撤销它的前任所通过的判决。一直到现在，帕麦斯顿勋爵的第二次对华战争，还受着一个议会裁决案的谴责。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

1859年9月16日，英国接到白河失败^③的消息。帕麦斯顿勋

-
- ① 指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年7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占天津、北京；10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英法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特权。——译者注
- ② 指1856—1858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6月在天津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1月，又在上海签订了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译者注
- ③ 指1859年6月英法侵略军在大沽之战中所遭受的失败。这月24日，英法派舰队到白河河口（即海河河口），进攻大沽炮台，被中国守军击沉军舰四艘，击伤六艘，英军舰队司令贺布受重伤，登陆部队被击退。敌人在美舰掩护下逃走。——译者注

爵不是召开议会，而是致书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谈派一支新的英法远征军打中国。在三个月中，正如格雷勋爵所说的，

“英国港口和军械库里一片喧哗，忙于准备；同时采取种种步骤向中国运送大炮、弹药和炮舰，并且除海军外，还加派了不下一万人的大军。”

一方面，由于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另一方面，由于事先不通知议会而作的一大笔支出，就已经把这个国家完全投入一次新的战争了，而议会复会后，却满不在乎地要求议会“感谢女王陛下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和远征中国的准备工作告诉了他们”。路易—拿破仑本人对他自己的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 说话的方式，或者皇帝亚历山大对他的参议院说话的方式，能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1857 年下院在关于答词的辩论中，现任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先生谈到波斯战争时曾经愤慨地说：

“我不怕反对，我要说，不事先通过议会就开始战争的做法，是同我国的惯例完全相抵触的，这种做法危害宪法，为了使这样危险的先例完全不可能重演，绝对需要下院加以干涉。”

帕麦斯顿勋爵不仅重演了一回“这样危害宪法”的先例；他这一次不仅在伪善的格莱斯顿先生的协助下重演了一回，而且，好像是想试试内阁不负责任的程度似的，他利用议会的权力对付国王，利用国王的特权对付议会，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居然肆无忌惮地在同样的行动范围内重演了一回危险的先例。他的一次对华战争曾经遭到议会的谴责，他不顾议会又进行了另一次对华战争。而在两院中，却只有一个人鼓起足够的勇气反对内阁的这种僭越行为；奇怪的是，这一个人并不是立法议会的民主派，而是贵族派。这个人就是格雷勋爵。他对答复国王演辞的答词提出了修正案，主张在没有听取议会两院的意见以前，不应该开始远征。

执政党的代表和陛下反对派的领袖对待格雷勋爵的修正案的方式，清楚地标志着英国代议机关正在迅速走向政治危机。格雷勋爵承认，形式上国王享有宣战的特权，但是，既然大臣们事先不得到议会的批准不得在任何事情上花费一个法寻^①，所以在没有事先通知议会，没有提请议会预先设法支付这些可能的费用以前，国王的负责代表们根本不当采取远征的战争行动，这就是宪法和惯例。因此，只要国民的参议院认为适当，它在一开始就可以制止大臣们所策划的任何不正当的或不明智的战争。为了说明过去是怎样严格遵守这些规章的，这位勋爵阁下举了几个例子：1790年，当几艘英国船在美国的西北海岸被西班牙人截走时，皮特曾向两院提出了国王的咨文，要求两院通过一笔款项来弥补可能的支出。另一次，在1826年12月，当西班牙斐迪南七世为了援助唐·米格尔而打算入侵葡萄牙，唐·彼得鲁的女儿^②向英国求援时，坎宁送致了同样的咨文，把问题的性质和费用的概数通知议会。最后，格雷勋爵明白地指出，政府已经敢于不经议会同意而向全国征税，因为已经承担的大量费用，总是必须设法支付的，而不挪用完全是准备作其他用途的款项，就不可能支付这笔钱。

格雷勋爵从内阁方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曾经带头反对帕麦斯顿第二次对华战争的合法性的纽卡斯尔公爵回答道：第一，近年来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惯例”，即“对答词决不提出任何修正案，除非是要达到某种重大的政党目的。”因此，如果格雷勋爵不是受任何派别性动机的驱使，如果他不是奢望把大臣们赶走而让自己挤进去，那末，纽卡斯尔公爵至死也想不通，他破坏这个“近年

① 法寻是英国的辅币名，等于四分之一辨士。——译者注

②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编者注

来非常良好的惯例”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以为议院在重大的政党目的以外还会为了别的什么事情而争吵,岂不是荒唐古怪吗?第二,皮特和坎宁如此热心遵守的宪法惯例曾经一再被帕麦斯顿勋爵改变,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吗?这位高贵的子爵不是曾经自作决定,于1831年在葡萄牙、1850年在希腊,以及像纽卡斯尔公爵还可能补充的,在波斯、阿富汗和其他许多国家进行过战争吗⁹?如果议会30年来一直让帕麦斯顿勋爵僭越宣战、媾和和征税的大权,那末议会为什么要突然违背自己悠久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呢?宪法可能在格雷勋爵方面,但是时效权无疑是在帕麦斯顿勋爵方面。既然以前他没有因这类“良好的”新花样而受过谴责,那末为什么现在一定要追究这位高贵的子爵呢?老实说,格雷勋爵企图破坏帕麦斯顿勋爵任意处理自己的财产(英国军队和财政)的时效权,而纽卡斯尔公爵没有责备他造反,看来已经够宽大了。

纽卡斯尔公爵力图用以证明远征白河的合法性的方式也是同样别出心裁的。根据1843年的中英条约,英国享有天朝给予最惠国的一切权利^①。而俄国在最近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享有了白河的航行权¹⁰。因此,按照1843年的条约,英国也享有这样的航行权。纽卡斯尔公爵说,这一点他是能够坚持的,“不需要什么有力的专门的论据”。但是实际上他未必能够!一方面,这里有一个颇为尴尬的情况,即俄国的条约只是在白河惨败以后才批准,从而才

① 指1843年10月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这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由此获得一些新的特权,主要有: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凡其他国家从中国得到的侵略利益,英国都可“一体均沾”,等等。——译者注

生效的。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无关宏旨的 hysteron proteron^①。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在战争状态中，一切现行条约都停止生效。如果英国人在远征白河的时候已经同中国人处于战争状态，那末不言而喻，他们既不能援用 1843 年的条约，也不能援用其他任何条约。如果他们不处于战争状态，那就是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准而发动了新的战争。为了回避两种可能的后一种，可怜的纽卡斯尔断定，自从炮击广州¹¹以来，最近两年当中，“英国从来没有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政府只是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而不是重新恢复军事行动，因此，纽卡斯尔也能够不用专门的论据，而诉诸只在和平时期才有效的条约。而内阁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为了使这种奇怪的辩术更加精彩，他与此同时在下院断言，这些年来，英国“和中国从来不处于战争状态”。两国现在也是这样。自然，发生过炮击广州、白河惨败以及英法远征等事件，但是没有发生过战争，因为根本没有宣战，因为一直到现在中国皇帝^②还允许他们照常在上海做生意。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帕麦斯顿违背了有关交战的所有国际法准则；正是这个事实，却又被他用作理由，为自己在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的行为辩护，而他在上院的代表格兰维耳伯爵则轻蔑地宣称：“至于中国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竟然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那末，英国议会和法国 Corps Législatif 究竟还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国，至少是一个被假定为民族英雄后裔的人大胆地把自己当作国家，同时公开承担这样僭越大权的一切危险。而在英国，则是所谓内阁里的一个二流人物，一

① 先 (proteron) 后 (hysteron) 倒置的错误。——编者注

② 咸丰。——编者注

个声名狼藉的野心家，一个无名小卒，依靠议会精神的愚蠢，依靠无名报刊的迷惑人心的胡言乱语，一声不响地，毫无危险地，悄悄地窃取了无限权力。如果一方面拿苏拉¹²掀起的骚动，另一方面拿股份银行经理、慈善会秘书或教区牧师的招摇撞骗的生意经式的手法来比较一下，你就会了解法国皇帝的僭越大权和英国内阁的僭越大权的区别了！

得比勋爵充分认识到两派在保持内阁的无能与不负责任方面有同样的利害关系，他自然不能“同意高贵的伯爵（格雷）对政府的疏忽所作的严厉的指责”。他可以部分同意格雷勋爵的不满，即认为“政府应该召开议会，征询它对中国问题的意见”，但是，“如果格雷要求把他的修正案提付表决”，他“一定不会支持格雷”。

结果，修正案并没有提付表决，而两院在对华战争上的全部争论，也就失在两派对那位如此光荣地使英军葬身于污泥的舰队司令贺布的一片奇怪的问候声中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1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2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6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法英之间的新条约

1860年1月28日于伦敦

对法商约提交下院审查不会早于2月6日。可是,根据在关于答词辩论时的揭发,法国报纸的透露以及伦敦和巴黎的传闻,而不管格莱斯顿先生怎样郑重警告,现在就已经可以给这个“可爱的换来儿”¹³作一个总的评价了。1月23日,星期一,条约已以应有的方式在巴黎签字,它的法国教父是贸易大臣鲁艾和 ad interim (代理) 外交大臣巴罗什;英国方面扮演这种角色的是考莱勋爵和科布顿先生。以下的这一件新闻,即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曾为此事出了一臂之力,整个法国都惋惜路易一拿破仑处理不善,没有让这位名人(即舍伐利埃先生)有可能同他的“英国 confrère (伙伴)”一同签名于条约,已经由“名人”自己慨然向伦敦作了报道,并且在各个自由贸易派机关报上登载了。但报界还不知道,法国方面的主角是前圣西门主义最高司祭安凡丹 père (天父)。所有圣西门主义者,从安凡丹 Père 到伊萨克·贝列拉和米歇尔·舍伐利埃,都已变成了第二帝国经济上的主要支柱,这可不是使人惊奇吗?不过,还是让我们再来谈谈舍伐利埃先生的“英国 confrère”吧。这位过去的郎卡郡厂主得到如此的荣誉,居然能亲

笔签署国际条约,当然感到不胜荣幸。如果注意到,凡是根据相互原则签订的条约和一般商约(同野蛮人签订的条约除外),总要被以科布顿先生为首的英国自由贸易派痛斥为最坏的和最无信义的一种保护关税形式;如果再注意到,现在的条约,即使从相互原则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相当荒唐的协定;最后,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权衡一下用这个条约做掩护的政治目的和任务,那末,公众大概就会可怜理查·科布顿先生成了帕麦斯顿的一个诡计的无辜牺牲品了。但事情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大家都知道,科布顿先生因进行反谷物法运动¹⁴有功,曾得到感恩的厂主们约6万英镑的奖赏。这笔钱科布顿先生买了美国股票,由于1857年的危机,几乎全部损失。他启程去合众国旅行时还抱有的希望成了泡影。科布顿先生回到英国时已经是一个破了产的人了。为了安排一个国民捐献,就必须有一种国民性质的借口,必须有一桩可以吹嘘的事情,好再一次把科布顿先生描绘成联合王国的守护天使,“能保障千百万普通的家庭的富裕和安宁”。英法条约大概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而且,正像诸君从省报上获悉的那样,用来补偿自由贸易的伟大使徒在美国亏损的为数4万英镑的新捐献已在进行,并且得到很大的“同情”。毫无疑问,如果是迪斯累里向下院提出这样的条约,自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先生就会建议对内阁表示不信任,说内阁企图使立法机关重犯过去不文明时代的最愚蠢的错误了。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1858年英国对法国商品征收的保护关税的数额:

商 品	关 税 (英镑)
篮筐	2061
黄油	7159
瓷和瓷制品	1671
挂钟	3928
咖啡	4311
蛋类	19934
刺绣品	5572
纸花	20412
水果	7347
花边	1858
皮靴、皮鞋及其他皮革制品	8883
手套	48839
乐器	4659
工业用油	2369
壁纸	6713
编帽草等	11622
丝织品	215455
白兰地及其他酒类	824960
糖	275702
茶叶	14358
烟叶	52696
手表	14940
葡萄酒	164855

这样征收的关税,多数是保护关税,如篮筐、挂钟、花边、鞋、手套、丝织品等的关税都是。其他如烧酒税等等,要高过英国国产酒类的消费税,因此也带有保护关税的性质。甚至如葡萄酒税这样通常的财政关税,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也会认为是保护关税,因为,如果不同时保护国内市场的同类商品以至同样的商品,是不可

能对外国商品征税的。所以，对外国葡萄酒征收的财政关税，对当地啤酒等等来说，就可以看做是保护关税。由于新签订的条约，英国对法国商品的全部税收将很快取消，而烧酒税、葡萄酒税及其他商品税将同英国的消费税或同目前征收的从不列颠殖民地输入的同类商品（如葡萄酒）的关税拉平。另一方面，法国税率的改变，在1861年10月以前不会彻底实现，这从法国省报的下列报道中看出：

- 1860年7月1日——废除棉花和羊毛进口税。
- 1860年7月1日——对英国煤和焦炭采用比利时税率。
- 1860年10月1日——将现行铁税改为每100公斤收税7法郎。
- 1860年12月31日——降低机器进口税。
- 1861年6月1日——废除对麻线和麻布输入的禁令，规定关税不超过30%。
- 1861年10月1日——废除其余一切有关输入的禁令，采用5年为期的 ad valorem（从价税）的保护关税制度，5年期满后不超过25%。

除英国煤税降低到了目前征收的比利时煤税的数额以外，法国所做的一切表面上的让步，显然是极端模棱两可的。例如一号生铁（威尔士的）每吨价格目前是3英镑10先令，而法国对它将征收近3英镑的关税。伦敦的“经济学家”¹⁵承认，对迄今禁止输入的物品征收的30%的 ad valorem（从价税），实质上将带有保护关税的性质。由于降低英国商品税——不管真降低或假降低——要延搁到将来，所以英国政府实质上起一个保险公司的作用，保证在这个时期内维持住路易—拿破仑的权力。这个商约的真正秘密正是在于，“这完全不是商约”，而纯粹是一个骗局，是要迷惑约翰牛的商业头脑和掩盖不可告人的政治计划。这个秘密在关于答词的辩

论时被迪斯累里先生巧妙地揭发出来了，他的揭发的要点如下：

“几年以前，法国皇帝作过声明，这个声明同不久前他写给国务大臣的那封信相似。在这个声明中，他建议完全取消禁制关税制度，采取类似他在不久以前的宣言中提到的那些措施。1858年，根据这个精神拟定的法案就提交给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但在通过以前，它曾提到法国 86 个省议会审查，除 6 个省议会外，都赞同这个法案，并都附带说明新制度应该再过一些时候施行。结果，皇帝同意了 this 建议，并在一些公开文件上表明了他实行这个制度的决定。这项法律生效的日期预定在 1861 年 7 月。因此，法国根据所签订的条约答应在 1861 年 7 月实行的一切，是已经在法国用立法手续规定下来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1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2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6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德国的军事改革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比克里木战争¹⁶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法国的军事组织为全欧之冠这个事实。除法国军队以外，奥地利军队无疑是欧洲军队中最好的；但是，在1859年的短暂的战局期间，全军一个战役也没有能够打赢，虽然它的兵士赢得了光荣。即使把将军的无能，指挥的不统一和皇帝的瞎干涉都估计在内，奥地利各团的军官和兵士仍然一致认为：这支军队未获胜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组织不像他们敌人的组织那样适合于实际战争的需要。如果说，仅仅几年以前才彻底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队也不能令人满意，那末对其他在组织上还要老式的军队能有什么希望呢？

法国人在这方面是超群的，这一点毫不足怪。任何一个略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以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25年的小型战争¹⁷，都不会不因此而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高度发扬。当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高加索主要是用专为这个目的而派出的军队进行战争的时候，大部分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经过锻炼了。法国的确从这次锻炼中吸取了最大的益处，这次锻炼花费了许多生命和金钱，但是从取得宝贵的战争经验的角度来看，它是非常有成效的。继之而来的克里木战争，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锻炼，使兵士有了更大的信心，因为这次战争向他们指明，他们在征

讨游牧部落和非正规部队时所取得的经验，在对付正规部队时是同样有益和适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特殊军事能力的国家，本来就应该使自己的战斗组织达到完善程度，超过其邻邦的一切成就，这是一个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¹⁸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的事实，但是，它仍然引起了惊讶，特别是在德国。这个国家的军事学家们是这样相信自己似乎优于轻浮的、无恒的、无纪律无道德的法国人，以致这一打击简直使他们目瞪口呆了。另一方面，奥地利和德国其他各邦军队的一些一贯反对学究气的比较年轻比较有教养的人马上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刚刚去过马振塔的奥地利军官们首先讲话，——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说，法国人战斗中不背背包，他们既没有领带和竖领，也没有瘦上衣和瘦裤子；他们穿的是肥裤子和肥大的折领上衣，脖子和胸部非常自在，头上戴着法国式轻便军帽，子弹放在裤袋里。奥地利兵士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地走到一个地方，而法国人却生气勃勃，歌声不绝地来到那里，准备进行任何体力上的紧张活动了。奥地利军官们在自己的战地书信中报道过这种情况，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军官们紧接着也是这样说。一个可怕的事实摆到了眼前。兵士们真的大胆地不在身上带大量累人的东西就跟敌人干起来了，这些东西差不多全是为了阅兵式和装门面用的，它们加在一起对一个兵士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紧束衣。而且，尽管没有这种紧束衣，他们结果还是打一仗胜一仗。这个事实是这样严重，连德国各邦政府都不能闭眼不看了。

因此，军事改革在德国就成了一个使旧传统的所有信徒们大大恐慌的迫切口号。最革命的军事理论不但不受制裁地被提出来讨论，而且甚至为各邦政府所注意。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兵士的军

服问题了,因为它造成了战场上两军间的最突出的差别。这个问题讨论之久,就像口味之多那样。种种发明才能在军服问题上都表现出来了。制帽,头盔、高筒军帽、棉帽、上衣、短上衣、大衣、衣领、袖口、裤子、护腿和靴子,——所有这一切都进行争论,激昂慷慨,雄辩滔滔,真好像仅仅是这些东西决定了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命运似的。奥地利人的军服式样最为过火。他们从差不多完全模仿法国样式(颜色除外)开始,经过了所有的过渡阶段,一直弄到短上衣和软宽边帽为止。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呆板、保守、拘谨的奥地利帝国兵士穿上法国猎兵的俏皮服装,或者还要糟糕,穿上1848年革命的德国志愿兵的短上衣和戴上他们的细毡帽,是个什么样子!对于奥地利军事制度来说,再也想不出比每一个这样的极端都要加以认真考虑这个事实更好的讽刺。通常的情况是:争论到完全困乏而止,而不是最后作出什么决定;旧军事传统的信徒们收回了一部分失去了的阵地,整个说来,军服方面的改变至少在奥地利将是很小很小的,在德国其他各邦军队中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改变,只有一点除外:普鲁士的头盔这个浪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心爱的发明,看来势必先于它的发明者进坟墓。

其次一个大问题是背包问题。法国人不带背包进入战斗是有些轻率的;只不过因为他们走运气,另外还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才能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这成了他们的习惯,那末在冷天或雨天的第一个失利就会使他们为此而大吃苦头。可不是吗,如果一般地采取这种做法,那末在每次战役中战败的军队不但会丢掉枪炮、军旗和备用品,而且会丢掉每个步兵个人的全部行装。如果在野营碰上几个雨天,将会使步兵的队伍完全紊乱,因为每个兵士所穿的只是他身上的那点东西。不过,问题的实质显然在于怎样才能

把每个兵士的个人行装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只从行装是否适于行军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重要问题本来是能够容易地和令人满意地解决的；但是在德国，辩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除军服问题和背包问题以外，军队的各种分队的编制也在详加讨论。应当多少人组成一个连，多少连组成一个营，多少营组成一个团，多少团组成一个旅，多少旅组成一个师，等等。这又是一个可以煞有介事地说出一大堆废话的题目。在任何军队里，基本战术体系把连和营的数目和定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旅和师的定员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取决于各邻国军队的编制，以便在冲突时各个较大的战术兵团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不从上述事实所决定的实际条件出发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企图规定基本原则，——这等于胡说，这或许对德国的哲学家们合适，而与实际工作者是不相称的。减少营的数目，把奥地利基干步兵团的数目从 63 个增加到 80 个，这不会比实行穿较肥的裤子和折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他们“未来的成功”。

但是当军服式样和关于旅的定员和编制的高明见解吸引着全部注意力的时候，德国军事制度的大缺点和症结却被忽视了。军官们对一条裤子或一条衣领的式样争论得不可开交，而对德意志联邦¹⁹军队中有 20 来种不同的野炮口径和差不多数不清的各种小型火器口径却安之若素，对于这样的军官们，老实说，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呢？采用线膛枪是统一全德国的口径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这不但搞得马虎得丢人，而且把事情弄糟了。有必要稍微谈谈口径的这种混乱情况。奥地利、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有一种口径——0.53 英寸。它们用南德意志人在许多场合下表现出的实际的健全思想进行了这一极其重要的改革，

为德意志联邦军队 5 个军规定了同一口径。普鲁士有两种口径，一种是所谓 Zündnadelgewehr 或针发枪^①的口径，约 0.60 英寸，另一种是不久以前按照米涅原理嵌上膛线的旧式滑膛枪的口径，约 0.68 英寸。前者应当尽快地代替后者。第九军有三种不同的步枪口径和两三种滑膛枪口径；第十军至少有十种口径，而在预备师中几乎有多少营就有多少口径。现在可以想见在积极战斗行动时这支五花八门的军队的情形了。能否设想，适用于每个部队的弹药总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摆在附近，如果这不可能，那末这个部队就毫无办法和毫无用处呢？除奥地利、南德意志各邦和普鲁士以外，仅仅由于这一情况，就没有一个部队的官兵在长时间的战斗中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炮兵也是一样。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巴伐利亚人，不直接去研究哪怕是适合于旧式六磅炮的一个共同口径，从而使它逐渐成为线膛野炮的共同口径，他们现在却彼此毫无联系地铸造线膛炮，这只能加剧目前的口径不统一的情况。有这许多重大缺点的军队，本来是可以做一些比争论衣领和裤子以及旅和营的定员更为重要的事情。

在德国，只要上层人士不想打消建立军队是为了检阅而不是为了打仗这样的念头，在军事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种学究气一度被奥斯特利茨、瓦格拉姆和耶拿²⁰以及 1813—1815 年的人民热潮打下去，很快就又抬高了；它一直称霸到 1848 年，看来，在最近 10 年间还达到了顶点，至少是在普鲁士。假如普鲁士曾经参加了意大利战争，佩利西埃差不多一定会给它的军队布置一个新的耶拿，只有莱茵的要塞才可能拯救它。这支军队的现状就是

^① 见本卷第 229—232 页。——编者注

如此,而这支军队就其兵士的素质而言,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别的军队。一旦法国人和德国人未来发生冲突,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等待着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的特征的再现。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 月底—
2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2 月 2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73 号

卡·马克思 英国的预算

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

昨晚的会议是议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格莱斯顿先生在长篇演说中把自己预算的秘密和商约的秘密同时泄露了，他极力将两个文件互相联系在一起，用预算的大胆来支持商约的懦弱。谈到现在全世界都知其详情的条约，诸位将看到，几星期前我对它所作的短评^①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我对当时所给予的总评介已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了。因此，在这里我将把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只作为英国的财政业务来考察一下。这样来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即将进行的议会辩论，无疑还会在我们面前顺便揭穿那些隐藏在格莱斯顿先生所举的事实和数字后面的外交打算。

不管预算的细目怎样不合理，不管可以提出怎样的政治异议去反对，认为在赤字占总收入14%强和支出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完全废除许多现行的税收（其中一部分未必是人民群众负担的）是不慎重的，——单纯的公正心还是使得我要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是一种出色的和大胆的财政手腕。如果采取不列颠自由贸易论的观点，撇开同对法条约有关、同时也同不列颠每一任财政大臣对5

^① 见本卷第15—19页。——编者注

万个大地主的地租问题一贯温情有关的某些明显的荒唐事，——那就得承认，这个预算是了不起的。格莱斯顿先生的处境因他自己所造成的困难而复杂化了。须知，正是他于 1853 年在自己的为期 7 年的所谓模范预算中，答应在 1860—1861 年度彻底废除所得税。其次，格莱斯顿在由于对俄战争而编制的追加预算中，曾答应不久的将来废除茶叶和糖的战时税。而现在当他的期票到期的时候，他却拟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税，而所得税从每英镑征收 9 辨士提高到 10 辨士，即提高 $11\frac{1}{9}\%$ 。但是，大家还记得，我在对格莱斯顿 1853 年预算的批评意见²¹中，曾努力表明，如果自由贸易的财政立法一般意味着什么的话，它首先是意味着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我当时指出，格莱斯顿先生答应继续废除关税和消费税，同时他又答应把所得税一项从税册中一笔勾销，这两种诺言是不相容的。尽管所得税不概括全部收入，尽管它不公平，甚至极为荒谬，然而所得税是英国财政立法的较好的一部分。格莱斯顿先生不认真地去课地产税，却保留茶叶和糖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战时税收，是一种胆怯的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他的眼光短浅，而是由于议会的贵族结构。要是他敢去动一动地租，前途相当不稳的内阁很快就会被更换。古语说：饿汉没有耳朵，但同样也应当说，地租没有良心。

在简评格莱斯顿先生拟定的变动以前，我先要请读者注意他在演说中某些脱口而出的意见。第一，这位财政大臣承认，关于英国的财政制度是自由贸易论的体现这种流行看法，完全是庸俗的。第二，他承认，英国对法国没有什么大宗贸易，恰恰相反，是法国对英国进行着大规模的而且日益增多的贸易。第三，他被迫承认，帕麦斯顿背着议会安排“友好远征”的政策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使国库由于不列颠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的收入化为乌有。最后,——虽然他把这丸苦药裹上糖衣,并像法国药商通常制造最低劣的药品那样,做得式样美观,——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大不列颠目前准备从自己收入中拿出将近 200 万来捐助的那位亲爱的盟友,是使不列颠 1860—1861 年度陆军和海军军费开支增加到 3000 万巨额数字的主要原因。应当提醒,24 年前,铁公爵^①号召明智的英国人勉力承担的最高军事开支额是 1800 万。

在谈过这些前言之后,现在再来谈谈格莱斯顿先生拟定的变动。这些变动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同对法条约有关的变动;另一类包括一些附带的变动,格莱斯顿先生实行这些变动是为了避免别人指责他的预算是被专制主义的外国逼出的一种让步,也是为了把预算打扮成一个对现行税率进行普遍改革的样子,使预算具有一个易于接受的外表。

同对法商约有关的变动如下:工业品一项立即从英国关税税则中全部取消,只有软木、手套和一种没有多大意思的商品在一定限期内例外。烧酒税从每加仑^② 15 先令降到殖民地关税的水平——8 先令。全部外国葡萄酒税将立即由每加仑 5 先令 10 辨士减到 3 先令。其次,英国答应从 1861 年 4 月 1 日起,酒税按照葡萄酒内酒精含量相应地下降。凡是英国也生产并且征收消费税的外国商品,一律把关税减少到国内消费税的水平。这就是所拟定的第一类变动的实况。

同对法条约无关的那些应使现在的预算具有不列颠财政立法普遍改革性质的变动如下:

^① 威灵顿。——编者注

^② 液体和散粒于物体的单位;英制 1 加仑等于 4.54 公升。——编者注

立即和全部废除黄油、脂肪、干酪、桔子和柠檬、蛋类、豆蔻、胡椒、甘草和其他各种产品的税收,这些产品的总税额每年约为382000英镑。现行的建筑木材的税收从7先令和7先令6辨士降到殖民地税率水平即1先令和1先令6辨士;无核小黑葡萄干的税收从15先令9辨士降到7先令;葡萄干和无花果干的税收从10先令降到7先令;啤酒花的税收从45先令降到15先令。最后,完全取消纸张消费税。

1860 财政年度的预算是这样的:

支 出		(英 镑)
长期和非长期公债	26200000	
统一公债的支出	2000000	
陆军和民军	15800000	
海军和邮船	13900000	
杂项和民政	7500000	
税务局	4700000	
共 计	70100000	
收 入		(英 镑)
关税	22700000	
消费税	19170000	
印花税	8000000	
其余税收	3250000	
所得税	2400000	
邮政收入	3400000	
皇室土地	280000	
其他收入	1500000	
共 计	60700000	

收支相较,明显的赤字几达 1000 万英镑,这个赤字正像我们说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指望通过将所得税从 9 先令提高到 10 先令并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税的办法来弥补。格莱斯顿先生还指望用一些不太重要的变动从其他各种来源中得到点微薄收入,这些变动在这个对不列颠 1860—1861 年度预算的总评里就没有必要详谈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2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2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7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论线膛炮

—

用在炮膛内刻制螺旋膛线的方法使炮弹获得垂直于飞行线的旋转运动以增大火炮的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的最初试验，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慕尼黑有一门小型线膛炮，是1664年在纽伦堡制造的；它有8条膛线，炮膛的直径约为2英寸。在整个十八世纪，不论德国或英国都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并且其中有些是后装火炮。虽然这些炮的口径不大，但其效能却很好。1776年，英国二磅炮在1300码距离上射击时，方向偏差只有2英尺；这样的精度是当时其他任何火炮根本无法达到的。就在同一年，这种线膛炮被第一次用来发射长炮弹。

可是，所有这些试验长时期内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结果。当时，军事界是完全反对线膛武器的。步枪本身在当时就是一种特别笨重的武器，它的装填的动作既缓慢又累人，而且需要高度的技巧。这种武器在那一时代不适于在战争中广泛使用，因为当时展开的横队、纵队的前列或散兵线内的兵士的速射是会战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仑就不曾打算在他的军队里使用步枪；英国和德国只有少数几个营装备了步枪，仅仅在美国和瑞士，步枪才成了全

国普遍采用的武器。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人们重新注意到了步枪,改进了它的构造,这些改进仅仅是在整个火器方面的大革命的开始,这一革命直到现在还远没有结束。法军的滑膛枪无法与阿拉伯人的埃斯宾加德长枪相比!这种埃斯宾加德枪,枪管长,材料好,能使用较重的装药,因而卡拜尔人和贝都英人能够在法军制式火枪根本射不到的距离上对法军进行射击。奥尔良公爵看到普鲁士猎兵和奥地利猎兵后极为满意,于是也仿效他们建立了法国猎兵,这支猎兵在武器、装具和战术方面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一支猎兵。他们装备的步枪比旧式步枪优越得多,并且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这就使线膛枪终于在欧洲所有国家的步兵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

这样,当步枪的射程从 300 码增大到 800 码乃至 1000 码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在 300 码到 1500 码之间的任何距离上一直占优势的野炮,能够赛得过这种新式小型火器吗?实际上,一般野炮最有效的射程正是步枪现在与它们相竞争的射程:霰弹在超过 600 码或 700 码的距离上就几乎没有作用了;六磅或九磅炮的球形实心弹在超过 1000 码的距离上就得不到特别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要发挥榴霰弹(球形霰弹)的巨大杀伤作用,炮手就必须沉着并精确地计算距离,这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在战场上不是经常能做到的,至于用旧式榴弹炮对军队发射榴弹,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口径最小的火炮为九磅炮的军队,例如英国军队,情况还比较好;可是法国的八磅炮,尤其是德国的六磅炮,就几乎成了废物。法国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大约在克里木战争初期采用了一项所谓路易一拿破仑的发明,也就是轻型十二磅炮,即 canon obusier,它既可以使用重量为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的装药(代

替以前的重量为炮弹的三分之一的装药)发射实心弹,也可以发射榴弹。这种火炮只不过是英国已经弃而不用的小型十二磅炮的一种仿造而已;用长管炮发射榴弹的方法,德国早就采用了,因此,这种所谓改进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是,如果法国炮兵全部装备了十二磅炮,即使射程减小,也会使它获得对旧式六磅和八磅炮的决定性优势。为了对付这一点,普鲁士政府于1859年决定给自己所有的步炮连装备重型的十二磅炮。这是滑膛炮受人赏识的最后一次了;这表明,整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而滑膛炮的拥护者已经达到了 ad absurdum (荒唐的地步)。整个军队的炮兵全部装备这种笨重的、旧式的普鲁士十二磅炮,的确是再荒唐不过的了,何况是在灵活、迅速的机动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要求的时候。既然法国轻型十二磅炮只是比其他的火炮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根本不比新式小型火器优越,而普鲁士的重型十二磅炮又显然完全不适用,那末除了完全取消野战炮兵,或者改用线膛炮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

这时各国都不断地进行了线膛炮试验。在德国,一位巴伐利亚中校赖辛巴赫早在1816年就进行了小型线膛炮和一种圆柱锥形炮弹的试验。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试验结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装填方面的困难和外界的环境使这一问题未能获得彻底解决。1846年,皮蒙特少校卡瓦利制成了一门后装线膛炮,它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他制成的第一门火炮是三十磅炮,使用5磅装药和重64磅的圆柱锥形空心弹;当射角为14.75度时,火炮的射程(根据第一次测量所得的结果)为3050米,即3400码。他的试验一直继续到不久以前(部分在瑞典,部分在皮蒙特进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发现了线膛炮发射出去的一切炮弹都经常发

生方向偏差,也就是由膛线的缠角所引起的、并且总是偏向炮弹旋转方向的一种偏差;当这种偏差被发现后,卡瓦利就又发明了一种叫做方向或水平正切分划尺来修正偏差。他的试验结果非常令人满意。1854年,他所设计的使用8磅装药和64磅炮弹的三十磅炮在都灵试验时所得的结果如下:

射角	射程(米)	方向偏差(米)
10°	2806	2.81
15°	3785	3.21
20°	4511	3.72
25°	5103	4.77

当射角为25度时,射程超过了3英里,而与瞄准线的方向偏差(用水平正切分划尺修正后所得的结果)竟不到16英尺!法国最大的野战榴弹炮,当射程达到2400米,即2650码的时候,方向偏差平均为47米,即155英尺,也就是说,当射程仅为线膛炮的一半时,方向偏差却是线膛炮的10倍。

在卡瓦利的最初试验以后不久,很快引起了人们注意的另一一种线膛炮,是瑞典瓦廉多夫男爵发明的。他的火炮也是后装的,炮弹也是圆柱锥形的,但是在炮弹构造上有以下的差别:卡瓦利的炮弹用硬金属制成,其上有嵌入膛线的弹齿;而瓦廉多夫的炮弹则包有一层薄铅,因而炮弹的直径较炮身膛线部分的直径稍大一些。炮弹放进足够容纳它的药室后,被装药爆炸的力量推入炮身的膛线部分,这时由于铅层完全嵌入了膛线,彻底堵塞了炮弹和膛壁之间的空隙,因而爆炸时所产生的气体就丝毫不会外泄。这种火炮在瑞典和其他各地取得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如果说卡瓦利的火炮在热那亚已被用来装备军队,那末现在瑞典瓦克斯霍耳姆的和

英国朴次茅斯的穹窿形工事以及普鲁士的某些要塞里使用的，则都是瓦廉多夫式火炮。线膛炮就这样开始得到实际的使用了，虽然暂时还只是用于要塞。还需要再进一步，用线膛炮装备野战炮兵；法国已经走了这一步，而整个欧洲的炮兵现在也都正在走这一步。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介绍现在正在顺利制造的或可能制造出来的各种野战线膛炮。

二

我们在前一部分说过,最先在实际战斗中使用线膛炮的是法国人。在过去五六年间,两位军官——塔米济埃上校和特雷伊·德·博利约中校(现为上校)受政府的委托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而成果相当令人满意,以致能作为法国炮兵在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前夕进行改组的基础。我们不谈这些试验的经过了,现在就来谈一说法国炮兵目前采用的火炮。

由于法国人特别喜欢整齐划一,因而他们的野炮只有一种口径(法国旧式四磅炮的口径,即 85.5 毫米,也就是大约 3.5 英寸),攻城炮也只有一种口径(旧式十二磅炮的口径,即 120 毫米,也就是 4.75 英寸)。其他一切火炮,除臼炮外,必须一律取消。造炮的材料大部分是普通的造炮金属,但有时也用铸钢。炮弹是从炮口装填的,因为法国人进行的后装炮的试验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每门火炮有 6 条圆膛线,深 5 毫米,宽 16 毫米;看来,膛线的缠角不很大,不过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情况我们不了解。弹体与膛壁之间的空隙大约是半毫米到 1 毫米; ailettes 即嵌入膛线的弹齿所形成的空隙,则稍小于 1 毫米。炮弹是空心的,呈圆柱尖头形;装满火药时重约 12 磅;炮弹共有 6 个 ailettes,每条膛线 1 个,其中 3 个在弹头部;3 个在弹尾部;它们都很短,长约 15 毫米。发火管孔从弹头部通向中心,当弹内装满火药时,孔内即装上发火管或带击发火帽的雷管,在不需要炮弹爆炸时,则用铁螺帽盖住;在后一种

场合,炮弹要用木屑和沙子填满,以使其重量和装满火药时的重量相等。炮身的长度是 1385 毫米,即为炮膛直径的 16 倍。硬铜炮的总重量是 237 公斤(518 磅)。为了根据炮弹向膛线旋转方向产生的方向偏差,也就是一切线膛炮发射的炮弹必然发生的一种偏差来修正瞄准线,在火炮右耳轴上有所谓水平正切分划尺。据说这种火炮及其炮架制作得非常精致,由于它尺寸小以及讲究装饰,与其说它像一门真的军用火炮,不如说它像一个模型。

用这种火炮装备起来的法国炮兵参加了意大利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他们真正使奥军吃惊的,当然不是火炮的射击精度,而是火炮的远射程。这种火炮射击时经常产生甚至可以说总是产生远弹,因而对敌人预备队造成了比对第一线部队更大的危险,换句话说,在它们比一般火炮更有效地发挥杀伤作用的地方,它们所杀伤的却根本不是它们所瞄准的那些人。这种优越性当然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十次就有九次意味着火炮不能命中所瞄准的目标。奥地利的炮兵虽然和欧洲其他各国的炮兵一样装备了笨重的火炮,但在对付法国火炮时却表现得很不错,他们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从前车上卸下了火炮,在很近的距离(500 或 600 码)上与这个可怕的敌人对射。毫无疑问,不论法国新式火炮比旧式滑膛炮有多大的优越性,它却完全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望。它实际的最大射程是 4000 米(4400 码),关于这种火炮似乎可以在 3300 码的距离上轻而易举地击中单个骑兵的说法,毫无疑问不过是波拿巴分子无耻的夸大罢了。

在实际战斗中产生了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原因很简单。这种火炮的构造极不完善,如果法军坚持采用这种火炮的话,那末两三年以后,他们的火炮就会是全欧洲最差的花炮。线膛武器构

造的基本原则是要在炮弹和膛壁之间**没有空隙**，否则，炮弹在炮膛和膛线内就会不规则地转动，这样就不能围绕本身的纵轴线旋转，而是围绕着一**条捉摸不定的轴线成螺旋状旋转飞行**，这条轴线的方向决定于炮弹飞出炮口时的偶然位置，而且螺旋状转动的圈子将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增大。而法国火炮有很大的空隙，而且没有这种空隙还不行，因为炮弹的**发火管必须由装药爆炸时的火焰来引燃**。这正是射击所以不够准确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装药爆炸时多少会有一些气体从空隙中泄出，因而推力就不平衡。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空隙，因此在装药量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加大射角；道理很明显，等量的装药，在炮膛与炮弹之间根本没有气体外泄的情况下，会比部分气体外泄时把炮弹推得更远。看来，法国的线膛炮不仅需要大量的装药（相当于炮弹重量的五分之一），而且还需要用相当大的射角。即使在装药较少的情况下，线膛炮的射程也比滑膛炮的射程远，这主要是由于线膛炮没有空隙，以及装药爆炸时产生的推力全部用于推送炮弹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所致。法国人听任这种空隙存在，浪费了一部分推力，于是不得不增加一定量的装药来弥补这部分推力，而当装药无法继续增加时，则加大射角。然而在任何距离上，对射击精度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大射角了。当弹道的最高点超过目标的高度不多时，测定距离方面的误差不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远距离射击时，炮弹飞得很高，因此落角平均要比射角大一倍（这里所说的当然是限于射角不超过 15 度时的情况）。由此可见，射角愈大，炮弹落地的弧线就愈接近于垂直线；因此在测定距离时如果发生 10 码或 20 码以内的误差，就可能根本不会命中目标。而射击距离只要超过 400 或 500 码，这种误差是必不可免的，结果是靶场

上根据已定的距离所进行的出色的射击情况与战场上极坏的射击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在战场上,距离既不知道,目标又在运动,而且考虑的时间也很短。新式步枪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战场上它们在 300 码以外的距离上命中率很小,而在 300 码以内的距离上,由于弹道低,命中率很大;因此当冲锋的部队一接近这一距离,就只有刺刀冲锋是把敌人逐出阵地的最有效的方法了。假定某方军队使用的步枪,在 400 码距离上射击时所形成的弹道,并不高于他们敌人的步枪在 300 码距离上的弹道,那末这支军队就具有在比敌人远 100 码的距离上先开始有效射击的优越性,同时因为从 400 码的距离冲锋一共只需要三四分钟,所以这种优越性在战斗的决定性关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火炮的情况也是如此。10 年前,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就认为能以最小的射角达到最远的射程的火炮是最好的火炮。这一点对于线膛炮更为重要,因为目测距离时产生误差的可能性,是随着射程的增加而增大的;而跳弹又只有在使用球形弹时才能利用。这是线膛炮的一个缺点;线膛炮要命中目标,就必须使炮弹在第一次触及地面时便击中目标,而球形弹在发生近弹时却能够跳起,继续飞行,几乎不改变最初的方向。由此可见,低弹道在这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射角每增加一度,直接命中目标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减少;因此法国火炮的高弹道是它最严重的缺点之一。

可是,还有一个能使这种火炮声誉扫地的缺陷,这个缺陷使得它的全部缺点更加严重了。制造这种火炮所用的工具和所依据的原则,完全和过去制造旧式滑膛炮的一样。这种旧式火炮在其炮弹和膛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隙,炮弹的重量和直径都不相同,因而在制造这种火炮的过程中,丝毫不差的精密程度仅是次要的问题。

直到最近几年，火器的生产仍是现代工业中最落后的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中，手工操作很普遍，而机械操作却很少。这对旧式滑膛武器来说还可以容许，可是当生产的火器必须在很大的距离上保持高度的射击精度时，这种情况就不能容忍了。要使所有的步枪在 600、800 和 1000 码的距离上以及火炮在 2000、4000 和 6000 码的距离上一样精确地射击，就必须使每道工序的每一部分工作都由最完善的自动机器来完成，使每件武器的各个部分都丝毫不差地互相吻合。在旧式火器中感觉不到的微小误差，现在却成了使武器完全变成废品的缺点。法国人对于自己那些旧机器没有作出什么显著的改进，因此他们的射击不准确。如果没有一门火炮同其他火炮是完全相同的，那末即使射角相同，其他一切条件也都一样，火炮又怎么能达到相同的射程呢？而且由于火炮制造上的不精确，在 800 码距离上会发生 1 码误差，在 4000 码距离上就会发生 100 码的误差。能指望这样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精确地射击吗？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法国的线膛炮不好，因为它们一定有空隙，因为它们必须使用比较大的射角，而且因为它们的生产完全不符合远射程线膛炮的要求。必须尽快地把它们换成其他火炮，否则，法国炮兵就会成为欧洲最差的炮兵。

我们有意识地对这些火炮考察得比较详细一些，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阐述线膛炮构造的主要原理。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探讨目前正在英国争夺首位的两种火炮。这两种火炮的基本特点是，炮弹由炮尾部装填，没有空隙，制造精良；我所指的是阿姆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三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目前正在英国争夺首位的两种后装线膛炮；这 Z 两种线膛炮都不是军人发明的，但是它们的效能无疑都超过了造炮专家到目前为止所制成的一切产品；我说的就是阿姆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发明的火炮的优越条件，在于它是先发明的，并且已经博得了英国的整个报界和官方的赞赏。这种火炮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而且比法国线膛炮优越得多，但是能否超过惠特沃思火炮，还值得怀疑。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制造火炮时，是在铸钢管外面用锻铁条按螺旋状缠绕成两层套筒，同时上层缠绕的方向与下层相反，像缠丝枪管的构造一样。这种结构的火炮虽然花钱很多，但却非常牢固。炮膛内刻有许多紧密相邻的细膛线，这些膛线按炮膛的长度环绕一周。圆柱尖头形的长炮弹由铸铁制成，但外面包有一层铅，这就使炮弹的直径稍大于炮膛的直径；这种炮弹连同装药由炮尾部一起装入足够容纳它的药室；装药爆炸的力量将炮弹推入狭窄的炮膛，软铅便嵌入膛线，这样就完全堵塞了一切空隙，同时使炮弹获得一种由膛线缠角决定的螺旋式的旋转运动。这种把炮弹压入膛线的方法以及为此而在炮弹外面包上一层必要的软金属的方法，就是阿姆斯特朗线膛炮的特点。读者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前两部分阐述过的线膛炮的构造原理，那末一定会同意说，阿姆斯

特朗的线膛炮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炮弹的直径较炮膛大，那末火炮必然是后装的，我们认为这也是一切线膛炮必须具有的一个特点。不过，火炮后装设备就其本身来说，与不同类型的线膛炮的原理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的线膛炮上的后装设备可以交换使用，因此我们完全不准备谈这个问题。

这种新式火炮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是有些令人惊奇的。炮弹能够发射到将近 8500 码，即几乎 5 英里的距离，而且它在 2000 和 3000 码的距离上击中射靶的射击精度，远远超过了滑膛炮在这三分之一的距离上所能达到的射击精度。尽管英国报刊大力加以宣扬，可是所有这些试验中有关学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细节却仍然严守秘密。这种射程究竟是用多大的射角和多重的装药获得的，根本没有报道过，有关炮弹和火炮本身的重量的详细数字，有关方向偏差和距离偏差等的确切资料，也没有报道过。现在，在出现了惠特沃思火炮以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些细节，至少知道了一个阶段的试验的某些详细情况。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曾经在议会宣布说，十二磅炮重 8 担，用 1 磅 8 盎斯的装药，在射角为 7 度时，其炮弹的飞行距离为 2460 码，最大方向偏差为 3 码，最大距离偏差为 65 码；射角为 8 度时，炮弹飞行距离为 2797 码；射角为 9 度时，炮弹飞行距离则在 3000 码以上，而且两种偏差几乎和第一种情况完全一样。可是在滑膛野炮的实际射击中，采用 7 度到 9 度的射角却是一件没有听说过的事。例如在正式规定的射表中，射角最大只到 4 度，使用这种射角时，十二磅炮和九磅炮的射程可以达到 1400 码。任何继续增大野炮射角的做法都是无益的，因为这会使弹道过高，从而使命中率大大降低。可是我们掌握有关于重型滑膛舰炮用大射角进行射击的一些试验的资料（这些资料记载于霍

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海军炮兵”²²一书中)。1839年英国三十二磅长管炮在迪耳用7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231码到2318码；用9度的射角所达到的是2498码到2682码。1846年和1847年，法国三十六磅炮用7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270码，而用9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则是2636码。这说明，当射角相同时，线膛炮的射程并不比滑膛炮大很多。

惠特沃思火炮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姆斯特朗火炮相反。它的炮膛不是圆的，而是六角形的；它的膛线缠度几乎超过阿姆斯特朗火炮的一倍；炮弹是用极其坚硬的金属制成的，外面没有任何铅壳；炮弹是由炮尾部装填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有这种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便于操作和适应火炮的外形。这种炮是用不久前刚成为专利品的一种被称为“均质铁”的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的强度、弹性和抗力都较大；炮弹与炮膛是丝毫不差地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因此，炮弹如果不加以润滑，就装不进炮膛。润滑炮弹用的是一种腊和油的混合剂，放在装药和炮弹之间，这种混合剂同时还用来减小炮弹和膛壁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空隙。这种火炮很牢固，能够容易地经受3000次发射，而炮膛不会有什么损坏。

惠特沃思火炮是今年2月在郎卡郡海滨的南港进行了许多次试验而公诸于世的。当时向大家介绍的共有三种火炮；即三磅炮、十二磅炮和八十磅炮；我们从这些试验的详细报告中仅选出十二磅炮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这种炮的长度是7英尺9英寸，重量是8英担；而一般使用球形弹的十二磅滑膛炮的长度却是6英尺6英寸，重量是18英担。惠特沃思火炮所达到的射程如下：在射角为2度、使用1.75磅的装药时，射程为1208码到1281码（旧式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1000码）；射角为5度时，射程

为 2298 码到 2342 码 (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 1940 码); 射角为 10 度时, 射程平均为 4000 码 (旧式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时射程为 2800 码)。在采用大射角时, 则使用装药为 8 盎斯的三磅炮; 当射角为 20 度时, 其射程为 6300 码到 6800 码; 而当射角为 33 度和 35 度时, 射程则为 9400 码到 9700 码。而旧式五十六磅滑膛炮在射角为 20 度时, 其射程为 4381 码; 射角为 32 度时, 射程则为 5680 码。惠特沃思火炮的射击精度很令人满意, 而在减小方向偏差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至少不比阿姆斯特朗火炮差; 至于距离偏差的情况, 则根据试验还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3—4 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4 月 7、21 日和 5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914、5926 和 593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柏林的情绪

1860年4月10日于柏林

如果一个有理性的外国人，仅仅在两个月以前访问过柏林，现在又回到这个“理性之都”来，他就不能不感到吃惊：《meiner lieben Berliner》（“我亲爱的柏林市民们”）²³的面貌、腔调和情绪都完全变了。然而，几个月以前，首都社会的各阶层中还传说纷纭。人们悄悄地彼此道贺，说是十年反动时期的梦魇终于不再折磨他们的头脑了，最坏的时光已经过去。这个愚蠢的话题被人们用各种调子说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事后显示聪明的结论：转机的发生不是由于普鲁士臣民的强有力的健全的努力，而是由于普鲁士国王脑子的病态；这个转变不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是自然过程的结果。这种不能令人宽慰的结论，甚至破坏了柏林各家日报的无聊透顶的文人们所郑重宣告的新时代的早年的欢乐。懦怯的情绪流行一时，以致为了不吓跑摄政王的时新的自由主义，对所有参加第二院普选的候选人都作了下面一个简单的考查：他们对摄政王所建立的霍亨索伦内阁表示了信任吗？从新内阁的温和和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名字是否在某一方面不能被接受呢？以担当国家急难为己任的人是不要的，所要的是事先就准备投票支持内阁的走卒。至于新内阁实际上并没有触犯它的前辈制造

出来的官僚制度和警察制度的枷锁，新内阁的信仰表白又表现出半心半意的骑墙态度，充满吞吞吐吐的保留和模棱两可的缄默，——对于这些事实，公众都视而不见，而且还把视而不见宣布为一种爱国义务。所有的反对派报纸，不管自称是立宪派的，还是自称民主派的，都公开变成了政府报纸。

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之后，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曾经公布了一个关于意大利战争的某种蓝皮书²⁴。他的报告——一个低能儿的真正废话标本——暴露出，他不愧是那位在上个世纪缔结了巴塞尔和约而在这个世纪又造成耶拿大祸²⁵的人^①的后继者。我们看到了，冯·施莱尼茨先生是怎样恭顺地聆听小约翰^②，不列颠的万事通所讲的基本法制课；我们看到了，他是怎样匍匐在哥尔查科夫公爵脚下，怎样同十二月的英雄^③传递 *billets doux* (情书)，怎样傲慢地向他的奥地利同行皱眉；我们还看到，最后他是怎样挨他的所有通信人的脚踢。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报界和我们柏林的自由派仍然兴奋万状，颂扬这个不仅自己不行动，而且还设法阻碍了以德意志的名义采取任何行动的普鲁士政府表现了超凡的智慧。

此后不久，就在布勒斯劳举行了以俄国沙皇和哥尔查科夫为一方、摄政王和他的走卒大臣们为另一方的会谈²⁶，老老实实地签订了普鲁士臣服听命于它的俄国邻人的新协定——这是维拉弗兰卡和约的第一个后果，也是必然的后果。即使在 1844 年，这样的事情也会引起遍及全国的反对浪潮。然而现在，这个协定却被捧

① 哈登堡。——编者注

② 约翰·罗素。——编者注

③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之为眼光远大的治国安邦之才的证明。在我们的朋友柏林自由派以及各种色彩的普鲁士报纸看来(旧式权臣的专用机关报除外),摄政王的虚无主义的对外政策,再加上与官僚制度混合在一起的封建主义的反动旧制度原封不动(这种制度只不过名义上放弃而已),似乎就具备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宣布普鲁士王朝的代表有权取得小德意志(即把德意志奥地利除外的德意志)的皇位了。这样的盲目判断,在历史书上还很难找到先例;我们只记得,在奥斯特利茨会战²⁷以后,普鲁士也曾经像公鸡在粪堆上那样快乐地大叫过几天, *quasi re bene gesta* (似乎一切都很美好)。^①

意大利战争结束以后,以柏林报纸为首的普鲁士报界呈现出一片既可恶又可悲的景象;它们不敢对本国统治者的愚蠢的外交提出哪怕是微弱的批评,没有勇气去要求“自由主义的”内阁在它的对内政策中最后消除名义与实际之间的鸿沟,不去揭露曼托伊费尔的官僚(他们仍然优游自在地住在他们的旧时的主堡中)的军队一声不响地然而一直践踏公民自由的事实,这些事它们都不去做,反而大唱赞美诗歌颂革新的普鲁士伟大,把它们的钝箭射向已经受辱的奥地利,伸出它们无力的双手要求德意志的皇冠,而且,所作所为完全像一个生活在幻梦的疯子,使整个欧洲都十分惊奇。总之,我们的柏林朋友们面对着目前正在欧洲舞台上开演的伟大的国际戏剧似乎只是观众,他们应当从包厢里或者从池座上叫好或者发出嘘声,而不应当以剧中人的身分参加进去。

现在,这一切像随着魔杖的一挥那样变了。现时的柏林——恐怕巴勒摩和维也纳要除外——是欧洲最革命的城市。风潮遍及

^① 据法国寓言长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情节,公鸡在粪堆上闭眼唱歌,自鸣得意,被狐狸捉走。——译者注

所有阶层的居民,而且看来比 1848 年三月的日子更强大有力。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而且还是这样突然呢?是各种事变的凑合:首先,一方面是路易·波拿巴最近的武功,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政府提出的新的军队改革^①。其次是,轻信和有意自欺的状态本来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除此之外,就是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迫使内阁黜退了警察厅长施梯伯这个卑鄙的罪犯,他曾经同他的主子,已故的辛凯尔迪一起,从 1852 年起在普鲁士握有最高权力;最后的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公布了洪堡同万哈根·冯·恩赛的通信²⁸,——这才最后使大功告成。死者的气息驱散了幻梦。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4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4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93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只本卷第 20—25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西西里和西西里人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征服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几乎从波利菲米斯在埃特纳火山附近游逛和赛丽斯向西库利人²⁹传授耕作方法时起，一直到现在，西西里就是连续不断的入侵、混战和顽强抵抗的场所。西西里人是几乎所有北方种族和南方种族混合的产物：首先是土著的西卡尼人同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希腊人混合，以及同通过买卖或由于战争从世界各地运往该岛的奴隶混合，以后又同阿拉伯人、诺曼人、意大利人混合。虽然有这种种变化和变异，西西里人仍然为争取自由一直进行着战斗。

三千多年以前，西西里的土著居民曾经尽一切力量抵抗过武器较为完善和军事学术较为发达的迦太基和希腊的征服者。他们被迫纳贡，但无论是迦太基征服者，或者是希腊征服者，都没有能使他们完全屈服。西西里在长时期内成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角逐的场所；它的居民被弄得流离失所，一部分沦为奴隶；它的城市住满了迦太基人和希腊人，成了向该岛的整个腹地推行压迫和奴役的主要中心。但古代的这些西西里人从未放过一次机会为自由而斗争，至少是一有可能就向迦太基统治者和叙拉古人复仇。最后，

罗马人把迦太基人和叙拉古人都征服了，把所有能卖的人都卖为奴隶。有一次竟有 3 万个巴诺摩（现在的巴勒摩）居民这样被卖了出去。罗马人利用人数无算的奴隶队伍在西西里耕种土地，以使用西西里的小麦养活不朽之都^①的贫穷无产者。为此他们不仅把岛上的居民变为奴隶，而且还从所有其他属地上把奴隶向岛上运。凡是稍许了解罗马历史或西塞罗演说艺术的人，都会知道罗马的总督、大法官和地方官的极端残暴。大概，罗马人的残忍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放纵过。自由的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交不出向他们勒索的苛重贡品，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儿女就被税吏无情地卖为奴隶。

虽然如此，无论在叙拉古的迪奥尼修斯时代，还是在罗马人统治时代，西西里都不时爆发惊人的奴隶起义，在起义中往往是当地人和被运到该岛的奴隶共同斗争。在罗马帝国衰落时代，许多征服者侵入了西西里。后来，又有一个时期西西里被摩尔人所侵占；但西西里人——首先是住在该岛腹地的土著居民——始终进行着有一定成效的反抗，一步步捍卫或争得各种细小的自由。当中世纪的暗夜中刚刚露出曙光的时候，西西里人就不仅已经争得了一系列的市镇自由，而且也建立了那时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的萌芽形式的立宪政体。西西里人早于任何其他欧洲民族采用表决方式来调整政府和君主的收入。可见，西西里的土地自古以来就不适于压迫者和征服者生存，而西西里晚祷³⁰在历史上将永垂不朽。当阿腊贡王朝使西西里人附属于西班牙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自己的政治自由免遭侵犯；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和波旁王朝

^① 即罗马城，罗马帝国的首都。——译者注

时代，他们也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把统治那不勒斯的暴虐王朝逐出那不勒斯时，西西里人在英国的种种诺言和保证的诱惑下接纳了逃亡者，并且和拿破仑作斗争，用鲜血来保护他们，拿金钱来支持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后来波旁王朝用什么样的背叛行为报答了他们，英国企图而且至今还企图用什么样的花招和丧尽良心的自我更正来掩饰它背信弃义地把西西里人民和他们的自由交给波旁王朝去宰割的行为。

目前，人民中的一切阶级都被政治的、行政的和财政的压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这些委屈就突出到首要地位上来了。但是，几乎所有的土地至今仍属为数不多的大地主或贵族所有。中世纪的土制制度至今还在西西里保存着，只不过耕者不是农奴罢了；他们是在十一世纪左右变成自由佃农时摆脱农奴依附的，但租佃条件大都极为苛刻，以至绝大多数耕者仅仅为税吏和贵族干活，产品除缴纳捐税和地租外几乎剩不下什么。他们自己则生活在赤贫中，至少是非常贫困。虽然他们种植驰名的西西里小麦，培育出色的水果，但是一年到头都仅以豆类充饥。

现在西西里又在流血，而英国则安闲地观望着卑劣的波旁及其同样卑劣的宗教扈从和世俗扈从——耶稣会教徒和近卫军的新的放纵行为³¹。忙碌的演说家们在不列颠的议会中用空洞的废话震动着空气，侈谈萨瓦和对瑞士的威胁，而对西西里各城市中的屠杀则一字不提。在整个欧洲听不到一点愤慨的呼声。没有一个君主，没有一个议会宣布嗜血成性的那不勒斯白痴不受法律保护。只有路易—拿破仑为了某种目的，或许会去制止这个人肉商所进行的屠杀，当然，这不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而是为了抬高他的王朝的地位，或是为了加强法国的影响。英国将大骂失信，大发雷霆

抗议拿破仑背信弃义和追求虚荣,但是,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不管是得到缪拉特或是得到别的哪一个新君主,他们终究是要赢得好处的。无论怎样变都会好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4 月底—
5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5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948 号

卡·马克思 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 未来战争作准备

—

1860年5月1日于柏林

此间社会上所有各阶级中正盛行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路易·波拿巴正打算把德国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今天的“国民报”上，一位通讯记者甚至断言，据他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的消息，巴登格（巴黎人对路易·波拿巴的戏称）³²已经确定要在莱茵河上进行战争；还说，几个星期以前，约翰·罗素勋爵知道这个计划以后跳起来大骂法国皇帝，并且突然宣布英国现在要找新的盟友，因而使下院大吃一惊。法国半官方报刊的语调和情绪根本没有消除这种恐慌。请大家读一段大多数法国地方报刊从中汲取灵感的巴黎布耳埃通讯社³³如下的一段通讯。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爱开玩笑预言未来的人，最近曾对我说：‘等着瞧吧，皇帝一定去莱茵河向普鲁士国王建议结盟，顺便也把疆界稍微修改一下。’对此我引用了‘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这个小册子中的一句话来回答说：‘通过友好的办法解决领土改变问题，要比在胜利后第二天被迫这样做好些。’”

法国政府同英国订立了商约以后不久，曾向普鲁士驻巴黎公使作了这样一个暗示：如果提议法国和关税同盟³⁴之间也订立一个类似的条约，想必会受到欢迎。但普鲁士政府回答说，关税同盟根本不想订立这样的条约。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并且用很不礼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除此之外，普鲁士政府那时还得到充分的情报，知道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在此以前不久就已开始同巴伐利亚宫廷进行谈判，要求后者把兰道要塞让与法国，说这个地方曾根据 1814 年的条约留给了法国，但后来又根据 1815 年的条约把它从法国手中很不公平地夺走了³⁵。由此可见，在居民中流传的关于即将同法国决裂的消息，还有官方的猜疑表现来作证明。

目前普鲁士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很像奥地利在东方战争结束后的情况。当时，奥地利同其他强国比起来，所得的利益似乎最大。它得意洋洋地认为，除了把自己的军队动员了一下以外，没有给自己添任何麻烦，就杀下了它的危险的邻邦俄国的威风。由于奥地利扮演的是武装调停者的角色，而西方列强则不得不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所以在和约签订以后，奥地利就自以为它已经假手于西方盟国的武装力量，把俄国自 1849 年匈牙利事件³⁶以来对它所取得的优势摧毁了。的确，维也纳内阁当时也听到不少恭维它外交手段十分巧妙的话。但实际上却是，奥地利在东方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使它失去了同盟者，使路易·波拿巴得以把意大利战争局部化。在意大利战争的过程中，普鲁士也保全了自己的一切资源。它手里是拿起武器了，但是却不使用，只让它的政治谋士们挥洒那顺从的墨水去代替士兵们流血。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看起来似乎是，普鲁士已经借法国胜利之助，把自己的竞争者哈布斯堡王朝削弱，为自己开辟了做德意志盟主的道路。

然而,宣布在维拉弗兰卡议和的理由本身,就应该已打消了普鲁士的幻想。路易·波拿巴宣称,普鲁士的武装和进行干涉的威胁牵制了法国的力量,而奥地利则宣称,它的抵抗力量是被普鲁士的模棱两可的中立瓦解的。在整个战争期间,普鲁士一直都在表示与自己的行动有着可笑的矛盾贪求。它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各小邦面前说自己负有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义务;在英国和俄国面前说自己负有作为一个主要的德意志国家的义务,并且以这些虚伪的托词为理由,贪心地要求法国承认它是欧洲的武装调停者。由于贪图 *par excellence* (主要) 德意志国家这一称号,它就让俄国在一项空前无礼的周知照会中恐吓德意志各小邦的宫廷³⁷,并且让施莱尼茨先生作代表诚惶诚恐地恭听约翰·罗素勋爵关于“基本的”国际公法的冗长讲课。

普鲁士的行动进一步证实了它贪图充当欧洲大国的角色:它把德意志各小邦国君的要战的热情平息了下去,并且企图利用奥地利在军事上的失败来攫取它的这个对手原来在德意志联邦的机构中的位置。当法国军队的胜利终于迫使它采取某种要战的立场时,它便碰到了德意志各小邦冷淡的反对态度,这些小邦都已不大隐瞒它们对普鲁士宫廷的最终目的的不信任了。到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的时候,普鲁士已经不仅在欧洲完全孤立,而且在德意志也完全孤立;接踵而来的萨瓦被兼并则使法国的无防御的疆界大大缩短,于是法国在莱茵河上打胜仗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普鲁士现在力图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政治路线都同样是错误的。不管在普鲁士的报刊上和众议院里吹嘘得多么起劲,但在它的内政方面,除了它的官吏们所用的词句之外,没有丝毫变化。关于军队改革的提案根本没有预定

要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以应付紧急情况,这些提案的目的只是不断扩大已经过度庞大的常备军,加重已经过度紧张的财政负担,并取消国家唯一的民主设施——后备军³⁸。关于出版、结社权、市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官僚主义的监护、无所不在的警察等等的反动法律,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甚至关于贵族与平民通婚的可耻条例至今也没有废除。关于恢复被 coup d'état (政变) 所推翻的宪法的主张,就像一种狂想一样遭到嘲笑。

让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普鲁士臣民现在所享有的公民自由吧。在最反动的时期,有一个莱茵普鲁士人^①以所谓政治罪被不公正组成的陪审法庭判处 7 年徒刑,监禁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里。自由主义的政府并没有给他减刑。他刑满后就去科伦,但科伦警察局立即把他驱逐。于是他就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城市。但莫名其妙的是,当局却通知他说:由于他 7 年不在,所以他丧失了公民权,得寻找新的住所。他提出反驳说,他的不在并非出于自愿,可是这种反驳毫无结果。后来他到了柏林,但又被赶走,借口是他除了个人能够工作和运用自己的知识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因为他的全部财产已在被监禁期间用光。最后他到了布勒斯劳,在这里,他的一个老朋友把他安置在自己那里作帮手;但是有一天早上他被警察局传去,警察局对他说,如果他不能取得布勒斯劳市的公民权,顶多只能允许他在这个城市里再住几个星期。他去找布勒斯劳市政当局,但却遭到百般刁难;后来由于热心的朋友们为他奔走设法,这些阻难才得以克服,他关于公民权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但是,与公民权一起,他却收到一张很大的收费单,上面列有许多项

^① 诺特荣克。——编者注

凡有幸被接受为布勒斯劳公民的平民所应缴纳的费用。假如不是他的朋友们共同筹集这笔款项的话，这个普鲁士小民就会像一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那样，在他光荣的祖国找不到安睡的地方。

二

1860年5月2日于柏林

普鲁士政府有好几个月一直陶醉于一种妄想，以为它将被承认为欧洲的武装调停者，以为它将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霍亨索伦王朝君临全国的大厦。但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后，看来它已经感到在它的前途上埋伏着巨大危险了。它那犹豫动摇而且背信弃义的政策使它失去了同盟者；就连冯·施莱尼茨——他那冗长的书信已成为外交界的一个说不完的笑柄——也未必能使自己无视这一事实：一旦法国内部状况再度驱使十二月英雄^①冲出法国国境，普鲁士必定会成为新的局部化战争的目标。

难道路易一拿破仑不是已经在故作坦率的时候透露出几句话，说他知道德意志需要统一，他就是可以使它统一的人，并且说用莱茵河各省换取这样珍贵的东西代价不算过高吗？和普鲁士过去的传统完全一致，摄政王及其仆从们首先便想到恳求俄国的慈悲。难道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一世不是曾经同彼得大帝一起，为反对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而签订了瓜分条约，因而获得了波美拉尼亚吗³⁹？难道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中不是多亏俄国扔掉了盟国奥地利才取得了胜利，并且夺得了西里西亚吗⁴⁰？难道不是由于柏林宫廷和彼得堡宫廷的策划，对波兰进行了几次瓜分⁴¹，才使小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小的普鲁士君主国的疆界大大扩大吗？难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极端谄媚的立场——他在1814年正当英国、奥地利和法国表现出某些反对和抗拒迹象时支持亚历山大一世——不是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奖赏，使萨克森和莱茵河各省并给了普鲁士吗⁴²？总之，普鲁士在觊觎德意志的时候，一向都是仰仗俄国的庇护和支持的，当然，要履行一个特殊条件，即帮助俄国征服其邻国，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俄国的恭顺仆从的角色。1859年10月，摄政王和亚历山大二世在外交官、将军和廷臣的簇拥之下，在布勒斯劳为签订条约而会见了，条约的条文至今仍是一个无法揣测的秘密，但这对路易·波拿巴或帕麦斯顿勋爵并不是秘密，而对普鲁士臣民才是一个秘密，他们的自由主义代表者当然非常谦恭有礼，不敢就这个微妙的问题向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提出质问。然而可靠的是，波拿巴的报刊并没有因布勒斯劳会议而表现出惊慌；俄法之间的关系从那时起更加使人不安地亲近起来；这次会议并没有妨碍路易·波拿巴侵占萨瓦，威胁瑞士，暗示“莱茵河疆界”必不可免地要作一些“修改”；最后，普鲁士本身，虽然有重新蒙准为俄国作先锋的希望可以自慰，最近仍然贪婪地抓住同英国结盟这一块诱饵，而伦敦抛出这一块诱饵只不过是為了在一两个星期内使英国下院有所消遣而已。

然而，约翰·罗素勋爵一时疏忽，在蓝皮书⁴³中透露了冯·施莱尼茨先生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如何勾搭土伊勒里宫，这便给了英普同盟一个致命的打击；普鲁士政府有一个时期曾认为这个同盟是一个真正现实的计划，但在伦敦，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无非是一句空话，借此玩弄议会把戏罢了。归根到底，尽管同亚历山大二世在布勒斯劳举行了会议，尽管约翰·罗素勋爵已经开始

“寻找新的同盟者”，普鲁士现在也像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一样，在法国的自然疆界论⁴⁴面前完全孤立了。

谁能相信，普鲁士政府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所想到的唯一办法，竟然是重新搬出建立以霍亨索伦王朝的一员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计划，并且通过最无礼的挑衅行动，不仅把奥地利抛到敌对阵营中去，而且使整个南德意志离开自己呢？不管这看来是多么不足信——尤其是因为波拿巴的报刊也热心推荐这种政治路线——，然而实际情况却正是这样。危险愈是逼近，普鲁士就愈想显示自己重新分裂德国的意图。顺便说一下，在奥地利遭受打击以后，德意志很有可能是需要使普鲁士也受到一个这样的打击，以便摆脱“两个王朝”；但无论如何谁也料想不到摄政王及冯·施莱尼茨先生所奉行的是这样悲观的原则。自维拉弗兰卡条约签订以后，摄政王的政策的趋向通过报纸上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一些小争论和议会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暂的、偶然的辩论暴露出来，但到4月20日，在普鲁士下院辩论黑森问题时，秘密就完全暴露了。

关于这个黑森问题，我已经向贵报读者作过说明⁴⁵，所以现在只把辩论所围绕的主要几点稍作解释。当1831年的黑森宪法被选帝侯在奥地利的赞助下于1849—1850年撕毁时，普鲁士有一个时候也曾假装要代表提出抗议的众议院宣战；但在1850年11月，当施瓦尔岑堡公爵同曼托伊费尔男爵在奥里缪茨会见时，普鲁士便完全向奥地利投降，承认恢复旧的德意志议会⁴⁶，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放弃了自己对盟主权的一切贪求，与此同时，也就放弃了保护1831年黑森宪法的侠义行动。

1852年，选帝侯不顾黑森人民反对，恩赐了一个得到德意志议会保证的新宪法。意大利战争以后，在普鲁士秘密鼓动下，这个

问题又被提出来讨论。黑森的上下两院再度表示赞成 1831 年宪法的合法性,法兰克福议会也开始收到新的请愿书,要求恢复这个宪法。这时普鲁士声明,1831 年的宪法是唯一合法的宪法,但是它却很知趣地补充说,这个宪法应该使之符合议会的君主制原则。另一方面,奥地利则说,1852 年的宪法是合法的,但应该根据自由主义的精神修改一下。这样一来,所争论的只是一些无关大体的小事,而且带有纯诡辩的性质。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这两个王朝在德意志联邦内部较量一下彼此的力量。议会终于以绝大多数作出决议,赞成 1852 年的宪法,也就是赞成奥地利,反对普鲁士。德意志各小邦的立场受到影响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这些小邦知道,奥地利正在忙于解决它在对外政策上的难题,而且它很吃不开,所以它除了竭力保持德意志的一般 *status quo* (现状) 以外,别无更大的志愿,而另一方面,它们则怀疑普鲁士正在拟制沽名钓誉的新政计划。如果它们不承认德意志议会于 1851 年通过的这一决议合法,那就会使议会自 1848 年以来所作的一切其他决议的合法性都受到威胁。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不喜欢普鲁士对德意志各小邦实行操纵并借口支持黑森人民对选帝侯的不满企图侵犯它们的主权这样的战略。因此普鲁士的提案就失败了。

这样,到 4 月 20 日,当这个问题成了柏林下院辩论的题目时,冯·施莱尼茨先生就代表普鲁士政府明确声明:普鲁士将不承认自己受德意志议会的决议的束缚;1850 年制定普鲁士宪法时德意志议会已不存在,因为这个机构已被 1848 年的风暴扫除;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议会的一切同普鲁士政府的计划相矛盾的决议都没有法律效力;最后,德意志议会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尽管德意志

联邦仍继续存在。还能够设想普鲁士政府会采取任何比这更荒唐的步骤吗？奥地利政府曾宣布，德意志帝国旧有的国家机构已不存在，这是在拿破仑第一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德意志帝国以后。哈布斯堡当时只是肯定一事实。霍亨索伦则相反，它现在是正当国外战争威胁着德意志的时候宣布德意志联邦的宪法无效，这似乎是为了给十二月英雄同德意志各小邦单独结盟以合法的借口，因为议会的法律至今仍妨碍各小邦这样做。如果普鲁士所宣布的是1848年的革命合法，并宣布它自己以及德意志议会在1848年以后颁布的一切反革命法律无效，如果它把革命时代的制度和法律恢复起来，它本来是可以取得整个德意志——包括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在内——的同情的。

可是现在，它只是引起了德意志各邦君主间的分裂，而没有把德意志人民团结起来。实际上它是敞开了大门放朱阿夫兵进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5月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0年5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50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本文第二部分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普鲁士的状况^①

1860年5月28日于柏林

不言而喻，加里波第在西西里的战绩是这里的主要话题，像在整个欧洲一样。诸君知道，无耻地滥用电报，像目前在那不勒斯和热那亚或都灵所做的那样，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侵袭欧洲的蝗虫，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满天飞的电报“鸭”^②那样多。因此，简要地叙述一下此间最有权威的军界人士对西西里事态的看法，是合乎时宜的。首先，尽人皆知，在加里波第到达以前起义已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但是，尽管这一事实十分重要，对它的估计，像巴黎的“立宪主义者报”⁴⁷所做的那样，可能是过高了。在朗扎将军率领援军到达西西里之前，那里的那不勒斯军队未必有2万人，其绝大部分都不得不集中在巴勒摩和墨西拿的要塞中，因此抽出来追踪起义者的游动队可以夸耀在几次小战斗中的战绩，可以驱散个别据点上的敌人，也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骚扰敌人，但是它表明自己是完全没有力量把起义最终镇压下去的。目前巴勒摩大概集结了那不

① 标题的第一部分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② 原文用法文 canards 一词，有“鸭”和“谣言”两个意思。——译者注

勒斯军 3 万人,其中三分之二驻在要塞,三分之一安营在要塞的四周。据悉,墨西拿有 15000 那不勒斯兵。至于谈到加里波第,根据最近的消息,他还没有越过蒙雷阿勒。诚然,这一城市位于山丘之上,从陆上控制着巴勒摩,但是要利用这一阵地的优越地势,加里波第却缺少一个主要条件——攻城炮兵。因此,在最近期间,加里波第(他的军队约有 12000 人)的成败将取决于两种主要的情况:起义向全岛扩展的速度和巴勒摩的那不勒斯兵士的态度。如果后者发生动摇,并且与他们队伍中的外国雇佣军发生冲突,那末,朗扎的防御手段就会在他自己的手里毁掉。如果起义扩展到很大的规模,那末加里波第的军队将壮大到更具有威胁力量的程度。加里波第如果拿下了巴勒摩,他就会横扫自己道路上除墨西拿以外的一切地方,因为在墨西拿他会再一次面临一个困难的任务。请回忆一下,在 1848—1849 年,那不勒斯人失掉了一切地方,只剩下了墨西拿作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之间的某种 *côte-de-pont* (桥头堡);但是,由于当时守住了墨西拿,结果就把全岛夺了回来。不过,这一次由于政治情况改变,巴勒摩陷落和爱国者占领除墨西拿以外的全岛,定会取得比 1848—1849 年更有决定意义的成果。如果加里波第占领了巴勒摩,“意大利国王”就会给他正式的支持。加里波第如果失败,他的进军就将被宣布为个人的冒险。在加里波第的话中带有的一种讽刺意味的感慨,他对维克多—艾曼努尔说,他行将为国王再夺到一个省,但希望国王不要像出卖尼斯——加里波第的故乡那样出卖它。

在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中,社会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主要集中在普鲁士摄政王给英国女王的丈夫的一封私人信件⁴⁸上。这封信的副本被路易·波拿巴的驻柏林宫廷的大使拉图尔·多韦尔尼侯爵

转给了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先生。这位大使不以这样的越礼行为为限，竟然还冒昧地要求对信中某些地方进行解释，因为那里牵涉到伟大的巴黎 saltimbanque (丑角) 的声誉和计划。这件事令人想起 1833 年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和约⁴⁹批准前不久所发生的一个类似的事件。土耳其总理大臣曾经把奥尔洛夫伯爵所拟定的密约送了一个副本给驻君士坦丁堡的不列颠大使馆，但是，使他惊讶之余颇不愉快的是，第二天奥尔洛夫伯爵就把同一副本还给了他，并且恼怒地希望他以后挑选可靠的人办事，这件事弄得他十分尴尬。在柏林大家都深信，摄政王这封通过**奥斯坦德**而不是通过**加来**邮出的信，是在英国邮政总局被拆的，那里有许多人员明目张胆地检查可疑的信件。这种做法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在联合内阁时期阿伯丁伯爵自己承认，他不敢冒险把自己给首都朋友的信托付给邮局。据推测，帕麦斯顿勋爵通过这种办法获得摄政王的信件副本后，由于敌视阿尔伯特亲王和为了英法俄同盟的利益，就把它交给了法国驻伦敦大使处理。不管怎样，英普同盟的前景虽然议论得如此热烈，但决不是美妙的。

几个月之前，当约翰·罗素勋爵某一天忽然声称英国必须寻求新盟友的时候，而且柏林官方又以孩子般的热情从而响应之后，在英国的议会报告中却突然发表了布卢姆菲耳德勋爵拍给唐宁街⁵⁰外交部的报告，报告申述了他在不久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期间同冯·施莱尼茨先生的一次私人谈话，使普鲁士对外政策的真诚意图的名誉大受打击。这时约翰勋爵承认，他做了一件最莫名其妙的蠢事，而新同盟则遭到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摄政王的信送错了地方。

诸君想必知道，摄政王在他的议会开幕词中曾经非常强调地

谈到条约义务的牢靠，谈到德国将用统一战线来对付任何侵犯共同的祖国的独立和完整的企图。这种直截了当的威胁在巴黎交易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被俄国的“北方报”缓和了，该报用一种挖苦式的表示宽容的 bonbomie (善意) 语调使摄政王的开幕词没有了一点认真的意味，并且提醒人们记起他在意大利战争时期所说的类似的词句，而最后则把开幕词的整个这一部分评为不过是一种迎合人民情绪的愿望而已。至于摄政王开幕词的其余部分，从实质上说，只不过是一张立法方面种种失败的清单。曾经在两院讨论过的少数重要法律草案——婚姻法草案、市政法草案、田赋改革法草案（在王国大部分地区，贵族仍然免交田赋）——都成了死胎。此外，摄政王对于他本人所建议的有关军队改革的措施至今未获法律效力一事，表示不满。

即使在这一届有相当多数都拥护政府的众议院中，政府也没有能够通过它所建议的军队改革，但是，它却终于争到了一笔 950 万塔勒的补充拨款作为军费。而与此同时，据我从各省的来信得知，在军队组织方面所策划的改革，却正在不声不响然而实实在在地贯彻下去，以便使两院重新开会时面对着已成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的东西无计可施，只好批准。关于所策划的军事改革的实质，俄国的德文月刊“波罗的海月刊”曾经作了说明。这家报纸在里加出版，它是经俄国的里夫兰、爱斯兰和库尔兰总督批准印行的。

这家杂志写道：“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后立即提出的普鲁士军队改革，看来只有一个目的——使政府今后不必再直接请求全体国民支持，因为在旧的军事制度下，每当政府认为需要用军事示威来加强它的政策时，是必须请求全体国民支持的。在欧洲当前的政治局面下，一个像普鲁士那样的力求被

完全承认为大国的国家，既不能一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就破坏国内的和平生活，也不能每次都向居民保证，它的拿起武器的号召果真就与开始打仗有关。在后备军制度中，包含着某种对抗君主制原则的民主因素。1850年和1859年前后相隔不长接连两次动员，两次动员的结局都不是战争而是复员，看来，这已经破坏了很大一部分普鲁士居民的信任心，使他们甚至不再信任国家的军政方针了。两次动员时所发生的情况本身，显然已使人民得出结论：政府在每次宣布总动员以前，必须先征得公众的同意。甚至普鲁士的说明自己在意大利战争时期的立场的官方声明，也都承认动员后备军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这家俄国的德文杂志由此作出结论说，普鲁士应当摆脱现在这种形式的后备军制度，但它同时又带着嘲弄语气暗示说，“正当普鲁士政府强调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时候，这样改变一种最得人心的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必须指出，“波罗的海月刊”这一家在沙皇政府监护下在里加出版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波拿巴保护下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斯特拉斯堡记者报”的补充。两个刊物，一个从东方，一个从西方，在德意志边境上耀武扬威。前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说是文坛上的哥萨克兵，后一刊物的作者可以说是文坛上的朱阿夫兵。两个刊物都吹嘘自己热爱德意志，并且精心制造一些贤明的忠告，提给这一个它们不惜自降身分使用其语言的国家。两个刊物都努力训练德意志进行未来的伟大改革，并且都强烈地散发着恰好现在把巴黎的凯撒制度和彼得堡的沙皇制度联合起来的那种 *entente cordiale* (诚意协商) 的臭气。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斯特拉斯堡的报纸虽然充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所特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假高尚精神，但仍然有一个使用南德意志的通俗语言的特点。它努力表明自己是健全思维的拥护者，绝不妄求任何文雅。相反，里加的那个月刊则发扬着科尼斯

堡大学的传统，故意炫耀大学者谆谆诲人的姿态和形而上学的深思神情。然而，对于德国报刊攻击“月刊”和“记者报”，特别是攻击“记者报”的时候所爆发的爱国义愤，我认为不过是孩子般的窘急之情的愚蠢表现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5 月 28 日

载于 1860 年 6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97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在西西里

关于加里波第从马尔萨拉向巴勒摩这次令人惊奇的进军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听到许多极其矛盾的消息以后，终于获得了看来相当可靠的报道。的确，这是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之一；如果不是这位革命将领在这次胜利进军以前就卓有声誉，这样的战绩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加里波第的胜利证明，那不勒斯王国军队仍然对这个曾经在法军、那不勒斯军和奥军面前一直高举意大利革命旗帜的人感到恐惧，而西西里人民对于他以及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则没有丧失信心。

5月6日，两艘轮船载着约1400名武装的兵士离开了热那亚海岸；他们组成7个连，显然，这里的每一个连都要成为在起义者中间召集的一个营的核心。8日，他们在托斯卡纳海岸的塔拉莫涅登陆，用各种理由说服该地的要塞司令向他们供应了煤、弹药和4门野炮。10日，他们进入了西西里最西端的马尔萨拉港，携带了所有的武器装备在该地登陆，尽管当时有两艘那不勒斯军舰开到，但在紧要关头却无力阻挠他们登陆。关于英国人曾进行干涉协助起义者的说法已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现在连那不勒斯人自己也抛弃了这种说法。5月12日，这支小部队开始向距海岸18英里、位于去巴勒摩的路上的萨累米进军。大概就在这里，革命党的领袖们

会见了加里波第同他进行了讨论，并且集结了约 4000 名起义者组成的援军。在援军进行编组的时候，几个星期以前遭到失败但未被完全镇压下去的起义，在西西里西部所有山区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而且，正如 16 日所得知的，起义的发展还是顺利的。5 月 15 日，加里波第率领他的 1400 名有组织的志愿军和 4000 名武装农民翻山越岭向北推进到卡拉塔菲米；从马尔萨拉来的土路与从特腊帕尼通往马尔萨拉的大道就在这里会合。横穿雄伟的切腊腊山（即所谓皮扬托—罗马诺山）的支脉而通向卡拉塔菲米的狭谷有朗迪将军指挥的王国军队 3 个营包括骑兵和炮兵把守。加里波第立即对这一阵地发起攻击，开始时该阵地的防守是顽强的；但是，尽管加里波第只能用他的志愿军和很小一部分西西里起义者来攻击 3000—3500 名那不勒斯军队，王国军队仍然被连续逐出 5 道坚固的阵地，并且损失了 1 门山炮，还有大量伤亡。加里波第部队的损失，据他们自己宣布，是 18 人阵亡，128 人受伤。那不勒斯人硬说，他们在这次小战斗中缴获了一面加里波第的旗子；但是由于他们曾经在马尔萨拉的一艘弃而不用的小轮船上找到一面忘记带走的旗子，所以完全可能，他们在那不勒斯展览、用来证明他们似乎曾经取得的胜利的，就是这面旗子。然而，卡拉塔菲米的失败并没有使王国军队在当天晚上退出该城。他们直到次日早晨才从那里撤走，此后一直到巴勒摩，大概都没有对加里波第进行过任何抵抗。他们到达了巴勒摩，但已陷入完全涣散和混乱的状态。王国军队竟被一股“海盗和武装匪徒”击溃这一事实，立刻使他们回想起当年的加里波第的可怕形象，正是这个加里波第在抵抗法军保卫罗马⁵¹的时候却能选择时机进攻韦累特里并击退整个那不勒斯军队的前卫，以后又在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比那不勒斯军队骁勇得多的

敌军。由于仓促退却,加之毫无继续抵抗的企图,就更加助长了在这以前便已经在王国军队中出现的绝望情绪和逃跑倾向;而当他们突然处于萨累米会议所计划的起义的中心并且受到起义者的频繁袭击时,他们之间的一切团结精神便完全消失了;朗迪的这一旅人惊慌失措地乱成一团,人数减少了很多,一小队一小队地陆续逃回巴勒摩。

加里波第就在朗迪放弃卡拉塔菲米的当天即 16 日进入该城; 17 日进到阿耳卡莫(前进 10 英里), 18 日进到帕蒂尼科(前进 10 英里)并继续向巴勒摩方向前进。19 日,不停的大雨使部队无法继续运动。

这时加里波第获悉,那不勒斯军队正在巴勒摩周围构筑堑壕,并加固面对帕蒂尼科大道方向的半已损毁的旧城墙。他们至少还有 22000 人,这就远远超过了加里波第所能用来对他们作战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是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了,许多人开始打算投到起义者方面来;同时他们的将领庸碌无能,而这一点,无论他们自己的兵士或他们的敌人都是知道的。他们中间只有两个外籍营是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加里波第不能下立即从正面强攻城市的决心,但是那不勒斯军队也不能对他采取稍许坚决的行动,即使他们的军队有这种能力也不行,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城内经常保持一支强大的警备部队,并且任何时候也不能离城太远。如果处在加里波第的地位的是一位平凡的将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进行许多无计划的和不坚决的小战斗;在这些小战斗中,他可以使自己一部分新兵学会作战,不过,王国军队也会很快地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已失去的对于本身力量和纪律的信心,因为在某些小战斗中他们必然会成为胜利者。但是这种作战方法无论是对于起义或是对

于加里波第来说,都是不适合的。这时,大胆进攻是革命所允许的唯一战术;起义者只要一接近巴勒摩,就必须取得像解放该城那样惊人的胜利。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加里波第表现出是一位不仅能够进行游击战,而且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战斗的杰出将领。

20日及以后几天中,加里波第攻击了那不勒斯的警戒部队和配置在蒙雷阿勒(位于从特腊帕尼到巴勒摩的路上)和帕尔科(位于从科尔累奥内到巴勒摩的路上)附近的阵地,因而使敌人认为加里波第的进攻主要将指向城市的西南部,并认为他的主力也正是集中在这个方向。加里波第把进攻和假退却巧妙地结合起来,诱使那不勒斯军队的将领把愈来愈多的部队从城里派到这个方向上来,因此到24日就有1万名左右的那不勒斯军队开到城外,配置在通往帕尔科的道路上。这正是加里波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立即迫使敌军同他的一部分军队作战,并缓慢地后退,诱使敌人离城愈来愈远,而当敌人被引到皮亚纳,越过了横贯西西里并把孔卡—多罗(“金色的贝壳”——巴勒摩的一个谷地)同科尔累奥内谷地隔开的主脉以后,他便出其不意地把主力从这个主脉的另一些山道调到巴勒摩附近濒海的米集耳美里谷地。25日,他把大本营移到了距首府8英里的米集耳美里。我们不知道后来他对于那1万名陷在唯一的一条穿过山脉的恶劣道路上的那不勒斯军队还采取了什么行动,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用一次又一次的诈败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一直到确有把握地知道他们不致很快返回巴勒摩为止。他用这种办法使守城部队减少了几几乎一半,并且把进攻路线从特腊帕尼道路改到卡塔尼亚道路,这样他就能够发起总攻了。关于

城内的起义是在加里波第进行强攻以前发生的还是因为他出现在城门旁才引起的这个问题，由于报道的互相矛盾而无法得出答案。但是，确凿无疑的是：27日早晨巴勒摩的全体居民都拿起了武器；加里波第出乎所有那不勒斯人的意料之外，强攻了该城东南部的特尔米尼港。其他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除炮台、主堡和王宫外，全城的敌人都被逐渐肃清，接着是炮击、停战和投降。所有这些事件的确实的详细情况暂时还不知道，但主要事实已经很明显了。

现在我们应当说，加里波第为了准备强攻巴勒摩而采取的机动，立刻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将领。在这以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同时也很走运的游击队领袖；即使在罗马被围期间，他的那种用不断出击来保卫城市的战术也差不多没有使他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超出这个水平。但是，这一次他所解决的纯粹是战略任务，经过这次考验以后，他已是一位公认的军事专家了。他赖以成功地欺骗了那不勒斯军队总司令、使后者犯下大错而让一半军队远离城市的那种方法，他的迅速的侧敌行军和在巴勒摩城下最出人意料的方向上的重新出现，以及他利用守军被削弱的时机所采取的坚决的强攻，——所有这些，要比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所作的一切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军事天才。西西里起义得到了一位第一流的军事领袖；我们希望，不久将作为政治家而登上舞台的加里波第，将不会玷污他作为军事家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6月7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6月2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979号

卡·马克思 普鲁士新闻

1860年6月13日于柏林

摄政王今晚赴巴登—巴登，那里将于本月16日和17日举行一个特殊的会议，即有路易—拿破仑参加的德意志王冠人物的会议⁵²。摄政王的随从人员将包括：军事办公厅长官冯·曼托伊费尔将军，冯·阿尔文斯累本将军，冯·席梅尔曼中校，chef d'escadron（骑兵连长）冯·洛埃，宫内大臣冯·皮克列尔伯爵，枢密顾问冯·伊莱尔，摄政王秘书博克曼先生，内阁首相和王室成员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侯爵。读者还记得摄政王给英国女王丈夫的私人信在伦敦被截走，并且由伦敦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一事^①，由于这封信，路易·波拿巴曾坚持与摄政王会晤，认为这样的会晤是使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消除似已发生的误会的最好办法。此后不久，在摄政王访问与法国毗邻的城市萨尔布吕肯和特利尔时，路易—拿破仑又一次表示，他不反对利用这个机会与摄政王会见。但是这一建议被拒绝了。同时传言纷纷，说摄政王准备在巴登—巴登逗留一个月；于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②就想起建议摄政王在水上同力求与普鲁士修好的南德各邦举行一个会议，并且在

① 见本卷第64—66页。——编者注

②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编者注

这个大会上显示一下反法的统一战线。摄政王马上抓住了这一方案，巴登大公、维尔腾堡国王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也接受了这一方案，可是，法国驻柏林大使有一天却向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提出正式通知：他的至尊的国王为了消除似乎是法国无缘无故遭到的不信任，认为在巴登—巴登与当今的普鲁士国家元首作友好的会晤，无论对于德国或是对于法国，都将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普鲁士的大臣回答说，普鲁士也遭到不公正的怀疑，不过这样的会晤未必能消释这些怀疑，此外，德意志诸侯们的秘密会议已在巴登—巴登召开。当时法国大使又一次向巴黎请示后答复说，路易—拿破仑如能与尽可能多的德意志诸侯们晤面，将不胜愉快。此外，他还想亲自作一个重要的、不容继续拖延的报告。霍亨索伦的抗拒就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了。接着，柏林就收到维也纳的信件，奥地利在信件中对行将举行的会晤表示不满，但是，其他德意志邦的宫廷则被普鲁士外交大臣的周知照会或多或少地安抚了下来。由于这一照会，汉诺威国王今天上午突然来到柏林，并亲自表示准备伴随摄政王赴巴登—巴登，这时，摄政王便电召萨克森国王，要他也来参加会议。用不着说，科堡—哥达和拿骚的大公也会跟着别人走的。

这样一来，原来是想对法国示威的德意志诸侯们的会议，便变成了路易·波拿巴在德国领土上举行的招待会，德意志联邦的国王们、大公们和其他小诸侯小领主们成群结队前来参加。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摄政王由于自己怀疑法国篡位者有侵略计划而表示痛悔，而每一个小公国则是准备采取预防措施，以便不让它们的大 *confrère* (伙伴) 把它们出卖给共同的敌人。众所周知，王冠人物对法国革命的加西莫多如此卑躬屈节，维多利亚女王和撒丁

国王已作出了榜样⁵³。1857年沙皇在斯图加特与十二月英雄的私人会晤⁵⁴，曾经只能使咖啡店座上的政客们惊讶，这些人任凭自己被彼得堡宫廷故意卖弄正统主义教条的手法所迷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之后，哈布斯堡在维拉弗兰卡与自己的战胜者的会晤是事务性的，而不是一种客气的举动。摄政王和环聚在他四周的小星宿，既没有必要像维多利亚和维克多—艾曼努尔那样去要求联盟，也没有必要像亚历山大二世那样去搞阴谋，更没有必要像弗兰茨—约瑟夫那样去弥补自己的失败；但是摄政王却可以把行动的理由撇在一边，而援引更高的人物们所开创的一般先例。不管怎样，他接受了路易·波拿巴的建议，就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虚名，更有甚者，在此之前总共不过几个星期，波拿巴还无礼地在他的外交大臣德·图温奈尔先生的信件中向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和巴登大公暗示，今后他们给法国皇帝写信必须签署这样的下款：《Votre frère et serviteur》（“您的兄弟和仆人”）。实际上这就是拿破仑第一为德意志诸侯们、莱茵联邦的参加者拟定的公式，他是莱茵联邦的保护人，而巴登、黑森—达姆斯塔德则与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和其他德意志邦一样，同是该联邦的参加者⁵⁵。为了不让路易·波拿巴迫使深受侮辱的巴登君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君主跟德·图温奈尔先生交往，摄政王和他的戴王冠的伙伴们一致同意不用外交大臣作随从人员，不过，难道这些老爷们真的认为，给了他们侮辱的乃是仆人，而不是主子吗？

至于荷兰的社会救主准备向德意志的王冠人物做的“重要报告”，那末，可以有充分根据地断定，路易—拿破仑将效法梅特涅在维也纳、亚琛、特劳波、莱巴赫和维罗纳的各次会议期间所举行的招待会⁵⁶，尽其所能使摄政王相信：革命者有一个大规模的阴谋，

他们正尽一切努力引起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冲突，以便在巴黎建立红色共和国的统治，在德意志建立中央集权共和国的统治。在瑞士、比利时和德意志的所有波拿巴派的报刊，早在两个星期之前就已登满了包含着这种阴郁暗示的文章，而波拿巴在日内瓦的秘密代理人——一位人人闻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①——已经洋洋得意地宣布，德国报刊对波拿巴的猖狂进攻将于最短期间被各地当局制止。

当此摄政王和他的德意志 *dii minorum gentium*^②尚待说服，才能深信必须结合在头号的社会救主周围的时候，阿布先生的一本新的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⁵⁷却从另一方面提出了说服普鲁士人民这个目的。虽然这本小册子至今还未在德国流行，但也有几本偶尔传到柏林，同时，我在另一篇通讯中，已经向诸君报道了这一最新的土伊勒里宫宣言中最有趣的地方⁵⁸。这位宣谕官在塞纳河岸上说，普鲁士人民应当在奥地利的封建制度和法兰西帝国的民主原则之间进行选择。只有借助于这一原则，德国人民——当然，是在给予自己的强邻以某些物质保证的条件之下——才能指望实现他们强烈追求的统一。小册子的作者十分肤浅地叙述了当前普鲁士政府的缺点之后，便开始教育普鲁士人，叫他们了解法兰西第二帝国所特有的“民主原则”的真正实质；简言之，这一原则就是现代的高卢通常所说的“普遍投票”选举帝国首脑。诚然，连阿布先生也未必敢于否认，法国的所有自由都为了荷兰的冒险家的利益而被充公了，不过要知道，这是根据普遍投票才充公的。德意志正是应该通过这样的道路，在法国的帮助之下，采取同

① 福格特。——编者注

② 直译是：“小神”；转义是：“二流人物”。——编者注

样的民主原则，建立一个在霍亨索伦统治下的条顿帝国。整个办法非常简单。普鲁士只须把一部分自己的“合法”领地让给法国，与此同时，再用全民投票的办法侵入小邦的领土，这样，普鲁士就会马上由封建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应该承认，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食客们所发现的这个新的“民主原则”，决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在近二百年来，它在神圣的俄罗斯就已非常盛行。罗曼诺夫王朝是通过普遍投票登上皇位的。此后，从尼门河到阿穆尔河便由民主统治了。或许，新“民主原则”的先知们会反驳说：罗曼诺夫王朝是自由选出的；在诉诸人民之前没有 *coup d'état*（政变）；罗曼诺夫家族登基时的普遍戒严并没有能把投票箱控制在民主原则的适当范围以内。不管怎样，既然路易·波拿巴无法成为“正统”国君，所以对于他来说，最好是能做到，把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国君兄弟们按照小帝国的模型变成“民主”国君。罗马的皇帝自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君，因为现代的进步，要求世袭君主制的原则与“普遍投票”的原则相结合，这样，无论哪一个好汉在某个时候用某种方法篡位成功，并且用一出普遍选举的喜剧装饰一下，大概就可以认为，他的王朝一定永远是人民的普遍意志（卢梭的 *volonté générale*）的生动体现了。

我打算在另一篇通讯中评述一下现阶段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巴登—巴登的会议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里只提一下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①于6月10日在克朗博尔格城堡的会晤。会晤前两星期，瑞典外交大臣向丹麦外交大臣发出了一个照会，照会暗示在丹麦国王随从人员中最好没有那些瑞典

① 查理十五和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国王陛下不乐意见面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建议丹麦国王在自己的随从人员中不要带自己的妻子丹纳尔女伯爵,即 *ci- devant* (过去的) 腊斯马森小姐。因此,丹麦国王认为把自己的情妇留在家里是合适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6 月 13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6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98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英国的志愿兵部队

几个星期以前在伦敦举行的志愿兵大检阅，引起人们对大不列颠国民军的注意。志愿兵不应该同民军混为一谈，民军是陛下的另一种军队。据政府统计，截至4月1日民军有5万人。其中在编制之内的有23735人，即：在英格兰有135580人，在爱尔兰有7471人，在苏格兰有2684人。民军代表各下层阶级，而志愿兵代表资产阶级。伦敦“泰晤士报”⁵⁹断言，6月22日参加检阅的部队“代表所有阶级”，这不过是企图把这次检阅加上一个人民事业的幌子罢了。大约3个月以前，体面的机械工人代表团谒见当局，想领取武器，以便在受到侵犯时“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允许参加志愿兵部队的只有这样的工人，他们的装备和费用由他们的厂主担负，当然，他们必须永远听从这班厂主的支配。

英国志愿兵部队的总人数并未达到9万人，虽然最近许多统计表上的数字较大。诚然，麦克默多上校在不久以前为圣乔治步枪部队举行的午宴上曾声称，名列志愿兵的已达124000人。但是当人们请他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以后，才知道他把一半民军计算在内。报纸所依据的是各团的定员，即每团为800—1000人，其实曾经以超过500—600的人数参加检阅的团是不多的。在伦敦大检

阅前一两天,悉尼·赫伯特先生(他在总司令部的地位使他成为这一问题的权威)在议会确认:“在纸面上这些部队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但是与事实不符,因为实有人数从来也没有得到确证。”

包含这种意见的整个演说,就刊登在大谈全国志愿兵检阅的“辉煌成就”的同一号“泰晤士报”上。在海德公园阅兵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伦敦报界是如何夸张的手法来叙述这些事情的。20日的“泰晤士报”曾预言:“在陛下面前将出现不下 35000 人。”汤姆·泰勒在 21 日发自伦敦的刊登在“曼彻斯特卫报”⁶⁰上的一篇通讯中写道,在首都已有 46000 多名志愿兵。实际上,根据未必愿意过低估计志愿兵人数的麦克默多上校的材料来看,在女王面前一共走过了 18300 兵士。这支军队的人数,当然达不到可以令人欣喜若狂的程度。在 1803 年 10 月,就约有 13000 名身穿志愿兵服装的伦敦当地人参加了检阅。为了把不列颠人当年的从戎豪迈感同他们现在的从戎豪迈感加以比较,我们列出一个截至 1804 年 1 月的志愿兵部队人数简表:

全部列兵	341687
校官	1246
上尉	4472
中尉和少尉	9918
参谋军官	1100
军士	14787
鼓手	6733
总 计	379943

甚至英国所期望达到的现在志愿兵人数的数字——124000,若同这个表相比,就显得不大了。如果从现在大不列颠的所有适

合服兵役的男人之中抽出十分之一,那就有 50 万人。这些事实绝不表明英国人现在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充满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不管伦敦报纸如何作相反的证明。根据发表在“陆海军报”⁶¹上的一篇文章的作者的精细统计,英国的民军共有 50160 人,志愿兵部队 88400 人,总共为 138560 人。“陆海军报”上文章的作者肯定地说,这个数目当中至少要有 2 万人会因各种原因不能在必要时入伍,所以英国的民军和志愿兵部队的总人数是 118560 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6 月 25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7 月 1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99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贸易

伦敦刚发表的贸易部关于截至 1860 年 5 月 31 日为止的 5 个月的报告书, 反映出不列颠的出口水平同 1859 年头 5 个月比较, 仅有一些不大的变化。

出口额从 1859 年的 52337268 英镑增加到 1860 年的 52783535 英镑, 而且这个不大的增长, 整个都是由于今年 5 月份出口额的增加而引起的。

对比一下 1860 年和 1859 年头 5 个月相应的出口数额, 使人注目的首先就是不列颠对东印度的输出大大减少。下列资料可以证明:

截至 5 月 31 日为止的 5 个月内运往东印度的 最重要的不列颠商品

	数 量		价 值	
	1859年	1860年	1859年	1860年
			(英 镑)	
啤酒和麦酒(桶)	168355	166461	507308	491609
棉布(码)	396022733	311163765	4884982	3977289
棉纱(磅)	17411542	15044812	1002439	903516
扁铁、螺丝钉、铁条(吨) ...	16851	12194	127678	90954

(续)

	数 量		价 值	
	1859年	1860年	1859年	1860年
			(英 镑)	
生铁(吨)	12138	4108	132946	42912
熟铁(吨)	11823	10554	188126	195659
铁板和铁钉	31582	79117	169072	437170
陶瓷	—	—	34530	24039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	—	—	83832	42126
皮革制品和马具	—	—	16780	15600
蒸汽机	—	—	73087	100846
其他机器	—	—	165899	196928
马口铁片	—	—	19127	6441
总计			7405808	6529089
出口额减少				976719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东印度输出的主要项目总共减少约 100 万英镑,基本项目(棉布和棉纱)减少得最多,唯一例外的是同修建铁路直接有关的一些商品。此外,必须注意到:与最近从大陆来的邮件同时收到的有关贸易资料,表明情况极为不利和市场过分膨胀,因而英国宣布的、根据大大超过一般水平的价格而确定的出口值,无论如何印度不能兑现。现在已毫无疑问,印度的贸易是人为地胀大的。印度起义⁶²时政府人为地使需求扩大,商业活动由于革命动乱沉寂而复苏,以及 1857—1858 年的普遍危机使大部分其他世界市场缩小,——所有这些情况,促使印度的贸易额增加,超

过了它的自然可能的限度。但是,根据过去的所有经验,新出现的市场繁荣,如果没有不列颠政府的英明干涉,本来也许还能在很多年内经得住棉织品的轰炸。看起来,威尔逊先生被派往加尔各答,好像是专门为了瓦解英印贸易似的,他双管齐下,对内采取笨拙的充裕国库的措施,对进口商品征收繁重关税。像联合王国这样,正当它向法国皇帝讨好并以法国关税的假降低为借口而容忍皇帝的篡位政策的时候,反而让它的政府采取专横措施,自己来瓦解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市场,这种情况在贸易史上见到过吗?

对澳大利亚市场的输出,虽然在棉布方面有所减少,但总的说来,无论是数量或总值都增加了。但是,为了正确地评价澳大利亚殖民地市场的现状,我们必须从贸易部的报告书转向新近在这里得到的商业情报。来自阿得雷德的4月26日的通报,对于英国商品无休止地过量地输入,对于投机、欺诈和滞销日益严重,表示担忧。人们指出,整整一系列无支付能力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要倒闭。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已经发生几起破产,其中有一起是9家商行的破产,负债总数为40万英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归根到底将有四分之三的债务总数无法清偿,而且这笔亏损将由银行和英国债权人担负。从刚得到的澳大利亚近17年来的破产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破产的数目1858年比1857年多一倍,1859年又增加50%,而今年,至4月中旬止再次增加了约7%。1822—1859年期间破产的公司债务总数为5981026英镑,清单上指出这些公司的资产为3735613英镑,但其中兑现的还没有50%。

输往美国的大部分不列颠商品,无论就其价值或数量来说,都大大减少了,下列资料可作说明:

截至 5 月 31 日为止的 5 个月内对美国出口的主要项目

	数 量		价 值	
	1 8 5 9 年	1 8 6 0 年	1 8 5 9 年	1 8 6 0 年
			(英 镑)	
煤(吨)	68020	106925	67785	66196
棉布(码)	88441112	84208598	1562918	1491721
亚麻布(码)	25476444	20974699	776780	643676
生铁(吨)	37510	21497	106476	62919
扁铁、螺丝钉、铁条(吨) ...	48063	37824	394426	293294
熟铁(吨)	16024	16488	200576	189854
铁板和铁钉(吨)	12107	4622	61721	24559
植物油(加仑)	795808	511602	95154	57230
丝织品(磅)	119719	58836	128133	68866
毛织品和半毛织品(码) ...	22697619	18520639	892026	733000
陶瓷	—	—	234492	281532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	—	—	719754	637035
马口铁片	—	—	524615	464630

无疑,法国是一个能填补东印度、澳大利亚殖民地和美国缩小了的市场的国家。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可发现,英国对法国的出口贸易仍旧保持着通常的不大的数额。至于棉布和棉纱,看来贸易大臣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害怕丢脸,因此,认为在报告书中以完全不包括这些商品为宜。亚麻布、亚麻纱和丝织品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对比一下 1859 年和 1860 年同期的出口值就可发现,今年的出口值减少了:拈丝由 130260 英镑降到 88441 英镑;丝线和纱线由 50520 英镑降到 29643 英镑;机器由 98551 英镑降到 64107 英镑;煤由 253008 英镑降到 206317 英镑;同时也可看到,铁、铜、羊毛、毛织品和精梳毛纱的输出有某些增加。

法国葡萄酒的输入量提高了,但还没有所有其他酒类输入量

增加的比例大。最后还应指出，主要市场的萧条迹象，前景堪忧的收成，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向金融市场要求大宗借款和欧洲的动荡政局，这些都显现出 1860 年秋天的前景是很不美妙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6 月底—
7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7 月 1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998 号

卡·马克思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

—

1860年7月10日于伦敦

刚发表的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⁶³总共有三个报告。不久前还由莱昂纳德·霍纳先生视察的地区,如今一部分并入约翰·金凯德爵士的视察区(苏格兰),一部分并入现有3075个工厂和印花企业的雷德格雷夫先生的视察区;罗伯特·贝克先生的视察区(爱尔兰和英国的某些地方)仍保持原来的范围。下列资料所表明的,是已呈报给三位视察员的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内的不幸事故总数。

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

损伤性质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工		合计		总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死亡.....	14	3	7	2	2	2	23	7	30
截断右手或右臂.....	5	6	3	1	1	—	9	7	16
截断左手或左臂.....	4	1	7	3	1	—	12	4	16
截断右手的一部分.....	23	24	29	22	15	7	67	53	120
截断左手的一部分.....	16	17	21	18	8	7	45	42	87
截断腿或脚骨的一部分.....	5	—	1	—	—	—	6	—	6

(续)

损伤性质	成年工		未成年工		童工		合计		总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四肢和身体骨折·····	30	11	43	11	11	4	84	26	110
手或脚骨折·····	39	43	30	37	20	15	89	95	184
头部和面部受伤·····	20	17	23	29	11	4	54	40	94
擦伤、碰伤和上列伤亡 以外的其他创伤·····	268	255	315	352	128	66	711	673	1384
合计·····	424	377	479	465	197	105	1100	947	2047
非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									
合计·····	83	30	59	26	21	10	163	66	229

这些报告一致证明,近半年来工业活动异常活跃。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以致某些工业部门工人不足。在因机器的改进使工厂主可以不用手工劳动的毛织厂,这个困难小些,而在那些由于缺少工人,特别是缺少青年工人,大部分机器停工的纺纱厂和精梳毛纺织厂则大些。为了消除这种人手暂时不足的现象,过去往往采用一些不道德的办法。当工厂制度发展之初,工厂主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便直接求助于某远方教区的管理人,这些人招来一定数量的学徒即幼年儿童,把他们固定给工厂主做工,并规定一定的年限。一旦孩子们被送去学徒,主管济贫所的官员就祝贺教区摆脱了吃闲饭的人,而工厂主就马上从这笔交易中牟取最大的好处,他们尽可能少地开销学徒的生活费,尽可能多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因此,1802,即乔治三世在位的第四十二年通过的一系列工厂法令中的第一个法令(第七十三章),就得名“棉纺棉织等工厂企业的学徒和其他雇工的健康和道德保护法”;这个法律的目的只不过是减轻学徒制的罪恶。但是,随着机器的改进,就需要有另一

种劳动力了,这时,生意兴隆,邻近地区的居民已不能充分给工厂提供所需数量的人手。工厂主就派遣代理人去爱尔兰,把爱尔兰的家庭引诱到英国来;然而爱尔兰已不再是能按英国的需要找到工人的市场了,所以工厂主现在不得不把他们的视线转到英国的南部和西部各郡及威尔士,在那里寻找能够被北方各郡现行的工资额引诱到新的工业场所来生活的家庭。代理人被派到全国各地,描述将家庭移居工业区的种种好处,他们还受托把这些家庭迁移到北方来。据报道,这些代理人已经运送了许多家庭。但是成年男人带着妻子和全家移居工业城市,有这样一种特殊的不利,那儿最感需要的是最年轻的家庭成员,因为他们能很快受教并在较短时期内成为有用的工人,而不熟悉工厂劳动的成年男人及其妻子,暂时还不需要。这促使某些工厂主在某种意义上恢复旧的学徒制,同监护院签订关于雇佣无以为生的贫民儿童的有期契约。工厂主供给儿童住房、穿衣、吃饭,但不付给任何定期的工薪。随着这种制度的恢复,显然,对滥用这种制度的抱怨也就产生了。但是必须注意到,只是在不可能找到任何其他工人的时候,才使用这种劳动力,因为这种劳动力价钱很贵。一个13岁童工的通常工资是每周约4先令;再供给50或100个这样的童工住房、穿衣、吃饭、医疗和应有的监督,还要发给他们一些金钱奖励,平均每人每星期4先令都不够开销。

对比一下工厂工人1839年和1859年的工资水平,就可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在一些工时限制在每周60小时的工厂中,工资(至少是名义工资)提高了;而在童工、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工时未加限制,有时每天工作14—15小时的印花、漂白和染色的企业中,实际工资却降低了,只有少数例外。关于曼彻斯

特及其郊区的棉纺织工业,有下列资料:

周 工 资

	1839年	1859年
每周工时数	69	60

工 种

蒸汽机工	24先令	30先令
仓库童工	7先令	8先令
仓库工人	18先令	22先令
梳棉间——		
清棉女工(青年妇女和少女)	7先令	8先令
搬运工(青年男工)	11先令	14先令
监工	25先令	28先令
粗梳机工(14—18岁的未成年工)	6先令	7先令
并条机女工(青年妇女)	6先令	6辨士 8先令
细纱间——		
走锭精纺机细纱工	16—18先令	20—22先令
拈接工(女工和青年男工)	8先令	10先令
监工	20先令	20先令
拈线间——		
拈线工(女工)	7先令	9先令
筒子工(少女)	4先令	5先令
监工	24先令	28先令
短工(青年男工)	10先令	13先令

在摇纱间、烧毛间和机织布间,工资也稍有提高。有些人曾警告工厂工人说,他们会因工时缩短而吃大亏,这样一来,他们的预言完全被驳倒了。另一方面,请比较一下工时未被法律限制的那些工业部门的工资变动情况:

印花、染色和漂白企业——每周 60 小时

	周 工 资 (先令)	
	1839 年	1859 年
混合染色工	35	32
印花机工	40	38
工长	40	40
雕刻工	35	25
印花工	40	38
染色工	18	16
清洁工和杂工	16—15	16—15

绒布染色企业——每周 61 小时

梳理工	18	22
漂白工	21	18
染色工	21	16
上浆工	21	22

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先生和约翰·金凯德爵士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关于工厂建造与管理合作社在郎卡郡和一部分在约克郡的发展和扩大。这些合作社在实施股份有限公司法之后大大增加了，通常是由工厂工人组成。每个合作社拥有资本 1 万英镑或多一些，资本分为 5 或 10 英镑的股票。它有权按照与股份资本的一定比例借入资金，而这些借入资金都是工厂工人和这一类人的小额存款。例如，在柏立，为使已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合作工厂开工，需要 30 多万英镑。在棉纺厂中，纺纱工和其他工人往往是这些企业的股东，他们除领取工资外，还领取股息。在棉织企业中，合作社的参加者常常租借织布机来干活。这种方法吸引着工人，因为不需要很大费用，就可在他们企业里把机器开动起来。他们购买织

布机用的成品纱,然后织布,这就完成了工厂的操作过程;或者是他们从某个与他们有来往的工厂主那里领纱,还给他成品布。这种合作社的制度不只限于纺纱织布业,而且还扩大到其他许多消费品的商业方面去了,如面粉、食品杂货、布匹和其他商品。

下面是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的一位助手帕特里克先生所编写的报告,其中有一些关于这种新的工厂占有制发展情况的有价值的资料。我担心,在下一次工业危机时期这种制度将遭到残酷的考验。

“在罗契得尔,有一个名为‘贝凯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的合作社已存在约12年。它按照股份公司法注册,是一个股份无限公司。它在罗契得尔附近的瓦德耳的克拉夫—浩斯工厂开始营业,有权用每张为12英镑10先令的股票集资10万英镑,其中已交付2万英镑。后来所集总额达到3万英镑,于是合作社就约在5年前,作为对克拉夫—浩斯工厂的补充,在斯塔克斯太德附近建造了一个有100匹马力的法尔—霍耳姆大蒸汽厂。在去年10月以前的半年内,公司支付实付资本股息的44%(6月11日帕特里克先生说:“贝凯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以“法尔—霍耳姆工厂(贝凯普)”的名义刚刚宣布再支付实付资本股息的48%),而现在合作社的资本已增加到6万英镑,并大大扩充了位于斯塔克斯太德附近的法尔—霍耳姆工厂,为此就需要两台每台为40匹马力的机器,这两台机器很快就要安装。大部分股东都是在工厂工作的产业工人,但他们作为工人领取工资,在管理工厂方面,只是每年参加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今天上午我访问了法尔—霍耳姆工厂,我可以告诉大家,在遵守工厂法方面,它同我区的任何工厂一样,做得很好。虽然我没有询问这方面的情况,但我猜想,合作社已得到利率为5%的借款。

在贝凯普附近,有另外一个已存在了6年的合作社,名叫‘罗塞戴尔工业联合会’。

这个合作社修建了一个工厂,但听说,不怎么兴旺,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它也是按照合作社的制度组织起来的。现在公司易名为‘罗塞戴尔工业公司’,并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法注册,有权集资20万英镑。4万英镑是出售每张为10英镑的股票聚集起来的,此外还借款4000英镑左右。这4000英镑是

分别从小资本家那儿借来的，数额从 150 英镑至 10 英镑不等，这笔借款不要用任何抵押作保证。当这个合作公司刚刚开业的时候，每个股东都是工人。现在，作为对威尔工厂（这个工厂，据报道，是由“罗塞戴尔工业联合会”修建的）的补充，该公司向 B. 穆姆和 T. 穆姆两先生买了贝凯普的艾尔威尔工厂，并经营这两个厂。

‘贝凯普和瓦德耳新商业公司’的兴旺和成就，看来成了一批新公司兴起的动力，这批公司目前正在我的邻近地区出现，并为大工厂提供装备来经营业务。其中有一家公司——‘新切尔奇棉纺织业公司’——根据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有权通过出售每张为 10 英镑的股票集资 10 万英镑。其中已交付 4 万英镑，另外，公司还借到 5000 英镑抵押借款，利率为 5%，这家公司已经营业，买到一个有 40 匹马力的不开工的工厂——新切尔奇的魏尔工厂，目前正在兴建‘维多利亚’工厂，该厂需要一台 100 匹马力的机器，到明年 2 月竣工后，公司打算用 450 人作工。

另一个类似的公司是‘罗坦斯塔尔花纱布公司’，也是有限公司，法定资本为 5 万英镑，每股 5 英镑，有权借款 1 万英镑。约 2 万英镑已经交付。现在公司正在黑尔霍耳姆修建工厂，这儿需要一台 70 匹马力的机器，据报道，这两家公司十分之九的股东都属于工厂工人阶级。

还有一个近 6 个月成立的合作公司——‘克拉夫棉织业老公司’，它从 B. 穆姆和 T. 穆姆两先生处买了两个名叫艾尔威尔—斯普林格斯的旧工厂。它们的经营原则也同别厂一样，因为我今天未能前去，所以不可能谈它们的一切详情，但有人告诉我说，那儿有一台 13 匹马力的机器在工作，工人有 76 人，我想，全体股东都属于工厂工人阶级。

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合租部分厂房，根据情况，租用一间或两间房子，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一间房子的一部分。这样，承租人就是这部分厂房的业主，虽然他们和自己的工人一样地作工。他们像任何其他企业主一样，雇佣工人，付给工资，但在他们那儿作工的工人是不过问企业的。过去，在贝凯普这样的企业比现在多得多。有些人完全放弃了这种经营，而另一些却取得了成就，或购买了自己的工厂，或租了大厂房。在罗契得尔，这样的企业比我区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1860 年 5 月 16 日”

二

1860年7月14日伦敦

我在上一封信里概述了约翰·金凯德爵士和雷德格雷夫先生的工厂报告,现在要谈谈罗伯特·贝克先生的报告,他是爱尔兰以及柴郡部分地区、郎卡郡、格罗斯特郡、约克郡、斯泰福郡、莱斯特郡、赫勒弗德郡、希罗普郡、伍斯特郡和瓦瑞克郡等地的工厂视察员。贝克先生视察区发生的不幸事故总数为 601 起,其中童工事故只占 9%,而 18 岁以上的占 33%。对这些不幸事故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就可看出:首先,不幸事故在总作工人人数中的比重,以那些机器不受法律监督的工业部门为最大;其次,使用同样机器的纺织厂,不幸事故多半是发生在那些最大的企业里。关于贝克先生视察区的 198565 个工厂工人的情况,他援引了下半年的如下数字:

	作工人数	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数
棉纺织厂	107106	每 261 人中有 1 起
毛织厂	14982	每 348 人中有 1 起
亚麻织厂	33918	每 389 人中有 1 起
丝织厂	33874	每 2251 人中有 1 起
精梳毛纺织厂	2896	每 424 人中有 1 起
其他各厂	5789	—————

在所有这些纺织厂里,机器都有防护,也就是为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安全装置了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工厂法保护条例所规定的。

如果我们看一看例如诺定昂的情况——那儿有大批人，特别是童工，都是在没有依法装置安全设备的机器旁工作，——我们可以看到，1859年中心医院的记事簿里记人的不幸事故有1500起，而防治所的记事簿里有794起，这样，不幸事故总数共2294起，然而作工人数却不超过62583人，可见，诺定昂市的不幸事故在每27人中就有1起——已实施保护法的纺织厂的不幸事故与此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其次，在北明翰，有许多利用和不利用机械力的各种企业，只有两个不大的纺织厂，青年工人所使用的机器根本没有必不可少的安全设备，企业里作工人数与不幸事故数的比例是34：1。假如我们把已呈报工厂视察员的1845年10月31日以前和1846年4月30日以前两个半年的不幸事故总数，同1858年和1859年的10月和4月以前两个半年的不幸事故数比较一下，同样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工厂法保护条例及其比较广泛的强制实行中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在后面这一时期内，不幸事故总数降低了29%；虽然工人数按最低统计还增加了20%。

至于不幸事故在大小企业中的分布情况，我认为，贝克先生所说的下列数字具有决定的意义。在他的视察区有758个棉纺织厂，作工人数为107000人，近半年来，所有的不幸事故都是在约有40000人作工的167个厂发生的。可见，在有67000人作工的591个厂中没有发生过一起不幸事故。同样，387个小企业的所有不幸事故都发生在28个企业内；153个麻纺厂的所有不幸事故都发生在45个厂内，而774个丝织厂的所有不幸事故都发生在14个厂内。由此可见，在每个工业部门，大多数工厂没有发生过一起与机器有关的不幸事故；在所有的工业部门，大部分不幸事故发生在最大的工厂。对后面这一现象，贝克先生试图用两点原因来说明：第

一，在最大的工厂里，从没有装置安全设备的旧机器到新机器的过渡非常缓慢，一步一步地做；第二，在这些大企业里，人手集中于一地的速度增加，而对这些企业道德上的监督则减弱了。

贝克先生说：“这两个原因对不幸事故的发生起着最明显的作用。关于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保留下来的旧机器从来没有装过安全设备，许多不安全的轮子仍然存在，尤其有害的是，工人们由于同安全的新机器打交道，就忘记了使用旧机器的危险。关于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由于在有时达 1000 匹马力的不变机械力所开动的机器上工作，由于经常力求珍惜每一分钟，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危险的后果。在这样的工厂里，一瞬的时间都是利润的因素，所以要求每个人每一秒钟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李比希的话来说，在这里可以觉察到生命与无机力量之间的不断搏斗，这时智力必须起主导作用，而体力的运动则必须与锭子的转动相适应。工人们不能落后，尽管因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炎热而紧张万分；不能停止一秒钟的工作，把注意力转移到周围所发生的各种动态，因为慢上一点都要带来亏损。因此，当工人的注意力没有投向需要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常常把手指放到那由于位置或由于转动缓慢而被认为是安全的轮子上。由于工人忙于在有的时候要生产出一定磅数的纱，他们就往往忘记注意自己的机器下面的‘小拮据工’，因此，许多不幸事故都是由于所谓自己不小心而发生的。”

近半年来，除丝织厂外，所有的纺织企业，无论是在爱尔兰，或者是在贝克先生视察的英国地区，都异常兴盛。唯一的一个看来使个别工业部门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障碍是愈来愈缺乏原料。在棉纺织工业中，从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新工厂建设，这样的新的扩大生产的制度和这样对人手的需求。最突出的现象是在寻找原料方面采取的新措施。例如，在拜尔法斯特，仿效郎卡郡棉花供应联合会而成立了亚麻供应联合会。截至 1853 年为止的 5 年内，亚麻的平均输入量连同爱尔兰收获的亚麻在内，每年为 113409 吨，而截至 1858 年为止的近 5 年内相应的数额只有 101672 吨，也就

是每年减少了 12000 吨,虽然每年的出口值增加了 100 万英镑。羊毛的价格在最近工厂报告所说的时期本来就已高于一般水平,以后又不断上涨。羊毛价格这样上涨的经常因素,可以说是毛线厂的迅速扩大以及大不列颠和各殖民地对羊肉需求的增加;至于使羊毛的经常供应量减少的偶然因素,应该认为是本季度的特殊条件,因为在冬季,由于饲养不好或不当,死了不少母绵羊,而春天,由于寒冷,饲料不足和一种能使牲畜在几小时内死去的疾病,又死了许多羊羔。

由于签订英法商约⁶⁴和担心外国竞争,近 6 个月来情况严重恶化的唯一工业部门,就是丝纺织工业。这些情况的影响是逐渐表现出来的;当写这篇通讯稿时,仅在考文垂一地,就有 13000 织工因全部机器停工而失业。正如我在关于 1859 年的工厂报告的通讯中所指出的,这个危机尤其应感到遗憾的是:在考文垂组织了许多家庭丝织厂,作工的是工人及其家庭,只是偶而使用雇佣劳动。从 1860 年初起,这样的工厂数大大增加。实质上,这些工厂是回复到过去的家庭工业,区别只是在于,这样的工厂采用蒸汽机,但它们又完全不同于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新的合作社制度。这里房主就是业主,而织工就是发动机的承租人;有时,织工除自己的家庭以外,还利用外边工人的劳动。织工自己的两台机床,或者全部购买,或者赊购,每星期交付一定的款项,或者,譬如向他的既是建设者又是投机者的房主租用。此外,他还租用必需的发动机。据说,现在用织工的机床工作和用业主的机床工作之间的差别就同法国丝带和英国丝带的差别一样。但是,有人忧虑,——看来,罗伯特·贝克先生在他的报告里也有这些忧虑——,这样使用机械力的家庭劳动,将不能顶住商业上的动荡。可能,英国的厂主为了

对付法国的劲敌,将被迫使用大宗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毁灭在他自己的家门口同他竞争的家庭丝织厂。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7 月 10 日
和 14 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载于 1860 年 8 月 6 日和 24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6016 号和第 6032 号

卡·马克思
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
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1860年7月23日于伦敦

据今天巴勒摩来电称，由于梅迪契上校准备向米拉措进攻，那不勒斯国王已不得不命令那不勒斯军队全部撤出西西里，退入他的大陆领地。虽然电报尚待证实，但加里波第的事业正在向前进展，却是无可争辩的，尽管他的军队受着疾病的折磨，他的政府受着种种外交阴谋的扰乱。

坏透了的阴谋家拉法里纳，以及按原籍来说是科西嘉人、按职业来说是波拿巴警探的格里舍利先生和托蒂先生被逐出西西里，表明加里波第已和卡富尔派公开决裂；这个公开的决裂，在欧洲报刊上引起了莫衷一是的评论。加里波第有一封私人信给一位伦敦朋友⁶⁵，内容已有人介绍给我看过，并且允许我在“论坛报”上报道它的基本论点，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真实情况。虽然加里波第的信还是在本月7日发布驱逐上述三位阴谋家出岛的命令之前写成的，但是它已全面地阐明了将军和大臣、众望所归的独裁者和王朝首相之间，简言之，即加里波第和卡富尔之间的争论的实质。加里波第用这样的话《cet homme faux》（“这个坏家伙”）痛斥路易

·波拿巴，并且预言，“他总有一天要”跟路易·波拿巴“交锋”；而卡富尔则和路易·波拿巴签订了密约，并断然决定一块一块地兼并可能由加里波第的宝剑夺取过来或由人民起义使其摆脱长期附属地位的意大利领土。与这种把领土逐渐合并于皮蒙特的过程同时，也将有一个“补偿”第二帝国的过程。就像为了伦巴第和诸公国曾经必须付出萨瓦和尼斯一样，兼并西西里也势必用撒丁岛和热那亚来作补偿；每进行一次片面的兼并行动，都得和皮蒙特的监护人^①做一笔片面的外交买卖。如果意大利为了法国的利益再度遭到瓜分，除了意味着意大利的完整和独立受到侵犯之外，还将立时扼杀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爱国运动。那种正在散播的信念，即认为意大利为了在皮蒙特的权力之下统一就必须逐渐缩小，会使波拿巴有可能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保持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依附法国的特殊政府。因此，加里波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排除法国外交干涉的一切借口，但是，正如他所知道的，只有运动保持纯粹人民的性质，并且不与纯粹王朝的扩张计划发生任何联系，才能做到这一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一旦解放，如果维克多—艾曼努尔担起责任来治理它们，并且保护它们既不受前方的敌人奥地利的侵犯，也不受后方的敌人法国的侵犯，那时，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合并于维克多—艾曼努尔王国了。大概，加里波第太信赖英国政府的善心，太相信路易·波拿巴的处境困难，他指望，在他把任何领土合并于皮蒙特之前，在他只倚靠意大利的武器来进行解放事业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是不敢干涉，不敢公然违反他过去在开始向意大利进行十字军征讨时所持的口实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是

^① 指路易·波拿巴。——译者注

可靠的，即不管加里波第的计划是否顺利实现，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他的计划，才不仅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意大利摆脱历来的暴君和内部纠纷，而且也能使意大利逃脱新的法国保护人的魔爪。卡富尔正是为了阻挠这一计划的实现，才把拉法里纳在两个科西嘉人伙伴的陪同下派往西西里。

拉法里纳是西西里人，1848年在西西里的革命者中间露出头角，但这决不是由于他有真正热情或卓越功绩，而是由于他仇视共和党，由于他跟皮蒙特的空论家大搞阴谋。西西里革命失败后，拉法里纳住在都灵，发表了一本大部头的意大利历史⁶⁶，尽力吹捧萨瓦王朝，诋毁马志尼。彻头彻尾效忠于卡富尔的他，把波拿巴主义的精神传给了“争取意大利统一民族协会”⁶⁷；在他成为这一组织的主席之后，便利用它来阻挠而不是促进独立的民族发动的任何尝试。和他过去的活动完全相符，当加里波第打算远征西西里的传闻初起时，拉法里纳就嘲笑和辱骂进行这种远征的主张。而当准备这次壮举的直接措施终于已经采取的时候，拉法里纳就利用“民族协会”的一切可能加以阻挠。到了他的阴谋已不能削弱将军及其士兵的决心，远征已经出发时，拉法里纳就以厚颜无耻的冷嘲态度大发悲观论调，而且大胆地预言此举将迅速和全面破产。可是，一当加里波第拿下巴勒摩并宣布自己是独裁者，拉法里纳便急忙附和他，并且从维克多—艾曼努尔那里，更正确地说，从卡富尔那里，获得了在居民赞同该岛合并于皮蒙特以后立即代表国王治理该岛的大权。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加里波第最初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没有计较他那不祥的过去，于是他便马上开始扮演起主人的角色，暗算克里斯比政府，和法国警探策划阴谋，把那些希望通过投票片面地把该岛合并于皮蒙特而结束革命的自由派贵族纠合

在自己周围，不去准备必要的措施把那不勒斯人逐出西西里，反而去安排种种办法撤销马志尼的拥护者以及其他一些为他的主子卡富尔所不能信赖的人的公职。

克里斯比（拉法里纳的阴谋首先就是针对他的政府）曾长期在伦敦流亡，他在伦敦是马志尼的朋友，他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解放西西里。1859年春，他冒着很大的危险，用瓦拉几亚人的名字，带着瓦拉几亚的证件，来到西西里，走遍西西里各大城市，制订了起义计划，定于10月间开始起义。秋天爆发的事件⁶⁸，使起义不得不推迟到11月以前，后来又推迟到今年。同时，克里斯比曾求助于加里波第，加里波第拒绝参加起义的组织工作，但他答应在起义开始并充分巩固从而表现出西西里人的真正情绪后予以援助。在远征期间，克里斯比带着自己的妻子——远征中的唯一女性——伴随着加里波第，参加了各次战斗，他的妻子还领导了救助伤病员的工作。拉法里纳先生首先要撇开的正是这个人，当然，暗中还希望继克里斯比之后把独裁者本人也摆脱掉。加里波第为了尊重维克多·艾曼努尔，并且在自由派贵族的强大压力之下，违反着自己的意志，同意了建立新政府和免除克里斯比的职务，把他作为私人顾问和朋友留在身边。可是一当加里波第作了这种牺牲，他就看到了，那帮人坚持克里斯比政府辞职，只不过是强加给他一个名义上是加里波第的政府、而实质上却掌握在拉法里纳或卡富尔手中的内阁。这个内阁在拉法里纳的鼓励之下，并且依靠卡富尔庇护，将很快使他的全部解放计划化为乌有，并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全部影响去反对他们已经叫起来的所谓尼斯的暴发户，即加里波第。正是在这个关头，加里波第不仅拯救了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拯救了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事业：他驱逐了拉法里纳和两位科西嘉伙

伴,接受了阁员们——拉法里纳的走卒——的辞呈,并任命了一个爱国政府,我们可以提一下,马里奥先生是这个政府的成员之一。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7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8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1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不列颠的国防

刚刚提交议会审查的英国的国防计划⁶⁹，建议把全部经费用于巩固港口和某些次等工事，只要能保卫国家最大的港湾不受敌人不大的分舰队的袭击即可，还用于在杜弗和波特兰建立大的坚固的堡垒，保证区舰队和单艘船只有设防的停泊场所。预定把全部经费用在保卫国家边缘，即易于受敌舰袭击的深岸线上；而既然不可能加强全部海岸线，为此便选择了几处重要的据点，主要是海军兵工厂和港口。国家的内地则完全听天由命。

这样一来，既然英国现在承认，它的军舰已经再也保卫不住它了，它必须采用筑城工事作为国防手段了，那就不言而喻，它首先应该使自己的海军兵工厂即它的舰队的摇篮不受袭击。谁也不会怀疑，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彭布鲁克、席尔涅斯和乌里治（或任何别的选来代替它的地点）应该充分巩固起来，能够击退任何海上的袭击和在一定时期内经得住陆上的正规围攻。不过，把对付这种危险的预防措施叫做国防计划是完全荒谬的。实际上，为了使这个计划名副其实，看来有必要使它大大复杂一些，并且拨出比单单保卫各港口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经费来实现它。

一个国家，如果像法国或西班牙那样，容易受到来自自己陆地边界方面的入侵，也同样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袭击和陆战队在它

的沿海地区登陆,那是不得不把自己的海军基地变成头等要塞的。土伦,卡塔黑纳,热那亚,甚至瑟堡,都可能成为像消灭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军械库和港埠设备的那种联合攻击的目标⁷⁰。因此,这些地方应该有非常坚固的陆地防线,并且筑一些使港埠设施不致遭到轰击的堡垒。但这对英国是不适用的。即使假定它的舰队的失败暂时使英国的海上优势成了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入侵的军队在不列颠的领土登陆之后,也永远不能指望自己有自由的交通线,因而将不得不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这支入侵军队将不可能采取正规的围攻;即使它能够采取围攻,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也不会估计侵略者会安然呆在朴次茅斯面前,把它的武力消耗在长期围攻上,而不趁着自己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优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直取伦敦,力求解决主要任务。假如有朝一日敌人能够无阻碍地使足够进攻伦敦之用的部队在英国登陆并运去足够进攻伦敦之用的武器装备,同时包围朴次茅斯,那末英国就要处于灭亡的边缘,这时朴次茅斯周围的任何岸防炮台也不能拯救它了。其他的海军兵工厂也同朴次茅斯的情况一样。海上防线可以尽量加以巩固,但是陆地防线的一切设施,凡不包括在制敌于相当远的距离之外,使港口不受轰击并使之不受两个星期正规围攻这个任务之内的,都是完全多余的。但是,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拟议中的朴次茅斯防御工事的预算和某些计划来看,所谈的却是砖和石灰的大量消耗,壕沟和胸墙建筑,财源以及战时兵源的消耗。看来,军事工程师们是完全陶醉于这些编制筑垒计划的大好机会了。这些计划对他们说来很久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奢侈品。英国将有置身于堡垒群和炮台群的危险,这些东西会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出现,会像热带林里的蔓生植物一样茂盛起来。看来,政府是坚决主张

实现这些计划来证明开支的正当；然而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工事的主要成果只不过是好看罢了。

在各港口不能保证能够防备 *coup de main* (突然袭击) 之前，是有可能受到专为破坏其中某个港口，破坏后马上退却的入侵的。可见，各港口可以说是伦敦的安全阀。但是，既然各港口将有准备反击主力的攻击，甚至能够经得住两个星期的正规围攻，——这种准备看来被认为是必要的，——那末入侵的目标除开伦敦外就没有别的了。既然所有较小的据点都设了防，局部的入侵已经不起作用，入侵就势必进行冒险——要末消灭英国，要末自己被消灭。由此可见，巩固港口的事实本身便是削弱伦敦。这个事实迫使入侵的强国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力图一下子占领伦敦。帕麦斯顿勋爵说，伦敦应该从陆上加以保卫。假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陆军越强大，伦敦也就越安全。但是哪里会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陆军呢，如果朴次茅斯、普利茅斯、查塔姆、席尔涅斯或者彭布鲁克，都变成瑟堡、热那亚、科布伦茨或科伦这种类型的头等要塞，要保卫它们不是需要 15000—20000 人的守军吗？可见，越大力巩固港口，也就越削弱伦敦和别的地方。而人们居然把这叫做国防！

无论如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会决定伦敦的命运，而如果考虑到国家商业的大集中，考虑到敌人占领伦敦会使英国的整个工商业机器完全停顿下来，那就用不着怀疑，一次会战会决定整个王国的命运。可见，虽然预定在港口防御上花 1200 万，国家的心脏本身仍然可能是没有防卫的，而它的命运势必取决于一次会战的结局！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可以用最合理的办法来巩固各港口——要做到这一点，花不到预定用在这上面的过大款项的一半就可以

了，——但是，如果希望建立国防，那就立刻着手巩固伦敦吧。跟在帕麦斯顿后面说这样做不可能，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说法在巴黎需要巩固的时候曾经流行过。巴黎周围的一圈绵亘的筑垒工事所包括的面积略小于伦敦的面积，巴黎周围的堡垒线全长 27 英里，而伦敦周围距切林— 罗斯 6 英里的防线长达 37 英里。这条防线提供了关于各堡垒同中心的平均距离的正确概念；如果相应的铁路联络系统在半径范围和圆周范围方面都便于迅速调动预备兵员，这条防线延长 10 英里也不会使它显得过长。不言而喻，伦敦决不能马马虎虎地来巩固，像“康希耳杂志”⁷¹所建议的那样，认为 6 个大型堡垒就够了；堡垒至少得有整整 20 个，但是，另一方面，伦敦没有必要像巴黎那样用学究式的作法来巩固，因为伦敦是决不会需要经得住围攻的。全部要求就是保卫伦敦不受 *coup de main*，对付入侵的军队在它登陆后的两个星期内能够用来进攻伦敦的武力。没有绵亘的筑垒工事也行；如果防御计划事先有了妥善的安排，那末这种防线可以卓有成效地用巩固村庄和市郊住宅组的办法来代替。

如果伦敦这样来巩固，而各港口从海上来加强，并且防备陆上猛烈的、非正规的进攻，甚至短时期的围攻，那末英国就可能不必担心遭到任何入侵，而且做到所有这一切，大概用 1500 万英镑就够了。各港口总共需要不到 7 万正规部队和 15000 志愿兵；同时其余的基干部队、民军和志愿兵——假定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 8 万，志愿兵 10 万——将保卫伦敦附近的野战工事，或者在伦敦前面迎击；而且，伦敦以北的全部地区将有充分自由来组织志愿兵的新队伍，建立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的基地。在任何情况下，敌人都将是被迫行动的；在伦敦的巨大筑垒地域的吸引力面前，即使他想站也

不可能站住,他没有别的选择,要末向它攻击,从而遭到失败,要末等待,从而一天天增加自己处境的困难。

与此不同,政府的国防计划会造成这种局面:英国的军力假定是 90000 基干部队和民军部队以及 115000 名志愿兵,在这种情况下,守军至少用掉 25000 正规部队和 35000 志愿兵,剩下 65000 名正规部队和 80000 名志愿兵作为保卫伦敦的野战军,其中,一打起来显然就会迫切需要的 35000 人还十分安全地呆在谁也不打算攻击的石墙后面。但是这支军队的削弱还不只是在这 35000 人身上,它还会失去筑垒阵地,而把它从这些阵地里赶走只有正规围攻才能办到;它将不得不派出自己的指挥不善、经验缺乏的 80000 志愿兵在开阔的地方作战,这样一来,它就将被迫在不利得多的条件下行动,比不上以上说过的那样配置的军队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7 月 24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8 月 10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2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
——不列颠的贸易状况

1860年7月28日于伦敦

因为关于叙利亚骚乱的蓝皮书刚刚发表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定于下星期二提出关于叙利亚局势的质询⁷²，所以我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评论搁一搁，只想预先提醒一下读者，不要听信波拿巴派报刊的伤感语调，不要陷在对野蛮部落的残酷暴行的恐怖情绪和对受难者的自然同情里。但是总还有些情况需要仔细谈谈。首先应该指出，俄罗斯帝国由于农奴解放运动和财政紊乱而发生的内部矛盾，正处于困境，现时的政府要摆脱这种困境，除了发动大战外，找不到别的出路。政府认为，战争是防止发生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小册子“俄国的真相”⁷³里那样带有机密性地预言过的革命的唯一手段。自从哥尔查科夫公爵发出关于土耳其基督徒的控诉的周知照会，试图重新把东方问题提出讨论以来，到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但他的呼吁，只得到土伊勒里宫孤单的声音的响应，对欧洲舆论没有发生预期的影响。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俄国代理人 and 法国代理人开始蠢动起来，他们力求制造一次政治宗教殴斗，——前者在达尔马威亚，后者在叙利亚沿海一带，——而且，在门的内哥罗和黑塞哥维那的骚动迫

使土耳其政府撤出驻留在叙利亚的几乎全部土军,从而为黎巴嫩野蛮部落间特别尖锐的斗争留下了毫无阻碍的场所之后,这两个运动就遥相呼应起来。法国人的皇帝,像信奉正教的沙皇那样,不得不寻找某种新的、能轰动一时的十字军征讨,以便重新用战争的幻觉把自己的帝国投入忘河^①。意大利的运动由于挣脱了他的驾御并采取了同他所希望的相反的方针,已使巴黎舆论厌倦,这一点“立宪主义者报”已委婉地暗示过。他想以强迫“德意志统一”的办法来引诱普鲁士摄政王,借此使法国得到莱茵河各省作为“道义上的补偿”,这种企图以全盘失败而告终,甚至使这位投民族解放运动之机的 entrepreneur (事业家)成为一个笑柄。路易—拿破仑被牵连在内的与教皇的冲突⁷⁴,损害了他在农民中的威信支柱——法国天主教僧侣。

帝国国库已有若干时候处于枯竭状态,而现在还处在这种状态。虽然曾试图通过散布可以举办 emprunt de la paix (和平公债)的暗示来改善状况,但结果是徒劳的。甚至对波拿巴法国来说,这样做都未免太说不过去。除了以战争为借口的公债以外,再来一个以和平为借口的公债,这是一个连巴黎交易所经纪人也不能接受的方案。被阉割了的巴黎报刊用有些犹豫忐忑的语调斗胆暗示:第二帝国的恩赐既伟大又珍贵,因为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国债增加 50%。为数 5 亿法郎的和平公债计划因此被放弃了——这一退却,给了法夫尔先生勇气,使他在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作了关于“财政破产”堪虞的长篇演说,把帝国编制预算的能手给国库蒙上的华丽面纱撕成了碎片。法夫尔先生和奥利

① 据希腊神话,喝了“忘河”的水,就忘掉一切。——译者注

维耶先生在 Corps législatif 这个假代议机关的《chiens savants》（“有特殊训练的狗”）面前对十二月制度的特点大胆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巴黎的官方和半官方准官方报纸上满目皆是的对“旧党”⁷⁵阴谋的疯狂攻击，同时证明了这一个无情的事实的存在：叛乱的高卢精神又在死灰复燃，篡位者的继续统治又将有赖于组织一场大的军事演出，就像 coup d' état（政变）后两年和克里木事件结束后又两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很明显，法国的专制君主和俄国的专制君主都迫于同样的擂起战鼓的迫切需要，正在互相谅解地一致行动。半官方的波拿巴派的抨击文章向普鲁士摄政王提议，建立一个使法国得到“道义上的补偿”的“德意志联邦”，而皇帝亚历山大则向自己的舅舅公开建议把直至海岸的整个北德意志并入普鲁士，其条件是莱茵河各省交给法国，对俄国向多瑙河的推进保持沉默，这一建议不久前已在德国“民族联盟”⁷⁶的刊物上得到公开的认可，柏林政府刊物也没有驳斥。正是这个情况——两位专制君主同时的声明——引起奥地利皇帝同普鲁士摄政王在特普利策会晤⁷⁷。但是，彼得堡和巴黎的阴谋家为了防备他们对普鲁士的引诱不能得手，便把令人震惊的叙利亚屠杀事件储藏起来；这一事件准能成为法国干涉的借口，而法国的干涉则会给全欧战争在大门走不通的情况下打开后门。至于英国，我只补充一下，1841年帕麦斯顿勋爵供给德鲁兹人武器，至今他们还掌握着这些武器；1846年通过同沙皇尼古拉的协议，他事实上消灭了控制黎巴嫩野蛮部落的土耳其统治，并且为它们搞到一个假独立⁷⁸，这种假独立在外国阴谋家的巧妙指导下，随着岁月的消逝只能结出血腥的果实。

诸位知道，这一次议会会议使政府遭到了空前的接二连三的

失败。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在保护关税方面的毫无成效的措施外，一项重要的措施也没有通过。但政府一方面把法案一一收回，同时却施展诡计，以走私的办法在二读时巧妙地夹带了一个不大的、总共只有一个小条款的动议，假如这个动议被议会通过，那就会引起最大的、从 1689 年以来英国未曾有过的宪制改革⁷⁹。这个动议不是别的，恰好是提出取消印度的地方英军，把它并入不列颠军队，从而把它的最高统帅部从加尔各答的总督手中转交给伦敦的总司令部，换句话说，就是转交给剑桥公爵。这个改革会使一部分军队不受议会的管制，会在极大程度上加强王室权力，至于其他的严重后果就更不用说了。看来是，曾一致反对政府方案、但由于 1858 年的印度法案⁸⁰而不能成为下院议员的一些印度事务参事会的委员们，把某些议员鼓动了起来支持他们的抗议；于是，当政府认为自己的巧计已经得手时，突然发生了霍斯曼先生领导的议会 émeute (暴动)，恰好及时粉碎了政府阴谋。内阁完全出乎意料地陷入困难，因自己十分无知陷入了圈套的下院则一片混乱，这一出戏确实滑稽。

业已公布的上个月的出口值反映着不列颠的贸易萎缩的过程。同我在上一篇通讯^①中所说的一致，1860 年 6 月的出口与 1859 年 6 月的输出相比，减少将近 150 万英镑。

近三年的 6 月份的报告提供了如下的数字：

(英镑)		
1858 年	1859 年	1860 年
10241433	10665891	9236454

① 见本卷第 83—87 页。——编者注

截至 1860 年 6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内，公布的出口值比 1859 年同期减少 100 万：

	(英镑)	
1858 年	1859 年	1860 年
53467804	63003159	62019989

6 月份出口减少的商品有棉布、棉纱、麻布、小五金、刀类、铁、精梳毛织物。甚至在贸易额一向(本月份除外)不断增加的工厂毛织物的出口中，“毛纱和精梳毛纱”项下的出口也减少了。6 个月内向英属印度出口的棉织品从 1859 年上半年的 6094430 英镑减至 1860 年上半年的 4738440 英镑，即减少了将近 126 万英镑。

至于进口情况，最突出的就是购进了大量的棉花。1860 年 6 月收进 2102048 担，而 1859 年 6 月为 1655306 担，1858 年 6 月只有 1339108 担。6 个月内供应量增加了不下 300 万担，或者说增加了 60% 以上。1860 年 5 月份输入的棉花值比 1859 年 5 月输入的棉花值多 180 万英镑。1860 年头 5 个月购买的原棉比 1859 年同期至少多 650 万英镑。

棉织品和棉纱的出口迅速减少，而棉花的输入却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假如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加以比较，问题就很明显：棉纺织工业的危机日益迫近，尤其是因为，新购进的原棉同多得异乎寻常的棉花储存已经发生冲突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7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8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2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

不久以前在伦敦公布的不列颠国防委员会的报告说，如果法国人的皇帝想要派敌军到英国，那末“皇家舰队的所有战船”都不能阻挠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长达 2147 英里的海岸线的任何一段上登陆，更不用说爱尔兰的海岸线了。既然在茹安维尔的有名的小册子⁸¹发表前后人们也不止一次地承认过，只要指挥有方，就可能使 10 万人以上的法军在不列颠群岛上实现登陆，那末，唯一重要的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大不列颠拥有什么手段来抵抗这种入侵了。

根据下院的决定，本年 5 月间公布了不列颠陆军人数的资料。这个资料如下：部队的整个人员编成等于 144148；截至 5 月 1 日为止各级队列军人——133962；民军新编军队的人数——19333。这个资料一发表，三个王国四面八方都发出了差不多一致的抗议声，反对花费数达 7500 万美元的军事预算的方式，因为检查一下 144148 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基干部队的实际人数，“暴露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在任何一个地点，都未必能够集合 3 万名步兵用于进攻或防御”。

悉尼·赫伯特先生和他总司令部的同僚们立刻举行了一个会议，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努力来消除居民的恐慌。报纸写道：

“我们有可能研究了充实这个资料的数字，而且相当详细地弄清了实际情况。”

“泰晤士报”企图

“表明，如果‘部队’一词只指基干步兵，那末情况就反映得相当准确，但是实际上，驻在国内的军队也包括其他兵种的重大兵团，这样，它们的总人数就决不像看上去那样少。”

由于公众的这种神经过敏和总司令部会议的结果，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统计表，把宗主国的大不列颠的武装力量的人数定为 323259，即比根据两个月以前所引用的资料多 179111 人。这个出入是不难解释的。公布第一个数字的目的在于指明在有利的情况下和得到及时的通知后能够立即入营服役的人数；第二个数字的用途是指出列入领饷表的、也就是从上述 7500 万美元当中得到一份的男人和青年的总数，以及志愿兵和民军 227179 人（其中 20 万实际上不是作为兵士而存在的）。此外，还把 33302 名属于“新编部队训练站”的人算了进去。为了别人不致怪我们对这些“新编部队训练站”有偏见，我们可以引用伦敦“泰晤士报”这家权威报纸的话：

“新编部队训练站的部队实际上不是准备在国内服务，而是准备在国外服务的。它们的编制属于驻在国外的各营，所以它们不适于在国内服务，这是毫不奇怪的。”

简言之，这只不过是些不中用的部队，其中一类是服役不到 3 个月的新兵，这些新兵集结后每 3 个月或者不到 3 个月就被派到驻国外的部队里去，另一类是由于无法使用而留在国内的老弱，“因此，这支由年老体衰和未受训练的人组成的部队，无论如何也

不能同正规军的营同等看待”。

我们不谈新编部队训练站，谈谈志愿兵利民军吧。再指出一下目前至少有 20 万人只在纸上存在也就够了。马瓜伊尔先生不久以前在议会证实，几乎每个民军团，按照总司令部的名册计算，都比任何时候能够集合到队列里来的人数多出 200—300 人。悉尼·赫伯特先生也这样承认过。在爱尔兰的民军里，虽然兵士们由于穷苦，在集结方面不得不比他们的英格兰的同伴们更守规则些，但是有许多官方以 800 人计算的团，——例如，瓦特福德团——只不过有 400 人。把英国的民军和志愿兵部队的人数定为 138560 人，这个统计大概是接近实际的，对于一个公正的统计家所作的统计来说，这是可能的。

根据陆军部不久以前的报道，宗主国的正规军人数是 68778 人。这里面包括近卫骑兵 (1317 人)，工兵 (2089 人)，由老弱组成的卫生队，军用辎重队和其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打仗的部队。为了避免争论，假设所有 68000 人都是合格的。如果假定，整个民军和志愿兵都处于集合状态，正在服役，那末总数就将是 206560 人。甚至还可以把爱尔兰警察也加到这个名册里，这大约可以使它增加到将近 237000 人。正规军以及民军新编部队的正常人数刚刚定为 10 万人，大约比实际数字多 16000，但是我们将把这个数字算作可靠的。假设有 15000 志愿兵能够在法军登陆后 3 天以内到指定地点集合，英国仍然会有 115000 人的军队可用。但是要记住，其中有不少 25000 人是使用武器的新手。其次，所有海军造船厂、军械库和国家重要设施都要加强守军，因为在各海军港口从来也没有 8000 人以上的海军陆战队。爱尔兰也得派军队去，不管“国民请愿书”在开导爱尔兰人友好对待麦克马洪的兵士方面有没有

有什么影响。全部志愿兵和民军对于维持绿岛的秩序，特别是由于面临着会战是会觉得不够用的。女王陛下的政府将势必为这个国家至少拨出 1 万正规军和 25000 非正规军，警察除外。合在一起，这方面要 55000 人左右，于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剩下 8 万兵士来保卫军械库、兵工厂和海军造船厂了。假定，新编部队训练站的不适用的或无经验的兵士能够自己保卫自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要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两万来名适用的部队就够了，那也是没有根据的。可见，对付拿破仑的由法国人、朱阿夫兵等组成的 10 万军队的将是 6 万红色制服军队（其中可能有 45000 多基干部队）。这两支互相对抗的军队的冲突，结果如何，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可能有人反对这一点，认为法国不能在一切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装备 10 万人并把他们运过拉芒什。这也是可能的；但是英国不会知道袭击从哪里来，所以它自然是会耽心自己的地中海沿岸领地的命运的，并且会设法加强自己在那里的守军，以防袭击伦敦的威胁掩盖袭击马尔他岛和直布罗陀这个最终目的。英国会用自己拉芒什舰队的若干舰船向这些据点派 2—3 万兵士，当然不是“志愿兵”，这样，它会把国内的对敌斗争的整个担子都加在后者身上。某些知名的作者肯定地说，甚至洗劫伦敦归根到底给英国带来的损害，也会比把英国从马尔他岛和直布罗陀赶走要小。

然而关于这点，人们会对我们说，只要一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在全国，从切维厄特丘陵到康瓦尔，就能够把所有不列颠人都动员起来，把入侵的敌人打退到海里去。这有些道理。但是，经验教导我们，不管群众的爱国力量如何，由于居民通常没有武器，即使有也不会用，他们的战斗情绪在战争的情况下就没有多少价值。

木棍和铁叉在“七日规”^①或内地能够成为置人于死地的武器，但是，认为它们在同朱阿夫兵斗争中将成为抵挡不住的，那就荒谬了。要使差不多完全包下志愿兵部队的资产阶级在法军占领他们的家乡岛国的关头，愿意像志愿兵部队出席检阅，接受女王陛下的祝贺一样，响应号召，也是非常成问题的。无论如何，承认可能有15万人的军队入侵，并不比认为志愿兵能够派出12万人更为荒谬一些，因为，到12个月征召的终期白金汉宫发出的诚心邀请还不能够使集合来的人数超过18300人。

关于实际参加了海德公园检阅的部队的人数，有人表示了某些怀疑，因此让我们从“曼彻斯特卫报”摘录一段谈阅兵第二天情况的文章。这里提到的“特派记者”，是麦克默多上校的知己汤姆·泰勒先生：

“大概，我们的读者记得，我们的特派记者根据麦克默多上校的官方资料曾经声明，他们的人数是18300人，即比约翰·伯戈因爵士所确定的那个数字略小。但是，看来约翰爵士更感兴趣的是志愿兵的军容，而不是他们的人数。”

在估计可能集结起来抗击入侵的部队人数时，我们有意依照最有利于大不列颠的统计。我们关于常备军的统计，承认花名册中有名的每个兵士都合格，不管有病没病。我们把民军和志愿兵的人数定为115000人——对这个数字，熟悉情况的人是可能认为大大超过实际人数的。此外，还完全没有考虑有关这个问题的下面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法军指挥军官的公认的才能，法国军纪的优势，法国战术的总优势，另一方面，英军许多高级军官的不容置

^① 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工人区。——编者注

疑的迟钝,正规军和志愿兵的管理不善(在通知下达 5 个星期以后;一个民军团在本年 5 月间出席了检阅,有 135 人光着脚)。最后,整个不列颠军队的战斗素质同法国军队相差悬殊。

考虑到这些因素,下面的情况就应该被认为是无疑的,即拿破仑若以 15 万人或者甚至 10 万人的军队在一个选择得当的英国港口明天登陆,那末他是有可能“洗劫伦敦”的,而不像一家伦敦报纸不久以前曾经断言的那样,“如果他怀着敌意踏上萨克森土地”,他的必然命运就是“被消灭”。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7 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8 月 1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2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俄法同盟

1860年8月3日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通讯^①中认为叙利亚的屠杀和俄法同盟之间有秘密联系的看法，在拉芒什海峡彼岸得到意外的证实，这就是丹屠先生于上星期二出版的据说是艾德门·阿布先生写的小册子“叙利亚和对俄同盟”⁸²。你们知道，丹屠先生是法国政府的出版商，出版所有半官方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时把土伊勒里宫正在努力“研究的题目”透露给欧洲。上述的小册子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它是紧接十二月英雄向培尔西尼发出的一封甜蜜的书信⁸³之后问世的，这封书信的目的是麻痹约翰牛，而约翰·罗素勋爵则把它的副本送往伦敦的“泰晤士报”，同时却拒绝提交给议会。下面的摘录是“叙利亚和对俄同盟”这本小册子中最重要的内容。

“基督教欧洲，正像十字军远征时期一样，被可怖的罪行震动了，不久以前的叙利亚就成了这种犯罪的场所。70万基督徒被200万伊斯兰教徒的残酷的宗教狂热任意摆布，而土耳其政府那种无从解释的不闻不问态度、看来暴露出它是参与了这件事的。当然，如果法国不立即担负起光荣的任务去保护那些在遥远的过去就是隐士彼得和非力浦—奥古斯特的战士的人的生命财产，那末，它就是背弃自己的所有传统……因此，已经是考虑怎样摆脱这

^① 见本卷第110—112页。——编者注

种境况的时候了,因为,如果这种境况拖延下去,必然会引起一场大灾难——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全被屠杀。土耳其政府侈谈的远征完全不足以恢复秩序。在叙利亚有教友并且公正地为他们的安全而担忧的大国,应该准备物质上的干涉。如果它们拖延,要保护这些牺牲者就晚了;它们唯一的义务就将是为蒙难者复仇了。

特别关心保护这遥远海岸上的十字架的有两个国家:法国和俄国。它们武装同盟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和这一同盟将怎样影响到欧洲的今后组织?我们打算探讨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吸引和结合的规律的作用之下,人民组成先前所未有的政治联合。我们‘正亲身处在’人类生活的这种紧要关头中的一个关头。叙利亚问题只是极其复杂的局势的一个纽结。整个欧洲都处在期待和不安的状态;它期待问题的通盘解决,以便为欧洲和东方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使我们大陆的组织同那些正在与奴役进行斗争的现代各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相符合。敌对的宗教意向,各异的气质,完全不同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在某些欧洲国家中促成了不安的情绪,这种情绪有碍于信任的恢复和文明的进步。和平是各国政府所谋求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只有在我们刚才指出的骚动的经常原因消失时,才能得到可靠的保证。因此,我们想作出两点结论:

1、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应该促成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国家的使命,是把具有共同思想和意向的居民吸收和集中到一个强大的统一体里;

2、应该贯彻和支持这个原则,而不诉诸武力。

对法国和俄国一眼就可看出:它们实现了君主国的理想。这两个国家彼此相隔整整400里约^①,但它们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达到了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建立巩固的国家,而不是变化无常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边界因战争的偶然情况每天都可以改变)……在近一百三十五年来,历代沙皇在彼得大帝遗嘱上动脑筋的时候,从未转移其对欧洲土耳其的贪婪目光……法国是否必须像过去那样抗议沙皇对衰老的苏丹帝国的野心?我们认为不必。如果俄国在恢复我国莱茵边界的问题上帮助我们,那末,在我们看来,拿任何一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1里约大致等于4.5公里。——译者注

个国家来酬答这个同盟都不是太高的代价。由于这种联合，法国可能恢复自己十八个世纪以前地理学家斯特拉本所划定的实际边界。”

(接着引述斯特拉本所列举的高卢作为一个强国领土的种种好处。)

“很容易理解，法国应该力求重建这个神的创作(显然，是指高卢边界)^①，这在如此多的世纪内一直由于人心狡诈而受到阻碍，并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要扩张领土时，德国就周期性地表现不安并以贝克尔的爱国歌曲^②向我们挑战……我们知道，不单是我们想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如果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打算同我们对莱茵的打算一样，那末，难道就不能从这些类似的要求中求得一些好处吗？难道就不能迫使欧洲接受这样一种联合，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把土耳其交给俄国，把拿破仑第一在1814年视为自己作为君主而存在的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即莱茵边界交给法国吗？

欧洲只有200万土耳其人，而把沙皇作为自己精神主宰的希腊人却有1300万……曾持续9年之久的希腊起义只是运动的前奏，叙利亚的屠杀可能就是运动发生的信号。希腊的基督徒只待自己的彼得堡主宰或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命令一发，就要起义反抗异教徒；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会预见到，东方问题是要在对俄国有利的意义上，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的。因此，假若受到斯塔列扎诺夫预言鼓舞的俄国人，应他们教友的呼唤准备随时越过普鲁特河，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边界，那末我们的意图所根据的理由，就会同俄国所遵循的理由一样雄辩有力。我们且撇开一切历史上的回忆，一切地理上的道理，挨次地考察一下同莱茵毗连的各个地区，探讨一下要求把它们合并过来的原因吧。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② 指尼古劳斯·贝克尔的“德国的莱茵”(1840)，开头是：《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den freien deutschen Rhein》(“他们休想获得德国的自由莱茵”)。——译者注

首先是比利时。惊人的相似使一些历史学家有理由称比利时人为北方的法兰西人，凭良心说，这是很难争议的。的确，在这个国家里有教养的阶级只用法语，而懂佛来米方言的只是某些地区的下等居民阶级。除此而外，整个比利时都信奉天主教；比利时的独立正应该归功于法国，即按起源、语言和宗教来说是它的姐妹国的法国。我们且不说，1795年被我们的武力征服了的比利时，在1814年以前是法国的9个省。不过，我国对它的压制看来并不怎样沉重，因为在1831年，当比利时未能取得各大国的大国的允许合并给法国的时候，曾根据两院的决定，愿把比利时王位交给法王之子奈穆尔公爵。由于后者拒绝，两院才不得不把王位交给了萨克森—科堡公爵，即现在的列奥波特一世。但我们引证的前例极为重要；这使我们有根据设想，如果要问及比利时的意见，它的豁达不会在萨瓦之下，它会再一次证明，法国的伟大引起它多么大的同情和尊敬。上等阶级某些代表的反对立场很快就会被人民的鼓掌声压下去。

莱茵河分三条支流入海，其中两条——法入须德海的艾塞耳河和麦士河的支流伐耳河——几乎直向北流。假如法国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它不能选择莱茵河本线代替伐耳河或艾塞耳河线，以便从荷兰南部割一块尽可能小的地方吗？当然，它正是会这样做。此外，必须以莱茵河线为基础修改我们的边界，这绝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荷兰的利益。我们需要扩张，舆论也早就大声疾呼地要求我们扩张，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具有现在边界的比利时就足够了，何况，些耳德河线就是根据1801年的吕内维尔条约应该划归法国的边界。”

接着是一小段，用同样的一些论据证明兼并“在帝国时期是Département des Forêts（森林省）的卢森堡大公国的必要性。此后，小册子的作者就转而证明合并莱茵普鲁士的必要性：

“比利时和卢森堡归属我国以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改善我们的边境，我们必须合并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莱茵普鲁士、整个莱茵巴伐利亚和大约三分之一的黑森大公国。所有这些土地，在帝国时期是鲁尔、莱茵和摩塞尔、萨尔、蒙顿奈等省以及贝尔格大公国。1815年这些土地被瓜分，为的是使这些省份再回到我们的手中变得困难。曾经并入法兰西君主国的

这些省虽然同我们直接联系的年代不多，但是，我们暂时的逗留却在那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一件卓越的事情。在这些地区人们是以怎样的好感对待法国旅行者，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近 45 年来，没有一个法国兵士在莱茵河沿岸的城市驻防，但是真教人惊奇：这里的人对待我们穿军服的人却如此令人感动。像我们一样，他们是天主教徒；像我们一样，他们是法国人。难道我们的皇帝查理大帝的宫廷不是在亚琛吗？…… 与法国毗连的莱茵各省在政治上应该像在天然条件上一样依附法国。”

然后，作者又谈到俄国，并指出，克里木战争不是法俄同盟的障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达成谅解。接着他便这样来陈述法国应当得到俄国感谢的一个理由：

“应该记得，法国没有支持英国在波罗的海上的计划。我们不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向喀琅施塔德袭击能否成功；我们有根据认为，幸亏法国反对，才没有进行袭击。”

在回顾了一下意大利战争之后，作者表示相信普鲁士最终会加入法俄同盟：

“但是，要使柏林内阁同意我们的政策，就应该使它摆脱英国的影响。这怎样才能做到呢？使普鲁士不再是我们在莱茵河的邻国，并答应支持它在德国占领导地位的合法要求。这些莱茵省的割让将迫使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从奥地利那里寻求补报。与英国同盟能给普鲁士的只是 status quo（现状），而与法国同盟却可以在它面前开辟无限广阔的天地！

法、俄、普三国一旦缔结真诚的同盟，——而我們也有理由期望它将会缔结，——从中产生的后果将是很自然的……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一千八百年以前斯特拉本就认为是无可争辩的，——莱茵河是法国北部的天然边界。普鲁士因这种领土扩张而吃亏最大。近 45 年来它看守莱茵河就像巨龙看守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一样。消除这个法普之间敌对的原因吧；让莱茵河左岸重新成为法国的领土；作为奖赏，普鲁士将从奥地利那里得到补报，——奥地利这个国家将因背信弃义和迟钝呆笨而受到惩罚。为了持久和平，什么事都得做。

应当符合居民的愿望,以便不发生强力兼并的事情。如果俄国占了君士坦丁堡,法国占了莱茵,如果奥地利缩小了自己的范围,普鲁士取得了在德国的主导地位,那末欧洲还会发生骚乱或革命吗?英国一国敢反对俄国、普鲁士和法国吗?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但是,假如这种事情发生了,假如大不列颠敢于如此轻举妄动,那末,它会得到严重的教训;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伊奥尼亚群岛是使它保持冷静的保证;是它铠甲上的脆弱之处。尽管它能够在自己的岛上徒劳无功地焦躁不安,并且始终不得不消极观看大陆上发生的一切,但由于它将派往叙利亚五六千人,它仍然会被允许说出自己的意见的。

已经到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明确确定的时候了。正是在叙利亚,法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莱茵边界,巩固同他国的同盟。但我们应该注意不让俄国无止境地扩张。波斯普鲁斯海峡以北各省就应该使它的要求满足了。小亚细亚仍应是中立区。如果能够用富有理想和实际的眼光观察实际问题,那末我们就说,选择已经由我们做好了,正好,提出了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叙利亚实现的那种思想的化身。这就是阿布德-艾尔-喀德。他是一位相当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足以博得伊斯兰教居民的信赖;他相当文明,足以对一切人一视同仁;感恩的纽带把他同法国联在一起,他将保卫基督徒并迫使那些一直要破坏小亚细亚平静的狂暴部落就范。如果任命阿布德-艾尔-喀德为叙利亚的艾米尔,我们的这位俘虏的劳绩就得到应有的奖赏了。”

对阿布的小册子的评论是卡·马克思
于 1860 年 8 月 3 日写的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载于 1860 年 8 月 16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6025 号

卡·马克思 纸张税。——皇帝的信

1860年8月7日于伦敦

昨晚下院在大多数议员出席的情况下爆发的本届议会的党派大战，虽然从内阁的角度来看是一次胜利，但从舞台效果的角度来看却是一次失败。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把纸张关税降至消费税的水平——另增少许的关税附加税以弥补消费税可能发生的不妥——的决议，以33票的多数通过。但是下院完全以自己的风格做了这件事。这里有舞台，有斗士及其侍卫，但没有稍微值得一提的观众。还在战斗开始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知道，公报亦已发表。因此，公众是漠不关心的。谁都知道，联合起来组成所谓“大自由党”⁸⁴的党派控制着议会的多数，因此，只有多数人队伍发生分裂，内阁才会失败。但这一点已由帕麦斯顿勋爵事先把形形色色的自由派议员召到他官邸中而得到调解。决议本身出自内阁中的曼彻斯特派，而帕麦斯顿勋爵也只是保证把格莱斯顿先生的决议提升为内阁的决议才得以保住了格莱斯顿先生和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支持。他曾经在通过关于取消纸张税的法案时使用手段，骗过他们。这一次，他们强迫他遵循一定的行动路线。正统的辉格党人是多数派中唯一被怀疑有背叛阴谋的派别；但他们主子的严厉声音和议会再度解散对他们的威胁，已足以使他们回到

严格纪律的约束之下了。总之，在演出开始前许多小时，整个伦敦就已确切地知道党派裁判的结果了，因此，除了观众席上的常客外，谁也不想出席观看圣斯蒂凡教堂⁸⁵的虚有其表的大战。的确，这是相当无聊的场面，只有格莱斯顿先生的引人入胜的口才以及休·凯尔恩斯爵士精心准备的辩护词才引起少许的活跃。格莱斯顿先生极力把对其法案的反对立场描绘为保护关税派企图对自由贸易派的最后一次绝望反抗。当他坐下来时，掌声淹没了他最后几句话，这似乎是在向他这位自由党的真正领袖致敬，而帕麦斯顿勋爵在这个党里则远不是受人敬爱的独裁者。代表保守党人发言的休·凯尔恩斯爵士用严密的逻辑论据和深刻的分析，证明将纸张税降至消费税的水平与对法商约绝对无关。他的对手首席检察官理查·贝瑟耳爵士（自由党人）做得很笨，对自己劲敌的成功怒不可遏，并嘲笑休爵士的“律师辞令”；因此，这位可怜的人招来了保守党人一连串不赞同的喊声，不时地打断他的发言。

这样，本届议会的一场党派大战就结束了，现在，极可尊敬的议员们肯定即将成批地离开下院，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可能现在干脆用纠缠的办法争取通过任何合他心意的小法案，例如，关于地方欧籍军队同不列颠军队合并的可恶的印度法案⁸⁶。如果要求对英国议会制的深刻恶化提供什么令人信服的新证明，那末，这个印度法案和下院对它的态度就可以做这样的证明。任何一个对印度事务稍有权威和略知一二的下院议员都反对过这个法案。下院的多数派不仅自己承认没有得到任何材料，而且对法案作者的内心打算也表示过疑虑。多数派曾经不得不承认：法案是以欺骗的方式偷运进议院的；正确估计情况所必需的最重要文件被狡诈地藏了

起来；印度事务大臣^①不顾印度事务参事会全体成员的不同意就提出了法案——关于此事，他显然违反 1858 年赐与印度的新宪法⁸⁷而认为没有必要向议院报告；最后，内阁甚至没有试图引用任何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在下院会议快结束时——在一切比较重要一点的问题被从议程中取消之后——用那种极不光彩的匆忙方式通过法案，而这个法案实际上将根本改变不列颠宪法，因为它将大大加强王室的权力，将建立一支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不受议会拨款约束的军队。但法案仍然可能在现在通过，因为两派的头目看来已同宫廷有了秘密协定了。

路易一拿破仑写给他所钟爱的培尔西尼的信，仍然是英国和拉芒什海峡彼岸注意的中心。首先，土耳其政府对法国和俄国最初所筹划的那种叙利亚远征⁸⁸的抗议，看来得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烈支持，而帕麦斯顿勋爵既在不久前即辩论防务时选定了路易一拿破仑作为不列颠所疑惧的主要对象，于是就不能不把自己的权威地位抛在天平盘上加重土耳其和德意志各邦这一边了。其次，十二月英雄看来不仅被俄国的唯我独尊的口气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被《*anciens partis*》（“旧党”）在沙龙里的反复嘲弄以及从巴黎郊区传来的对《*alliance cosaque*》（“与哥萨克同盟”）的低声怨言弄得惊慌起来。

要使巴黎能接受这个同盟，需要把情况大大复杂化一下。路易一拿破仑在如此可悲的情况和显然心慌意乱的状态下，写了那封信，信中某些地方是极为可笑的。

英国人在读到下面一句说给帕麦斯顿勋爵听的话时，大概会

① 查·伍德。——编者注

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都是老实人，让我们像老实人那样，而不要像尔虞我诈的骗子手那样达成真诚的协议吧”；但是，只有法国人的听觉才能鉴别这一段粗俗不堪而又可笑之极的法文原文：《Entendons nous loyalement comme d’honnêtes gens, que nous sommes, et non comme des larrons, qui veulent se duper mutuellement》。任何一个法国人，在读到这一段话时，都不能不想起名剧“罗伯尔·马凯尔”⁸⁹中类似的话。

附录几份有关法国和英国国家支出的比较资料。根据临时的或草拟的预算，法国 1860 年的总收入估计为 182500 万法郎或 7300 万英镑，其收入来源如下：

(英镑)	
一、直接税、土地、房屋、私人营业执照	18800000
二、注册收入 (印花税和地产)	14300000
三、林场、森林和渔业	1500000
四、关税和盐税	9100000
五、间接税 (消费税等)	19500000
六、邮政	2300000
七、其他收入	7500000

英国 1859 年的收入 (1860 年的财务报告尚未公布) 如下，并且同法国的报告一样，取其整数：

(英镑)	
一、税收 (包括所得税)	10000000
二、印花税	8250000
三、皇室土地	420000
四、关税	24380000
五、消费税	18500000
六、邮政	3200000
七、其他收入	2100000

两国国家支出比较如下：

	法 国	英 国
	(单位: 英镑)	
国债利息	22400000	28500000
陆军和海军	18600000	22500000
皇室费	1000000	400000
进款征集费	8000000	4500000
其他支出	23000000	9000000
共 计	73000000	6500000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波拿巴法国的国债利息正在迅速达到英国的水平；大陆上的集权君主国对陆军和海军的支出少于岛上的寡头政体国；某个名叫路易—拿破仑的个人开支比英国君主多一倍半，最后，在法国这样一个官僚国家里，进教征集费正在以同进款本身不相称的比例增长着。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8 月 7 日
载于 1860 年 8 月 22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603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的运动

1860年8月8日于伦敦

意大利南部的危机就要到来。如果法国和撒丁的报纸可信的话，那末 1500 名加里波第的军队已经在卡拉布里亚海岸登陆，并且随时都可望加里波第本人到来。即使这个消息为时过早，8 月中加里波第就可以把战场转移到意大利半岛却是毫无疑问的。

要想弄清楚那不勒斯军队的调动情形，必须注意到在它的队伍中有两个互相敌对的派别：一派是执政的温和自由派，以政府为代表；另一派是专制主义的权臣集团，军队的大多数将领都同它有联系。政府的命令往往被宫廷的密令和将军们的阴谋所破坏。军队调动的矛盾以及新闻报道的矛盾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今天我们听说全部王国军队都要撤离西西里岛，明天我们却发现王国军队在米拉措附近准备新的作战基地。这种情形是所有不彻底的革命所特有的；1848 年在欧洲到处都出现过类似的局面。

当那不勒斯政府主张撤离西西里岛时，博斯科——看来他是这一群佩带那不勒斯将官肩章的老懦夫中唯一坚定的人物——却安然地着手把该岛的东北部变为希望能够从这里去收复全岛的筑垒基地。为了这个目的，他率领了一支在墨西拿所能选出的精锐部队开往米拉措。在那里他碰上了梅迪契指挥的加里波第军队的

一个旅，可是却没有敢对他们进行任何认真的攻击。就在那时，加里波第本人得到了报告，率领援军来到了，于是，这位起义者的领袖便向王国军队发起了攻击，经过 12 小时以上的激战，完全击溃了王国军队。双方参战的兵力大致相等，但那不勒斯军队占领的是非常坚固的阵地。然而，无论阵地或兵士都没有能抵挡住起义者勇猛的攻击，他们把那不勒斯军队一直赶过城市，退入主堡。于是那不勒斯军队只得投降。加里波第准许他们登船离去，但不得携带武器。在这次胜利以后，加里波第立即向墨西拿进发，当地的那不勒斯的将军同意以不触犯他的主堡为条件交出该城的外围堡垒。容纳不了几千人的墨西拿主堡，永远也不会成为加里波第进攻行动的严重障碍。因此，他做得完全正确，使该城避免了一场炮击，而这本来是任何强攻所不能避免的后果。总之，这一连串的投降——在巴勒摩、米拉措和墨西拿——比次数多一倍的战败更能摧毁王国军队的自信心和对指挥官的信任。那不勒斯军队向加里波第投降已经成为常见的事情。

从这时起，这位西西里的独裁者就可以考虑在大陆登陆了。可是，要保证在更往北面、距离那不勒斯 6—8 日行程的地方登陆，即使是在波利卡斯特罗湾登陆，他现有的轮船大概也还是不够的。因此，看来他决定在最狭窄的地方，即在该岛的东北端、墨西拿以北的地方渡过海峡。据报道，他在这个地方集中了将近 1000 只船，其中大概多半是一些这一带常见的近海捕鱼的小帆船，所以，假如关于萨基指挥的 1500 人登陆的消息属实的话，那末他们就是加里波第的先头部队。从这里向那不勒斯进军并不是最适宜的地点，因为这个地点在半岛上距离首都最远。但是，如果加里波第的轮船不能一次载运 1 万人，那末他就用不着选择其他地点了，而在

这个地点他却至少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卡拉布里亚人会立即和他联合起来。然而，假如加里波第的轮船能载运约 1 万人，并能指望王国舰队的中立（看来王国舰队并没有决心对意大利人作战），那末，大概一支不大的部队在卡拉布里亚登陆就仅仅是一种佯动，而他本人是想率主力开往波利卡斯特罗湾，甚至萨累诺湾。

加里波第现有的兵力为 5 个正规步兵旅（每旅 4 个营）、10 个 Cacciatori dell' Etna（埃特纳猎兵）营、2 个 Cacciatori delle Alpi（阿尔卑斯猎兵）营（这是他的精锐部队）、1 个由英国人邓恩上校指挥的外籍营（现为意大利营）、1 个工兵营、1 个骑兵团和 1 个骑兵连及 4 个野炮营，共 34 个营、4 个骑兵连和 32 门火炮，总人数约达 25000 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北意大利人，其余的是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几乎所有这些兵力都可以用来进攻那不勒斯，因为目前正在编组的新的部队不久就足以监视墨西拿的主堡和保卫巴勒摩及其他城市。但是，同那不勒斯政府名义上拥有的军队比起来，这支军队的人数还是很少的。

那不勒斯军队按平时编制包括 3 个近卫团、15 个基干团、4 个外籍团，每团 2 个营，计 44 个营；还有 13 个猎兵营、9 个骑兵团和 2 个炮兵团，共计 57 个步兵营和 45 个骑兵连。如果再加上也完全按照军队原则编组的宪兵 9000 人，这支军队按平时编制共有 9 万人。但是近两年来，这支军队已按战时编制补充满员；各团增编了第三营，后备骑兵连已转为现役，警备部队也已补充足额，因此，目前这支军队名义上已超过 15 万人。

但是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呵！表面上，在书呆子看来，它是十分中看的，然而这支军队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爱国热忱，也没有忠心。它没有民族的战斗传统。这样的那不勒斯军队一向总是

吃败仗；只有在追随拿破仑时它才始终是胜利的分亨者。这不是民族的军队，这纯粹是国王的军队。征集和组织这支军队仅仅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使人民俯首听命。可是，甚至在这一方面，它显然也是无用的；军队中有着大批反君主主义分子，目前他们已到处显露头角。特别是中士和下士，几乎全都是自由派。整团的人高呼：《Viva Garibaldi!》（“加里波第万岁！”）。这支军队从卡拉塔菲米到巴勒摩所遭到的这样的失败，是任何一支军队从未遭到过的。如果说外籍部队和某些那不勒斯部队在米拉措曾经打得不坏，那末不应当忘记，这些精锐部队只是那不勒斯军队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此，几乎无疑问的是：如果加里波第率领足以保证在大陆上取得几次胜利的兵力登陆，那末那不勒斯军队无论集中有多大的兵力也不能成功地抵挡他；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可能就要听到加里波第率领 15000 人对付比他多十倍的敌人，从希拉向那不勒斯继续胜利进军。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8 月 8 日

载于 1860 年 8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3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
法国公债和印商公债

1860年8月14日于伦敦

600万英镑的新的撒丁公债的发行工作结束了,据说,公债的认购数字超过所要求的数字的一倍。可见,市场上新意大利王国的债券价格是提高了;与此同时,奥地利却无法应付债务,其债台之高,已不能用国家的财源来衡量,而是要用它的政府的虚弱来衡量了;至于俄国,强大的俄国,由于被赶出欧洲信用市场,已不得不再去求助于印刷机。然而,即使对撒丁来说,新公债也提醒我们一个可恶的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刚迈出第一步,就好像有一种恶鬼般的宿命力量把他们推向新的奴役。难道任何国债不是压在整個国民经济身上的抵押,不是阉割人民的自由吗?难道它不是产生新型的名叫国家债权人的无形暴君吗?无论如何,如果说法国人为了继续做奴隶而在不到10年之内把自己的国债增加了一倍,那末,意大利人为了获得自由,大概要担负起同样的债务了。

本来意义上的皮蒙特,即不算一些不久之前合并过来的省份⁹⁰,在1847年共缴纳税款3813452英镑,而今年它必须缴纳6829000英镑。在英国报刊上,例如在“经济学家”上曾经指出,由于关税制度实行了自由主义的改革,皮蒙特的商业也已大大发展,

并且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了下述数字：

	(英镑)
1854 年输入仅为	12497160
1857 年输入为	19123040
1854 年输出为	8595280
1857 年输出增加到	14050040

但是，请允许我指出，这种增加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撒丁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丝织品、细绳、酒类和植物油；而正如已经普遍都知道的，在 1857 年前三个季度中，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大涨物涨，因而撒丁的商业收入总额就增加得特别多。此外，王国的官方统计所说的只是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数量，因此，1857 年的数字一般说来可能是一个例外。在 1858—1860 年期间，至今没有印发过任何官方报告，所以，国家的工业发展曾否因 1858 年的商业危机和 1859 年的意大利战争而停顿，还不得而知。下面引用的撒丁本土本年度（1860 年）官方收支统计表证明，新公债的一部分将用于弥补赤字，而另一部分则规定供准备新战争之用。

1860 年撒丁的收入

	(英镑)
关税	2411824
土地税，房捐，印花税等	2940284
铁路和电报	699400
邮政	242000
外交部的进款	12400
内务部的进款	21136
某些国民教育门的收入	580
造币厂的收入	6876
其他收入	193888
特殊收入	301440
共 计	6829738

1860 年撒丁的支出

	(英镑)
财政部.....	4331676
司法部	243816
外交部.....	70028
国民教育	117744
内务部	407152
公共工程	854080
陆军费.....	2229464
海军费	310360
特殊开支.....	1453268
共 计	10017588

把数达 10017558 英镑的开支同为数 6829738 英镑的收入比较一下,就可看到,赤字是 3187850 英镑。另一方面,新获得的省份据统计应提供年收入 3435552 英镑,而它们的年支出则将为 1855984 英镑,这样约净余 160 万英镑。根据这一统计,包括新获得的省份在内的整个撒丁王国的赤字,就将减少到 1608282 英镑。当然,让伦巴第和诸公国支付皮蒙特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所负担的部分费用,是公平合理的,不过,单是为了缓和旧省份的财政状况而向新省份征收几乎两倍于它们的行政费的捐税,这到后来可能是万分危险的。

熟悉巴黎金融市场内幕的人一直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举办新的法国公债。只要有一个适当的理由就可举办公债。如所周知,emprunt de la paix (和平公债)结果是失败了。《Partant pour la Syrie》⁹¹的排演规模到现在仍然太小,无法对 grande nation (伟大民族)的热情发出新的召唤。因此,据推测,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而粮价继续上升,那末,就将以防止可能的饥荒为借口而举办公

债。联系着法国财政状况,可以指出一件有趣的事实:曾在 Corps Législatif (立法团)大胆预言过帝国财政必将破产的茹尔·法夫尔先生,被选为巴黎律师公会的 bâtonnier (会长)。诸位都知道,从旧君主制度时代起,法国律师就保存了某些古老的封建宪法的残余。他们仍然组成一个特殊的公会组织,叫做 barreau,它的会长即 bâtonnier 每年选一次,代表公会与法庭和政府打交道,同时维持会内的内部纪律。在复辟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者国王^①统治的时代,巴黎 bâtonnier 的选举往往被认为是一件政治大事,是一次对当前的政府表示拥护或反对的行动。我认为,茹尔·法夫尔先生的当选应该认为是巴黎律师公会组织第一次反波拿巴主义的示威,因此,这是当前大事记上值得一提的事件。

在昨天勉强达到法定人数的下院会议上,查理·伍德爵士,这真正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辉格党钻营家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授权他以印度财政部的名义举办 300 万英镑的新公债。根据他的报告,1858—1859 年度(印度的财政年度的起迄向来都是 4 月)印度的赤字为 14187000 英镑,1859—1860 年度为 9981000 英镑,而 1860—1861 年度预计为 740 万英镑。这项赤字的一部分他答应用威尔逊先生刚刚制定的税收来弥补,——顺便指出,这是非常成问题的,——另一部分赤字则用 300 万新公债来消灭。1856—1857 年度即起义前一年为数 59442000 英镑的国债,目前已增加到 97851000 英镑。债务的利息增加得更快,从 1856—1857 年度的 2525000 英镑增加到 1859—1860 年度的 4461000 英镑。虽然实行新税收而使收入强行增加,但是收入仍旧赶不上开支。甚

^①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至用查理·伍德先生本人的话来说,所有部门,除了公共工程部门以外,开支都增加了。为了弥补今年和明年用于建筑设防兵营的300万英镑开支,“公共工程和民用的公共建筑几乎完全暂停”。看来,查理爵士认为这种“全面暂停”是整个办法的最好的一着。1856—1857年驻在印度的欧洲兵士为4万名,现在那里有8万名,那时土著军队不到20万人,而现在却超过30万人。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8月14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0年8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35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奥地利病夫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所以活着，看来只是为了证明一句古拉丁名言的正确性：“上帝要想叫谁灭亡，首先是使他疯狂。”从1859年初起，他别的事情不做，总是故意放弃摆在他面前的一切拯救自己和奥地利帝国的机会。只用部分军队突然进攻皮蒙特，由皇帝及其党徒代替海斯元帅统率军队，因犹豫不决而导致了索尔费里诺会战，正当法国人来到他的最强大的阵地前面而突然签订和约，在为时不太晚的时候顽固地拒绝在帝国内部组织上作任何让步，——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无与伦比的一系列由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期内所犯下的荒谬的错误。

但是，命运垂青，又给弗兰茨-约瑟夫一个机会。路易-拿破仑的无耻的两面手法，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盟成为必要，这一联盟，最初由于奥地利以往的屈辱和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就已经有了可能了。巴登会晤和特普利策会晤⁹²巩固了这一联盟。普鲁士第一次以全德代表的身分出现，答应在奥地利遭到意大利乃至法国进攻时予以援助；奥地利方面则答应向舆论让步并改变自己的对内政策。在弗兰茨-约瑟夫面前，的确出现了希望。即使匈牙利发生骚动，他也可以不害怕与意大利单独较量了，因为他的新政策定会确保帝国这一部分的安全。匈牙利获得以1849年

废除的旧宪法为基础的特殊宪法，可能就心满意足：一个自由主义的全帝国宪法，可能符合君主国的德意志核心的当前愿望，并且还可能在颇大程度上抵销斯拉夫省份的分立趋向。财政交由社会监督，将会恢复国家信用，这样，目前这个软弱、贫困、一蹶不振、衰竭不堪、被内部纠纷弄得分崩离析的奥地利，将会在 70 万准备保护它的德意志军队的守卫之下迅速恢复自己的实力。为了实现这一切，只要求奥地利做到两个条件：坚决地、无条件地在国内实行真正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威尼斯保持防御策略，而让意大利其他部分自行其是。

但是，弗兰茨—约瑟夫看来是做不到这两个条件的，或者说，他不想这样做。他既舍不得放弃他那日益衰微的专制君主的权力，又不能忘情于他已经丧失的意大利小君主的保护人的地位。缺乏真诚、软弱无力但又顽固不化的弗兰茨—约瑟夫看来正力求通过对外的侵略战争来逃避国内的困难，看来，他不想用放弃正在从他手中溜走的权力的办法使自己的帝国凝合起来，而是重新投入了他的密友的怀抱并准备进行一场可能导致奥地利君主制崩溃的、向意大利的征讨。

不管维也纳是否向都灵发出关于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登陆一事的照会或其他正式通知，有一点是非常可信的，即弗兰茨—约瑟夫决定把这一事件做借口而实行干涉，帮助那不勒斯国王。事实上是否如此，不久的将来定见分晓。但是奥地利政策如此急剧地转变，原因何在呢？是不是不久前与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结盟冲昏了弗兰茨—约瑟夫的头脑呢？未必如此，因为，归根到底，特普利策的这次结盟只是对普鲁士来说是一大胜利，而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屈辱。是不是弗兰茨—约瑟夫想趁加里波第还没有把教皇和那

不勒斯国王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并把其中的意大利人并入自己的队伍的时候，把这些军队集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呢？这也不成其为理由。虽然奥地利一旦采取那种荒唐的侵略行动以后，会对任何帮助都来者不拒，但这些军队在任何战争中都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奥地利制定这些计划的唯一的原因，只能是由于它的内部政治状况。在这方面，要想找到解释是不难的。帝国议会虽然补充了一些来自各省的极端的保守分子和贵族分子，并且被赋予在和平时期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但它不久即将讨论人民代议机关以及帝国宪法和帝国内各省的宪法问题。匈牙利议员所提的议案已在委员会中得到了压倒的多数，这些议案也将在议会中不管政府如何而同样胜利地通过。一句话，第二次奥地利革命看来正在开始。帝国议会这一个按照法国名士会议造出的很差劲的仿制品，正在准确地模仿后者，宣布自己力不胜任，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奥地利政府面对着同路易十六一样的财政困难，又由于帝国内的各个民族的离心趋势而更加衰弱，已经无力抗拒。在强迫政府作出让步以后，一定还会要求它作出新的让步。三级会议很快就会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弗兰茨-约瑟夫感到他脚下的大地在动摇；为了避免危险的地震，他可能投入战争的深渊。

如果弗兰茨-约瑟夫真正实现他的威胁，为维护那不勒斯和教皇国的正统而开始十字军征讨，结果将会如何呢？在欧洲，无论大小国家，都是丝毫也不需要去支持波旁王朝的，如果弗兰茨-约瑟夫为了它而干涉进来，全部后果将落在他身上。路易-拿破仑一定会以维护不干涉原则的名义跨越阿尔卑斯山，而奥地利由于遭到整个欧洲舆论的坚决反对，财政紊乱不堪，面临着匈牙利的起义，军队虽骁勇善战但人数却少得多，终不免要遭到惨败。可能，

这对它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谈不到德意志会给它一臂之助。德国人将十分坚决拒绝为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而战。他们将只希望德意志联邦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能得到承认(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将乐意赞同这一愿望),而匈牙利如果起义,他们也将袖手旁观。而且,帝国的德意志各省看来也很可能会像 1848 年那样支持匈牙利人的要求,它们自己也将要求自己的宪法。不管政府怎样限制奥地利帝国出版界的自由,但出版界仍然表现出对加里波第同情的明显迹象,这种同情甚至在奥地利也很普遍。舆论的倾向从去年起就已改变,威尼斯现在被看做十分不合算的领地,而维也纳居民则赞许意大利人争取独立的斗争,因为它是在没有法国援助的情况下进行的。弗兰茨—约瑟夫将很难迫使甚至是自己的德意志臣民为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教皇和艾米利亚小公侯的利益去拚命。正在走上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道路的人民,未定会捍卫自己的统治者的王朝利益。维也纳人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十分可能,奥地利军队渡过波河,将成为维也纳和匈牙利领导运动的党派采取更坚决斗争的信号。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8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9 月 1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603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欧洲的收成

1860年8月21日于伦敦

夏天愈朝后过,收成的前景就愈暗淡,天气可能好转的希望就愈渺茫。今年夏天,不仅联合王国天气完全反常,而且整个北欧、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莱茵河各省都是这样。至于英国,下面就是对它的天气的真实描写:

“在寒冷的、迟到的春天之后,六月雨水又这样多,竟使许多地区无法播种芜菁,无法除去饲用甜菜中的杂草,也无法完成通常的季节性农活。后来,在十来天的好天之后,天气又变化无常了,连着两天不下雨就有点使人奇怪。除了水分过多外,今年夏天,或者说,已经过去的夏天的特点是缺少晴天,气温特别低,即使没有下雨,气温也多半是如此。”

每年降雨量平均约 20 英寸,而今年五月和六月的降雨量已达 11.17 英寸;由此可见,这两个月的雨量已超过全年的一半。上星期开始时似乎天气有好转的预兆,结果比任何时候都变化无常,而且风雨大作;本月 16 日和 18 日下暴雨时还有雷和一阵阵的西南暴风。因此马克街⁹³的小麦价格,昨天比上星期一^①的市场价格每夸特^②上涨约 2 先令。

① 8月13日。——编者注

② 1夸特等于12.7公斤。——编者注

干草的收割已经严重受阻，并且由于连续刮风、下雨和寒冷而延迟了。草已经倒下，一直在沤着，使人担心它的很大一部分养料会因受潮而丧失，因而大部分草将不适于作饲料，而只能作铺垫。这会引来很严重的损失，因为会使对春播谷类作物的消费大大增加。很多干草尚未收割，而很多已无可补救地损失了。

星期六的“园艺纪事”⁹⁴说：“几乎用不着怀疑，小麦的收成一般是受到严重的损害了。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通讯员那里接到的 140 篇报告中至少有 91 篇说，收成低于中等年景；从小麦的主要产区来看，也有相当多的报告说明情况不妙。例如，林肯郡的 6 篇报告中的 5 篇，诺福克和萨福克的 5 篇报告中的 3 篇，牛津、格罗斯特郡、威尔特郡、汉茨和肯特的全部报告，都是一些表明情况不好的消息。”

很大一部分小麦在麦粒成熟以前就从根上烂掉了，许多地区麦粒遭到病害和霉烂。在小麦遭到这种病害，而且在许多地区受害面积都很大的时候，那种从 1845 年开始、猖獗了 4 年之久、至 1850 年后才逐渐平息的马铃薯病，现在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英国的许多地区及大陆北部更严重地复发了。

下面是“自由人报”⁹⁵对爱尔兰收成的一般情况所作的总结：

“燕麦的收成一般认为差不多是垮了。除几个不大的地区外，燕麦尚未成熟，全是青的，就因天气极坏而倒下了。看来，小麦也要遭受到威胁着所有谷类作物的那种灾害。迄今为止，只有少许小麦收割了；小麦的收成，仅在几个星期前还引起人们最好的希望，而现在却使农场主感到十分担忧了。至于马铃薯的收成，一般认为，如果目前的天气再保持一个月，也必然要完蛋。”

据“威克斯弗德独立报”⁹⁶称，

“马铃薯病正在逐渐加剧，在某些地区，所有的马铃薯，不管它的大小、品种和栽种时间，已有整整三分之一受到传染。”

因此，看来十分肯定，普遍收获将比通常时期大大推迟，因而

现有的储存将不够用。部分干草毁坏,再加上马铃薯病,将使谷类作物的消费空前增长;同时各种谷物的收成,特别是小麦的收成,将大大低于中等年景。迄今为止,国外的输入量没有超过 1858 年和 1859 年的输入量,恰恰相反,还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尽管现在粮食的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高 26%,但仍然没有继续提高,原因是:据说美洲和俄国南部的收成好,同时人们对天气的好转抱有希望,另外,由于不久前皮革贸易衰落,人们对所有金融交易都极端谨慎。把现在的价格与 1815 年以来同期的价格相比,我得出结论:现在 1 夸特相当于 58 先令至 59 先令的小麦的平均价格,将来一定会提高到(至少在英国)65—70 先令。粮价如果这样上涨,如果正值国内出口贸易日益衰落之际,后果将尤其悲惨。不列颠的出口额到 1859 年 6 月 30 日为止的 6 个月内是 63003159 英镑,而至 1860 年同期则减少到 62019989 英镑,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①中所指出的,这种缩减主要是由于亚洲和澳大利亚市场上棉布和棉纱过剩、需求减少而引起的。出口是这样减少了,可是进口却比 1859 年同期大大增加。的确,我们看到,截至 1859 年 5 月 31 日为止的,5 个月内的输入总值是 44968863 英镑,而 1860 年是 57097638 英镑。

这种输入超过输出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加速黄金外流,从而使金融市场更加不稳定,这是所有歉收和大量购买外国粮食时期的特征。如果说英国不可避免的财政困难的影响不见得会远远超出经济的范围,那末,大陆上的情况就将完全不同了,在那里,既然财政危机同歉收和大增税捐同时发生,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出严

^① 见本卷第 83—85 页。——编者注

重的政治乱子。最严重的担忧已经使巴黎波动起来，城市当局现在正忙于收购整批整批的旧房屋，然后再拆除，从而使《ouvriers》（“工人”）有工作可做。巴黎上等小麦价格现在像伦敦一样高（假如还没有超过的话），即从 60 先令 6 辨士至 61 先令。路易·波拿巴企图用以转移舆论视线的最后花招——远征叙利亚，把西班牙提升为“大国”⁹⁷，同普鲁士谈判，企图阻止加里波第成功，——所有这一切都完全失败了，他马上就得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在他的政治“威信”明显地变得不值钱的时候，正好又碰上因天气恶劣、财政困难和国库空虚而产生的危险。如果说，上面这种说法需要什么证明，那末波拿巴给《Mon cher Persigny》（“亲爱的培尔西尼”）的信⁹⁸不就是这样的证明吗？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8 月 2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9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43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⁹⁹

英国像德国一样，正在武装起来准备反击波拿巴主义威胁着它的进攻。英国志愿兵猎兵的出现，其原因也同普鲁士把自己的基干营数增加一倍的原因一样。所以，对德国军人说来，获得有关英国志愿兵的现状和战斗力的一些详细情报，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支军队就它的起源和思想基础来说，是波拿巴主义的敌人，是德国的盟友。

少数几个营除外，这支志愿兵是从去年（1859）下半年开始建立的；大部分志愿兵穿上军服和受训还不到一年。目前它的人数名义上是 12 万人；但是如果我们从某些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就可以说，真正有战斗力而又受过训练的人不超过 8 万；其余的都没有什么兴趣，最好除名。

志愿兵的组织很简单。凡是有 60—100 名志愿兵（炮兵是 50—80 名）的地方，他们就组成一个连，这一点要经本郡总督同意。志愿兵选出军官候选人（上尉、中尉和少尉各一名），多半由总督任命给他们各自的连队；但是选出的候选人也有被否决的时候。几个连可以组成一个营，由总督任命少校和中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军官的志愿来任命，或者是根据上尉的军龄来任命。这样，

就组成了一支有 1 个到 8 个连或更多的连的部队，并根据这些连在各自的郡编成的顺序给予番号；但是只有由 8 个连组成的完整营才有一名中校。所有军官都可以从志愿兵当中任命，不必经任何考试。但是副官¹⁰⁰必须是常备军或民军的军官，并且只有他一人领取固定的薪水^①。志愿兵自备服装等物，而政府则根据他们的请求借给他们步枪和刺刀。制服的颜色和式样由各部队自行决定，但须经总督批准。一般说来，各部队还必须自己安排练兵场、教练场、弹药、教官和军乐队。

各种步兵部队或猎兵部队的制服多半是深绿色、深灰色、浅灰色或褐色的。式样介乎法国式与英国式之间；他们多半头戴法国式军帽或法国军官和英国军官的制帽。炮兵身穿深蓝色制服。他们照顾到外貌，采用了相当不方便和笨重的皮帽或骑炮兵的高筒军帽。还有少数骑猎兵，他们的服装式样是模仿英国骑兵服装，但是这个部队仅仅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当最初一开始鼓动组成这种猎兵部队时，整个想法很像我们自己的国民或市民自卫团¹⁰¹；从许多方面来看很像玩兵形游戏；造就军官的办法^②，以及某些军官在执行勤务时表现出来的姿态和无能，都是相当可笑的。完全可以想像，志愿兵所选出的并不总是最有能力的人，甚至不是最同情志愿兵运动的那些人。在头 6 个

① 除政府发给的薪水 180 英镑外，大多数营自己还增加相当一笔钱；我知道正规军的中尉副官拿 300 英镑或 2000 以上塔勒薪水。——恩格斯在“军事总汇报”上加的注

② “造就军官的办法”一语在“军事总汇报”改作：“选举军官时的朋党关系 (Klüngel)”，接着是编辑部加的注：“《Klüngel》一词对于我们的许多读者来说不是十分明白的，尽管我们驻曼彻斯特的记者没有忘记它。这个词起源于古科伦，指最大的贵族同城市部队的联系。”——编者注

月期间，从参观者所得的印象来说，差不多所有的营和连都同我们自己的已不存在的 1848 年的市民自卫团一样。

这就是交给军士教官设法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野战部队的兵员。操枪动作训练和排教练每周两次或三次，多半是每晚 7—9 点钟点着煤气灯在室内进行。如果可能，每逢星期六下午整个部队就做短途行军，并且进行全连的运动。法律和习惯都禁止在星期天进行训练。教官是基干部队或民军部队的中士和下士，或领优抚金的兵士；他们还必须把军官训练得像个样子。但是英国的军士是一种出色人材。在执行勤务时，英国军队里的骂人话和粗野话比在任何别的军队里都少；可是使用惩罚的时候却多得多。军士是模仿军官的，所以就其作风来说大大超过我们德国的军士。其次，他服役不是为了将来在文职方面获得某种小的职务，像在我们德国的情况那样；他是自愿服役 12 年的，他在职务上一直提升到班长，每个阶段都对他有相当大的新的好处；在每个营里，副官和财务官这两个军官职务多半由老军士担任；而在执行作战部队的勤务时，每个军士可以往自己的衣领上戴上一颗小金星，在对敌行动中区别自己。属于这一类人的教官，总的说来，为志愿兵做了他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不但把他们训练得能够稳稳当地完成连的运动，而且使军官们也成了个样子。

同时，各独立连，至少是各大城市里的，已经编成营，并且从正规部队得到副官。英国的尉官像奥地利的尉官一样，比北德意志尉官的理论训练少得多；但是也像奥地利人一样，如果他爱自己的职业，他对自己的职务就十分熟悉。在从基干部队转到志愿兵部队的副官中间，有些人充当教官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自己的营里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的。但是，直到现在，只

有一小部分志愿兵编成固定的营，当然，这些部队跟还没有编成营的大多数连比起来要好得多。

8月11日，郎卡郡和柴郡的志愿兵，在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半路上的牛顿组织了一次检阅，负责指挥的是区司令乔治·韦瑟罗耳爵士将军。在这里集合的志愿兵是曼彻斯特附近各工业区的志愿兵；利物浦或柴郡各邻近农业区的居民在出场的志愿兵当中不很多。如果根据我们德国的招兵经验来判断，这些部队在体格方面应该是低于中等水平。但是不应该忘记，来自工人阶级的志愿兵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牛顿赛马场的土质本来就又湿又软，由于老是下雨，软得就更厉害，并且很不平，很泥泞。赛马场的一边是一条小河，两岸有些地方灌木丛生。这个地方正好适合于年轻的志愿兵进行阅兵；他们大多数人足踝站在水里泥里，而军官的马在粘泥里一陷就陷到马的脚踝以上。

同意参加检阅的57个部队分成4个旅；第一旅有4个营，其余的各3个营，每营8个连。各旅由基干部队的中校指挥；营长由志愿兵军官充任。第一旅展开3个营，第四营成纵队列于中央后边。其余的3个旅列于第二线，9个营从右到左排成密集间隔的连纵队，连与连成四分之一距离。

向将军敬礼后，应该向左边调换正面，由第一线后面列成纵队的一个营掩护。为完成这点，在它的正面展开的那个营的两个中心连向两翼转弯，然后，纵队通过由此而形成的通路，并且沿小河展开，同时4个连组成散兵线，另外4个连组成支援队。场地和灌木丛太湿了，不可能指望志愿兵正确利用地形；此外，大多数志愿兵营正在训练基本的散开队形和警戒勤务，因此，在这里用太高的

标准对待它们是不公正的。这时,展开横队以中心为轴变换了正面;中间营的两个中心连各转 90 度:一个连向前,另一个连向后,然后,其余各连按照新排列看齐。第一线的两个翼侧营排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①,走入这个排列,然后重新展开。可以想见,这个又复杂又相当笨的运动占用了多少时间。同时,纵队横队的一个右翼营一直前进到第一线的新组成的右翼后边为止;其余各营向右转,成复列(在右侧成 4 行)跟随前进,而且每个营刚一到达最初被这个右翼营所占领的地方,它就转向正面,并且跟着右翼营移动。当最后一个纵队以同样方法走到新排列时,每个纵队各自向左转,这样就恢复了纵队横队的正面。

然后第三旅从这个横队的中央开始向前移动;走到离第一线或展开横队约 200 步之处,3 个营疏开成展开队形所必需的距离并且依次展开。由于这时散兵线大大向前推进了,两个展开横队也就向前推进数百步,然后第二线替换了第一线。这一点是这样做的:第一线在右侧把队形变成 4 行,每个连的头部分离出去并向右转弯,第二线的队伍让开路,这就给第一线的通过腾出了地方,然后各连组成正面并且以施转列成横队。这一种练兵场上的队形变换,在可以做得到的地方是完全不需要的,而在需要的地方又是做不到的。然后,全部 4 个旅重新列成一个大纵队,于是部队就以连为单位(正面是 25—35 行)在将军面前走过分列式。

我们将不评论这一套队形变换^②,无疑我们的读者会感到它

① 在“军事总汇报”上接着是一句带括弧的话:“正是英国人所熟悉的密集纵队”。

——编者注

② “这一套队形变换”一语在“军事总汇报”上改作“这一种最基本的战术”。——编者注

是相当陈旧的。显然,不管它对具有 12 年服役期限的常备军如何珍贵,但是对于一个星期只能用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来搞军事训练的志愿兵来说,的确是最不适合的。在这种场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志愿兵怎样做完了这些队形变换;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说,虽然某些地方有过一些拖拉,但整个说来,这些变换是做得稳妥的,没有发生慌乱。最差的是纵队旋转和展开,而且后者做得还很慢;从这两种变换中可以看出,军官训练得还不够,还没有熟悉自己的职务。但是另一方面,横队前进——这是英国战术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的运动——做得出乎意料的好;的确,英国人似乎有做这种运动的特殊才能,并且学得特别快。分列式一般进行得也很好,但是最有趣的是,它是冒着倾盆大雨进行的。犯了几个连反英国军事成规的错误,此外,由于军官的过失,距离保持得不好。

除了某些过分狂热的志愿兵指挥官在伦敦组织的一次相当乱的作战演习以外,大队志愿兵进行一个比最后分列式要多一些东西的演习,这还是第一次。如果我们注意到,到牛顿来的很多只有一两个连或者最多三个连的部队还没有编成固定的营,没有正规军的军官,只受过军士教官的训练,而且只是偶尔集合为一个营,那末就应该承认,志愿兵做了能够做的一切,而且他们已经不再同我们的市民自卫团处于同一水平了。不言而喻,那些已经编成固定的营并且由基干部队的副官(因为副官暂时是实际的营长)指导的部队,在检阅时队形变换是做得最稳的。

兵士总的看来都很好。当然,有些连是由法国人那样的瘦小身材的人组成的,然而其余的全超过了目前英国基干部队兵士的中等身材。但是,大多数兵士的身材很不一样,胸围也不同。城市居民固有的那种苍白脸色,使大多数兵士带有一种相当难看的

像军人的样子,但是过一个星期的兵营生活就会很快变好的。有些兵士的服装有点装饰过分,但总的说来给人的印象很好。

第一年训练使志愿兵在掌握基本运动方面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转入散开队形训练和射击教练了。在这两方面,他们将远比英国的基干部队来得灵巧,所以到 1861 年夏天,志愿兵是可能组成一支十分有用的军队的,如果他们的军官更好地熟悉本身业务的话。

整个部队的弱点有如下述。军官是不能以训练兵士的同样期限和同样方式来造就的。迄今为止所证明的是,如果需要把每个人都训练成兵士,是可以依靠群众的善良愿望和热情的。但是对军官来说,这是不够的。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甚至在进行营的简单运动、纵队旋转、展开和保持距离(在英国队形变换中,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里常用纵深纵队疏开)时,军官的训练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执行警戒勤务和处于散开队形的情况下,地形判断就是一切,而且还必须考虑许多别的复杂情况,那时他们会怎样呢?怎么能委托这样的军官来保证军队的行军安全呢?政府已责成志愿兵的每个军官都去海特学习,至少 3 个星期。暂时这是好的,但是这既教不会他们领导侦察群的活动,也教不会他们指挥尖兵。要知道,志愿兵应该主要用来执行轻步兵的勤务——需要用最能干最可靠的军官去执行的那种勤务。

如果希望志愿兵运动能有某种成果,这就是政府应该过问的事。应该强迫现在还是一个连或者两三个连组成的所有的独立连队联合起来,组成固定的营,从正规军中给它们配备副官。必须责成这些副官向自己营的全体军官教授有关基本战术、各种轻步兵勤务和营的内务条令的正规的训练课程。除了在海特受训以外,

应当责成这些军官到基干团或民军部队中在兵营里至少服役 3 个星期,最后,经过一个时期,要让他们都通过考试,证明自己是不是至少掌握了最必要的业务。这就是军官的训练和考试的课程。然后,应当对兵士进行身体检查,以便淘汰掉身体不适于在作战军队服役的人(这样的人不少),并且每年核查连队名册,以便把不上操、只作兵形游戏、不学习业务的兵士除名;如果这一点做到了,那末现在纸上存在的 12 万人这个数字就会大大缩小,但是,这样一支军队,将能顶得过三支现在纸上有数的 12 万人的军队。

然而,据报道,军事当局却忙于讨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一有可能就让全体志愿兵猎兵穿上如此向往的基干部队的砖色军服。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8 月 24 日左右

载于 1860 年 9 月 8 日“军事总汇报”第 36 号,1860 年 9 月 14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2 期及“志愿兵读物”1861 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根据“军事总汇报”和“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校对过

卡·马克思
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
和备战。——东方问题

1860年8月25日于伦敦

由于本周天气未见好转，所以昨天马克街的市产面粉价格每袋上涨6先令，并且立即向外国各港口发去订货单，订购粮食100万夸特左右。差不多所有的进口商都同意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①里阐述的看法，即认为粮食市场上的价格必将继续上涨。法国不久前在粮食贸易方面采取的措施，使它成了不列颠粮食批发商的直接竞争者。大家知道，法国是实行调节制来调整谷物进出口税的，而且这个调节制在全国按照粮食贸易划分的8个不同地区里都有所不同。8月23日在“通报”上公布的一条法令，暂时全部废除了这个调节制。法令规定，从陆路或者由法国船或外国船从水路进口的谷物和面粉，不管从哪里运来，一直到1861年9月30日一律只征收1832年4月15日的法律所规定的最低限额的关税；它还规定，装载谷物和面粉的船只，免纳船舶税；最后，在上述日期即1861年9月30日以前从任何一个外国港口出发的装有这种货物的船只，只缴纳上述最低限额的关税，并且免纳船舶税。这里所

^① 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

说的最低限额,是每百升(约 $2\frac{3}{4}$ 蒲式耳)25分。这样一来,在1858年和1859年向英国运进小麦和面粉比任何一国都多的法国(小麦2014923夸特,面粉4326435英担^①),如今在从外国市场上采购粮食方面,将同英国作剧烈竞争;而法国的调节制的暂时废除,也给这种竞争造成有利条件。

英国和法国现在都不得不只限于两个主要的出口市场,即美国和南俄。关于俄国的收成,有关的消息是非常矛盾的。有些人说收成很好;有些人则说,大雨和水灾损害了帝国全境的收成,南部各省的粮田受到蝗虫的很大毁坏,——这是第一次在贝萨拉比亚出现蝗灾,当局为了把它的破坏作用限制在一定地区,用2万人的大军包围了这个地方,结果徒劳无功。蝗灾的实际受害面积当然还不能具体确定,但是不管怎样,它总是要加快粮价上涨的过程的。伦敦某些报纸推测,与谷物突然大量进口有直接关系的黄金外流对金融市场通常发生的影响,可以用来自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入来平衡。这种推测是最荒谬不过的。我们都亲眼看到过,在1857年危机时期,黄金储备减少到比开发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以前的任何危机时期更小的数量。早些时候,我曾经根据确凿的事实和数字证明,1851年以后英国异常大量的黄金输入,远没有抵销其异常大量的黄金输出。此外,还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1867年以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不但没有超过平均数额,而且还不断减少。在1858年8月,黄金储备达到17654506英镑,但1859年8月就减少到16877255英镑,而1860年8月则减少到15680840英镑。如果说,黄金外流还没有开始,那末,这种现象可以用下述

① 1英担约等于50公斤。——编者注

情况来解释，即歉收前景只是现在才开始发生影响，而伦敦的利率迄今为止还高于欧洲大陆的其他主要交易所即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汉堡和巴黎等处的利率。

大陆欧洲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场面。大家知道，法国正遭到严重的财政困难，但是它仍然以极其巨大的规模和不知疲惫的精力武装着自己，就像得了一盏阿拉丁的神灯似的。奥地利处于破产的边缘，然而却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资金，以使巨大的军队得以维持，使自己的四角形堡垒^①得到线膛炮的供应。而在俄国，虽然政府的一切财政措施都告失败，虽然人们都认为国家可能破产，军队也由于不发饷而怨声不绝，连皇帝近卫军的忠诚都由于最近5个月不发饷给近卫兵而大成问题，——虽然如此，俄国仍然派出了大量部队去黑海，并且在尼古拉也夫准备好200艘军舰运送部队去土耳其。看来，俄国政府由于它不能解决农奴制问题、财政问题，再加上波兰问题的再度紧张，正促使它去进行战争，作为安抚国民的最后一着。所以，根据政府的命令，对于帝国全境的各个地方和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响起的怨言，一律都用狂叫为土耳其境内不幸受难的基督徒复仇的声音压制着。在俄国报刊上，每天都充满着必须对土耳其进行干涉的实例和证据。下面从“残废者”摘录下来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¹⁰²：

“这个问题还将长久地为全欧洲的报纸所谈论。不能不谈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引起全欧洲注意的只有这个问题。只有对全人类漠不关心的读者才会感到厌烦。至于我们，不但有责任每天把这个问题的详情介绍给读者，而且也有责任既说明过去的事件，也说明未来的意外事件，以便让公众看到正在采取以及应该采取哪些办法来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这种状况已经成

^① 指曼都亚、培斯克拉、维罗那、列尼亚哥四个地方。——译者注

为我们时代和文明的耻辱了。

但是，在看到土耳其人的野蛮行为和野兽般的狂热性的时候，我们至少应当根据历史的公道来补充一点：欧洲本身对此有罪，它应该把这些屠杀事件的原因和后果写到自己账上去。现在我们要坦率地来谈谈。欧洲在1853—1854年对俄国进行了非正义的战争是为了什么呢？它公开宣布了一个双重目的：既想遏止俄国的本不存在的贪心和优势，又想制止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任何压迫。所以，欧洲是认识到这些压迫和苦难的，但是，它却企图用共同调停制止这些现象之后，仍然完全保持土耳其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说什么这对于保持欧洲的均势是必需的。战争结束以后，外交家们就着手研究达到这两个目的和管理土耳其的办法。首先他们约定吸收土耳其到欧洲国家的大家庭里，使它不致受到任何单独的调停。这一点很容易做到，所以两个目的有一个已经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的呢？它达到了吗？为了拯救基督徒免于难以忍受的奴役和压迫，采取保证措施了吗？抱歉得很！欧洲在这方面相信了空话和纸上文章，没有任何保障。早在1854年8月8日的第一批照会中，当开始考虑停战，并且拟定了著名的四点保证的时候，就决定要求土耳其政府维护所有基督徒的宗教权利。在1854年12月28日给圣彼得堡当局的记事录中也这样谈过。最后，1856年2月1日在维也纳写成并且附在巴黎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上的初步草案第四条说：‘莱雅的权利将得到维护，同时不侵犯苏丹的独立和尊严。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和土耳其政府彼此同意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利，并在缔结和约时也邀请俄国参加这个协定。’

巴黎会议从它的第二次会议起就长久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一点从2月28日和3月24、25日的记录上看得很清楚。他们打算把两个不可能协调的东西，即苏丹的最高权利和他的臣民的权利，协调起来，把这两者同样都置于全欧洲的共同保护和共同调停之下。会议忘记了，它想要加以维护的莱雅的权利，在以前同土耳其政府缔结的条约中就已批准了，这些条约是迫使它接受的，并且已经侵犯了他们现在同样要予以维护的苏丹最高权力所拥有的权利。为了把这不调和的两点调和起来，他们制造了那个著名的苏丹诏书，说什么它是苏丹出于自己的意志写成公布的。在这个文件中，答应维护和改善基督教臣民的一切权利，而为了保证这个诺言的履行，还在和约中提到这个苏丹诏书。为了使这一点得到履行，会议在条约的第九条中放弃了对土耳

其内政的任何干预。

会议究竟做到了什么呢？它是否保证了苏丹诏书中的诺言的履行呢？这些诺言是否对苏丹有约束力呢？根本没有。在条约上是提到苏丹诏书了，也盛赞这些诺言的英明，但是却没有预见到这个文件将是一纸具文（这是全欧洲早就知道并谈论的）。而现在，在已经四年多都没有实现它之后，在叙利亚发生了最可怕的屠杀的时候，欧洲根据条约有没有调停权呢？没有！欧洲应该意识到：一方面，它是过于宽大了，过于轻信了，另一方面，它也太不公正。不久前俄国还提起各国内阁注意：穆斯林的宗教狂热丝毫没有减弱，没有减退，正准备来一个新的爆发，而且以前的压迫和暴行仍在继续着；但是欧洲却满足于土耳其政府答应进行审讯和惩治罪犯的诺言。得让暴徒们杀死了几千名无辜的受害者，才能说服欧洲。只是现在，才着手进行调停，即使这样，也出现种种困难，种种保留，并且迟缓不堪，好像是为了提供逍遥法外的机会似的。大家都注意从字面上尊重 1856 年 3 月 30 日的条约，正如在 1859 年意大利事件中一样，忘掉了人民的状况而只思索维也纳条约的文字。人道、信仰和文明，这就是欧洲同土耳其的一般性条约。如果土耳其违反了它，自己就招致调停及其后果。

在 1856 年以前，欧洲列强同土耳其政府曾签订过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它们随时都可以要土耳其政府注意基督徒的遭遇。请问，现在这个权利是否被 1856 年 3 月 30 日的条约取消了？欧洲是否放弃了保护自己教友的权利？如果欧洲认为 2 月 18 日的苏丹诏书能够实现，如果相信了应允的改革能够付诸实施，那末，它就是放弃了这种权利；如果欧洲认为，风俗、习惯、嗜好和可兰经的成规能够自己改变，那末，它就是放弃了这种权利。但这样想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根据。欧洲由于醉心于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土耳其为保持均势所必需，所以才想起把土耳其吸收到欧洲国家的大家庭里来，但是，它这样做当然有如下的意图，即土耳其应成为一个完全欧洲式的国家，抛掉那古老的伊斯兰教的思想；利剑不再是可兰经与受可兰经统治的民族之间的唯一的法律；战败者不再是奴隶即一件属于胜利者的物品；他的生命、财产和家庭不再由主人支配。这就是 1856 年欧洲的主要意图。虽说欧洲对俄国抱有由于非正义的流血战争而引起的敌视态度，但它却没有解除土耳其政府先前的一切义务，相反的，它要求更多地、更诚意地、更有保证地改善基督徒的处境。欧洲实行共同保护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只是以此为代

价,它才保障土耳其的完整和不受侵犯。不然的话,无论战争或者和平都是没有理由的;不然的话,把土耳其吸收到基督教大家庭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保证它将来的政治安全又是为了什么呢?两个条件彼此是这样密切地、不可分地联系着,以致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这一个就不可能有那一个。

的确,条件的形式是有一些缺点的。从字面上看,欧洲根据巴黎条约的第九条表面上放弃了对土耳其政府内政的干预,但是这一条本身却提到,这是根据2月18日的苏丹诏书制定的,而苏丹诏书承认基督徒在权利上和穆斯林平等。健全的逻辑说明,如果这一点没有履行,那末第九条也就没有意义了。

现在土耳其这样狂热地反对在叙利亚进行调停是不应该的。基督徒的状况没有改变,甚至恶化,所以调停是必然的。英国反对这种调停也是不应该的。英国反对调停可能有它政治上和贸易上的动机,这种动机的重要性和正义性我们不来讨论,但是它也不应该引用巴黎条约第九条。第九条遭到破坏不是由于进行调停,而是由于苏丹诏书没有履行。欧洲如果决定进行必然的调停,它现在也不应该又采取这样的有缺点的外交形式,这种形式的缺点是它从巴黎条约可以看到的。而现在有人又在说,调停要根据土耳其政府的愿望进行……要求调停的结果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即使它暂时被撤销,将来也要成为必然。依利翁城没有相信珈桑德拉的预言,结果就灭亡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8月25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0年9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46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的进军

随着事变的发展,我们已开始了解加里波第制订的解放意大利南部的计划。我们对这个计划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是赞叹它的宏伟。只有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够设想出这样的计划或是企图实现它,因为在这里民族派组织得这样出色,而且完全处于一个为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事业而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人的控制之下。

这个计划不只限于解放那不勒斯王国;它同时还规定要开始进攻教皇国,这样,不仅给炮弹国王^①的军队派下工作,而且给拉摩里西尔的军队和驻在罗马的法军¹⁰³都派下工作。计划预定,已经由热那亚陆续渡海到阿佩耳辛湾(阿朗契湾)——撒丁岛的东北海岸——的6000名志愿军,将在8月15日左右调往教皇国的沿海地区;这时,那不勒斯王国的大陆各省就开始起义,而加里波第则将渡过墨西拿海峡在卡拉布里亚登陆。我们所听到的加里波第关于那不勒斯军队胆小畏战的某些评论,以及最近一艘轮船所带来的关于加里波第已经进入那不勒斯并受到居民热烈欢迎的消息,都谈到,在这个由于国王逃跑而成为多余的城市的街道上举行

^① 这里是指弗兰契斯科二世。——译者注

起义,可能也是计划规定的。

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在教皇国登陆一举没有实行,这一方面是由于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坚持,另一方面而且主要是因为加里波第本人认为志愿军没有作好独立作战的准备。因此他把志愿军调到了西西里,其中一部分留在巴勒摩,其余的则搭乘两艘轮船环岛而行,开赴塔奥尔米纳,他们不久就到达该地。同时,正如预先所决定的那样,在那不勒斯王国各省的城市中开始了暴动,这些暴动表明,革命派组织得多么好,全国各地起义的条件是多么成熟。8月17日在阿普利亚省的弗贾爆发了起义。城市警备部队中的龙骑兵投向人民一边。担任该地区司令官的弗洛雷斯将军派出了第十三团的两个连,但这两个连到达当地后就仿效了龙骑兵的榜样。于是弗洛雷斯将军率领着他的司令部人员亲临弗贾,但他也毫无办法而被迫离去。他的行动方式清楚地表明,他本人也不打算认真抵抗革命派。如果他打算认真抵抗,他就不会只派出两个连,而会派出两个营;当他亲临弗贾时,就不会只带几个副官和传令兵,而会带一支尽可能强大的部队。事实上,单是起义者让他再离开该城这一事实,就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和起义者之间至少有某种默契。

另一次起义在巴齐利卡塔省爆发。这里,起义者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科尔勒托—佩蒂卡拉——拉尼河畔的一个小村子里(大概就是电讯中称作科尔勒托的那个地方)。他们从这个遥远的山区向该省的主要城市波坦察前进,8月17日有6000人到达该城。只有大约400名宪兵进行了抵抗。这些宪兵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即被击溃,以后便相继投降了。以加里波第的名义成立了省政府并且指定了临时的独裁者。据报道,这一职位是由国王的一个行政长官(省长)充任的,这又一次表明,即使是波旁王朝自己的官员也

认为王朝的事业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从萨累诺派出了第六基干团的4个连去镇压这次起义,然而兵士们到达距波坦察约23英里的奥列塔之后,便拒绝继续前进,并且高呼:《Viva Garibaldi!》(“加里波第万岁!”)。这是我们了解到某些详情的仅有的两次暴动。此外还有消息说,其他城市,如距那不勒斯不到30英里的阿韦利诺、莫利泽省(在亚得利亚海沿岸)的康波巴索和阿普利亚省的切兰察(可能就是电讯中称作切兰塔的那个城市,它差不多是在康波巴索和弗贾两地的正中间),也都举行了起义。现在,连那不勒斯城也属于起义城市之列了。

当那不勒斯王国各省的城市这样执行他们在共同事业中所担负的任务的时候,加里波第并没有坐着不动。他视察撒丁岛归来以后,立即完成了登上大陆的准备。他的军队现在包括由图尔、科散兹和梅迪契指挥的3个师。集中在墨西拿和法罗附近的科散兹师和梅迪契师已开往西西里北部海岸米拉措和法罗之间的地方,以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们将在那里上船,并在卡拉布里亚海岸墨西拿湾以北距帕耳米或尼科特拉不远的某一地方登陆。至于图尔师,则其中一个旅(阿贝尔旅)在墨西拿附近扎营,另一个旅(比克西奥旅)则深入该岛的布朗特去平定某些骚乱。这两个旅都奉命立即向塔奥尔米纳出动,8月18日傍晚,比克西奥旅在该地与来自撒丁岛的志愿兵一起,登上了“托利诺号”和“富兰克林号”两艘轮船和几艘拖带的运输船。

在这以前10天内,米索里少校率领一支300人的部队渡过墨西拿海峡,顺利地通过那不勒斯军队的驻区,进入多山的、地形起伏的阿斯普罗蒙特地区。陆续渡过海峡而来的其他小部队以及卡拉布里亚的起义者都在这里同米索里会合,因此到8月18日,他

已掌握有一支为数约 2000 人的部队。当这支小队刚刚登陆时，那不勒斯军队曾派出约 1800 名兵士追击他们，但是这 1800 名英雄却采取了使自己永远碰不到加里波第军队的行动。

8 月 19 日拂晓，加里波第的远征部队（他本人也随船前来）在卡拉布里亚的最南端，即梅利托和斯帕提万托角之间登陆。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不勒斯军队被那些有在海峡北面登陆之势的调动所迷惑，以致完全忽视了海峡以南的地区。这样一来，除米索里聚集的 2000 人以外，又有 9000 人登上了大陆。

在这些部队与米索里的部队会合以后，加里波第立即向雷焦前进，那里驻有 4 个基干连和 4 个猎兵连。但是，这支警备部队大概得到了一些援兵，因为据报道，8 月 21 日在雷焦或雷焦附近曾发生极为激烈的战斗。加里波第以强攻夺取了几个前沿堡垒以后，雷焦堡垒的炮兵停止了射击，维亚勒将军也投降了。德弗洛特上校（1851 年法国立法议会的巴黎市共和派议员）在这次战斗中阵亡。

停泊在海峡的那不勒斯舰队等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加里波第登陆后，海军司令官即向雷焦拍出电报，说他的军舰不能进行任何抵抗，因为加里波第掌握有 8 艘大军舰和 7 只运输船！当科散兹将军的师大约于 20 或 21 日在海峡最窄的地方，希拉和圣卓万尼镇之间，即在那不勒斯的舰船和军队集中最多的地方渡海时，这支舰队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科散兹的登陆异常顺利。梅兰德兹和布里冈蒂两个旅（那不勒斯人把旅叫做营）和佩佐堡垒（不是某些电讯中所指的皮佐；皮佐是北面很远的一个小地方，在蒙特列奥涅以北）看来一枪未放就向他投降了。据报道，这是 21 日的事；在同一天，经过短时间的小战斗后，圣卓万尼镇即被占领。

这样，加里波第在三天内就攻占了海峡沿岸的全部地区，包括

一些筑垒要点在内；仍然在那不勒斯军队手中的几个堡垒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了。

在这以后的两天中，看来是调遣其余的部队和装备，至少，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继续作战的消息，这样一直到 24 日，据报道，那一天在电讯称作**皮亚勒**的地方（在地图上没有标出这个地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个地名可能是某一条山溪的名字，它所形成的狭谷成了那不勒斯军队的防御阵地。据报道，这次战斗没有决定性的结果。过了一些时间，加里波第军队提出停战的建议，那不勒斯军队的司令官将这一建议转呈蒙特列奥涅的总司令。但是在得到答复以前，看来那不勒斯的兵士已得出结论：他们为国王效劳已经足够了，于是便离开自己的炮台而走散了。

博斯科指挥的那不勒斯部队的主力，在整个这一时期看来是留在距海峡约 30 英里的蒙特列奥涅未曾行动。大概，这个部队没有同攻入的部队作战的特殊愿望，因而博斯科将军便前往那不勒斯，以便从那里弄来 6 个猎兵营，它们是除近卫军和外籍部队以外最可靠的部队。现在还不知道，这 6 个营是否也已军心涣散和受到了在那不勒斯军队中到处蔓延的颓丧情绪的影响。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不论这些部队或其他某些部队，至今都未能阻挡住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的百战百胜而且可能是毫无阻碍的进军。加里波第到那不勒斯就会发现，王室已经逃跑；这个城市会向他敞开大门，给他举行一个隆重的入城式。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9 月 1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9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56 号

弗·恩格斯 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

现在我们有的是关于加里波第占领南卡拉布里亚和该地的那不勒斯守军已经完全瓦解的详细材料。加里波第在他辉煌事业的这一阶段，表现出他不仅是勇敢的领袖和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足智多谋的统帅。以主力对连绵的海岸堡垒线进攻，这一行动不仅需要军事天才，而且需要有军事知识。因此，可以满意地指出，虽然我们的英雄一生中并没有经过一次军事考试，而且恐怕从来也没有在正规军队中服务过，但在这个战场上却同在其他任何战场上一样行动自如。

意大利长靴的尖端是绵亘的阿斯普罗蒙特山脉形成的，山脉的终点是高约 4300 英尺的蒙塔尔托峰。山洪从峰顶沿着许多深深狭谷流向海边，这些狭谷好像是以蒙塔尔托峰为圆心的一个半圆形的许多半径，分头延伸下来，而半圆周就是海岸线。狭谷和山洪的水道（在当前的季节里是干涸的）合在一起，叫做 *fiumare*（时令河），形成了许多对退却的军队有利的阵地。虽然这些阵地可以从蒙塔尔托峰迂回过去，特别是在阿斯普罗蒙特的每一条支脉的山脊和主脉上都有驮载道和徒步道，但是由于这一山区完全没有水，因此大部队在夏季进行这样的机动是相当困难的。山的支脉往下伸向海岸，再下伸向大海，都是乱石陡岩。警卫雷焦和希拉之

间的海峡的堡垒有一部分就构筑在海岸上,但往往都构筑在岸边低低的而且向前突出的山岩上。因此,从附近较高的、处于瞰制地位的山岩上可以观察到全部堡垒。虽然火炮不能运到这些制高点上去,而且大部分制高点是老式的“褐色的拜斯”¹⁰⁴的火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以致当初在修筑堡垒时,对这些制高点丝毫未加注意,可是在现代步枪出现了以后,它们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制高点大部分都在步枪火力范围以内,因此它们现在真正瞰制着堡垒。在这种情况下,不拘泥于正规围攻的各种原则而对这些堡垒采取坚决的进攻是完全恰当的。显然,加里波第准备采取下述作法:派一个纵队顺着那条沿海岸并暴露在堡垒火力下的大路前进,装作要从正面进攻那不勒斯军队的样子,而率领另一纵队翻越山冈沿 *fiumare* 而上,根据地形特点或那不勒斯军队防御阵地的正面长度,攀登到必要的高处,以便包围那不勒斯军队和堡垒,并在任何战斗中都占据瞰制的地位。

按照这一计划,加里波第在8月21日派遣比克西奥率领部分兵力沿海岸向雷焦方向前进,他本人则率领一支小部队和已与他会合的米索里的部队翻越山岭。那不勒斯军队8个连,约1200人,在雷焦近旁的 *fiumare* 占领阵地。应当首先开始攻击的比克西奥向极左翼派出了一个纵队,沿沙岸前进,他本人则沿大路前进。那不勒斯军队很快就撤退了,但他们配置在山岗上的左翼却抵挡着加里波第先头部队的一小部分兵力,直到米索里的部队到达才将他们击退。于是他们退向城市中部的堡垒和海岸上的一个小炮台。这个炮台遭到比克西奥的3个连猛烈攻击,被他们从炮眼突入而攻占了。比克西奥缴获了这个炮台内的那不勒斯军队的两门重炮和炮弹,便开始轰击主要的堡垒。但是,如果不是加里波第的

熟练的射手们占领了制高点，从那里发现并射击炮台里的炮手，那末只靠这两门炮也不能迫使堡垒投降。射手们的行动发生了效力：炮手离开了炮座，逃入穹窿；堡垒投降了，一部分兵士归附了加里波第，但大部分解散回家了。正当雷焦发生这些事件，那不勒斯的蒸汽舰的注意力被这次会战以及搁浅的“托利诺号”蒸汽舰被毁和梅迪契的部队在墨西拿佯作上船等情况吸引住的时候，科散兹就乘机用 60 只小船将 1500 人由法罗角运到希拉和巴尼亚腊之间的西北海岸上登陆了。

8 月 23 日，在雷焦过去不远的萨利切附近发生了小战斗。50 个加里波第的战士，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德弗洛特上校的指挥下击溃了人数比他们多三倍的那不勒斯部队。德弗洛特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同一天，在南卡拉布里亚指挥一个旅（属于维亚勒的部队）的布里冈蒂将军与加里波第举行会谈，商谈投向意大利人方面的条件。而这次会见的唯一结果，就是暴露了那不勒斯军队的士气已经完全涣散。从这时起，他们根本谈不到会有什么胜利，只是投降的问题了。布里冈蒂和梅兰德兹（南卡拉布里亚地区第二机动旅的旅长）占领的阵地，在圣卓万尼镇和希拉之间，离海岸不远，左翼一直配置到菲尤马腊—迪—穆罗附近的山岗；其军队总数可能近 3600 人。

加里波第与在这支敌军后方登陆的科散兹取得联系以后，便从四面包围了他们，然后静待他们投降，果然在 24 日傍晚达到了目的。他解除了敌军的武装，并根据兵士的自愿允许他们解散回家，于是大部分兵士都回家了。佩佐角堡垒也投降了，阿拉—菲尤马勒、卡瓦洛塔堡和希拉等地的守军都相继投降，因为他们处于制高点的步枪火力下，以及在所有其他堡垒投降和野战部队中临阵

脱逃现象的影响下,已经完全军心涣散。这样,不仅海峡两岸被完全控制,而且整个南卡拉布里亚都被攻占了。于是,派来守卫该地的军队不到5天就全部被俘和解散回家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粉碎了那不勒斯军队继续进行抵抗的一切能力。维亚勒属下的、守卫蒙特列奥涅的其余各营的军官决定在自己的阵地上防守一个小时保一保面子,然后便放下了武器。其他各省的起义迅速扩展起来,整团整团的军队拒绝同起义者作战,甚至在保卫那不勒斯城的部队中也有整个部队同时逃跑的现象。就这样,在这位意大利的英雄面前,终于打开了通往那不勒斯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9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60年9月24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058号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贸易

1860年9月8日于伦敦

“论坛报”是第一个引起读者注意英国对东印度出口锐减的报纸。出口锐减的情况在基本出口项目即棉织品和棉纱方面特别显著。郎卡郡和约克郡开始感到出口减少的后果的时候，正是在国内市场由于收获比去年延误了整整5星期而开始萎缩的时候，虽然收获的前景从8月30日(星期四)起有了好转，但无论如何将低于中等年景。因此，不列颠商会大为恐慌，并纷纷向中央政府抗议新的印度关税条例。按此条例，从大不列颠来的基本进口项目的关税由5%增加到10%，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一倍。原先对此审慎不语的英国报界，这样一来，也终于被迫打破缄默。伦敦的“经济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商业”和“印度商业萧条的原因”的文章。“经济学家”的关于印度的文章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除了因为这家杂志在这类问题上被认为是英国的主要权威之外，还因为它的文章同目前的财政部印度财务大臣威尔逊先生的大笔有关。文章的第一部分企图为最近的印度关税立法推卸它对印度市场缩小应负的任何责任，可是，事实对此作了最好的回答：印度总督不得不在加尔各答召开由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税务局和商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重新审查和修改不久前

实施的税率。正如我第一次向读者诸君介绍这个问题^①时所指的那样，这一税率决不是印度商业危机的原因，但它加速了危机的产生，因为它是正当印度的贸易已经发展到超过市场的自然容量时突然实施的。“经济学家”公开承认，印度市场上的英国商品过剩，英国市场上的印度商品过剩。

它写道：“在我们看来，谁也不会否认，由于在去年的一定时期内，对印贸易取得了巨大利润，结果使这个国家市场的进口商品突然大增，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国内的需要，并且还引起印度资本家大搞投机买卖，他们指望用海外的商品供应遥远的内地市场。例如，向英属印度出口的棉织品价值，1859年是12043000英镑，1858年是929900英镑，1857年是5714000英镑；纱的出口价值——1859年是2546000英镑，1858年是1969000英镑，1857年是1147000英镑。在一个长时期内，商品一到，便一售而空，同时，由于价格继续上涨，就有不少的高利贷投机分子，收购商品转运到内地去；所以，无疑的是，正如我们根据最可靠的消息能判断的那样，在西北部各市场上已积存了大量的商品储备，关于这一点，米尔扎普尔、阿拉哈巴德、勒克瑙、阿格拉、德里、阿姆里察和拉合尔等地的资料是一致的。”

接着，“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一定意义上促使印度市场的积压变成一种经常现象的某些情况。基本原因——英国不停的大量的供应——则一字不提。首先，由于到处干旱，在整个北印度，1859年的秋收无论是质量或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年景，因此，冬季和春季粮价高昂，后来由于饥谨的威胁，又涨得更高了；而且，与农产品缺乏和价格昂贵的同时，瘟疫也猖獗起来。

“在整个西北部，霍乱流行病如此严重地威胁着人口稠密的城市，以致日常生活许多情况下都停止了，居民像躲避入侵的敌人一样，四处逃生。”

^① 见本卷第83—85页。——编者注

但是坏的是——

“在发出最近一班邮件之前一个月或 6 个星期，上印度已处于可怕灾难的威胁之下。唯一能决定秋收的雨，通常是在 6 月中，最迟也在 6 月底，但今年，到 7 月中一滴雨也未下。从西北边境到下孟加拉，从开伯尔山口到贝拿勒斯，包括萨特里日河、朱木河和恒河的广大流域，被太阳晒成一片颗粒无收的硬土，只有个别地区，得到巨大灌溉系统的河流或蓄水池、朱木拿河和恒河的水渠的滋润，能生长一些农作物。到处人心惶惶，觉得像 1837 年和 1838 年那样的饥荒又要来了。粮价涨得更高了，牲畜大量死亡或被赶上山，不用来耕地，而人民则处于饿死的边缘。”

然而，据加尔各答收到和发表的电讯说，在 7 月 27 日发出最近一班邮件前一星期，对最坏情况的担忧已经消除，终于下了透雨，而且下得及时，即使不能保证好收成，也可防止饥荒。

“经济学家”杂志转述的详情足以表明，1860 年上半年比 1859 年上半年已经缩减约 200 万英镑的印度贸易，最近没有丝毫复苏的希望。澳大利亚市场，由于商品过剩，也出现了种种收缩的迹象。原来预料，会因英法商约而很快地达到巨大数额的对法贸易，却缩减了 100 多万英镑，这一点有下列资料证明：

截至 6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内

	1859 年 (英镑)	1860 年 (英镑)
从法国进口	9615065	8523983
向法国出口	2358912	2324665
共 计	11973977	10848648

英国从法国的输入锐减，应该归因于今年法国的食品价格高，而在 1859 年，谷物和面粉却是法国向英国出口的基本项目。人们这样认为，合众国不断增加购买英国的工业品作为目前向联合国大量出口食品的交流，这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虽然国家的出

口与进口总会有一个比例,而以 1859 年和 1860 年的上半年英美贸易的变动来判断,这种结论就显得有些轻率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1859 年 (英镑)	1860 年 (英镑)
不列颠向合众国出口	11625920	9366647
不列颠从合众国进口	17301790	25618472

可见,不列颠从合众国的进口额增加 800 多万英镑,而向合众国的出口额却下降了 200 多万英镑。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只表现在英土、英中和英德的贸易上。目前,土耳其由于俄法两国的干涉而动荡不定,中国由于英国人自己的干涉而动荡不定,而德国,许多地区因歉收遭灾,正处于深刻的内部政治震荡和严重的对外冲突的前夕。至于英中贸易,我还是要强调指出:英中贸易在某种程度上的增加,无疑是由战争的需要决定的;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是纯粹由于从印度市场上提出了大量商品,以试验的方式转向中国市场而造成的;最后,从中国进口仍比向中国出口有大得多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到:

截至 6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内

	1859 年 (英镑)	1860 年 (英镑)
从中国(包括香港)进口	5070691	5526054
向中国(不包括香港)出口	1001709	1622525
向香港出口	976703	1236262
共 计	7049103	8384841

同时,大多数贸易行业中的突然破产,正继滋长普遍不信任的情绪。本文末尾援引的、破产的各皮革贸易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

核实的负债和资产综合报道证明,资产在每英镑负债中平均只有5先令6辨士,这对破产公司的期票持有人来说,意味着亏损1471589英镑。

负 债

公 司:	(英镑)	
已破产的	9	1530991
正在清理中的或已同债权人签订了协定的	15	499806
详情未公布的	10	—
<u>共 计</u>	<u>34</u>	<u>2030797</u>

资 产

	金 额	每英镑	赤 字
	(英镑)		(英镑)
已破产的	9 342652	4先令6辨士	1188339
正在清理中的或已同债权人签订了协定的	15 216556	8先令8辨士	283250
详情未公布的	10 —	—	—
<u>共 计</u>	<u>34 559208</u>	<u>5先令6辨士</u>	<u>1471589</u>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9月8日
载于1860年9月29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606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法国轻步兵

如果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志愿兵不得不同敌人交锋的话，那末谁都知道，这个敌人将是法国步兵。而法国步兵的典型——beau idéal（模范）——就是轻步兵，特别是 chasseur（猎兵）。

法国猎兵不仅是本国军队的榜样；在轻步兵勤务方面，法军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各国军队的榜样；因此，法国猎兵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欧洲所有轻步兵的榜样。

法国猎兵既是可能的敌人，又是轻步兵迄今为止的最好榜样，他们的这两个特点，引起了英国志愿兵的巨大兴趣。所以我们志愿兵对他们了解得愈早愈好。

—

直到 1838 年为止，法军没有使用过步枪。旧式步枪使用那种需要塞入枪膛的、紧贴膛壁的弹丸，使装弹动作又困难又慢，因此它对于法军不是合适的武器。拿破仑有一次在德国步枪营中观看燧发枪时曾感叹地说：“这的确是能发到兵士手中的最倒霉的武器了。”旧式步枪确实不适于大量步兵使用。在德国和瑞士，有几个精兵营一直是装备着这种步枪的，但这些营的兵士是专门用作优

秀射手，来消灭军官和射击正在修建桥梁的工兵等；而且当局很注意用猎场守护人的子弟和其他在入伍前早就学会使用步枪的青年来编成这种部队。阿尔卑斯山区猎羚羊者以及产鹿的北德意志大森林的守护人，为这些营提供了最好的人材，他们也是英国基干部队的步枪手的榜样。

法国人以前通称为轻步兵的那些部队，其武器装备和训练同基干团完全相同；因此，在 1854 年，路易一拿破仑下令取消这 25 个团的轻步兵团称号，把它们编为基干部队，它们现在的番号是从第七十六团到第一百团。

每个步兵营中的确还有一个轻骑步兵连，由优秀的、最机智的和身材矮小的兵士组成；而身材较高的 *élite* (精兵) 则编入掷弹兵连。当需要进行散兵战时，他们即首先展开；但是在其他各方面，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同本营其余各连是一样的。

当法军在 1830 年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装备着在大多数东方民族中广泛使用的长火枪的敌人。法国滑膛枪在射程方面不如这种长火枪。行军中的法军纵队在平原遇到骑马的贝都英人的四面包围，而在山区则遇到卡拜尔散兵的四面包围；敌人的弹丸可以射到法军纵队，而敌人本身却处在法军的有效射程之外。在平原上散兵不能远离自己的纵队，因为害怕遭到行动迅速的阿拉伯骑兵的突然袭击和被他们消灭。

当英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他们也领教了这种长火枪。阿富汗射手虽然只有明火枪，却从可怜的老式“褐色的拜斯”根本达不到的距离上，给了在喀布尔兵营内的以及经山区退却的英军部队以惨重的杀伤。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同英属印度西北边境上的各部落还可能发生持久的战斗；然而在给派往这个边境的英国兵士

装备在射程上能够同东方明火枪相比的武器这方面，却仍然什么也没有做。

法国人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缺点刚一发现，马上就采取了克服缺点的步骤。路易—菲利浦的儿子奥尔良公爵 1836 年在德国作结婚旅行的时候，趁机研究了普鲁士近卫军的两个步枪营的组织。他立刻发现，这正是一个起点，从这点出发，他就能够建立一支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需要的那种军队。他马上亲自动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法国人对线膛枪的成见使他遇到许多障碍。幸而在他本国，德尔文和庞沙腊的发明帮助了他；他们设计了一种步枪，它几乎可以同滑膛枪一样迅速灵便地装弹，而在射程和精度方面则大大超过滑膛枪。在 1838 年，公爵被允许按照他的意图组成一个连；在同一年里，这个连扩大到一个整营；1840 年，该营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以检验它在实战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如此出色地通过了考验，以致在同一年里又另组成了 9 个猎兵营。最后，在 1853 年又组成了 10 个猎兵营，因此法军目前共有 20 个猎兵营。

贝都英人和卡拜尔人无疑是最好的轻骑兵和猎步兵，他们那种独特的军事素质很快就促使法国人试图招募土著居民到法军中服务，并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的办法去征服阿尔及利亚。这个思想就是建立朱阿夫兵部队的起因之一。朱阿夫兵部队早在 1830 年就主要由土著居民组成了，而且到 1839 年以前一直是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部队；当 1839 年阿布德—艾尔—喀德刚刚举起圣战的旗帜¹⁰⁵时，这些朱阿夫兵就大量地跑到他那边去了。结果除配属给每营的两个纯粹由法籍兵士组成的连以外，每个连只剩了基干人员和 12 名法籍兵士。缺额不得不由法国人来补充，从此以后朱阿夫兵便成了完全由法籍兵士组成的部队，长期驻留非洲担任

警备勤务。但是原先的那一批法籍朱阿夫兵骨干已经带有如此浓厚的土著色彩，以致使所有朱阿夫兵部队就其整个气质和习惯来说，从那时起始终仍是一支特别的阿尔及利亚部队，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完全不同于法军其他的部队。他们大部分是由代役者¹⁰⁶中招募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终身的职业兵。他们实质上是属于轻步兵的，因此早已装备了步枪。目前在非洲朱阿夫兵有 3 个团（9 个营），还有 1 个近卫朱阿夫团（2 个营）。

从 1841 年开始，重新尝试招募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组成地方部队。组成了 3 个营，但在 1852 年以前他们一直是薄弱和人员不齐的。1852 年开始对应募土著居民给予重赏，这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致在 1855 年得以组成 3 个团，即 9 个营。这就是我们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时期如此经常听到的那种土尔科兵或 *tirailleurs indigènes*（土著猎兵）。

这样，除了外籍军团（现在已经解散，但从一切迹象来看又在重新组织）和 3 个惩戒营以外，法军专门组织和训练了 38 个担任轻步兵勤务的营。在这些部队中，猎兵、朱阿夫兵和土尔科兵各有显著的特点。后两种部队的地方色彩太重，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大部分法军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猛烈的冲锋——意大利战争的情况说明，他们在冲锋时完全听从指挥，甚至凭着他们固有的军人的机智还能预先料到指挥官的命令，——对于其他部队永远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法国人在散兵战的具体动作和利用地形的方法上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轻步兵中间，始终是道地的法国人部队并因而如上所述已成为军队模范的，则是猎兵。我们在下一节里将更详细地介绍他们。

二

1831年法军操典第一页就表明,法军是由身材多么矮小的兵士组成的。

慢步:每步为65厘米(25英寸),每分钟76步。

快步:步幅同上,每分钟100步。

冲锋步(pas de charge):步幅同上,每分钟130步。

与任何其他国家军队在战爆运动时所采取的步幅和速度相比,25英寸一步无疑是最小的步幅,而每分钟100步无疑是最慢的速度。法国营每分钟前进208英尺,英国营、普鲁士营或奥地利营却能前进270英尺,就是说比法国营多百分之三十。我们的30英寸的大步幅对腿短的法国兵来说是太大了。冲锋时的情形也是如此:法国兵每分钟前进271英尺,也就是相当于英国兵用普通的快步就能走完的距离;而英国兵用每步36英寸和每分钟150步的跑步可以前进450英尺,就是说比法国兵多百分之六十。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说明了,兵士的标准高度不能低于一定的限度,否则就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运动性。

腿这样短、步子这样小、步伐这样慢的兵士,是无法组成轻步兵的。当最初组织猎兵部队时,从一开始就采取措施,在国内选拔最优秀的步兵兵士;他们都是些体格健壮、肩膀宽阔而且很灵活的人,身高5英尺4英寸到5英尺8英寸,大部分是从山区选拔来的。根据猎兵操典(1845年出版)的规定:快步的步幅和以前一样,

但步速增加到每分钟 110 步；跑步 (pas gymnastique) 的步幅规定为 33 英寸 (83 厘米)，每分钟 165 步，但在展开、排成方队或其他需要迅速行动的情况下，步速应增加到每分钟 180 步。即使用这样的步速，猎兵每分钟前进的距离也不过比英国兵跑步时多 45 英尺。但是猎兵的特殊成就与其说是由于运动特别迅速，不如说是由于他们能在长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度的运动；此外，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在集合时或其他时候，他们还按口令以最大的速度快跑。

跑步是法国猎兵营训练的最主要内容。最初训练兵士用每分钟 165—180 步的速度原地踏步，这时兵士呼喊：“一！”，“二！”或者“右！”，“左！”，这是为了调节肺的活动，防止发生肺炎。然后，兵士就要用同样的速度前进，而且距离逐渐增大，直到他们能够在 27 分钟内跑完 1 法里格 (4000 米或 $2\frac{1}{2}$ 英里) 为止。如果发现某些新兵的腿或肺太弱，经受不住这样的练习，就把他们送回基干步兵部队。下一步是练习跳跃和快跑，快跑时要求在短距离上达到最高的速度；不论 pas gymnastique 或快跑，起初都是在平坦的练兵场或道路上练习，然后越野练习，同时练习跳越栅栏和沟渠。只有经过这种训练以后，兵士才能领到武器，这时兵士又将跑步、快跑和跳跃这一整套练习重复一次，但须持枪和携带全副行军装具；背囊和子弹盒的重量与战斗情况下相同。他们必须这样连续 pas gymnastique 整整一个小时，在这一时间内至少要跑完 5 英里。有一次，一个外国军官穿便服企图同这样一个携带全副行军装具的猎兵营一同前进，但是他由于没有经过锻炼，只能勉强跟着跑一个小时；而猎兵继续前进，交替采取快步和 pas gymnastique，在那一天共走了 22 英里以上的路程。

战场上的一切运动和队形变换都应当以跑步完成；兵士在以跑步成横队前进、排成纵队或方队、变换方向、展开以及做其他动作的时候，都应当和采取普通快步时一样确有把握地保持自己的位置。在进行一切队形变换时的步速为每分钟 165 步，只有在展开和变换方向时，步速增加到 180 步。

下面是一位普鲁士军官关于法国猎兵的意见：

“在马尔学校场上，我见到了跟一个基干团一起操练的几个猎兵连。他们运动的灵活，他们的动作的整个风度同这个团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你一眼就可看出，这是由林区和山区的优秀人员组成的一支精锐部队。他们全都是些结实、粗壮、有劲而又惊人地灵敏的人。当他们用惊人的速度灵活地运动时，你会感觉到他们的那种进取心以及他们的勇猛大胆、机智灵活、不知疲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虽然你一定也会看到他们非常自负并且有法国人的那种虚荣心。不论你在哪里看见他们，在斯特拉斯堡、巴黎还是其他任何驻地，他们总是给你造成同样的印象，他们看来好像是用一个模子铸造的。我见到指挥他们的全是青年军官；只有几个上尉看来有 35 岁，但大部分都比他们年轻，甚至校官也不大于这个年纪。他们动作迅速灵活，一点不显得紧张或吃力；看来经常的锻炼已经使这种灵活性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这些队伍就是这样轻松自如地完成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血液似乎比别人流得平缓些，他们的呼吸也均匀一些。单个的传令兵在街上行走，很快就超过所有在前面走的人，而整个队伍也用同样快的步伐在愉快的号声中成纵队在街上通过。不论你在什么时候见到他们，在练兵场上，在行军中或是在室内，他们从来都没有露过倦容。在这方面，自负心可能和习惯同时起着作用。

如果说迅速的动作和准确的瞄准看来是互不相容的，那末猎兵大概已经克服了这种似乎存在的矛盾。我自己没有见过他们的实弹射击，但据有经验的军官说，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能是决不能低估的。即使他们瞄准的准确性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对战场上的射击效果，影响一定是很小的。在非洲，由于在战斗前时常进行这样的跑步行军，猎兵总知道怎样射杀他们的敌人；这就证明，他们所受的这一套专门训练可使体力得到适当的增强，而且不损害瞄准的准确性。对于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部队来说，情形当然就大不相同了。

这种训练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的步兵能够比现在运动得更快，这在战争中的许多场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例如在先敌占领重要阵地时，在迅速到达制高点时，在支援遭受敌人优势兵力攻击的部队时，以及在派小队伍在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向上突然袭击敌人时，都是如此。”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军事当局看到，经过这样长跑训练的步兵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从 1853 年起，就讨论是否应当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全军的问题。鲁尔梅耳将军（1854 年 11 月 5 日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阵亡）曾专门提请路易一拿破仑注意这件事。克里木战争以后不久，pas gymnastique 就在法国所有步兵团内实行了，虽然步速比猎兵慢些，步幅也小些，而且，基干部队长跑的时间也比猎兵的要短得多。这是必要的；由于基干部队兵士的体力和身材不同，因此就要以较弱和较矮的兵士的能力作为整个部队训练时的依据。但在一个紧急关头，仍然是可以克服过去那种运动缓慢的情形的；兵士有时能跑 1 英里或将近 1 英里，特别是能够以跑步变换队形，所以他们就能跑步冲锋 600—800 码，去年法军就这样做过，在几分钟内跑步通过了受优良的奥地利步枪的火力威胁最大的那段距离。pas gymnastique 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帕勒斯特罗、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等地的会战¹⁰⁷取得胜利。跑步本身能够激发兵士高昂的士气；一个营以快步冲锋时可能表现出犹豫不决，但是，同一个能够不气喘地跑到目的地的营，如果跑步冲锋，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将大胆无畏地前进，以较小的损失到达目的地，并一定能给停止在原地的敌人以更大的精神震撼。

猎兵在跑步方面所达到的这样极完善的地步，只有他们这种专门部队才能做到，但是对于大量的基干步兵来说，这既是做不到

的,又是无益的。尽管如此,兵员质量较好的英国基干部队,在这方面是不难训练得远远超过法国基干部队的,同时,这将和一切有益健康的锻炼一样,对兵士的身心会大有好处,不能交替地跑 1 英里再走 1 英里、连续运动几小时的步兵,不久就将被认为是运动迟缓的步兵。至于志愿兵,由于在年龄和体力方面参差不齐,连这种结果也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无疑地,在半英里到 1 英里的距离上逐渐练习跑步,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而且能大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

三

法国想尽一切办法来发展每一个新兵，特别是每一个猎兵的体力、智力和精神力量，以便使他们成为尽可能完善的兵士。它采用一切办法使兵士成为强壮、灵活而机智的人；使他们学会迅速判断有利地形或在困难情况下迅速定下决心；竭力提高他们对自己、对伙伴以及对武器的信心。因此，队列教练在法国只占兵士勤务中的很小一部分；据我们所知，一个法国营对于练兵场上的步法、转法和持枪动作都是极其随便的。但是这看来只是民族性格的表现，而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在英国和德国军队中则似乎宁愿要一套比较严格的队列教练制度；他们执行口令比较敏捷，同时，经过一定时期的队列教练以后，他们在做一切动作时都将表现出法国兵从未有过的那样高的准确性。至于其他方面，练兵场上的一套战术动作在法国和英国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战场上极不相同。

法国兵的主要训练内容之一，就是体育。在巴黎有一所为全军培养教员的中央军事体育学校。各团抽调 15 到 20 名军官，此外每个基干团或猎兵营还各调 1 名军士，到那里学习 6 个月，然后调换另一批人去学习。这个学校的课程和其他国家的同类学校的课程并没有很大区别；大概只有一样独特的练习，就是爬城，即利用炮弹在墙上造成的弹坑，或利用靠在墙上的杆子或投到墙上的带有钩子的绳索，爬上城墙。这种练习无疑具有实用的价值，并且大

大有助于使兵士学会运用手脚。在这个学校里还训练刺杀，但仅限于各种突刺和防护动作的练习，而从来不让兵士真正作相互防刺或防骑兵的动作。

在法国，每个驻地都拥有必要的体育设备。首先，到处都辟有能进行普通体育练习的、设备齐全的操场。所有兵士都依次到这里受训；学完所规定的体育课程，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这种训练实行还不久，并且完全是从猎兵那里学来的。猎兵是第一个实行体育训练的，而当这种训练对于猎兵有了很大益处以后，就被推广到全军。

此外，在每个兵营中都有击剑房和舞蹈室。在击剑房学习使用轻剑和阔剑，在舞蹈室则学习舞蹈和拳斗，即法国人所谓的《la boxe》（“拳术”）。每个兵士可以在这些练习中进行选择，但必须学习其中的一种。一般都愿意学舞蹈和使用轻剑。有时，还进行棍棒格斗的练习。

所有这些练习和单纯的体操一样，之所以需要进行并不是因为这些练习本身是必要的，而是因为它们能增进兵士的体力和灵巧，使他们产生更大的自信心。击剑房和舞蹈室决不是履行枯燥的职责的地方，相反，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所在，它可以使兵士甚至在闲暇时间内还留在兵营里面；兵士到那里去是为了娱乐；如果说他在队列中不过是一架机器，那末在这里当他手握长剑来和同伴比赛个人技巧的时候，他就是个无拘无束的人了；而他在这里获得的对自身的敏捷和灵巧的全部信心，对他担任警戒和进行散兵战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他或多或少都不得不依靠个人的力量。

猎兵采取的一套新的散兵战的方法，不仅在后来推广到了法

军全军,而且为欧洲许多军队所仿效,英军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所采取的战法就是由法国猎兵的战法改进而来的。因此我们只谈谈这种战法的几个主要的特点,特别是因为法军在战斗中的行动常常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根据总的命令行动(例如1859年在意大利);部分地是由于军官完全有按情况采取行动的自由;部分地也是由于在战斗中一般必然要对操典上的所有的规则作相当大的更动。散兵以4人一组行动,每组展开成一线,兵士互相间隔5步。各组间隔最少5步(这样就构成了每5步一人的绵亘的横队),最多40步。军士位于本班后面10步的地方;每个军官有4名兵士和1名司号兵跟随,位于散兵线后面20—30步的地方。如果展开的只是连的一部分兵力,那末连长的位置就在散兵线和支援部队之间。利用地形隐蔽自己,是主要的要求;队形的齐整和间隔的保持都服从于这一要求。整个散兵线仅仅用号角指挥,信号共有22种;此外,每个猎兵营及其所属每个连都有自己的特别信号,这种信号应当在指挥信号之前发出。军官带有一个哨子,但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哨子可发出5种信号:“注意!”,“前进!”,“立定!”,“后退!”和“集合!”。某些志愿兵步枪手的哨子即来源于此,他们把哨子当做自己装具中不可少的东西,因而使军官无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哨子。在受到成散开队形的骑兵的攻击的情况下,散兵以4人一组集合,或以班或半连为单位集合成不规则的密集队形;或者同支援部队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连的方队;或者同全营集合在一起(当全营必须成横队行动,或组成方队时)。这些不同的集合方法,法军练习得很多,而且掌握得很好;方法的繁多并不会造成任何混乱,因为兵士都学会了在危急情况下以任何可能采取的方法集合,然后利用有效的运动方法,同

信号所指示的更大的单位会合。方队有时排成两列，有时排成四列。

这套新方法同各国军队在法国猎兵出现以前几乎都采用的那套旧方法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不应当忘记，归根到底这一切并不是别的，而只是一套练兵场的队列规则。这里没有每个兵士个人表现智慧的余地，如果是在平地上来作这些动作，那末这就会和最苛求的老军人也能感到满意的那种拘泥细节的做法差不多。各列都按规定的间隔排列，它们的前进、后退、变换正面和变换方向，都同基干部队的任何一个营是一样的，兵士们按号音运动，就像许多木偶被一根铁丝牵动一样。对于散兵说来，真正的练兵场是在敌人面前，而在这方面法国人就阿把阿尔及利亚做了自己轻步兵的最好的学校；那里的地形起伏不平，防守这些地方的又是迄今世界上最勇敢、最顽强而且最细心的散兵卡拜尔人。正是在这里，法军把他们从 1792 年以来在每次战争中都表现过的那种以散开队形进行战斗的能力和利用地形的能力发展到了最高度；在这里朱阿夫兵特别利用了从土著兵士那里得到的对自己最有益的教训，而成为全军的榜样。一般都认为，散兵线是以一种近似展开横队的队形前进，在有良好掩蔽物的地方可能集中在一起，在需要通过开阔地时则又分散开；与敌人散兵从正面进行战斗，仅仅偶尔利用栅栏或某种类似的东西向翼侧射击一阵，这样做，除了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外，不指望甚至也不打算达到更多的目的。朱阿夫兵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散开队形就是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总的目的来独立行动；有利条件一出现即加以利用；突然地接近敌人的主力并以准确的火力袭扰他们；完全不必集中成更大的单位来解决小的战斗。在他们看来，突然袭击和伏击就是散兵战的实质。

他们利用掩蔽物并不只是为了从比较隐蔽的位置进行射击，而主要是为了悄悄地匍匐到敌人散兵跟前，突然跳起，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他们利用掩蔽物为的是接近敌人的两翼，并突然密集成群地在那里出现，分割敌人的一部分兵力，或者设伏，如果敌人散兵过急地追逐假退却的朱阿夫兵，就会中计而遭到伏击。在决定性的行动中，这样的诡计可以在决定战斗胜负的较大战斗之间多次施行；然而在小战斗中，在为了搜集敌情或为了保障本军休息而派出的小部队和步哨的战斗中，朱阿夫兵的这些特性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从下面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朱阿夫兵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一切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个规则，即担任警戒，特别是担任夜间警戒的哨兵，不应当坐下，更不应当躺下，并且只要一发现敌人就鸣枪向小哨报警。现在请看奥马尔公爵关于朱阿夫兵营的一段描写吧（1855年3月15日的“两大陆评论”¹⁰⁸）：

“夜间，即使在那边的小山顶上监视前面地形的单个的朱阿夫兵，也都隐蔽起来。你看不见步哨，但是等到军官过来查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和朱阿夫兵谈话，这个朱阿夫兵俯卧在山顶后面，注视着一切。你看到那边有一丛灌木。但是如果你再仔细观察，发现那里隐藏着几个朱阿夫兵，那是丝毫不会使我感到惊奇的；当一个贝都英人钻进这些树丛想观察一下兵营里面的动静的时候，这些朱阿夫兵不开枪，而是不声不响地用刺刀把他杀死，免得暴露设伏地点。”

有些兵士只在和平时期在驻地学过警戒勤务，他们不站着或者不走动就难保不睡觉；如果拿他们同那些在对贝都英人、卡拜尔人进行的充满着各种巧诈和诡计的战争中训练出来的兵士比较一下，他们又算得是什么样的兵士呢？朱阿夫兵虽然经常违背规定的制度，仅只有一次遭到他们机警的敌人的突然袭击。

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上占有的领地中有一个地区，从军事观

点来看很像阿尔及利亚。气候和地形特点几乎是一样的，边境的居民也几乎是相同的。那里经常发生掠夺和各种敌对性的冲突；不列颠军中一部分最好的兵士就是在这个地区锻炼出来的。但是这种长时间的、极其富有教育意义的冲突竟没有对不列颠军轻步兵执行各种勤务的方法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尽管同阿富汗人和俾路支人打了 20 多年仗，这部分军队还是这样地不完备，以致必须赶快学习法军的榜样，才能使步兵在这方面成为有效的战斗力量；这种情形的确是叫人感到奇怪的。

法国猎兵使法军采用了：(1) 新式服装和装具——紧身制服，轻便的圆筒军帽，代替交叉式皮带的腰带；(2) 步枪及其使用法，即现代的一套射击学知识；(3) 长时间的跑步及其在变换队形时的运用；(4) 刺杀教练；(5) 体育；(6) 同朱阿夫兵一起倡导的一套现代的散兵战的方法。说句真心话，不列颠军既然采用了这当中的很多东西，难道不应当归功于法国人吗？

然而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改进，为什么不列颠军方面不去作这些改进呢？为什么在印度的西北边境甚至今天不能使那里的作战部队对英军作出像法国猎兵和朱阿夫兵对法军所作出的那样的贡献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9 月中—
10 月中
载于 1860 年 9 月 21 日、10 月 5 日
和 20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第 3、5、7 期及“志愿兵读物”1861 年
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校对过

卡·马克思 俄国利用奥地利。—— 华沙会议

1860年9月17日于柏林

目前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德国提供了一幅最奇异、最紊乱、最悲惨的图景。只须对比一下这样两个事实，即德意志民族联盟不久前在科堡举行会议和主要的德意志邦君即将在华沙举行会晤¹⁰⁹，就可以最清楚不过地了解德意志的真实情况。民族联盟力求祖国的统一，对德意志的奥地利拒而不纳，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而普鲁士摄政王本人则把他的反抗法国侵略的计划跟重建一个在俄国庇护下的神圣同盟联系起来。如所周知，俄国的对外政策是丝毫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则的。它既不是正统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但它却同样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机会，不管这种扩张是附和起义的人民而达到，或是附和角逐的君主而达到。时而附和这一边，时而附和那一边，成了俄国对德国的确定不移的政策。最初它和法国达成协议，以便摧毁奥地利对其东方计划的反抗，随后又站到德国这一边，以便削弱法国和取得德国酬谢的期票，然后在维斯拉河或多瑙河上兑现。在欧洲纠纷发展的进程中，俄国始终会认为联合德意志各邦君主比联合法国暴发户好。原因很简单，它的真正力量在于外交优势，而不在于物质

实力。如果因为同法国结盟而同自己的紧邻德国发生战争，就可能暴露出北方巨人的外强中干；而在对法战争中，俄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总是应当担任后备队的角色，而迫使德国承受战争的实际重担，为自己储存胜利果实。结盟的国家在这方面与各个军团相像。先头部队和本队得顶住主要的打击，而决定会战的结局和取得胜利的则是后备队。德国的幻想家们希望，俄国在国内的与解放运动联系着的社会斗争的强烈影响下，这一次将放弃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关于俄国对外政策永远不变的信条，就让你们以这种虚幻的希望自慰吧。

有人推测，被阶级斗争弄得四分五裂，被财政危机弄得精疲力竭的大帝国，将非常乐意地不再过问欧洲；但这样的推测只说明对俄国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真正本质了解得很差。不管慈悲的沙皇的真正意图如何，对他来说，消灭农奴制和保存自己的专制政权两者是不可能调和的，就像 1848 年对慈悲的教皇^①来说意大利统一和教皇宫廷的切身利益不可能调和一样。“俄国解放农奴”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它后面却隐藏着各种极不相同的意义和各种极为矛盾的意向。在运动之初，这些矛盾意向被某种共同的热情掩盖了起来，而一旦采取从空论到行动的步骤，这种掩盖物就一定会被打破。按照沙皇的理解，解放农奴就等于排除那些仍然限制着皇帝专制的最后障碍。一方面，应当取消贵族的以专横统治大多数俄国人民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应当用政府的消灭“共产主义”原则的计划，来取消以共同占有被奴役土地为基础的农奴的村社自治。这就是中央政府所理解的农奴解放。至于俄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国贵族阶级中有势力的那一部分贵族，他们由于没有希望保持昔日的状况，于是就决定在两个条件下让农奴解放。第一个条件是要补偿金，使农民由农奴变为契约债务人，这样一来，从物质利益这方面来说，至少在两三个世代之内，除了农奴依附的形式可能由宗法式的变为新的、文明的形式外，就什么也不会改变。除了应由农奴付出的这种补偿之外，贵族还要求由国家再付给一笔补偿。贵族表示准备放弃自己在地方上对农奴的统治权，但它要求从中央政府手中取得政治权力来代替这种统治权，实质上，就是要取得宪法权利参加帝国的一般治理。

最后，农奴对解放问题则宁愿作最简单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解放，就是去掉他们的旧主人之后的旧制度。在这种相互的斗争中，政府虽然进行了威胁和阿谀，仍然大遭贵族和农民的反反对，贵族阶级则大遭政府和他们的牛马即农奴的反反对，而农民则大遭他们的最高主人和地方主人的联合的反反对。在这种斗争中，一如既往，掌权者总是牺牲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妥协。政府和贵族阶级已经商妥，把解放农民问题暂搁一下，在对外冒险上再碰碰运气。1859年与路易·波拿巴的秘密协定¹¹⁰和1860年有德意志邦君们参加的正式的华沙会议，都是由此而来的。意大利战争削弱了奥地利的自信，已经可以使它这块绊脚石变为俄国执行对外政策计划的工具；而普鲁士由于在战争的进程中既追求虚荣，背信弃义，又毫无举动，以致弄得狼狈不堪，现在受到法国在它的莱茵省边界上的威胁，已不得不步奥地利的后尘。哥达党¹¹¹的一个大错误，就是幻想奥地利大概会在法国的打击之下，瓦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如果摆脱了把它同意大利、波兰、匈牙利拴在一起的绳索，也就可以很容易地成为统一的大德意志帝

国的成员。长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奥地利跟法国或俄国进行任何战争都不会使德意志摆脱奥地利的影晌,只能使它服从法国或俄国的计划。即使这些强国有力量给奥地利一个沉重的打击,把它打碎成各个组成部分,对它们来说也是一种下策;但是削弱奥地利,利用其残余影响为自己利益服务,却曾经是并且永远是它们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只有以维也纳为一个中心,以柏林为另一个中心的德国革命,才能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打碎,而不使德国的完整遭到危险,不使它的非德意志地区受法国或俄国控制。

即将举行的华沙会议是会使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大大巩固起来的,如果不是在意大利,真正的民族派和法国派冲突的前景使他丧失了这种机会的话。不过,应当预期,华沙会议最后将使德国睁开眼睛,并教育它懂得,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国内实现统一和自由,它必须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们。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9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10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7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普鲁士现状。——普鲁士、
法国和意大利^①

1860年9月27日于柏林

正如我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过的，摄政王从取得最高权力时起，尽管宣扬普鲁士美丽幻梦的宣传官们在他身上装饰了自由主义的花朵，但在灵魂深处他已成了顽固的、彻头彻尾的正统主义者，——这位摄政王，近日得到机会公开宣泄了他那抑制已久的感情。不管多么奇怪，但这是事实：普鲁士的摄政王现在竟不许加里波第的军队进入墨西拿的主堡，而为自己最亲密的兄弟、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②保全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普鲁士驻那不勒斯公使冯·佩庞舍伯爵——此人和普鲁士驻罗马公使冯·卡尼茨男爵一起，像他们的大多数同行一样，都以顽固的正统主义而知名——把炮弹国王伴送到加埃塔，那里停泊着一艘保护德国臣民的普鲁士轻巡航战船“罗累莱号”。9月15日墨西拿的主堡准备投降。军官们宣布拥护维克多—艾曼努尔并派代表团到加埃塔，向国王报告要塞不能再守下去。次日，这个代表团即奉令乘轻巡航战船“罗累莱号”折回墨西拿，船上载有普鲁士政府的全权代表。该船到达之

① 标题的第二部分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② 这里是指弗兰茨科二世。——译者注

后,这位全权代表立即前往主堡,同那不勒斯军队的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普鲁士代表除了他本人的雄辩以外,还拿出了整整一叠国王的急诏,急诏号召这位将军继续抵抗,坚决反对即使是在最合算的条件下投降的一切建议,因为堡垒所需的一切还够用几个月。普鲁士全权代表在墨西拿逗留的时候,主堡中大喊《Evviva il Re!》(“国王万岁!”),他走了以后,本来已经开始的关于确定投降条件的谈判便马上中断了。卡富尔伯爵获得了这些消息,在柏林急忙表示不满,说这是“滥用普鲁士的旗帜”和违背在意大利革命战争中完全中立的诺言。尽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但是卡富尔伯爵作这样的声明是最没有资格的。冯·施莱尼茨先生——在1859年战争期间他的公文曾以甜蜜缠绵的风格、模棱两可的议论、串连词句不顾论点的无比艺术而获得一些名气——贪婪地抓住了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取得摄政王信任的机会。这一次,他把他那谦恭温顺的低语换成了尖锐而傲慢的高腔。他给了卡富尔伯爵一个严厉的驳斥,毫不客气地向卡富尔声明:西西里现在还没有成为撒丁的省份,都灵的宫廷每天都在违反条约上的条件;如果卡富尔想抗议外国干涉意大利,应该把抗议书送到土伊勒里宫去。

从都灵召回法国公使,这里认为是一个露骨的诡计,因为大家知道,紧接着路易·波拿巴和法里尼先生、查耳迪尼先生于莎姆伯里会晤之后,查耳迪尼先生就受命率领皮蒙特军队入侵教皇国。这次入侵,是在莎姆伯里拟定的,目的在于从加里波第手中夺取主动权,把它转交给卡富尔——法国皇帝的最机灵的奴仆。大家知道,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战争,在土伊勒里宫看来,不是偶然滚下来的一次雪崩,而是一个独立的意大利政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这个政党从路易·拿破仑走上 via sacra¹¹²时起,就经常宣称,南部

的起义是摆脱受法国庇护的恶梦的唯一手段。的确，马志尼在1859年5月16日对意大利人民的宣言中曾公开地宣称：

“在一定条件下，北部可以统一在维克多—艾曼努尔的旗帜下，不管奥地利人在哪里——在意大利领土上或是在邻近，南部的起义必须采取另一种更为独立的方针。起义，联合起义，建立临时政府，武装起来，选择一个战略要地，据以固守自己的阵地，吸引北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志愿兵，——这样做还能拯救意大利的事业并且建立自己的以民族阵营为代表的政权。由于有了这样的阵营和北部的志愿兵，意大利在战争结束后还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管战争的首倡者的意愿如何……人民意向的这种表现还会排除重新瓜分意大利的任何可能性，排除以外力扶植新王朝的任何企图，阿迪杰河或明乔河上的任何和约，意大利领土的任何割让。但是罗马的名字和意大利的名字是分不开的。那个神圣的城市是我们民族统一的担保。罗马的职责不是用一群乌合的志愿兵去增强撒丁军队，而是向皇帝的法国证明：谁成为罗马教皇专制的支柱，他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意大利独立的维护者……如果罗马忘记自己的职责，我们就必须代替罗马人来干。罗马是祖国统一的象征。西西里、那不勒斯和北部的志愿兵必须组成罗马的军队。”

这就是马志尼在1859年5月所说的话。加里波第重述了这些话，当时，他作为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所建的人民军队的首脑，答应将在克维里纳尔山之颠宣布意大利的统一¹¹³。

读者还记得：卡富尔从最初的时候起就竭尽全力为加里波第的远征制造困难，在这位人民英雄获得初步成就时，他又把拉法里纳连同两个波拿巴密探派往巴勒摩，阴谋剥夺加里波第的独裁者的权力；接着，加里波第的每一个军事措施都受到卡富尔从外交上、而后又从军事上的阻挠^①。在巴勒摩陷落和向墨西拿进军后，加里波第在巴黎居民和军队中间声名大振，以致路易—拿破仑认

^① 见本卷第100—104页。——编者注

为采取奉承手段是明智的。当图尔将军——他那时已被解除现役职务——到达巴黎时，受到了皇帝的恩遇。他不仅是罗亚尔宫¹¹⁴的贵宾，甚至还受到土伊勒里宫的接待，在接待时，皇帝对自己的“被兼并过来的”臣子、来自尼斯的英雄，表示无限钦佩，并且向他敬赠礼物，如线膛炮等等。同时，皇帝的这样一个信念也被传授给了图尔：加里波第在掌握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舰队后，最好是跟匈牙利流亡者一起采取步骤在阜姆登陆，以便在那里升起匈牙利革命的旗帜。但是路易一拿破仑大错而特错了，他错误地认为图尔是能够影响加里波第行动方向的人，或者认为图尔自己也自以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图尔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一个勇敢的兵士，精明的军官，但在军事活动范围之外就根本算不了数，还不如一个中等水平的普通人；他不仅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发展不足，而且还缺少天赋的敏感和嗅觉来代替教养、教育和经验。总之，这是一个心地善良、无忧无虑、非常轻信的可爱的小伙子，当然不能从政治上指导任何人，何况是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因此，押在图尔身上的赌注便失败了；至少在土伊勒里宫的圈子里是这样说的。于是，就试图利用科苏特，把他派到了加里波第那里去，影响加里波第为皇帝的计划效劳，使之离开通往罗马的光明大道。加里波第则利用科苏特做激发革命热情的工具，因此，就让他尝了一尝人民欢呼的甜头，但同时却英明地把他的代表人民事业的名字跟他的包藏着波拿巴骗局的使命区别开来。科苏特十分沮丧地回到了巴黎；但是，正如“民论报”¹¹⁵这家普隆—普隆的Moniteur（机关报）所报道的，他为了证明自己对皇帝的利益的忠诚，写了一封信给加里波第，要加里波第同卡富尔和

解,放弃对罗马的任何侵犯,免得自绝于法国这个被压迫民族的真正希望,甚至要加里波第不要过问匈牙利,因为这个国家尚未成熟到起义的程度。

无须再谈,在柏林这里,内阁自由主义的行市已由于即将召开的华沙会议而大大下落;在这个会议上,不仅受命于天的君主们将握手言欢,而且他们的外交大臣们——哥尔查科夫公爵、莱希堡伯爵和敝国的冯·施莱尼茨先生——也将在金碧辉煌的前厅里找个舒适角落聚会,给未来的人类历史规划一个正确的方向。

普鲁士和奥地利就 1853 年 2 月 19 日条约中拟定的、关税同盟和奥地利之间的新通商条约一事所进行的谈判¹¹⁶,现在可算是中断了,因为普鲁士内阁已经肯定地声明,谈不上什么关税平等,甚至接近也不行。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9 月 2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10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7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志愿兵炮兵

志愿兵的炮兵问题十分重要,应该广泛加以讨论——尤其是因为志愿兵炮兵在国防上应该起什么作用,看来目前仍然不十分明确。

显然,必须加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志愿兵炮兵适合于何种活动范围。不解决这个问题,各部队的训练制度就永远不会一致。炮兵学包括各种各样的科目,让全体志愿兵——军官和兵士——来学这些科目的理论和实践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各部队在接到战斗任务前来时,对于应该完成的任务的训练就会极不一致;而一执行一个特定的任务就会发现许多连队没有什么训练。

在下述的意见中,我们决不是想妄说志愿兵炮兵应该是个什么样或不应该是个什么样;我们只是想指出志愿兵炮兵以及别的任何炮兵在编成时都应该考虑到的几个条件,从而给我们想要引起的辩论开个头,从这一点出发,最后弄清楚志愿兵炮兵部队的活动范围。

整个炮兵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或要塞炮兵。前者应该在战场协同步兵和骑兵活动,配备着马拉火炮;后者用重炮在固定的或有掩蔽的炮台中攻击或防御筑垒要点。如果说在正规军中,兵士的长期服役和军官的专业教育可以训练全体成员在上述两种炮

兵中都能执行勤务，至少在必要时可以使每个连完成其中的任何一个任务，那末对志愿兵的军官和兵士来说，事情就不同了，因为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时间用在军务上。在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野战炮兵是同要塞炮兵或攻城炮兵完全分立的。如果在正规的常备军中如此，那末这样做无疑应该是有某些理由的，而这些理由在志愿兵中将更强烈得多地发生作用。

情况是这样：掌握野炮本身与掌握炮台重炮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大得志愿兵连队的兵士不容易学会两者。但是军官任务的性质在这两种情况下却大不相同，只有在专门教育和长期实践中才能训练他们同样很好地完成这两种任务。一个野战炮兵军官的主要品质是：善于迅速判断军情，正确判断地形和测定距离；完全熟悉自己的火炮效能（这使他能够顶住攻击到最后一分钟，不损失一门火炮）；根据长期经验，知道马匹能够完成什么工作，在战斗中应该怎样使用马匹；最后，十分勇猛而又谨慎。对要塞炮兵或攻城炮兵的军官的要求是：科学知识，炮术各方面的理论知识，筑城学、数学和工程学的知识，运用这一切的本领；耐心地、严格地注意土质工事的建筑和修整，注意集中火力的后果；最后是持久的勇敢而不是勇猛。让任何一个九磅炮连的连长去指挥棱堡，甚至其中最好的也要经过好多训练以后，才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安排一名专门搞攻城炮搞了好几年的军官作骑炮连的首长，也需要花很长时间他才能摆脱自己工作方法上的迟缓性，获得新的武器所要求的那种猛劲。至于没有像他们长官那样受过科学训练的军士们，在这里困难就更大。

看来，两种炮兵之中，要塞炮兵人员最容易训练。非军人的工程师具有这一事业所需要的一切初步科学知识，并且很快就能学

会把他们已经很熟悉的那些科学原则运用到炮兵里来。他们很容易学会掌握重炮移动时采用的各种机械、炮台的建筑和筑城的规则。所以主要应该从他们当中挑选志愿兵炮兵军官，而且他们特别适合于要塞炮兵勤务。对于军士和炮手也可以这样说。一切长期同机器打交道的人，如工程师、技师、铁匠，是炮兵的好材料，因此各大工业中心应当提供优秀部队。重炮的射击训练不能在内地进行，但是海洋距我们的郎卡郡和约克郡这样的内地城市并不远，因此有时候可以为了这个目的组织海岸旅行；此外，在重炮连每次射击时可以看到弹着情况，所以炮手们自己能够校正射击，实弹目标射击并不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另有一种情况妨碍组成志愿兵野战炮兵，这就是高价的火炮和马匹。的确，几个连合起来或许能够支付夏季几月的几门马拉火炮的费用，轮流学习使用，但是这样一来，无论是兵士或军官都不能被培养成熟练的野战炮兵人员。一个6门炮的野战炮兵连的装备费用一般约等于组成一个完整步兵营的费用；任何一个志愿兵炮兵的连都负担不起这样的开支；而且，如果注意到战场上损失火炮是一种耻辱，那就使人十分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政府，当敌人入侵时，愿意把带有马匹和驭手的野炮在志愿兵猎兵使用小型武器的条件下委托给志愿兵炮兵部队。

根据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理由，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适合志愿兵炮兵的活动范围，是为固定的海岸炮台补充人员。在内地的各个城市里，必然会有人试图训练志愿兵野战炮兵，以便在志愿兵运动中保持对这一事业的兴趣。无疑，如果要他们尽可能学习掌握马拉轻炮，那末，对于军官和兵士都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根据我们在这一兵种服役的亲身经验，我们非常怀疑，志愿兵最后能不

能熟谙野战勤务。不过志愿兵仍然会学到许多对他们使用重炮同样有益的东西,当他们要同重炮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很快会成为使用重炮的内行。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谈一谈。炮兵实质上是一个比步兵和骑兵需要多得多的科学知识的兵种,所以它的功效主要取决于军官的理论知识 and 实践知识。我们不怀疑,格里菲思少校的“炮兵教范”¹¹⁷很快会传到每个志愿兵炮兵军官的手里。这本书的内容表明:一个炮兵军官甚至一个军士,在他能够自称对他的武器有所认识以前,应该熟悉多么多的科目;但是这本书仍不过是一个熟练炮兵人员应该知道的东西的纲要而已。除正规连、营的队列教练对步兵和炮兵是共同的以外,还需要知道许多不同口径的火炮,知道炮架和炮床、装弹、测定仰角和不同的射程;需要知道炮台是怎样建筑的,知道攻城术、永备工事和野战工事;需要熟悉弹药和烟火器材的制造;最后,需要掌握火炮射击学,这门科学目前由于使用线膛炮更加显著地充实起来。所有这些科目都应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学好,而且它们都同样重要,因为,如果志愿兵炮兵不注意炮兵科学的所有这些学科,一旦应召服现役,就会碰壁。在所有志愿兵部队当中,炮兵这个兵种的军官的素养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取得实际经验和理论知识,否则他们在考验的日子里就会显得不中用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0 月上半月

载于 1860 年 10 月 18 日“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6 期及“志愿兵读物”1861 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根据“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校对过

卡·马克思 普鲁士备战

1860年10月23日于柏林

我们的自由派对摄政王参加华沙会议一事的愤怒和恐惧，像真正的普鲁士自由派的任何不满情绪一样，通过对奥地利和它的新出炉的宪法¹¹⁸的无情诽谤而发泄了出来。首先，弗兰茨-约瑟夫永远不会被饶恕的是，他使这些先生们失去了他们的主要慰藉，也使他们失去了一个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的永恒主题，这就是把“宪制的”普鲁士与“专制的”奥地利作对比。当然，奥地利的恩诏不仅提供了挑剔的借口，而且也引起种种严重的不安。赏赐这件礼物的当时情况和奉献它的双手，使它具有与其说是真诚让步不如说是巧施诡计的性质。早在1849年3月4日，弗兰茨-约瑟夫就曾公布了宪法总则，其结果不过是在第二年武运亨通之后再把它废除¹¹⁹。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君主们不遭到外界的强大压力而限制自己的特权和向人民的要求让步的例子，同样，也没有君主们每当可以不受制裁地违背自己的誓约和诺言的时候而仍然信守前言的例子。匈牙利古宪法¹²⁰并没有全部恢复，因为佩斯议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利——国家收入表决权 and 征兵权——被取消了，并且被转交给维也纳中央帝国议会；后者将变成全全国的国会，所以它被赋予种种特性，这些特性看来将成为它同各个民族议会或

省议会之间冲突的永久根源。既然各德意志省和斯拉夫省的宪法只有一些最一般最不明确的原则，那就可以对它们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了。马扎尔人认为，恩诏的最大缺点，是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同匈牙利分开，并允许这些省有特别议会；但是，如果回忆一下 1848—1849 年的事件，我们就有根据怀疑，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是否会附和马扎尔人的这种怨言，支持这种怨言。看来，维也纳的国家活动家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巧妙地玩弄了一下民族原则，使它对自己有利。

但是，谈到全帝国的共同的议会——帝国议会（它设于维也纳，由加里西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威尼斯和各德意志省的各个议会的议员组成），既然它不受德意志联邦议会的管辖，难道不是要破坏德意志奥地利与德意志联邦之间一向存在的关系吗？这就是普鲁士官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们现在无休止地议论的大问题，他们举出种种新的论据来论证他们那个心爱的理想——把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排除出德意志联邦。但是他们的所有议论全是出于误解，因为他们对弗兰茨—约瑟夫的恩诏信以为真了。应该把弗兰茨—约瑟夫的恩诏看成是奥地利王朝的一种花招，但是，它仍然给哈布斯堡王朝压迫下的各族人民提供了自己安排自己命运和开辟革命新纪元的大好机会。现时，奥地利宪法就会带来很大好处，因为它将克制普鲁士假自由派的骄傲，使霍亨索伦王朝失去它可以用来向自己对手吹嘘的唯一优越性：它是在比较体面的宪制形式掩盖下经营着它的官僚加大兵的老行业。

为了使诸君清楚地了解这个被夸耀为“中兴的”普鲁士的真实情况，有必要提一提不久以前在普鲁士军队编制方面发生的变动。大家记得，普鲁士的议院既没有勇气公开批准政府关于军队改编

的提案而得罪舆论，也没有勇气坚决反对摄政王的大兵脾气，于是就诉诸弱者所常用的巧计，选择了非驴非马的中间道路。议院拒绝了批准政府的军队改编计划，但是投票赞成了拨款 950 万塔勒供重整军队击退外来威胁之用。换句话说，普鲁士的议员们投票赞成了拨给政府为完成它的计划所必需的经费，不过他们这样做是用了一个虚伪的借口罢了。普鲁士议会刚一休会，政府就公然违背它取得拨款的条件，不再有什么客气，着手把摄政王所希望和所谓的代表们所拒绝的那种军队编制方面的改变实行了。在议会会议休会期间，常备军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且它的团的数目由 40 个增到 72 个基干团和 9 个近卫团。这样一来，便显然违背着人民的意志，而且违背着他们的伪代表们的投票表决，根据摄政王的最高意志，把军事预算中每年的固定支出增加了 100%。但是请不要以为，霍亨索伦亲王或者他的某一同僚有遭到斯特腊弗德的命运¹²¹的危险。全部问题将只不过是仍然坚决担保自己忠于王朝和无限信任内阁的同时悄悄嘀咕一下而已。如果注意到，主要靠农业人口而存在的旧的军队编制都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财政负担，成了逐渐走上工业发展道路的人民进行生产活动的障碍，那末就可以容易地了解到，现在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军队是会怎样压制人民群众最宝贵的精力，吞噬国民财富的来源了。普鲁士军队现在可以夸耀的是，从人口和国家资源方面来看，它是欧洲最大的军队。

诸君知道，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君自称 Kriegsherr，即“军事主宰”，大臣和官员们也这样称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普鲁士的国王们和摄政王们有能力支配战争的命运。他们保持和平的明显的愿望，他们爱打败仗的众所周知的脾气，都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

点。霍亨索伦国君们所酷爱的“军事主宰”这个封号是意味着，他们的王权的真正支柱不应该在人民中去找，只应该在人民的一部分中去找，这一部分脱离了群众，被置于与群众对立的地位，用臂章与群众区别开来，灌输以消极服从的精神，通过刻板训练把它变成了王朝的单纯的工具，王朝把它看做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胡乱使用。所以普鲁士国王宁愿放弃王位，也不让自己的军队宣誓效忠宪法。可见，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君只有当他是“军事主宰”，换句话说，是军队的所有者时，他才能做自己人民的国王，所以他首先就得热爱自己的军队，爱护它，捧它，并且用从国民财富中捞取的越来越多的油水喂肥它。这个伟大的目的，通过新的军队编制而达到了。军官的数目增加了一倍；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所特有的官衔快速晋升，以前是普鲁士军官所艳羡的，现在也有了保证，并且完全无须让自己的宝贵生命受到哪怕一点点危险。所以，在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中间，而不是在兵士中间，现在便洋溢着一片对摄政王和他的“自由派”大臣们的巨大热情。同时，对新政府的自由主义空谈暗怀不满的贵族猎狐者¹²²，由于他们又有可能用人民的脂膏养自己的幼子，就完全同新政府和解了。所有这一切，甚至从王朝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坏处。现在普鲁士把它拥有的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常备军中去了。如果这支军队被击溃，那末它就没有任何能够动用的预备兵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10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0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097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步 枪 史

—

步枪是德国人远在十五世纪末发明的。最初制造步枪显然只是为了便于装填与膛壁几乎紧密贴合的弹丸。为此膛线被刻成直线的，没有任何回旋，其唯一的目的是减少弹丸在枪膛内的摩擦。弹丸本身包着一层浸油的毛织物或麻布（浸油丸衣），这样就能不太困难地塞入枪膛。这种步枪虽然简陋，但是比起当时使用直径比枪的口径小得多的弹丸的滑膛枪来，它的射击效果要好得多。

后来，由于采用螺旋膛线，步枪的性能起了根本变化；枪膛就像一只螺母。弹丸借助于紧贴膛壁的浸油丸衣顺膛线旋转前进，因而围绕着它的飞行轴线保持旋转运动。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使弹丸作旋转运动的方法，能大大增大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因此螺旋膛线很快就代替了直线膛线。

这就是二百多年来通用的那种步枪。这种武器除了经过改进的发动机和制作得更精致的瞄准具外，直到 1828 年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它在射击精度方面大大超过了滑膛枪，但是在射程方面却远不了多少；在 300—500 码以外，它就射不准了。同时，它装弹比较困难；塞入弹丸是一套很麻烦的动作；火药和裹着浸油丸衣的弹丸要分别装进枪管；而且每分钟最多只能发射一次。步枪的

这些缺点,使它不适于在军队中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当时一切战斗的胜负都是由展开的横队的速射决定的。由于采取这种战术,旧的滑膛枪尽管有各种明显的缺点,却仍然是人们更乐于使用的武器。所以我们看到,步枪仍然是猎取鹿和羚羊的猎人们所喜用的工具;只是在某些军队的少数优秀射手营里面它才被作为特殊的军用武器使用,而这种营是那些能够从居民中征召足够数量的老练猎手的军队才能组织的。

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战争¹²³使战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时起,在每次战斗中都采用散开队形;散兵线和横队或纵队相结合,成了现代战斗的特点。在一次战斗的大部分时间内,主力都留在后面;他们组成预备队,或者进行机动,以便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他们只在决定性时刻才投入战斗,而散兵线和它的直接支援队则不间断地作战。大部分的弹药都是由他们耗费的,而他们的射击目标则很少超过一个连的正面;在大多数场合,他们不得不对隐蔽良好的单个兵士进行射击。尽管这样,他们的火力仍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冲锋做准备,又最先抵抗敌人的冲锋;他们的任务就是削弱占领着庄园或村庄的敌人的抵抗,以及挫折敌人的横队冲锋的锐气。这时如果使用老式的“褐色的拜斯”,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圆满地完成。和装备滑膛枪的散兵作过战的人,没有不极端藐视滑膛枪在中距离上的射击效果的。然而旧式步枪仍然不适于大量装备散兵。为了能够方便地塞入弹丸,旧式步枪必须做得很短,以致不适于安装刺刀。因此,步枪手只是在受不到刺刀冲锋和骑兵冲锋威胁的阵地上才使用上。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发明一种把步枪的射程和射击精度同滑膛枪装弹灵便迅速和枪管长的优点结合起来

的武器,使它既是步枪又是冲锋兵器,适于每个步兵使用。

由此可见,自从在现代战术中采用散兵战以来,就有了一种改良武器的需要。在十九世纪,只要出现某种需要,而发展的情况又证明确实有这种需要,它就一定能得到满足。这一次的需要就得到了满足。从 1828 年以来,小型武器的一切改进,几乎都是为了满足上述需要的。

在旧的塞入式装弹方法废止以后,线膛火器由于经过改进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在试图说明这些改进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在旧的装弹方法还保持不变的时候,对步枪曾作过哪些改进的尝试。

像英国有名的朗卡斯特式步枪这样的椭圆形枪膛的步枪在欧洲大陆曾使用了四十多年。我们发现一本 1818 年出版的德文军事书提到了这种步枪。在不伦瑞克,贝尔奈上校改进了这种步枪,并且在 1832 年用它装备了公国的全体步兵。枪膛的椭圆度不大,椭圆形弹丸用旧法塞入。但是这种椭圆形弹丸仅仅在散兵单独射击时使用。兵士进行齐射时则使用口径较小的、能够像一切火枪弹丸一样容易顺着枪膛滑下去的球形弹丸。这种枪的不足之处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仅仅是,这是第一次试用线膛枪装备一支军队的全体步兵。

瑞士的一位工程师、步兵军官维尔德先生大大改进了步枪。他发明的弹丸与枪膛的比例比通常的小,只有靠浸油丸衣才能嵌入膛线;探条上的圆卡子可以防止探条进入枪膛太深,以免弹丸紧压在装药上把火药压碎;膛线的缠角减小了,装药量则增大了。维尔德式步枪在超过 500 码的距离上射击时,弹道极低,效果很好,能够发射 100 次以上而不致使枪膛产生污垢。瑞士、维尔腾堡和

巴登都采用过这种步枪,但是现在它当然已经过时而不用了。

根据塞入式装弹原理设计的最现代化和最好的步枪,是瑞士优秀射手所装备的新式步枪。这种武器像美国的武器一样,口径很小——不超过 10.50 毫米,即 0.42 英寸;枪管长 28 英寸,有 8 条浅膛线(每一转长 34 英寸);探条上有维尔德式的圆卡子;弹丸是圆柱尖头形的,很长,利用浸油丸衣塞入;装药量较大,使用粗粒火药。这种武器取得了惊人的射击效果;在荷兰政府不久以前所作的各种步枪的试验中,这种武器的射程、射击精度和弹道低伸度都被认为是最好的。的确,当射程为 600 码时,它的弹道最高点仅 8 英尺 6 英寸,所以全部每程都是骑兵的危险界,而弹道的最后 100 码甚至还是步兵的危险界;换句话说,在射程为 600 码时,判断目标距离有 100 码的误差,对杀伤 6 英尺高的目标一般也不会有影响。这种射击效果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线膛枪的射击效果;它们中间最好的一种在 600 码距离射击时所必须取的射角,使弹道最高点提高为 13—20 英尺,因而使危险界缩小为 60 到 25 码。瑞士新式步枪的弹道所以特别低伸,是由于枪的口径小,可以使用长的尖头形弹丸和较大的装药。枪的口径小,枪就可以做得非常坚固而不笨重,弹丸可以长而不重,装药也可以大些而不产生过大的后座力。显然,这种武器的良好的射击效果绝对不是由于塞入式装弹法;事实上这种装弹法是这种枪的唯一缺点,使它不能成为步兵通用的武器。所以,瑞士人只限于用这种枪装备优秀射手连,这种枪在他们手中无疑会取得最良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将说明步枪怎样改进而成为适于每个步兵使用的武器。

二

法国军官德尔文第一个试图使步枪成为适于步兵普遍使用的武器。他清楚地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弹丸必须像滑膛枪弹丸一样或几乎一样顺畅地滑入枪管,然后必须改变形状,以便嵌入膛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早在 1828 年就设计了一种枪尾部带药室的步枪,也就是使装填火药的枪管末端的直径大大小于枪管的其余部分。药室是仿照榴弹炮和白炮上经常采用的药室制成的,但是榴弹炮和白炮上的药室只是为了稳固地放置小量装药,而德尔文式步枪上的药室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用途。火药装入药室后,直径小于枪的口径的弹丸就被装入枪管;但是弹丸一到达药室的边缘,就被药室顶住而不能继续前进;这时用探条猛力冲打几下,就足以使弹丸的软铅嵌入膛线并且使它的直径扩大而紧贴膛壁。

这种枪的最大的短处,就是弹丸失去了圆球的形状,变得有些扁平,结果容易失去膛线赋予它的旋转运动,使射击精度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德尔文发明了长弹丸(圆柱锥形),这种弹丸最初在法国试用虽然不很顺利,但是在比利时、奥地利和撒丁却十分令人满意;在这三个国家中,德尔文式步枪经过各种改进以后,被用来装备猎兵营以代替旧式的步枪。尽管这种步枪现在几乎到处都不再使用了,但是德尔文所作的改进却包含着为后来一切发明家都不能不遵循的两个重要的原理。第一,前装步枪的弹丸顺枪管下滑时,必须有一定的空隙,以便于装填,而经过冲打以

后则必须改变形状，以便嵌入膛线；第二，长弹丸是现代步枪唯一适用的弹丸。由此可见，德尔文一下子就把问题提到了正确的基础上，完全不愧为现代步枪之父。

长弹丸比球形弹丸优越的地方很多，因为前者能够作旋转运动（围绕纵轴线）；几乎所有的现代步枪在这方面都令人满意。同重量相对而言，长弹丸的断面比球形弹丸的断面小得多，因此它所遇到的空气阻力也就比球形弹丸小。它的头部可以做成尖形的，以使这种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它像梭镖或箭矢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空气的支持。结果是，这种弹丸由于空气的阻力而失去的初速比直径相同的任何球形弹丸都少得多，因而在既定的距离上弹道也低伸得多（也就是说弹丸的飞行路线对于敌人要危险得多）。

长弹丸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同膛壁的接触面比球形弹丸大得多。因此，长弹丸能更好地嵌入膛线，而这也就可以减小缠角和减小膛线的深度。这两点有利于武器的擦拭，同时又使步枪能利用全装药而不致增加枪的后座力。

最后，由于长弹丸比球形弹丸重得多，所以枪的口径即枪膛的直径就可以大大缩小，而仍然能够发射和原来球形弹丸同样重的弹丸。而且，如果以旧式滑膛枪的重量和它的弹丸的重量作为标准来衡量，那末发射同样重的长弹丸的步枪就可以比旧式火枪做得更加坚固（坚固的程度与枪膛的直径缩小量成正比），而重量却不超过旧式火枪。枪愈坚固，它就能愈好地承受装药的作用，后座力就愈小，因而口径缩小后能够使用较大的装药，这样就使弹丸具有较大的初速并从而保证获得较低伸的弹道。

另一位法国军官图温南上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发现，当

弹丸被冲打而压入膛线时，它的边缘抵在药室的圆形边缘上，这是一个缺点。因此他把药室的边缘去掉，使整个枪管像过去那样前后直径一致。他在枪膛底部螺帽的中央安上一根短的坚固的钢心杆或支撑杆，钢心杆伸入枪膛，在它的周围装填火药。弹丸则抵在钢心杆的钝头上面，而探条的冲打就把它压入膛线。这种装置的优点很大。弹丸在探条的冲打下向周围产生的扩张，比在德尔文式步枪里面要规则得多。这种武器能使弹丸和膛壁间留有较大的空隙，从而便于装填。这种改进所获得的效果极其令人满意，所以早在 1846 年法国的 chasseurs à pied (猎步兵) 便装备了图温南式步枪；随后朱阿夫兵和其他的非洲轻步兵也这样做了。当人们知道花钱不多就可以把旧式滑膛枪改成图温南式步枪时，法国步炮兵的马枪就一律进行了改装。普鲁士猎兵于 1847 年装备了图温南式步枪；巴伐利亚猎兵于 1848 年装备了这种步枪；不久北德意志诸小邦大部分也都仿效了这种做法，在某些场合甚至还用这种精良的武器装备了一部分基干部队。所有这些国家的步枪，虽然在口径等等方面有种种差别，但是显然有一定的统一的趋势；膛线的数目减少了（大都减少到 4 条），而且一般在枪管全长内旋转四分之三转到一转。

但是图温南式步枪还是有缺点的。为了反复冲打铅质弹丸使之扩张而嵌入膛线，就要费很大的力气，而这一点同基干步兵的普通火枪作为有效的白刃格斗兵器所必须具有的那种枪管的长度，是不相容的。此外，散兵在卧射或跪射时这样用力装弹就十分困难。被压入膛线而紧靠在装药上面的弹丸对爆炸力产生阻力，这就使后座力增大，因而不得不使用较小的装药。最后，支撑杆毕竟使武器结构不必要地复杂化；在它的周围很难擦拭，并且它又容易

折断。

由此可见，根据用探条冲打而使弹丸压入膛线的原理，德尔文式步枪当时获得了很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图温南式步枪又获得了更好的效果。但是，作为全体步兵通用的武器来说，还不能断定这类步枪比旧式滑膛枪优越。因此，必须根据另外的原理来制造适于每个兵士使用的步枪，在下一节里，我们就要谈谈这些原理。

三

德尔文(在前一节里我们叙述过他的步枪)发现,为了使长弹丸的重量减低到旧式球形弹丸的重量,必须把它的底部掏空。虽然他很快就发现使用这种底部掏空的弹丸同机械冲打弹丸使其扩张的方法是不相容的,但是他的试验却充分证明,爆炸时形成的气体进入弹丸的掏空部分,能使这个部分向周围扩张,因而使弹丸紧贴膛壁,嵌入膛线。

米涅上尉 1849 年所利用的就是这个发现。他完全取消了膛底的支撑杆或钢心杆,使步枪恢复了德尔文和图温南以前的那种简单的构造,而仅仅利用火药气体对于弹丸的掏空部分的扩张作用。他发明的弹丸是圆柱尖头形的,围绕圆柱部分有两道环形凹槽^①,底部掏空成圆锥形,用一个中空碗状铁塞(culot)堵上,火药爆炸的力量把铁塞压入掏空部分,因而有效地使铅弹扩张。弹丸同膛壁之间有足够空隙,即使裹着浸油的纸筒也能顺利地装入枪膛。

这样,我们终于有了能用来装备每个步兵的步枪和弹丸。这种新式武器像滑膛枪一样容易装填,它的射击效果比旧式步枪好得多,射击精度和旧式步枪相同,但是射程超过旧式步枪。不论是

① 这种凹槽(cannelures)是另一位法国军官塔米埃发明的。它除了可以减轻弹丸的重量和减少弹丸在膛壁内的摩擦以外,还能像箭羽一样使弹丸在空中保持稳定,从而使弹道更加低伸。

供普遍使用还是供优秀射手使用,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都无可争辩地是所有前装枪中最好的一种。正因为这样,它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被各国的军队采用,而且人们又做了许多尝试来改进这种步枪的弹丸或膛线的形状。米涅式弹丸由于是空心的,它就能够做得比口径相同的旧式球形弹丸略微重一点。这种弹丸是轻轻地压在火药上面的,而且只是当它通过枪膛时才逐渐扩张,因此后座力比旧式步枪或德尔文式和图温南式步枪的后座力小得多(后几种步枪的弹丸都是紧塞在枪膛里面,需要利用火药爆炸的全力才能推动前进);结果米涅式步枪就能够使用较大的装药。它的膛线做得很浅,这样枪膛便容易擦拭。膛线旋转一整圈的轴线的长度相当大,因而弹丸旋转的次数以及它和空气的摩擦(任何旋转运动都要产生摩擦)都减少了,这样就能更好地保持初速。弹丸底部掏空便使重心大大前移。所有这一切使这种武器获得了比较低伸的弹道。

事实上,米涅式步枪的普遍使用是由另一种情况造成的,那就是所有的旧式滑膛枪只要经过极简单的改装就能成为发射米涅式弹丸的步枪。在普鲁士,当克里木战争要求马上给全体步兵装备线膛枪,而针发枪的数量又不够的时候,就有 30 万枝旧式火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刻上膛线,成为适于发射米涅式弹丸的步枪。

法国政府第一个用米涅式步枪装备了几个营,但是采用了渐增式的膛线,也就是说,枪尾部的膛线比枪口部的深,因而弹丸嵌入枪尾部的膛线以后,在沿枪膛前进时还要再受到越来越浅的膛线的压缩,而同时火药气体从内部使弹丸扩张的力量还在继续起作用。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摩擦,以致常常使坚实的弹头脱离弹丸的其余部分飞出枪口,而中心掏空的底部则牢牢地留在膛线里

面。这个缺点和其他的缺点使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进一步采用米涅式步枪的任何企图。

英国在 1851 年就制造了 28000 枝和法国的步枪相类似的步枪；英国的弹丸略呈圆锥形，尖头，带有一个圆形空心塞，没有凹槽，因为预计弹丸会受到一定的压缩。这种步枪的效果极其不能令人满意，主要是因为弹丸形状不合适。直到 1852 年才进行了新的试验，结果出现了恩菲耳德式步枪和弹丸，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恩菲耳德式步枪不过是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从 1854 年起，它最后代替了不列颠军队中所有的滑膛枪。

在比利时，米涅式步枪稍经改变后，从 1854 年起被用来装备猎兵，后来也用来装备基干部队。

在西班牙，米涅式步枪在 1853 年被用来装备猎兵，后来又装备了基干部队。

在普鲁士，如前所述，常备军在 1855—1856 年临时使用过米涅式步枪，但是后来就完全换成了针发枪。

在德意志诸小邦，都采用了米涅式步枪，只有极少数的例外。

在瑞士，用来装备全体步兵（优秀射手除外）的普雷拉式步枪，不过是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

最后，在俄国，政府正忙于用一种很好的米涅式步枪代替旧式滑膛枪。

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步枪的膛线的数量、深度和缠度以及弹丸的形状，都有细微的差别。在下一节里，我们就要谈到其中最重要的差别。

四

我们扼要地重述一下米涅式步枪的原理。这种枪刻有浅膛线,使用长弹丸,弹丸的直径比枪膛的直径小得多,因此能顺畅地下滑。这种弹丸的底部即贴近火药的一端被掏空。发射时,因爆炸而突然产生的火药气体进入这个掏空部分,压迫掏空部分较薄的壁层,使铅弹扩张,因而使它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线,这样,弹丸就沿着这些旋转的膛线前进,保持了任何线膛枪弹丸都具有的那种旋转运动。这是各种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主要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至于在细部方面,则不同的发明家作了许多不同的改变。

米涅本人采用了塞子。这种塞子是一小块碗状圆铁片,堵在弹丸掏空部分的口上。它应当被火药爆炸的力量更深地推入掏空部分,从而帮助弹丸扩张,使这种扩张更可靠。但是不久就证实这种碗状塞子有很大的缺点:它在弹丸射出枪口时常常脱离弹丸并且乱飞,有时使侧前方不远的自己方面的兵士受到轻伤。此外,它有时还翻转过来塞入弹丸,造成弹丸不规则的扩张,因而使它在飞行时离开瞄准线。当人们知道根本不用任何塞子也能使弹丸扩张时,就进行试验来探索不用塞子的扩张式弹丸的最好形状。首创这种弹丸的,可能是普鲁士上尉奈恩多夫(在1852年)。这种弹丸的掏空部分是圆柱形的,但是在靠近弹丸的底部的地方变宽,成漏斗形。这种弹丸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

是不久就发现，塞子除了使弹丸扩张外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它可以防止在运输时和在使用不注意时损坏空心弹丸的薄壁；而奈恩多夫式弹丸在运输中变了形，所以射击效果非常差。因此，在德意志诸邦的大部分军队中保留了空心铁塞，不过它呈又长又尖的圆锥形，因而能够充分发挥效用，从来不翻转，而且几乎从来没有脱离过铅弹。恩菲耳德式弹丸，如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装有坚硬的木塞。

然而有些国家继续进行了不带塞子的弹丸的试验，并且军队采用了这种弹丸。在比利时、法国、瑞士和巴伐利亚就是这样。所有这些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弹丸空心部分确定一种形状，使它既能防止弹丸损坏，又不妨碍弹丸扩张。所以，这个空心部分有的是钟形（比利时的提梅尔汉斯所发明），有的是三角棱柱形（法国的奈斯勒所发明），并具有十字形截面（达姆斯塔德的普伦尼斯所发明）等等。但是任何不带塞子的扩张式弹丸要把这两个要素——坚固性和扩张性——结合起来，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具有简单的圆柱形空心部分和很牢固的壁层的新式巴伐利亚弹丸（波德维耳斯少校所发明），目前大概是最符合这种要求的。

在那些把旧式滑膛枪刻上膛线用来发射米涅式弹丸的国家中，旧式火枪的口径当然只能是很大的。但是在那些装备着完全新式步枪的军队中，根据我们在前一部分中提到的那些理由，枪的口径大大缩小了。英国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为 14.68 毫米，南德意志诸邦（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步枪的口径为 13.90 毫米。只有法国人给他们的近卫军装备的步枪保留了从前的滑膛枪的口径（17.80 毫米）。

恩菲耳德式步枪是一个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良好榜样。

它的口径很小，因而能够采用长度为直径的两倍而且还不比旧式球形弹丸重的弹丸。它的制作十分精良，几乎比欧洲大陆各国军队所装备的一切步枪都优越。它的弹丸很合比例。虽然有人反对使用木塞，认为木塞可能由于膨胀而使弹丸的直径扩大，或者由于收缩而脱落，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木塞膨胀会使弹丸不便使用，那是在早先就可以发现的；而当木塞收缩时，弹筒能防止它脱落。总的说来，恩菲耳德式步枪取得的效果，是和大陆上最好的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效果大致相等的。

对于这种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恩菲耳德式步枪的意见是：它的口径还可以再小些，这样就能采用更长一些的重量相同的弹丸和更坚固一些的重量相同的枪管；事实证明 5 条膛线比 3 条膛线更好；它的长枪管，至少在枪口部分太不牢固，因此不能作刺刀柄用；弹丸由于没有环形凹槽，在膛内受到的摩擦过大，所以就有使坚实的弹头飞开而环形的空心部分则牢牢地留在膛线内的危险。

改变口径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而不这样做就很难使枪管的枪口部分更加坚固。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见。而所有其他的意见都是无关紧要的。膛线的数目和弹丸的形状在任何时候都不难改变；而且即使像现在这样，恩菲耳德式步枪仍然表明自己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武器。

到此为止，我们仅仅把恩菲耳德式步枪和使用扩张式弹丸的各种步枪作了比较。下次当我们考察目前使用的其他各种枪的构造时，再把它同根据其他原理制造的步枪作比较。

五

1852年英国军械师威金逊先生和奥地利炮兵军官罗伦兹上尉同时但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另一种方法,即利用火药爆炸的力量使自由装进的长弹丸的直径加大,从而使它紧贴膛壁和沿膛线前进。这种方法就是利用火药的爆炸力沿纵方向**压缩**弹丸,而不是使弹丸扩张。

试拿一个有弹性的软球,把它放在桌上,用手猛力往一旁击球,以使球滚动。打击力在使球滚动以前,其第一个效果就是使球变形。不管球的重量怎样小,它都能产生一种抗力,足以使受到打击的一面变为篇平;球体在一个方向上受到压缩,在另一方向上就一定会膨胀;当你把球完全压紧时,球体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形。火药的爆炸力对于罗伦兹和威金逊发明的**压缩式弹丸**的作用,就如同打击力对于弹性球的作用一样。弹丸的重量和 *vis inertiae* (惯力),由于对火药爆炸力产生抗力,使弹丸沿纵方向受到压缩,而沿横方向发生膨胀;发射后的弹丸总是比发射前的弹丸短而粗。

坚实的铅质长弹丸要产生足够的抗力并因而受到足够的压缩以便嵌入膛线,就必须是很重的,也就是说必须是十分细长的。这种弹丸即使是小口径的,在战时也还是显得太重,因为兵士携带通常数量的弹药就会负担过重。为了弥补这个缺点,人们就在弹丸的圆柱体上刻了两道很深的环形凹槽。试拿一个恩菲耳德式弹丸,把它的塞子去掉,用熔化的铅灌满掏空部分,待铅冷却后,在圆

柱体上靠近平直的末端的地方刻上相邻的两道凹槽，而凹槽截成的三个部分照旧固定在同一个坚实的铅轴上。这样，弹丸就由两个头部朝前的很平的截头锥体和一个又重又坚实的弹头组成；它们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弹丸就是压缩式弹丸。沉重的前部，即弹头，对火药的爆炸力产生抗力；受爆炸力推动的后一个截头锥体的前端嵌进前一个截头锥体的底部，前一个截头锥体的前端又嵌进弹头的底部，这样一来，在纵方向上被压缩和变短了的弹丸就将变粗，从而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线。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坚实的弹头是压缩式弹丸最主要的部分。它愈长愈重，它产生的抗力就愈大，因而火药爆炸力的压缩作用就愈可靠。当步枪的口径很小，比方说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还小得多的时候，压缩式弹丸可以不比扩张式弹丸重。但是随着口径增大，弹丸底部的表面，换句话说，直接承受火药爆炸力的作用的表面也会增大；这就是为什么枪的口径很大时，压缩式弹丸就必然太重以致根本无法使用的原因；如果弹丸不那样重，那末当它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压缩时，火药爆炸力就会克服它的抗力而把它抛出膛。因此，大口径滑膛枪能够改成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改成发射压缩式弹丸的步枪。

如果枪的口径小，膛线浅，压缩式弹丸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弹丸重心在前部，是取得低伸弹道的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装填灵便迅速和后座力小这些方面，压缩式弹丸比扩张式弹丸绝对优越。这种弹丸很坚固，搬运时不易损坏，而且耐用；它的形状使它能够冲压而成，而不需要铸造。唯一的缺点是，它要求空隙极小，不超过 0.01 英寸，并且要求枪管的口径和弹丸的大小都非常准确，因为压缩作用显然不能像扩张作用那样，使弹丸向横方向膨胀

得那么多。因此,空隙过大或使用旧式枪管时,弹丸能否受到足够的压缩而嵌入膛线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空隙小并不是一个大障碍,因为很多使用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空隙都不大(例如恩菲耳德式步枪的空隙仅为 0.01 英寸),而且现在制造尺寸很准确的枪管和弹丸都不是什么难事。

奥地利军队的全体步兵都使用压缩式弹丸。它的口径小,为 13.90 毫米,即 0.546 英寸(比恩菲耳德式弹丸小 0.031 英寸);膛内有 4 条很浅的膛线(偶数膛线虽然对于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来说极不合适,但是对于发射压缩式弹丸的步枪来说却比奇数膛线好),膛线每一转长约 6 英尺 6 英寸(和恩菲耳德式步枪几乎相同)。弹丸重约 480 喱(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丸轻 50 喱),装药量为弹丸重量的六分之一(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装药量约为弹丸重量的八分之一)。这种步枪在 1859 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受到了考验,大量的法国兵,特别是军官,都死于它的火力之下,这证明了它的优良性能。它的弹道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道低伸得多,这是由于它使用较大的装药,具有能发射长弹丸的较小的口径,还可能是由于它的弹丸有两道环形凹槽。

萨克森、汉诺威和其他一两个德意志小邦的轻步兵,也采用了发射罗伦兹压缩式弹丸的步枪。

在瑞士,除了我们谈到过的优秀射手使用的步枪以外,还采用了同样口径(10.51 毫米,即 0.413 英寸,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小 0.164 英寸)的使用压缩式弹丸的步枪,这种步枪用来装备各步兵营中的轻装连。弹丸是罗伦兹式的。在弹道低伸度、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这种步枪的效果仅次于我们谈到过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它用旧式塞入法装弹,弹道比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步枪的弹

道都要低伸)。这种步枪使用瑞士压缩式弹丸在 500 码距离上射击时,危险界^① 竟为 130 码!

目前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压缩式弹丸比扩张式弹丸具有更好的效果,因为它的弹道到目前为止肯定是最低伸的。但是还有一点同样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弹道所以能够特别低伸并不是由于压缩原理本身优越,而是由于另外的一些原因,其中主要的是口径小。如果枪的口径同样小,扩张式弹丸也一定能取得像它的优胜的竞赛对手目前所取得的那样低伸的弹道。这一点不久就会清楚的。西南德意志 4 个邦(巴伐利亚等)的步枪,同奥地利步枪的口径相同,因此必要时可以使用奥地利弹丸,反之,奥地利步枪也可以使用它们的弹丸。但是这几个邦在采用同样口径的枪管时,都采用了扩张式弹丸。两种弹丸实际射击结果的登记表对于二者的优劣将是最好的说明。如果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扩张式弹丸的射击效果和它的竞赛对手同样良好,那末它就是更值得采用的一种弹丸,因为:第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更可靠地嵌入膛线;第二,枪管口径相同时它可以做得比压缩式弹丸轻些;第三,一切使用过一定时期的枪管都要发生的扩大,对它的影响小些。

① 危险界是指弹丸飞行高度不超过人的身高(即 6 英尺)的那一段距离。例如,在 500 码的距离上,瞄准 6 英尺高的目标的下端射击时,位于瞄准线上 370 码到 500 码之间的任何 6 英尺高的物体都能受到弹丸的杀伤。换句话说,判断 500 码的距离时可以容许 130 码的误差,但只要瞄准正确,仍然能够命中目标。

六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谈的步枪都是前装枪。然而，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许多种后装火器。后装火炮比前装火炮出现得早。在最古老的军械库中有二三百年的带活动枪尾部的长枪和手枪，它们的装药从枪尾部填放，而不用探条从枪口装填。一个很大的困难总是怎样连接活动的枪尾部和枪管，使它既便于开关，又连结得很牢固，能承受火药爆炸的压力。在技术不够发达的当时，这两个要求不可能兼顾——或者是连结枪尾部和枪管的装置不够坚固耐用，或者是开关的过程非常慢——这是毫不奇怪的。于是后装武器被弃置不用（因为前装的动作要迅速得多），探条占着统治地位，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到了现代，军人和军械师都想设计一种火器，它既能像旧式火枪那样灵便而迅速地装弹，又具有步枪那样的射程和射击精度；这时后装方法自然又受到了重视。只要枪尾部有合适的连结装置，一切困难就都能克服了。直径略大于枪膛直径的弹丸，就可以和装药一起放置在枪尾部，被爆炸力推动前进，在经过枪膛时受到压缩，多余的一层铅挤满膛线，因而不可能有任何空隙。唯一的困难是枪尾部和枪膛的连结方法问题。但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做不到的事情，却不能认为今天也是不能指望的。

假定这个困难被克服了，后装的巨大优越性是很明显的。装弹所需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用不着把探条拔出、转动、再塞回。

第一个动作，打开枪尾部；第二个动作，装子弹；第三个动作，关闭枪尾部。这样一来，在许多决定性场合具有重大意义的散兵速射或者快速连续齐射就有了很大把握，而这是任何前装枪都做不到的。

当兵士在散兵战中在某种遮蔽物后面进行跪射或卧射时，一切前装枪的装弹就困难了。如果他要保持隐蔽，就不能把枪竖直，结果大部分装药在沿枪膛下滑时便会粘在膛壁上；而如果他把枪竖直，那就会暴露自己。他使用后装枪时却可以采取任何姿势装弹，甚至在装弹时可以继续观察敌人，因为他不看着枪便能装弹。在散兵线内，他可以在行进间装弹；在前进中不断进行齐射，而且在接近敌人时，枪经常还是装好子弹的。弹丸可以制造得非常简单，特别坚固，绝不会像压缩式弹丸和扩张式弹丸那样发生不嵌入膛线的现象或者其他的故障。枪的擦拭非常方便。通常最容易发生污垢的部分——药室，即装填火药和弹丸的地方，是完全敞开的；枪管即枪膛两端都是敞开的，很容易察看和擦拭干净。靠近枪尾部的部分必须做得比较重，不然就不能承受火药爆炸的压力，这就使步枪的重心靠近肩部，因而便于稳定地瞄准。

我们看到，唯一的困难是怎样牢固地连结枪尾部。没有疑问，这个困难现在已经完全克服了。近 20 年来出现的后装枪非常多，其中至少有一些，不论在后装设备的效能和牢固程度方面，或是在枪尾部开关的迅速和灵便方面，都满足了一切合理的期望。但是，现在作为军用武器使用的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瑞典和挪威步兵目前使用的枪，它的后装设备相当灵便和坚固。装药利用火帽起燃，机尾和击针都在药室的底部。关于这种枪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没有能够获得任何详细的材料。

第二种是转轮枪。转轮枪和步枪一样，是德国人很早以前发明的。数百年前，有过一种带几个枪管的手枪，枪上有一个转动设备，可以在每次发射之后使下一个枪管对准击发机。美国科耳特上校重新利用了这种办法。他把药室和枪管分开，使所有可以转动的药室共同使用一个枪管，这样就使这种武器成了后装枪。我们的读者大都使用过科耳特式手枪，所以没有必要加以描述；此外，在没有图表的情况下要详细解释复杂的机件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武器的装药利用火帽起燃，比枪膛略粗的球形弹丸在被压入枪膛时嵌入膛线。科耳特的发明传开以后，人们又发明了许多种带有转轮设备的小型武器，但是只有迪恩和亚当斯才真正简化和改进了作为军用武器的转轮枪。然而这种枪还是非常复杂的，在军事上只适宜作手枪使用。但是经过一些改进以后，这种转轮枪将会成为全体骑兵和进行接舷战的水兵的必不可少的武器，同时，它对于炮兵来说也将比任何马枪都有用得更多。事实上在白刃战中它的作用是惊人的；而且不仅美国骑兵装备了转轮枪，不列颠、美国、法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也都采用了转轮枪。

瑞典枪以及转轮枪的装药都是利用普通的火帽从外部起燃的。第三种后装枪，即轰动一时的普鲁士针发枪，完全取消了这种火帽；它的装药是从内部起燃的。

针发枪是普鲁士泽默达的一位非军人德雷泽先生发明的。他在首先发明用撞针突然撞击弹壳内的起爆药而使装药起燃的方法以后，在1835年就设计了带有这种撞针装置的后装枪，从而完成了他的这项发明。普鲁士政府立即收买了这项发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1848年这项发明才被大家知道。在这个期间，普鲁士政府决定一旦爆发战争就用这种武器来装备本国全体步兵，并且开

始大批生产针发枪。现在常备军的全体步兵和大部分的后备军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而全体轻骑兵目前正在装备针发后装马枪。

关于后装机件，我们只能说，它似乎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后装设备中最简单、最方便和最坚固的一种。它已经受过多年的考验，能够发现的唯一缺点是它比较容易磨损，不能像前装枪的固定枪尾那样经受多次的发射。然而，看来这是一切后装设备不可避免的缺点；虽然它需要比旧式武器更频繁一点地更换枪尾部某些零件，但是这决不能有损于它的巨大优越性。

子弹包括弹丸、火药和起爆药，**整个地**装进略宽于线膛部分的药室。用手的简单动作关闭枪尾部，同时使枪成待发状态。但是机尾不露在外面。装药的后面，有一个铁管装着坚固的尖顶的钢针，它依靠螺旋弹簧的力量击发。使枪成待发状态，不过就是使这个弹簧拉向后面，受到压缩，并且保持紧缩状态。扣扳机时，弹簧伸开，立刻推动钢针前进，穿进弹壳，使起爆药立刻爆炸，从而引燃装药。可见，这种枪的装弹和发射只有 5 个动作：打开枪尾部，装子弹，关闭枪尾部，瞄准和击发。使用这种枪在一分钟内可以进行 5 次准确射击，这是毫不奇怪的。

针发枪最初使用的弹丸的形状很不合适，所以弹道很高。不久前这个缺点被成功地克服了。现在的弹丸长得多，形状像去了壳斗的橡实。它的直径比枪膛的直径小得多；它的底部附有一个软金属制成的碗状物，以便使它具有必要的粗度。在枪膛内这个碗状物附在弹丸上面，嵌入膛线，从而使弹丸旋转运动，同时又大大减少了弹丸在枪膛内的摩擦，并且完全消灭了空隙。因此这种枪的射击效果有了很大提高，过去 600 步（500 码）射击时用的表尺，现在可以用来进行 900 步（750 码）的射击；这无疑说明弹道大

大降低了。

没有什么比认为针发枪构造非常复杂的这种观点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了。后装设备和针发机的零件比起普通击发机的零件来,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坚固得多,但是仍然没有人认为在战争或紧急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普通击发机是过于复杂的。此外,分解普通击发机要花很长的时间并且要有各种工具,而针发机的分解结合却只要非常短的时间,并且除了兵士的十个指头以外不需要其他任何工具。唯一的容易折断的零件,就是撞针本身。但是每个兵士都带有一支备用的撞针,可以在不分解击发机的情况下,甚至在战斗中,把它立刻装上。我们还听说德雷泽先生改进了击发机,使撞针在装药起燃后立刻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这样,撞针折断的现象就很少了。

这种现代的普鲁士针发枪的弹道差不多和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弹道相同;它的口径略大于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如果把它的口径缩小到奥地利步枪的口径那样大,或者更进一步,缩小到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的口径那样大,那末没有疑问,除了原有各种显著优点之外,它在射程、射击精度和弹道低伸度方面都可以同这两种武器中的任何一种媲美。后装设备甚至还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加坚固,而枪的重心还可以更加靠近进行瞄准的兵士的肩部。

用射速这样快的武器来装备军队,自然要引起关于这种武器将使战术发生什么变化的许多推论,对于爱好推论的北德意志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关于针发枪可能引起的所谓战术革命,人们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普鲁士的大多数军界人士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使用针发枪进行快速连续齐射的营进行任何冲锋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刺刀也就完全没有用了。如果这种愚蠢的意见占了

上风，那末针发枪就会给普鲁士人带来许多惨痛的失败。幸而意大利战争告诉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现代步枪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锋的营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便利用这次机会告诫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军界的舆论改变了；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到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如果说新式枪将使战术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末这只是重新更多地采用展开横队（只要地形允许），甚至是采用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用以赢得了大多数会战之后几乎被普鲁士步兵完全忘却了的那种横队冲锋。

七

我们概述了欧洲各国军队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步枪，在结束本题目之前，还必须对另一种步枪谈上几句，这种步枪虽然没有被任何军队采用，但是因为它在远距离上具有惊人的射击精度而享有完全应得的声誉。我们指的当然是惠特沃思式步枪。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惠特沃思先生力求在他的火器的构造上采用两条新颖的原理——六角形枪膛和弹丸对膛壁的机械贴合。枪膛不是圆形的，而是从上到下都是六角形的，并且正像从六角形弹丸的表面所看到的那样，膛线的缠角很大。弹丸是硬金属制成的，尽可能紧紧与膛壁贴合，而且不因为火药爆炸的压力而改变形状，因为六个角使它十分准确地沿着旋转的膛线前进。为了防止空隙和使枪膛光滑起见，在火药和弹丸之间放有浸油的圆形布片；当布片随着弹丸向枪口前进时，上面的油被火药爆炸产生的热所溶化。

尽管惠特沃思先生用他的步枪取得了无可否认的优良成绩，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原理比起扩张或压缩弹丸的原理或者后装步枪膛的直径粗的弹丸的原理来，还是逊色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如果发射扩张式弹丸或压缩式弹丸的步枪或者根据普鲁士针发枪的原理设计的步枪制作得和惠特沃思式步枪同样精致，具有同样小的口径，而且其他条件也都相同，那末它们就都会比惠特沃思式步枪优越。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的机械贴合不管怎样准确，

总不可能像弹丸在火药爆炸时和爆炸后改变形状而与膛壁贴合得那么紧。他的使用硬金属弹丸的步枪，有着步枪应当绝对避免的缺点，那就是弹丸和膛壁之间留有空隙和因此而产生漏气现象；甚至溶化的油也不能完全弥合这个空隙，那些经过长期使用后枪管稍微扩大的步枪就更是这样。像这样的机械贴合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度，换句话说，贴合不宜太紧，以便使弹丸能迅速灵便地装进枪膛，甚至在发射几十次以后也能这样。结果六角形弹丸只是轻轻地贴合。尽管关于空隙的大小我们了解得不准确，但是根据不涂油的和包着纸的弹丸能够很容易地装进枪膛这个事实来看，这个空隙可能比恩菲耳德式弹丸的空隙（0.01 英寸）小不了多少（如果小一些的话）。惠特沃思先生在发明这种步枪时，看来有两点主导思想：第一，消除膛线淤塞的一切可能；第二，用预先使弹丸和枪膛的形状相吻合的方法，消除可能妨碍圆柱形弹丸沿着膛线运动的各种意外情况（因为它们妨碍弹丸的扩张或压缩）。铅弹的碎屑淤塞膛线的现象，是所有发射软铅弹的步枪都可能发生的；妨碍弹丸正确地沿膛线前进的意外情况，则是发射压缩式弹丸和扩张式弹丸的枪都可能发生的，但是普鲁士式后装枪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然而这些障碍都没有严重到不可克服的地步，都没有严重到为了避免它们就必须放弃弹丸应当不留任何空隙地通过膛线这条制造步枪的基本原则。

我们这样说，是有一位大权威作后盾的，这就是惠特沃思先生本人。我们知道，惠特沃思先生在他的步枪上面已经放弃了机械贴合的原理，目前大多数人用他的步枪发射的不是硬的坚实的六角形弹丸，而是软的铅质圆柱形弹丸。这种弹丸像恩菲耳德式弹丸一样，底部是掏空的，但是没有塞子；它很长（有一种重 480 喱，

长度为直径的3倍,另有一种重530喱,长度为直径的3.5倍),利用火药的爆炸力嵌入膛线。这样,我们看到,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机械贴合原理完全被扩张原理代替了,而惠特沃思式步枪也完全像恩菲耳德式步枪一样成了米涅式步枪的一个变种。还剩下一个六角形枪膛,但是它对于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究竟适用到什么程度呢?

六角形枪膛当然有六条膛线,而我们知道,对于扩张式弹丸说来偶数膛线不如奇数膛线合乎要求,因为最好不要使两条膛线正对着。大部分发射扩张式弹丸的步枪的膛线都很浅,例如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膛线刚刚能够看得见;而六角形枪膛的里圈(即枪膛本身)直径和外圈(通过六个角构成的圈)直径的差数约为里圈直径的十三分之二,即六分之一弱,换句话说,铅弹必须扩张到将近本身直径的六分之一的程度,才能塞满六角形枪膛的各个角。由此可见,六角形枪膛对于机械贴合的原理说来虽然非常巧妙,但是看来不符合扩张式弹丸的要求。

然而几乎每枝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试验结果都表明,六角形枪膛还是符合这种弹丸的要求的。既然惠特沃思先生放弃了他的原理中的实质部分而现在采用了另一条不适于他的步枪的原理,那末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首先,这是由于他的步枪制作精致。我们都很清楚,在制造小的甚至极小的精密零件方面,惠特沃思先生是没有对手的。不论是他的工具还是他的步枪,就它们的零件的结构来说都是极好的。看看他的步枪上的准星,并且同其他步枪上的准星比一比吧!没有能比得上它的,而对于射程为1000码的步枪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有利条件。

其次，也是主要的一点：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枪膛最小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里圈）的口径是 0.451 英寸，而恩菲耳德式步枪的口径是 0.577 英寸，我们几次提到过的弹道最低伸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的口径则是 0.413 英寸。现在来看一看弹丸形状的差别。重 530 喱的惠特沃思扩张式弹丸，大约比同样重的恩菲耳德式弹丸长八分之三英寸；而前者的长度约为本身直径的 3.5 倍，后者的长度刚刚为本身直径的 2 倍。显然，在重量相同和装药量相同时，细长一些的弹丸比粗短一些的弹丸更容易克服空气的阻力，即取得更低伸的弹道。此外，恩菲耳德式步枪的装药量为 68 喱，而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装药量为 60、70 和 80 喱，但是使用惠特沃思式步枪的优秀射手告诉我们，要使弹丸扩张到足够程度和在远距离上取得良好的射击效果，就需要用 80 喱的装药。可见，惠特沃思式步枪使用的装药比恩菲耳德式步枪使用的装药要多六分之一，而且惠特沃思式步枪的装药的效力应当更大（即使装药量相同），因为它是在较小的空间爆炸，并且是对小得多的弹丸底部面积发生作用的。

因此，我们从这里又找到了一个例子，说明能够发射细长的尖头弹丸的小口径枪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不论哪一位读者，只要注意过我们对各种步枪的优点的考察，早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弹丸的形状比枪或弹丸本身的构造原理重要得多；为了有形状最合适的、便于兵士携带的弹丸，就必须采用小口径的枪膛。这就是惠特沃思式步枪使我们重温的教训。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采用小的口径时，弹丸的又长又重的尖头能够产生足够的抗力，使弹丸的空心底部不需要塞子的帮助就扩张到应有的程度。惠特沃思式弹丸的底部仅有一个

浅浅的凹部,并没有塞子。它应当扩张的幅度,至少是其他扩张式弹丸扩张幅度的3倍;但是如果装有重80喱的火药(这种枪能承受这一装药而不致产生很大的后座力),它仍然能够完全按着要求嵌入膛线。

惠特沃思式步枪是否会成为军用武器,我们非常怀疑;的确,我们认为六角形枪膛很快会完全停止使用。如果志愿兵从实践中相信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射击性能比目前的恩菲耳德式步枪优越,因而建议装备惠特沃思式步枪,那末他们无疑走向了一个极端。我们认为,这两种武器是根本不能比较的。惠特沃思式步枪是一种奢侈的武器,造价至少比恩菲耳德式步枪贵一倍。就它目前的情况来说,它是一种非常精致的武器,不宜发给每个兵士;比方说,只要去掉它的精致的瞄准器而换上一个粗糙的瞄准器,它在远距离射击时的精度就会大大降低。如果用惠特沃思式步枪装备军队和志愿兵,那就必须采取两项措施中的一项:或者是使目前装备的小型武器保持现在的口径,那末与恩菲耳德式步枪口径相同的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效果就会比现在的惠特沃思式步枪的效果差很多;或者是把口径缩小,譬如说缩小到和现在的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口径一样大,那时口径缩小后的恩菲耳德式步枪,假定造价和惠特沃思式步枪造价相同,那末就很可能收到一样好甚至更好的效果。

八

最后，我们扼要地列举一下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步枪以及这种武器的可以说是已经确立了的各种原理。

步枪的类型如下：

1、塞入式，就是用探条猛力冲打，使紧贴膛壁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塞入枪膛。这是使弹丸嵌入膛线的最老的一种方法。现在几乎到处都不把它作为军用武器来用了。主要的和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是瑞士优秀射手的新式步枪，它的口径很小，使用尖头长弹丸，它的弹道是目前所有步枪中最低伸的。这种武器不是用来装备大量步兵，而只是用来装备精选的部队，同时需要细心装填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正是它不同于所有各种枪的地方。

2、压扁式，就是使顺畅地滑进枪膛的弹丸抵在枪尾底部的某一机件（德尔文式步枪是狭窄的药室的边缘，图温南式步枪则是药室中央的钢心杆）上面，用压扁的方法使它嵌入膛线。这种方法曾一度普遍使用，现在正在或多或少地被其他方法代替。同时还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时枪的口径必须相当大，否则药室就会太窄。

3、扩张式，就是使底部掏空的长弹丸顺畅地装进枪膛，装药爆炸时产生的气体进入弹丸的掏空部分，使它扩张，从而使弹丸紧贴膛壁和嵌入膛线。这种方法目前得到了普遍使用，而且还可以作很大的改进，例如不久前惠特沃思先生把扩张的原理应用到他的

枪上以后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4、压缩式，与扩张式的作用相同，就是在弹丸上刻几道很深的环形凹槽，使火药爆炸的力量能够在沉重的弹丸头部的抗力下，向纵方向压缩弹丸，从而使弹丸的直径得到应有的增大。这种方法虽然不如扩张的方法可靠，但是由于口径小而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例如在奥地利和瑞士）。然而用上面提到的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发射压缩式弹丸，并不能取得同它发射紧塞枪膛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时一样好的效果。

5、后装式，这种装弹和发射方法本身就比其他各种步枪优越，同时又能够最有把握地使弹丸嵌入膛线，因为药室和弹丸都比枪膛其余部分略粗一些，这样，弹丸不被压入膛线，就不可能进入枪膛。看来这种枪一定会逐渐代替所有其他类型的枪。

我们没有把惠特沃思先生的弹丸的机械贴合方法包括进来，因为这种方法至少在小型武器中不再使用了。因此，我们只准备谈上述几种枪。如果根据各种枪的优劣分类，那末我们应当说，后装的针发枪是最好的；其次是使用扩张式弹丸的枪；再其次是使用压缩式弹丸的枪。而头两种枪可以说是已不再使用了；因为即使是塞入式装弹法目前在瑞士在口径相同的情况下比压缩式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我们仍然完全不想在未作十分周密的研究以前把这点归功于**装弹法本身**，何况瑞士步枪的包着浸油丸衣的弹丸被公认为是不适于步兵普遍使用的。

同时我们看到，自从出现长弹丸以来，枪或弹丸的构造本身对于保证远射程、低伸弹道和射击精度来说，只是次要的问题。当弹丸还是球形的时候，膛线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那时所有的弹丸遇到的空气阻力几乎相同，膛线的缠角较大、膛线较深或较多等情况

所发生的影响比现在大得多。但是出现长弹丸以后就产生了新的因素。弹丸可以做得较长一些或者较短一些，而且长短相差很大，于是全部问题就在于，什么形状的弹丸最有利。从理论上考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以相同的初速发射重量相同的两粒铅弹，细长的弹丸比粗短的弹丸更能保持这个速度，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枪膛使弹丸旋转以防止弹丸在飞行时翻滚。空气的阻力是一种阻滞的力量，它使火药爆炸力所赋予弹丸的初速逐渐降低，从而使它产生愈来愈大的重力，也就是对它起更大的阻滞作用。初速取决于装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武器的构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不变的；重力也是固定的，而且是一个已知数；这样只有弹丸的形状可以改变，可以使弹丸更适于飞行而只遇到最小的空气阻力；而为了减少空气的阻力，我们说过，细长的弹丸比重量相同的粗短的弹丸要合适得多。

最后，军用弹丸的最大重量也是一个已知数。兵士除了武器和装具外至少应当能携带 60 发子弹。因此要在这种一定重量（例如 530 喱）的条件下制造形状最合适的铅弹，就必须使它变长变细，换句话说，必须缩小步枪的口径。在一定程度上，这对于一切枪都是适用的。请看重 530 喱的恩菲耳德式弹丸和同样重的惠特沃思式弹丸；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惠特沃思式弹丸具有低伸得多的弹道（也就是更好更多地保持初速），并且因而容易命中 1000 码距离上的目标，而恩菲耳德式弹丸在这样的距离上却是不可靠的。但是这两种弹丸都是扩张式的，而惠特沃思式弹丸的构造肯定并不是扩张式弹丸中最好的一种。或者请看瑞士优秀射手的步枪，它的口径比惠特沃思式步枪的口径还小，而且不管它的弹丸是包着浸油丸衣并靠着探条塞入枪膛的也好，还是非常顺畅地

进入枪膛并受到火药爆炸力的压缩的也好，都取得了更好的射击效果和更低伸的弹道。或者拿一支普鲁士针发枪，使它的弹丸变细变长，利用碗状托底或垫塞装进宽大的枪膛，用原来射击 600 码的表尺，现在可以射到 900 码。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肯定一个事实：不管步枪的构造原理怎样，它们的射击效果一般地说是同它们的口径成反比的。口径愈小，步枪就愈好，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就用这些意见结束这个对于我们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是相当枯燥无味的课题。但是这是很重要的课题。每一个自觉的兵士都应当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能。我们试图在这里阐明的一切，想必是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的军士都懂得的；当然，大多数的志愿兵，作为“国家的智慧”来说，也应当通晓自己的火器。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0 月底—
1861 年 1 月上半月
载于 1860 年 11 月 3 日和 17 日，12
月 8、15 和 29 日，1861 年 1 月 5、12
和 19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和 9、11、14、15、17、18、19 和 20 期及
“志愿兵读物”1861 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校对过

卡·马克思

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

1860年11月10日于伦敦

老早就预言过的金块外流和贴现率随之上涨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昨天,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4%提高到4.5%。在1859年同月,银行的贴现率没有超过3%,虽说那时曾有价值13234305英镑的大量白银运往东方。银行的明显目的,是阻止黄金从自己的地下室外流,截至9月26日为止,黄金储备总数量16255951英镑,现在缩减到13897085英镑(昨天从银行提出的43000英镑不算)。从9月26日起,外流量就不断增加,本星期已增加到将近30万英镑。粮食的大量进口,当然迟早要使贵金属输出,但因偿付粮食的期票还未到期,所以目前的外流还不能用这一点来说明,而且,除此以外,它正发生在伦敦的贴现率高于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汉堡的时候,与此同时,作为交易所业务的黄金输出,并不提供任何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究竟流入哪里?流入法兰西银行的地下室。法兰西银行的贴现率现在还只是3%,虽然从8月底起,这个企业已损失了400万英镑左右,然而它的贴现业务在8、9两月几乎增加了300万英镑。任何一个普通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提高贴现率,但路易·波拿巴由于害怕引起金融市场明显的混乱,就

命令银行亏本购储黄金,并且毫无疑问将来还会迫使它继续这种在商业上不合算的业务。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证明了,它不能够用提高利率的方法制止现在正在发生的外流。例如在昨天,从银行的发行部中完全没有提出金块,可是银行部却被抽走大量的金镑。1844年和1845年公布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臭名远扬的银行法¹²⁴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商界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贵金属输出的实际数量,因为银行部不公布任何关于从它的柜子里提走的金镑的报告。

英格兰银行的官方贴现率的上涨(特别是,如果继续上涨的话),当然会迫使法兰西银行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样一来,就会阻止路易·波拿巴像过去那样为了使金融市场的紊乱不明显化,命令银行经理亏本购储黄金。但是,这种被迫的措施将不能制止黄金从英国外流,因为粮款期票将按时到期,这是要用现金支付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1月10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0年1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111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 和活动范围

志愿兵部队拥有相当数量的步兵和炮兵,已经有一个时候了,它也已经拥有编制不大的骑兵;现在,正逐渐建立最后一个兵种——工兵。关于志愿兵工兵的问题,目前正在非常广泛地讨论着,这个问题是完全值得这样注意的。皇家工兵在宗主国和殖民地担负了许许多多任务,它的力量已经不够用了。一旦发生战争或预计中的入侵,又将怎么办呢?那时,目前正在修建的许多工事(即各港口周围修建的大规模的筑垒兵营),将需要相当数量的工兵官兵来驻防;而作战部队由于补充了志愿兵,比现有数额增加一两倍,也将需要补充某些工兵,才能取得对敌的行动自由。如果不大大增加皇家工兵的人数,那末这一兵种的任务就一定完成得不好,不然的话,那就要由事先训练好的志愿兵来完成了。

战时应当配属给作战部队的工兵数量,归根到底并不很大;每个由两个师(16—24个具有相应数量的骑兵和炮兵的步兵营)组成的军,配属3个或4个工兵连,就完全够用了。假定,陆军在战时拥有4万基干部队、2万民军和10万志愿兵,总共16万人,或200个营,共合8—10个军,那末,这就需要约30个工兵连。假定皇家工兵提供10个工兵连,那末还有20个连就得由志愿兵提供。在防

卫港口工事方面，也需要大致同样数目的志愿兵工兵来协助皇家部队；由此可见，在现有人数的志愿兵步兵和炮兵之外，再建立约有 40 个志愿兵工兵连就够了。如果志愿兵人数增长到战时可提供 10 万人以上（扣除警备部队之后），那末每 100 名额外猎兵增加 1 名工兵就够了，即每个由 2 万人组成的军将配备 200 名工兵（或 3 个连）。

所以，现在建立一支最高限额为 40 个连或约 3000 人的工兵部队，是合适的。但是，为了使他们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工兵，还要作很多努力。我们现在就已看到，志愿兵炮兵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用到连、营手持马枪的队列教练上了，虽然所有这些训练都仅仅是为了检阅，并且不会对他们的作战勤务带来任何好处，无论是在掌握野炮方面，或是防守工事方面。我们也担心工兵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们首先应该记住：除了培养他们的军人姿态，教会他们迅速准确地服从命令，并且使他们的分列式走得很好所必需的时间以外，花在连队列训练上的每一个钟头都是一种浪费；他们应该学习完全另外一种东西，他们的战斗力正是取决于此，而不是取决于走得稳妥的分列式。他们——兵士也好，军官也好——必须熟悉野战筑城和永备筑城的原理；他们应该实习修建堑壕和炮台，筑路和修路。如果物质条件具备，他们应该建筑军用桥梁，甚至挖掘地道。在这些科目中，有一些恐怕只能学点理论，因为在英国，要塞和浮桥都极少，而且决不能设想每个志愿兵都可以到朴次茅斯或查塔姆去学习筑城或参加架设浮桥。但是，也有些工程学科目是每个连队都能够实习的。如果在曼彻斯特这里编成一个工兵连，我们就能够给这些工兵指出许多条战时行军纵队必须通过的很坏的乡村道路，而且，与这些小路有关的人们只能非

常乐意让工兵在这里实习筑路。这些工兵要找一块地段来建筑少数野战工事、挖掘堑壕和修建炮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特别是因为，这样的地段将使志愿兵炮兵和步兵有可能来实习那些不实习就无法学习的军事勤务。他们甚至可以找到地方，随时架设一座不大的支柱桥来穿过我们地区的某条高岸河流，而每条这样的河流的河底都是水底硬地，这就给架设这样的桥梁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这样的作业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作业，应该成为工兵实习的主要内容；连的队列教练应该在开头就迅速完成，只有在部队相当熟悉了工兵的真正业务以后才再搞队列教练；这时，在第二个冬季，就可以很好地利用晚间进行队列教练。但是，如果工兵一开始就抱定目的要同步兵比步兵法操练和营的队形变换，从而削弱自己的专业训练，如果让工兵军官去较多地注意完成步兵军官的任务而较少注意专业训练，那末，志愿兵工兵就会认为，在战争时期，他们将被用作步兵，而被用作工兵の場合要少得多了。

找有资格的军官并不难，如果从唯一适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当中即非军人工程师当中挑选的话。学习几个月的理论，去查塔姆、朴次茅斯或阿尔德肖特旅行几次，很快就会使他们熟悉军事工程学的大多数科目，他们的连队的军事教育也将继续使他们得到训练。他们从教别人当中去学习。他们的本行迫使他们去了解军事工程学的一切原理；既然他们一定是非常容易领会问题和有知识的人，那末，要他们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军事问题上就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在“陆海军报”上读过一篇文章，文章谈到一种极大的军事工程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包括国家的全部铁路线，并且一旦敌人入侵，应该带来巨大的成果。计划要点曾在上周的“志愿兵杂志”

上转载。这个计划是以一种非常含糊的形式公诸舆论的；暂时我们还看不到这个计划的极大的好处，所以只是觉得，它把两个迥然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了。无疑，研究王国每一条铁路线的战略意义，以及研究整个铁路网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十分重要，所以如果这一点不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到，如果在总司令部的档案库里和各区司令官的档案库里现在不是存放着大批体现了这项研究成果的文献，那末，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大漏洞了。但这是司令部的任务，而不是工兵的任务。至于把每条铁路线上的司机、司炉、铺轨工和挖土工组成工兵部队，我们看不出这有多大好处。这些人可以说已经有了军事组织，他们的纪律比全国任何一支志愿兵部队更严。希望他们作为志愿兵工兵去做的事，以他们现在的能力也完全能够完成。既然在战争时期比现在更有必要把他们留在他们现在所呆的地方，教他们军事工程学的专门科目就毫无益处了。

这些意见是针对计划已经公布过的部分提出的，如果将来在计划中还有一些别的内容，我们当然有权利再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我们仍然要再指出一个优越条件，这个条件是国内有许多有素养的工程师而产生的。大多数部队，除拥有工兵和地道爆破兵的军官以外，还拥有一批不属连队编制而担任专门职务的工兵军官。为什么不使英国的非军人工程师有可能自修这种勤务呢？非军人工程师学校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要开几门军事工程学的课，和一门同工兵连一齐进行的短期实习课，就可以达到全部要求了；考试严格限于军事科目，而且只考绝对必需的东西，可以用这样的考试作为主要的考查，以决定接收不在部队编制的志愿兵工程师加入军官队伍；当然，政府应该有权取消不适合的应

试者的资格。这样的军官可以作很多事情,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恰恰都取决于军官的学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指挥若干志愿兵步兵或炮兵,可以更好地执行某些工兵的任务,比带有一两个基干步兵班专为完成同样任务的正规军工兵军官们执行得更有成效。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1 月底
载于 1860 年 11 月 24 日和 12 月
1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第 12 期和第 13 期及“志愿兵读
物”1861 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
杂志”校对过

弗·恩格斯 奥地利革命的发展

1860年12月24日于伦敦

奥地利的革命正在急剧发展。总共只两个月之前，弗兰茨—约瑟夫在其10月20日的恩诏¹²⁵中承认，他的帝国处于革命状态；为了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他许诺打折扣恢复匈牙利古宪法^①，企图以此来收买匈牙利。虽然恩诏也是对革命运动的让步，但是就其意图来说，则是背信政策的圆滑手段之一，这样的手段正是奥地利外交的特色。用以收买匈牙利的让步，从外表看来，特别是同对德意志各省和斯拉夫各省的微不足道的施舍、同恩诏中所拟定的成立帝国议会的丑剧比较起来，显得非常巨大。但是，只要更仔细地阅读一下这个文件，它的背信性质就显得十分清楚，巧妙的手法就变成了透顶的荒唐，变成政府对革命运动无计可施和无力应付的证据。问题不仅在于，要剥夺匈牙利议会拨款和军队定额的决定权，并把它们交给中央议会，甚至部分地交给皇帝本人，——仿佛这个在最近十年中不得不忍受接受二连三的政治打击的政府，还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些权利从实际夺得者那里再夺来之后，保持在自己手里似的，——而且，对照一下给予帝国其他部分

^① 见本卷注120。——译者注

和中央代议机关的那些权利,看看这些权利是如何微不足道和不明确,整个意图的虚伪性便立刻暴露无遗。而当为施梯里亚、克伦地亚、萨尔茨堡和提罗耳等省制定的宪法——这些宪法把代议机关中的绝大部分席位轮予了贵族和僧侣并保留了旧等级差别——公布出来的时候,当旧内阁仍然掌握着政权的时候,这一切策划的目的何在,已再无任何疑问。这是打算安抚匈牙利,然后把它变为帮助专制的奥地利摆脱困境的工具;而匈牙利在奥地利重新强大以后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它根据经验,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无限制和无条件地承认匈牙利语是匈牙利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事实本身,也完全是用来鼓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反对马扎尔民族的。因此,同皇帝做了这笔交易的匈牙利的旧保守派(vulgo(换言之)贵族)就失去了自己家中的一切支柱;他们已决定用议会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利来换取这些。实际上,皇帝的恩诏没有骗住任何人。各德意志省的舆论立即迫使旧的市议会(革命后皇帝所任命的)为目前人民投票选举的新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而匈牙利人则开始恢复自己的旧的各州官员和1849年之前代表国内所有地方政权的州议会¹²⁶。不管怎样,反对党立即掌握地方的和城镇的管理机关,而限于要求暂时换一换内阁,并且不放弃占领那些在较小的活动范围中间向他们开放的重要阵地,这些都是良好的预兆。在匈牙利,1848年改组过的古老的地方管理机构立即把民政权力交到了人民手中,并且要维也纳政府作二者之一的选择:要末让步,要末马上诉诸武力。因此,这里的运动就自然发展得特别迅速。现在全国都纷纷要求完全恢复1848年修改过的宪法,恢复那时议会和国王达成了协议的所有法律。此外,还要求立即废除烟草垄断(1848年后非法实行的)和所有其他未经

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法律。在议会尚未核准以前所征收的捐税被公开宣布为非法；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应纳捐税没有交付。劝说应召服役的青年反抗或逃避征兵；扯掉帝国的鹰徽；最糟的则是，在这一过渡时期，政府已无力与掀起的风潮作斗争。凡是召开了州议会的地方，州议会都一致支持这些要求；而在匈牙利大主教主持下于赫兰召开的、目的是向政府提出议会选举基本原则的匈牙利名士代表大会，几乎未经讨论就一致同意宣布1848年的民主选举法仍然有效。

这是旧保守派与皇帝妥协时所未有料到的。他们完全被《débordés》（“冲倒”）。他们有被革命浪潮淹死的危险。政府也了解到必须想个办法才好。但是，维也纳内阁能有什么办法呢？

收买匈牙利的试图已处于完全破产的前夕。如果内阁现在另作尝试去收买德意志人怎么样呢？德意志人从来没有享受过匈牙利人那样的权利，用较少的东西可能就会使他们满足。为了生存，奥地利皇朝是必须挨次地挑拨它统治下的各民族相互反对的。斯拉夫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发动，因为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把他们同俄国联系得太紧密了。总之，就是说，应当利用德意志人。果鲁霍夫斯基伯爵，这个万民痛恨的波兰贵族（背叛波兰事业而投效奥地利的叛徒）作了牺牲品，骑士冯·施梅林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是1848年昙花一现的德意志帝国的大臣，后来是奥地利大臣；1849年的宪法被彻底废除时，他离开了这个职位。他被公认为立宪主义者。但这一次又是在表现了大大的动摇和犹豫之后，最终才邀他来担任这一职位的，以致又丧失了效果。人们问，如果所有其他的大臣仍然高踞原位，施梅林能有什么作为呢？还在他得到最终的任命之前，所有希望就已开始消逝了，所以，对他的任命并不是真诚的让步，而只是无力应付的一个新证明而已。

但是,当各德意志省的反对派满足于获得地方政权,并且怀着公然的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态度对待政府的每一个步骤的时候,匈牙利的运动却继续发展着。还在任命施梅林之前,被扶上台的以塞钦和瓦伊为首的匈牙利旧保守派就已承认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于是帝国政府不得不十分忍气吞声地去邀请 1848 年的两位匈牙利大臣——在 1848 年秋天以前,他们是被枪决的鲍蒂扬尼以及科苏特和瑟美列的同事,——即邀请德亚克和埃特韦什,来参加那个曾经借俄国之助镇压了匈牙利的人所领导的政府。他们还没有被任命;犹豫动摇和争吵小事的气氛仍然十分的浓厚,不过,只要他们接受邀请,最终一定会被任命的。

由此可见,弗兰茨-约瑟夫已被迫接连做出了让步,如果两个议会在 1 月间能够召开——一个是在佩斯为匈牙利及其各区召开的议会,一个是在维也纳为帝国其他各省召开的议会,那末,还将从皇帝那里夺得新的让步。但是每个新的让步不仅不能安抚皇帝的臣民,反而会由于它那无法掩盖的虚伪性而愈来愈使他们愤怒。如果这里再加上回忆往事,——这是靠路易-拿破仑津贴为生的匈牙利流亡者的手法,——再加上奥地利的对外政策将永远是反动的,这种对外政策马上便会成为王室和议会冲突的源泉,因之不可能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奥地利,而路易-拿破仑又利用这一点进行投机,那就十分可能,1861 年将是奥地利帝国瓦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的一年。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2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1 年 1 月 12 日“纽约每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论坛报”第 6152 号

弗·恩格斯 德国的运动

看来,随 1861 年而来的震荡还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美国发生脱离派叛乱¹²⁷,中国发生起义^①,俄国向东亚和中亚细亚推进;我们碰到东方问题及其自然产物——法国占领叙利亚和苏伊士运河;我们眼看着奥地利在崩溃,匈牙利处于公开起义的前夕,加埃塔被围,并且听到了加里波第要在 3 月 1 日解放威尼斯的诺言;最后然而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是,有人正企图使麦克马洪元帅在爱尔兰复登其祖先的王位¹²⁸。不过,所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目前我们看到,除此之外,即将发生第四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

1851 年丹麦国王^②在什列斯维希问题上曾自愿地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承担某些义务¹²⁹。他答应,公国将不被合并于丹麦;它的议会将与丹麦的议会分立;两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和丹麦民族将在什列斯维希享受同等权利。此外,对霍尔施坦议会的权利作了专门的保证。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占领霍尔施坦的联军撤了回去。

丹麦政府千方百计地规避履行自己的诺言。在什列斯维希南半部,一切纯粹是德意志的;在北半部,所有城市都是德意志的,但农村居民讲的则是已经面目全非的丹麦方言;自远古以来德语几

① 指太平天国革命。——译者注

②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乎到处是标准语。在居民的赞同之下发生了德意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因此,除了极北的边界地区的居民之外,甚至那一部分讲丹麦方言的农民(这种丹麦方言与标准丹麦语如此不同,以致南部的德意志居民都很容易听懂),也都认为德意志南部的标准语比丹麦的标准语更容易懂。1851年以后,政府把这一块边区划分为丹麦区、德意志区和混合区。在德意志区,德语被宣布为政府机关、法庭、教会和学校的唯一的官方语言,在丹麦区则是丹麦语。在混合区承认两种语言具有同等的权利。表面上看来这很公正,但实际上,在设立丹麦区时,丹麦标准语是强加给居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甚至听不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行政、诉讼、教育、洗礼和嫁娶都用德语。但是,政府为了根除区内德意志化的所有痕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十字军征讨,甚至禁止家庭中采用任何其他语言进行私人教学,只能采用丹麦语;同时,它又采取间接的办法,力求在混合区内使丹麦语占优先地位。这些措施所引起的反抗非常强烈,因而曾经试图借助一系列烦琐苛刻的政令加以镇压。例如,在埃克恩弗尔德这个不大的城市中,凡向议会非法递交呈文即作犯罪论,立即处以4000塔勒以上的罚金;所有被罚款者作为罪犯被剥夺选举权。但是,居民和议会过去和现在一直进行着反抗。

在霍尔施坦,由于丹麦政府不作政治性质的或民族性质的让步,所以就无法使议会核准任何捐税。政府是不愿意让步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使自己失去公国的收入。因此,为了制造一些多少合法的根据向公国的居民征税,政府就召集了一个王国会议——这个会议没有任何代议制的性质,但却被派作代表丹麦本土、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的用房。这个会议,尽管霍尔施坦人拒绝参加,还是来核准通行于整个王国的税收,而且,政府

还根据这个会议的决定，规定了霍尔施坦的税率。这样一来，本应成为独立自主的公国的霍尔施坦，就丧失了任何政治独立，从属于丹麦人所把持的会议了。

根据这些事实，德国报刊在近五、六年间不断呼吁德国各邦政府对丹麦采取强制性措施。事实本身确实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德国报刊——在1849年后的反动时期内被准许存在的报刊——只是利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的确，如果那些在自己家中力求在施行烦琐的苛政方面超过丹麦的德国各邦政府允许的话，一场反对丹麦人的义愤是很容易激发起来的。当克里木战争爆发时，对丹麦作战曾经成为流行的口号。当路易—拿破仑进入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时，对丹麦作战的要求又重新提出。现在，看来终于要完全达到这个目的了。普鲁士“新纪元”¹³⁰的代表者，以前听到自由派报刊的呼吁时是那么羞涩不答，这时也同后者完全一致了。新即位的普鲁士国王向全世界宣布，他一定要解决这个老争端；老朽的法兰克福议会也开动起自己的全部笨重机器，要来拯救德意志民族。而自由派报刊怎样了呢？欢庆胜利吗？完全不是！在此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自由派的报刊却一反前言，大叫：当心！它发现，德国没有舰队可以用来反抗一个海上强国的舰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它作出种种胆怯的表示。几个月之前被说成是刻不容缓的爱国职责的东西，现在突然被描绘为奥地利的阴谋，普鲁士不要参加进去。

德国各邦政府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所表现的出乎意料的热情，是极不真诚的，这一点当然用不着怀疑。正如丹麦的“日报”¹³¹所说的：

“我们都知道，德国各邦政府的老办法之一就是：每当它们感到需要一些

名声时，就搬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并激发反丹麦的狂热以掩盖本身的种种罪恶。”

毫无疑问，萨克森正是这样，普鲁士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在普鲁士，这个问题的突然提出显然还意味着与奥地利联盟。普鲁士政府看到，奥地利从内部瓦解着，而与意大利的战争则从外部威胁着它。当然，眼看着奥地利被消灭，是不符合普鲁士政府的利益的。同时意大利战争，路易—拿破仑不会长久地袖手旁观，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不见得不会触动德意志联邦的领土，因此，普鲁士是一定要干涉的。这样，就一定会既同法国在莱茵河上作战，又同丹麦在埃德尔河上作战；既然普鲁士政府受不了让奥地利被击败，那末又何必等到奥地利再吃一次败仗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去干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冲突，从而使不会为保卫威尼斯而战的整个北德意志都来关心战争呢？如果普鲁士政府的思想的程序是这样，那就相当合乎逻辑了，不过，在 1859 年，即还在奥地利被马振塔利索尔费里诺之败以及内部震荡削弱之前，这样想也是同样合乎逻辑的。究竟为什么那时的普鲁士不按照这样的想法去行动呢？

这次大战是否将在今年春天发生，还说不一定。但是，这次战争如果发生（虽然哪一方都不值得同情），结果一定要发生革命，不管哪一方失败都一样。如果路易—拿破仑被战胜，他的王位必然垮掉；如果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败北，他们就不得不在德国革命面前退却。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1 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 1861 年 2 月 1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17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法国的武装力量¹³²

根据“哥达年鉴”¹³³ (它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能找到的最大权威) 的资料, 1860—1861 年法国军队的战时编制如下:

1、步兵: 近卫军——12 个掷弹兵营, 16 个轻骑步兵营, 2 个朱阿夫营, 1 个猎兵营, 共计 31 个营。基干部队——103 个团, 每团 4 个营, 共计 412 个营; 3 个朱阿夫团, 外籍军团 2 个团, 3 个土尔科 (或土著阿尔及利亚猎兵) 团, 每团 3 个营, 共计 24 个营; 猎兵——20 个营; 3 个捷菲尔或非洲 (惩戒) 轻步兵营, 巴黎市 pompiers (消防队)——1 个营。	
共计 491 个营, 或在战时	515037 人
2、骑兵: 近卫军——6 个团, 或 37 个骑兵连;	
基干部队——58 个团, 或 358 个骑兵连, 共计 395 个骑兵连	100221 人
3、炮兵: 22 个团——227 个炮兵连 (其中 146 个 6 门火炮的炮兵连——876 门火炮——组成野战炮兵)	66007 人
4、工兵	15443 人
5、后方勤务: 卫生部队和军需部门	24561 人
6、宪兵队	24172 人
7、司令部、残废兵、军事学校及其他	17324 人
共 计	762765 人

战时编制就是这样。平时编制如下：

步兵	255248 人
骑兵	61023 人
炮兵	39023 人
工兵	7467 人
后方勤务等等	11489 人
宪兵、残废兵等等	41496 人
共 计	415746 人

1859年1月，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不久，在“立宪主义者报”上曾公布了法国军队正式条例，根据这个条例，战时编制为568000人，平时编制为433000人。试问，在两年当中，在平时编制实际缩减的情况下，把战时编制增加了20万人，这是怎样才办到的呢？

军队每年能有的适合服兵役的青年总数，像以前一样，约16万人。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他们当中实际上征召了4—6万人；要使军队人数保持以前的水平，当时认为这已够用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有伤亡。后来就征召8万人，甚至征召10万人和10万人以上。意味着和平的帝国¹³⁴，比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所需要的炮灰却要多一倍。服役期限定为7年，但是即使假定在最近时期每年征召10万人（这超过平均数），7年内也只有70万人。如果从这里除去由于各次远征和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损失，所剩就未必有60万人了。下余163000人从何而来呢？

法国皇帝最近的指令中有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原来由3个营（每营8个连）编成的各团，开始用4个营（每营6个连）编成。这样，在团的内部用简单的重新分配24个连

的办法就把 3 个营变成了 4 个营。营的人数有自己的最高限额。如果营超过 1000 人,它的人数就太多了,一个人的口令指挥不了,而且也太笨重了,不能迅速地机动。而连的人数则可以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改变:连可以有 100 人,也可以有 250 人,——这取决于选择,而不决定于必要。用上述方法以同样数目的军官和军士建立第四营,一旦有了人就能把团从 3000 人扩大到 4000 人。在战争时期,各团是以 3 个战斗营编成的,第四营组成后备部队——补充队。因此,100 个基干团的这些第四营,可以再编 10 万人到军队里来,即骨干人员人数不变而服役者多出 10 万人。战后,第四营曾经解散,但是不久以前它们又重新恢复了。另外还编成了 3 个步兵团(第一〇一、第一〇二和第一〇三),这就有可能再编 17000 人到军队里来。这些新编部队是 112000 人,所差的 51000 人可能是军队在 1859 年 1 月间由于过去的损失而较战时满额编制所减少的数字。这表明,现在单单法国步兵所拥有的骨干,就足够把我们上面谈的那么多的人组织起来,不必再新编部队。但是从哪里找人来使这些骨干人员都有兵可带呢?

最近 7 年来军队虽然定期征兵,也还有 55—60 万人是没有应征的。每年属于征召范围的实际总人数约 16 万人。每年征召的名额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比这个数字少 5 万人,而在必要时,还有一批最近 6 年期间由于征兵时抽到免役号码而得以完全免服兵役的年轻人可用。他们可能至少约有 30 万人,但是由于这些人长期以来习惯于认为自己永远免服兵役了,由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结了婚,一部分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很难找到他们,他们应征入伍,不会得到居民的赞同,而且也是难以实现的。

路易·拿破仑究竟从哪里补充他的这个人员差额呢?用实行

变相的普鲁士预备兵制度的办法。从每年能够征召的 16 万人当中，一部分，譬如说一半，用来补充常备军的空额。其余的编入预备兵的名册里，编成部队，第一年训练两个月，第二年和第三年各训练一个月。他们仍然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在 7 年内是可以被征召的，像在基干部队中服过役的人一样。其次，我们有根据推测，如果军医检查身体不太严格（战时他们常常是很宽很宽的），那末每年适合服兵役的 16 万人总数，稍加一把劲儿就会达到 20 万人；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如果每年总数等于 16 万，那末在 7 年期间军队就有 1112000 人，扣除一个整数的损失，还有 100 万兵士。这样，我们看到，由于不久以前实行的新的预备兵制度，路易一拿破仑的部队几年以后将超过现有部队准备接收的兵士数目。而这种情况也已被预料到了。将来团的所有 4 个营都应该成为战斗营；现在正以教导营的名称编着第五营，借口是要训练被编入预备兵的兵士。这个新的编制保证有可能再编入 103000 人，因而就把能够有成效地用于现有部队或由常备骨干组成的新编部队中的战士增加到 863000 人。

法国政府并不满足于此，它还预定再编成 1 个近卫团和 17 个基干步兵团。这 18 个团将有 90 个新的步兵营或 9 万人。

由此可见，甚至根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判断，我们相信，到今年年底，法军在自己的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里将能够绰有余裕地容纳不少于 953000 人。至于将要用来补充这些新编部队的人员，我们看到，甚至在本年内就可以得到约 70 万人，而不用征召前些年被免役的人。但是，一旦实行不在野战部队服役就在预备兵中服役的普遍兵役制，对最近 6 年内免服兵役的人采用同一原则就相当容易了（拿破仑当年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毫无疑问，

那时候 953000 人很快将被征齐。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无意中引起了志愿兵运动的人,对志愿兵运动作出了反应,他安静地、不声不响地组织百万大军,同时建造 20 艘装甲巡航舰——可能是要把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护送过拉芒什。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1 月底
载于 1861 年 2 月 2 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22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弗·恩格斯 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

下文译自毕若为自己的军官写的指示¹³⁵。毕若当时是第五十六法国团团长。这是毕若元帅的最好著作之一，没有哪一点例外。这个指示表述了步兵作战的原则，它的表述比任何国家的军事书籍都有力、肯定，其明确性也只有长时期的军事经验才能提供。这些原则法国人甚至现在还遵循不渝，他们一直是靠着这些原则，战胜了那些固守平时长期形成的旧习、看来相信巧妙的战术胜于相信旺盛的士气的军队。这些原则不是新的，而且也决不单单是法国的，但是在这部著作中，这些原则成功地综合了起来，用通顺精辟的语言加以叙述。它们丝毫没有取代战术学，然而却是对战术学的十分必要的补充；此外，其中大多数原则都非常清楚，不要很多军事知识就可以理解，因此大部分志愿兵完全能够看懂。

先生们！部队打仗的艺术对战斗行动的成败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这种艺术，正确的战斗部署可获胜利，而在部署不好的情况下，也可防止最坏的后果。士气高、指挥强、用正确的作战原则教育出来的部队与像大多数欧洲军队那样组织和训练的部队之间的差别，就像成人与小孩之间的差别。我根据

20 个会战的经验，确信这种情况是真的。我希望你们也确信这一点，并且用你们所有的一切办法来帮助我提高第五十六团的精神状态和战斗训练，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使世界上任何帝国或王国的近卫军在对双方同样有利的地形条件下都不能抵抗我们哪怕是 5 分钟。

先生们，你们大多数都看到了步兵战斗，这些战斗仅仅是彼此平行配置的部队远距离的胆怯对射而已。

双方在期待胜利时，看来都指望了偶然事件，或者指望了它们的子弹能够引起对方的恐惧心理。双方消耗了千百万发子弹，但是，唯一的结果是双方死伤了一些人，这样一直到出现了某种多半与作战部队无关的情况，迫使这些横队中的一个横队退却为止。以这种方式耗尽了自己的弹药，队伍又大大稀疏了的部队，是很少愿意采取新的努力的，所以一支根据更正确的原则行动的生力军，就很容易使他们溃逃。

训练良好的步兵应该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战斗。现在我们试图确定一下应该使我们大大优越于欧洲各国步兵的那些原则。

先生们，这些原则绝不是关在书房里空想出来的结果；它们是我根据 1808 年西班牙战争以来的经验而制定的，它们一直使我在同西班牙人、英国人^①和奥地利人的斗争中得到成功。我希望你们也用它们做指导，因为它们同你们在你们参加的战斗中的亲身观察是相符合的；你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把它们传授给自己的部下；一旦这些原则深入到了从鼓手到团长的全团的认识，第五十六团就可以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那时只有同时对它采取行动的几个兵种的联合力量才能把它打败，而光靠步兵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即使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它也不行。

战斗有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我认为前者最为重要；但我们先从后者讲起吧。

进行远距离射击是坏步兵的特点；好步兵是爱惜弹药的。正因为射击是步兵最主要的力量，它就不应该白费弹药，而必须教它把瞄准练到最精确的程度。如果还不是进行射击的时候，那就要把自己的部队控制在敌人的射程以外，或者隐蔽在掩体内。射击的时候一到，那就要坚决而沉着地冲向敌人，

① 毕若元帅曾以少校或中校军衔在卡塔卢尼亚指挥了苏舍元帅军队的一个营。大家都知道，在西班牙的这支法军部队得到了最大的成功，阵地守得最久。

这可以使你们完成任何任务。如果敌人意外地坚守阵地，并且让你们非常接近了也不开火，你们就应该首先齐射，并且注意到你们的兵士每次射击总要装两发子弹。由于采用两发子弹射击，我不止一次地取得了成功。在激战中，我也会忘掉了下相应的命令，但是你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我认为这有重大意义。由于沉着、果断和两发子弹射击，你们很少有必要再来一次齐射，不管你们攻击敌人的阵地也好，反击敌人的攻击也好。

凡是对作战的问题稍微有一点点研究的人，都会同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拿着装好子弹的武器走近敌人，而敌人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弹药，敌人怎么能够抵抗你们呢？敌人的精神状态被瓦解了，因为他在不可能不具有杀伤力的近距离齐射面前感到了恐惧，于是就会退却。那时就齐射吧，冲进敌人的队伍和**捕捉俘虏**——这比打死要好。**在你们用刺刀杀死 1 个人的时候，你们本来是可以俘获 6 个人的。**这样的战斗使胜利者付出的代价很小；你们在进攻时要损失几个人，但是你们一接近敌人并击败了他，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先生们，这种战术会保证你们胜利，而且如果全军掌握了它，那末不管战斗部署怎样不好，它都会取得胜利。后者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但是如果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在那里进行打击的地点，我们就应该做到击溃我们面前的任何敌人。杜盖-特鲁安的战术就是如此，而且他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是由于这种作战方法，而不是由于他的所有其他才能。他接近敌人的军舰，而且他的大炮是装好炮弹的，而乘员却躺在甲板上；当他的军舰刚一接触敌船，他的乘员就一跃而起并向敌船的甲板进行了最猛烈的射击，然后接舷战就已经没有困难了。

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我们还应该利用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尽可能多的优势。巧妙地利用散兵将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他们的行动，无论在进攻或防御中，始终应该在密集队形的兵士的行动之前。在进攻中，他们将找到远距离观察所无法发现的地褶，并且将对敌人队伍进行疾风射。这将扰乱敌人并妨碍他准确地瞄准不进行射击而成展开队形进攻的步兵。应当尽可能派他们到那些不发生决定性搏斗的地点去。但是，如果情况要求他们在进攻横队的前边行动，那末最后他们应该退到它的翼侧，以免妨碍它的行动，然后再试图走到敌人的翼侧，以便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并捕捉俘虏，或者他们应该通过营与营之间的间隔退却，或者平卧在地上让步兵横队走到前面去。

散兵像成展开队形的步兵一样，不应该自费弹药。问题不在于，不应当简单地子弹交流，——这些子弹应该有助于取得成功。为此，应当在步兵成横队进行攻击之前的那个时刻，给散兵指出他们在开火之前必须占领的阵地；他们刚一开火，步兵横队就进入攻击。你们明白，如果让散兵紧靠敌军孤立地呆上一会儿，他们就会被击退，他们的任务也会完不成；你们则势必给他们增援，以击退迫使他们退却的敌人散兵，不过这样就非常不利了。所以只有 à propos（及时地）把散兵投入战斗，这是极为重要的；最适宜的时机差不多总是攻击时机。如果敌人在这个时机以前就开始以自己的散兵扰乱我们，我们就以突然的、短促的、但是坚决的攻击打退他们。你们一定能迫使他们退却，不过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派出同他们平行的散兵线，而是从翼侧迂回他们，或者以一个连的兵力打断他们的战线（这个连要以集中的兵群涌上去）。这是精神作用的结果，让我来说明如下。

散兵是不可能有的精神和团结的感情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集体精神和统一指挥的结果。每个散兵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自己的指挥员，他所考虑到的只是本人的力量。他看到大的兵群跑步向他挺进；他太弱了，以致于坚持不住；他退下来。他的左右邻也是一样，并且又影响到自己的左右邻，后者无意识地仿效他们，或者害怕被截断，逃了起来；他们跑到更远的后方聚在一起，重新射击。

我们的攻击连将不回击这种射击；它或者再次退却，或者在某一地褶隐蔽起来。没有比这些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散兵的连续性小战斗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你们浪费弹药，使自己的人精疲力竭，却没有改善情况，于是往往在决定性时机你们会感到东西不够用，因为你们把这些东西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我特别强调这个时机，是因为白费弹药是我国步兵，也是其他一切国家的步兵的一个最大缺点。在许多情况下，在半小时的射击以后和在取得某种成功以前，你们会听到四处都在大声埋怨，说子弹完了；为了求得子弹补充，兵士们便离开战斗队形，而这常常导致失败。一次最大的会战，一个兵士60发子弹就应该够用了。1815年，毕若上校指挥的第十四基干团在阿尔卑斯山进行了8小时的战斗，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子弹。在这8小时内，敌人不断地射击，而第十四团只还击了几个齐射，而且还只是在奥军转入攻击，逼近它的阵地的時候。该团总是在齐射后立即转入白刃冲击，于是，不用继续散兵射击和乱射，就决定了敌人攻击的结局。双方回到了自己的相隔很近

的最初阵地；奥军继续进行射击，而第十四团则不作射击，一直到敌人重新发动攻击。

这个例子的目的也在于帮助你们领会和珍视防御战的正确原则，即：自己永恐在最后的决定性时机进行攻击；但是在防御中，以及在进攻中，还有一个异常有效的制胜方法，这就是尽可能避免在部队平行配置的情况下作战，因为在这种配置下，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等的，而且，只有依靠精神优势和更有效的两发子弹射击才能使其结局有利于我。所以在决定性时机，我们将力求包围敌人的翼侧。在防御的条件下，在起伏地上，这一点是相当容易实现的。当敌人已经完全展开了攻击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一部分预备队成纵队派到阵地的翼侧，这些分队在决定性时机出现，向前推进和展开，以便从翼侧攻击敌人；我们派散兵到敌人后方，当每个营或者向敌人翼侧推进的分队刚一展开，他们就立即攻击，不给敌人以挫败攻击的时间。敌人受到正面和翼侧同时的攻击，一定很快就被击溃。

这种方法在我们进攻时也是可以利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大的纵队在展开的横队的两翼后边推进，在相当接近敌人之后，也改变成横队，延长自己部队的正面，组成一个包围敌军横队的半圆形；如果这样做我们的兵力不足，进攻的横队的翼侧营在行进中改变成纵深疏开纵队，走到敌人翼侧，重新组成横队并攻击，而由散兵占据它们中间的间隔。我认为这个机动对达到目的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营长很善于测定距离，使这个机动开始得不太早不太晚的话。当然，在夜间或起伏地可以使你们潜入敌人翼侧的时候，首先应该利用这一点。

退却时应该特别节省弹药。当你们用射击来防御时，你们会使自己的处境恶化，因为你们一点也不会离自己的指走地点更近一些。有时你们**甚至必须跑步**才能走到敌人的射程以外。这常常成为避免被消灭的唯一办法。由于采用了被错误地称之为系统退却的方法，进行缓慢的逐渐的退却，有许多部队都被消灭了！唯一合理的方法在于用任何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退却时这个目的就是迅速地走到敌人的射程以外，因为情况不允许你们继续战斗；你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该由于错误地理解了荣誉感而给自己提出投入战斗的目的，这种战斗对你们说来只能是毁灭性的，而且正如你们确信的那样，要再摆脱这种战斗，常常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迅速退却，在方法上才是正确的。从我们当代一位伟大的统帅的一生中，就可以举出这种退却

的例子。

在马森纳元帅从葡萄牙退却的时候，奈元帅接到命令要用后卫部队阻挡英军前进，以便辐重队有时间通过隘路。他以他所特有的毅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因为英军援军源源而来，要继续保持住占领的地区就不可能了。他放弃这个地区之后，不得不往下退到一个狭谷，再登上河谷后面的另一丘岗的斜坡；在这段时间内，他的部队可能受到敌人的射击，因为敌人当然不会放过机会马上占领放弃了阵地。元帅认为，如果缓慢退却，他就会遭到巨大损失；所以他命令各营旗手、司令部通信兵和其他的人在高地后方标出一道新的战线，战线的经始应由参谋军官制定。这事刚一完成，各营就根据他的命令跑过山谷并占据了这道战线，战线就这样好像魔杖一挥地出现了。没有这个出色的预防措施，我们会损失许多人，而且事情可能会以我们的被击溃而告终。同时很明显，当骑兵威胁着你们的时候，这种机动是不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尽量更决地退却，同时保持自己队伍的适当队形。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些冒充战术专家的人说，应该以慢步进行退却；我一向都觉得这个原则是有毛病的。无疑，有时候一部分部队应该挡住敌人，保证其余部队的退却时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必慢步行动，你们应该战斗，而且常常应该向前推进和攻击，以便重新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和破坏敌人的士气。但是，当这支部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目的达到了，当敌人部队越来越集中而使这支部队不可能继续战斗的时候，它就应该尽快退却，越快越好。

因此，我们要学会迅速地、方法正确地退却，尽管不保持队形；应当学会立刻恢复自己的队伍，在敌人的一个翼侧以展开队形或普通队形跑步改成横队，并且始终最精确地瞄准。

我始临认为士气比体力重要。你们要树立士气，就要使兵士养成高尚的精神，使他们爱光荣，有团的荣誉感，首先是发扬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爱国的种子。只要你们能够取得兵士们的信任，你们这样来教育他们，就能够容易完成大事业。为了取得信任，你们应该履行你们对他们的一切义务，同他们交朋友，常常跟他们谈战争，谈作战方法，使你们相信你们有办法很好地领导他们。在火线上，你们应该给他们做出高度勇敢和十分沉着的样子。

你们应该特别注意能够有助于提高你们兵士的勇气和削弱敌军勇气的一切。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第五十六团从来就不让敌人攻击它；在决定性时机它总是把战斗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攻击敌人。在防御中，它配置在它预定进行战斗的战线后面，以便在决定性时机向这个战线推进。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因素的有力影响是明显的：配置在自然条件有利、防御设备很好的阵地上的部队，拥有一切物质上的优势；而布置在这里的部队如果它们只限于在原地作战，也仍然差不多一定要被赶出这个阵地的。可以说，精神方面也好，物质方面也好，良好的防御始终应该用进攻来实现。在敌人的翼侧和后方的进攻行动差不多总是有效果的；即使进攻行动只是由一小群兵士进行的，也对敌人的精神状态发生特殊的影响。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最好的机动就是在攻击横队的翼侧后边组成密集纵队，这些纵队在你们同敌人刚一进入直接接触的时候就展开并包围敌人。既然这种机动是极其有效的，你们就必须警告自己的兵士，叫他们预防他们自己也可能受到这样的攻击，并且给他们指出，怎样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攻击。还必须预先告诉他们后方可能有人惊叫“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截断了！”，等等；应该告诉他们：后方的殿后兵和精兵分队有严格的命令用刺刀杀死或者枪毙敌人的所有奸细或我们自己的散布恐慌的坏兵；一切敢于威胁我们翼侧和后方的敌人部队，将被我们的预备队迅速消灭，我们的兵士这时应该考虑的只是如何击溃我们面前的敌人。

其次，你们在改善自己部队的精神状态时，要注意不使你们的队伍由于兵士借口护送伤员而渐渐稀疏。战斗过后，如果我们不是离得很远，我们对伤员会给予应有的照顾；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夺取胜利。胜利了的军队的伤员任何时候也不会被丢下不管的；而失败了军队的伤员就不得不遭受无数苦难了。所以，在战斗时期，看护伤员是一种假怜悯，而且往往简直是对胆小怕死的一种伪装。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们应该再做出忠于事业的榜样，受伤时拒绝那些应该进行战斗的兵士们的任何援助。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期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伤员把那些要送他们去医务所的伙伴们打发回营了。

保持兵士的勇气的最好办法之一，是军官在战斗的各个阶段的出色行为。如果团在炮兵的火力之下被阻呢？那时他们应该在自己兵士们的前边自

豪地走来走去，并且用愉快的交谈和鼓气的话语来保持他们的情绪。如果猛攻敌人的时间到了呢？那时他们应该准备自己的兵士去猛攻，再一次告诉他们上述的射击原则，并且建议他们在白刃战中尽可能地彼此靠近些，一听信号就迅速集合。

有个防止你们兵士过早开火的好办法；这就是军官们在进攻横队的前面骑马前进。团长可以说：“兵士们，你们可不要射击自己的军官呀！我在开火的时候到来之前将走在你们前边。”这样投入战斗的兵士，总是很勇敢的，而且很少遭到失败，因为他们很少会遭到具有这种坚强精神和遵循着这种作战原则的敌人。

如果出现骑兵，就必须提醒兵士们，我们的方队有力量使他们成为攻不破的。至于我，我可以向你们表示，我真希望在我们将要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我们受到骑兵的攻击——我深信这会给第五十六团带来光荣。

对士气的最严厉的考验是退却。有人常说，法军不太适合这种战斗，这等于说，法军是坏兵。这是胡说。最近40年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法军在好的指挥员的领导下是能够完成出色的退却的。人们常常认为民族性格是失败的原因，其实应该归罪于那些指挥不当或不能提高部队士气的将军们。

古语说：“你要做绵羊，别人就要剪你的毛。”在退却期间你们应该做狮子；你们给予跟踪追击你们的敌人三四次有力的打击之后，别人就会尊敬你们。甚至只有不多的战斗经验，也能够容易在后卫战中获得某种成功，而这就大大有助于提高退却的军队的士气，使追击部队十分犹豫起来。你们在退却时总是有可能选择战斗地点的；在那里你们集结和布置自己的部队，要便于包围在追击时大大伸长的敌人纵队的头部。每个人的任务应该事先准确地规定好，战斗应该又快又猛。决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犹豫或动摇；敌人纵队的先头部队必须打掉，然后你们快退，避免跟即将源源赶到的援军战斗。

先生们，我说的已经够使你们了解和珍视士气的威力了。当军官们知道如何鼓舞自己的部下，这一点有了把握的时候，士气就高涨起来；巧妙的、合理的和勇敢的行动有助于士气的巩固。你们应该努力在和平环境里使自己的兵士们明确地认识到你们在战争条件下能做到什么。这一点你们是做得到的，如果你们不只限于训示、检阅和枯燥的操练的话；无疑，所有这一切

都是有益的东西，但是它们并不影响兵士的精神状态。你们应该同自己的兵士谈我们过去的战争，给他们讲我们的勇敢军队的功勋，引起他们超过这些功勋的愿望，——一句话，要想方设法使他们爱光荣。

篇首按语是弗·恩格斯于 1861 年 2 月初写的

载于 1861 年 2 月 9、16 日和 3 月 2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23、24 和 26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SSAYS

ADDRESSED TO VOLUNTEERS.

[REPRINTED FROM 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IRES AND
CHESHIRE."]

LONDON:

W. H. SMITH AND SON, 185, STRAND.

MANCHESTER: W. H. SMITH AND SON, 12, BROWN STREET.

1861.

“志愿兵读物”一书的扉页

“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序言¹³⁶

下面的文章起初是为“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写的，现在，根据该杂志主人的愿望以它们现在的形式重印，据他们说，一个多少有点地方性的期刊所能提供的范围有限，而这些文章是值得在志愿兵中推广的。这种看法是否公允，让读者评定吧。

想必无须附带说明，在论步枪和论法国轻步兵等篇文章中所谈的事实并不是新鲜的，独有的；相反，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别的史料（没有必要一一列举）编写而成的。这些文章中唯一可以算做独创的部分，是作者的结论和作者表述的见解。

弗·恩·

1861年3月9日于曼彻斯特

载于“志愿兵读物”1861年伦敦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志愿兵读物”

弗·恩格斯 志愿兵将军

志愿兵运动缺少一样东西：内行的局外人公平合理的、同时又坦率而真诚的批评。志愿兵成了公众和报界的宠儿，以致做出这样的批评是完全不可能的。谁也不会听取这样的批评，谁都会说它是不公正的，不高尚的，不合时宜的。志愿兵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中的缺点，差不多总是被默默地放过去了，可是每个部队如果完成任务比较令人满意，那就会被捧到天上。人们用温和的口气提出的任何不偏不倚的意见，都遭到猛烈的谴责。在任何地方，人们只要一谈到有关志愿兵的问题，如果不准备热烈地大吹大捧一通，他们就总是要落一个自视过高的势利小人之名。志愿兵能够同世界上任何军队作战，人们就是常常用这样的大话来挖苦志愿兵的！任何一个基干师的演习，都不会比他们在海德公园、爱丁堡、牛顿或诺乌斯利的演习更好，人们就是常常这样告诉志愿兵的！

且不说这些在任何时候都十分可笑的无聊奉承吧，我们完全愿意承认：志愿兵本来应当先给以相当的考验，然后才能对他们的能力得出公正的意见。但是这样做的时期早过去了。如果志愿兵运动在存在快两年以后仍然经不起批评，那它就永远经不起了。我们认为，去年夏季举行的大检阅是这个运动从童年阶段到青年

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这些检阅，志愿兵实际上已自己招来了批评，不过这种批评没有由那些本来应该这样做的人公开说出来（只有一两个例外）。

缺乏坦率而真诚的批评和这样大肆吹捧的后果，现在已相当清楚了。未必找得出哪怕是一个存在了18个月的志愿兵部队，它不暗自相信它的训练已达到应有的水平了。志愿兵兵士仅仅经过各种最简单的营的队形变换、平坦地上散兵战教练的规定课目以及少许步枪射击练习，他们就过快地准备声明，他们能够成功地对付这一切，就像基干部队一样了。军官们对自己的看法如何，已被差不多每个部队里都有的追求晋升上尉、少校和中校的情况所表明。谁都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他所能获得的任何军官军衔；无疑，既然人员的提拔多半不是按照功绩，那就难怪他们常常根本不称职了。十分赏识志愿兵的报界和公众把他们的教练说成是完美无缺的，军官和兵士们也坚信这一点，以致他们把军事勤务看成是一种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他们本身速成的成绩居然还没有使他们认为：在一个依照志愿兵原则可以容易得多地造就精兵的国度里，拥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军官和兵士的常备军是完全多余的，这总算是一件怪事。

志愿兵运动的报界朋友们使它受到损害的第一个明证，就是去年夏季在伦敦举行的作战演习。志愿兵的某些雄心勃勃的上校决定，是让自己的兵士们体会体会战斗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了。当然，正规军当中的聪明人都摇头，但这是没有意义的。要知道，这些正规军人是仇视志愿兵运动的；他们嫉妒志愿兵；海德公园检阅的成功差点儿使他们发了疯；他们害怕志愿兵的作战演习超过基干部队以往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等等。难道志愿兵没有进

行过操枪动作、排教练、营教练和散兵战演习吗？他们的军官固然不久以前还是普通的非军人，难道现在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上尉、少校和上校了吗？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指挥一个营那样成功地指挥一个旅或一个师呢？他们军衔不高就那样成功，为什么不能当一当将军呢？

作战演习就这样进行完了，根据所有的报告来看，它只不过是一次演戏。战斗进行时，极端轻视所有地褶，根本不问射击效果，真正滑稽可笑地夸大任何作战演习所固有的一切假设。兵士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他们带走的是与实际截然相反的战斗概念、空着的肚皮和疲乏的双腿。后两者或许可以认为是使这些未成熟的战士得到某种好处的唯一成果。

这种儿戏在这个运动发展的童年阶段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我们对于现在再搞这类尝试将说些什么呢？我们伦敦的那些不知疲劳的自封的志愿兵将军们又干起来了。去年夏天的荣誉使他们不能安静下来。一般规模的普通作战演习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虚荣心。这一次应该进行一场大决战了。一支拥有两万志愿兵的军队将从伦敦调到南海岸，击退入侵并于当晚返回伦敦，以便次晨照常工作。正像“泰晤士报”完全正当地指出的，所有这一切是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既没有司令部，也没有军需部门、陆运工具、团辎重队，甚至没有背包和基干部队兵士带在背包中的一切必需的行军用品！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仅仅表明了我们的志愿兵将军荣幸地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自负这一个惊人的特点。“泰晤士报”没有提出怎样取得普通的战术知识和掌握军队的指挥艺术这个问题。要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志愿兵的训练直到现在还只是在平坦地上进行的；但是战场

通常绝不是平坦地和非起伏地，而恰恰是对起伏地和丘陵地的利用组成全部实用战术即部署战斗部队的整个艺术的基础。现在要问，志愿兵的将军、上校和上尉怎样才能掌握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须学习的艺术呢？在什么地方教过他们这种艺术呢？对这个实用战术基础注意得太少了，以致我们找不到一个部队是受过起伏地的战斗教练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作战演习的所有这些尝试都只会变成一种戏剧演出，这种演出也许会满足外行的观众，但是对那些被迫参加作战演习的人们是绝对没有益处的，而且只能促使志愿兵运动在目击这个场面的军人的心目中具有一副滑稽相。

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看到，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曼彻斯特也在进行尝试来造就志愿兵将军。我们无疑不像我们的伦敦朋友们走得那样远；我们将不搞作战演习，而只在曼彻斯特全部志愿兵的参加下搞一个野外演习日，有点像牛顿的检阅那样，而且这些演习将在比较平坦的地形上举行。我们在这里想说明一下，我们远不是要指责组织野外演习的这些尝试，相反，我们认为，每年进行6次这样的作业，会对曼彻斯特的志愿兵大有好处。我们只想补充一点：我们认为最好是让这种野外演习在比较有点起伏的地形上进行，以便使机动（针对假想敌人）更加多样一些，并且逐渐使军官和兵士养成在起伏地上机动的习惯。这种演习会给副官们提供大好机会，使他们以后能在军官副练中联系这些机动来讲授利用地形的方法的实习课。因此，我们不但赞同这个计划，而且甚至希望看到这个计划的扩大和条理化。但是，我们从当地报纸星期六发表的一则简讯中获悉，在这次演习中，志愿兵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切事情。换句话说，他们的总司令将是志愿兵，旅长也将是志愿

兵，司令部也由志愿兵组成。由此看来，我们这里在尝试着把伦敦造就志愿兵将军的制度输送到曼彻斯特来，这样做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完全尊重指挥驻曼彻斯特各团的军官，但是我们要说，在他们成为完全有素养的营长以前，他们还应当学会许多东西——这里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例外。如果他们的水平还同他们已经担任的职责不相适应，就力图担任一天更高级的指挥，那末可以断言，他们会因此而给志愿兵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他们不过是在玩兵形游戏而已，并且会把这个运动下降到最低级。如果领导自己的营，他们就会适得其所，就能照顾好自己的兵士，而且自己也会学到东西。当假牌将军，他们对于自己的兵士和自己本人，都不会有实际好处。荣誉和光荣属于我们曼彻斯特各团的副官们，因为他们的团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功劳大半属于他们；但是他们的的位置应该是在自己的团里，因为团里目前没有他们是不行的，而如果他们哪怕是有一天拿副官、将军或副旅长当儿戏，那他们是不会给这些团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一定不会感到特别满意。

我们在曼彻斯特有一个陆军北方师司令部，拥有很多有能力的司令部人员，而且有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驻防，的确没有任何必要做这种浮夸的事。我们认为，集中这样多的人，并且武装起来以后，只有把领导权和自由任命师、旅的参谋军官、队列军官的权利一并交给区的司令，才会更加符合军事隶属关系和志愿兵本身的利益。无疑的，志愿兵将像以往那样，受到友好的对待。那时，当他们师长和旅长的人，都精通业务，善于指出志愿兵可能犯的错误，而且志愿兵也会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原来的编制。无疑的，这时会排除上校当将军、少校当上校、上尉当少校的事情；这会带来巨

大的好处,因为在曼彻斯特不会进行假牌将军的制造了,而伦敦现在正是因此而获得虚荣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3 月上半月

载于 1861 年 3 月 16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28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弗·恩格斯 布莱顿和温伯耳登

伦敦及其郊区的志愿兵部队在复活节星期一的行动，看来完全证实了我们在“志愿兵将军”^①一文里的预言。兰尼勒勋爵想试图在他亲自指挥下把自己区的所有志愿兵集合一天，一下子就引起了各部队间的分裂。有一位柏立勋爵出来竞争总司令的候选人；他用温伯耳登的野外演习日来同布蒙顿的作战演习对立。在各部队中间发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结果是：有些部队去布莱顿受兰尼勒勋爵的指挥，有些部队去温伯耳登受柏立勋爵的指挥，有些部队去的也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独立行动；也有些部队去里士满，有些部队去旺斯特德。这种分散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损害。每个部队是完全不依附于别的部队的，有权随便利用自己的节日。但是，早在这次分裂以前就发生的，大概还要继续一个时期的这些激烈争论、个人争吵和仇视表现，必定带来而且已经带来很大损害。军官们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他们的兵士也同样这样做，但并不总是和自己的指挥官在一起，于是大多数的伦敦志愿兵就分裂成两大派——兰尼勒集团和柏立集团。接到开往温伯耳登的命令的部队当中的许多兵士出现在布莱顿，没有携带武器，但是穿着军

^① 见本卷第 274—279 页。——编者注

服,以表示抗议自己的直接长官的决定和命令;而对这种同情的表示感到特别满意的兰尼勒勋爵,甚至把他们编成了一个临时步兵营,而且表现出一种在任何一个军队里至今还没有遇到的细致的军人趣味,让他们同自己的兵士一道在他面前用分列式通过。至少“每日电讯”¹³⁷是这样报道的。

现在,我们要问,兰尼勒勋爵或柏立勋爵有什么权利把自己提出来作志愿兵将军的候补者,从而在一向协同一致行动的部队之间引起纠纷呢?这两位军官都在正规军服务过;如果他们原来有当将军的大志,那末在他们面前,像在所有别人面前一样,达到这种地位的通常门径是敞开着的;就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他们达到这种目的的机会要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同行多10倍。他们在加入志愿兵部队的时候明明知道:这支部队的最高军衔是中校军衔;志愿兵一旦被征召服役,他们将同基干部队、民军部队一道被编成旅,并且交给基干部队的旅长指挥;英国军事编制的性质本身,不允许从任何别的兵种任命将军,只能从基干部队任命。他们追求志愿兵临时将军的地位,是为了猎取无论是他们或任何别的志愿兵军官都永远不会被任命的职位,而且,由于他们缺乏指挥大量部队的经验,也没有能力担任这种职位。但是,如果他们只是由于想当一天的将军,就破坏自己区的各部队间的团结一致,并且胆敢给运动带来严重的损害;那末,他们就更应该受坚决的、严厉的谴责了。

直到现在,在志愿兵所有大的集训中,总司令的职务和任命师长、师长的权利,通常都是授与区的司令的。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说过^①,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制度,因为它符合军礼和隶属关系并且

^① 见本卷第277—279页。——编者注

保证任用通晓本身业务的指挥官。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制度是有更大意义的。如果复活节集训的指挥权委托给有关军事当局，那就不会发生分裂，并且能够避免所有这一切争吵。但是，看来伦敦的指挥官们向自己的兵士灌输了一种极端荒谬的害怕总司令部的心理。他们叫嚷：“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叫总司令部管事！”我们在北方没有表现出这种狭隘性。我们总是同我们天然的军事长官们友好相处，并且确信这样做的好处；我们也希望老制度仍然继续实行下去，使我们避免现在正在使伦敦部队陷于分裂的这些可笑的争吵。

伦敦人对总司令部不信任到什么程度，从斯卡利特将军来到布莱顿（他是由总司令部委派回报演习进程的）一事而引起的吵嚷中可以看出。各部队里的聪明人都大摇其头。派这位将军到这里来是总司令部的由小及大的第一步。如果把这种情况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放过，那就预示着最可怕的后果。志愿兵是应该表示反对的；的确，也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斯卡利特将军无权接受只有郡的总督才能接受的敬礼。问题最临是这样解决的：他们两人同时出现，一起接受敬礼。但是这样的问题居然能够成为辩论的对象，这个事实表明，有些志愿兵对自己的地位认识得多么不正确。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无论是在部队的纪律方面，无论是在隶属关系或者哪怕是在尊重高级军官方面，这次复活节集训都没有给伦敦志愿兵带来好处。

在谈到某些野外演习日之前，我们必须指出，我们只能根据在军事方面极不充分而又含糊的伦敦报刊的报道；因此，如果我们事实有错误，这就不能归咎于我们了。

兰尼勒勋爵的5个旅走了分列式以后，就占据了布莱顿以东

的阵地，面对着该城。这些旅很小，每旅有 3 个营，平均每营 400 人；需要用这些兵力占领一排山岗，而这排山岗太宽，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 7000 人接战，那就是估计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不很大，否则，部队就会退到预备队那里去。因而，指挥官就会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部队分为第一线、第二线和预备队，尽量保证自己的翼侧，责成自己的预备队和主力（假设它们配置在后方）击退敌人的任何迂回运动。但是，差不多可以从所有的报道中看出，兰尼勒勋爵竟把自己的全部 7000 兵士拉成了一条线！他的计划是按照超出部队数目两倍的人数制定的；既然只来了 7000 人，而不是两万人，所以他就用这支不大的兵力占领了给两万人大部队用的整个地段。如果真是这样做的，那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兰尼勒勋爵追求志愿兵或任何别的将军职位的问题了。我们是最不愿意相信他采取了这样荒谬的行动的，但是我们从未见通过常自相矛盾的报刊差不多是一致这样报道的，所以应该相信，事情原来就是这样。我们甚至获悉，曾经有一支由几个连组成的小预备队，但是其中三分之二一下子就被调到第一线了，这样一来，在战场上就连第二线或预备队的影子都未必有了。

这个具有自己的**假想第二线**和**假想预备队**的第一线被假想敌人攻击了，假想敌人遇到前面散兵的射击，然后就被右翼各连的横队射击所击退。为什么训练志愿兵在作战演习中进行横队射击，我们可说不上来。我们相信，所有参加过战斗的兵士都会同意我们说的：在横队正步前进时期一度采用的横队射击，现在完全过时了；它永远也不能在处于敌人的正面的情况下带来任何好处；在散兵射击与齐射之间是没有什么适用的中间环节的。

假想敌人击退了防御部队的第一线。第二线和预备队(像应该假设的那样,它们归根到底应该支援第一线)的行动是怎样描述的,我们是莫名其妙的。各营要假定自己不仅是被击退了,而且还要假定得到了援助。然后,位于后方高地的第二线被占领,又被放弃;但是在第三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假想援兵到来,敌人被击溃了,但是又没有遭到认真的追击。

“泰晤士报”告诉我们,所完成的运动都是最简单的运动。“电讯”记者从一个军官那里得到一个简报,是关于他的那个营的运动的报告:

“横队成四行队形到达之后,在第一连的正面之前组成一个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纵队开始向左走并面对第一连重新展开,成横队(受第一连掩护)前进,再站住,然后发出集合信号,散兵开始行动;从各连右方射击;横队退却,成4行从各连的最右翼退到后方;正面改成纵队;在第一连后边组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纵队以排为单位围绕中央走过;为了绕到后方远处,纵队再次展开;向左前进,展开成横队,并且齐射;从右边沿后方成连纵队推进;对第一连排成横队;在第一连前面组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对第二连展开成正面;然后,第一连推向战线,其余部分向右前进,在第一连后面组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在左侧成4行,这样退出丘岗。”

关于这些运动是怎样完成的,我们只知道,像志愿兵通常的情况一样,距离常常被破坏,各连在编成横队时是零零散散的。

在温伯耳登,格娄典诺勋爵一清早带着自己的营进行了演习,当柏立勋爵的两个旅(不到4000人)到达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这两个旅进行的演习是很简单的,但是它们非常有助于兵士们了解在真正的战争中会发生的动作和队形变换。所有这一切在麦克默多上校的演说里都讲得很好,我们只须补充一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横队射击,它是用来充实散兵退却之后与齐射开始之前的一

段间隙时间的——这种做法，我们最坚决地认为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时机，威灵顿公爵会宁愿让他的兵士就地躺倒，也不会让他们上去遭受炮兵火力，并用软弱的、没有效果的、使他们本身泄气的横队射击来还击炮兵火力。

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完全赞同麦克默多上校在他那篇值得赞扬的演说中所阐述的意见，我们就以他的演说来结束这篇文章吧。我们希望全体志愿兵注意他所谈的连队列教练，并且牢记在心。虽然志愿兵的基本训练必然不如正规部队兵士的训练那样完善，但是对于使营具有稳定性来说，连队列教练是有极大意义的。只有特别注意连队列教练，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缺点。

麦克默多上校说：

“志愿兵们！没有必要对内行的人们来详细地讲解你们今天的行动，但是我认为有必要让你们注意一下你们在进行野外运动时所占领的那两个阵地的性质。你们占领的第一个阵地无疑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敌人即使用上三分之二兵力也无能为力。敌人的骑兵是不能顺利行动的，他的炮兵也不能给你们带来损害，除非用曲射火力。假定说，敌人发现阵地非常坚固以后，企图沿着通往温伯耳登方向的一条山谷，迂回你们的翼侧，到达现在我们所在的高原上。这样一来，你们必须用向左调换正面的办法来放弃你们原先控制的那个坚固阵地。敌人抱有双重目的。他想到一个平坦的地方去，以便能够使自己的炮兵和骑兵进入战斗并且也用上步兵；他也想迂回你们的左翼到达温伯耳登大道，沿这条大道可以通过你们的正面向伦敦推进。我想给你们指出你们控制的两个阵地之间的差别。当你们沿着这条通往山谷的、骑兵和炮兵都无法接近的难以克服的高地棱线配置时，情况就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们挡住了敌人，而且在那里随便多少个勇敢的兵士也是会挡住敌人的；但是，在这里你们就好像被放在一张台球桌上一样，你们可能遭到欧洲最优秀的部队的打击。我发现，这里有些营在编成横队时有点不稳定。这我并不责备它们，因为直到现在它们的实践还很少。不过它们仍然是不稳定的；如果说今天它们

在编成横队时是不稳定的，那末，假如这个平原被敌人炮兵火力扫射，假如你们快渴死了，假如你们的伙伴在你们身旁纷纷倒下，假如你们突然在烟尘滚滚中感到你们脚下的土地由于敌人骑兵的强大攻击而震动，情况又会怎样呢？你们想一想吧，年轻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不稳定的。怎样才能克服这一切呢？靠纪律，只有靠纪律。我用‘纪律’这个词，并不是指纠正不良行为说的；我说的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使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旅的行动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只有用连队列教练才能达到这一点：只有多注意各个教练才能达到这一点，因为我把连看成是军队的一种单位，如巢单个战士训练得很好，很稳定，那末一个连将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整个军队将是稳定的。如果不深刻通晓连队列教练，你们在射击时学到的一切东西，你们的一切热情，你们的一切爱国精神，在战斗的日子里都将毫无用处。连队列教练，而且只有连队列教练才能有所帮助，所以我请你们考虑一下，射击优秀——这还不是一切，如果你们不具备在敌人的火力下队列的绝对稳定性，那什么也帮助不了你们。先生们，今天你们在潮湿的地上做了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不想再多耽搁你们了，你们可以解散，各自回到你们能够这样成功地保卫的家里。”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4 月 4 日
左右

载于 1861 年 4 月 6 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31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弗·恩格斯 连队列教练

在本刊的上一期里，我们曾经提起志愿兵特别注意麦克默多上校关于连队列教练的意见^①。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国内每个步枪手都应该认识到连队列教练的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最近曾经有机会参观了一个志愿兵部队的营队列教练。这个部队在战士的比例方面，在良好的教练出勤率方面，在军官的勤勉任职方面，因而在整个战斗力方面，总的来说无疑都在我区部队的一般水平之上。使我们非常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同大约6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部队中所看到的情况比起来，进步是很小的。营队形训练进行得比上个季度末的情况好些，但是操枪动作和排队形训练进行得很马虎。甚至在做“托枪”动作时，每个志愿兵都好像根本意识不到他应该同他左、右、后的400人一致动作。在做预备和瞄准的动作时，每枝步枪都各具姿势，不顾两旁，好像以此为骄傲似的。总之，按口令的每一个字动作，应当数“一、二！”或“一、二、三！”的时候，都毫不在意地数着，好像已经习以为常。

在进行连队列教练的兵营院里的一角，我们偶然看到一个基

^① 见本卷第285—286页。——编者注

干团的一个班在一个军士指挥下排好队形进行队列教练。我们以为，这是营里面的一个较笨拙的班在进行补充训练。但是，有多么不同呵！兵士像雕像一样站着，在口令下达以前一动都不动，只有执行口令的时候应该动的地方才动，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完全不动。口令一发，每支枪都同时动作，按口令做的各个动作区分得清清楚楚，并且是大家同时做这个动作。整个班实际上像一个人似的。那些喜欢吹嘘志愿兵能够像基干部队一样完成一切任务的绅士们，不妨来看看，稍微了解一下基干部队。那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在最好的志愿兵和训练最坏的基干团之间仍然是有极大的差别的。

但是，可能有人问，要求队列教练这样完善，对志愿兵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志愿兵不是专为这个而建立的，也不能期待他们达到这一步，他们也不需要这样。无疑，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仅仅是企图使志愿兵同基干部队在队列教练的完善方面媲美，也会使这个运动瓦解。但是，志愿兵应该有队列教练，应该训练到使他们的普通的同时动作成为非常机械而又非常自然的程度，并且使他们的各种运动和动作都稳定而一致，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军容。在这几点上，基干部队始终是志愿兵应该仿效的榜样，而连队列教练则应该是借以达到这些要求的唯一的方法。

就谈谈操枪动作训练和排队形训练吧。一个营的所有步枪都必须切合口令的每一个字，并按照规则同时动作，这一点可不仅仅是一个外貌问题。应该认为，志愿兵各部队现在已经能够做好这个科目，兵士们彼此不碰撞，也不碰枪。但是，即使不管这一点做得如何，仅仅是完成各种动作的马虎态度，就无疑会对受训的营产生很大的精神影响。这些兵士中的任何一个，如果看到左右的伙

伴都做错了，而且别的步枪在他已经执行口令以后好久还在上下乱动，那末为什么应当是他必须特别注意口令呢？如果左边的一个兵士，不知道右边的伙伴们是否将同他一道按照口令装子弹、预备和瞄准，不知道在自己做好准备的时候他的伙伴们是否也准备好和他同时开枪或冲锋，那末他在敌人面前对伙伴们还能有什么信心呢？而且，每个有经验的兵士都可以告诉你：这种同时动作的习惯——相信军官的口令必有两三个宏亮清楚的字音应和，表示每个兵士正和自己的伙伴们一起同时动作——对于一个营是有很大精神影响的。这使兵士们意识到，他们确实像一个人，他们完全被指挥官把握着，这个指挥官能够毫不延迟地、最有成效地运用他们的力量。

还可以谈一下大部队或小部队的动作。只有每个兵士都对自己的队列教练有了把握，达到了几乎可以机械地按照下达口令完成任何一个要求动作的程度，一个营才能够稳定从容地运动。如果一个兵士还得绞一绞脑汁，呕一呕心血，才能弄清楚下达的口令要求他做什么，这样的兵士在一个营里是有害而无益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常常是这样的兵士，他由于习惯或某种别的原因，总以为在某些动作以后接着必然是另外一些动作；他时常会听到不是他所期待的口令，而是完全另外一种口令，这样他就很可能做错。这些缺点，只有不断进行连队列教练才能消除。在教练时，指挥官可以使一个小分队在15分钟内完全听从自己的命令做许许多多不同的动作和队形变换，并且可以把队形变换的命令多样化，以致使兵士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动作，那时他们就很快学会注意听口令并且非常机械地反应口令了。做好一个营的各种动作必然慢得多，所以一般来说对兵士不如对军官益处大；但是一个公认的事

实是：连队列教练已经完善的兵士，在优秀军官的指挥下，在很短时期就能很好地学会营队形变换。兵士在有学识而又机灵的教官的领导下，对连队形变换练习得越多，他们以后在营内行动也就越沉着。没有必要指明营行动的十分稳定沉着是多么重要；齐射可以乱到一定程度，而且仍然能获得成果；但是，一个营在做方队、展开、纵队转弯以及其他动作时如果混乱不堪，那末，在面对一支活跃而又有经验的敌军的时候，是随时都会惊慌失措，无法自救的。

还有一个关于距离的重要问题。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任何一个志愿兵的军官或兵士也没有目测距离的技能。每次营队列教练都表明，在营成散开队形或密集纵队行进时，在展开时，军官对保持正确距离是感到多么的困难。由方队变成纵队时，位于中央各班的兵士差不多总是保持不好自己的距离，他们朝后退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结果使向后转也做得很不正确。军官只有在营里才能学会保持距离，尽管连里面以排、班为单位的队形对他们也会有所帮助；但是，兵士要想学会变方队为纵队（这种队形变换在面对敌人时是极其重要的），就必须在连里来练习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谈，这就是兵士的军容问题。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每个单独的兵士精神振作，有神气，毫不拘束，而且还指那种连、营队形变换时的快速同时动作；这种快速同时动作，无论对于做动作的部队，或是对于一个做原地操枪动作的营，同样都是必要的。看来，志愿兵如果能大致在要求时间内（通常包括几秒喘息时间）勉强达到指定地点，他们就十分满意了。无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志愿兵部队存在的第一年做到这一点，每个人大概都会完全满足了。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有条令所要求的、固定的方式，这种方式被看做是能够在尽可能短时间内达到指定目标，

同时对每个出场的人都最方便,因而也最有秩序的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规定方式的任何违反,都必然会使秩序受到一些破坏,不够整齐,不够正常,这不但给参观者一种马虎从事的印象,而且也意味着浪费了一定的时间,同时还使志愿兵以为条令上的各条规定不过是瞎扯。试让一个兵士看一下志愿兵部队如何从中间和正面成四路纵队行进,如何按连站队或进行某种别的队形变换,他立刻就会看到我们养成了何等马虎从事的习惯。这些缺点在老基干团里是可以容许的,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踏实训练的基础,并且可以重新进行这样的训练,摆脱自己的缓慢操法;但是在志愿兵部队里,这些缺点就危险得多,因为那里必然缺乏这种坚实的细致训练的基础。他们那种马虎从事的习惯起初是不得不容忍的,因为兵士必须很快地练完全部基本训练课目;但是这种习惯必须用正规的、勤奋的、严格的连队列教练加以纠正,否则就会滋长和扩大。彻底消除这种习惯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习惯无论如何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限制,不使它进一步发展的。至于兵士的个人姿态,我们认为它会逐渐好起来,虽然我们非常怀疑,志愿兵在原地踏步时摇摆不定的队形(这种情形在志愿兵的任何教练中都可以看到)是否有一天会完全消失。我们说的是一种在原地踏步时上身动弹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迄今所看到的志愿兵身上大概都有。右脚刚一抬起,右眉也抬起,左肩就落下;左肩也和左脚一同向上抬。这样,整个正面就前后摆动起来,就像在暴风袭击下的一片成熟了的庄稼一样,而不太像一队准备迎敌的坚强兵士。

以上所说的这些,我们相信已经足以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了。凡是关切操练动作的志愿兵,一定会同意我们所说的进行正规而勤勉的连队列教练的必要性;让我们再提一下:对志愿兵部

队的基本训练肯定是一直忽视的,所以,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补救这个缺点,就需要多加注意,多做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4 月中

载于 1861 年 4 月 20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33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弗·恩格斯 步枪和步枪射击

朗卡斯特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

华林格中尉和工兵部队的军士们前不久的比赛(关于这次比赛我们在本刊4月6日和13日两期上已有报道),又引起了公众对特别作为军用武器的朗卡斯特式步枪的性能的注意。在查塔姆比赛时,军士们用来进行射击的是工兵部队装备的价值约4英镑的朗卡斯特677式椭圆形枪膛的普通军用马枪。用这种武器同制造精良,价值约25英镑的惠特沃思式步枪比赛,显然是不公平的。把朗卡斯特式马枪和普通恩菲耳德式步枪加以比较,这更合理一些,因为这两种武器的差价不大,而且朗卡斯特式步枪的价格可能会等于恩菲耳德式步枪的价格,如果政府工厂大批生产朗卡斯特式步枪的话。那末,朗卡斯特式步枪是不是更好的呢?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伦敦评论”¹³⁸发表的一篇短评的作者,从一般原则出发,并且根据真实的经验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来研读一下他谈这个问题的文章的下述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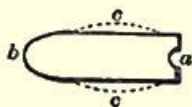
“决定着步枪射击精度的法则很简单。必要的只是定出弹丸的长度和直径之间的一定比例,并使弹丸围绕它的纵轴适当地旋转运动,从而达到无误的射击精度,不管这种旋转运动或螺旋运动是以何种方式授予弹丸的。这就是说,枪膛可以有任意数量任何形状的膛线或者干脆没有膛线,但是,如果保

持住规定的比例，而且弹丸得到正确的旋转运动，射击精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一样的。然而在选择适合于兵士的武器的时候，必须首先遵守一点：武器的重量和长度不得超过一定限度，它应易于装弹和易于擦拭。由此可见，为使武器易于装弹起见，装弹时的摩擦面要尽量小些，膛线形状的选择要尽可能完全避免有角。我们不知道有比椭圆形螺旋更好地满足这些要求的别的形状，因为这种形状的枪膛装弹时只有两个摩擦面，而且用兵士在战斗环境里采取的那种简陋办法擦拭时，任何别的形状也提供不出这种方便。看来，这种看法已被印度战局的成果和马尔他、直布罗陀以及英国国外其他各地的考验所证实。据说在印度，恩菲耳德式步枪在战局的许多紧要时期完全‘失灵’。报纸、私人书信和官方报告都充满类似的怨言；但是工兵部队用椭圆形枪膛的步枪在同样的情况下使用同样的弹药，却从来没有误过事，使军官和兵士都很满意。

恩菲耳德式步枪如果缩小口径并且使用较长的弹丸，也可以提供出像惠特沃思式步枪一样的良好效果；至于现有的军用恩菲耳德式步枪，仍然必须视之作为一种满足做不到的要求的尝试。并没有允许负责设计这种武器的军官把它的口径缩小到低于规定的限度。因此采用了 0.577 英寸的标准口径。由于枪膛直径太大，发生了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困难，即：当弹丸受火药爆炸作用沿枪膛运动时，弹丸难于完全地绝对密封地贴住膛壁。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恩菲耳德式步枪表现出来的这些不完善条件的实际效果。弹丸重量定为 530 喱。火药装药量——70 喱，口径如上所说是 0.577 英寸。70 喱火药爆炸产生的、作用于弹丸横断面的大面积上的压力，不会而且也确实没有使弹丸在一切情况下都扩张到所要求的程度，使之填满膛线。精密进行的试验表明，均匀地充分地向周围扩张的弹丸甚至不到百分之十。有时在弹丸上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条膛线的痕迹，有时有两条，只有总数十分之一的发射后的弹丸完全扩张了；因此，口径 0.577 英寸的军用步枪的射击就不够准确。

带有任何形状膛线的步枪的精确射击的最好条件是：口径应为 0.5 英寸，弹丸长度 1.12 英寸，膛线缠距或螺距 1 比 18 英寸，弹丸重量 530 喱；火药装药量 90—100 喱（6 号）。在这些条件下，对弹丸横断面产生压力的这个力量就可以增大，所以弹丸必定牢靠地贴住膛壁，这是因为：膛线的直径缩小了，可以增大弹丸的长度，而弹丸上使金属部分扩张的木塞就不需要了。因此弹丸就是一个长度约等于三条直径的同质的实体。爆炸时火药气体的扩

张力起初作用于弹丸底，即它的后部 (a)，而动力的传动，虽然差不多是在一瞬间进行的，但仍然遇到构成弹丸的金属物质的 vis inertiae (惯性)，—— 这种惯性作用于弹丸全身 (从 a 到 b)，并且被枪膛的空气正面阻力加强。



小口径步枪弹丸

一看就明白，这种阻力应该出现在弹丸的中部或最大的阻力面 (c) 上，因而弹丸会在这里完全自然地变粗，会稍微缩短，譬如说大约缩短 0.1 英寸，而它的中部直径将充分增大，足以准确地适合枪膛的形状，不管这种形状怎样。

如果这些比较完善的条件具备了，那末 500 次里就不会有一次扩张不足的现象，弹丸总是适合枪膛形状的结果，就能达到最好的射击精度。

这些意见对任何型式的一切步枪都适用。

这些有利条件究竟给步枪提供了什么？为什么它们能提高射击精度？我们指明弹丸是怎样准确地适合枪膛形状之后，再进一步看看它的效果。步枪设计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取得‘低伸弹道’；这就是说，弹丸在飞行时走的曲线应该尽可能地接近直线，因此就必然绝对需要高速，这种高速能使弹道弯曲的重力作用减小到最低限度。缩小口径可以达到第一个目的，而最高速度和最大射击精度是靠增大作用于缩小的弹丸横断面的火药装药量取得的。

关于膛线构造方式，从我们所谈的可以看出：既然弹丸从枪管飞出时得到必要的‘旋转’，那末这种旋转是怎样授给弹丸的，实际上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像惠特沃思式步枪那样，用六角形膛线也好，像朗卡斯特式步枪那样，用椭圆形膛线也好，像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样，用三条膛线也好。如果一条膛线就足够使弹丸旋转运动，也就没有必要用几条膛线，因为需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仍然很容易证明，某些膛线方式是有缺点的。如果膛线成角，那就有一部分力量浪费在弹丸扩张时填充这些角上面了，更不用说推进的气体在这些地方可能逸走。此外，每个角都是枪管的缺点；这种毛病在任何数量膛线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并且和膛线的深度成正比例。所以，理论上最好的形状是朗卡斯特式步枪的椭圆形螺旋，因为这种步枪的形状可以使弹丸即使

在很小很小扩张的情况下也最容易适合。

下述事实可以看出朗卡斯特式步枪有很大优点，即在恩菲耳德式步枪中选以前，当时同它竞争的朗卡斯特式步枪曾经被 4 个完全不同的委员会看中，得到推荐。它被提交总司令同意，并且被后者送到海特作最后决定。当地步兵学校的军官们的第一个报告是极好的，但是在第二个报告中他们赞成用恩菲耳德式步枪。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弹丸‘同膛线脱离’。但是，据说后来弄清了以下情况。用来进行初次试验的第一批 1 万发普里契特式子弹是规定的标准口径。用这种子弹效果很好。再次试验时使用了另一种弹药；第一批子弹是 1853 年制造的，而第二批是 1854 年；在海特进行试射的军官们不知道这两种弹药的差别，因为没有通知他们，1854 年制造的子弹的直径比 1853 年制造的子弹的直径小 0.007 英寸。

在最后决定采用恩菲耳德式步枪以后过了一年半，当菲茨罗伊·索美塞特上校（当时是上尉）试验工兵部队带有椭圆形枪膛的马枪样品时才发现这个情况。不难理解，既然缩小的普里契特式子弹的直径比规定的标准小，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铅的硬度偏高的情况下，它必然会得不到旋转运动而飞出枪口，也就是说，它扩张得不足以填满朗卡斯特式步枪或任何别种步枪的枪管的整个内部。

我们认为，未必有人怀疑，惠特沃思式步枪用于军队太贵，并且要求在战斗情况下做不到的那种细心保养；所以应该试验朗卡斯特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或其他适合于战时条件下繁重勤务的步枪。但是这种试验不应该采用射击比赛的形式，而应该用同等火药装药量、同重同型的子弹从固定架上射击，这样做，一切条件相同，试验效果就仅仅取决于武器本身的性能了。”

上述评论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1)任何步枪射击用的椭圆形弹丸的直径和长度之间的比率怎样最好？(2)朗卡斯特式步枪或带有椭圆形枪膛的步枪有什么优点？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同意作者所说的必须承认他所提出的优等弹丸的尺寸最合适。到目前为止效果最好的步枪是瑞士步枪和惠特沃思式步枪，这两者的口径不到 0.5 英寸，弹丸长度较大。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就这个一般性问题进行讨论。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看不出作者举出了肯定的证据来证明朗卡斯特式步枪对恩菲耳德式步枪有任何优越性。工兵部队的马枪不像步兵的恩菲耳德式步枪那样常常“失灵”，这是容易解释的，因为在任何军队中，步兵的人数都要比工兵多一百倍；基干部队使用自己的步枪一百次，工兵部队也未必有一次使用自己的马枪，这是由于工兵部队负有完全不同于步兵的任务。

惠特沃思式步枪的例子可以为证：在全装药的情况下，可以使长的、很难扩张的、后部带有相当深的凹部的弹丸差不多适合任何形状的枪膛；这里要求有很大的扩张，但弹丸的后部仍然适合六角形枪膛。所以，无疑能够做出一种弹丸，它扩张得足以填满椭圆形枪膛的横断面，如果这两个直径的差别不太大的话。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根据这点就可以认为工兵马枪比恩菲耳德式步枪好。我们作者的那种理想弹丸与这种马枪毫无关系——它不会适合马枪；如果甚至在缩小口径的情况下，作者还认为，要使弹丸适合椭圆形枪膛，必须把火药装药量增大到 90—100 喱，那末，我们认为，这无异于默认，现在采用的 70 喱装药量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椭圆形的工兵马枪枪膛里的弹丸能充分扩张。我们的作者不谈在增加装药量的情况下后座力的增大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我们知道，重达 80—90 喱的装药量，在惠特沃思式步枪中，引起了相当讨厌的后座力，以致在快射时很快地影响到瞄准的稳定性。

在查塔姆比赛中工兵马枪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某些私人用朗卡斯特式步枪也进行了出色的射击，报刊上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最好是再试验一下用椭圆形枪膛和扩张的弹丸的步枪的性能和它是否适于作军用武器。从我们方面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步枪也不会没有缺点，膛线构造原则是军用步枪方面极其次要的问

题。为什么用这样一些小节来挑剔恩菲耳德式步枪的毛病，而不马上探讨问题的本质和指出它最大最重要的缺点是大口径呢？改变一下口径，你们就会看到，一切其他的改进都只不过是些细节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4 月底
载于 1861 年 5 月 4 日“朗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35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朗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弗·恩格斯 阿尔德肖特^①和志愿兵

剑桥公爵在伦敦步枪旅宴会上的一篇演说中说，他很希望能在阿尔德肖特看到志愿兵。在他看来，唯一的困难是如何把他们吸引到那里。现在我们试提几点关于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建议。

无疑，根本谈不上把整队的志愿兵部队派到阿尔德肖特或任何别的兵营的问题。组成志愿兵的人员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没有一个连(营更谈不到)的大多数人员能为此目的同时腾出即使是两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既然不能把整队的志愿兵吸引到阿尔德肖特，是否能够单个地派他们到那里去，而且仍然能学到许多东西呢？我们认为，如果给志愿兵提供一切有利条件来利用这种机会，这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相信，志愿兵的绝大部分人，经常都能够在一年内从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腾出两个星期。他们许多人定期有这样的休假，甚至更长的休假。他们中间一定有很多人不会拒绝，相反，甚至会乐意至少有一次在阿尔德肖特花掉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只要那里要他们。因此，从5月到9月底，阿尔德肖特可以毫无困难地保持住人数每次至少相当于一个完整营的志愿兵轮换人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轮换人员吸引到兵营的话，怎样才能使这一点得到利用呢？

^① 见本卷注 377。——译者注

我们建议拨出一批约 600 名志愿兵用的板房或帐篷,并任命一名基干部队的上尉或者更好是一名少校为这个志愿兵营的营长,再给一名副官和一名班长协助他。譬如说,一有足够人数的志愿兵报名,兵营在 5 月间就应当开始;如果兵营人满,那末下一批申请者只有在有了他们的地方,而且所有这些志愿兵都编成了营的情况下才能入营。为了使他们服装一律,他们应当在衣服外面罩上一件规定样式和颜色的外衣。军官人数一定是过多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让这些军官临时充当军士甚至列兵。我们绝不认为这是个缺点,相反,我们将认为这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志愿兵军官都不是认真地亲自受过队列教练的,因此暂时回到队列只会给他带来好处;他应当想起,每个基干部队军官年年都要打一个时期的步枪。营里临时军官的职务的分配是不难安排的,可以先从参加的上尉中资格较老的开始,其余的以后轮流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妨委托给营长一些自决的权力来指派这些职务,以便保证在参加的军官中间开展活跃的竞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细节问题,只要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它们的解决是不会遇到大困难的。

这样拥有轮换人员的营,任何时候也不能达到很高的战斗训练水平,而且营长和他的助手的任务也是不轻的。但是无论如何会达到一个目的,即:一般在志愿兵中,特别在在军官和军士中,会形成一个由哪怕是当了两个星期真正的兵士的人组成的核心。两个星期可以说是一个短得可怜的期限,但是我们并不怀疑,每个人在离开兵营时都会感觉到,他在到阿尔德肖特以前是个什么样,现在又是个什么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大。一个星期里在整天忙于各种事务之后进行一两次训练,比起在兵营里早晨、白天和晚上训练即使是两个星期,这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在这两个星期

内,每个住在兵营的志愿兵除了军事训练外将没有别的事务;他将能把自己的队列教练提高到目前的志愿兵队列教练不管持续多久都达不到的程度;此外,他将得到更多的军事勤务,这比他在自己的部队中所能希望看到的要多得多,除非他所在的部队专门派往兵营。每个人在离开阿尔德肖特时都会认为,他在这两个星期里所得到的东西,至少可以同他前此在志愿兵部队整个服役期间所得到的东西相比。经过一定期限,一个人或几个人没有去过阿尔德肖特的志愿兵连队就差不多不会有一个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各部队用这种方法注入一些受过较多训练的分子,是会怎样大大增进部队的稳定和军人作风。

我们估计每个志愿兵的训练期限应为两星期,这只是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办法抽出这样短的时间。但是丝毫不妨碍那些有条件的志愿兵留在兵营里整整一个月。

不言而喻,志愿兵住在兵营里应该自费。政府则应该提供帐篷和兵营用具,还可以安排口粮的供应,由志愿兵出钱。这样一来,国家差不多可以不要花一个钱,对志愿兵自己也很便宜,而一切事情都按真正的兵营规章安排了。

我们不怀疑,如果这种尝试哪怕只做一次,它也会得到志愿兵的热烈响应;营会经常满员,而且,也许很快就有必要在别的兵营或阿尔德肖特这里再集合一些这样的营。如果剩余的军官人数太多,可以在某个兵营里建立一个特别的“军官营”,留住期限更长一些,而且我们认为,这样的营至少要一个季度才是有成效的。

但是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使兵营或基干部队给志愿兵军官带来好处;这就是把这些军官临时派遣到正规军的营里工作。不使军官们离家太远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这段派遣期间(譬如说一个

月),志愿兵军官应该像他真正属于该团那样工作。无疑,可以找到办法至少一次派一名志愿兵军官到一个营里工作,同时丝毫不妨碍那些对待志愿兵一贯极好的现役军官的工作习惯和地位。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派那些没有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能够从这里取得好处的志愿兵军官去基干部队,因为把志愿兵军官派到那里不是为了去学起码的知识,而是为了巩固和提高他们已经取得的知识,为了学习他们在自己的部队里学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两点建议——在兵营里编成轮换营和允许派遣适当的志愿兵军官到基干部队一个月——主要以训练军官为目的。我们一再重申,志愿兵部队的弱点是军官;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现在所有的人应该都看得很清楚,靠现行的志愿兵训练制度**不可能建立一支有训练的军官队伍**,所以必须寻求新的训练方式,才能使志愿兵部队的情况不但不会日益恶化,反而会日益改进。

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为了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我们并不想向读者推荐一个拟好了一切细节,规定了一切可能的事项,并且准备立即付诸实现的最终计划。这应该由别人来做,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认真对待的话。但是,我们要说,整个志愿兵运动是一个尝试,如果不准备把这个尝试更进一步试验下去,以便找到一条改进新的军队的可靠途径(这是这个尝试的成果),那末运动最后一定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5 月初
载于 1861 年 5 月 11 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36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月),志愿兵军官应该像他真正属于该团那样工作。无疑,可以找到办法至少一次派一名志愿兵军官到一个营里工作,同时丝毫不妨碍那些对待志愿兵一贯极好的现役军官的工作习惯和地位。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派那些没有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能够从这里取得好处的志愿兵军官去基干部队,因为把志愿兵军官派到那里不是为了去学起码的知识,而是为了巩固和提高他们已经取得的知识,为了学习他们在自己的部队里学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两点建议——在兵营里编成轮换营和允许派遣适当的志愿兵军官到基干部队一个月——主要以训练军官为目的。我们一再重申,志愿兵部队的弱点是军官;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现在所有的人应该都看得很清楚,靠现行的志愿兵训练制度**不可能建立一支有训练的军官队伍**,所以必须寻求新的训练方式,才能使志愿兵部队的情况不但不会日益恶化,反而会日益改进。

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为了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我们并不想向读者推荐一个拟好了一切细节,规定了一切可能的事项,并且准备立即付诸实现的最终计划。这应该由别人来做,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认真对待的话。但是,我们要说,整个志愿兵运动是一个尝试,如果不准备把这个尝试更进一步试验下去,以便找到一条改进新的军队的可靠途径(这是这个尝试的成果),那末运动最后一定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5 月初
载于 1861 年 5 月 11 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36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因为这些事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正是当权的人们对志愿兵运动
的看法有了某种改变，特别是从格雷和里彭勋爵不再当陆军副大臣
时起。几个星期以前——大概是在降灵节星期一——兰尼勒勋爵
在瑞琴特公园检阅了他请来的伦敦志愿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
严厉谴责过兰尼勒勋爵当将军的企图^①。他本来应该请求志愿兵
总监麦克默多上校检阅他的志愿兵，或者为此另派一名有资格的
军官。但是不管是否适宜，他毕竟和他的志愿兵一同到公园去了。
检阅是公开宣布了的，人人都知道，因此招来了一大堆观众。在这
堆人当中，有些人行为极端卑鄙；他们团团围住志愿兵，打乱他们
的横列，使他们无法变换队形，并且投掷石子，据说有些人甚至还
企图用尖东西刺伤军官的马匹。这种行动刚开始，指挥志愿兵
的军官们自然就去找警察了，但是，据说组成理查·梅恩爵士大军
的 6000 人之中，在那里的连一个也没有！结果，由于这堆人的干
扰，兰尼勒勋爵的检阅遭到完全失败。很可能，如果让这种事件任
意发展下去，那末整个事业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就像兰尼勒勋爵以
前的一切企图必定遭到失败一样。由于整个事件的结果，兰尼勒
勋爵成了受难者，得到全体志愿兵的热烈同情。

毋庸置疑，在公开宣布过的检阅中完全没有警察，这不完全是
偶然的。报纸曾经指出，警察一定是接到了躲开的指示，我们知
道，在伦敦志愿兵中间，也盛传总司令部曾经插手此事，总司令部
里有人想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破坏志愿兵运动。因此，伦敦掀起
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愤怒情绪；应该承认，上述情况（据我们所知，这
些事一直没有人试图为之辩护或解说）是很容易造成这种情绪

^① 见本卷第 274—279 页和第 280—286 页。——编者注

的。

本周还发生过另一件事，它绝不说明当局像它答应的那样，打算尽力支援志愿兵。不久前曾宣布，我们曼彻斯特的一个部队打算加入兵营受短期训练。我们相信，这种宣布只是在证实了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之后才做出的。人们都说，曾经口头请求当局发给帐篷等等，也已得到了同意；甚至条件都确定了。我们相信，达成这一协议顶多是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据此，又达成了所有其他协议——关于兵营营地、关于营内小卖部、军官食堂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的协议，——可是当一切准备就绪，正式请求发放帐篷的时候，政府一下子就变卦了，宣布任何帐篷也不能供给！

这当然就破坏了整个计划，部队的全部花费和操劳就算白费了；我们都知道，志愿兵部队是有一切理由小心使用自己存在银行里的一点积蓄的，如果它们有这种积蓄的话。有人告诉我们说，请求政府供给帐篷的志愿兵部队太多，政府不能弄到供所有部队用的帐篷，所以任何部队一个帐篷也不供给。不管这是否属实，政府应该知道，契约总是契约，后来的事件是不能解除政府已经承担的义务的。但是据曼彻斯特和伦敦现在正在开始散布开来的传闻，说这只是一种不值一提的借口而已，政府根本不希望让志愿兵受兵营训练；即使有关的部队要自己出钱自己想办法来为自己弄到帐篷或板房，上面也仍然是不赞成兵营训练的。

这些事情，当然不能促进当局和志愿兵之间的和睦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使运动进一步取得成就所必需的。运动是十分强大有力的，任何政府都止不住它；但是，志愿兵对当局缺少信任和相当局暗中反对，却会很快引起不小的混乱，把运动的发展阻碍一个时期。这是不应当容许的。议会中有很多志愿兵军官。希望他们利

用自己的地位,设法使政府做出解释,以便立即扭转情况并向志愿兵表明:他们将能够得到诚意的支持,不再有暗中的敌视。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6 月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1 年 6 月 8 日“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40 期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

署名:弗·恩·

弗·恩格斯 瓦德西论法国军队

不久前在柏林出版了“法国军队在练兵场和战场”¹³⁹一书，它引起了很大轰动，短期内出了好几版。虽然作者只自称“一个老军官”，但是该书出自前普鲁士陆军大臣瓦德西伯爵将军的手笔，毕竟不是什么秘密了。他是一个在普鲁士军队里占有很高地位的人，使他在那里特别突出的是，他从根本上摧毁了旧的、学究式的训练兵士散兵战、侦察、警戒、以及执行一般轻步兵勤务的制度。他的新方法（我们可能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再来谈它），现在已在这个军队里实行。这个方法的出色之处在于完全摆脱了一切形式方面的学究气，专门激发兵士的智力来执行只有通过许多人的聪明的谐调的协同动作才能很好完成的勤务。十分自然，一个这样重视每个单独兵士的智育的军官，总是非常注意法国军队的，因为法国军队是一支在军事方面以自己兵士的个人智力而最出名的军队；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他把这支军队作为自己研究的特殊对象，在这支军队的队伍中他有许多朋友和熟人，从他们那里他能够得到宝贵的情报资料，这是用不着奇怪的。法军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对欧洲的一支最优秀最勇敢的军队赢得了胜利之后，全欧洲都在研究是什么情况使法军总是取得这样不寻常的胜利。瓦德西将军在上面提到的书里所叙述的，据他看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

解释。

下面是一段从他关于法国军队的一般特点的概述中摘录的文字：

“法军有法兰西性格的一切优点，但也有其一切缺点和短处。它受到真正尚武精神的鼓舞，充满了战斗热情，渴望行动和荣誉，勇敢而大胆，它一向证明着这一点，不久前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和意大利各战场也作出了证明。无论是军官或兵士，特别是精锐部队的军官和兵士，到处都表现出惊人的大胆行动，所以法国兵士在这些战局中的行动一般都值得给予最大的注意。

法国兵士身体和头脑都非常灵活，这虽然往往变成好吵好动，但是无论是打仗还是干任何重活，他们都是不知疲倦和顽强的。

每个个别兵士非常自负，充满雄心，爱好虚荣，他所希望的只有一点——向敌人进攻。他不知道任何困难；他的行动准则是一句古老的法国谚语：‘可能的，等于做成的；不可能的，总是做得成的。’他不多加思索地——的确，往往是不小心地——前进，确信没有任何他不能克服的困难。这样，他总是以他的民族所固有的那种猛劲和热劲力图进行攻击，他的主要力量就在于此。此外，法国兵士聪明、灵巧，特别适合于单人战斗，并且习惯于独立行动。他在困难情况下有办法，灵活；他有特殊的技能，能够给自己安排一个舒服的露营场所，在火线上修复桥梁等物，立刻使房屋和村庄适合进行防御战，然后以最大的顽强性保卫它们。

战争是军队的最如意的环境。法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为战争对于军队来说是正常状态，所以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以真正作战时期的严格性对待军队。团尽可能经常集合在兵营里，此外，还要它们经常改换宿营地，不让在它们中间产生和平时期的习惯。同样，兵士的训练也专门使之适应于战争目的，不做任何为了阅兵目的和事情。从来不根据分列式的表现来评判任何一个部队；所以外国军官们颇为惊奇地看到，当法国营走分列式时，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是步伐随便，横队摇摆，兵士们步子杂乱。扛着枪懒懒散散地行进。

但是这种图景除它的光明面外，也有它的阴暗面。所有这些促使法国兵士猛烈进攻的好的军事素质，只有在你们允许他进攻的时候，才产生自己的辉煌效果。作为他的一切进攻能力的源泉的个人感，也有很大的缺点。一个

兵士如果主要是考虑自己,那就只有在全体顺利进攻时才跟全体一道前进;但是如果全体在压力之下或者突然地被迫退却,那末它的团结即每个人同自己伙伴的联系,就会很快破坏,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部队战术训练马虎(下面将谈到),就使一切坚定性成为不可能,并且导致混乱和彻底瓦解。

此外,法国人生来爱忌妒,并且容易在紧急关头以他们民族所固有的那种轻率性猜疑别人。法国兵士非常热情地乐意跟在自己的军官后面进入战斗,但是只有在这些军官走在他的前面,名副其实地带着他们的时候。兵士所希望的就是这个,所以当他们在火线上前进时,他们便高喊:“肩章带穗的,往前走!”来表达这种希望。这就使校官和将军通常必须走在自己的军队前面进入攻击——当然,这是一个将军的最合适的位置,——法军的军官队伍损失特别大的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当退却不可避免的时候,对军官的信任就很快消失了,甚至公然不服从。由于这些原因,法国军队在重压之下的被迫退却,对它说来,过去总是而且将来也总是带有毁灭性的。”

瓦德西将军本来还可以补充许多东西来描述法国兵士怎样容易在不利情况下丧失对自己军官的信任。兵士对自己的直接长官是否信任(甚至在不止一次的失败以后),是有无纪律的最好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军并不比毫无纪律的新兵强多少。对他们来说,无疑的事实是,他们从来是不可能被打败的,除非是由于“背叛”;所以每当他们吃了败仗,被迫退却不过几百码,或者出乎意料地遭到敌人的突然推进的时候,他们总是高喊:“我们被出卖了!”这与他们的民族性格是如此不可分,以致拿破仑在自己的回忆录(事变以后很久写于圣海伦岛上)¹⁴⁰中,也不公正地指责他的很大一部分将军有某种背叛行为,而法国的史学家——军事史学家和其他史学家——也更加夸大这种指责,甚至变成了最惊人的捏造。民族怎样看待将军,兵士也就怎样看待自己的团和连的军官。几个有力的打击,纪律就全完了;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军队比起来,法军所作的退却是最带有毁灭性的。

关于兵士和军官的补充制度，瓦德西作了如下的叙述：

“法国兵士是用抽签办法从全国青年中间招募的；但是每人有权缴纳政府规定的一笔钱找人代役。这笔钱收进政府支配的基金里，代役者从基金中领取一小笔款子作为应募奖金，而其余的钱则在服役期满时领取，利息在整个服役期间向他交付。但是他应得的那笔钱可能因犯了罪或行为不端而被部分或全部没收。这样，政府就把挑选代役者的事情完全抓在自己手里，并且通常尽量只录用那些服完一期7年兵役、表现可靠、品行良好的人当兵。所以军队总是能够有很多老兵，大多数军士就是从他们中间选拔出来的。服役期限是7年，但是，在这个期限内，大部分兵士实际上只在军队服役四五年，其余时间都在休假中度过。

军士选拔是非常仔细的，他们都受到长官密切的考察，大部分人不但本身品行好，熟悉业务的一切细节，而且机警，有独立精神，有优美的军人姿态，有一定的尊严，特别是在对待兵士方面，他们熟悉应当怎样利用条令给予他们的权力来对待兵士。既然每个军士都能够被提升为军官，他们就竭力与兵士保持一个距离，另一方面也尽一切努力表现自己，给自己的部下做出好的榜样。

目前大多数军士都是代役者。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在自己第一次服役期间成了下士和中士，这多半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而由于应考者太多进不了军事学校的青年，他们为了取得军官军衔自愿参军。这些青年很快晋升为军士，在他们能够成为少尉之前，要通过军士的实际业务考试，服役2—4年以后就常常取得军官军衔。

大多数由列兵提升的军官，取得军官军衔要在服役9—12年、甚至常常在15—20年以后。从随便选出的170名这样的军官来看，16名是在服役2—4年以后取得军官军衔的，62名是在服役5—8年以后，62名是在9—12年以后，30名是在13—20年以后。前16名属于受过教育的青年一类；服役5—8年以后取得军官军衔的62名，是作为战功卓越者提升的。由此看来，平时由列兵提升军官甚至在法国也是很慢的。

军官补充，一部分来自列兵（如上所述），一部分来自军事学校（主要在平时），在军事学校，青年必须学满两年，然后经过严格考试，马上就取得军官军衔。这两类军官彼此间有很大距离；军事学校的学员和兵士出身而受过

教育的人，是用轻视的眼光看那些因服役多年而取得带穗肩章的上了年纪的少尉和中尉的；甚至在一个营里，军官们也远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核心，像在差不多任何别的军队里那样。不过，那些从文化程度较低的列兵中提升的人（在克里木和意大利严重损失以后，他们现在构成中尉和少尉的大部分），在自己的岗位上仍然是非常有用的。虽然他们常常显然很无知，有时很粗鲁，而且举止或风度未必比军士强，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一般是灵活的，非常称职的，他们耿直，严格，准确；他们很好地知道怎样对待兵士，怎样关心兵士，怎样在执行警备勤务时和在火线上用自己的榜样去鼓舞兵士。此外，他们现在多半都是有野营生活、行军和战斗的丰富经验的。

总的说来，法国军官是机灵的，勇敢的；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知道——特别是在火线上——怎样独立自主地行动，怎样用自己个人的勇敢的榜样去鼓舞兵士。如果加上大多数军官都有丰富的行军经验和战斗经验，那末我们应该说，他们具有使自己在本行中处于很高地位的素质。

升级不是根据军龄就是根据长官的选拔。在平时，按军龄提升和按选拔提升的比例是二比一；战时与此相反。但是选拔一般仅限于有文化的军官，而从列兵提升的多数军官只是按军龄升级，所以当他们升到上尉军衔时，年纪就相当大了。这个军衔差不多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如果能够带着上尉军衔退休的话，那他们通常是完全满意的。

所以你们在法国军队里可以看到很多 30—40 岁的中尉和少尉和很多年近 50 的上尉。而在校官和将军中间却有很多比较年轻的人。无疑，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非洲、克里木和意大利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大大加快了职务的提升，把更多的青年提升到了高级指挥职位上。

为了说明从上述两类军官提升到更高军衔的比例，不妨介绍一下下面一个在意大利的死伤军官或占居高级指挥职位的军官的统计资料：从军事学校提升的——将军 34 名，指挥团的上校 25 名，其他的校官 28 名，上尉 24 名，中尉和少尉 33 名；从列兵提升的——将军 3 名，指挥团的上校一名没有，校官 8 名，上尉 66 名，中尉和少尉 95 名。

将军们多半是从校官的基本队伍中提升的，而从司令部和教导部队或精锐部队的校官中晋升的将军则较少。所以他们大都缺少更高级的军事教育；其中只有少数人有 *les vues larges*（远大眼光）。他们在战略上很差，很不善于指挥大兵团，因此很需要上级的命令或内行的帮助，以致在战场上就像在

练兵场上一样，常常给他们订好进入战斗必须完成的运动计划。但是他们头脑健全，善于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知道自己职务的实际方面，他们热情，有雄心，忠于职务。他们的独立作战习惯使他们在火线上得到必要的毅力。他们不怕任何困难；他们能够在紧急关头立即行动，不等待命令，也不去要求下命令；他们不怕负责，而且像所有的法国人那样勇敢，他们总是亲自率领着自己的部队。

他们大部分都在阿尔及利亚、克里木和意大利作过战，所以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作过战的将军当中，有28名老‘非洲人’，其中18名也在克里木作过战。只有一名将军（帕尔土诺）是在意大利完成他的初次出征。

由于这些接连不断的战役，法国军队比任何别的军队有了更年轻的将军。为了平时也保持这种状况，中将65岁、少将60岁退休，领半薪。

简言之，应该认为，法国将军比较年轻，活泼，有学识，有热情，有战争经验，有适应战争的本领，虽然直到现在，才能非凡和深谙重大兵团指挥艺术的人还不多，而且无论克里木战争或意大利战争都还没有提供一个杰出的军事天才。”

谈到法军的队列教练实践的时候，我们的作者说道：

“一个看上去又粗野又笨拙的新兵，当他来到自己的团的时候，往往不到两个星期，有时甚至没有领到他的全部军服，就很尊严地带着一副老兵的威风样子站岗，并且由于他受到缜密的各个教练而很快具有应有的姿态。虽然连、营队列教练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是对于每个单个兵士却是很用心地训练他们学习体操和刺杀、轻剑击剑术和长跑……在练兵场上步兵通常表现得不稳定，漫不经心，所以总有些慢吞吞；但是在行军中却异常敏捷，而且习惯于这种大部分是用跑步进行的长途行军；这种步子在战斗中是常常采取，而且卓有成效的。在法国，人们正是根据这种条件来评价部队的训练质量的；评定一个部队从来不根据它的队列训练得怎样，尤其不是只根据分列式进行得如何。法军实际上也不能够以应有的队形进行分列式，因为他们缺少任何一个好部队归根到底所必需的那种细致的队列教练。”

我们的作者在谈到队列教练的时候，叙述了拿破仑第一的一

个趣闻：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这种马马虎虎的队列教练制度的缺点，并且想竭尽全力予以纠正。在他的严格指导下，教练的精确性曾经保持在法国人所能达到的程度，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队列教官。1809年在雪恩布龙，有一回他想亲自训练自己的近卫营，使它像法国人所说的，faire la théorie（学点理论）。他抽出了剑，下了口令；但是做了几个队形变换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兵士完全弄乱了，于是他把剑入鞘，大叫道：‘你们的……理论见鬼啦！快把这个乱队伍重新整好！’（《Que le diable emporte votre… théorie！ Redressez cette cochonnerie!》）”

关于“土尔科兵”即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段出色的叙述：

“根据从法国军官那里得到的资料，土尔科兵最不喜欢同奥地利猎兵接触。土尔科兵每逢遇到他们时，不但拒绝前进，而且往地上躺，正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威吓也好，殴打也好，都不能迫使他们站起来进行攻击。”

作者关于步兵团的队列教练说道：

“新兵训练进行得非常学究气，同时又非常肤浅；对单个兵士的姿态注意得不够，所以条令执行得相当马虎（在连和营教练中）。很少注意让兵士们好好地立正，好好地看齐，横队紧紧地密集，甚至不注意让兵士们走整齐。看来，兵士们在场并且这样或那样一同走来，就被认为够了。一支习惯于这种马马虎虎的训练制度的军队，在它继续进行进攻行动的时候，当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训练制度所产生的缺点。但是这种制度势必对纪律和战斗队形发生不良影响；每当在敌人火力之下退却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所以试图用应有的队形退却，对法军说来，常常是危险的，所以一支坚强而有很好训练的军队迫使他们接受的退却，对他们说来总是带有毁灭性的。”

瓦德西将军在分析队列教练问题以后，扼要地谈了一下毕若元帅的作战原则（我们已经将这些原则的很大一部分译出，发表在

前几期的“志愿兵杂志”上，标题是“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①。他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同时试图证明（也有一些成功之处），其中大部分是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规程中早已有之的旧的实用规则。我们不谈这一点，也不谈占有相当多篇幅的他从战略观点对 1859 年意大利战局的评论（评论揭露出居莱将军不下 18 个明显的大错误），以便考察法军在这个战局中的作战方法。

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

- 1、一有可能就采取攻势行动。
- 2、不看重长时间的射击并且尽快以跑步转入刺刀冲锋。

这些原则一经知悉，那末结论多半是：法军随时随地都完全不顾一切战术样式而直冲奥军，并且总是不用特别费力而很快就把他们击退或者赶走。

但是战局的经过证明，事情远非如此。相反，它表明：

1、法军在大多数场合（不是永远如此）确实曾经快速跑步攻击自己的敌人，然而他们第一次突击就打败敌人的事情却未必有过。通常他们在这方面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多半是在几次反复攻击后被击败，受到损失，所以在战斗期间，他们差不多常常退却，就像他们常常进攻一样。

2、他们往往攻击而不开火，但一旦他们的攻击被击退，他们就不得不继续进行一个时间的火力战斗，虽然在这个火力战斗中也曾反复进行过刺刀冲击。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附近，这样的火力战斗曾持续了几个钟头。

然后，作者根据从法国军官和奥地利军官那里得到的资料，对

^① 见本卷第 262—270 页。——编者注

法军在意大利战局中采用的战术布势作了评论,我们将从评论中摘录几段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的作者在描述了法国军队的一般特点和战斗原则之后,评论了 1859 年意大利战局时期法军采用的战术布势。

“法国的基干师是由 2 个旅组成的,第一旅包括 1 个猎兵营和 2 个基干团(每团有 3 个营),而第二旅只有 2 个基干团(或者 6 个营)。每营有 6 个连。

战斗队形是第一旅组成第一线,同时各营排成半个距离的纵队,纵队之间留有充分的展开间隔,并且由散兵线掩护。第二旅站在第二线,距第一线 250 码,各营也排成半个距离的纵队,但是纵队间只有半个展开间隔;它们通常位于第一线的一个翼侧的后边。

法国人把意大利战争中通常采用的那种纵队队形叫作营纵队——成纵队的 2 个连叫作营。6 个连是这样排成队的:2 个在前边,2 个保持半个距离的连在它们后边,第二对连后边又有 2 个保持半个距离的连。这个纵队可以排在 2 个中心连后边,也可以排在一个翼侧的 2 个边上连后边。全部由精干兵士组成的近卫军的纵队,总是列于 2 个中心连后边,因此(像英国排在 2 个中心分队后边的复纵队一样),纵队的排队时间和展开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基干部队的纵队通常是排在 2 个右翼连后边。这种队形的意义在于,在这种部署情况下,‘掷弹兵’连(第一连)配置在纵队前边,而轻装或‘轻骑步兵’连(第六连)列于后边。这样一来,由精于兵士组成的这 2 个连可以说组成了一个框架,框架里面放了 4 个不那么可靠的‘中心连’;此外,如果位于后连的 2 个连受命展开成散兵线,那末其中的 1 个就是轻装连,而在第一线的那个掷弹兵连则不动,直到全营必须展开为止。

对于一支主要不是用横队而是用散兵和纵队联合作战的军队说来,这种队形是有很多长处的。三分之一的兵士(2 个前方速)随时能够动用自己的火器,同时纵队又能够简易迅速地展开。纵队的各组成部分间的大距离(连距离的一半,或约 40 码),有助于大大减轻炮兵对于比较密集的纵队的破坏作用;如果注意到通常都是 2 个连散开成散兵线,从而整个纵队由第一线的 2 个连和位于它们后边 40 码地方的 2 个连组成,那末很明显,这种队形是最最

接近横队队形的；在后边的2个连是作为2个前方连的预备队或第二线，而不是作为实际的支援队即不是像欧洲大陆军队的进攻纵队通常所部署的那样，在第一线后边的部队应当给第一线提供实际支援。此外，虽然在意大利战争中时常展开成横队，但是像在伦巴第这样的地形上采用横队作战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些小块田野上，绿篱、壕沟和石墙纵横交错，庄稼和缠着葡萄蔓的桑树密布丛生，穿过高墙之间的道路窄仄得连两辆马车都难以错开，——在这种地形的条件下，部队刚一推进，去直接与敌人接触，任何一种正规的队形就常常失效。唯一必需的是，在正面拥有大量散兵并且用密集的兵群向最重要的据点快速推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不可能有比法国人选择的那种队形更好的了。当三分之一的营在散兵线上的时候——没有任何支援部队，因为纵队在100码之后是一个足够的支援队，——全营很快地向前推进，并且，当散兵距敌人相当近了的时候，他们就腾出营正面的地方并列于它的两翼；第一线齐射并进入冲锋；第二线距第一线40码，作为预备队跟随前进并根据地形情况尽量保持队形。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方法看来最适合这种地形的一切进攻任务，并且能尽量把兵士控制在一起受军官监督。

凡是在地形相当开阔，允许正常运动的地方，进攻都是按照下面办法进行的。在纵队接到进攻命令以前，散兵与敌人进行战斗；支援部队——如果有的话——排列在散兵线的两翼，并且在两翼的横队中展开，以便包围进攻的敌人和向他们进行交叉射击；当纵队走到散兵线的时候，后者填满营与营之间的间隙，与纵队的先头成一横队向前推进；离敌人20码，纵队的先头进行齐射并进入冲锋。如果地形非常起伏，那末营甚至有3个或4个连展开成散兵线；也有消息说（土尔科兵在马振塔附近），整营整营地展开成散兵线。

对付奥军的刺刀冲击时，有时采用了类似英国巷战条令（第六十二条，营教练）所规定的那种方法。纵队的先头连进行齐射，向两翼方面转弯并成二路纵队退到后方再重新整队；跟随它们的连也作同样动作，最后，在最后的连齐射并肃清正面地域以后，全营攻击敌人。

在决定性时刻，命令兵士把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仅仅带上少许面包和背包里面的全部弹药，他们把弹药塞在可以塞的地方。由此就谣传说‘宋阿夫兵通常把自己的子弹带在大裤子口袋里’。

在马振塔附近，宋阿夫兵和近卫第一掷弹团曾经展开一个时候并进行了单发射击和横队射击。在索尔费里诺附近，近卫轻骑步兵师（12个营）在战斗

开始以前也展开成一横队,但是当各营真正投入战斗的时候,它们好像是组成了一个普通的纵队。既然在这两次事件中,展开是在路易一拿破仑直接亲临指挥之下进行的,那大概就用不着怎样怀疑,他下这样的命令是由于回想起了英国的横队演习;但是在两次事件中,大概当决战时机一到,法国军官对本民族的作战方法的爱好和地形的特点就占了上风。

攻击村主是由几个纵队开始的。密集的散兵线在它们前面推进;指定从正面攻击阵地的比较弱的纵队列于最后边,而比较强的纵队则从翼侧迂回村庄。攻下了村庄的部队立刻占领它并加以巩固,而由预备队追击敌人。在保卫村庄时,法军主要指望的是在村庄后面或在它翼侧的预备队,而不是在这些房屋里的强大警备部队。”

上面是关于 1859 年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战术布势一章的摘录,我们用它来结束对瓦德西伯爵著作的考察。虽然英国的地形远不像伦巴第那样起伏,但是,由于这里有无数的篱栅、壕沟、树林和森林地段,再加上地形的起伏和深深横断英国的森林沟壑,所以它是一个比法国北部、比利时和德国的一望无边的平原要起伏得多的战场。如果法国军队有一天企图在英国土地上登陆,那未没有多大疑问,它的步兵队形会很像在意大利采用的那种队形;所以我们认为这种队形对于英国志愿兵不是没有意义的。

瓦德西著作的按语是弗·恩格斯
于 1861 年 6 月写的

载于 1861 年 6 月 22 日、7 月 6 日
和 20 日、11 月 8 日“郎卡郡和柴
郡志愿兵杂志”第 42、44、46 和第
62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弗·恩格斯 牛顿检阅的军事评论

去年在牛顿举行的检阅很成功。由于有种种困难妨碍这次检阅，成功就尤其突出了。这是把郎卡郡的志愿兵合成一个整体的第一次尝试；铁路运输全不是它应有的样子；地面坏极了；天气恶劣。尽管如此，检阅还是进行得非常好；我们的志愿兵回家时都湿透了，又饿又渴，但是他们自豪地意识到，他们完成检阅任务时的镇静、稳定和军容已博得了所有的人的钦佩。

今年的检阅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呢？恐怕不可以。铁路运输很出色，地面好极了；天气晴朗；志愿兵已经经过了第二年的训练；但是我们仍然确信，他们大多数回家时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和成绩是会有不如去年之感的。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部队来到检阅的地方时，标明各旅地点的小旗子已经插好，而且各营的位标一般说来也都立刻安好了。但是有许多营，特别是那些最先到的营，在进入他们的指定地点以前，却长时间地前后移动，停了又动，动了又停。结果，那些在检阅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到的部队，架枪和给兵士们哪怕是几分钟吃吃东西的时间都没有了。这当然不是营长的过错。

在敬礼仪式以后开始了变换队形。但这里未必是什么变换队形。第一旅展开了，进行了几次射击——从中央到翼侧以连为单

位的一次点射,以营为单位的一次齐射,三次横队射击。这时第二旅展开了,在射击结束后接替了第一线。这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将两线都变为四列横队,然后第二线的四列横队由第一线的四列横队的间隔中间穿过。在条令上,这种变换队形是只用于**检阅的目的**,从来不在战斗环境中采用的(第113页)。然后第二旅也同样进行了射击,这时第三旅展开组成第二线,而第一旅则以纵队队形退到后方。我们看出,第一旅完成这些动作很慢,在第二旅射击快结束时才退到一边。后来第三旅走了过来,后面是第四旅,两旅依次进行了射击,然后所有部队排成密集纵队,进行了分列式。

由此可见,受检阅的志愿兵显然不是通过变换队形,而是仅仅通过射击和进行分列式这两个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本领。我们反对把空弹射击作一个标准,据此评判像集合在牛顿的志愿兵这样的部队。有些部队曾经打过大量空弹,因而早就在整齐划一的齐射方面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也有一些部队在连教练、营教练以及打靶教练方面取得了同样好的成绩,甚至更大的成绩,但是以前未必进行过空弹射击。而且那里还有大量为检阅才编成营的零星地方部队,这些部队从来没有可能以营的编成进行齐射,原因很简单,即在此以前它们甚至无法进行营教练。齐射是只凭声音不凭效果来判断的,所以它是兵士们所有任务中最容易的任务;在其他方面有把握的营,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学会齐射。如果受检阅的营绝大多数确实齐射很差,我们倒应该说,我们对这种情况很满意,因为这表明,这些营并没有把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个星期以内随时都能学会的很像做游戏或装门面的技巧上。

检阅计划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它给所有参加检阅的步兵提供了一个随便做些什么的机会。除此以外内容的确十分贫乏。散兵

战是没有的,变换队形也几乎没有,所定的评价标准不仅不足为凭,而且对大多数参加检阅的部队一点也不公平。至于演习的最后一项,即勇猛的骑兵冲锋,那就最好不谈。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大笑料。

在进行分列式时,我们又看出了志愿兵的老毛病——完全忽视距离。只有一个部队通过时保持了比较正规的距离,而且这还不是那个齐射也同样出色的部队。我们认为,保持正规的距离,这在现行志愿兵训练制度中比整齐的齐射更困难更重要。总的说来,分列式的进行表明,同去年相比,改进并不像我们有理由预期的那样,但我们必须说,人数较少的地方部队在这方面的成绩最大。他们应该大受赞扬,因为这些不大的部队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它们大多数都没有副官的帮助,除了教练军士以外没有更高的军官来训练它们。

很遗憾,在郎卡郡的志愿兵中,红色短上衣甚至熊皮帽的数量增加了;这大概是很想摆一摆排场,这对运动不会有任何好处。但这个题目会使我们离开牛顿太远,因此我们将另找机会来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8 月初
载于 1861 年 8 月 10 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49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卡·马克思 美国问题在英国

1861年9月18日于伦敦

比彻—斯托夫人致舍夫茨别利勋爵的信¹⁴¹，不论其本身的价值如何，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它迫使伦敦新闻界中反对北部的报刊出来声辩，在广大公众面前摆出它们捏造的理由，为自己对北部持敌对论调、对南部抱难以遮掩的同情态度作辩护，因为假装十分痛恨奴隶制度的人抱这种态度看起来是颇为奇怪的事情。它们所申诉的第一个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就是当前美国的战争“并不是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因此，不能指望一向只根据“宽大的人道原则”从事战争和关心别国战争的高尚的英国人同情他们美国北部的兄弟。

“经济学家”杂志写道：“首先，说北部与南部的争执是解放黑人的一方与奴役黑人的一方的争执，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是不真实的。”“星期六评论”¹⁴²写道：“北部并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度，也从来没有做出要为反对奴隶制度而战的样子。北部并没有提出公正对待黑人这一神圣原则作为自己的 oriflamme（战旗）；它的 cri de guerre（战斗口号）不是无条件废除奴隶制度。”“观察”¹⁴³写道：“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崇高运动的真正意义方面受了骗，那末，除了联邦派自己以外，还有谁应当对这种欺骗负责呢？”

首先，必须承认这个前提是说得通的。开始进行这次战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奴隶制度，美国当局自己也不辞一切烦劳来否认任

何这类看法。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记住，发动这次战争的不是北部，而是南部；前者只是防卫的一方。如果说，北部是在长期犹疑，表现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忍耐之后，最后才拔出刀剑为拯救联邦而战，而不是为消灭奴隶制度而战，——如果这一点可信，那末，南部在发动战争时，则是高声宣布它举行叛乱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特殊的制度”^①。南部承认它是为争取奴役另一个民族的自由而战，并且不管北部如何声辩，硬说这种自由在共和党¹⁴⁴获胜和林肯当选为总统之后受到了威胁。同盟派的国会自夸它新造的宪法¹⁴⁵与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等人的宪法不同，它的宪法第一次承认了奴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福音，是文明的堡垒和天赐的制度。如果说北部承认自己仅仅为联邦而战，那末南部则是以发动叛乱争取奴隶制度的统治而自豪。如果敌视奴隶制度和奉行理想主义的英国不为北部的话所动，那末究竟为什么又对南部的无耻自供不表示强烈反感呢？

“星期六评论”表示不相信脱离派自己所宣布的东西，企图以此来脱出这个讨厌的窘境。这家杂志能看到更深处的东西，它发现，“奴隶制度同脱离联邦没有什么相干”；杰弗逊·戴维斯一伙所宣布的话只不过是一些“隐语”，它们的“意思同那些祭坛受辱和炉灶被毁的隐语^②差不多，这种隐语在这一类文告中是常见的”。

反对北部的报刊所提出的论据贫乏得很，所以在所有这些报刊上，我们都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语句像数学级数的公式一样在一定的差距上重复着，很少有变异或组合的技巧。

“经济学家”杂志叫道：“为什么正是在昨天，当脱离运动一得到林肯当选

① 奴隶制度。——编者注

② “祭坛”和“炉灶”暗指“家园”、“事业”等等。——译者注

的消息而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的时候，北方人向南部提出，如果南部继续留在联邦里面，就给予它各种保证不侵犯这个可憎的制度，并且十分郑重地否认有干涉这个制度的任何意图呢？同时，为什么北部的领袖们在国会中曾经一再提出以同意不触犯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妥协案呢？”“观察家”问的是：“如何解释北部在对待奴隶制度的问题上愿意对南部作出最大让步以取得妥协呢？为什么要在国会中提议划一条地理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范围内，奴隶制度应当被看做必需的制度呢？南部各州没有以此为满足。”

“经济学家”杂志和“观察家”不仅应该问为什么在国会中提出了克里滕登妥协案¹⁴⁶以及其他妥协办法，而且还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它们没有被通过。他们故意瞎说这些妥协提案是北部接受而南部拒绝的，而事实上，这些提案是被北部为林肯竞选的政党所否决的。提案始够只是停留在 *pia desideria*（良好愿望）的萌芽阶段，没有变成决议，南部事实上根本没有机会来拒绝或同意它们。“观察家”下面的一段话使我们更接近了问题的实质：

“斯托夫人说：‘蓄奴党看到它无法再利用联邦，于是就决定破坏联邦。’这里是承认：直到此时为止，蓄奴党总是利用联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如果斯托夫人能明白指出北部是什么时候开始反对奴隶制度的，那就好了。”

本来可以认为，“观察家”以及英国舆论界的其他宣论官们对当代的历史已够熟悉，无需斯托夫人在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再告诉他们什么了。奴隶主集团同北部民主党¹⁴⁷联盟，有加无已地滥用联邦，可以说是本世纪开始以来美国历史的一般公式。奴隶主通过接二连三的侵占行动把联邦愈来愈变成他们的奴隶，接二连三的妥协办法就是这些侵占行动的各个阶段的标志。这些妥协办法每一次都意味着南部的新的侵占和北部的新的让步。可是同时，南部的这些胜利没有一次不是同北部的以各种党派的名义、在各种口号下、打着各种旗帜的敌对力量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才取

得的。如果说,各次斗争的实际的与最后的结局是南部得利,但留心观察历史事件的人却不能不看到,奴隶主的每一个新的进展都是向他们最终的失败走近了一步。甚至还在密苏里妥协案¹⁴⁸的时候,斗争的双方就已经是如此势均力敌,以致使杰弗逊担心联邦将因这种致命的对立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¹⁴⁹。奴隶主集团的侵占气焰先后达到几个最高点:由于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¹⁵⁰,正如道格拉斯自己所承认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在美国境内扩展奴隶制度的一切法律障碍;此后,一个北部的候选人担保联邦将在古巴为奴隶主征服或购买新领土,以此买得了总统之职¹⁵¹;再后,联邦当局通过德雷德·司各脱一案的判决¹⁵²,宣布扩展奴隶制度是美国宪法的一项法律;最后,实际上恢复了非洲的奴隶买卖,其规模比以前它合法存在的时期还大。但是,在南部被北部民主党纵容而采取的侵占行动达到这些最高峰的同时,已经有无可怀疑的迹象表明:北部的对抗性的力量已经强固起来,不久就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堪萨斯战争¹⁵³,共和党的成立,1856年总统选举时弗里芒特先生得到的大量选票,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了北部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纠正美国历史上半世纪以来在奴隶主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使国家回到它的发展的真正原则上来。除开这些政治现象以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统计学与经济学的的事实表明,奴隶主集团对联邦的滥用已经达到顶点,再往后去,无论是被迫或 *de bonne grace* (自愿) 都必将日益低落。这个事实就是西北部的成长,就是它的人口在1850年至1860年的巨大增长,以及这一切对美国的命运必然发生的新的影响和振兴的作用。

难道所有这些是一段秘密的历史吗?难道只有比彻—期托夫

人的“承认”，才向“观察家”和伦敦新闻界的其他政治明显泄露了“直到此时为止，蓄奴党总是利用联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段被小心隐瞒起来的真情吗？两种对抗势力的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而英国的新闻界人士竟对它们的剧烈冲突感到突然，这难道是美国北部的过错吗？英国新闻界把实际上是长期斗争臻于成熟的结果误认为一朝一夕所产生的奇事，这难道是美国人的过错吗？美国共和党的组成与发展，几乎没有被伦敦报纸提到，这个事实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它们反对奴隶制度的长篇大论的空洞虚伪。可以拿伦敦新闻界中的两个对立面即伦敦“泰晤士报”和“雷诺新闻”¹⁵⁴做例子来看一看：这两家报纸，一个是尊贵阶级的最大的报纸，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报纸。“泰晤士报”在布坎南的官场生涯结束以前不久，还刊载文章为他的统治苦心辩解，并且对共和党人的运动极力诽谤。至于雷诺，在布坎南出使伦敦时期，就是布坎南宠信的走卒之一，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放过一次机会来为布坎南捧场，极力贬抑布坎南的反对者。为什么以公开反对奴隶主侵占和反对奴隶主滥用联邦为其政纲的共和党竟能在北部获得了胜利呢？其次，为什么北部民主党的大部分人，抛弃了他们与奴隶主领袖们的悠久联系，毫不顾及他们半个世纪的传统，牺牲了很大的商业利益与更大的政治成见，群起而支持现在的共和党政府，并且无所吝惜地供给它以人力和金钱呢？

“经济学家”不来回答这些问题，而极力叫喊：

“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废权派在北部和西部，同在南部一样，也一向都受到凶恶的迫害与虐待吗？难道能够否认，华盛顿政府的暴躁与冷淡（且不说缺乏诚意）成为许多年间的主要障碍，使我们有效制止非洲海岸奴隶买卖的努力备受挫折，而实际从事这种买卖的船舶大部分都是用北部的资本所建造，为北部的商人所有，船上人员都是北部的海员吗？”

这真是一篇逻辑的杰作！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之所以不能同情正在摧毁日益衰微的奴隶主势力的北部，是因为它不能忘记北部在受制于这种势力的时候曾经支持过奴隶买卖，殴打过废奴派，使自己的民主制度沾染了奴隶主的偏见。它之所以不能同情林肯的政府，是因为它以前曾经批评过布坎南的政府。它之所以要恶毒地挑剔当前北部的觉醒运动，鼓励北部的那些同情共和党政纲中所指斥的奴隶买卖的人，并且向建立自己的帝国的南部奴隶主殷勤献媚，是因为它不能忘记昨天的北部并不是今天的北部。它需要用这种从旧堡¹⁵⁵学来的讼棍伎俩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英国新闻界中反对北部的这一部分，是由非常卑鄙可耻以致不敢公开说出的隐秘动机所驱使的。

既然这一部分英国报刊的得意手法之一是用先前维护奴隶制度的政府的所作所为来辱骂现在的共和党政府，所以它就用尽一切力量，要英国人民把“纽约先驱报”¹⁵⁶当做唯一真正代表北部意见的报纸。伦敦“泰晤士报”先发出一定的暗示，其他敌视北部的大小报刊的 *servum pecus*（奴仆群）就坚持不懈地跟着学舌。例如，“经济学家”写道：

“在争论激烈进行的时候，颇有一些纽约的报纸和纽约的政客向交战双方劝告：既然双方已把庞大的军队拉到战场上来，那就不要用这些军队来互相厮杀，要用他们打大不列颠去，以便调和内部的争执，包括在奴隶制度问题上的争执，而出其不意地以压倒的兵力进攻不列颠领土。”

“经济学家”知道得十分清楚，“纽约先驱报”之所以企图唆使美国对英国作战，并且这种企图得到伦敦“泰晤士报”的热烈支持，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南部脱离联邦获得成功，阻挠北部的新生运动。

不过，敌视北部的英国报刊毕竟承认了一件事。势利小人“星期六评论”告诉我们：

“在选举林肯时成为争论问题并且加速了这次破裂的，无非是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已有这种制度的各州之内这一点。”

“经济学家”也说：

“有一点是十分确实的：使林肯当选的共和党的目标是防止奴隶制度扩展到尚未设州的领地上去……还有一点是可能的：如果北部获得完全的、无条件的成功，他们就能够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已有这种制度的 15 个州以内，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奴隶制度的最后灭亡——虽然只是可能如此，而不是一定如此。”

1859 年约翰·布朗在哈帕尔斯渡口暴动¹⁵⁷的时候，同一个“经济学家”就曾发表一连串精心制作的文章来证明：由于一种经济规律的力量，美国的奴隶制度一旦不可能扩展，就注定要逐渐消亡。这一个“经济规律”是奴隶主完全了解的。

图姆斯说：“再过 15 年，如果蓄奴领地没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许奴隶逃离白人，否则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

共和党人所宣布的把奴隶制度限制在宪法规定地区的原则，曾经成为 1859 年 12 月 19 日在众议院中第一次以脱离联邦相威胁的人所持的显著理由。当时，辛格尔顿先生（密西西比州议员）问柯蒂斯先生（艾奥华州议员）：“是不是只要南部留在联邦里，共和党就永远不会让它再得到一英寸实行奴隶制度的土地？”柯蒂斯先生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辛格尔顿先生说：这将使联邦解体。他劝告密西西比州退出联邦，愈早愈好——“诸位先生们应该记起杰弗逊·戴维斯曾经率领我们的军队在墨西哥作战，也许他还要活着领导起南部的军队。”撇开经济规律（它使扩展奴隶制度成

为在宪法规定地区内保存奴隶制度的必要条件)不谈,南部的领袖们也一向清楚地懂得需要奴隶制度来维持他们在美国的政治统治。约翰·卡尔洪 1847 年 2 月 19 日在参议院辩护他的提案时曾经明明白白地说,“参议院已是南部在政府中借以保持均势的仅有的机构”;“为了保持参议院中的均势”,必须设立一些新的蓄奴州。不仅如此,即使在他们本土,30 万奴隶主的寡头集团也只有经常向他们的白种平民投以有希望在美国内外征服新地区的诱饵,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如果说,按照英国新闻界宣谕官的高论,北部已经坚决要把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地区以内,这样来循着宪法的途径消灭奴隶制度,这难道还不足以获得反对奴隶制度的英国的同情吗?

然而,英国的清教徒们似乎非要有一场明白宣告为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战争才感到真正的满意。

“经济学家”说:“既然这不是解放黑人的战争,那末,还有什么理由能够光明正大地使我们热烈同情联邦派的事业呢?”

“观察家”说:“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的同情是在北部方面,因为我们那时以为它确实是要严重抵抗各蓄奴州的侵占”,确实是主张“解放黑人,作为公正对待黑人的措施”。

可是,就在这些报刊告诉我们,说它们之所以不能同情北部,是因为它所进行的战争不是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的时候,它们却又在同一号的报纸上说:“宣布解放黑人并号召奴隶普遍暴动”,这样一种“不顾一切的手段”是一件“仅仅这种想法本身就使人厌恶和怕人的”事情,而“妥协”要比“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取的和被如此的罪恶所玷污的胜利可取得多”。

由此可见,英国热心于一场废除奴隶制度的战争,完全是虚伪的。下面这段话就露了马脚。

“经济学家”写道：“最后，难道康里耳税则能使他们有权指望我们感激和同情吗？或者，难道北部获胜时必然会把这种税则推广到全国，就有理由使我们吵吵嚷嚷地热望他们成功吗？”

“观察家”写道：“北部的美国人所热心的实际上只是一件事，即自私自利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南部各州非常厌恶北部用保护关税制的税则来夺走他们奴隶的劳动果实。”

“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杂志是互相补充的。后者老实地承认，对于它和它的附和者来说，同情问题只是一个关税税则问题，而前者则把北部与南部的战争归结为关税税则战争，归结为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之间的战争。“观察家”也许不知道，即使是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废除税则派，如杰克逊将军所证实的，也只是借口实行了保护关税来脱离联邦¹⁵⁸；但是，即使是“观察家”也应该知道，现在的叛乱并不是摩里耳税则¹⁵⁹通过以后才爆发的。事实上南部也不可能厌恶北部实行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夺去了他们奴隶的劳动果实，因为在1846年至1861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税则。

最近一期的“旁观者”¹⁶⁰以惊人的方式点破了某些反对北部的报刊的心思：

“反对北部的报刊借口遵从事实的不可移易的逻辑，并且为这种借口作辩护，而实际上它们究竟认为怎样才合适呢？它们论证说，联邦分裂是合适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是结束这场‘无缘无故的，兄弟相残的战争’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另外，由于事情的结局已很明显，它们还发明一些理由，说这样做很适合这个国家的精神需要。当然，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这些理由只是一种事后看法，用来马马虎虎地代替天意和‘上天待人公平合理’的说法。这些报刊发现，分裂成为敌对的集团，将是美国各州的极大的利益。这些州将互相限制彼此的野心；它们的力量将彼此抵销，而英国一旦与其中的一个州或几个州发生争端，仅仅是猜忌心就可以使敌对的集团来帮助我们。它们断言，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十分有利的情况，因

为这将解除我们的忧虑,并鼓励美国各州之间的政治‘竞争’,这种竞争是诚实与纯结的最大保障。

现时在我们中间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同情南部的人极力宣扬的就是这些理由。翻译成英文——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英国人的论据竟需要翻译未免使人痛心——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因这次‘兄弟相残的’战争具有现在这样大的规模而慨叹,是因为它可能把敌对各州集团之间未来一连串长久的小战争、愤怒和猜忌,集中而成为一次可怕的大乱。敌对的美国各州一定不可能在和平或和谐中相处,这是真正的实情(怀有上述那种非英国感情的人自己是了解这种实情的,尽管他们用体面的言词掩盖着实情)。由造成当前冲突的那些原因所引起的恶意敌对状态,将长期存在下去。这些人断言:各州集团在关税问题上利害各有不同。各州一旦分离,这种关税上的利害不同就要成为经常的小战争的源泉,而奴隶制度这一个全部冲突的根源就将成为无数的仇恨、不和与斗争的源泉。在敌对各州之间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稍微稳定的均势。可是这些人仍然认为:这种未来的长期不息的斗争,是天意注定的解决目前已经爆发的大争执的办法,这个办法之所以受到欢迎,唯一的真正的理由是:如果目前这个大规模的冲突会导致一种复兴的和更加强有力的政治统一,那末,与此相反,无休止的小冲突却会造成一个英国无须畏惧的弱小而分裂的大陆。

我们并不否认,美国人自己,由于他们对英国常常表现不友好的和挑战的态度,也曾经给这种卑鄙的感情播下了种子,但是,老实说,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怀有这样的感情是卑鄙的。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把彻底解决拖延下去,美国就没有希望得到深固的和持久的和平,这种拖延会使美利坚国家衰落和崩溃,使它变成许多纷争不已的氏族与部落。但我们仍然呼天抢地,反对目前的‘兄弟相残的’争斗,因为它有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希望。我们怂恿美国人选择一个充满无数小型战争的渺茫的未来(这些小战争同样是兄弟相残,而且或许远为败坏人心),因为这样一来,就将使我们摆脱美国的竞争。”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9 月 1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1 年 10 月 11 日“纽约每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论坛报”第 6403 号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棉花贸易

1861年9月21日于伦敦

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终于开始严重地影响棉纺织工厂，现在它们的棉花消费已比正常消费减少 25%。这个结果，已因生产一天天减少而成为事实，许多工厂每周仅开工 4 日或 3 日，无论是在已经缩减工时的工厂中，或者是在仍然全周开工的工厂中，都有一部分机器停开，有些工厂则暂时完全停闭。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布莱克本，不仅缩减工时，同时还削减工资。但是，缩减工时运动只不过刚刚开始，我们还可以有十分把握地预言：几个星期以后，这一个行业将普遍实行每周工作 3 日，同时大多数工厂要停止开动大量机器。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在承认棉花供应困难方面，总的来说，是极为迟缓和勉强的。

他们说：“上一季的美国棉花早已全部运抵欧洲。新棉收购刚刚开始。即使根本没有战争和封锁，我们也不能多得一包棉花。航运季节不到 11 月底不会开始，而通常是到 12 月底才有大宗输出。在此以前，无论棉花是留在种植场里，或是打包之后立即运向港口，都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封锁在今年年底以前任何时候停止，明年三四月我们就会有充分的棉花供应，好像这次封锁未曾宣布过一样。”

在商人心理的最深处，曾怀有这样的幻想，即整个这次美国危

机,包括这一次封锁,都将在年底以前终止;或者是帕麦斯顿勋爵将用强力打破这个封锁。但是后一种想法现在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曼彻斯特了解到:两个巨大的势力,即已经在北美的工业企业中投入了巨量资金的金融资本家,和以北美为主要来源地的谷物贸易界,将联合起来阻止英国政府采取任何无端的侵略行动。希望封锁将适应利物浦或曼彻斯特的需要而及时解除,或者希望美国的战争将以与脱离派妥协而结束,这些希望都在英国棉花市场中前所未有的一种情况面前破灭了,这种情况就是美国人在利物浦对棉花所进行的活动——部分是投机活动,部分是为了把棉花再运回美国。结果,利物浦的棉花市场在过去两星期内极为狂热。除了利物浦的商人投机性的棉花投资以外,还加上了急于为自己储备冬季原料的曼彻斯特工厂主以及其他各地的工厂主的投机性的投资。后一种交易的规模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充分看出:曼彻斯特很大一部分空余的仓库已为这种储存所占;从9月15日到22日这一个星期中,中等美棉的价格每磅上涨了 $\frac{3}{8}$ 辨士,上等美棉上涨了 $\frac{5}{8}$ 辨士。

棉花价格自美国战争爆发以来就不断上升,但原料价格与纱布价格之间的恶性失调直到8月最后一两个星期才表现出来。在此以前,因美国的需求锐减而可以预察的棉织品价格的任何重大跌落,都被第一手的货物囤积以及向中国和印度的投机性运销抵销了。可是这些亚洲的市场很快就达到了饱和。1861年8月7日的“加尔各答行情报”¹⁶¹写道:

“存货日益充斥,自本刊上期出版以来,运进的单色棉布不下2400万码。国内消息说明,棉织品仍在陆续启运,超过了我们的需要,这样下去,情况难期好转……孟买市场也是大大地供过于求。”

还有一些情况也助长了印度市场的萎缩。西北各省在不久以前的饥荒之后又受到霍乱的蹂躏，而整个下孟加拉则因大雨而成泽国，稻谷遭受了严重损害。据上星期英国收到的加尔各答来信说，40支纱每磅售出后的实得是 $9\frac{1}{4}$ 辨士，而在曼彻斯特，则低于 $11\frac{3}{8}$ 辨士是不能买到的；40英寸衬衣布的出售与曼彻斯特现在的价格相比每匹要吃亏 $7\frac{1}{2}$ 、9以至12辨士。在中国市场上，价格也因进口货物积存过多而被压低。

在这些情况下，既然对英国棉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减少，棉纺织品价格自然就不能跟上不断上涨的原料价格；相反的，纺、织与印染在许多情况下都将不能收回生产成本。下面是曼彻斯特最大的工厂主之一关于粗纱所说的一个情况，现在拿来作例子：

	每磅价格	棉价与纱 价 差 额	每磅纺 工成本
1860年9月17日			
棉花成本	$6\frac{1}{4}$ 辨士	4 辨士	3 辨士
16支纱(经纱)售价……	$10\frac{1}{4}$ 辨士	—	—
	利润——每磅 1 辨士。		
1861年9月17日			
棉花成本	9 辨士	2 辨士	$3\frac{1}{2}$ 辨士
16支纱(经纱)售价……	11 辨士	—	—
	亏损——每磅 $1\frac{1}{2}$ 辨士。		

印棉的消费量正迅速增长，而且随着棉价的再涨，印棉供应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要在几个月内改变一切生产条件，扭转商业的趋势，仍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英国现在正自食其多年来在庞大的印度帝国进行罪恶统治的后果。英国要用印棉代替美棉，必须克服两个障碍，即整个印度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和印度农民无力利用有利条件的不幸处境。对于这两种困难，英国人只能

责怪自己。一般说来，英国的现代工业有两个同样畸形的支柱。一个是作为爱尔兰和很大一部分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食品的**马铃薯**。这一个支柱被马铃薯病害和继之而来的爱尔兰的灾难¹⁶²扫荡掉了。于是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使千百万劳动者再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英国工业的第二个支柱是美国奴隶种植的棉花。当前美国的危机正迫使英国人去扩大自己的供应来源，把棉花从繁殖奴隶和消费奴隶的寡头们手中解放出来。只要英国棉纺织工厂主还依靠着奴隶所种植的棉花，就可以如实地断言，他们是依靠着一种双重的奴隶制：对英国白人的间接奴隶制相对大西洋彼岸黑人的直接奴隶制。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9 月 21 日

载于 1861 年 10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40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1861年10月5日于伦敦

“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这是一位出名的英国作者^①就所谓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见。这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内改革，就从来没有在“泰晤士报”的支持下实现过；相反，“泰晤士报”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议会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¹⁶³，都可以作为例子。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就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因此，这家报纸对舆论的真正影响只限于对外政策的范围。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广大公众，特别是资产阶级，都不像在英国那样，对本国的对外政策问题表现得那样无知。这种无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从1688年光荣革命¹⁶⁴时期起，在指导英国对外政策方面总是由贵接一手垄断。另一方面，

^① 罗·娄。——编者注

日益发展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阉割了资产者的一般智力,使他们的全部精力和智力局限在商业利益、工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狭小圈子里。结果,在对外或国际政策方面,贵族为资产阶级**动手**,而报界则为它**用脑**;并且很快地这两个方面——贵族和报刊——就理解到,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应当联合起来。只要翻开“科贝特氏政治纪事报”¹⁶⁵,就可看到,从本世纪初起,伦敦各大报就一贯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高贵掌权人充当辩护律师。虽然如此,但还是经过了一些过渡时期,才形成了现时的局面。一手垄断对外政策的贵族,起初缩小成寡头集团,以一个名为内阁的秘密会议为代表,然后,内阁又被一个人挤掉,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他在近30年来篡夺了管理不列颠帝国国家资源和决定其对外政策方针的绝对权力。

与这种篡夺行为同时,由于集中规律在报业起着比在纺织业中更快的作用,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如果说,在执掌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垄断权从贵族转给了寡头会议,又从寡头会议转给了一个人即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那末,在为国家考虑和判断其对外政策并代表舆论方面,垄断权则从整个报界转给了一家报纸即“泰晤士报”。帕麦斯顿勋爵掌管不列颠帝国的对外政策于密室,不仅广大公众或议会,甚至他自己的同僚都不知道他的真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设法抓住这家篡夺了以英国人民名义广泛议论他的秘密勾当的权力的唯一报纸,那他就太笨了。至于在自己字典里从来没有“美德”一词的“泰晤士报”,则必须表现出超乎斯巴达刻苦精神的美德,才不致与实际独掌帝国国家资源的统治者结为一伙。因此,从法国 coup d'état (政变)时起,由于英国的一个集团的政府已被几个集团的政府所代替,因而帕麦斯顿

的篡夺已不再受到任何敌手的威胁，“泰晤士报”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奴隶。帕麦斯顿设法把“泰晤士报”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到内阁中来担任次要的职位，并且把另一些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予以安慰。从这个时候起，“泰晤士报”在不列颠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就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的舆论。“泰晤士报”必须为帕麦斯顿勋爵想做的事准备舆论，并且强使舆论赞同他已经做的事。

这种奴隶劳动需要付出怎样的辛苦，在最近的议会会议期间暴露得最为清楚。这次会议对帕麦斯顿勋爵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某些无党派的下院议员，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起来反对他所篡夺的独裁权力，并且揭露他以往所做的坏事，想让国民了解到，这样的无限权力保持在他手中是多么危险。邓洛普先生开始了攻击，提出关于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院提供的阿富汗文件的议案，并且证明，帕麦斯顿确实伪造了文件¹⁶⁶。“泰晤士报”在发表议会报告时，略去了邓洛普先生发言中所有在该报看来可能大大损害它的主子的地方。稍后，蒙台居勋爵提议公布有关1852年丹麦条约的全部文件，谴责帕麦斯顿，说他在为了某一个外国的利益而修改丹麦的王位继承制的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¹⁶⁷，并且谴责他提供明明是假的材料欺骗下院。但是，帕麦斯顿却找到机会同迪斯累里先生达成了一个协议，用法定人数不足而中断会议的办法搁置了蒙台居勋爵的议案，这样一来，果然就把问题蒙混过去了。尽管如此，蒙台居勋爵的发言，在会议因法定人数不足而中断之前，还是延续了一个半小时。“泰晤士报”已事先得到帕麦斯顿关于会议将中断的通知，因此，专门负责歪曲和假造议会报告的编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日，结果，蒙台居勋爵的

发言未经歪曲就在报纸上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出了差错，便写了一篇社论，告诉约翰牛：因法定人数不足而闭会是打断无聊的发言的妙法；蒙台居勋爵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不是用最不客气的方式摆脱无聊的议会发言，国家事务是无法管理的。在最近的会议上，帕麦斯顿又被追究责任，这次是亨尼西先生提出关于向议会提供外交部在 1831 年波兰革命期间的往来信件的议案。“泰晤士报”又像对邓洛普先生的议案那样使用了干脆隐瞒不提的办法。该报关于亨尼西先生发言的报道是 *in usum delphini*¹⁶⁸ 的现行版。如果注意到，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才能在冗长的议会报告从下院送到编辑部的当天夜里读完这些报告，并且在当天夜里把它们歪曲、修改、伪造得丝毫不损于帕麦斯顿的政绩，那末，应该承认，不管“泰晤士报”能从它对高贵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轻松愉快的。

因此，如果说，对于在英国下院中头一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泰晤士报”还能够用造谣和隐瞒的办法这样来迷惑舆论，那末，对于远在国外所发生的事件，例如美国的战争事件，它运用造谣和隐瞒的艺术就真正是神通无限了。在讨论美国问题时，该报竭尽全力使英国人和美国人互相反对。不过，它这样做既不是由于同情英国的棉纺织业巨头，也不是由于关心英国的任何现实利益或可能的利益。它直截了当地是执行自己主子的命令。因此，伦敦“泰晤士报”在最近一星期改变调子，就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帕麦斯顿勋爵想放弃他迄今对合众国所采取的极端敌对的立场。几个月来“泰晤士报”一直吹捧脱离派的进攻力量，大谈合众国无力对付脱离派，而今天却在一篇社论里表示完全相信北部的军事优势。对于这次改变腔调是由主人指使这一点，下述情况作了充分有力的

证明,这就是: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人知道是与帕麦斯顿有关系的报刊,都同样地转变了方向。这些报刊之一的“经济学家”,相当明显地向舆论的投机者暗示:已经到了“详细检查”自己的所谓“对合众国的感情”的时候。现在让我引用“经济学家”上有关的一段话,我认为必须引它来证明帕麦斯顿的报人接到了新指示。这段话如下:

“我们老实承认:北方人一方有理由鸣不平,我们一方也必须更克制一些——可能要比过去通常所表现的态度更克制一些。我们的起领导作用的报纸太爱引证一些向来名声不好、影响微弱的报纸,并且认为它们代表合众国的观点和立场;现在大家差不多已经肯定地知道:它们骨子里都持着脱离派的观点,用别人的旗号掩抑自己;它们假装拥护北部的极端观点,同时却为南部说话,大概还拿南部的钱。例如‘纽约先驱报’,在英国未必有人会真心认为它表达共和国北部的性格或观点。让我们重复一下:我们必须非常克制,否则,我们对联邦派的正确的批判态度就可能无形中变成对脱离派的承认和保护。一般人通常都很容易有所偏袒。不过,我们无论怎样激烈地批评北部的言行,决不应当忘记:南部脱离时所持的出发点,它开始脱离时所采取的行动,都是我们这方面深深厌恶的。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联邦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是难堪的愚昧的狂妄行为。当然,我们同情南部实行低额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意图。当然,我们希望,出产那么多原料、需要那么多工业品的一些州的繁荣局面,不被中途打断或完全毁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实行脱离的真正目的和主要动机不是维护在自己的领土上的蓄权权利(北方人在这方面的让步并不小于南方人的要求),而是把奴隶制推广到迄今根本没有这种该死的东西、但种植场主幻想在将来开拓的广阔而无限制的土地上去。这一目的,我们一向都认为是不明智的、不正当的和令人厌恶的。对于奴隶制在南部各州所建立的社会秩序,英国人是越看越厌恶,越看越骂得厉害的。所以我们必须告诉南方人,在扩大开发种植场主的州以及他们所觊觎的新领地的荒地方面,无论我国可能得到多少金钱上或商业上的好处,都永远不能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丝毫改变,不能阻碍我们表达我们的观点,不能使我们将来不去采取必要的或适当的行动。据推

测，他们(脱离派)还醉心于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用美洲完全停止供应的方法使法国和英国遭受损失和困难，这样把国家弄到枯竭的地步，然后，迫使这两国的政府为他们讲话和强迫合众国停止封锁……绝对没有任何希望使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有一会儿感到自己有权作出这种露骨的和不能容许的敌对合众国的行动……我们对南部的依赖小于南部对我们的依赖，这一点南方人很快就会懂得的。因此，我们希望他们懂得：只要还存在着奴隶制度，我们之间就会隔着相当高的道德障碍；无论是默然的鼓励，或者是大胆的公开干涉，都是我们根本不能想像的。郎卡郡并不是英国，同时，为了照顾我们工业区居民的荣誉和勇敢，应该说，即使两者的情绪可以等同，归根到底棉花也成不了国王。”

我想加以证明的，仅仅是帕麦斯顿以及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的伦敦报刊正在放弃对合众国的敌对立场这一点。至于发生这种法国人所说的 *revirement* (大转弯) 的原因，我想在我以后的通讯中再来说明。最后再补充一点。福斯特先生，布莱得弗德的议员，于上星期二在布莱得弗德机械学院礼堂作了题为“美国内战”的讲演，深入分析了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并且成功地驳斥了帕麦斯顿的报刊的谰言。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0 月 5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1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每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论坛报”第 6411 号

卡·马克思 伦敦“泰晤士报”评 奥尔良亲王赴美

1861年10月12日于伦敦

正当普鲁士国王访问贡比泉¹⁶⁹的时候，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几篇尖刻的文章，把拉芒什海峡彼岸大大地触犯了一下。“国家报，帝国报”¹⁷⁰反过来把“泰晤士报”的作者们描写成头脑为醇酒所迷、笔尖浸了污水的人。这种偶尔的相骂，只不过是使舆论看不清印刷所广场¹⁷¹与土伊勒里宫的亲密关系罢了。在法国国境以外，对这位十二月的英雄再没有比伦敦“泰晤士报”更大的捧场人了；而这家报纸越是时而装出监察官卡托对待凯撒的腔调和神气，它的服务也就越是可贵。

有几个月，“泰晤士报”一直在侮辱普鲁士。它利用一个小小的麦克唐纳案件¹⁷²告诉普鲁士：英国将欢迎莱茵河各省从霍亨索伦的野蛮统治之下转到波拿巴的开明专制之下去。这不但激怒了普鲁士的宫廷，而且也激怒了普鲁士人民。“泰晤士报”不赞成一旦普法发生冲突英普结成同盟的主张。它竭尽全力使普鲁士相信，不要指望能从英国得到什么帮助，最好是同法国取得某种谅解。当软弱无力、俯仰随人的普鲁士国王终于决定访问贡比泉的时候，“泰晤士报”本来是可以自豪地叫喊《quorum magna pars

fiu》（“此事我有大功”）的^①，但是现在，要从英国人的记忆中抹去“泰晤士报”曾经以为普鲁士君主探路这一事实的时候也到来了。因此，才有它这一阵戏剧中的雷霆，同样也才有“国家报，帝国报”这一阵回敬的雷霆。

“泰晤士报”现在又恢复了它的波拿巴主义的死敌的立场，因而又能为十二月的英雄效劳了。一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路易·波拿巴每逢遇到与他的竞争者——法国王位的追求者的声誉有关的事，自然是极其敏感的。在奥马尔公爵抨击普隆—普隆的小册子的事件中¹⁷³，他曾经招来许多讪笑，他的行动比所有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算在一起还更多地帮助了奥尔良派的事业。在这些不久以前的日子里，法国人民又一次被提醒把普隆—普隆与奥尔良亲王们作一番比较。在普隆—普隆启程赴美国的时候，在圣安东郊区^②就出现过一张漫画，在漫画上，他被画做一个寻找王冠的大胖子，但同时却装作一个最和善的、特别嫌恶火药气味的旅行者。而当普隆—普隆返回法国，并没有给自己在克里木和意大利博得的荣誉增添什么的时候，奥尔良亲王们却渡过大西洋，投效美国军队去了¹⁷⁴。波拿巴的阵营里因此发生很大的混乱。通过容易收买的巴黎报刊来发泄波拿巴派的愤怒是没有作用的。这样做只会暴露帝制派的恐惧，重复一下那次小册子的丑事，并且会引起一个讨厌的对比：一方面是在共和党旗帜下为反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奴役者而战的流亡亲王们，另方面则是一个曾经宣誓去当英国的特别警察，分享镇压英国工人运动的荣誉的流亡亲王¹⁷⁵。

谁来使十二月的英雄脱出这种窘境？除了伦敦“泰晤士报”还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章。——编者注

② 巴黎的一个郊区。——译者注

有别人吗?如果同一家伦敦“泰晤士报”,在1861年10月6、7、8和9日曾经虚伪地批评过贡比臬的访问,激怒了“国家报,帝国报”,而在10月12日又来无情地攻击奥尔良亲王们参加美国军队,那末,不是就证明路易·波拿巴反对奥尔良亲王是有道理了吗?难道“泰晤士报”的文章不会译成法文,为巴黎的报刊所评论,被 *préfet de police* (警察局长) 发给各省的报刊,并且作为一项公正无私的判决,即路易·波拿巴本人的仇敌伦敦“泰晤士报”对奥尔良亲王最近行动的判决而传遍法国吗?因此,今天的“泰晤士报”才出面对这两位亲王进行十分粗暴的攻击。

路易·波拿巴自然是一个大生意经,他不会像官方的舆论贩子那样瞎断美国战争。他知道,英国、法国、德国、欧洲的真正的人们都把合众国的事业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看作自由的事业,而且他们不顾种种被收买的诡辩言论,仍然认为合众国的土地是欧洲千百万无地的人们的自由土地,是他们的天赐乐土,现在他们应当手执武器来保卫它,使它免遭奴隶主的贪婪的侵占。路易·拿破仑更知道,在法国,群众是把维护联邦的斗争同他们的祖辈为奠定美国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拿起武器站在美国政府这一方面的法国人,就是在履行拉斐德的遗志¹⁷⁶。所以,波拿巴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为奥尔良亲王赢得法国人民的好感,那就是奥尔良亲王参加合众国军队的行伍。他一想到这一点便不寒而栗,因此,他的捧场的监察官伦敦“泰晤士报”今天才告诉奥尔良亲王说:“他们自降身价,为这个不名誉的事业服务,不会增高他们在法国国民中的声望。”路易·拿破仑知道,从他的 *coup d'état* (政变) 以来,欧洲各敌对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师出无名、妄动干戈、假借虚伪的口实而进行的欺骗性的战争。对

俄战争和意大利战争(且不说对中国,对交趾支那的海盗式的征战¹⁷⁷和诸如此类的战争),从没有得到过法国人民的同情,法国人民本能地感觉到,这两次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加强 coup d'état 铸下的锁链。而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战争是美国战争。

欧洲各国人民知道,南部的奴隶主是以发表宣言,说奴隶制度的存在与联邦的存在再不能相容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因此,欧洲各国人民知道,为联邦的继续存在而战就是为反对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战,这场战争是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向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作战。

奥尔良亲王们恰恰投身于这样一个战争,——一个气势宏大,目标崇高,因而与欧洲自 1849 年以来历次师出无名、妄动干戈、渺小琐屑的战争迥然不同的战争,自然使路易·波拿巴感到极其难堪。因此,伦敦“泰晤士报”才觉得必须声明:

“无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与这个国内战争——这在历史上一切国内战争中是一次最为师出无名和妄动干戈的内战——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对公共道德的违犯。”

当然,“泰晤士报”也必须大大恭维一番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费里诺的胜利者,以此来结束它对奥尔良亲王“自降身价,为这个不名誉的事业服务”而进行的攻击。它写道:

“要是把斯普临菲尔德和马纳萨斯这样的战斗^①同塞瓦斯托波尔和索尔费里诺的战绩相比,是很愚蠢的。”

下一班邮件就会表明,皇帝的报刊将如何按照预定计划来利用“泰晤士报”的文章。一个急难时的朋友,如谚语所说,是抵得过

① 指 1861 年夏美国北部的军队在这两个地方的大败。——译者注

走运时的一千个朋友的,而伦敦“泰晤士报”的秘密盟友现在恰好正在异常困窘的时候。

继缺粮而来的缺棉,与农业歉收相伴的商业危机,加上关税收入减少和金钱困难,已迫使法兰西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 6%,并且同路特希尔德家族和贝林议定从伦敦市场上借 200 万英镑,把法国政府手中的有价证券在国外抵押;用了这种种办法也不过只剩下 1200 万的储备,而债务却已超过 4000 万。这样的经济状况,正好为王位竞争者造成了可以投下双倍赌注的良好形势。圣安东郊区已经发生过抢粮骚动,所以目前是最不宜让奥尔良亲王夺取人望的时候。这也就是伦敦“泰晤士报”出面狂暴攻击别人的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0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1 年 11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42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北美内战¹⁷⁸

1861年10月20日于伦敦

数月以来，伦敦新闻界的主要周刊和日报对美国内战一直重复着同样的一支调子。它们一方面诬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时又惴惴不安地防备别人怀疑它们同情南部的蓄奴州。事实上它们是在不断地写着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攻击北部，而另一篇文章又为自己攻击北部作辩护。Qui s'excuse s'accuse (自我辩解者是自供有罪)。

辩解的论点主要是：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是一个关税战争；进一步说，这场战争是无原则的，它没有触及奴隶制度问题，事实上问题只牵涉到北部的主权欲；最后，即使正义是在北部一方，难道想借武力压服 800 万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是很狂妄吗？南部的脱离难道不正好使北部完全摆脱与黑奴制的关系，并且使北部及其 2000 万居民和广大的土地获得梦想不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吗？因此，难道北部不应该把脱离运动当作一桩喜事来欢迎，倒应该用流血而无效的内战来镇压脱离运动吗？

让我们逐条研究一下英国新闻界的辩护词吧。

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第一条辩词这样说——仅仅是一

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而英国自然是站在自由贸易一边的。奴隶主是应当享有奴隶劳动的全部果实呢，还是这些果实应当被北部的保护关税主义者骗者一部分？据说，这就是这次战争所争的问题。这个辉煌的发现是“泰晤士报”的功劳，“经济学家”、“观察家”、“星期六评论”tutti quanti（之流）的报刊则进一步发挥这个论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发现不是出自查理斯顿，而是出自伦敦。在美国无疑每一个人都知道，1846—1861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税则，众议员摩里耳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只是在1861年叛乱爆发以后才在国会通过。所以脱离运动并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摩里耳税则才发生的，充其量不过是因为脱离运动已经发生，国会才通过摩里耳税则。当南卡罗来纳州于1832年第一次发动脱离运动¹⁷⁹的时候，1828年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确实曾经被用来作为借口，但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点人们从杰克逊将军的声明中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一次，旧的借口事实上并未被重复。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中，都完全避而不谈税则问题，因为最有势力的南部几州之一的路易西安纳州的植糖业是完全依靠保护关税政策的。

但是，伦敦新闻界又辩解说，美国的战争无非是一个用武力来维持联邦的战争。北方佬不能下定决心从自己的国旗上取消十五颗星。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角色。当然，如果这次战争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那就又当别论了！但是，奴隶制度问题，如“星期六评论”所断然宣称的，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这次战争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发动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它有好几个月一直平静地听任脱离派夺取联邦的堡垒、兵工厂、造船厂、海关、信贷机关、船只和武器储备，

侮辱联邦的旗帜，俘掳联邦的军队。最后，脱离派决定大动干戈以迫使政府放弃其消极态度，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才动手炮击查理斯顿附近的萨姆特尔堡垒。4月11日（1861年），他们的博雷加德将军在和萨姆特尔堡垒司令官安德森少校的会谈中获悉，该堡垒只备有3天的给养，3天后必将不战而降。为了防止他们不战而降，脱离派第二天（4月12日）拂晓便开始炮击，几小时之内即将该堡垒攻陷。关于这件事的电讯一传到脱离派召开国会的地方蒙哥马利，陆军部部长沃克就立刻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公开宣称：“没有人能够说**今天开始的战争**将在何处结束。”同时他预言：“在5月1日以前，南部同盟的国旗就将飘扬在华盛顿的古老的国会大厦的圆顶上，而在短时期内大约也会飘扬在波士顿的凡尼耳会堂¹⁸⁰上。”只是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林肯征集75000人来保卫联邦的文告。炮击萨姆特尔堡垒截断了唯一可能的依照宪法途径的出路，即召开一个美国人民的全国代表大会，像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那样。对林肯来说，这时只剩下这样的选择：或者是逃出华盛顿，撤离马里兰、德拉韦两州，并且放弃肯塔基、密苏里、弗吉尼亚等州，或者是用战争来回答战争。

关于美国内战的原则问题，已经由南部在破坏和平时发布的战争口号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总统斯蒂文斯在脱离派的国会上宣称，在蒙哥马利新近制造出来的宪法与华盛顿、杰弗逊的宪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奴隶制度第一次被承认为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制度和整个国家建筑的基础；而革命的前辈，那些被十八世纪的偏见所愚弄的人们，却把奴隶制度看做是一种从英国输入并将逐渐消灭的罪恶。南部的另一个魁首斯普腊特则大叫：“对我们来说，这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奴隶制共和国（a great slave republic）的

问题。”所以，如果说，北部拔出刀剑只不过是为了保卫联邦，那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称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继续存在再不能相容了吗？

正如炮击萨姆特尔堡垒发出了战争开始的信号一样，北部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林肯当选为总统，成了实行脱离的信号。林肯于1860年11月6日当选。1860年11月8日，南卡罗来纳州发出的电讯就说：“这里已认为脱离是既成事实”；11月10日，乔治亚州立法议会就忙于搞脱离计划；11月13日，密西西比州立法议会决定召开特别会议来考虑脱离问题。但是，林肯的胜利本身只不过是民主党阵营分裂的结果。在竞选期间，北部民主党人投的是道格拉斯的票，而南部民主党人投的则是布雷金里季的票，由于民主党选票的这种分散，共和党才获得了胜利。那末，为什么共和党在北部占了优势呢？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内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行动一致的南北两部分为什么发生了分裂呢？

南部通过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逐渐篡夺统治联邦的权力，他们的这种权力在布坎南任总统时期达到了最高峰。1787年的末届大陆会议和1789—1790年根据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曾经通过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国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大家知道，领地一词是美国版图内居民尚未达到根据宪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的垦殖区的名称¹⁸¹。）所谓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就是这个妥协案所产生的结果，——曾禁止在纬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苏里州以西的每一个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根据这个妥协案，实行奴隶制度的区域推进了几个经度，而另一方面，限制奴隶制度将来再扩展的地理界限看来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这个地理上的防线在1854年

又被所谓塔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这个法案的倡始者就是当时的北部民主党领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国会两院所通过这个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置奴隶制与自由于同一地位，规定联邦政府对两者一视同仁，由人民即垦殖者的多数来决定某一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这样，在美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由于这个新法案，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自由领地的新墨西哥（其面积大于纽约州4倍）便变成了一个蓄奴的领地，因而蓄奴地区便从墨西哥共和国边境扩展到北纬38度。1859年，新墨西哥接受了一个奴隶制的法典，这个法典的野蛮性可以与得克萨斯和亚拉巴马的法典相比。然而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新墨西哥的约10万居民中，奴隶还不到50人。因此，南部只要派遣若干冒险家携带少数奴隶越过边界，然后借华盛顿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新墨西哥的官吏和承办人之助，击鼓召开一个冒牌的人民代表会议，就可以把奴隶制度以及奴隶主的统治强加于这个领地了。

但是，这个便利的方法在其他领地还是行不通的，于是南部便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从国会转而诉诸美国最高法院。这个最高法院有法官9人，其中5人属于南部，所以它很久以来就是奴隶主的百依百顺的工具。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脱案件¹⁸²中决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携带宪法所承认的任何财产进入任何领地。宪法承认奴隶为财产，并且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这种财产。因此，根据宪法，奴隶主就可以强迫他们的奴隶在各领地内劳动，每个奴隶主也就可以违反垦殖者多数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带到一直是自由的领地中去。各领地的立法会议会被剥夺了禁止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赋予保护奴隶制度

的先锋的义务了。

如果说,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度在各领地的地理界限,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又取消了任何地理界限,换上一个政治的障壁,即垦殖者多数的意志,那末,美国最高法院则是通过1857年的判决,把这个政治障壁也拆掉了,从而把共和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了培植奴隶制度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布坎南政府时期,在北部各州还严厉无情地实行了1850年颁布的更厉害的逃亡奴隶引渡法¹⁸³。为南部奴隶主捕捉奴隶看来已经成了北部的合乎宪法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尽量阻止自由垦殖者移殖到领地去,蓄奴党破坏了一切所谓 free-soil 措施,即将一定数量的未开垦的国有土地免费给予垦殖者的措施¹⁸⁴。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布坎南事实上是靠了发布奥斯坦德宣言才弄到总统一职的,这个宣言宣布,用购买办法或用武力夺取古巴,是国家政策的伟大任务¹⁸⁵。在他执政时期,墨西哥北部已经被美国土地投机分子所瓜分,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发出信号便袭击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诺拉¹⁸⁶。海上走私者对中美各国不断进行的海盗式的远征,同样是由华盛顿白宫指挥的。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开放奴隶买卖¹⁸⁷,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国参议院中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去年输入的奴隶的数目已达

15000人。

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统治南部的30万奴隶主的奴隶。一系列的妥协导致了这种结果，而这些妥协是南部依靠它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而达到的。在这个联盟面前，自1817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隶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尝试，一直都遭到失败。最后，才到了一个转折点。

取消了奴隶制度的地理界限并将新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的问题交由垦殖者多数决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奴隶主的武装特使，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边境暴徒，就一手执长猎刀，一手执连发手枪，进袭堪萨斯，并且以前所未闻的暴行企图把垦殖者从他们定居的领地上赶走。这些盗匪式的袭击受到了华盛顿中央政府的支持。于是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整个北部，特别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协会，以人、武器和金钱支援堪萨斯¹⁸⁸。就从这个支援协会中产生了**共和党**，所以共和党实起源于保卫堪萨斯的斗争。在借武力使堪萨斯变为**蓄奴领地**的企图失败以后，南部便企图借政治阴谋来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布坎南政府尽一切力量企图强迫堪萨斯接受一个奴隶制的宪法，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美国诸州的行列。于是开始了新的斗争，这一次主要是在华盛顿国会内进行的。甚至北部民主党的首脑斯蒂·阿·道格拉斯，这时（1857—1858年）也起来坚决反对政府及其南部的同盟者了。因为，强制实施奴隶制宪法是与1854年的内布拉斯加法案所规定的垦殖者主权的原則相抵触的。道格拉斯是西北部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如果他承认南部有权借武力或者借国会的法案来夺取北部所垦殖的领地，他自然就会失去自己的全部影响。所以，正

像保卫堪萨斯的斗争产生了**共和党**一样，它同时也引起了**民主党**本身内部的第一次分裂。

共和党在 1856 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个总统竞选纲领。虽然它的候选人约翰·弗里芒特没有获得胜利，而他所获得的大量选票则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政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西北部的迅速发展。在他们为竞选总统而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860 年 5 月 17 日）上，共和党人重新提出了 1856 年的纲领，仅仅作了几点补充。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下：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遣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最后，必须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

这个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反过来说，就是奴隶制度要永远限制在它已经合法存在的各州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奴隶制度就被限制住了。然而，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

由奴隶耕种的、作为南部输出品的棉花、烟草、糖等等作物，只有在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才是有利的。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的集约化作物，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原先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输出品的州，如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就迅速变成了繁殖奴隶向更远的南部地区输出的州。甚至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的确，在环境的压力下，南卡罗来纳州已部分地变成了一个繁殖奴隶的州，因为它向极南部和西南部出卖奴隶每年已达 400 万元。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获得

新的领地，以便使一部分奴隶主带着奴隶得到新的肥沃的土地，并且使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奴隶主得到新的市场供他们繁殖和出卖奴隶。举例来说，如果美国没有取得路易西安纳、密苏里和阿肯色，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奴隶制度早就该被扫除了。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上，南部的一个首领，参议员图姆斯曾经很鲜明地表述了要求不断扩张奴隶制领地的经济规律。

他说：“再过 15 年，如果蓄奴领地没有大量的增加，那末就将不得不容许奴隶逃离白人，否则白人就不能不逃离奴隶。”

如所周知，各州在国会众议院中的代表人数是依各州人口而定的。由于自由州人口的增长比蓄奴州快得多，北部的众议员的人数势必很快就超过南部。因此，美国参议院便愈来愈成为南部政治力量的真正的集中地点，因为在参议院中，各州不论人口多少都有两名参议员。南部为了确保它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并且通过参议院来确保它对美国的领导权，就需要不断成立新的蓄奴州。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征服国外的土地，像得克萨斯的情形那样；或者是把美国所属的领地首先变为蓄奴领地，然后变为蓄奴州，像密苏里、阿肯色等地的情形那样。被奴隶主们捧为 *par excellence*（卓越的）政治家的约翰·卡尔洪早在 1847 年 2 月 19 日就曾在参议院宣称，只有参议院才能为南部造成均势，而要在参议院中保持南部和北部的这种均势，就必须扩展蓄奴领地；他还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南部借武力建立新的蓄奴州的做法是正当的。

最后，联邦南部真正的奴隶主的人数不超过 30 万人，是一个狭小的寡头统治，与之对立的是好几百万所谓“白种贫民”（*poor whites*），这些白种贫民的人数由于地产的集中而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处境也只有罗马帝国极度衰微时期的罗马平民才可比拟。只

有靠取得新的领地和有望取得新的领地,以及靠海盗式的远征,才能调和这些“白种贫民”的利益与奴隶主的利益,把他们的热烈的事业欲引到一个无害的方向,并且用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奴隶主的希望来羁縻他们。

因此,把奴隶制度严格地限制在其旧有地区之内,由于经济规律,势必使奴隶制度逐渐消亡,使蓄奴州通过参议院所行使的政治领导权归于消灭,最后,势必使奴隶主寡头集团在他们本州内部处于“白种贫民”的威胁之下。所以,共和党人提出应当用法律完全禁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的原则,就等于要从根割断奴隶主的统治。因此,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才必然导致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公开斗争。但是,这次选举胜利本身,如前所述,则是民主党阵营内的分裂所促成的。

保卫堪萨斯的斗争已经引起了蓄奴党和它的同盟者北部民主党人之间的分裂。到186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这个争端又更加深入地再度爆发了。以道格拉斯为候选人的北部民主党人主张,各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应取决于垦殖者多数的意志。以布雷金里季为候选人的蓄奴党坚决认为,美国宪法已经使奴隶制度合法化了,最高法院对此已经作了解释;奴隶制度自身在一切领地内都是合法的,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移植。因而,共和党人是完全禁止增加蓄奴领地,而南部的党则要求占有共和国的全部领地,认为这些都是法律所保障的奴隶制的地盘。奴隶主以堪萨斯为例所做出的事情,即在中央政府协助下违反垦殖者自己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强加于一个领地,现在被他们宣布为适用于联邦一切领地的法律。民主党的领袖们是不会作这种让步的,因为这样做只能使他们的队伍投到共和党阵营里去。另一方面,道格拉斯所提出的“垦殖者主

权”，也不能使蓄奴党满足。蓄奴党想要实现的事情，必须于未来4年中在新总统任内实现；这件事只有借中央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不容再有拖延。奴隶主们并不是没有看到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力量，这就是**西北部**，它的人口在1850—1860年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大致已同蓄奴州的白人人口相等，这个力量无论从传统、性格或生活方式上来说，都不会甘愿让别人把自己从一个妥协拖到另一个妥协，像东北部的旧有各州那样。对于南部来说，联邦仅仅在它把联邦权力交到南部手中做奴隶主政策的工具的情况下，才具有价值。如果不能这样，南部不如现在就决裂，否则，就得在4年之中坐待共和党的发展和西北部的兴起，然后在不利的条件下开始斗争。因此蓄奴党才把一切都投到赌注上来！当北部民主党人不愿继续扮演南部的“白种贫民”的角色时，南部便以分散选票让林肯取得了胜利，然后就以此胜利作借口拔剑出鞘了。

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探讨伦敦报界所说的，北部应当欢迎脱离，把它看做最有利的和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主张。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2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1年10月25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293号

卡·马克思 美国内战

“让他离去吧，他不值得你恼怒！”英国的政治家风度一再向美国北部喊出——不久以前还通过约翰·罗素之口喊出——列保莱罗劝告唐璜的弃妇的话。据说，如果北部让南部离去，它就会摆脱与奴隶制度的一切关系，使自己从历史的原罪中解脱出来，并且为新的更高的发展打下基础。

的确，如果北部和南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例如像英国和汉诺威那样，那末，它们彼此分离不会比英国与汉诺威分离更为困难¹⁸⁹。可是，“南部”既不是一个在地理方面与北部截然隔离的地区，也不是一个在精神方面完整的统一体。它完全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战斗口号。

要它们和和气气分手的这种劝告有一个假定，即南部同盟虽然在内战中采取了攻势，但至少它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防御。有人以为，蓄奴党仅仅是要把它迄今为止所统辖的地区联合成一个独立的州集团，使这些州不受联邦最高权力的约制。这种看法是最荒谬不过的。“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它。”这就是脱离派进攻肯塔基时的战斗口号。所谓南部的“全部领土”，按照他们的理解，首先是指所有的所谓边界州 (border states)——德拉韦、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

田纳西、密苏里和阿肯色。除此以外，他们还要求从密苏里州西北角至太平洋一线以南的全部领土。所以，奴隶主们所称的“南部”，包括了联邦迄今所拥有的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他们所要求的领土有很大一部分仍在联邦手中，首先必须从联邦手里夺过来。然而，所谓边界州，包括那些现在被南部同盟控制的州在内，都从来不是真正的蓄奴州。勿宁说，这些州是美国境内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并存而互相争胜的地区，是南部与北部之间、奴役与自由之间的真正战场。因此，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个防御战争，而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为了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

起自亚拉巴马向北蜿蜒而至哈德逊河的山脉，形同美国的脊骨，把所谓南部切成三个部分。由阿勒格尼山脉及其两条平行的山脉——西面的康伯兰山脉和东面的布卢山脉——所形成的山岳地区，像楔子一样把大西洋西岸的低地与密西西比河南部河谷的低地隔开。被山岳地区隔断的这两块低地及其广大的水稻区和辽阔的棉田，就是真正的蓄奴地区。突入蓄奴地区中心的楔形山岳地区风物宜人，气候温和，盛产煤、盐、石灰石、铁矿、金，总之，全面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应有尽有，而这一片地区现在大部分已是自由地区。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的土地只有由自由的小农来耕作方有成效。奴隶制度在这里只是零散地勉强存在，从来没有扎下深根。这个高原的居民，也就形成了大部分所谓边界州的自由人口的核心，这些自由居民仅仅为了保全自己就站在北部一方了。

现在，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片争执地区的各个部分。

边界州中极东北的**德拉韦州**，事实上和精神上都是属于联邦的。脱离派想在这里建立哪怕是一个对他们抱好感的派别的一切

企图,从战争爆发之初就由于当地人民的团结一致而遭到失败。这个州的奴隶人口很久以来就处在灭亡过程中。仅在 1850 年至 1860 年间,奴隶的人数就减少了一半,以致现在德拉韦州总人口 112218 人当中仅有 1798 个奴隶。虽然如此,南部同盟仍然要求占有德拉韦州;从军事方面来说,一旦南部取得马里兰州,北部的确也守不住这个地方。

至于**马里兰州**,那里也发生了上面所说的高原与平原之间的斗争。这个州总人口 687034 人,奴隶是 87188 人。最近华盛顿国会的大选又一次确凿地证明:占压倒多数的人口是站在联邦一边的。目前驻守马里兰州的 3 万联邦军队,其任务不仅仅是为波托马克一线作后备,而且也特别是为了控制该州内地的叛乱的奴隶主。这里也暴露出一个与其他边界州相同的现象,即大多数居民站在北部一边,而站在南部一边的则是人数很少的蓄奴党。蓄奴党用权势来弥补他们人数少的缺陷,这些权势是他们通过多年来窃据一切政府职位,一代代致力于政治阴谋和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取得的。

弗吉尼亚州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军营,脱离派的主力军和联邦的主力军在这里互相对峙着。在弗吉尼亚州的西北高原,奴隶有 15000 人,而大于此数 20 倍的自由人大部分是自由农。相反的,弗吉尼亚州的东部平原约有 50 万奴隶。繁殖并向南部各州贩卖奴隶是这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平原上的叛乱魁首们在里士满的州立法议会中玩弄阴谋通过了脱离法令,并且急速给南军开放了弗吉尼亚的大门的时候,西北部便和脱离派脱离关系,成立一个新州,现在正在联邦的旗帜下手执武器保卫自己的土地,抵抗南部的入侵。

田纳西州有居民 1109847 人，其中 275784 人是奴隶，这个州现在在南部同盟手里，南部同盟将全州置于戒严状态，实行了罗马三执政时期那样的排除异己的制度。1861 年冬，当奴隶主们提议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会，要它投票表决是否脱离的时候，大多数居民都反对召开任何代表大会，以杜绝脱离运动的任何借口。后来，当田纳西州已被南部同盟的军队占领，建立起恐怖统治的时候，参加选举的投票人仍然有三分之一以上宣称拥护联邦。在那里，像在绝大多数边界州一样，山区即**东田纳西**是抵抗蓄奴党的真正中心。1861 年 6 月 17 日，东田纳西在格林维耳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拥护联邦，委派该州前州长、最热烈的联邦拥护者之一安得鲁·约翰逊出席华盛顿参议院，并且发表了《declaration of grievances》，即控诉书，把田纳西州被“票决退出”[hinausvotier]联邦时的一切欺骗、阴谋与恐怖手段揭露无余。从那时起，脱离派就用武力来控制东田纳西。

在亚拉巴马北部、乔治亚西北部和北卡罗来纳的北部，可以看到与西弗吉尼亚和东田纳西相同的情况。

再往西去，是边界州**密苏里**，那里有居民 11173317 人，奴隶 114965 人——后者大都集中在该州西北地区。1861 年 8 月，该州的人民代表大会表示拥护联邦；该州州长、蓄奴党的工具杰克逊反对密苏里州立法议会，当即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此后他便率领了一支武装匪徒从得克萨斯、阿肯色和田纳西进攻密苏里，企图使该州向南部同盟屈服，用刀剑割断它同联邦的联系。目前，密苏里同弗吉尼亚一起，是内战的主要战场。

新墨西哥不是一个州，而只是一个领地。在布坎南任总统期间，有 25 个奴隶被运入该地，以便随后再从华盛顿送去一套奴隶

制的宪法。新墨西哥并没有要求归并于南部，这一点南部也是承认的。但南部却要求占有新墨西哥，所以便派遣一支武装的冒险分子从得克萨斯越过了边界。新墨西哥请求联邦政府保护，以抵抗这些“解放者”。

读者大概已注意到，我们特别重视各边界州中奴隶与自由人的人数比例。的确，这个比例是有决定意义的。它是一个寒暑表，应当用它来测定整个奴隶制度的生命能力。

整个脱离运动的灵魂是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州有奴隶 402541 人，自由人 301271 人。其次便是密西西比，南部同盟的独裁者杰弗逊·戴维斯就出在这个州，那里有奴隶 436696 人，自由人 354699 人。居第三位的是亚拉巴马，那里有奴隶 435132 人，自由人 529164 人。

在争执中的各边界州中，最后我们要谈的是肯塔基。这个州近来的遭遇特别足以表明南部同盟的政策的特点。那里有居民 1135713 人，其中奴隶 225490 人。在接连三次全民选举中——1861 年冬边界州议会议员选举、1861 年 6 月华盛顿国会议员选举、以及 1861 年 8 月肯塔基州立法议会选举——一个人数总是不断增加的多数都表示拥护联邦。另一方面，肯塔基州州长马哥芬以及该州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蓄奴党的狂热的拥护者，另外还有布雷金里季——肯塔基州出席华盛顿参议院的代表、布坎南时期的美国副总统、1860 年总统选举时蓄奴党的候选人。蓄奴党虽然力量太弱，不能使肯塔基站到脱离运动方面来，但是却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肯塔基州在战争爆发时宣布中立。在这个中立为南部同盟服务时，在南部同盟忙于镇压东田纳西的抵抗时，它是承认肯塔基州中立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它就用枪托敲打着肯塔基的大

门，高叫：“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它！”

南部同盟的强盗军队从西南和东南同时侵入了这个“中立”州。肯塔基从它的中立梦中醒来，它的立法议会公开地站到了联邦一边，用一个公安委员会来监视叛逆的州长，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宣布布雷金里季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命令脱离派立即撤离所侵入的地区。这是作战的信号。南部同盟的一支军队向路易斯维耳移动，而来自伊利诺斯、印第安纳、俄亥俄的志愿兵即疾驰前来拯救肯塔基，抵抗奴隶制度的武装传教士。

南部同盟不顾密苏里和肯塔基等州的意志而企图并吞它们，这就证明了它所说的为维护各州权利、反对联邦侵犯而战的借口是虚伪的。的确，它承认被它算入“南部”的各州有脱离联邦的权利，但它并不承认它们有留在联邦内的权利。

甚至那些真正的蓄奴州，虽然目前外部的战争、内部的军事独裁和奴隶制度使它们到处具有一种和谐的外貌，但仍然不是没有对抗的成分。显著的例子是得克萨斯。该州有居民 601039 人，其中奴隶 180388 人。根据 1845 年的法律——得克萨斯作为蓄奴州加入合众国即系根据此项法律——得克萨所有权在其领域内成立整整 5 个州，而不是一个州。这样一来，南部就会在美国参议院中取得 10 个新席位，而不是两席，而当时南部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增加它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但是在 1845—1860 年间，对于这个德国人口起着重大作用的得克萨斯，即使是把它分成两个州，而不使拥护自由劳动的党在第二个州内比拥护奴隶制度的党占优势，奴隶主们也都无法办到。这一点最清楚地证明了，在得克萨斯州内部，对抗奴隶主寡头统治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

乔治亚州是蓄奴州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州。在 1057327 人的居民总数中，奴隶有 462230 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虽然如此，蓄奴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能够在乔治亚用全民投票的办法通过蒙哥马利国会强加于南部的宪法。

1861 年 3 月 21 日在新奥尔良举行的路易西安纳州代表大会上，该州政界元老罗斯利埃斯宣称：

“蒙哥马利宪法不是一个宪法，而是一个阴谋。它所建立的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而是一个可恶的、横行无忌的寡头统治。没有让人民参预这件事。蒙哥马利的代表大会已经给政治自由掘下了坟墓，现在我们是被召集来参加葬礼的。”

实际上，30 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不仅是利用蒙哥马利的国会来宣告南部与北部分离。他们还利用它来改变各蓄奴州内部的法制，来完全控制在联邦的民主宪法保护之下还保有一些独立性的白种居民。早在 1856 年至 1860 年间，蓄奴党的政治首领、法学家、道德家和神学家们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确实完全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各边界州和领地大多数仍在联邦手中，这些地方起初通过投票表示站在联邦一边，以后又手执武器站在联邦一边。而南部同盟则把它们算作“南部”，并力图把它们从联邦方面征服过来。南部同盟在它暂时已经占领的各边界州中靠戒严令控制着比较自由的高原。在真正的蓄奴州中，南部同盟也排斥了先前的民主政治，代之以 30 万奴隶主横行无忌的寡头统治。

南部同盟如果放弃它的征服计划,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生存能力,就是放弃脱离运动所提出的目的。要知道,脱离运动之所以发生,也只是因为在联邦范围内再也不可能把各边界州和领地变为蓄奴州。另一方面,北部如果和平地把争执地区拱手让给南部同盟,那就是把美国全部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交给一个奴隶制共和国;北部就将丧失整个沿墨西哥湾的地区,以及除佩诺布斯科特湾^①至德拉韦湾的狭小地带以外的大西洋沿海地区,并且使自己和太平洋隔断;密苏里、塔萨斯、新墨西哥、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就会把加利福尼亚拖走。位于落基山脉与阿勒格尼山脉之间的盆地上的,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流域的各大农业州,由于无力从强大而敌对的南部奴隶制共和国手中夺取密西西比河口,就将为本身的经济利益所迫而脱离北部,加入南部同盟。这些西北部的州又将把所有位于更东方的北部各州拖进脱离运动的漩涡,只有新英格兰诸州¹⁹⁰也许是例外。

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不是联邦的解体,而是联邦的改组,是在奴隶主寡头的被承认的控制之下,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改组。这样一种改组的计划,已由南部的发言人在蒙哥马利的国会上公开宣布了,并且体现为新宪法的这样一项条款,即原联邦的任何一州都有权自由加入新的同盟。这样,奴隶制度就将蔓延于全联邦。在黑奴制度实际上行不通的北部各州,白种的工人阶级将逐渐降到赫罗泰¹⁹¹的地位。这就完全符合了公开宣布的一个原则:只有特定的种族才有资格享有自由,如果量繁重的劳动在南部是黑人的天职,那末在北部它就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或他们的子孙

^① 美国东北角的一个小海湾。——译者注

的天职。

因此,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如果说,这些争执地区,即两个制度迄今为止在那里争夺支配权的各边界州是扎到南部肉体中的刺,那末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在战争的过去一个阶段中,它们却是北部的最薄弱的地点。在这些地区中,一部分奴隶主根据南部阴谋家的命令对北部假意表示忠诚;另一部分发现站在联邦一边事实上符合他们的实际利益和传统观念。这两个部分都同样限制了北部的行动。联邦政府渴望保持各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的好感,害怕他们投入脱离派的怀抱,总之,是对这些暧昧的同盟者的利益、偏见和虚情抱着无微不至的关切态度,这就使联邦政府从战争一开始便受着一个致命的弱点的打击,迫使它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迫使它隐瞒战争的原则,而放过敌人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罪恶的根源——**奴隶制度本身**。

如果说,不久前林肯还表示怯懦,不赞成弗里芒特在密苏里发布的关于解放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的文告¹⁹²,那完全是由于面对着肯塔基州“忠诚的”奴隶主们的高声抗议而顾虑重重。然而转折点已经到来了。肯塔基州——最后一个边界州——已经卷入了南北之间的斗争。随着在各边界州内部为争夺这些州而爆发真正的战争,这些州谁得谁失的问题就要越出外交与议会讨论的范围了。一部分奴隶主将抛掉忠诚的假面具;另一部分将满足于能得到大不列颠给予西印度的种植场主那样的补偿¹⁹³。事变本身正促

使宣布一个决定性的口号——**解放奴隶**。

近来所发表的一些声明证明，即使是最顽固的北部民主党人和外交家们也都不由自主地达到了上述结论。布坎南时期的国务卿、一向最狂热地支持南部的卡斯将军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解放奴隶是拯救联邦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北部的天主教党的首领、1836—1860 年间最坚决地反对废奴运动的布朗逊博士于 10 月间在最近一期他的“评论”¹⁹⁴上发表文章**赞成**解放奴隶。

他在文章中说：“如果说，我们在此以前曾经反对解放奴隶，认为这样做危及联邦，那末现在，当我们断定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存在或我国作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保持奴隶制度。”

最后，华盛顿政府外交官在纽约的机关刊物“世界报”¹⁹⁵，在它最近的一篇虚声恫吓废奴派的文章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一旦必须决定奴隶制度和联邦谁存谁亡，那时奴隶制度就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北部**没有**奴隶解放就不能胜利，那末：**借助于**奴隶解放它就将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0 月底
载于 1861 年 11 月 7 日“新闻报”
第 30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英国的危机

今天,英国又像 15 年前一样,正面临着一场有根本摧毁它的整个经济体系之势的灾难。大家知道,当 1845 年和 1846 年的马铃薯病把爱尔兰人的生活来源腐烂掉的时候,马铃薯是爱尔兰和很大一部分英国劳动人民的唯一食物。这一场可怕的灾难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 200 万,其中一部分死于饥饿,另一部分逃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同时,这场大灾难帮助了英国主张自由贸易的党派获得胜利;英国的土地贵族被迫放弃了它的一项最有利的垄断,而谷物法的废除则为千百万劳动者的再生产和生活保证了一个比较广阔、比较有益于健康的基础。

当时的马铃薯对爱尔兰农业所起的作用,也就是现时的棉花对大不列颠的最重要工业部门所起的作用。现在靠棉花加工为生的居民,比苏格兰居民总数还多,或者说,超过现在爱尔兰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二。根据 1861 年的普查,苏格兰的人口为 3061117 人,爱尔兰的人口一共只有 5764543 人,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直接或间接靠棉纺织工业为生的人则有 400 万以上。不错,棉花现在并没有什么病害。棉花的生产也没有被地球上少数几个地区垄断。相反,没有一种可做衣料的植物像棉花这样在美、亚、非三洲占有如此广阔的地区。美利坚联邦各蓄奴州对棉花的垄断并不是一种

自然的垄断，而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垄断。这种垄断是与英国棉纺织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同时生长和发展起来的。1793年，即在英国机械大发明时期之后不久，康涅狄格的一个战栗派教徒伊莱·维特尼发明了 cotton-gin，即把棉纤维与棉子分开的轧棉机。在这项发明之前，一个黑人最紧张地劳动一整天未必能清拣出一磅棉花。而 cotton-gin 发明以后，一个老年黑人妇女一天就可以轻易地清拣出 50 磅棉花；后来机器逐渐改进，效率又增加一倍。美国植棉业的桎梏这时便被粉碎了。美国植棉业与英国棉纺织工业并肩发展，很快便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力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时英国看来也对美棉的垄断地位这一个不祥的幽灵感到恐惧。例如，在英国用 2000 万英镑为殖民地的黑人买得了解放的那个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人们忧虑地看到，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工业依靠着奴隶主在乔治亚和亚拉巴马的皮鞭统治，同时英国人民却为了在本国殖民地内废除奴隶制度而承担这样巨大的牺牲。但是慈善并不创造历史，特别是不创造商业的历史。每当美国棉花歉收，奴隶主利用这种自然现象联合起来人为地高抬棉价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忧虑。于是，英国的纺织厂主便以反叛“棉花王”相威胁。各种各样自亚洲、非洲获得棉花的计划都提出来了。例如 1850 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下一次美国的棉花一丰收，又把这种要求解放的热情完全消灭了。而近年来美国的棉花垄断则达到了先前难以设想的规模，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贸易的立法废除了前此对奴隶种植的棉花所征收的级差关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 10 年来英国棉纺织工业和美国植棉业同时大步前进。在 1857 年，英国就用了将近 15 亿磅的棉花。

而现在，美国的内战突然威胁了英国工业的这个巨大支柱。

联邦封锁了南部各州的港口，以便阻止运出今年的棉花，从而断绝脱离派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这个封锁之所以具有了逼人的力量，却完全是由于南部同盟决定不自动输出一包棉花，而迫使英国自己从南部港口把棉花运出去。这将驱使英国用强力打破封锁，然后对联邦宣战，从而把自己的剑投到天平盘上来帮助蓄奴州。

从美国内战爆发时起，英国的棉花价格就不断上涨，但上涨的幅度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比预料的小。一般来说，英国商界看来都对美国的危机很不在乎。抱这种淡漠态度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上一季的美棉早已全部运到了欧洲。这一季的产品在 11 月底以前从来是不装船启运的，而在 12 月底以前又难得有大量货运。因此，在 12 月底以前，棉花包究竟就是放在种植场里，或是在打包之后立即运向南部港口，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封锁在今年年底以前任何时候停止，英国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指望在三四月间得到像往常那么多的棉花，好像不曾有过封锁一样了。总之，被英国报界引入迷途的大部分英国商界人士都以这样一种幻想自慰，即这一场战争过不了 6 个月，它将以美国承认南部同盟而告终。但是在 8 月底，美国人出现在利物浦市场上来购买棉花，部分是为了在欧洲进行投机，部分是为了再运回北美。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打开了英国人的眼睛。他们开始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从这时起，利物浦的棉花市场就处在狂热状态；棉花价格很快便上涨到平均水平的百分之百以上，棉花投机活动就像 1845 年的铁路投机活动那样猖狂起来。在郎卡郡和其他英国棉纺织工业中心，纺织工厂把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 3 日，一部分工厂完全停工；其他工业部门不久也将受到致命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个英国都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早就威胁着它的十分可怕的经济灾难临头。

印度棉花的消费量自然是在增加着，而不断上涨的价格也将促使更加紧从这个棉花的古老家乡运来棉花，然而，要随心所欲地在几个月之内就根本改变生产条件和贸易性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英国现在是在受着自己长期罪恶地治理印度的报应。它现在手忙脚乱想用印棉代替美棉的企图遇到两个大障碍，即印度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和印度农民的穷困状况——这种状况使他们无法利用当前有利的形势。但是，撇开这一点，也撇开印棉需要精心加工才能够代替美棉不说，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印度要能够生产所需数量的棉花以供输出之用，也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而据确切的计算，利物浦的存棉在4个月内就要用完。即使在这个时期内，英国的纺织厂主也只有在比现在更大的规模上把工时缩减为每周3日和把一部分机器完全停开，才能使棉花够用。这种做法已经使各工厂区蒙受着极大的社会苦难了。如果美国的封锁持续到元月以后，那时又将如何呢？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1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载于1861年11月6日“新闻报”
第305页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贸易

1861年11月2日于伦敦

英国贸易部关于截至1861年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的报告指出，出口大为减少，进口日益增加。把近3年来的输出作一比较，得出一般的结果如下：

截至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出口值

年份	英磅
1859	98037311
1860	101724346
1861	93795332

可见，今年的出口与1860年同期相比，一共减少了7929014英磅，而且，这笔减少的数额的绝大部分（相当于5671730英磅）是由于对美贸易突然减少而引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出口普遍下降反映在英国贸易的某些部门中，其数额可以从下表中看出：

截至9月30日为止的9个月内向美国的出口值

	1859年	1860年	1861年
	(单位: 英磅)		
啤酒和麦酒	78060	76843	25642
煤和无烟煤	144556	156665	200244
棉布	2753782	2776472	1130973

(续)

	1859年	1860年	1861年
	(单位:英镑)		
陶瓷器	448661	518778	191606
装饰品和时新货品	1204085	1083438	542312
亚麻织品	1486276	1337778	493654
小五金及刀类	865066	776772	446095
金属——铁、生铁.....	205947	165052	79086
枕木、螺钉、金属条	642882	546493	148587
各种钢轨	744505	665619	168657
铸件	16489	17056	9239
各种锻铁	357162	378842	125752
未加工的钢	372465	457490	216246
铜片和钉子	99422	44971	10005
铅锭	53451	66015	1451
薄钢板	935692	833644	274488
油料种子	122570	72915	1680
盐	63876	84818	59809
丝绸料子、丝巾和丝带.....	197605	102393	88360
其他丝织品	129557	93227	22984
苏打	439584	399153	142311
酒精饮料(英国的)	53173	56423	12430
各种毛料	586701	535130	250023
各种料子法兰绒、被褥等	1732224	1612284	652399
精梳毛织品	1052053	840507	377597
共 计	14785784	13698778	5671630

除了因对美贸易疲弱而引起的减少外, 出口总值还降低了2257284 英镑。这次下降大部分是在 9 月, 当时高昂的棉价以及棉

织品和棉纱价格的相应上涨，开始对英属北美^①、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市场产生严重的影响。截至 1861 年 9 月为止总共 9 个月的期间，土耳其和德国，是继美国之后对英国商品需求量减少最多的国家。向法国的出口没有多大增长，只有一项农产品，即绵羊毛和羔羊毛的出口大大增加。1860 年的前 9 个月，英国向法国输出羊毛 4735150 磅，价值 354047 英镑。今年同期出口的羊毛达 8716083 磅，价值 642468 英镑。在出口报告所援引的其他数字中，相当有趣的仅仅是与意大利有关的部分。英国向新王国的输出显著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对意大利自由表示同情。譬如，向撒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出口的英国棉布，从 1860 年 756892 英镑增加到 1861 年 1204287 英镑；棉纱的出口从 1860 年的 348158 英镑增加到 1861 年的 538373 英镑；铁制品的出口从 1860 年的 120867 英镑增加到 1861 年的 160912 英镑。

进口统计表只包括今年的前 8 个月。下列数字表明进口的一般数额。

进口的实际价值

年份	英镑
1859	88993762
1860	106894278
1861	114588107

进口增加主要是由于外国小麦的采购量大大增加——从 1860 年前 8 个月的 6796131 英镑增加到 1861 年同期的 13431487

^① 即加拿大。——译者注

英镑。至于原棉,在同一时期,它的输入量减少不多,而价格猛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前 9 个月输入的棉花数

年份	重量 (单位:担)	价值 英镑
1859	8023082	24039197
1860	10616347	28940676
1861	9616087	30809279

目前,在英国不存在一般的政治性问题,一切的一切都被工业问题和美国危机吸引住。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提请诸位注意利物浦棉花市场的狂热状态^①。的确,近两个星期以来,这里显露出1845年铁路热的一切征兆。外科医生、牙科医生、医生、律师、厨师、工人、办事员和勋爵、演员和牧师、兵士和海员、新闻记者和女教师,男男女女,全都做棉花投机生意。一批一批的棉花买进、卖出、再转卖,其实只有一包、两包、三包或四包。更大数量的棉花仍搁在原来的堆栈里,虽然物主已经换了20次。10点钟买进棉花,到11点卖出,每磅就赚到半个辨士的利润,许多批的棉花就这样在12个小时中转手好几次。但是,本星期的价格稍有下跌,这只是因为,1先令是一个整数,合12辨士,大多数人决定,一当价格涨到每磅1先令时,就卖出自己的棉花,所以棉花的供应量突然大增,因而价格下降。但这种现象可能只是暂时的。

当英国人的理智习惯于每磅棉花能值15辨士这种想法时,投机的暂时障碍就会消除,投机狂就将加倍激烈起来。这种动向,从一方面来说,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这同主张突破封锁的一派敌

^① 见本卷第331—334页。——编者注

对。报刊上已经刊登了投机者的抗议书，抗议书不无根据地说，英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性质的行动，对于商人来说，就是完全不公正的举动，因为这些商人信赖英国政府会忠于它所公开承认的不干涉原则，并以此为根据来打自己的算盘，在国内投机，向国外发定货单，购买棉花；棉花的价格都是考虑到自然的、可能发生的和可以预见的事件的影响而确定的。

今天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极为荒谬的文章。作者根据美国的居民和面积的统计资料，得出一个结论，说那里至少能容纳7个大帝国，因此联邦派应该放弃“完全统治的幻想”。“经济学家”从它自己的统计报道中本来是能够做出一个唯一合理的结论的，这就是：北方人，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也不能简单地放弃自己的要求，而不把“奴隶制还在其中苟延残喘，但已不能使自己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的幅员广大的州和领地牺牲给奴隶制度，——这个唯一合理的结论，作者竟然满有办法地极力加以回避。

除了自己商业上的困难外，使英国不安的还有法国财政的危急状况。法兰西银行想从路特希尔德和其他大公司得到通融票据来制止贵金属流入英国，这种手段，不出所料，只不过暂时减少了法国的困难。现在它挨次向柏林、汉堡和彼得堡的银行求助；但所有这些尝试都缓和不了现状，只不过证明处境没有希望罢了。法国政府在近两个星期中所采取的两个措施，可以说明它现在所遭到的困难。为了保持国库期票的流通，不得不把期票的利息提高到 $7\frac{1}{2}$ ，而维克多—艾曼努尔则接到命令，要他部分地延缓推销应该发行的意大利新公债，因为法国资本家要在意大利新公债中投入一笔巨款。当然，维克多—艾曼努尔向自己保护人的要求让了步。

土伊勒里宫现在有两个对立的派别，它们要用两种对立的临时医治财政痼疾的药剂。真正的波拿巴分子，培尔西尼和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正在酝酿一个方案，即把法兰西银行置于政府的直接和完全监督之下，使之变成国库的纯粹附属品，并利用这样得到的权力无限制地发行不能兑换黄金的国家纸币。以富尔德和旧制度的其他变节者为代表的另一派，提出发行新公债，其数额有不同说法：最保守的估计是 1600 万英镑，较大胆的估计是 3000 万英镑。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2 日
载于 1861 年 11 月 23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644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经济短评

目前,英国不存在能引起普遍注意的政治性问题。吸引着全国注意的,有法国的财政、商业和农业的危机,有英国的工业危机,有缺棉问题,有美国问题。

此间有资格人士一直都清醒地认为:法兰西银行同拉芒什海峡两岸几家大银行所做的空头票据的生意,仅仅是极其无力的一种缓和手段。用这种办法所能得到的和已经得到的一切,只是暂时减少了向英国的黄金外流。法兰西银行一再在彼得堡、汉堡和柏林动用金属后备的企图损害了自己的信用,同时并没有使自己的金库充实起来。提高国库债券的利率以保持其流通,以及不得不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同意减少对意大利新公债的支付,这两件事此间都认为是法国财政疲惫的危险征象。此外,大家知道,还有两个财政方案现在正在土伊勒里宫进行着斗争。以培尔西尼和(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的)贝列拉为首的真正的波拿巴分子想把法兰西银行完全置于政府权力之下,使它仅仅成为财政部的一个机关,并利用经过这样改造的这个机构作为印制公债券的工厂。

大家知道,这个原则本来就是组织 Crédit Mobilier 的基础。冒险性较少的一派,以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其他变节者为代表,提议举办新的国民公债,其数目有人说是 4 亿法郎,另一

些人说是 7 亿。“泰晤士报”在今天的社论中说，法国已由于经济危机而完全瘫痪，丧失了它在欧洲的影响，这种说法看来是反映了伦敦西蒂区的观点。但是，“泰晤士报”和西蒂区都错了。如果十二月政变的政府能够拖过今年冬天而没有什么巨大的内部动荡，到春天它就会吹起战争的号角。这不会消除国内的困难，但是会把困难的呼声压倒。

在前一篇文章^①中我曾指出，前几个星期中利物浦的棉花投机活动很像 1845 年最疯狂时期的铁路热。牙科医生、外科医生、律师、厨娘、寡妇、工人、办事员和勋爵、演员和牧师、兵士和裁缝、新闻记者和旅馆老板，男男女女，全都做棉花投机生意。人们买进、卖出、再转卖，其实只有很少数量的棉花，从一包到四包。更大数量的棉花则几个月一直存放在原来的堆栈里，虽然物主已经换了 20 次。10 点钟买进棉花，到 11 点就以每磅加价半个辨士再卖出去。这样，同一批棉花常常在 10 小时内就转手 6 次。但是，本星期却出现了某种暂时平静的局面，这里唯一的一个合理的原因只是，1 磅棉花（即中等奥尔良棉花）已经涨到 1 先令，而 12 辨士合 1 先令，到了一个整数。所以每一个人早就决定，只要到达了 this 最高点，就把存货脱手。因此才有供给的突然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应。一旦英国人习惯于知道 1 磅棉花的价格也可以涨到超过 1 先令，这种舞蹈病就要更加疯狂地复发的。

最近贸易部公布的关于英国进出口的报告一点也没有驱散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口统计表所包括的时期是 1861 年 1 月至 9 月这 9 个月。这个表说明，与 1860 年同期比较，出口几乎减少了 800 万

^① 见本卷第 367—370 页。——编者注

英镑。其中有 5671730 英镑属于对美国一国的输出，其余的数字则分属于英属北美、东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德国。只有对意大利的输出增加。例如，英国棉织品向撒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输出就从 1860 年的 756892 英镑增加到 1861 年的 1204287 英镑；英国棉纱的输出则从 348158 英镑增加到 538373 英镑；铁制品的输出从 120867 英镑增加到 160912 英镑等等。这些数字对于理解英国之所以同情意大利的自由事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大不列颠的出口贸易额已减少将近 800 万英镑了，而它的进口贸易额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这是一件丝毫无助于平衡国际收支的事。在输入中增加的这一部分主要是由于小麦进口增加。1860 年前八个月进口小麦总值一共只有 6796131 英镑，而今年同期则达到 13431487 英镑。

进口统计表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自法国的进口迅速增长，现在已达到将近 1800 万英镑（1 年），而英国对法国的输出仅仅略多于对荷兰的输出。大陆各国的政界人士直到现在还没有觉察到现代商业史上这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法国在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程度 5 倍于英国在经济上对法国的依赖程度。这一点，如果不仅限于考察英国进出口统计表上的数字，而且把这些数字同法国的进出口统计表比较一下，就看得特别清楚。从这里看出，英国现在已经成为法国出口的主要市场，而法国却仍然是英国出口的一个很次要的市场。因此，尽管有沙文主义和夸耀滑铁卢的言词，而对于同“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①相冲突仍然

① “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是拿破仑第一对英国的叫法。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译者注

是非常害怕的。

最后,英国最近的进出口统计表还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今年头九个月内,英国对美国的输出比 1860 年同期减少了 25% 以上,但是,仅仅纽约一个港口对英国的输出在今年头八个月内就增加了 600 万英镑。在此期间,美国对英国的黄金输出差不多已经停止,相反的,最近好几周来都有黄金从英国流到纽约。实情是:英国和法国的歉收帮助了美国弥补自己的赤字,而摩里耳税则¹⁹⁶和与内战俱来的节约则使北美对英法工业品的消费量有了极大的减少。现在,请大家把这些统计数字和“泰晤士报”关于北美财政崩溃的悲叹对照一下吧!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3 日
载于 1861 年 11 月 9 日“新闻报”第
30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对墨西哥的干涉

1861年11月7日于伦敦

今天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用它那出名的、万花筒式的、故作幽默的笔法评论了法国侵入达普谷地和瑞士抗议它的领土被侵犯一事¹⁹⁷。印刷所广场的宣谕官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在英国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人们常常唆使在工厂里做工的小孩子把铁针扔到机器的最精微部分中去，破坏整个强大机器的运转。机器就是欧洲，小孩子就是瑞士，而被瑞士扔到正在安安稳稳运转的机器中去的铁针则是路易·波拿巴对瑞士领土的入侵，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瑞士对这一入侵的叫喊。于是，铁针就突然变成了在针刺之下的叫喊，而这个比喻本身也变成了对期待一个比喻的读者所开的笨拙的玩笑。接着，“泰晤士报”很高兴自己发现了达普谷地只不过是一个名叫克雷松尼埃尔的小村庄。最后，它用一个与这篇社论的开头完全矛盾的论点来结束这篇短文。它叫道，在欧洲明年春天到处都将燃起大火的时候，又有什么必要为了瑞士的这件极小极小的东西叫喊得这样厉害呢？请不要忘记，不久以前欧洲还是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哩。整个这篇文章看来完全是胡说，然而，它仍然有它的意义。它意味着，帕麦斯顿已经给予拉芒什海峡彼岸的他的同盟者对瑞士的 *carte blanche*（行动自

由)。关于这一切，我们可以在“通报”的枯燥报道中找到解释，它报道，英法和西班牙已于10月31日缔结了一项联合干涉墨西哥的协定¹⁹⁸。瓦得州和委拉克路斯两地相距十分遥远，而“泰晤士报”关于达普谷地事件的文章和“通报”关于墨西哥的报道两者之间的联系却十分密切。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悦法国人民，时刻准备着各种可以一试的勾当，他把干涉墨西哥当做其中的一种是很可能的。西班牙由于在摩洛哥和圣多明哥轻易成功而完全冲昏头脑¹⁹⁹，它毫无疑问也正梦想恢复它在墨西哥的统治。但是，也没有疑问，法国的计划还没有最后成熟，而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根本不愿意进行一个在**英国**统率下对墨西哥的十字军征讨。

9月24日，帕麦斯顿私人的 Moniteur（机关报）“晨邮报”²⁰⁰报道了一项英法西三国为联合干涉墨西哥而缔结的条约的详细条款。次日，“祖国报”²⁰¹出面声明，否认这项条约的存在。9月27日，“泰晤士报”反驳了“祖国报”，不过没有提它的名字。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说，罗素勋爵曾把英国关于干涉一事的决定**通知了**法国政府，图温奈尔先生回答他说，法国皇帝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现在轮到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在一家半官方报纸上宣称，它打算在墨西哥进行干涉，但决不是和英国在一起进行干涉。辟谣声明不断地发了出来。“泰晤士报”还肯定地说：“这次远征已经获得美国总统的完全同意”。但是，这话刚传到大西洋彼岸，所有美国的政府报纸就指斥这是谎言，它们说，林肯总统不会反对墨西哥，而是要支持墨西哥。从这一切就可以看出，现在这种形式的干涉计划出自圣詹姆斯内阁²⁰²。

对这个协定的目的所作的说明，其神秘莫测和互相矛盾的程

度也不下于对协定的来源所作的说明。帕麦斯顿的机关报之一“晨邮报”宣称，墨西哥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政府的有组织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盗匪的窠穴。应该把它当做盗匪的窠穴来对待。据说，这次远征只有一个目的——使英法西三国的墨西哥国家证券持有人得到赔偿。为此，联军将占领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在它的海岸征收进出口税，把这一“物质保证”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全部债务偿清为止。

相反的，帕麦斯顿的另一家机关报“泰晤士报”则宣称，由于长期的经验，英国“已经有了锻炼，能够冷静对待破产的墨西哥所进行的掠夺”。问题并不在于债权人的私人权益。“泰晤士报”希望，“单单是联合舰队出现在墨西哥湾并占领某些港口，就会促使墨西哥政府作新的努力来维持国内和平，并且使在野分子恪守比较具有宪法精神的反对派形式，而不是采取盗匪手段”。

因此，根据这个说法，这次远征乃是为了支持墨西哥的正式政府。然而同时“泰晤士报”又暗示：“墨西哥的首都是十分有益于健康的，如果有必要推进那么远的话。”

无可争辩，巩固某个政府的最新颖的办法，就是用强力管制它的收入和侵占它的领土。而另一方面，单单占领港口和在这些港口征收关税，却只不过使墨西哥政府把它的海关向离海岸更远的内地移动而已。这样，外国货物的进口税和美洲货物的出口税都将增加一倍；实际上，这次干涉就将是向欧洲与墨西哥的贸易大征军税来满足欧洲债权人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只有在国内巩固了，才能成为有支付能力的政府，而只有国外尊重它的独立，它才能在国内外巩固起来。

这次远征的公开声言的目的是这样互相矛盾，而为达到这些

目的所宣布的手段更是矛盾百出。英国的政府报纸自己就承认，如果说，法国或英国或西班牙进行单方面的干涉还可以取得一些结果，那末，这些国家进行**联合干涉**就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们想起，墨西哥共和国的正式总统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哥自由党现在差不多统治了本国的全部领土；马凯斯将军所统率的天主教党已经连遭失败，它所纠集的盗匪队伍已被击退到克雷塔罗州的山区，被迫去同那里的印第安酋长梅希亚结成联盟。天主教党的最后希望是**西班牙的干涉**。

“我国和盟国之间唯一可能的分歧之点，——“泰晤士报”说——就是**共和国的政府**问题。英国希望政权仍然留在……自由党的手里，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有偏袒不久前被推翻的教权党统治的嫌疑。如果法国在旧大陆和新大陆都成了教士和盗匪的保护者，那是够奇怪的。正如在意大利，弗兰契斯科二世的党羽在罗马被武装起来而给那不勒斯的治理造成无政府状态一样，在墨西哥，公路、甚至首都的街道都遭到被教权派公开当做朋友的盗匪的袭击。”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英国才要伙同法国和西班牙对自由党政府发动十字军征讨，以便巩固这个政府；并且给奄奄一息的教权派从欧洲送去新的援军，以便尽力平定无政府状态！

除短短的冬季以外，墨西哥沿海地区通常是疫疾流行，这个地区只有征服了这个国家本身之后才能掌握住。但是，第三家英国的政府报刊“经济学家”杂志又声称，征服墨西哥是不可能的。

这家杂志说：“如果我们试图强迫这个国家接受带领一支英国军队的英国亲王，那就会激起美国的最强烈的愤怒。法国的竞争会使这样一种征服成为不可能；在英国议会方面，这样的动议一提出来也会遭到一致的拒绝。从英国这方面来说，它也不能把管理墨西哥一事委托给法国，更不用说西班牙了。”

可见,整个远征乃是一个神秘的谜,而“祖国报”则用下面一段话说出了谜底:

“这个协定认为,必须在墨西哥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安宁与秩序的强有力的政府。”

问题直截了当就是这样:结成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便把当年神圣同盟认为它自己有义务干涉欧洲各国内政所依据的原则应用于美洲国家。沙多勃利昂在复辟时期曾经为西班牙和法国的波旁王朝拟定了第一个这样的计划²⁰³,这个计划被坎宁和那位坚决反对欧洲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的美国总统门罗挫败了。从那个时候起,美利坚联邦就始终把门罗主义²⁰⁴看做一个国际法。但是,现时的内战却造成一种方便的形势,使欧洲专制国家有可能去创造一个干涉的先例,依据这个先例以后还可以再干。这就是英法西三国干涉的真正目的之所在。进行干涉的直接结果将是而且必然只能是在墨西哥恢复已在平息的无政府状态。

撇开一切一般性的国际法性质的道理不谈,这事对欧洲也有十分巨大的意义,因为这是英国以欧洲政治方面的让步为代价来购买路易·波拿巴在远征墨西哥方面的合作。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1 年 11 月 12 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 311 号

卡·马克思 对墨西哥的干涉

1861年11月8日于伦敦

正在策划中的英法西三国对墨西哥的干涉,我认为是国际史上最凶恶的勾当之一。这是一个真正的帕麦斯顿牌的阴谋,其目的之疯狂与手段之愚笨使外行人感到惊愕,因而看起来似乎与这个老阴谋家出名的能干很不相称。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悦法国公众,不得不经常准备许多花样,远征墨西哥完全有可能是其中之一。西班牙由于最近在摩洛哥和圣多明哥的廉价胜利冲昏了它那一向就很脆弱的头脑,的确也梦想恢复自己在墨西哥的统治。但是,也没有疑问,法国的计划还远未成熟,而且法国和西班牙都极力反对在英国领导下联合远征。

9月24日帕麦斯顿的私人的 *Moniteur* (机关报) 伦敦“晨邮报”首先详细报道了根据一项条约的条款而拟出的联合干涉的计划,这项条约,据该报报道,是英法西三国刚刚缔结的。这一番话刚刚传过拉芒什海峡,法国政府就通过巴黎“祖国报”指斥这是绝对的谎言。9月27日,帕麦斯顿的国家机关报伦敦“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首次打破了它对于这个计划的缄默,反驳了“祖国报”,不过没有提它的名字。“泰晤士报”甚至断言:罗素伯爵曾把英国方面干涉墨西哥的决定通知法国政府,而且图温奈尔先生已经答

复,说法国皇帝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现在轮到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半官方的报纸肯定西班牙有干涉墨西哥的意图,但同时却否定了与英国联合干涉的说法。Dementis (辟谣声明) 还在一个接着一个发表。“泰晤士报”还肯定地说:“这次远征已经获得美国总统的完全同意。”而美国所有的报纸在谈到“泰晤士报”的文章的时候,一直都在否认这种断言。

所以,显而易见,而且“泰晤士报”也明白承认,现在这种形式的联合干涉,是英国牌的——也就是帕麦斯顿牌的。西班牙是由于受到法国的压力而被迫附和;法国的参加则是由于它得到了在欧洲政治方面对它所做的让步。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巧合:“泰晤士报”在11月6日的同一号报纸上,一方面报道了在巴黎缔结了联合干涉墨西哥的协定的消息,同时发表了一篇社论,用蔑视和傲慢的态度,对待瑞士就不久前本国领土被侵,即法国军队侵入达普谷地而提出的抗议。作为参加远征墨西哥的报偿,路易·波拿巴在阴谋侵略瑞士方面,可能还会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已经得到了 *carte blanche* (行动自由)。在这些问题上,英法之间在9月和10月一直进行着谈判。

在英国,除了墨西哥债券持有人以外,是没有人愿意对墨西哥进行干涉的,而这些债券持有人也从来说不上能够夸口对舆论有什么影响。因此,要把帕麦斯顿的计划直接塞给公众是有困难的。其次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些互相矛盾的说法使英国大象糊涂起来,这些说法是同一个制造场用同样的材料炮制的,只不过在使用时分量有所不同而已。

“晨邮报”9月24日宣布:“在墨西哥”不会有“夺取领土的战争”,唯一的问题是对墨西哥的国库提出要求;而“把墨西哥作为一

个有组织的和已经确立了政府来与之交涉是不可能的”，因此，“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将暂时被占领。这些港口的关税收入将加以管制”。

与此相反，“泰晤士报”9月27日声称：“对于欺诈，对于抵赖，对于一个破产的国家不讲信义、无耻地用立法的办法掠夺我国同胞而无法补救的事情，我们已经由于长期容忍而有了锻炼了”，所以，“对英国债券持有人私人的劫夺”，实际上并不像“晨邮报”所说的那样是这次干涉的根本原因。“泰晤士报”*en passant*（顺便）提到，“墨西哥的首都是十分有益于健康的，如果有必要推进那么远的话”，不过“泰晤士报”却希望，“单单是联合舰队出现在墨西哥湾并占领某些港口，就会促使墨西哥政府作新的努力来维持和平，并且使在野分子恪守比较具有宪法精神的反对派形式，而不是采用盗匪手段”。

看起来，照“晨邮报”的说法，发动这次远征是因为“墨西哥不存在政府”，而照“泰晤士报”的说法，发动这次远征却是为了鼓励与支持**现存的**墨西哥政府。夺取领土和管制收入，的确是一个最希奇的、绝无仅有的用来巩固一个政府的手段。

“泰晤士报”和“晨邮报”发出暗示之后，约翰牛随即被转交给政府的第二流宣传官，他们不停地用同样矛盾的话把他折磨了4星期之久，直到舆论对联合干涉墨西哥的观念终于变得十分熟习为止，尽管仍然小心地使它远征的目的与意图茫无所知。最后，和法国的谈判结束了，“机关报”向公众报告进行干涉的三强已于10月31日签订协定，而“辩论日报”²⁰⁵（它的一个所有人已被任命为法国远征舰队的一艘军舰的舰长）则告诉全世界，不会进行永久性的领土征服；只将占领委拉克路斯和墨西哥海岸的其他地点；并

决定如果当地政府不愿满足干涉军的要求就进攻首都，而且，应向墨西哥共和国输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泰晤士报”在它 9 月 27 日第一次发表言论以后，似乎已经忘记了墨西哥的存在，但现在它又出来了。凡是不了解它和帕麦斯顿的联系，不知道它原先推荐过帕麦斯顿的计划的人，一定会认为“泰晤士报”今天的这篇社论是对整个这次冒险进行最尖锐无情的讽刺。这篇社论开头就说：“这次远征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往后它又说这是一件奇异的事情）。

“三个国家联合起来迫使第四个国家按规矩办事，而它们所采取的方式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

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这完全是神圣同盟的口吻，以不干涉原则自傲的英国用这种口吻说话确实惊人！然而为什么不用“战争的方式和宣战的方式以及国际法的其他一切规定”，而用了一个“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呢？“泰晤士报”说，因为“墨西哥不存在政府”。而这次远征的公开声言的目的是什么呢？“向墨西哥的合法当局提出要求”。

参加干涉的三强所诉说的仅有的理由，以及使它们的敌对行动能够稍稍有所凭借的仅有的借口，是很容易概述的。这就是债券持有人的金钱要求以及据说是英法西三国臣民所遭受的一连串的人身侵犯。这也就是最初“晨邮报”提出的进行干涉的理由，也是不久以前约翰·罗素勋爵接见英国的墨西哥债券持有人的代表时正式承认过的理由。今天的“泰晤士报”说：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协议进行远征，以迫使墨西哥偿还它的明文规定的债务和保护各该王国的臣民。”

可是，“泰晤士报”的文章写下去却变了方向，它叫道：

“……毫无疑问，我们至少会获得对我们的金钱要求的承认，其实，一艘英国巡航舰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得到这种赔偿。我们也可以确信，所犯下的更无耻的暴行将要用更直接和更多的赔偿来了结；但是很明显，如果要实现的只是这些，我们完全不需要采取像现在所提议的这种极端手段。”

总之，“泰晤士报”这样噜噜嗦嗦地承认，原先提出的远征的理由都是表面的借口；为了获得赔偿，根本没有必要采取现在这样的步骤，因此，“承认金钱要求和保护欧洲臣民”事实上与当前对墨西哥的联合干涉全然无关。那末，它的真实的目的和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在深入到“泰晤士报”往后的说明之前，我们要 *en passant*（顺便）指出另外一些它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的“奇异的事情”。首先一件真正“奇异的事情”是，西班牙——不是别的国家，恰恰是西班牙——竟然变成了保护神圣的外国债权的十字军战士！而上星期日的“星期日邮报”²⁰⁶已经力促法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强迫西班牙偿付“它无限期拖延的对法国债券持有人的旧债务”了。

第二件更大的“奇异的事情”是，同一位帕麦斯顿勋爵，据约翰·罗素勋爵最近宣告，是正在准备进攻墨西哥，使墨西哥政府向英国债券持有人还钱的，然而，就是这位帕麦斯顿本人，曾经自愿地，而且不顾墨西哥政府的意愿，牺牲了有条约规定的英国的权益和墨西哥给英国债权人的抵押。

根据 1826 年和英国签订的条约，墨西哥承担了不容许在当时属于它的任何领土上建立奴隶制度的义务。根据同一条约的另一款，它把得克萨斯的 4500 万英亩公有土地抵押给英国，作为从英国资本家取得的债款的担保。而帕麦斯顿在 10 年或 12 年之后以仲裁人的资格进行干预，站在得克萨斯一边反对墨西哥。在当时

他和得克萨斯订立的条约中，他不仅牺牲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宗旨，而且也牺牲了所抵押的公有土地，从而剥夺了英国债券持有人所得到的担保。墨西哥政府当时曾经提出抗议，但与此同时，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科·卡尔洪却开了这样一个玩笑：他通知圣詹姆斯内阁说，如果把得克萨斯合并于美国，那末，英国内阁想“看到在得克萨斯废除奴隶制度”的愿望就可以十分圆满地实现。英国的债券持有人由于帕麦斯顿自愿地牺牲了 1826 年的条约为他们所取得的抵押，事实上已经失掉向墨西哥提出要求的任何权利。

但是，伦敦“泰晤士报”既然承认这次干涉同金钱要求或人身侵犯全然无关，那末，归根到底，究竟什么是它的真实的或谄称的目的呢？

“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是想建立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并且已经组成了一个武装的最高法庭来在全世界恢复秩序。“泰晤士报”写道：“必须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它走上自治与和平的道路”。干涉者在那里“必须建立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应当由“某个墨西哥政党”的成员组成。

但是，有谁能设想帕麦斯顿和他的喉舌“泰晤士报”真是把这次联合干涉作为达到上述目的，即在墨西哥消除无政府状态，建立一个坚强而稳定的政府的手段呢？“泰晤士报”根本谈不到抱有任何这种空幻的目的，它的 9 月 27 日的社论就曾明确地说：

“我国和盟国之间唯一可能的分歧之点，就是共和国的政府问题。英国希望政权仍然保留在现时执政的自由党的手里，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有偏袒不久前被推翻的教权党统治的嫌疑……如果法国在旧大陆和新大陆都成了教

士和盗匪的保护者，那的确是够奇怪的。”

在今天的社论中，“泰晤士报”用同样的精神继续进行论证，它用以下的几句话总括了自己的疑虑：

“在分割了墨西哥的两党中，很难预期参加干涉的强国都能同意对其中任何一个党作出绝对的选择；而要在两个如此坚决的敌对力量之间取得实际的妥协，也同样难以设想。”

因此，帕麦斯顿和“泰晤士报”十分清楚，“在墨西哥有一个政府”；表面上为英国所喜爱的“自由党掌握着政权”；“教权党的统治已被推翻”，西班牙的干涉是教士和盗匪的最后一个绝望中的希望；最后，墨西哥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消失。因此，他们也知道，以公开声言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为唯一宗旨的联合干涉，只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它将削弱宪制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刺刀的支持下加强教士的政党，重新燃起内战的火焰，不是消除而是恢复无政府状态至其极境。

“泰晤士报”从这些前提所得出的结论是真正“惊人”和“奇异的”。

它写道：“虽然这些设想使我们怀着若干忧虑来展望这次远征的结果，但它们并不排斥远征本身的适宜性。”

总之，远征违背它唯一的公开声言的宗旨，这并不排斥远征本身的适宜性。手段妨碍它达到它自己公开声言的目的，这并不排斥采取这种手段。

但“泰晤士报”所指出的最大的“奇异的事情”，我迄今还没有宣布。

它说：“如果林肯总统接受这次会议所提出的邀请，参与这即将采取的行动，那末，事情将具有更加奇异的性质。”

假如正在与墨西哥和睦相处的美国竟然和欧洲的秩序贩子们联合起来,而且,参与他们的行动,以此来认可欧洲的武装裁判法庭对美洲国家的内政的干涉,那倒真是一件最大的“奇异的事情”。第一个这样的计划,即把神圣同盟移植到大西洋彼岸的计划,是沙多勃利昂在复辟时期为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拟定的。那次的企图被一位英国大臣坎宁先生和一位美国总统门罗先生破坏了。现时美国的动乱,在帕麦斯顿看来,是把这个旧计划加以修饰而重新提出的良好时机。既然美国在目前必须不让国际上的纠纷来妨碍它进行维护联邦的战争,所以,美国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表示抗议。在欧洲,对美国怀着最良好愿望的人都希望它将表示抗议,这样来在全世界面前坚定地拒绝在一个最卑鄙的计划中充当任何同谋。

与另外两个欧洲强国联合进行的帕麦斯顿的军事远征,是在议会闭会期间发动的,没有取得议会的批准,而且是违反议会的意志的。帕麦斯顿第一次不通过议会而进行的战争是阿富汗战争²⁰⁷,这场战争他用伪造的文件减轻了责任,辩护过去了。另一次这样的战争是1856—1857年的波斯战争²⁰⁸,当时他为这场战争辩护的托词是:“事前须经议院批准的原则不适用于亚洲的战争。”看来,现在这个原则也不适用于美洲的战争了。随着对国外战争控制权的丧失,议会将丧失对国家财政的一切控制权,而议会政体也就要变成不过是一个滑稽剧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1月8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1年11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40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富尔德先生²⁰⁹

1861年11月16日于巴黎

对于“高级政治”喜剧的鉴赏家来说，11月14日的法国“通报”是一个真正享受的源泉。正如在旧古典戏剧里一样，一个捉摸不到的万能的命运纠缠着主人公，而这一次命运的形象是数达十亿法郎的赤字。正如在旧戏剧里一样，对话只在两个人物之间进行：奥狄浦斯—波拿巴和铁列西阿斯—富尔德。但是悲剧变成了喜剧，因为铁列西阿斯所说的话都是奥狄浦斯预先悄悄告诉他的。

一次又一次地使旧的、已经演完了戏的 *personae dramatis* (剧中人) 作为崭新的主角重新粉墨登场，这套本领是波拿巴喜剧最典型的特技。起初是比约代替培尔西尼，然后是培尔西尼代替比约！波拿巴报界也是如此。格朗基奥、卡桑尼亚克、利美腊克无休止地调来遣去，一会儿在“立宪主义者报”，一会儿在“国家报”，一会儿在“祖国报”。代替维隆先生这位《bourgeois de Paris》²¹⁰ 主持“立宪主义者报”的是塞桑纳，代替塞桑纳的是居歇瓦尔，代替居歇瓦尔的是卡桑尼亚克，代替卡桑尼亚克的是勒奈，代替勒奈的是格朗基奥，而过了6年之后，维隆又作为一个崭新的人物复登原位。

同样，在宪制时期，基佐刚刚辞职，梯也尔成了新人物，而梯也尔刚刚辞职，摩莱就成了新人物，此后就这样循环不已。但是，这

些不同的活动家代表着不同的党派和意向。如果说他们互相排挤是为了互相追随，互相追随是为了再互相排挤，那末这种旋转木马式的把戏，是反映了组成路易—菲利浦时期的 *pays légal*（选举权享有者集团）的不同的党派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的。但是，比约换了培尔西尼，瓦列夫斯基换了图温奈尔，拉罗凯特换了富尔德，格朗基奥换了利美腊克呢？结果总是英国人所谓的《*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没有差异的区别）。所有这些都代表同一个东西，即 *coup d'état*（政变）。他们并不代表人民内部的不同的利益和党派。他们所代表的只是皇帝的不同脸谱。他们只不过是戴在同一个面孔上的不同的假面具而已。

“泰晤士报”酷爱比较，它把路易·波拿巴比做路易十六，而把富尔德比做杜尔哥。富尔德和杜尔哥！把他们相比，就同把瓦扬先生同卡诺相比差不多，根据只是他们都曾在陆军部高踞要职。杜尔哥是十八世纪新经济学派，即重农学派²¹¹的首领。他是一个推翻旧政权的才智之士，路易十六则是这种旧政权的化身。而富尔德是什么人呢？富尔德作为路易—菲利浦时期王朝反对派²¹²的一员，每当王朝反对派有机会提出财政大臣时，尽管他孜孜以求，但总是被根本否定。富尔德以《*financier dangereux*》（不祥的财政家）著称，而他的一系列失败的财政活动也证明这个诨名是相称的。只要他为某个提案辩护，就足以使议院否决这个提案。后来临时政府当政，富尔德来不及等政府宣告成立，就投奔赖德律—洛兰自请效劳，愿任财政部长，并且……建议宣布国家破产。他的追求失败了，于是被遗弃的情人为报复起见写了一篇抨击文《*Pas d'assignats!*》²¹³。最后，富尔德找到了路易·波拿巴，此人糊里糊涂地把法国国库委托给了富尔德先生。

富尔德积极参预了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总统选举中为使“侄子”^①获胜而玩弄的种种手腕。富尔德是个非常活跃的朋友，他在财政方面准备了政变。1851 年 12 月 2 日不仅是路易·波拿巴的胜利，也是富尔德的胜利。富尔德成了万能的人。富尔德当上了国务大臣。富尔德甚至有可能把个人的 *menus plaisirs*（小乐趣）提升为国家事务。他除了在财政方面建立专政，对剧院也建立了专政。像 *haute finance*（金融贵族）界其他臭名远扬的人物一样，富尔德把对金钱的热恋和对幕中女角的热恋结合了起来。富尔德成了幕中的苏丹。富尔德和贝列拉同是帝国财政制度的发明家。他对十分之九的当前赤字负有直接的责任。最后，在 1860 年，伟大的富尔德辞卸了国务，以便在 1861 年以《a new man》（“一个新人物”）重新出现在帝国财政喜剧的舞台上。富尔德又以杜尔哥的角色登台了，富尔德扮演着波扎侯爵！*Aplaudite, amici!*（朋友们，鼓掌吧！）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15 日

载于 1861 年 11 月 19 日“新闻报”第 31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卡·马克思 法国的财政状况

“泰晤士报”起初是温和地夸奖皇帝的 coup d' éclat (英勇的功绩), 后来就将他捧上天去, 今天又来了个急转弯, 变颂扬为批评了。这样的机动表现出英国报界的利维坦的特征:

“皇帝承认自己是一个平常的而不是一个圣洁的人; 他无疑只是用宝剑统治国家, 而不企求靠神权来统治。关于这些, 我们让别人去赞美。而我们必须问问皇帝统治 10 年来财政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这些成果比形容它们的空话重要得多…… 行政当局随心所欲行事; 大臣们只对皇帝负责; 财政状况对公众和议院严守秘密。每年表决预算的程序不是障碍, 而是面具, 不是保护, 而是欺骗。总之, 法国人民在把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一个孤家寡人掌握以后, 究竟得到些什么呢? …… 富尔德先生自己承认, 1851—1861 年的特殊信贷已达 28 亿法郎, 今年的赤字不少于 10 亿法郎……”

我们不知道, 这些钱是用什么方式弄到的, 但无论如何不是通过征税得来的。听说, 法兰西银行为恢复自己的特权而付出的 400 万已经耗尽; 从军队补贴基金中借用了 550 万; 还发行了形形色色的信用券。至于说到目前的事态, 我们驻巴黎的记者肯定说, 似乎国库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下月份就要到期的半年股息。在皇帝光辉灿烂地、成绩卓著地统治了 10 年之后, 法国的财政落到如此可悲和可耻的地步。只有现在, 法国政府在不能履行自己当前的义务时, 才稍微表现出对国民的信赖, 才稍微向他们透露了一点点过去包藏在经常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财政繁荣的华丽幻象之中的实际情况。不但如此, 正是这个时候, “两大陆评论” 因刊登了有关法国财政状况的某些资料受到法院审讯, 而这些资料的缺点, 只不过是仍然使用过分美妙的调子。”

“泰晤士报”接着就探索这种失败的原因。帝国存在的10年间，法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了一倍多。农业同工业一起发展起来，同时，铁路网也建立起来了，1848年前还只是走了第一步的信用制度得到了蓬勃的和全面的发展。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因为皇帝的命令，而是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发现后在世界市场上引起的大变动。但究竟是为什么发生了大破产呢？

“泰晤士报”提到陆海军的特别费用，这项费用是路易·波拿巴极力想在欧洲扮演拿破仑角色的自然结果；该报提到战争，最后提到公共工程的庞大费用，兴建这些工程本是为了企业主和无产者的生计和维持他们的良好情绪的。

“泰晤士报”继续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如此惊人的赤字……除了陆海军中侵略性的装备、公共工程和意外的战争以外，还有可耻的和普遍的掠夺制度——黄金如雨点般地倾入帝国及其拥护者的腰包。用某种神秘的方式突然攫取来的巨大财富，经常引起物议和惊讶，直到这种现象重复发生和屡见不鲜，物议才开始平息，惊讶才逐渐消除。现代的法国使我们能够理解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一些章节，那里认为悖人之财是反人民的罪行。人人都在谈论那些在 coup d'état (政变) 前还饿肚子的人的富丽住宅、豪华马车和挥霍无度。宫廷预算的奢侈性几乎使人难以置信。像魔杖一挥那样出现了新的宫殿，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黯然失色。除了国家金库和国家信用所拥有的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限制疯狂的挥霍。然而国家金库已不复存在，国家信用也消耗完了。这就是皇帝统治10年来给法国带来的一切。”

对欧洲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无疑就是：帝国的财政制度能否变成宪制的财政制度，像路易·波拿巴和富尔德在通信中对此提供了所谓希望那样？在目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个人的念头一转，而在于复辟的帝国的经济生存条件。欺诈性的财政制度要变成通

常的财政制度,只有消灭作为普遍管理手段的**营私舞弊**,把陆军和海军人数削减到和平时期的水平,从而使现时的政府**放弃模仿拿破仑**,最后,还必须完全放弃一直实行到今天的那种开展大规模国家建设及其他公共工程以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依附于现政府的计划。但是,难道这些条件的实现不是意味着《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为了生活而毁掉生活的根基)^①吗!事实上,难道在拿破仑公司的商标下能够恢复普通的路易—菲力浦制度吗?这正像在 drapeau blanc²¹⁴的复盖之下建立七月王朝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把 11 月 14 日的 coup d' éclat (英勇的功绩)称之为喜剧^②,并且从来不曾怀疑过,这出喜剧所追求的只有两个目的:对付现时的困难和平安地熬过冬天。如果这两个目的达到,那末,春天一到,就擂起战鼓,并且将设法使战争本身这一回能捞回一切有关的费用。人们没有忘记,到今天为止,十二月政变的法国是靠**法国国家的腰包来购买自己的全部荣誉的**,这也是仅仅**玩弄拿破仑主义的必然后果**。

英国报刊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对 11 月 14 日许下的诺言的**严肃性**和实现这些诺言的**可能性**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例如,今天的“泰晤士报”在上面引用的社论中说:

“皇帝拒绝享用特殊信贷,这种自我牺牲的美德的表现,往往发生在法国新公债之前,但很少比新公债持久。”

在该报金融专栏中说:

“由于财政危机而突然出现的财政上的圣洁的表现,是否能在国库重新

①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94—396 页。——编者注

得到充实以及新公债得到保证之后长久存在,是非常成问题的……据说,舆论将迫使皇帝违背自己的本意而实现富尔德的纲领。但是,下面这种说法是不是要更正确些呢?每个人都甘心陶醉于这种自我欺骗之中,而陆军和海军的供应者和投机者则毫不动摇地期待,到春天,在克服现时的危险之后,‘通报’将找到充分有力的根据——诸如:‘欧洲局势已经改变’,需要有所更正,法国荣誉在某处受到威胁,天主教的利益,人类自由和文明的利益——来恢复过去的财政制度。一般说来,在一个实行军事独裁和不存在公认的、不可违反的宪法权利的国家里,长时期放弃这种财政制度是办不到的。”

“经济学家”的言论大意也是如此。它是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议论的:

“尽管有法令,但对于一个丝毫不怀疑小小的失算就能彻底毁掉他的王朝的人来说,政治冒险将永远是指导原则。”

到现在为止,路易·波拿巴使欧洲只是遭到危险,因为他本人在法国经常遭到危险。能否设想,他给欧洲制造的危险将随着他本人在法国遭到的危险的增加而减少呢?这只有当国内危险到了爆发的时刻才会发生。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1 年 11 月 23 日“新闻报”第 322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弗里芒特的免职

弗里芒特被免除密苏里的军团司令职务一事，是美国内战发展史上的一个枢纽。弗里芒特不得不去赎两桩大罪过。他是共和党的第一个总统候选人（1856年），他还是第一个以解放奴隶威胁奴隶主（1861年8月30日）²¹⁵的北部将领。因此，他仍然是未来的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也是现在的妥协制造者道路上的障碍。

最近20年来美国有一种奇特的做法——不选举自己党内有权威地位的人担任总统。为了在竞选中显示阵容，固然也利用这些人的名字，但一到决定性关头人们就丢开他们，代之以仅仅具有地方声望的平常人物。波克、皮尔斯、布坎南等人都是这样成为总统的。阿·林肯的当选也是这样。安得鲁·杰克逊将军实际上是最后一个由于个人地位重要而当选的美国总统，而他的所有继任者则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地位无足轻重而当选的。

在1860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的最显赫的名字是弗里芒特和西华德。弗里芒特由于他在墨西哥战争²¹⁶时期的行动、在加利福尼亚勇敢的探险和1856年选举中的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而闻名，他是一个太著名的人物，所以到了问题已不再是共和党显示阵容，而是共和党胜利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被考虑到。因此，他就没有被提名做候选人。至于西华德——华盛顿国会的共和党参议员、纽约州

州长、共和党成立以来的毫无问题的首要演说家——情况就不同了。只有一系列恼人的失败，才迫使西华德先生放弃自己作候选人的打算，而作为一个演说家来赞助当时还比较不知名的阿·林肯。可是，当他看到他使自己作总统候选人的企图遭到了失败的时候，他却以共和党的黎塞留的资格去帮助被他看做共和党的路易十三的人。他帮助林肯当选为总统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林肯任命他做国务卿——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英国内阁首相相比的职位。果然，林肯一当选，就让西华德担任了国务卿。可是，这位曾经预言了自由劳动制度和奴隶制度的《irrepressible conflict》（不可制止的冲突）²¹⁷而名噪一时的共和党的狄摩西尼，在立场上却马上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变。林肯在 1860 年 11 月 6 日当选为总统，但到 1861 年 3 月 4 日才能就职。在此期间，在国会的冬季会议期中，西华德成了一切妥协企图的中心。为南部说话的北部报纸，例如在此以前一直把西华德看做 *bête noire*（可憎恶的东西）的“纽约先驱报”，都突然称赞他是体现了和解的政治家。的确，不惜任何代价而媾和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他的过错。西华德显然是把做国务卿仅仅当做一个晋身的阶梯，而且他所关心的主要还不是现时的“不可制止的冲突”，而是未来的总统职位。他的所作所为又一次证明，以说话流利见长的人是危险的不够格的国家活动家。请读一读他的公文吧，那是怎样可厌的一种夸夸其谈而思想贫乏、表面强硬而实际软弱的混合物呵！

所以，对西华德来说，弗里芒特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必须除掉；而这件事做起来是更容易了，因为一贯按照他的律师作风办事并且不喜欢一切标新立异的做派的林肯，是很胆小地拘守着宪法的文字，并且害怕一切足以惊动各边界州“忠诚的”奴隶主的步骤

的。弗里芒特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他显然是一个带有豪气的人，有点儿夸张和傲慢，不忌讳传奇剧式的行动。起初，政府企图用一连串细小的指摘迫使他自行引退；这样做没有成功，于是政府就在他所组织的军队在密苏里西南部转入反攻，即将进行决战的时候，免除了他的统帅职务。

弗里芒特是西北部各州的偶像，这些州歌颂他是《pathfinder》（开路人）²¹⁸。它们把他被撤职一事看做是对人格的侮辱。如果联邦政府再遭到几次布尔河和博耳斯—布拉夫那样的失败²¹⁹，那时就可以看到，政府是自己把约翰·弗里芒特造成了一个反对派领袖，这个反对派那时候将起来反对政府，并且结束目前这一套以外交方式进行战争的做法。至于华盛顿的陆军部所公布的这位被撤职的将军的罪状，我们以后再作评论。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19 日
左右
载于 1861 年 11 月 26 日“新闻报”第
3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弗·恩格斯 志愿兵军官

“某某中尉被革职；某某少尉被除名；某某上尉被解除美国陆军军职”——这就是我们从美国收到的大量军事新闻中的几个例子。

最近 8 个月以来，美国已经编成一支很大的志愿兵野战军队；它不吝惜力量和金钱来使这支军队有战斗力；而且这支军队还占着一个便宜，即差不多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它都处在一支从不敢向它发动总攻击或者在它败后进行追击的敌军的步哨面前。这些有利的情况，应该在极大的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在组织志愿兵时的缺陷：组成志愿兵核心的很小的正规军给他们的援助很少，缺乏有经验的副官和教官。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美国本来就有许多既合适而又愿意帮助组织志愿兵的人，一部分是受过正规训练并且在 1848—1849 年各次战争中参加过战斗的德国军官和兵士，一部分是最近 10 年来移民中的英国兵士。

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正常地整肃军官的队伍，这并不说明志愿兵制度本身有什么弱点，而是说明：由志愿兵自己不加甄别地从他们内部选拔志愿兵军官的制度，是有一些弱点的。美国政府只是在面对敌人的 8 个月的战争之后，才下决心让志愿兵军官在某种程度上自我鉴定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在获得军官称号以后所应完成的任务；于是看吧，结果是多少人自愿或被迫地递了辞职书，多少人不怎么光彩地被免除了职务。毫无疑问，如果美国

军队在波托马克河附近碰到的是一支以相当数量的职业兵士为核心而紧密结成的部队，它早就溃散了，不管它的兵士个人怎样勇敢。

这些事实也可以作为英国志愿兵的很好的教训。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从“志愿兵杂志”创办之初就说过^①，军官是志愿兵制度的薄弱环节，并且主张在一定时期之后对军官进行考试，要他们证明自己至少是有条件将来能胜任他们的职务。当时，大多数担负了指挥职务并且训练兵士（尽管自己也同兵士一样，对训练科目一窍不通）的绅士们，都对这种想法采取轻视态度。这正是对政府的任何帮助和干预同样采取轻视态度的时候。但从那时起，要求这些绅士们掏腰包的压力很大，迫使他们去请求政府出钱援助；于是，依照同政府打交道的惯例，这也就是意味着要求政府干预。另外，两年的经验也十分明显地揭示了现行的任用志愿兵军官的制度的缺陷。现在伦敦的一个显然是权威人士的军官告诉我们说，志愿兵军官即将应召接受考试委员会的考核，以判明他们是否适合带兵。

我们衷心希望能够这样做。事实是，英国志愿兵军官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进行一次整肃。请看一看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的基干营，并把它同志愿兵的营比较一下。志愿兵要用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的事情，基干部队的兵士们不要半小时就完成了。我们多次看见过英国志愿兵的某些优秀的营所做的方队队形，我们应该说，如果一队骑兵在它们的翼侧做好射击准备以前打不垮它们，那就是根本不中用的骑兵。这不是兵士们的过错。兵士们对于自己的任务看来正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有时甚至像大家在基干营看到的那样机械地完成这些任务。但兵士却不得不

^① 见本卷第 154—156 页。——编者注

等候连的军官,因为这些军官似乎对于究竟应该发什么口令,什么时候发,都迟疑不决。这样一来,队形变换也就迟疑甚至混乱了,而变换队形的最重要的要求恰恰是指挥和执行都必须迅速,这是只有靠长期实地训练才能达到的。所以,如果经过两年实地训练还有这种情况,那不正好证明许多志愿兵军官都不胜任他们所担当的重要职位吗?

然而,营长们不久以前却受到了有资格的高级权威人士的最大夸奖。据说,营长们看来是胜任的,而连的军官并不总是这样。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我们是完全不想反驳这后一种说法的,但我们必须说,假如这位高级权威看到中校和少校不是在大检阅的时候,而是在进行平常的营教练的时候,那末这种看法可能会多少有所不同。在大检阅的时候,任何一个校官,即营长,如果他完全不胜任自己的工作,他是不会采取由自己作主的行动的。他有一个副官做提示人,这个提示人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他依据副官的提示办事,顺利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而倒霉的上尉却只好在没有任何提示人的情况下勉强地执行自己的职务。但是看一看同一个校官在进行营教练时的情况吧。在这里没有将官的敏锐眼睛盯着他;在这里他就是最高权力;在这里,在没有找副官讨主意或没有乱成一团以前,副官往往必须站在陛下的规章给他安排的位置上,有主意也不能提。正是在这里才能看到志愿兵校官的本来面目。他在这里是应该指导兵士进行营教练的,但是既然他本人对这门学科的修养差得很,所以他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教教自己。正像古语说的: docendo discimus (吾人以教为学)。但是,如果教者本人在他所要教的那门技艺上不行,那就可能造成,而且不幸确实常常造成差错和混乱。这既不能使志愿兵的营教练取得成绩,也不能

使他们信任他们的指挥官,因为兵士们发现他们的营教练无非是使指挥他们的校官借此机会自己受一次训练,但是却把他们甚至毫无目的地赶来赶去,并且指望他们以自己知识上的优胜来纠正校官的差错。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志愿兵的指挥官们没有付出一些力量来学习自己的职务;我们的意思是说,既然连的军官都不能像列兵那样容易从普通人中造就出来,造就校官就更困难了。仅仅根据营教练的经验,我们就应当作出结论:只有职业军人适于担任营的指挥。如果我们认为营教练只不过是校官的职责的一部分,营长可能被派去执行自己负责的独立任务,因此需要有更高级战术的知识,那末我们还应该说,眼看 600 名或 1000 名兵士的生命将交由这样的普通人(现在大多数营长都是由这些人担任)来支配,是会令人感到很可悲的。

可以相信,英国志愿兵一旦面对敌人,它的条件决不会像现在美国政府得以整肃志愿兵军官队伍里最无能的人那样良好。英国志愿兵一旦被征召,他们要打的就不是同他们一样的志愿兵军队,而是欧洲最有纪律最有主动性的军队。最先进行的一些战斗将是决定性的;因此可以相信,如果由于上校指挥不当,或者由于上尉不可靠而造成迟疑或混乱,这一下子就会被利用的。在敌人面前是没有时间进行整肃的,因此我们希望在还有时间的时候进行这项工作。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11 月中
载于 1861 年 11 月 22 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64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卡·马克思 “特伦特号”事件

1861年11月28日于伦敦

英国邮船“特伦特号”与北美军舰“圣贾辛托号”在旧巴哈马海峡的狭窄的航道中发生的冲突，是当前最引人注意的事件。11月27日下午，“拉普拉塔号”邮船把这一事件的消息带到南安普顿，在那里通过电讯立刻闪电般的传遍整个大不列颠。当天晚上，伦敦交易所成了骚乱景象的舞台，与宣布意大利战争时候的情景相似。国家证券下跌了0.75%到1%。在伦敦流传着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如说美国公使亚当斯已经接到出境护照，太晤士河上的一切美国船只都被扣留等等。同时，在利物浦的交易所里，商人们举行了一个抗议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步骤来恢复被侮辱的英国国旗的荣誉。每一个正常的英国人就寝的时候都确信：他们在和平情况下入梦，而醒来一定是战争状态了。

尽管这样，仍然可以基本上断然肯定：“特伦特号”与“圣贾辛托号”的冲突并没有战争的危險。英国半官方的报纸，如“泰晤士报”和“晨邮报”，都正在示意要平静，极力试图用冷冰冰的法学议论来浇激动的火焰；那些稍微看到一点点 *mot d'ordre* (信号) 就要为保卫英国狮子而狂叫的报纸，如“每日电讯”之类，现在是真正的温和的典型。只有托利党反对派的报纸“先驱晨报”和“旗帜报”²²⁰

狂叫不已。这些事实使每一个有经验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即政府已经决定不把这一《untoward event》(不幸事件)制成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此外还应该指出,这个事件,如果不是指事件经过的一切细节的话,是事先就预料到的。10月12日,南部同盟派往法国的大使斯莱德耳先生和派往英国的大使梅森先生以及他们的秘书尤斯提斯与麦克法兰,已经乘“西奥多拉号”越过查理斯顿封锁线赴哈瓦那,以便从那里找机会乘挂着英国旗的轮船转赴欧洲。英国每天都在期待他们到达。北美的军舰也从利物浦出发,要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截获这些先生们和他们所携带的公文。英国政府也把北美是否有权采取这种步骤的问题提交政府的法律顾问,征询了他们的意见。这些顾问的回答据说是肯定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问题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打转。从美国建国以来,北美就采用了**英国**的海上法,保留了它的全部严格性。这个海上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切**中立国的商船**都应受交战**国搜查**。

斯托威耳勋爵在一次已经著名的判决中说:“这项权利是使中立国船只不载运任何禁运品的唯一保证。”

美国最大的权威**肯特**也说过意思相同的话:

“这项权利是从交战国的自保权利产生的。**英国**海军裁判所关于检验权和搜查权的理论已为我国法院完全承认。”

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²²¹并不是由于美国反对这种搜查权,像有时被人误解的那样。美国之所以对英国宣战,勿宁是因为英国**非法地**僭越权力,竟然借口捕拿逃亡的英国水兵而搜查美国

的军舰。

总之，“圣贾辛托号”是有权搜查“特伦特号”邮船并没收船上的禁运品的。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所携带的公文属于禁运品，这一点即使是“泰晤士报”、“晨邮报”等等也都承认。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即斯莱德耳、梅森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否也是禁运品，因而可以被收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法学家当中也是意见分歧。关于“禁运品”问题的英国最大权威普腊特在论“准禁运品——公文和乘客”一章中所提到的是“交战国政府致驻外官员的情报与命令之传递或军事人员之载运。”²²²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不是军官，同时也不是外交使节，因为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承认他们的政府。他们究竟是什么呢？当年，杰弗逊为了辩护英国在英法战争时期所坚持的关于禁运品的极其广泛的概念，在他的回忆录²²³中写道：禁运品一词，从根本性质上来说，不容有任何确定的定义，它必然要留下很大的自由解释的余地。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这个法学问题将从英国法律的范围转移到邓斯·司各脱式的争论²²⁴的范围中去，这种争论的势头不会超出外交函件的交换。

至于北美行动的**策略**方面，“泰晤士报”用下面的话作了十分正确的估计：

“即使西华德先生本人也一定知道：在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听来，这些南部的特使们从监禁中发出来的声音，比他们如果从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所能发出的声音要雄辩一千倍。”

而且，同盟不是已经有了杨西和曼两先生在伦敦作代表吗？

我们认为，西华德先生最近这一行动，是色厉内荏的人所特有的不聪明行动之一。如果这次海上的冒险能提前促使西华德离开

华盛顿政府，那末，这个事件就完全不会作为一个《untoward event》（不幸事件）而被美国载入内战史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1 年 12 月 2 日“新闻报”第 331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英美的冲突

1861年11月29日于伦敦

关于巴哈马海峡事件，王室法官²²⁵昨天就已经不得不提出他们的意见了。他们的诉讼记录包括留在“特伦特号”船上的英国人员的书面证词以及海军准将威廉斯的口头证词，威廉斯当时是海军部在“特伦特号”上的代表，他于11月27日乘“拉普拉塔号”轮船抵南安普顿，立即被电召前往伦敦。王室法官们承认，“圣贾辛托号”有权检验和搜查“特伦特号”。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因为在美国内战爆发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里曾经明确地把公文列为禁运品²²⁶。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即梅森、斯莱德耳两先生及其一行本身是否也是禁运品，因而可以收走。看来，王室法官是持着肯定的看法的，因为他们完全放下了**实质性的**法律问题。根据“泰晤士报”报道，他们在结论中仅仅指责“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犯了**手续上的错误**。这位指挥官本来应该把“特伦特号”作为战利品带到最近的美国口岸，交给北美的战利品裁判所²²⁷审处，而不应该捕走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一行。手续无可争论是这样，这符合英国的海上法，因而也符合美国的海上法。

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英国人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也曾常常违

反这项规定,像“圣贾辛托号”这样即决即行。无论如何,由于王室法官们的这一决定,整个冲突已经被归结为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从而失去任何重要意义了。说到美国政府,有两种情况使它容易接受这种解释,从而从形式上给英国以赔偿。第一,“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威尔克斯舰长当时不可能直接从华盛顿接到命令。他在从非洲返回纽约的途中于11月2日到达哈瓦那,11月4日就驶离该处,而与“特伦特号”的冲突是11月8日在公海上发生的。威尔克斯舰长在哈瓦那仅仅停留了两天,根本没有可能同政府联系。他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美国当局是联邦的领事。第二,他显然是真正糊涂了,他没有坚持要交出公文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英国人民的精神上的影响,在于它能够很容易地被英国棉花裔人——脱离派的朋友们用作政治资本。我上次提到的他们在利物浦召开的抗议会^①就可以说明这些情况。这个会是11月27日下午3时,在来自南安普顿的惊人的电报到达一小时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

开这个会,本来是试图让航行于利物浦和纽约之间的丘纳德公司的轮船主人丘纳德先生担任主席,后来又试图让其他商界名人担任主席,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一个名叫**斯宾斯**的、凭着一本为奴隶制共和国说话的小册子²²⁸而扬名的青年商人担任了主席。违反着英国的会议规则,他这个主席本人提出了一项“敦促政府要求立即对此次侮辱作出赔偿,以维护英国国旗的尊严”的动议。会场上一片喝采,鼓掌,数不清的欢呼赞成!赞成!这位奴隶制共和国的卫士的主要论点是说,运输奴隶的船只迄今一直在美国国旗

^① 见本卷第408—411页。——编者注

的保护之下不受搜查，尽管英国曾经声明自己有搜查权。接着这位慈善家就对奴隶买卖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抨击！他承认，1812—1814年同美国的战争是由于英国坚持在美国军舰上搜查逃亡的英国水兵的权利而引起的。

“但是”，他以奇怪的诡辩接着说，“为捕回英国海军逃兵而行使的搜查权，与暴力劫走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这样高贵的人的权利，是有很大不同的，何况他们是在英国国旗的保护之下！”

不过，他的最大的一张王牌是在他结束他的激烈演说的时候打出来的。

“不久以前”，他吼叫着说，“当我在欧洲大陆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里的人们评论我们对美国的态度，这些评论使我不能不脸红。大陆上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说些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已下决心要驯服地忍受美国政府的任何一种不讲理的事情，忍受它对我国的尊严的任何一种侮辱。对于这些意见，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有脸红。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已经容忍得够久了，已经能保持（容忍）多久就保持多久了。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事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难堪和令人惊愕的事实（！），因此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责任告诉政府：这个伟大的国家对于本国国旗受辱一事所抱的感情是强烈而一致的。”

这一长篇毫无意义的废话，博得了如雷的掌声。反对者的声音被呼喊声、嗤嗤声、顿足声压了下去。一位坎伯尔先生指出，这整个会议是“不合规则的”，而坚定不移的斯宾斯则回答道：“就算是这样吧，然而我们开会来讨论的这件事本身也是违反规则的”。一位特纳先生提议明天再开会，以便使“利物浦全市来发表意见，而不是由一个棉花掮客的集团来盗窃它的名义”，这时，从会场各方面响起了“抓住他，把他扔出去！”的喊声。特纳先生一点也不慌张，他重申他的动议，可是，再一次违反英国会议的全部规则，他的

动议没有被提付表决。斯宾斯胜利了。但是,事实上,伦敦的情绪之所以冷静下来,再没有什么比斯宾斯先生胜利的消息出力更多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1 年 12 月 3 日“新闻报”
第 332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 和伦敦的反应

1861年11月30日于伦敦

自从对俄国宣战那个时候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一次遍及英国社会一切阶层的激动能够比得上这次由“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所引起的激动。“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是在本月27日由“拉普拉塔号”带到南安普顿的。经过电报传递，在下午2时左右，关于这个“不幸事件”的消息已经在英国所有交易所的新闻室中张贴出来。一切商业证券都下跌，只有硝石价格上涨。统一公债券跌落了0.75%；而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则规定，来自纽约的船只，要缴纳5基尼的战争保险金。到了晚上，伦敦流传着十分热闹的谣言，说美国公使出境护照已经即时交给他了，已经下令立即扣押在联合王国港口的一切美国船只了，等等。脱离派的朋友们利物浦棉商利用这个时机，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交易所的棉业交易厅里举行了一次抗议会，会议的主席是一本替南部同盟说话的内容暧昧的小册子的作者斯宾斯先生。“特伦特号”船上的海军部代表，随“拉普拉塔号”到达的海军准将威廉斯，立即被召赴伦敦。

第二天，11月28日，伦敦报纸一般都显示出一种温和的语调，与前一天晚上政客和商人的极大激动形成一个奇怪的对照。

“泰晤士报”、“晨邮报”、“每日电讯”、“晨报”和“太阳报”²²⁹这些帕麦斯顿的报纸，都接到了要缓和而不要更激动的命令。“每日新闻”虽然严厉谴责了“圣贾辛托号”的行动，但它的目的显然是为自己洗刷抱有“北方佬的偏见”的嫌疑，而不见得是要抨击联邦政府；约翰·布莱特的报纸“晨星报”²³⁰则不对这一“行动”是否策略和是否明智的问题作任何判断，而只为其合法性作辩护。只有两家报纸是伦敦报界一般趋向中的例外。“先驱晨报”和“旗帜报”是名称不同而实际上是一家的报纸，这两家的托利党文人幸灾乐祸地尽情叫嚣，以为终于把“共和党人”拿住，找到一个现成的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了。支持这些文人的报纸只有一家，即“纪事晨报”²³¹，这家报纸多年来曾经先后把自己出卖给毒药杀人犯帕麦尔和土伊勒里宫，企图以此来延长它那屡遭变故的生命。由于主要的报纸语调温和，交易所的激动就大大平息了。同一天，11月28日，海军准将威廉斯前往海军部，报告了在旧巴哈马海峡发生的事件的情况。他的报告，连同在“特伦特号”船上的官员们的证词，立刻被呈交王室法官，这些法官们的意见到夜晚已正式转给帕麦斯顿勋爵、罗素伯爵和其他政府成员考虑。

11月29日，可以看到官方报纸的语调稍有一些变化。人们开始知道了，王室法官们根据一些技术上的理由宣布“圣贾辛托号”巡航舰的行动非法，内阁在此之后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由下一班航轮把训令送交莱昂斯勋爵，责成他按照英国法官们的意见办事。于是，在各主要商业处所——交易所、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耶路撒冷公司、波罗的海公司等等，激动又以加倍的力量重新开始，并且在另一个消息的影响下更形加剧，这个消息说，原定运往美国的硝石已在启运的前一天停止运出，海关于29日接到命令：除极为

特殊的情况外，禁止将这一商品向任何国家输出。英国的有价证券再度跌落了 0.75%，整个证券市场一度呈现一种真正的恐慌，任何有价证券都做不成交易，同时，一切物价都严重地跌落。下午，由于若干传闻，主要是由于传闻亚当斯先生已经表示华盛顿政府将不会对“圣贾辛托号”的行动负责，交易所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11 月 30 日（今天），所有伦敦的报纸，除开“晨星报”这个唯一的例外，都提出了一个抉择：或者是华盛顿政府履行赔偿，或者是——战争。

在叙述了自“拉普拉塔号”到达直至今天的事变的一般进程之后，我现在要谈一谈各种意见。自然，对于在英国邮船上逮捕南部的特使的问题，不能不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是法律方面，一是策略方面。

关于这件事的法律方面，保守党的报纸和“纪事晨报”所提出的第一个难题是：美国从未承认南部脱离派为交战国，因此，美国对他们就不能妄用交战国的权利。

这一个诡辩立刻就被官方报纸自己抛弃了。

“泰晤士报”说：“我们已经承认南部同盟各州为一个交战国，而且当时机来到时，我们还要承认它们的政府。因此，我们已经把中立于两个交战国之间的国家所有的义务与不便承担起来了。”

所以，不论美国是否承认同盟是交战国，它都有权坚持要求英国承担一个中立国在海战中的一切义务与不便。

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报纸以外，整个伦敦报界都承认“圣贾辛托号”有权对“特伦特号”进行检视、查验和搜查，以便确定它是否载有属于“战时禁运品”的物资或人员。“泰晤士报”曲折折地说什么英国的判例法“是在与现时发生的情况极不相同的情

况下产生的”，“当时轮船还不存在，还没有载运对世界各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信件的邮船”，“我们（英国人）当时是为生存而战，因而在那时候做了我们不会容许别人去做的事情”等等，都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帕麦斯顿私人的 *Moniteur*（机关报）“晨邮报”在同一天说，邮船就是商船，所以它不能享有军舰和运输舰的搜查豁免权。“圣贾辛托号”的搜查权，事实上已为伦敦报界和王室法官所承认。至于说“特伦物号”不是从一个交战国口岸开往另一个口岸，相反地是从一个中立口岸到另一个中立口岸的反对论点，也因为曾经有斯托威耳勋爵的判例，即搜查权的成立是要确定船只的目的地而站不住脚了。

其次，发生了这个问题：“圣贾辛托号”对“特伦特号”船头发出一阵射击，接着又发出一颗炮弹在它近旁爆炸，这是否违反了在行使检验搜查之权时应当遵守的惯例与礼节呢？伦敦报界一般都认为：既然事件的详情迄今只是从当事双方的一方的证词中得到的，这种小问题不能影响英国政府将要做出的决定。

“圣贾辛托号”所行使的搜查权是这样被承认了，那末，它所搜查的是什么呢？是它怀疑“特伦特号”可能载运的战时禁运品。什么是战时禁运品呢？交战国政府的公文是否算战时禁运品呢？携带这种公文的人员是否算战时禁运品呢？如果对这两个问题都做了肯定的回答，那末，假使这些公文及其携带者是在从一个中立口岸到另一个中立口岸去的商船上发现的，他们仍然是战时禁运品吗？伦敦报界承认：大西洋两岸最高司法当局的判例是如此矛盾，既可以用来证明肯定的答案，也可以用来证明否定的答案，看起来都正当合理，所以，无论如何，一个有利于“圣贾辛托号”的 *prima facie*（初步）案件是成立了。

王室法官们也同意英国报界的这种流行的意见，他们也已经完全放下了问题的实质，只谈形式方面。他们断言，国际法**实质上**并没有被违反，而只是**形式上**被违反了。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圣贾辛托号”错在自己作主逮捕了南部的特使，而没有把“特伦特号”带到联邦的某一港口，把这个问题交付联邦的战利品裁判所，因为任何武装的巡航舰都没有权利做海上的法官。“圣贾辛托号”违反了**手续**——这就是王室法官们所归罪于它的一切。据我看，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要搜求先例，表明英国也曾违反过海上法的手续，那可能是很容易的；但是，决不能容许以违反法律来代替法律本身。

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英国政府所要求的赔偿，即送还南部的特使，是否可以根据英国人自己称为**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违法行为来断定其为合理呢？关于这一点，伦敦坦普尔法学院的一位法学家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写道：

“如果这个案件对我们并不是有利到下述这种程度，使我们能够指责美国法院对该舰的判决是显然违反国际法，那末，那位美国舰长的行为虽不合规定，即让‘特伦特号’驶往南安普顿，倒是显然符合‘特伦特号’的英国船主和英国乘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把一件实际上对我们有利的手续上的错误，当做兴起国际争端的借口吗？”

不过，如果说，美国政府应当同意（据我看应当如此）威尔克斯舰长是违反了（形式上或实质上）海上法，那末，为了本国的名誉和利益，美国政府就不必再在应当给予受损一方的赔偿的条件问题上过分计较了。美国政府应该记住：如果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战争中，那就是成全了脱离派；这样的一场战争对于正处在困难情况下的路易·波拿巴将是一种天赐的幸运，因而必将得到法国官方

的全力支持；最后，由于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海面的一些据点驻扎着英国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再加上远征墨西哥的兵力，英国政府将拥有一支具有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

至于在巴哈马海峡进行搜捕一事的策略方面，不仅英国报界，而且欧洲报界，都一致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奇怪行为表示困惑不解，不知道它为什么当杨西先生和曼先生正在伦敦昂然阔步的时候，竟为了取得梅森、斯莱德耳之流的躯体而惹起这样大的国际危险。“泰晤士报”的确说得对：

“即使西华德先生本人也一定知道：在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听来，这些南部的特使们从监禁中发出来的声音比他们如果从圣詹姆士宫和土伊勒里宫所能发出的声音要雄辩一千倍。”

美国的人民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曾经慷慨地同意限制自己的自由，这回一定能够同样愿意公开承认和慎重补救这个国际上的失策，来赢回英国的舆论；而为此失策辩护，则可能使叛乱分子的最狂妄的希望得以实现。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1 月 3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1 年 12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46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弗·恩格斯 美国战争的教训

几个星期以前，当我们注意到美国志愿兵内部进行的一次必要的整肃^①的时候，没有得到机会来充分地探讨这次战争对于大西洋这边的志愿兵不断提供什么宝贵教训。所以，让我们现在重新谈谈这个问题。

目前在美国进行的战争，其作战方式是真正没有先例的。从密苏里河到切萨皮克湾，差不多对半分属于两个敌对阵营的百万兵士互相对峙已经有 6 个月左右，而没有进入一次总会战。在密苏里，两军你进他退，你打他打，再他进你退，都没有任何显著的结果；甚至到现在，经过 7 个月的行进和反转行进，国家想必受到可怕的蹂躏之后，看来仍像过去一样，离任何一种解决都还很远。在肯塔基，经过一个表面上中立²³²而实际上是进行准备的长时期之后，看样子不可避免地也要形成这样的局面；在西弗吉尼亚，正在不断进行着没有任何显著结果的小战斗，而在波托马克河附近，虽然双方都集中了最大兵力，彼此几乎可以望见，但任何一方也不想进攻，这说明在目前形势下甚至胜利也完全没有用处。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情况带来严重变化，这种无结果的作战方式可能还要延

^① 见本卷第 404—407 页。——编者注

续好几个月。

这应该怎样来解释呢？

在美国，双方差不多尽是志愿兵。先前的合众国正规军的少数核心，不是已被溶解，就是力量太弱，不能影响集中在战场上的大量未经训练的新兵。甚至没有足够数量的教练军士把这些人变成兵士。所以，训练必定进行得很慢；而且确实无法预言，这种训练要进行多久，才能使集合于波托马克河两岸的这一批优良的人力适于作大部队运动，以联合的兵力发动或迎接战役。

但是，即使兵士能够在比较短的期限内受完训练，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军官来领导他们。且不必说连指挥官，他们当然不能够从平民当中弄到；即使把正规军的每个中尉和少尉都任命为营指挥官，担任这种职务的军官也是不够的。所以，平民出身的上校数量很多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任何一个了解我们自己的志愿兵的人，如果看到麦克累伦或博雷加德因手下只有一些6个月军龄的平民出身的上校来执行自己的命令而拒绝采取进攻行动或复杂的战略机动，都不会认为他们太胆小的。

但是，让我们假定，这种困难大体上已被克服了；平民出身的上校除穿上军服以外也已得到执行任务所必需的知识、经验和技巧了，——至少对步兵是这样吧，但是骑兵的情况会怎样呢？训练一个骑兵团比训练一个步兵团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教练员有更多的经验。就假定所有人员入伍时都已具有足够的骑术知识，就是说，假定他们都能够牢固地骑在马上，能够控制他们的马，并且知道怎样看管和饲养它，这仍然未必能缩短训练时间。军事骑乘要这样来控制马匹，使它做出骑兵队形变换时所需要的一切运动，——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和平民通常习练的那种骑乘大不相

同。拿破仑的骑兵，据威廉·纳皮尔爵士的意见（见“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²³³），简直是比当时英国的骑兵还好，但大家知道，他的骑兵是由那些仅仅骑过马的最坏的骑手组成的；同时，我们有许多优秀的运动骑手，一旦参加志愿兵骑兵部队，也都发现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所以，当我们发现美国人现在非常缺少骑兵，他们现有的少数骑兵是由类似那些不适于作密集队形攻击的哥萨克骑兵或印度的非正规骑兵队（rangers 游骑兵）组成的时候，是用不着表示惊讶的。

炮兵方面的情况一定更糟；工兵的情况也一定是这样。这两个兵种的武器都是高等技术的，军官和军士都必须有长期细致的训练，兵士的训练当然也比步兵长。此外，炮兵是一个甚至比骑兵更复杂的兵种；这里要有大炮、受过牵引大炮训练的马匹和两种受过训练的兵士——炮手和驭手；此外，还要有大量弹药车和大的弹药实验室、铸造厂和作坊等等；而这一切都必须配备有复杂的机器。有人认为联邦派²³⁴在前线一共拥有 600 门火炮，但是这些火炮将怎样维护，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见，因为我们知道，在 6 个月内凭空编成 100 个完整的、供应充分的、维护得很好的炮兵连，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让我们再假定，所有这些困难都已经克服了，美国的两个敌对集团的战斗部队都处在很好的作战条件下了，即使这样，它们能不能动作呢？肯定不能。军队需要给养，而在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这些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一支大军主要要由仓库来供给粮食。军队的弹药必须补充；随军要有军械技工、马具工、木工以及其他工匠，以保证军队的技术兵器正常。所有这一切必要的条件在美国都是不具备的；不得不几乎在空地上来安排；我们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肯定两军的军需和军运（即使在现在）已经脱离

了幼年状态。

在美国,无论北部或南部,亦即无论联邦派或同盟派,一般说来都是没有军事组织的。常备军就人数来说完全不足以对付任何像个样子的敌人;民军几乎未曾有过。联邦以前所进行的战争从来也没有使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考验;英国在 1812—1814 年期间没有多少兵可派,而墨西哥则主要是用各种平民来自卫的。事实是,美国由于它的地理形势,实际上没有遇到过能够在某个地方至少用三四万以上正规军的兵力向它进攻的敌人,而且它幅员广大,这对于上述的那一支敌军来说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可怕的障碍,比美国能够派出的任何部队都要厉害。不过,美国的军队用来作为 10 万志愿兵的核心,并在适当时期训练他们,还是足够的。但是,当国内战争需要 100 多万人的时候,整个体系就垮下来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结果是明显的。两个庞大、笨重的人群互相对峙着,彼此都害怕对方,并且差不多像害怕失败那样害怕胜利,企图通过浩大的费用来建立一种类似正规组织的东西。金钱的巨大开支,不管多么惊人,却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组织上根本没有能够借以建立新大厦的基础。在每一个主管部门大都没有知识和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另一方面,从效果和组织方面来看,从这些费用得来的好处又非常微小。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不列颠的志愿兵应该感谢自己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找到了一支人数众多、纪律很好和有经验的军队来庇护他们。如果注意到各种职业都具有成见,那末,这支军队是很好地接纳了他们,很好地对待了他们的。应该希望,无论是志愿兵,或是公众,永远也不要以为志愿兵有一天能在任何程度上代替正规军。如果有这样的人,只要一看美国两支志愿军的状况,就应该知道自己是无知和

愚蠢的。任何一支新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假如它得不到比较强大的正规军的巨大精神资源的陶冶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主要是正规军的基本要素即组织的陶冶和支持，就永远也不会有战斗力。请假定英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拿来同美国已经必然地发生了的事情作个比较。在英国，陆军部可以很容易地在受过训练的军人当中再找一些文官，在他们帮助下就可以完成召集 30 万志愿兵的军队所需要的一切新的工作；有足够的休职军官，可以每个人专门照管譬如说三四个志愿兵营；再努力一下，就可以使每一个营配备一名正规军官做副官和一名正规军官做上校。骑兵当然不能临时建成，但是对志愿兵炮兵实行坚决改编——用皇家炮兵的军官和驭手——则可以补足许多个野炮连。国内的非军人工程师们只差一个机会来学习本行的军事方面，他们一有机会马上就会变成第一流的工兵军官。军需和军运部门是组织好了的，很快就可以用来满足 40 万人的需要，像满足 10 万人的需要那样轻而易举。一切都不会乱，一切都不会糟；到处都会有对志愿兵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用不着在黑暗中摸索；所以，除了英国在战争一开始时不免要有一些失策以外，我们找不到理由能说明在 6 个星期以后还有哪一件事没有顺利进行。

现在再来看一下美国，你们就会明白，正规军对于建立志愿兵是多么重要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61 年 11 月底
载于 1861 年 12 月 6 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66 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

卡·马克思 “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

1861年12月4日于伦敦

现在，认识一下“特伦特号”剧中的主要登场人物，是不无兴趣的事。这里，一边是主动的角色，即“圣贾辛托号”的指挥官**威尔克斯**舰长；另一边是被动的角色，即**詹·默·梅森**和**约翰·斯莱德耳**。查理·威尔克斯舰长是英国那位有名的政治煽动家、一度有动摇乔治三世的王位之势的威尔克斯的兄弟的直系后代。当年，汉诺威王朝由于同北美殖民地作斗争而得救，避免了一次英国革命；这次革命的征兆就清楚地表现在威尔克斯的呼声里和尤尼乌斯的书信里²³⁵。威尔克斯舰长1798年生于纽约，在美国海军中服役了43年，曾经统率1838—1842年奉联邦政府之命考察太平洋北部和南部的舰队。他曾发表共有5卷的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²³⁶。他也是关于美洲西部的一本著作的作者，这本著作包含着若干有关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地区的有价值的材料²³⁷。现在已经确定：威尔克斯是自己作主采取行动，并没有华盛顿的指示。

被捕获的南部同盟的两位代表——**梅森**和**斯莱德耳**两位先生——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对照。**梅森**生于1798年，出身于弗吉尼亚的一个旧贵族家庭，这是王党在伍斯特战役中大败²³⁸以后逃出英

国的那些家族之一。我们这位主角的祖父是同华盛顿、杰弗逊等人一起被美国人称为《the revolutionary fathers》(革命之父)的人们中间的一个^①。约翰·斯莱德耳与梅森不同,他出身既不是贵族,家庭也不是奴隶主。他的故乡是纽约,他的祖父和父亲是那里的诚实的 tallow-chandlers(蜡烛商人)。梅森学了几年法律之后就去做政治。从1826年起,他做过好几任弗吉尼亚州众议院的议员;1837年曾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但只是从1847年开始才成为一个名人。在这一年,弗吉尼亚州把他选进了美国参议院,这个席位他一直保持到1861年春天。斯莱德耳现在68岁,早年曾经因为通奸和决斗,简单地说,因为一桩丑事而不得不开离纽约。他逃到新奥尔良,在那里起初以赌博为生,后来便做律师。他最初是做路易西安纳州立法议会的议员,不久就钻出门路,走进了国会的众议院,最后走进了参议院。作为1844年总统竞选中选举骗局的指导者,其后又作为一次骗取国家土地案的参与者,他甚至使路易西安纳流行的那种道德都有点感到震惊。

梅森是继承了势力,斯莱德耳是争得了势力。他们两位在美国参议院这个奴隶主寡头统治的堡垒里互相发现了,并且互相补充。根据美国宪法,由参议院选出一个特别的外交委员会,它的作用大致与英国枢密院(privy council)²³⁹没有被所谓内阁——英国宪法的理论上的未知数——篡夺权力以前所起的作用相似。梅森有很长一段时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斯莱德耳则是其中的一个著名的委员。

梅森坚信,每一个弗吉尼亚人都是半神人,而每一个北方佬都

^① 乔治·梅森。——编者注

是贱民和下流人，所以他从来不想隐瞒他对他的北部同僚的蔑视。他傲慢自大，蛮横无理，会阴沉地皱起眉头做出宙斯的样子，事实上，他已经把种植园土产的作风带进参议院了。他狂热地歌颂奴隶制度，无耻地诽谤北部，特别是诽谤北部的工人阶级，并且喜欢对英国放空炮；他用喋喋不休的发言使参议院为之厌倦，他执拗地发表冗长的议论，徒劳无益地想用空洞的词藻来遮掩其说话毫无内容。近年来，他装模作样地穿上了弗吉尼亚本地出产的灰色麻布衣服；但是，很能说明这个人品格的是：这灰衣服却镶着新英格兰的一个州——康涅狄格州制造的鲜明耀眼的钮扣。

梅森在前台扮演奴隶主寡头统治的 Jupiter tonans (雷神丘必特)，而斯莱德耳则在幕后卖力。斯莱德耳具有稀有的策划阴谋的才能，他能不倦不疲，坚持到底，不讲天良，无视法度，但同时却谨慎，诡密，从不阔步直前，总是绕尽圈子，因而成为南部叛乱分子最高秘密会议的灵魂。这个人的名声如何，可以从这一件事情来判断：在 1845 年，即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被派往墨西哥做公使的时候，墨西哥曾经拒绝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²⁴⁰。他的阴谋曾使波克当上总统。他是皮尔斯总统的最阴险的顾问之一和布坎南政府里的奸才。梅森和斯莱德耳同是坚持通过逃亡奴隶法²⁴¹的主要发言人；他们也同是堪萨斯血腥屠杀的祸首，并且同是布坎南政府的一些措施的幕后主谋，通过这些措施，布坎南政府把一切便于实行脱离的物力暗暗交到南部手里，从而使北部陷于没有防御的地位。

早在 1855 年，梅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宣称：“对南部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立刻、完全和永远脱离联邦。”1861 年 3 月，他在参议院声称：“他没有对联邦政府 alle-

giance (效忠)的义务”，不过，他仍然留在参议院里，并且继续领他的参议员的薪俸，直到他感到自己在那里不大安全为止。这样，他就成为一个国家最高机关里的奸细，一个无信无义的揩国库油水的人。

梅森的曾祖母是有名的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女儿。所以他还是帕麦斯顿的远亲。梅森和斯莱德耳，在美国北部的人民看来，不仅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敌对者，而且是他们**本身的敌人**。因此他们被捕之后万众欢腾，这种欢腾的情绪在最初几天使人们连来自英国的危险也不大想起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1 年 12 月 8 日“新闻报”第 337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

1861年12月7日于伦敦

帕麦斯顿的报刊——我将另外找机会说明，在外交问题上，帕麦斯顿绝对地控制着十分之九的英国报刊，同路易·波拿巴绝对控制着十分之九的法国报刊一样^①——现在感到，它们是在“可爱的困难”^②之下工作着。一方面，它们承认王室法官已经把对美国的一切指控归结为一个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归结为一种技术上的过失。另一方面，它们又夸口说，根据这些纯粹讼师的狡辩，就应当向美国发出命令式的最后通牒，虽然发出这种最后通牒的根据只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绝不是行使公认的权利时所发生的形式上的错误。因此，帕麦斯顿的报刊现在是又把实质性的法律问题提出来了。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我们不能不来简单地谈一谈实质性的法律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没有一家英国报纸敢于指责“圣贾辛托号”对“特伦特号”的检验和搜查。所以这一点已不是争论问题。

其次，我们要指出 1861年5月1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这里是这样写的：

① 见本卷第454—457页。——编者注

② 海涅“新春集。序章”。——编者注

“**维多利亚女王谕**。我们与美国政府和睦相处，……故特严格告诫和命令我全体亲爱的臣民，……不得通过或企图通过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建立的封锁线，……不得**载运官员**、……**公文**……或任何被视为战时禁运品的物件而违反……我的文告，……违法者应受到成文法和国际法的惩处，……后果自身承担，决不能得到我们的**保护**，而且将为我们所不满。”

所以，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个文告从一开始就宣布了，**公文**是禁运品，载运这种禁运品的船应当受到“国际法的惩处”。那末，这应该是怎样的惩处呢？

美国的国际法学者**惠顿**的权威性是大西洋两岸同样承认的，他在《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原理”）²⁴²第 565 页上写道：

“载运敌方公文的中立国船只，应予**捕获和没收**。因为提供这种服务的后果要大大超过运送普通禁运品的后果……英国法官**威·司各脱**爵士说，载运军事物资必然是有限度的；但运送公文的行为则可能破坏交战国另一方的整个战局的计划……通常对于违反禁运的惩罚是没收被禁的物品，这种惩罚如果应用于运送公文就很可笑。对公文是不收任何运费的，因而没收公文无损于船主，也不是惩罚运送的船只。因此，载运公文的船只本身应予**没收**。”

沃克在其《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aw》（“美国法律绪论”）²⁴³中写道：

“中立国家不得冒船只及其货载被没收的危险而参与运送**敌方的公文**。”

英国司法界的著名权威**肯特**在其《Commentaries》（“评论集”）²⁴⁴中写道：

“如果在搜查船只时发现该船载有**敌方的公文**，该船就应受到惩罚，即加以捕获，并根据战利品裁判所的判决予以**没收**。”

罗伯特·菲利莫尔博士，《Advocate of Her Majesty in Her Office of Admiralty》（“维多利亚女王海军裁判所法律顾问”），在其最近的一本国际法著作²⁴⁵的第370页上写道：

“公职人员（official）记述一个交战国政府的公务的正式函件，是一种使其承运者（carriers）具有敌人身分的公文。提供这样一种服务的危害性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它远远超过运送通常禁运品的后果，原因很明显：传递这种公文可以使交战军队的重要计划得到成功或被阻碍……这种行为应受的惩罚，就是不仅将船只，而且将其货载一并没收。”

所以，有两点是确定地成立了的。根据维多利亚女王1861年5月13日的文告，运送南部同盟的公文的英国船应依国际法受到惩处。根据英国和美国的诠释者的解释，国际法所规定的惩罚是捕获与没收这种船只。

因此，帕麦斯顿的报纸就是奉命说谎——我们要是相信这种谎言那就太天真了——，它们说什么“圣贾辛托号”的舰长在“特伦特号”上漏查了公文，因此他就没有发现公文；由于这种失察，据它们说，“特伦特号”便应当是不受侵犯的了。与此相反，还不可能知道这种英国谎言的11月17—20日的美国报刊却一致地肯定，公文已经被截获到手，并且正在翻印，以便提交华盛顿国会。这就完全改变了事态。由于有这些公文，“圣贾辛托号”就有了带走“特伦特号”的权利，而每一个美国的战利品裁判所也都有没收“特伦特号”及其货载的职责。船上的乘客也必然应当与“特伦特号”一起受美国司法的管辖。

如果“特伦特号”被带到门罗，梅森和斯莱德耳一行立即就会作为叛乱分子而处于美国司法的权限之下。因此，“圣贾辛托号”的舰长没有把“特伦特号”押解到一个美国港口，而只是截走了公

文及其携带者,就不是使梅森和斯莱德耳一行的处境变得更坏;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手续上的错误**却有利于“特伦特号”及其货载与乘客。如果英国根据威尔克斯舰长所犯的一种有损于美国而有利于英国的手续上的错误要对美国宣战,那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至于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本身是否禁运品的问题,是因为帕麦斯顿的报刊散播**谎言**,说威尔克斯舰长既没有搜查也没有截走公文,才被提出来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被提出来。正是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才成为“特伦特号”船上可能属于禁运品范围的实质上唯一的对象。但是,让我们把这一点暂时放一放吧。维多利亚女王的文告宣布交战国的《officers》是禁运品。是否仅仅军官才是《officers》呢?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是不是南部同盟的《officers》呢?赛米尔·约翰逊在他所编的英语辞典²⁴⁶中说:《Officers》就是《men employed by the public》;用德语来说,就是《öffentliche beamte》(“公职人员”)。沃克也作了同样的解释(见他所编的辞典,1861年版)²⁴⁷。

因此,根据英语的用词,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既是特使, id est (也就是说),既是南部同盟的官员,就属于被女王的文告指为**禁运品**的《officers》的范围。“特伦特号”的船长是**知道**他们具有这种身分的,因而他就是使他本人、他的船只和乘客都处在被没收的危险之下。如果根据菲利莫尔和其他一切权威们的解释,一艘船成为敌方公文的 carrer(载运者)就是破坏了中立而应当被没收,那末对于传递公文的人员就更不用说了。按照惠顿的解释,甚至敌国的**大使**,只要他是 in transitu(在途中),也可以扣留。一般说来,全部国际法的基础是这一点,即交战一方的任何人员,都可以被敌对的一方视为“**交战者**”,并受到相应的对待。

瓦特耳说：“当一个人依然是他本国的公民的时候，他就是所有与他本国处在战争状态的那些国家的敌人。”²⁴⁸

总之，我们看到，英国王室法官之所以把问题归结为**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即不是 error in re (实质性的错误)，而是 error in forma (形式上的错误)，那是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法律被破坏**的问题。帕麦斯顿的报刊之所以重新谈起实质性的法律问题，不过是因为光是一个**手续上的错误**，而且还是**有利于“特伦特号”**的错误，实在不足以作为借口而提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罢了。

与此同时，两个极端对立着的营垒的权威人士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里一边是**布莱特先生和科布登先生**，另一边是**戴维·乌尔卡尔特**。这些人从原则和个人方面来说，都是仇敌。前两位是爱和平的世界主义者，后一位则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²⁴⁹；前两位随时准备为国际贸易而牺牲整个国际法；后一位乌尔卡尔特则毫不动摇地坚持《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公道必须贯彻，哪怕世界毁灭”）的原则，而且他的“公道”，还是指“英国的”公道而言的。**布莱特和科布登**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意见代表着资产阶级实力派的看法，并且在政府里代表这种意见的还有格莱斯顿、米尔纳·基卜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康瓦尔·路易斯爵士。乌尔卡尔特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国际法，并且被公认是这种国际法的**无私的**解释者。

布莱特替美国说话的演说词和科布登所写的同一内容的信，一般的报纸消息将有报道，因此我就不多说。

乌尔卡尔特的机关报“自由新闻”²⁵⁰，在最近 12 月 4 日的一号上说：

“我们应当炮轰纽约！这就是一星期以前的那天晚上，在那个完全没有意

瓦特耳说：“当一个人依然是他本国的公民的时候，他就是所有与他本国处在战争状态的那些国家的敌人。”²⁴⁸

总之，我们看到，英国王室法官之所以把问题归结为**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即不是 error in re (实质性的错误)，而是 error in forma (形式上的错误)，那是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法律被破坏**的问题。帕麦斯顿的报刊之所以重新谈起实质性的法律问题，不过是因为光是一个**手续上的错误**，而且还是**有利于“特伦特号”**的错误，实在不足以作为借口而提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罢了。

与此同时，两个极端对立着的营垒的权威人士也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里一边是**布莱特先生和科布登先生**，另一边是**戴维·乌尔卡尔特**。这些人从原则和个人方面来说，都是仇敌。前两位是爱和平的世界主义者，后一位则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²⁴⁹；前两位随时准备为国际贸易而牺牲整个国际法；后一位乌尔卡尔特则毫不动摇地坚持《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公道必须贯彻，哪怕世界毁灭”）的原则，而且他的“公道”，还是指“英国的”公道而言的。**布莱特和科布登**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意见代表着资产阶级实力派的看法，并且在政府里代表这种意见的还有格莱斯顿、米尔纳·基卜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康瓦尔·路易斯爵士。乌尔卡尔特的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国际法，并且被公认是这种国际法的**无私的**解释者。

布莱特替美国说话的演说词和科布登所写的同一内容的信，一般的报纸消息将有报道，因此我就不多说。

乌尔卡尔特的机关报“自由新闻”²⁵⁰，在最近 12 月 4 日的一号上说：

“我们应当炮轰纽约！这就是一星期以前的那天晚上，在那个完全没有意

卡·马克思 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

1861年12月7日于伦敦

大西洋这一边的美国的友人们，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希望联邦政府采取和解的步骤。他们之所以抱着这种希望，决不是由于他们同意英国报刊在一个战时事件上的疯狂叫嚣；这个事件，即使根据英国王室法官们的意见，也已经成为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并且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概括起来：违反国际法是因为威尔克斯舰长没有把“特伦特号”及其货载、乘客与特使一齐捉走，而仅仅捉走了特使。对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抱有善良愿望的人们之所以不安，也不是由于他们担心：尽管内战使美国的力量增强，但归根到底它仍然敌不过英国；尤其不是由于他们想使美国在这严酷的考验时刻放弃，即使是极短暂地放弃，它在国际会议上所据有的足以自豪的地位。他们的动机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

首先，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镇压叛乱和恢复联邦。奴隶主和他们在北部的走狗的最大愿望，一直就是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战争。战争一旦爆发，英国第一步就要承认南部同盟，第二步就是结束封锁。其次，无论哪一个将军，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决不会在敌人所选择的时间和条件下应战的。

深得帕麦斯顿信任的“经济学家”杂志说：“对美国作战将永远成为英国历史上最痛心的事件之一；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不可避免，那末，现在的时期

是战争使我们受到最小损害的时期，而且是在我们的共同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可以使我们得到意外的、部分的补偿的时刻。”

正是这种可以说明英国为什么急欲在这个“仅有的时刻”抓住一个勉强的战争借口的原因，应该使美国抑制自己，不在这个“仅有的时刻”来提供这样的借口。你总不能为了使你的敌人受到“最小的损害”而去打仗，更不能为了通过战争给敌人“意外的、部分的补偿”而去打仗。时机完全对一方有利，对你的敌人有利。

难道要进行费力的推理，才能证明一个国家在国内战争正激烈的时候最不宜于对外作战吗？在别的任何时候，英国的商人阶级是会怀着最大的恐惧来看待对美战争的。而现在则相反。几个月以来，商界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是有实力的一部分人一直力促政府用强力打破封锁，从而使英国工业的一个主要部门得到原料的供给。害怕英国对美出口贸易减少的恐惧心理，由于减少已成事实，也失去了它的作用。“经济学家”杂志写道：“它们（北部各州）是坏主顾，并不是好主顾。”一向由英国商界主要通过承兑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期票而给予美国的巨额借贷，已经减少到大约只有 1857 年的五分之一。最后一个重要的情况是：在国内陷于破产、瘫痪，在国外困难重重的十二月政变的法国，会把英美战争看做一个真正的天赐良机来抓住；它为了换取英国在欧洲对它的支持，将竭尽全力在大西洋彼岸支持“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只要看一看法国的报纸就知道了。它们正体贴入微地关怀“英国的荣誉”，怒气冲冲地激烈论证英国必须报国旗受辱之仇，并且卑劣地诽谤美国的一切，——这一切如果不是既可笑又可恶的话，是确实很可惊的。最后，如果美国在这件事情上让步，也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尊严。英国现在所指责的，不过是单纯的手续上的错误，只是技术上的过

失,这种过失是英国在历次海战中不断犯过而美国一直抗议的,麦迪逊总统在他 1812 年宣布对英作战的咨文中也曾经详述这种情况,称之为最令人震惊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之一²⁵¹。如果替美国作辩护,可以说它是用英国的办法对付英国,那末,它现在气度恢宏地拒绝对一个美国舰长自作主张的行动负责,拒绝对这种一向被美国斥责为英国海军的一贯的僭越行为负责,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事实上,这样做的好处完全在美国一方:一方面,英国不得不承认美国有权捕获一切为同盟服务的英国船只并交付美国战利品裁判所处理;另一方面,英国也不能不在全世界面前实际上永远放弃它在 1814 年缔结根特和约时和 1842 年阿希伯顿勋爵与韦伯斯特国务卿进行谈判时²⁵²都不愿放弃的那种要求。由此可见,问题就成为这样:您是想使这个“不幸事件”变得有利于您自己呢,还是因一时激动而眼光迷乱,使它有利于您的国内外敌人?

从一周以前我向贵报寄出那篇通讯^①以来,英国的统一公债券又进一步跌落,较上星期五降低 2%,现时的兑现价格是 $89^3/4\%$ — $89^7/8\%$,兑成 1 月 9 日的期票则为 90% — $90^1/8\%$ 。这个牌价相当于英俄战争^②头两年间英国统一公债券的牌价。这次跌落的原因,总起来说,是由于最近邮班递来的美国报纸被人作了要战争的解释,由于伦敦报刊使用了激怒的语调(持续了两天的克制态度不过是奉帕麦斯顿之命有意做出来的伪装而已);另外,也是由于往加拿大派军队,出告示禁止输出武器与火药原料;最后,是由于每天都有耀武扬威的谈话,说是各船坞和海军兵工厂正从事大规模的战争准备。

① 见本卷第 416—421 页。——编者注

②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帕麦斯顿要找一个合法的借口对美国作战，但是在内阁会议上，他遇到了格莱斯顿和米尔纳·基卜生先生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的极其坚决的反对。支持这位“高贵的子爵”的是他手中的下贱的工具罗素和整个辉格党集团。如果华盛顿政府提供他们所期望的借口，现内阁就会垮台，被一个托利党政府代替。关于这样一个变化的准备步骤，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已经谈妥了。这就是“先驱晨报”和“旗帜报”狂叫战争的由来，这些饿狼正在嚎叫着期待从施赈官手里得到垂涎已久的残羹。

回忆几件事情，便可以看清帕麦斯顿的阴谋。他从利物浦的来电中得知亚当斯先生将于5月13日晚间到达伦敦的消息之后，在5月14日早晨就坚决主张发布承认脱离派为交战一方的文告。他同自己的同僚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派军队3000人去加拿大，这支军队如果要想用来防守1500英里的边界是少得可笑的，但是如果用来鼓舞叛乱和激怒联邦，这却是一个狡猾的手段。他在几个星期以前曾怂恿波拿巴提议对这个“自相残杀的战争”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并且在内阁会议上支持这个计划，只是因为他的同僚反对才未能实行。于是他和波拿巴就去干涉墨西哥，作为一种 *pis aller* (下策)。这一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有二：激起美国人的正当的愤怒，同时造成一个派遣舰队的借口，这支舰队，用“晨报”的话说，随时准备“去执行华盛顿政府的敌对行为迫使我们在北大西洋海上执行的任何任务”。

在这次远征发动的时候，“晨报”同“泰晤士报”一起，加上其他较小的一群帕麦斯顿的报界奴仆都曾表示，这是一个出色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人道的事业，因为这将使蓄奴州同盟受到两面夹

攻：一面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北部，另一面是反对奴隶制度的英、法的军队。但是，这同一家“晨邮报”，这个可笑地混合了詹金斯和罗多芒特于一身，既能奉承又善吹嘘的报纸，在杰弗逊·戴维斯的演说词^①发表以后，在今天这一号上又说了些什么呢？请听听帕麦斯顿的这个宣谕官的话吧：

“我们必须注意这次干涉，它可能是一个在相当时期内无所作为的行动；北部的政府隔得太远了，不可能实际参预这件事情，而南部同盟则相反，它同墨西哥有很长一段地方接壤，因而它对反叛运动的发起者持友好态度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北部的政府一贯嘲骂我们的中立，而南部则以政治家风度与温和态度承认中立是我们对双方所能做的一切。所以无论是从我们在墨西哥的任务来看，或者是从我们与华盛顿政府的关系来看，南部同盟的**友好的自重态度**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

我可以指出，“北方报”——一家俄国报纸，因而也了解帕麦斯顿计划的内情——在12月3日暗示：远征墨西哥的计划自始就不是为了官方宣布的目的，而是为了一个反对美国的战争。

司各脱将军的信²⁵³对舆论甚至对伦敦交易所都发生了这样一种有益的作用，以致使唐宁街和土伊勒里宫的阴谋家们认为有必要把“祖国报”放出笼来，让它装出一副获有来自官方的消息的神气，说什么从“特伦特号”上逮捕南部特使是直接得到华盛顿政府批准的。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7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1年1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67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① 指杰·戴维斯就南部同盟特使被捕一事发表演说，挑拨英国反对美国北部。——译者注

卡·马克思 奴隶制问题的危机

1861年12月10日于伦敦

在美国，整个内战的基本问题即**奴隶制问题**明显地出现了一个转折。弗里芒特将军是由于宣布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是自由人而被免职的^①。在此之后不久，华盛顿政府发布了给南卡罗来纳讨伐军总指挥薛尔曼将军的一道指令，它比弗里芒特的告示还要进一步，连**忠诚**奴隶主的逃亡奴隶都规定收留做雇佣工人，还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武装这些奴隶；同时安慰“忠诚的”奴隶主说，他们将来可以得到一笔补偿。柯克伦上校比弗里芒特更进一步，要求把普遍武装奴隶作为一项必要的战时措施。陆军部长凯麦隆正式声明赞同柯克伦的“意见”。之后，内务部长以政府名义宣布不同意陆军部长的声明。后者在正式的会议上更加坚决地肯定自己的“意见”，并声明他要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弗里芒特在密苏里州的继任者哈勒克将军，以及东弗吉尼亚的迪克斯将军，都把逃亡的黑人赶出军营，禁止他们以后再在他的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内出现。然而就在同时，伍耳将军则在门罗要塞张开双臂收容了黑色“禁运品”²⁵⁴。民主党前领袖、参议员狄金逊和克罗斯威

^① 见本卷第401—403页。——编者注

尔(以前曾是所谓民主党摄政集团²⁵⁵的成员)在公开的信件中声明同意柯克伦及凯麦隆的意见,而堪萨斯州的詹尼森上校则胜过所有他的军界前辈,向部队发表讲话说:

“对于叛乱分子以及同情他们的那些人,不要有任何动摇……我曾对弗里芒特将军说过,如果我认为奴隶制的寿命会比这次战争的时间长,我根本就不会拿起武器。凡是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随时都可以在我们军营中得到保护,我们将保护他们直到最后一个战士和最后一颗子弹。在我的士兵中,我不愿意有一个人不是废奴主义者(I want no men who are not Abolitionists);我这里没有这种人的位置,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奴隶制问题是这次极其残酷的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实质和意义……如果政府不赞成我的行动,它可以把委托给我的职权撤回去,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自己负责(on my own hook)去干,哪怕一开始我只有半打兵士。”

在各边界蓄奴州,特别是在密苏里州,再其次是在肯塔基州以及其他各州,奴隶制问题已经在实际解决中。在这些地方,奴隶正大批外流。例如,从密苏里州就走了约5万奴隶,其中一部分是逃跑,另一部分是被奴隶主运往更远的南部各州。

说也奇怪,任何一家英国报纸都没有谈到一个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事件。11月18日,北卡罗来纳45个郡的代表在哈特腊斯岛开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废除了脱离法,并且声明北卡罗来纳回到联邦的怀抱。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地区的选民,正开会选举代表参加华盛顿国会。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2月10日

载于1861年12月14日“新闻报”
第34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8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

卡·马克思 美国近况

1861年12月13日于伦敦

关于“哈维氏桦树号”的遭遇以及“纳希维耳号”巡洋舰开到南安普顿港²⁵⁶的消息,11月29日就传到了纽约,但看来并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既不像此间某些人士所希冀的那样,也不像反对战争的人所害怕的那样。这一次是一个大浪潮同另一个大浪潮相撞了。原来,恰巧在这个时候,纽约正在十分激动地为即将在12月3日举行的市长选举进行竞选。“泰晤士报”驻华答顿的代表罗素先生,这个由于故作崇英狂而损坏了他那克尔特人的才能的人,装腔作势地耸了耸肩,表示对选举之前的这种忙乱感到惊奇。当然,罗素先生是以此来讨好伦敦小市民,因为这些人总以为纽约市长的选举也像伦敦市长的选举一样,都是过时的无聊事情。大家知道,伦敦市长与大半个伦敦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西蒂区的名义上的执政者,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但却在节庆的日子里烹制可口的甲鱼汤,或者对违反警规的行为胡乱做些判决,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际存在。伦敦市长只有在那些写轻松喜剧和 *faits divers* (社会小新闻)的巴黎作者们的幻想中才是一个国家要人。相反,纽约市长却有实权。在脱离运动初期,当时的市长、臭名远扬的**费南多·伍德**就曾经打算宣布纽约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²⁵⁷,不用说,这是得到

杰弗逊·戴维斯赞同的。他的计划由于共和党积极对抗 Empire City (纽约) 而告吹。

11月27日,美国参议员**查理·萨姆纳**(马萨诸塞州代表),即在堪萨斯战争²⁵⁸时期被一个南方人用棍子毒打而受罪的那个议员,在纽约库伯学院²⁵⁹的一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就奴隶主叛乱的发生及其内因作了出色的报告。在他演说以后,大会做出如下的决议:

“弗里芒特将军所提出的关于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的主张,以及伯恩赛德将军、参议员威尔逊、乔治·班克罗夫特(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柯克伦上校和西蒙·凯麦隆等人(他们都把奴隶制可能被消灭看做是叛乱的原因)随后所做的声明,都表达了道德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必要性。大会认为:北部舆论现在一定会完全同情一切旨在根除这种国家祸害而可能提出的实际计划,一定会把根除这种祸害看做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目下的这一斗争的最彻底的完成。”

“纽约论坛报”评论萨姆纳的演说时也提到:

“萨姆纳先生暗示国会即将就奴隶制问题进行辩论,这就唤起了这样的希望:国会终究会明白南弱北强的真正原因何在,并且采取能够最迅速、最彻底地镇压叛乱的坚决措施。”

在来自**墨西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有如下一段话:

“英国公使装做是胡阿雷斯总统政府热心的朋友……熟悉西班牙阴谋的人都肯定地说,马凯斯将军已接受了一项来自西班牙的任务,要他把教权党的那些已经星散的党羽,既包括墨西哥人,又包括西班牙人,都重新纠集起来。然后,叫这个党立即找一个适当借口去向信奉天主教的女王陛下^①请准为墨西哥立国王。据说这个位置准备让女王的舅舅去坐。他已经年老,随着

^① 伊萨伯拉二世。——编者注

事物的自然进程很快就会退出舞台；而关于指定他的继承者的问题，则将极力避免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因此，墨西哥将能重新归附于西班牙，这样一来，在海地实行的政策同样就会在墨西哥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13 日

载于 1861 年 12 月 17 日“新闻报”第 34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一件诽谤案

1861年12月19日于伦敦

大家知道,古埃及人曾经达到高度分工,虽然这只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而不是就个别作坊而言。在他们那里,身体上几乎每一部分都有专门医生来管,医生的业务照法律规定只限于这一个方面。偷窃是一种由官方承认的人来统率的特殊职业。然而,同现代英国的分工比较起来,古埃及的分工是多么不足道呵!伦敦某些行业的奇怪性质和这些行业的等级组织一样,都使我们感到惊讶。

这种奇怪的行业之一就是密探。密探首先分为两大部门——民事密探和政治密探。这里我们把后者完全抛开不谈。至于民事密探,它本身又分成两大类——官方密探和私人密探。

官方密探有的是由 detectives (侦探)担任,由国家或市政当局付酬,有的是由自寻方便进行刺探活动的 common informers (普通密告者)担任,由警察局付给 jobwork (计件)报酬。

私人密探则五花八门,但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的对象是非商业性质的私人关系,另一类则是商业性质的私人关系。在第一类中,最多的是跟踪侦察姘居关系;在这一类中享有全欧盛名的是菲尔德先生的研究所。关于商业密探的职能,可以从下述事件中得到一个比较近似的概念。

本星期二, Court of Exchequer²⁶⁰ 审理了一件诽谤案, 被告是当地的一家周刊“劳埃德氏新闻周刊”²⁶¹, 原告是斯塔布斯公司。事情是这样的: 斯塔布斯公司出版一个名叫“斯塔布斯氏报”的周报, 是斯塔布斯主持的“商业保护协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是秘密分别送到订户手里的, 订户每年缴 3 个基尼; 它不在 stationers (书商) 的书摊上、街头和铁路上等等地方零售, 这是与其他报纸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份宣告哪些债务人业已破产(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层)的罪犯名单。斯塔布斯所主持的“商业保护协会”侦察出已无支付能力的人, 然后“斯塔布斯氏报”就白纸黑字把他们的姓名登记下来。报纸的订户已达两万户。

“劳埃德氏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 其中有一段说: “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除掉这个可耻的密探机关”。于是斯塔布斯就要求法院对这种诽谤予以惩处。

在原告律师施博士以他那爱尔兰人的辩才讲了一大套话以后, 原告斯塔布斯就不得不经受“劳埃德氏周刊”的辩护人巴兰坦博士的 cross examination (这实际上是证人在被反问时受到的交叉火力)。于是出现了如下一段幽默的对话。

巴兰坦: 您是否要求您的订户提供情报?

斯塔布斯: 我请订户把他们认为是骗子的那些人的名字告诉我。然后我们就调查这些事情。我自己并不去调查。我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都有代理人。在伦敦我有十来个拿年薪的代理人。

巴兰坦: 这些先生们弄情报的收入有多少?

斯塔布斯: 150 到 200 英镑。

巴兰坦: 此外是否还给做新衣服? 如果这些报酬优厚的先生们有人抓住骗子, 那就怎么样? ——我们就公布他的名字。

巴兰坦： 是否只有当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的时候才这样做？——是的。——但如果他并不完全是一个骗子呢？——那我们就把他列入我们的登记簿。——这是在他完全表明自己是骗子以前，在此之后你们就要公布他的名字吧？——是的。——您是否公布骗子的自署？——是的。——这样一来，您为了商业的利益花费更多了。您是否公布骗子的像片？——是的。——您没有出钱雇用一個秘密的警察局吗？您同菲尔德先生有联系吗？——我很高兴我能够说：没有！——那末，您同他的区别究竟何在呢？——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您所说的“合法代理人”是指什么人而说的？——这同索债有关。我所说的这些人指的是 sollicitors (这是一种地位介乎辩护律师和法警之间的人)，他们按规定条件办理订户们的事务。——那末，您是否也是一个索债人呢？——我是通过 700 个 sollicitors 索债的。——天啊，您竟然出钱养活 700 个 sollicitors，那还得了！但请您说说，是您养活 sollicitors 呢，还是 sollicitors 养活您呢？——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您是否曾经提出过其他诉讼？——是的，约有六七次。——您曾否使这些诉讼得到判决？——是的。——曾否做出有利于您的判决？——只有一次。——贵报有一个“住址征询”栏，下面附有一大张人名单，是什么意思？——这是躲避起来的债务人，他们的住址无论我们或是订户都不能发现。——您的事业是怎样组织的？——我们的中央事务局设在伦敦，而分支机构则分别设在北明翰、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都柏林。这个事业是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最初在曼彻斯特从事这个事业。

接着，辩护律师巴兰坦在发言中无情地攻击了斯塔布斯，“这个人在作口供时那种可笑的、自鸣得意的态度至少证明他像一个

粪中的苍蝇，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事是怎样肮脏”。英国商业既然需要这样一些保护者，那就难怪它要大大衰落。这种卑鄙的密探活动使斯塔布斯掌握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去进行金钱勒索等等勾当。

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 Lord Chief Baron (高等控诉院院长) 在他的结论中是站在辩护人一方。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陪审员在很多方面仰仗报刊自由，但陪审员并不是因为报刊自由才享有独立性，相反，是因为陪审员享有独立性报刊才有自由。大家应该衡量一下，被指控的那篇文章是否越出正当批评的界限。斯塔布斯是有社会职务的人，因此应当受到批评。如果大家认为‘劳埃德氏周刊’越出了正当批评的界限，那大家就应该判给原告适度的赔偿！”

陪审员们离庭到自己的议事室。经过 15 分钟的讨论以后，他们又出现在法庭上，并做出判决：原告斯塔布斯有理，他名誉受到侮辱，应判给他 1 法寻的赔偿费。法寻是英国最小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法国的生丁和德国的分尼。斯塔布斯在许多听众的震耳大笑声中和他的几个崇拜者的护送之下离开了伦敦市政厅，听众们硬围住他欢呼，最后只有逃跑才使他那小小的身子脱难。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1 年 12 月 24 日“新闻报”第 353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

在英法土俄战争^①这样一个充满意外事件的战争里，最令人惊异的意外事件之一无疑就是 1856 年春天在巴黎通过的海上法宣言²⁶²。在对俄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并没有对俄国使用它的最可怕的武器，即没收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物资和实行私掠。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就砸了这个武器，把碎片献到和平的祭坛上去了。名义上是战胜一方的俄国，得到了它自叶卡特林娜二世以来历次用“武装中立”²⁶³、战争和外交阴谋的办法一直未能到手的让步。反之，英国这个虚假的战胜一方却放弃了它的海上实力所产生的、在一百五十年当中它用武力对着全世界来维持的强大的攻防手段。

在通过 1856 年宣言时作为借口的人道理由是经不起最肤浅的考察的。私掠一点也不比陆战中的志愿队或游击队的行动野蛮。私掠船就是海上的游击队。属于交战国私人的财产，在陆战时也是没收的。举例来说，战时征用难道只触及敌方的国库，而不同时触及敌方私人的财产吗？陆战的性质使战争威胁不到在中立国领土上的即处于中立国主权之下的敌方财产。海战的性质则排除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了这种界限,因为作为各国共有的大道的海洋是不能处于任何中立国主权之下的。

事实上,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它原则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它为贸易挡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此外,不言而喻,1856年宣言的人道借口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和神圣同盟的宗教借口完全一样。

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事实:在巴黎会议上签字放弃了英国海上权利的**克拉伦登勋爵**,正如他以后在上院所承认的,事先并没有让女王知道,也没有相应的权力。他的全部权力就是帕麦斯顿写的一封**私人信件**。直到现在,帕麦斯顿还不敢要求英国议会批准巴黎宣言和克拉伦登在宣言上的签署。除了关于宣言实质的辩论以外,令人担心的还有关于宪法问题的辩论——一个英国大臣是否可以不管女王和议会,僭越权力,大笔一挥而送掉英国海上霸权的历史悠久的基础。如果说,内阁的这一 *coup d'état*^①并没有引起激烈的质询,而是作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被默然地接受下来,那末,帕麦斯顿应当把这一点归功于曼彻斯特学派²⁶⁴的影响。曼彻斯特学派知道,这个新玩意符合它所代表的利益,因而也合乎慈善、文明与进步,因为这样一来,英国的商人就可以乘坐中立国船只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与敌方做买卖,而让陆海军兵士们去为国家的荣誉而撕杀了。曼彻斯特派看到一位大臣用不合宪法的方式使英国做出了用合乎宪法的议会方式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国际让

① 直译是:政变;这里是:改革。——编者注

步而欢欣若狂。因此，英国的曼彻斯特派现在才非常恼恨西华德提交华盛顿国会的蓝皮书中所做的揭露。

如所周知，美国是拒绝加入 1856 年巴黎宣言的唯一大国。如果美国放弃了私掠，他们就不得不创建一支大规模的国家海军。它的海上兵力的任何削弱同时就使它面临着建立一支相当于欧洲规模的常备陆军的威胁。虽然如此，布坎南总统仍然表示：如果对于船上的一切财产，除战时禁运品以外，无论是敌国的或中立国的，都同样保证其不受侵犯，那他就准备接受巴黎宣言。他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从西华德的蓝皮书看来，林肯在就任总统之后曾立即向英法声明，从巴黎宣言废止私掠这一点来说，美国是同意加入巴黎宣言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禁止私掠将同样适用于美国被叛乱分子割据的部分即南部同盟。他的这一建议所得到的答复实际上就是南部同盟被承认为交战的一方²⁶⁵。

“人道、进步和文明”向圣詹姆斯和土伊勒里的内阁暗示，禁止私掠会大大减少脱离派成功的机会，即分裂美国的机会。因此，他们才急忙承认同盟为交战的一方，以便在此以后回答华盛顿政府：英国和法国自然不能够承认以交战一方的提议作为交战另一方必须遵守的法律。英法与美国政府之间自内战爆发以来的一切外交谈判都贯穿着这种“高尚的诚实”；如果不发生“圣贾辛托号”在巴哈马海峡截留“特伦特号”的事情，也会有别的事件被利用来为帕麦斯顿勋爵所要的冲突提供借口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20 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载于 1861 年 12 月 25 日“新闻报”
第 354 号

卡·马克思 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1861年12月25日于伦敦

大陆上的政治家，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因而他们目前就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错误的结论。“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初，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相反的，伦敦的报刊却显得特别审慎，甚至“泰晤士报”也怀疑究竟是否存在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这种现象应当怎样解释呢？是因为帕麦斯顿对于王室法官们是否能找出合法的战争借口没有把握。情况是这样：在“拉普拉塔号”到达南安普顿之前一个半星期，南部同盟的代理人已经从利物浦向英国政府密告美国巡洋舰企图从英国港口驶出在公海上捕捉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等人，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加以干涉。政府根据王室法官的意见拒绝了 this 请求。因此，伦敦报界起初的时候才唱着平静温和的调子，与人民不耐烦的主战情绪适成对比。可是，一当王室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他们两人都是内阁阁员——发掘出一个向美国闹事的**技术性的**借口的时候，人民和报刊的态度就倒过来了。战争狂热在报刊上不断增强，而在人民中则不断减退。现在，对美战争在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民中——除了和棉花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土贵族以外——是不得人心的，而报刊上的好战叫嚣则震耳欲聋。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伦敦的报刊吧。这里为首的是“泰晤士报”，它的主编是**鲍勃·娄**，此人一度在澳大利亚活动，煽动澳大利亚脱离英国；他是英国内阁的一个二等阁员，即教育大臣之流，不过是帕麦斯顿的一个走卒。“笨拙”²⁶⁶是“泰晤士报”的宫廷弄臣，负责把“泰晤士报”的 *sesquipedalia verba* (威严的话) 变成浅薄无聊的俏皮话和低级趣味的讽刺画。它的主编之一由帕麦斯顿在 Board of Health (卫生部) 里安插了一个位置，年薪 1000 英镑。

“晨邮报”一部分是帕麦斯顿的私产。这个奇特的报纸的另一部分卖给了法国大使馆。剩下的部分则属于《*haute volée*》(“上流社会”)，给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提供最细致的消息。因此，“晨邮报”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报界的**詹金斯**(一个通常用来指奴才的典型)。

“晨报”是《*licensed victuallers*》即被特许既卖啤酒也卖烧酒的小店主的共有财产。此外，它还是英国国教的**虔诚派教徒**以及 *sporting characters* 即那些靠赛马、赌博、拳斗等等赚大钱的人们的报纸。这家报纸的编辑**格兰特**先生一度受雇于各报馆做速记员，没有什么写作修养，但却有过参加帕麦斯顿的私人宴会的荣幸。从那时起，他就对这位《*truly English minister*》(真正英国大臣)²⁶⁷、对俄战争^①之初曾经被他斥为“俄国奸细”的人满怀热诚。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家酒店报的虔诚的保护人的最高指挥者是舍夫茨别利伯爵，而舍夫茨别利则是帕麦斯顿的女婿。舍夫茨别利是那些一心想把圣灵掺和到诚实的“晨报”的罪恶酒精^②中去的 *low church men*²⁶⁸ 的教皇。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② 双关语：原文《*Spiritus*》有“酒精”和“神灵”两个意思。——编者注

“纪事晨报”!Quantum mutatus ab illo!(他变化多么大呀!)^①这家辉格党的大报曾经相当成功地同“泰晤士报”竞争了几达半世纪之久。但是在辉格党的战争²⁶⁹之后,它的星就沉落了。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形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penny paper²⁷⁰,以“惊人消息”为生,例如为毒药杀人犯帕麦尔辩护。后来,它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大使馆,但后者不久就懊悔白花了钱。于是它又投身于反波拿巴主义,但仍然没有什么成绩。最后,它才找到了它期待已久的买主——南部同盟在伦敦的代理人杨西和曼。

“每日电讯”是一个名叫勒维的人的私产。他的这个报纸甚至伦敦报界都斥之为帕麦斯顿的 mob paper (打手报)。除开这个职能之外,这家报纸还专登 chronique scandaleuse (丑闻)。很能表现这个“电讯”特性的是,当“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它按照上面的命令宣称**战争是不可能的**。它勉强担任这个充满自重和自制精神的角色,感到很不习惯,所以在那以后曾刊登了半打文章来谈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自重和自制精神。而变换方向的命令一到,它就努力来补偿自己前此所受的约束,用狂叫战争的声音来压倒它的所有同行。

“地球报”²⁷¹是政府的晚报,它从所有辉格党阁员那里得到官方的津贴。

托利党的“先驱晨报”和“旗帜晚报”属于同一个老板,它们的立场受着两个动机的支配:一个是对于“**背叛英国的殖民地**”的传统仇恨,另一个是钱袋的长期空虚。它们知道,同美国作战一定会使现在的联合内阁垮台,为托利党内阁铺平道路;而托利党内阁一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成立,对“先驱报”和“旗帜报”的官方津贴也将随之而恢复。因此,这些报纸才比看到小动物的饿狼叫得还凶,因为它们预见到随着对美战争而来的还有大量金钱!

在其余的伦敦的日报当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每日新闻”和“晨星报”,这两家报纸都反对战争鼓吹者。“每日新闻”因为与约翰·罗素勋爵有联系而行动受限制;“晨星报”(布莱特与科布顿的报纸)的影响则由于它享有“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平的报纸”的声名而减弱。

伦敦的周刊大多数仅仅是日报的回声,所以绝大部分都主张战争。“观察家报”²⁷²是靠政府生活的。“星期六评论”极力追求 esprit (机智),以为自己十分无耻地讥笑一下“人道”偏见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本领。为了显示《esprit》,为这家报纸撰稿的被收买的律师、牧师和学校教师们从美国内战爆发以来就站在奴隶主方面冷笑不已。自然,这些人随后就跟着“泰晤士报”吹起了战争的号角。他们已经在草拟对美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旁观者”、“观察家”、特别是“麦克米伦杂志”²⁷³,则应该多少作为可敬的例外提出来。

由此可见,整个说来,伦敦的报刊——地方报纸除棉织业巨头的报纸以外则同伦敦报刊形成一个可嘉的对照——无非就是帕麦斯顿加帕麦斯顿。帕麦斯顿要战争,英国人民不要战争。不久将来的事变就会表明,在这一场决斗中谁是胜利者,是帕麦斯顿还是人民。归根到底,帕麦斯顿是在赌一场比 1859 年初路易·波拿巴所赌的²⁷⁴更为危险的赌博。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2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1 年 12 月 31 日“新闻报”
第 359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法国的新闻敲诈。—— 战争的经济后果

1861年12月31日于伦敦

看来,对于奇迹的信仰从一个领域中消失只不过为了去另一个领域存身罢了。它被赶出了自然界以后,就在政治中复活起来。至少巴黎报纸及其在电讯社和新闻社中的同道是这样看。例如,昨天巴黎的晚报都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莱昂斯勋爵已经向西华德先生声明,他将等待到12月20日晚,如果那时华盛顿政府拒绝交出被扣押的人,他就要返回伦敦。所以,巴黎的报纸是昨天就已经知道了莱昂斯勋爵在接到“欧罗巴号”带给他的公文以后所采取的步骤了。但是,直到今天,欧洲方面还没有得到“欧罗巴号”抵达纽约的消息。“祖国报”及其同伙在得到“欧罗巴号”抵达美国的消息以前,就向欧洲报告了“欧罗巴号”到达美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显然,“祖国报”及其同伙认为,神速并非妖法。此间一家报纸在一篇谈证券交易的文章中指出,巴黎方面的这些臆造和某些英国报纸的煽动性文章完全一样,不仅是帮助某些当权人物进行政治投机,而且同样也是帮助某些个人进行交易所投机。

一直是主战派的一个最响亮喉舌的“经济学家”杂志,在最近一期上却发表了一个利物浦商人的来信和一篇社论,警告英国公众不要低估对美战争的危险后果。英国1861年输入了总值为

15380901 英镑的谷物；其中美国的谷物几达 600 万英镑。英国如果不能再买美国谷物，要比美国不能出售谷物受损更大。其次，美国有消息更快的优越条件。如果它决定战争，电报立即就从华盛顿飞传旧金山，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海上的舰只就可以在把战争爆发的消息送到印度之前好几个星期开始战争行动。

自内战爆发以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都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就仍然做着的这方面的贸易而言，购买货物主要是用英国的信用证券，就是说，用英国的资本。反之，英国同印度、中国、澳大利亚一向达到很大数量的贸易，在对美贸易中断以后有了更大的增长。因此，美国的私掠船就会有广大的活动范围，而英国的私掠船的活动范围则较小。英国在美国的投资超过英国棉纺织工业中的全部投资，而美国在英国的投资则等于零。英国的海军力量比美国大，但是远远达不到 1812—1814 年战争期间那种程度。

如果在那个时期美国的私掠船就已经显出它们大大胜过英国，那末现在该怎样呢？对北美各港口实行有效的封锁是根本谈不到的，特别是在冬季。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内陆水道上一——在这里的优势对于在加拿大的陆战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在战争行动展开时是握有绝对的控制权的。

总之，这位利物浦商人达到了如下的结论：

“在英国谁都不敢仅仅为了棉花就冒险主战。对我们来说，由国家出钱把全部棉纺织区养三年，也比为这些地区而同美国打一年仗来得合算。”

*Ceterum censeo*²⁷⁵，“特伦特号”事件不会引起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 1861 年 12 月 3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1 月 4 日“新闻报”第 4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

1862年1月1日于伦敦

英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国内许多地方召开的人数众多的大会都坚决主张通过**仲裁**来解决英美冲突。具有这种内容的备忘录像潮水一样涌向内阁的首脑，无党派的地方报纸则几乎一致地反对伦敦报刊的战争叫嚣。

下面所写的，是上星期一在**布莱顿**举行的一次大会的详细报道。这次大会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是由工人阶级发起而召开的，而两位主要发言人**肯宁格姆**先生和**怀特**先生则是有影响的议员，他们两人在议院中是坐在**政府**一边的。

伍德先生(工人)提出第一个动议：

“英美目前发生冲突，其原因在于对国际法所做的不正确解释，而不是由于对英国国旗的故意侮辱；因此大会主张把整个争论问题交由一个中立国仲裁解决；在目前情况下，同美国作战是没有理由的，相反地只能引起英国人民的谴责。”

另外，伍德先生还论证这项动议说：

“据说，这一次新的侮辱只是美国对英国的一连串侮辱的最近的一环。就假定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拔剑磨刀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美国还是统一而强大的时候，我们就默默地容忍它的侮辱；而在它处于危难之中的现在，我们就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局面来报复这种侮辱了。这样一种做法难道不使

我们在文明世界的面前丢脸，显出我们是可怜的懦夫吗？”

肯宁格姆先生说：

“……现在，在联邦内部，正在发展着明显的**解放政策**（掌声），所以我坚决希望：不许英国政府对它进行任何干涉（掌声）……难道你们，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愿意让自己卷入一场反共和的战争吗？要知道，这正是‘泰晤士报’及其支持者的意图……我向最需要保持和平的英国工人们呼吁，吁请他们发出更高的呼声，并且在必要时还动手来阻止这桩极大的罪行（掌声如雷）……‘泰晤士报’一直在用各种办法在国内激起战争狂热，在美国人当中用侮辱和诽谤酿成敌对情绪……我并不属于所谓主和派。‘泰晤士报’是鼓励俄国的政策的，它曾经（在 1853 年）用全力企图使我国对俄国野蛮人在东方的军事掠夺抱静观态度。我曾经和别的人一起反对了这种错误的政策。当旨在引渡政治流亡者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提到议会来的时候，‘泰晤士报’曾经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以促使下院通过这一法案。当时我同其他 99 位议员一起，反对了这种对英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侵犯，打倒了这位阁员。（掌声）现在这位阁员是内阁的首脑。我向他预告：如果他想把我国卷入一场对美国的战争而没有真正的、充分的理由，他的计划必将可耻地失败。我相信，他一定会遭到一个新的可耻的失败，一个比取缔阴谋活动法案那时候更惨重的失败（掌声如雷）……我不知道送往华盛顿的正式公文的内容；但是，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意见来看，王室法官们是建议政府采取一种狭隘的法律观点，即认为，对于南部的特使，如果不扣押他们所乘的船只，就不能逮捕他们。根据这一点，提出了把斯莱德耳和梅森交出来的要求，作为 *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

现在假定：大西洋彼岸的人民不让他们的政府把这两个人交出来。难道你们就为了援救这两个奴隶主的使者而让自己卷入战争吗？……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个反共和的主战派。回忆一下上次对俄国的战争吧。从彼得堡发表的秘密信件看来，1853 年在‘泰晤士报’上刊登的那些文章是一个能够看到秘密的俄国国室文书和文件的人写的，这一点完全没有疑问。当时，累亚德先生曾在下院宣读了这些文章中一些最惊人的地方，‘泰晤士报’十分惊惶，马上改变调子，第二天早晨就吹起战争的号角……‘泰晤士报’三番五次地抨击拿破仑皇帝，并且支持我国政府关于举办无限制借款来建造陆上要塞与浮

动炮台的要求。‘泰晤士报’在做了这样的事，发出了这种反对法国的大声警告之后，现在是不是想使我国卷入一场横越大西洋的战争，从而把我们的海岸线没有防备地暴露在法国皇帝的威胁之下呢……人们有理由担心，目前的大事备战并不仅仅是由于‘特伦特号’事件，而且是为了给政府将来承认各蓄奴州做准备。如果英国这样做，那末，它将使自己蒙上永远洗不掉的耻辱。”

怀特先生说：

“应该指出，工人阶级是这次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这次大会的一切费用都是由工人的委员会负担的……现政府从来不很好地讲求用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人民……我一刻也不曾相信有由‘特伦特号’事件发展成为战争的极微小的可能性。我曾经当着不止一个政府人员的面讲过：没有一个政府的成员相信‘特伦特号’事件可能引起战争。那末，为什么还有这些大力的准备呢？我相信，英国和法国已经协议于明春承认南部各州的独立。到那时候，大不列颠在美国领海上将集结一支强大的舰队。加拿大将充分准备好进行防御。如果北部各州那时想把对南部各州的承认作为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大不列颠那时将有准备进行战争……”

这个发言人接着就阐述了对美国进行战争的危险，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对哈弗洛克将军之死所表示的同情和在失利的白河战役^①中美国海军给予英舰的援助，等等。最后他宣称，美国内战必将以废除奴隶制度而结束，因此英国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北部。

大会一致通过原来的动议以后，就提出一份致帕麦斯顿的备忘录，经过讨论后通过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1 月 5 日“新闻报”
第 5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① 见本卷第 9 页译者注③。——译者注

卡·马克思 英国的舆论

1862年1月11日于伦敦

“特伦特号”事件和平解决²⁷⁶的消息受到了广大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种情况确凿地证明了前此所担心的战争不得人心，证明了对战争后果的恐惧。美国永远不应忘记：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到终了，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由于他们进行了干预，所以尽管被收买的、不负责任的报界天天进行恶毒的煽动，但在这和平处于千钧一发的整个时期内，没有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能在联合王国召开成功。唯一的一次主张战争的集会是在“拉普拉塔号”抵达之后在利物浦交易所棉业交易厅中举行的，它是一个完全由棉花掮客自拉自唱的屋角会议。即使是在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因而使个别要召开主战集会的人差不多在稍微有所打算的时候就马上放弃了自己的企图。

在英格兰、苏格兰或爱尔兰，无论什么地方召开群众集会，一律都是抗议报界的战争叫嚣和政府的邪恶阴谋，主张和平解决争端。最近有两次集会最能说明这种情况，一次是在伦敦的帕丁顿，另一次是在太恩河畔新堡。前一个集会热烈赞成华盛顿·威尔克斯先生的论点，即英国没有理由就南部特使被捕一事找岔子；新堡

的集会则差不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说：第一，美国人的罪过仅仅在于**合法地**行使了搜查与拘捕的权利；第二，“特伦特号”的舰长应当因破坏女王所宣告的英国的中立而受惩处。

在通常的情况下，英国工人的做法怎样，是可以从全世界人民群众对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民政府应抱的自然的同情态度上测知的。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都因南部被封锁而直接地、严重地受着苦难；另一部分，则由于对美贸易的削减而间接地遭受打击，人们还告诉他们这种削减是共和党人自私自利的“保护关税政策”造成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民主派周刊“雷诺新闻”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杨西先生和曼先生，每周都使尽它那恶臭的语言呼吁工人阶级为着自身的利益敦促政府对美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出于公正，也必须赞扬英国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尤其是把官方的和富裕的约翰牛的伪善、威逼、怯懦和愚蠢的行为拿来和这种立场作比较的时候。

人民群众现在的这种立场同他们在英俄冲突^①时所采取的立场是多么不同呵！那时，“泰晤士报”、“邮报”以及伦敦报界的其他黄裤奴都哭哭啼啼地要求和平，而它们碰到的却是遍及全国的许多大规模主战集会的斥责。现在它们嗥叫着要求战争，而回答它们的却是纷纷集会主张和平，谴责政府阴谋扼杀自由，谴责政府同情奴隶制度。这些舆论界的占星官在听到“特伦特号”事件和平解决时所露出的尴尬相实在是令人发笑的。

首先，它们必须庆贺自己在整整一个月当中每天都表现了庄重、理智、善意与温和。在“拉普拉塔号”到达之后的头两天，当帕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麦斯顿忧虑是否能发掘出一个兴起争端的法律借口的时候，它们曾经是温和的。但是，一旦王室法官们拼凑出了一个法律上的诡辩，它们就发出了自反雅各宾战争以来都未曾有过的叫嚷。英国政府的公文是在十二月初自昆兹敦城发出的，在一月初以前不可能指望得到华盛顿的正式复文。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新的事件都有利于美国。大西洋彼岸的报界的语调是平静的，虽然“纳希维耳号”事件²⁷⁷本来可能激起它的愤怒。业已肯定的一切事实，都说明威尔克斯舰长当时的行动是自作主张而采取的。华盛顿政府的处境很为难。如果拒绝英国的要求，就会使内战因外战而复杂化；如果让步，就会损害自己在国内的声望，显出自己是在外来的压力面前退让。这个政府处在这样困难的境地，同时，它又进行着一个凡不是公开的恶棍都不能不热烈同情的战争。

因此，从一般的审慎和通常的郑重来说，伦敦报界至少应该在英国提出要求到美国予以答复的这一段期间内努力克制自己，凡是能够激起愤怒、滋长敌意、使问题复杂化的话一概不说。然而不然！这个被报刊鉴定家威廉·科贝特称为“不可自制地卑鄙与下流的”报界，竟然夸赞自己曾经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怯于美国的团结，卑屈地忍受了历届维护奴隶制度的政府的历次的轻蔑和侮辱；而现在，它们就怀着懦夫的狂喜心情，急切地要在为内战所困扰的共和党政府身上进行报复了。像这样自供卑劣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

黄裤奴之一，帕麦斯顿私人的 *Moniteur*（机关报）“晨邮报”现在看到，它在美国报纸上被控告犯下了一桩最卑劣的罪行。根据控制着报刊的政治寡头们的通知，有一个消息一直小心地没有向约翰牛报道，这就是西华德先生不等罗素的公文到达就发表声明，

否认华盛顿政府在威尔克斯舰长的举动中有任何参预。西华德先生的公文是12月19日到达伦敦的。12月20日,关于这一“秘密”的传言即在交易所传开。21日,黄裤奴“晨邮报”出来郑重声明:“所说的这件公文同我国邮船受辱一事毫无关系。”

在“每日新闻”、“晨星报”和其他伦敦报纸上,你可以看到相当尖锐地抨击黄裤奴的言论,但是你从这些报纸上却无法知道外界的人说些什么。外界的人说:“晨邮报”和“泰晤士报”像法国的“祖国报”和“国家报”一样,它们愚弄读者不仅是为了要在政治方面把他们引入迷途,而且也是为了要在交易所中把他们的钱搜刮上去交给自己的主子。

厚颜无耻的“泰晤士报”虽然清楚地知道它在这整个危机时期只不过使自己丢尽了脸,并且又一次证明了它自命能影响真正的英国人民纯属虚妄,但是今天却又玩弄了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在伦敦这里只能使人禁不住发笑,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可能被理解得不对。伦敦的“黎民百姓”,即黄裤奴所称呼的“暴民”,已经极其明确地表示——甚至已在报纸上透露——要用过去海瑙在巴克莱造酒厂所遇到的示威来接待梅森(顺便说一句,梅森还是帕麦斯顿的远亲,因为他的一位先人与威·坦普尔爵士的女儿结婚)、斯莱德耳一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娱乐。“泰晤士报”一想到会发生这样一件怕人的事就感到恐惧。它怎样试图来防止这件事呢?它劝告英国人民不要用任何公众欢迎仪式来麻烦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泰晤士报”知道,它今天的这篇文章将成为伦敦所有酒店中的笑料。但是不要紧!大西洋彼岸的人们或许会想,“泰晤士报”宽大为怀,使他们不致因梅森、斯莱德耳一行受到公众欢迎而难堪,而事实上“泰晤士报”只是想使这些先生

们不致受公众的侮辱而已！

在“特伦特号”事件悬而未决的时候，“泰晤士报”、“邮报”、“先驱报”、“经济学家”、“星期六评论”，总之是伦敦整个时髦的卖身投靠的报界，都曾竭尽全力要约翰牛相信，华盛顿政府即使愿意也不能维持和平，因为北部的暴民不会让它这样做，而联邦政府是一个暴民政府。现在事实本身就驳斥了这些先生们。那末，这些先生们是否要为自己恶意诽谤美国人民来赎罪呢？至少他们是否承认自己的错误——黄裤奴在大胆评论自由人民的行动时不能不犯的错误呢？根本没有！他们现在异口同声地说，美国政府没有预先做到英国要求的事情，没有在捕获南部叛国分子后马上就他们交出来，因而错过了和解的好机会，这样就使它现在所做的让步失去了任何价值。说得太对了，黄裤奴！西华德先生在英国的要求到达之前就已经宣布不同意威尔克斯的行动，并且立即声明愿意走和解的道路；而你们在与此类似的情况下是怎样做的呢？当“利奥波德号”借口强征美国船只上的英籍船员服兵役——这个借口根本不符合海上交战国权利的规定，它是对一切国际法的明目张胆的、凶恶粗暴的违犯——，炮击“切萨皮克号”，打死船员6人，打伤21人，并捕去“切萨皮克号”上被诬指为英籍的人的时候，英国政府是怎样做的呢？这次非法暴行发生在1807年6月20日。而真正的赔偿、交还船员等等，则在1812年11月8日即5年之后才有所提议。不错，英国政府曾经即时声明自己与舰队司令贝克莱的行动无关，像西华德先生声明与威尔克斯舰长的行动无关一样；但是，为了惩处这位舰队司令，英国政府却把他从一个较低职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上去了。

英国在颁布枢密院敕令时曾明白地承认：这些敕令是侵犯中

立国权利特别是侵犯美国权利的,但是它不得不实行这些法律作为对拿破仑实行报复的措施;一旦拿破仑取消了他侵犯中立国权利的措施,英国也将欣然取消这些敕令。拿破仑在1810年春取消了涉及美国的这些措施,而英国则继续坚持自己直认不讳的对美国海上权利的侵犯。这种情况从1806年持续到1812年6月23日,即到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国宣战之后才告结束。由此可见,在6年当中,在这件事情上,英国还不是拒绝对公开侵犯别国权利予以赔偿,而是拒绝停止这种侵犯。而这些人今天竟然还谈论美国政府错过了什么好机会!不论错还是对,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还被捕者的方式来支持一个以虚假的技术性过失和单纯的手续错误为依据的指控,对英国政府来说都是一种怯懦行为。美国政府也许会认为需要答应这种要求;但是它没有任何理由要先一步做到这些。

“特伦特号”的冲突现在虽然这样解决了,但潜伏在这整个争端下面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再发生的问题,即一个海上强国作为交战国家对中立国家的权利问题,并没有因而得到解决。如果你们允许,我将在此后的一篇通讯中阐明这个问题。现在只请让我补充一点。在我看来,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为联邦政府帮了很大的忙。在英国本来有一个很有势力的主战派,这个主战派或者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或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心希望发生同美国的战争。“特伦特号”事件使这一派受到了考验。它没有经得起这个考验。战争的狂热在一个小问题上没有得到满足,气已经泄尽;寡头政治的疯狂叫嚣引起了英国民主派的疑虑;同美国有联系的英国各大集团表示了反对;工人阶级明白了美国内战的真实性质;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帕麦斯顿不受议会监督而独断统治的危险

时期正迅速告终。这个时期曾是英国可能冒险而为奴隶主进行战争的唯一时机。现在这一点已经谈不上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2 年 2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649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

1862年1月14日于伦敦

业已平息的“特伦特号”事件死后又复活了，但是这一回不是作为英国与美国之间而是作为英国人民与英国政府之间的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而复活的。这个新的 *casus belli* 将在下月开会的议会中审议。诸位无疑已经注意到“每日新闻”和“星报”就隐匿和否认西华德 11 月 30 日的和平公文一事对“晨邮报”的论战了。这封公文是在 12 月 19 日由美国公使亚当斯先生向约翰·罗素勋爵宣读的。现在，请允许我追述一下这件事情。由于“晨邮报”保证西华德的公文与“特伦特号”事件毫无关系，交易所证券便开始下跌，成百万英镑的财产转手，有的受损，有的得利。因此，西华德 11 月 30 日的公文一发表就露底的“晨邮报”的纯属无稽的半官方谎言，便在商业界和工业界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

1 月 8 日下午，事件和平解决的消息到达伦敦。当晚，“晚星报”（“晨星报”的晚刊）就隐匿西华德 11 月 30 日的公文一事质问政府。次日晨，即 1 月 9 日，“晨邮报”作了下面的答复：

“人们会问，既然亚当斯先生在 12 月就已经收到了西华德先生的公文，为什么以前就一点也没有听说呢？原因很简单。亚当斯先生收到的这封公文没有被转交给 (not communicated) 我们的政府。”

同一天晚间，“星报”指斥“邮报”完全说谎，它宣称“邮报”的“解释”是一种可怜的遁词。那封公文确实没有由亚当斯先生“转交”给帕麦斯顿勋爵和罗素勋爵，而是当面“宣读”的。

1月11日星期六晨，“每日新闻”参加了论战，它根据“晨报”12月21日的文章证明：“晨邮报”和政府当时对于西华德的公文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它们还故意歪曲了它的内容。政府这时就准备退却了。1月11日晚，半官方的“地球报”宣称，亚当斯先生确实曾于12月19日将西华德的公文转交政府，但在这封公文里“并没有华盛顿政府的任何建议”，同样也根本没有“对侮辱我们国旗一事坦白道歉”。这种不好意思地承认了英国人民被有意欺哄了三星期之久的做法，只能给火上加油。大不列颠工业区所有的报纸都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呼声，昨天的托利党报纸也响应起来。请大家注意，这整个问题不是由政客们而是由实业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今天的“晨星报”评论这个问题说：

“毫无疑问，约翰·罗素勋爵要负一份隐瞒真相的责任；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更正‘晨邮报’的欺骗性的报道。但是，12月21日那篇如此公然歪曲真相并带来巨大害处的文章仍然不可能是由他授意而写成的。能够做这件事的只有一个人，只有那位曾经制造了阿富汗战争的大臣才能够把西华德的和平公文隐瞒起来。下院的愚蠢的宽大曾经宽恕了他的一次罪行。难道议会和人民不要联合起来惩办他的新罪行吗？”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月14日
载于1862年1月18日“新闻报”
第1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铁路统计资料

英国铁路与 30 岁的人一样年纪。除国债外,没有一个国民经济部门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获得过这样巨大的发展。据不久以前公布的蓝皮书统计,截至 1860 年止,投入铁路的资本为 348130127 英镑;其中 190791067 英镑来自普通股,67873840 英镑来自优先股,7576878 英镑靠借债,81888546 英镑则靠活期贷款。全部资本约为国债总额的一半,比大不列颠所有不动产的年收入多 4 倍。这种暴发户式的财富,现代工业的巨大产物,雌雄同体的经济怪物(它的脚像树根一样地扎在土地里面,而头却靠交易所养活),乃是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劲敌,资产阶级的又一支辅助部队。

1860 年铁路全长为 22000 英里,包括复线及会让站在内。也就是说,在过去 30 年内,每年平均敷设铁路 733 英里。但在这一工业部门里,平均数字与实际发展过程之间的距离比所有其他部门都大。在那些铁路热年份里,如 1844 年和 1845 年,整个本土都像突击一样在敷设铁路。以后几年,则是逐渐充实的过程,联结干线,敷设支线,所以铁路网就扩展得比较慢。在这几年,铁路建设的规模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在铺轨以前需要完成巨大工程。早在 1854 年,据罗伯特·斯蒂芬逊的统计,铁路隧道全长约为 70 英里,铁路桥有 25000 座,还

有许多高架桥，伦敦附近的一座就长达 11 英里。土路基每 1 英里按 7 万立方码计，可填满 55000 万立方码的一个空间。如果把这些土倒在一起堆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底部直径就有半英里，高度就有 1 英里半——俨然是一座土山，相形之下，圣保罗教堂就会像是小人国的建筑。而自从罗伯特·斯蒂芬逊做了这个统计以后，铁路网又扩展了三分之一。

英国人给铁路起了个“不朽之路”的绰号，但它绝不是不朽的。它需要不断“新陈代谢”。由于磨损、氧化等等，铁逐渐失去它的特性，因此需要不断更换新的。据计算，机车每跑 60 英里就要磨去 2.2 磅钢，每辆空车皮要磨去 4.5 盎斯，每 1 吨货载要磨去 1.5 盎斯，像伦敦西北铁路那样的铁路线只能使用 20 年左右。铁的总耗损量每年每码为半磅；整个铁路网在其现有的长度下每年需要铁 24000 吨来补偿磨损，24 万吨供使用。然而作为铁路基础的钢轨远不如钢轨下面的枕木换得那样频繁。为了给铁路铺枕木，每年需要运来树木 30 万棵，而种植这些树木则需要 6000 英亩的土地。

铁路敷设好以后，为了使用铁路还需要机车、煤、水、铁路车辆以及工作人手。1860 年机车的总数为 5801 台，即每 2 英里铁路有 1 台多机车。同大多数机器初期的情况一样，机车最初也不怎么好看，走起来很不可靠，还有点像被机车取代的旧式交通工具，造价因而也比较便宜。英国第一台机车是四轮的，重量几乎不到 6 吨，造价 550 英镑。这种机车逐渐为造价 3000 英镑的蒸汽机车所取代，后者能带每辆重 5.5 吨的客车 30 辆，时速 30 英里，或以每小时 20 英里的速度运货 500 吨。像它们的先辈——马一样，有些机车也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名字就代表着它们的或大或

小的名声。

西北铁路上的“利物浦号”机车，最大功率为 1140 匹马力。这个大怪物每天要吞食 1 吨煤和 1000—1500 加仑水。这样的铁马构造非常精巧，零件不下 5416 个，互相配合，其精密程度不次于钟表。每小时走 50 英里的铁路机车车辆，其速度相当于炮弹速度的六分之一。如果每台机车的平均造价为 2200 英镑，则制造 5801 台机车的花费就是 1270 多万英镑。一年当中，每分钟就有 20000—25000 升水用 4—5 吨煤烧成蒸汽。斯蒂芬逊指出，这样变成蒸汽的水足够利物浦全体居民每日之需。同时，燃料的消耗量也几乎达到 4 年前不列颠煤的总输出量，或超过了伦敦总消费量的一半。

5801 台机车共带 15076 辆客车和 180574 辆货车，这些车辆的总值为 2000 万英镑。所有这些机车和车辆连成一列，就能把从布莱顿到阿贝丁的一条长达 600 多英里的线路完全占满。

列车每天要开出 7000 多次，一昼夜之间每分钟就要开出 7 次。去年一年运送的乘客和货物的总行程在 1 亿英里以上，超过地球周长 4000 倍。一年当中，每秒钟就有 3 英里以上的铁路线被列车驶过。用铁路运输的牛、羊和猪达 1200 万头，货物和矿物达 9000 万吨。而矿物的运输量则超过其他货物运输量的 1 倍。

总收入达 2800 万英镑。生产费用，不包括铁道路基的损耗，在中央各郡铁路公司为收入总额的 41%，在约克郡—郎卡郡铁路为 42%，在西部—中部铁路为 46%，在北方大铁路为 55—56%；所有铁路的平均费用为 13187368 英镑，或总收入的 47%。

按长度来说，伦敦西北铁路占第一位。它起初只限于伦敦—北明翰线、联合大铁路及曼彻斯特—利物浦线。现在，它连同各条

支线,在东面已从伦敦伸展到卡赖尔,从彼得波罗伸展到里子,在西面一直伸展到霍利赫德。这个铁路总局管理着 1000 多英里的铁路线,统率着一支约 2 万人的产业军。建筑这条铁路共花费 3600 多万英镑。铁路的总收入一昼夜之间每 1 小时为 500 英镑,而营业费每周为 1000 英镑。这条铁路以及大多数其他铁路的纯利润随着铁路网逐渐扩展,伸向人烟不太稠密和工业不太发达的地区而不断下降。100 英镑的股票的价值从 240 英镑逐渐跌到 92—93 英镑,股息则从 10% 跌到 3.75%。同时由于这条铁路的营业范围大大扩大(其他铁路也是如此),股东的监督削弱了,总局几乎独揽全权,管理方面就开始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 月中
载于 1862 年 1 月 23 日“新闻报”
第 2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

1862年1月17日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最近的危机时期中的处境是十分不愉快的，即使他的全部议会生涯证明，他是一个在需要为官职而牺牲实际权力的时候很少犹豫的人。没有人忘记约翰·罗素勋爵的首相一职曾经被帕麦斯顿得去，但是看来却没有人记得他从帕麦斯顿那里得到了外交部。帕麦斯顿用自己的名义指导内阁，同时用罗素的名义指导外交政策，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和平消息一从纽约来到的时候，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都争相颂扬帕麦斯顿的政治家风度，而对于他的助手，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甚至连最普通的夸奖也都没有。他干脆被忽略了。但是，**隐** 11月30日美国公文的丑事一出，罗素的名字就从死里复生了。

攻击者和辩护者现在都发现：**责任**外交大臣原来名叫**约翰·罗素勋爵**！而另一方面，罗素本人也忍耐不住了。他没有等到议会开会，并且一反内阁的惯例，马上在1月12日官方的“官报”²⁷⁸上发表了 he 本人和莱昂斯勋爵的通信。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曾在12月19日由亚当斯先生向约翰·罗素勋爵宣读；罗素也认为这封公文无疑是为威尔克斯舰长的行

为道歉，同时，亚当斯先生在罗素作了相应的表示之后，也表示认为这一冲突的和平解决已得到保证。有了这种官方的揭发之后，“晨邮报”12月21日根本否认有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西华德公文又作何说呢？“晨邮报”1月9日责备亚当斯先生隐匿了这封公文又作何说呢？帕麦斯顿的报刊从1861年12月19日到1862年1月8日的全部战争叫嚣又作何说呢？这还不算！1861年12月19日约翰·罗素勋爵给莱昂斯勋爵的信证明，英国内阁并没有提出过任何战争的**最后通牒**；莱昂斯勋爵并没有接到过在送致“此项最后通牒”7天后离开华盛顿的指令；罗素曾经命令公使避免作任何威胁的表示；最后，英国内阁决定：只有在收到美国的答复之后才作**最后的决定**。由此可见，帕麦斯顿的报刊那样用力鼓吹并且在大陆上得到那么多的奴婢般的回声的全部政策，原来是一种纯粹的痴心妄想，这种政策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正像一家伦敦报纸今天所说的，这种情况仅仅证明帕麦斯顿“企图不顾王室的责任顾问们必须遵守的既定政策而行事”。

约翰·罗素勋爵的 coup de main (突然袭击) 像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帕麦斯顿的报刊，下面一件事实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昨天的“泰晤士报”隐瞒了罗素的通信，对它一字不提。只是今天才用一篇社论作为介绍和引言，从伦敦“官报”上转载了这篇通信。它在这篇社论中小心翼翼地回避真正的争论问题，即英国人民与英国内阁之间的争论问题，而仅仅对这一点咕哝了一句：“约翰·罗素勋爵过度劳累了，从西华德11月30日的公文中看出了某种道歉”。然而，印刷所广场上的雷神丘必特却在另一篇社论中发泄了自己的愤怒，这篇社论极力证明，内阁阁员、贸易部头脑和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吉耳平先生配不上他在内阁中的位置。

吉耳平这个从前的书商、煽动家、禁酒运动鼓吹者、谁也不会把他当做英雄的人，于星期二在北安普顿——他是代表该地的议员——的一次公众集会上，竟然犯罪地怂恿英国人民组织公众游行示威来阻止政府不合时宜地承认南部同盟，并且粗鲁地辱骂南部同盟是奴隶制度生下的坏东西。“泰晤士报”怒叫：好像帕麦斯顿和罗素——“泰晤士报”现在再一次记起了约翰·罗素勋爵的存在——不曾毕生和奴隶制度作斗争似的！不消说，吉耳平先生呼吁英国人民起来反对他自己所属的政府对奴隶制度的同情态度，是一种轻率行动，是**有意的**轻率行动。但是，正如刚才所说的，吉耳平先生并不是英雄。他的全部历史都说明，他并不怎么想持戒苦修。他的轻率行动和约翰·罗素勋爵的 coup de main（突然袭击）发生在**同一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内阁远不是一个《happy family》（“快乐的家庭”），它的一些成员早就想“分家”了。

和英国内阁在“特伦特号”一剧中演出的终场同样有趣的，是这一场戏剧的**俄国的尾声**。在这整个喧闹时期中一直在后台不声不响的俄国，现在突然跳到前台来，拍拍西华德先生的肩膀，并且声明：彻底解决中立国海上权利问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大家知道，俄国是认为它有义务在适当的时刻和适当的地点把有关文明的紧急问题提到世界历史的议程上来的。只要各个海上强国放弃它们作为交战国对中立国所享有的权利，因而也放弃它们对俄国出口贸易的控制，这些国家就会拿俄国毫无办法。1856年4月16日的巴黎协定，有些地方曾**逐字逐句**地重复了1870年俄国针对英国而拟定的“武装”中立条约，但这个协定目前在英国还没有成为**法律**。如果这次**英美冲突**的结果使英国议会和女王批准了**英俄战**

争^①结束时两个英国大臣自作主张给予俄国的让步,那该是命运的怎样一个恶作剧呵!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 月 1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1 月 21 日“新闻报”
第 20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卡·马克思 伦敦的工人大会

1862年1月28日于伦敦

在早就不存在农民等级的社会中，工人阶级是那样占优势的一个部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它在议会中是没有代表的。不过它仍然不是没有政治影响。凡是重大的新设施和决定性的措施，没有一件不是经过 pressure from without (外界压力) 才在这个国家里^①得到贯彻的。有时反对派用这种 pressure (压力) 来对付政府，有时政府用这种 pressure 来对付反对派。所谓 pressure from without，按照英国人的理解，是指巨大的、议会外的人民示威，这种示威没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自然是无法实现的。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经利用群众来对付辉格党人。天主教徒的解放、改革法案、谷物法的废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俄国的战争、帕麦斯顿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的被否决²⁷⁹，都是议会外急风暴雨般的示威的结果。在这些示威中，工人阶级有时是被人煽动起来，有时是出于自身要求，他们或则作为 persona dramatis (剧中人)，或则作为乐队，依情况不同而扮演主角或呐喊助威的角色。因此，英国工人阶级对美国内战的态度便更加令人惊异了。

① 英国。——编者注

在北部工业区,由于各工厂借口各蓄奴州被封锁而停工和缩减工时,工人们遭到了无法形容并且日益加剧的困苦。其他部分的工人阶级的穷困情况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是由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对其他工业部门的反作用,由于这些部门对美国北部的产品输出因实行摩里耳税则而减少,由于对南部的这种输出因实行封锁而完全停止,他们也都遭到很大的痛苦。因此,英国对美国进行干涉,现时就成了工人阶级迫切的吃饭问题。此外,工人的《Natural superiors》(天然尊长们)还不惜一切手段来煽动他们痛恨美国。唯一存在的工人刊物,颇有地位而且发行很广的“雷诺新闻”,也被特地收买了过去,叫它在6个月内每周都狂热地反复鼓吹英国干涉的 *ceterum censeo*²⁸⁰。因此工人阶级清楚地了解到,政府所等待的,只是来自下面的要求干涉的叫嚷,即要求打破美国封锁并结束英国困苦状况的 *pressure from without* (外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保持沉默的那种顽强性是令人敬佩的;如果说他们打破沉默,那也仅仅是为了发出反对干涉和保卫美国的呼声。这又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英国人民群众的那种坚忍不拔的能力,它是英国强大有力的秘密之所在,它使一个普通的英国兵士在克里木战争和印度起义中——用马志尼的夸张语言来说——好像是半神人。

下面我们要报道昨天在伦敦居民最多的梅里勒榜区举行的一个盛大的工人大会,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政策”的特色。

主席斯特德曼先生宣布开会,他说,现在要决定一下,英国人民应当怎样来接待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

“必须弄清楚,这些先生们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把奴隶们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还是为了给这些锁链再加上一环。”

耶茨先生说：

“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候不能保持沉默。正在横渡大西洋到我国来的这两位先生，是专制的各蓄奴州的代理人。他们公开反叛自己国家的合法的宪制，并且到这里来劝说我国政府承认蓄奴州的独立。现在工人阶级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要叫英国政府以为我们对它的外交政策只袖手旁观。我们必须表明，我国人民为奴隶解放所花费的金钱决不当白白花掉。假如我国政府凭良心办事，它本来是应该衷心支持北部各州镇压这个可怕的叛乱的。”

演说人为北部各州作了详尽的辩护，并且宣称“拉夫焦伊先生对英国的激烈攻击是英国报刊的诽谤所引起的”，在这之后他就提出了下面一个动议：

“本大会认为：正在由美来英途中的叛乱分子代理人梅森和斯莱德耳，绝对得不到我国工人阶级的精神上的同情，因为他们是奴隶主，是正在反叛美利坚共和国的暴政集团的代理人，这个集团是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权利的死敌。”

威恩先生支持这项动议。他说，在梅森和斯莱德耳在伦敦期间，不言而喻必须避免对他们作任何人身侮辱。

尼科尔斯先生自我介绍是“美国极北部”的一个居民，而实际上却是杨西和曼两先生派到会场里来的 *advocatus diaboli* (魔鬼的辩护人)，他对这项动议表示反对。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有言论自由。在我国内，政府已经有三个月不许人开口了。自由不仅在南部受到压制，在北部也是受到压制的。北部有许多人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就是不敢说话。不下两百家报纸被封或被暴民捣毁。南部各州有权脱离北部，正如美国有权脱离英国一样。”

不管尼科尔斯先生怎样伶牙利齿，最初的动议还是一致被通过了。这时他又跑上去说：

“如果你们指责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是奴隶主，那末对于华盛顿、杰弗

逊等人也必须这样说。”

比耳斯先生以详细的发言驳斥了尼科尔斯，然后提出第二项动议：

“鉴于‘泰晤士报’及其他不正派的报刊欲盖弥彰地企图在美国事件上迷惑英国舆论，以任何事情为借口把我们拖入对千百万同族兄弟的战争中去，并利用共和国的暂时危难来诽谤民主制度，——本大会认为，既然工人在国民的参议院中没有代表，所以他们的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表示声援美国维护联邦的伟大斗争；揭露‘泰晤士报’及其同类的贵族报刊保护奴隶制的无耻立场；坚决主张实行最严格的不干涉美国事务的政策，主张由双方代表或仲裁法庭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斥责交易所投机家的报刊的战争政策；并且对废奴主义者力求彻底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努力表示最热烈的同情。”

这项动议被一致通过，最后还一致建议“将已通过的决议的副本交亚当斯先生转送美国政府，以表示英国工人阶级的同情与感情”。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2 月 2 日“新闻报”
第 32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反干涉的情绪

1862年1月31日于伦敦

利物浦的强大商业势力来源于奴隶买卖。利物浦对英国诗歌文学的唯一贡献是对奴隶买卖的颂歌。五十年前，威耳伯福斯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才得以踏上利物浦的土地。正如在前一世纪为利物浦的强大造成物质基础的是奴隶买卖一样，在这个世纪造成这种物质基础的是奴隶劳动的产品——棉花。所以，利物浦是脱离派的英国朋友的中心是不奇怪的。在不久前的危机时期，联合王国确实只有这一个城市得以组织了一次主张对美国作战的quasi（所谓）大会。而现在利物浦说些什么呢？让我们听一听它的大日报之一“每日邮报”²⁸¹的话。

在一篇题为《The cute Yankee》（“精明的美国北方佬”）的社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美国北方佬用他们一贯的巧妙手段，把名义上的失利变成了实际上的得利，使英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大不列颠的威风的确加强了，但这又有什么结果呢？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北方佬就一直坚持中立国有特权用它的国旗保护乘坐该国船只的乘客，不许交战国作任何侵犯。我们曾经尽力反对过这种特权，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在1812—1814年英美战争时期，以及更近一些，在1842年阿希伯顿勋爵与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的谈判时期，我们都反对过。现在我们的反对必须停止。美国北方佬的原则已经胜利了。这

个事实已由西华德先生肯定，他说，英国已在原则上作了让步，美国则由于‘特伦特号’事件而获得了它迄今为止用尽一切外交的和军事的手段都没有争到的让步。”

更重要的是“每日邮报”供认了舆论——甚至在利物浦——的转变。

它说：“同盟派并没有做什么使人们不再对他们同情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并且作了巨大的牺牲。即使他们还没有争到独立，每个人也都必须承认他们是应该得到独立的。但是不管怎样，舆论现在却转而反对他们的要求了。4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是好汉（fine fellows）。现在他们却被称之为十分渺小的一群（a very sorry set）……的确是出现了一个转变。反对奴隶制度的派别在不久前民众激愤的时候是那么老实，而现在则肆无忌惮，大喊大叫反对人的买卖和叛乱的奴隶主来了……甚至在这个城市的墙壁上不也都到处张贴着大幅标语，责备和恶意攻击‘该死的逃亡奴隶法的作者’梅森和斯莱德耳两先生吗？……同盟派被‘特伦特号’事件弄输了。他们曾经指望这个事件使他们获利；但结果却一败涂地。他们已失掉了我国的同情，所以他们必须尽快地顺应这种奇异的情况。他们受到了恶劣的对待，但是已无法可想（there will be no redress）”。

看了这家同情脱离派的利物浦报纸的上述自供之后，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帕麦斯顿的某些重要报刊现时在议会开会之前突然改变腔调说话了。例如，在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就出现了一篇题为“应该遵守封锁令吗？”的文章。

这篇文章首先从这样一个明显的原理出发，即这次封锁仅仅是一个纸上的封锁，因此违反这个封锁是国际法所容许的。法国已经要求强力打破封锁。实际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有待于英国，英国有重要的迫切的原因采取这一步骤，它特别需要美国的棉花。附带说一下：“仅仅是一个纸上的封锁”怎么就能阻止棉花的载运，这一点是使人不大理解的。

“经济学家”杂志喊道：“不过，英国仍然应当遵守封锁令。”它用一连串虚假的论据论证了这个看法之后，就转而谈到了问题的实质。

它说：“在这样的事情上，政府应当依靠全国的支持。但是，英国人民大众对实行干涉还没有**准备**，因为即使从表面上来看，进行干涉也意味着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奴隶制共和国。同盟各州的社会制度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联邦派极力要我们相信，奴隶制度是脱离运动的根源，他们联邦派是奴隶制度的敌人，——而奴隶制度又是我们特别深恶痛绝的……这就是民众迷不知返的真正原因。奴隶要获得解放，唯一可靠的道路是联邦的瓦解，而不是联邦的恢复；是南部的独立，而不是南部的失败。我们希望有机会时再向我们的读者说明这一点。但是**这一点目前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大多数英国人不是这样想**。而只要他们还坚持那样的偏见，我国政府实行任何干涉——这种干涉将使我们成为北部的真敌人，而对南部来说则不过是一个假盟友——都是得不到英国国民的衷心支持的。”

换句话说，如果进行这样的干涉，内阁就会垮台。而“泰晤士报”这样坚决地反对任何干涉而赞成英国中立的原因，也就从这里得到说明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 月 3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2 月 4 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 34 号

卡·马克思 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

曼彻斯特商会几天以前举行了年会。这个商会代表着郎卡郡——联合王国的最大工业地区和不列颠棉纺织工业中心。会议的主席艾·波特尔先生和主要发言人贝兹利、特纳两先生在下院里代表着曼彻斯特和一部分郎卡郡。因此，从会议的发言中可以正式地获知这个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巨大中心将在“国民的参议院”中对美国危机采取什么态度。

在这个商会去年的年会中，英国最大的棉纺织巨头之一艾释华特先生曾以品得式的夸张的文体歌颂了过去 10 年中棉纺织工业的空前的发展。他还特别着重指出，即使是 1847 年和 1857 年的商业危机，也没有引起英国棉纱和棉织品输出量的下降。他用 1846 年开始实行的自由贸易制度的神奇力量来解释这种现象。即使在当时，说这个制度虽然未能使英国免于 1847 年和 1857 年的危机，却能够使英国工业的一个特殊部门即棉纺织业不受那两次危机的影响，也是很奇怪的。而我们今天听到了什么呢？所有的发言人，包括艾释华特先生在内，都承认：从 1858 年起，亚洲市场上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商品过剩现象；即使没有美国内战、摩里耳税则和封锁，日益加剧的大规模生产过剩也一定会造成现时的停滞。当然，如果没有这些麻烦事情，最近一年的输出总值是否会减少

600万英镑，是很难说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亚洲和澳大利亚的主要市场现存的英国棉纺织品足供销售12个月之久，那末这一点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样，根据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曼彻斯特商会的供认，英国棉纺织工业中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美国封锁的结果，而是英国生产过剩的结果。但是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英国会有什么后果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答案：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无比困苦和小工厂主的破产。

奇坦先生指出：“在伦敦，据说我们还有足够的棉花来继续生产；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棉花。问题首先在于棉花价格。按现在的价格，厂主们的资本很快就完。”

然而，这个商会仍然表示坚决反对对美国的任何干涉，虽然它的大多数会员都受到“泰晤士报”的强大影响，认为北美联邦的解体不可避免。

波特尔先生说：“建议干涉是我们最不乐意做的事情。曼彻斯特是最不愿意作这种建议的。没有什么可以强使我们去要求做不道德的事情。”

贝兹利先生说：

“对于美国争端，必须遵守最严格的不干涉原则。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应当不受任何阻碍地解决他们自己的事务。”

奇坦先生说：

“我们这个地区的主要意见就是坚决谴责对美国争端的任何干涉。必须明确声明这一点，如果有任何动摇，另一方就会对政府施加最强大的压力。”

那末，商会的建议是什么呢？它要求英国政府消除当局对于在印度种植棉花一直设置的所有障碍。特别是要求取消10%的向印度输出英国棉纱和棉织品的进口税。对输往印度的英国工业品所

课的进口税，是帕麦斯顿在威尔逊先生的协助下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还没有来得及被消灭²⁸²，东印度还没有来得及并入不列颠帝国版图的时候实行的，而这恰好与他出卖萨瓦和尼斯以换取英法商约同时。这样一来，法国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英国工业开放了，但东印度市场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向英国工业关了门。

谈到这件事，贝兹利先生指出：自从实行上述税收以来，有大量英国机器输往孟买和加尔各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英国式的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准备吞吃最好的印度棉花的。如果把 10% 的进口税和 15% 的运费加在一起，那末由英国政府发起而人为造成的竞争者便享有一个 25% 的关税的保护。

在这个英国工业巨头的会议上，对于在殖民地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日益发展着的保护关税倾向，一般地表示了极端的不满。这些工业家先生们忘记了，殖民地曾经抗议宗主国的“殖民制度”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而未获结果。那时殖民地要求贸易自由，而英国则坚持实行限制措施。现在英国宣传贸易自由了，而殖民地则认为针对英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更符合它们的利益。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2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2 月 8 日“新闻报”
第 38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英国记事

大陆上人们习惯地认为，岛民约翰牛是有“独特性”或“个人特性”的。一般说来，这种看法是把早先的英国人和现代的英国人混为一谈了。其实相反，明显的阶级差别、过分细致的分工以及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别的已不是单个人，而是他们的“职业”和阶级。如果不看职业而只看日常生活，那末一位“体面的”英国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像，连莱布尼茨也未必能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 *differentia specifica* (特种差别)。那种大受赞扬的个人特性被排除于政治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外以后，便在私人生活的怪癖和胡闹中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以便不时在这些地方 *sans gêne* (无拘束地) 再来表现一下自己，而人们这时却意识不到他们已陷入了怎样可笑的境地。因此英国人仍旧以一个 *sui generis* (有其独特之处的) 人的姿态出现，这主要是在法庭上，这里是个人怪癖互相尖锐冲突的公开场所。

说完了这几句前言，可以谈一谈几天以前在高等控诉院上演的一出有趣的诉讼戏。 *Personae dramatis* (剧中人) 的一方是英国当代最大的画家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另一方是伦敦第一流裁缝能手海登兄弟；爱得文爵士是被告，海登兄弟是原告。 *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物证)是画家拒不付款的、价值 12 英镑的一件大衣和一件燕尾服。巴兰坦先生做兰西尔的辩护人,格里菲思先生做海登兄弟的辩护人。

海登供述: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定做了两件衣服。这两件衣服做好后送给他试穿,但定做的人嫌领子太高。领子改做以后,定做的人埋怨说,他还是不能穿,穿起来很热,很不舒服,而且领子磨他的头发。按照被告的愿望,做了种种修改。最后,原告说,如果不另外加钱的话,就不再修改了,于是兰西尔就打发他的仆人把这两件衣服退给成衣店,而原告则给他写去如下一封信作答:

“兹随信奉上一两件照您的最后吩咐重新改做的衣服。您说多次改做都不合适,这全怪您自己。在第一次试穿时,大衣和燕尾服都很合身;但是,如果定做的人弯起身子,做出很怪的姿势,那末任何手艺也无法使他满意。(笑声)我们极不愿意照您的要求改做这许多次,认为这些改做是多余的,而且是不符合我们这门手艺的规章的。现在我们认为不能再让步了。您已根本不能要求我们收回这两件衣服。所以我们特将账单附上,请您马上付款。”

辩护人巴兰坦:您是否想说,大衣和燕尾服现在也很合身呢?
海登:对,我所肯定的正是这一点。

巴兰坦:没有改做以前是不是更合身呢? **海登:**是的。——
巴:做大衣和燕尾服并不是你们的专长,对吗?你们是以做裤子出名的,是不是这样?——**海:**据说是这样!我们的裤子专家的名声比较大些。——**巴:**但做燕尾服专家的名声不大,对吗?那位带领爱得文·兰西尔爵士到贵处的阿尔弗勒德·蒙哥马利先生事先曾提醒他当心在贵处做燕尾服,是不是这样?——**海:**是的,这样说过。——**巴:**您或者您的弟弟是否对爱得文爵士说过,宁肯白给他做燕尾服,也不能什么也不给他做?——**海:**我们根本没说过这

样的话。——**巴**：你们对“修削”领子是怎么理解的？——**海**：爱得文爵士抱怨说领子磨他的脖子。因此我们修削了领子，就是说，把领子的高度稍微降低了一些。——**巴**：照你们看，这值多少钱？——**海**：两三英镑。

辩护人巴兰坦：爱得文·兰西尔爵士认为必须对海登的侮辱性的信提起控诉。蒙哥马利先生把海登商号推荐给爱得文爵士，是让他去做下身穿的衣服，而不是去做上身穿的衣服。虽然爱得文爵士是一个大画家，但他在这些事情上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才敢于去冒险；结果如何，法庭已经很清楚了。陪审员们方才在证人席上看到的原告也是一个大行家。难道大行家竟要改做他的作品吗？他既然确信他的手艺已经十分高明，那他就应该誓死维护自己的作品。

但海登并没有捍卫他的作品。他同意在符合他本人原则的范围内改做。而这之后他竟然为这种没有用处的工作而索取两三英镑！我很荣幸地在这里向法庭讲话，你们也是穿燕尾服的；我要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坚硬异常的领子箍着脖子更痛苦呢？我听说，爱得文爵士在试穿这样一件燕尾服时，他的脖子就被夹住了，以致英国险些丧失一位最大的画家。爱得文爵士愿意在这里当着法庭穿一穿那件燕尾服和那件大衣！这样，陪审员先生们就能根据亲身的观察而得出结论。现在我请爱得文爵士出来作证，让他向诸位说一说做这两件衣服的前前后后。

爱得文·兰西尔爵士：……我一穿上燕尾服和大衣，领子就这样竖着。（这时爱得文爵士扭摆了一下身子，在场人的大笑声中背朝陪审员，做出一种好像突然中风的样子）……我请求找一位最好的裁缝做仲裁人；但无论如何每个顾客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燕

尾服是否合身,或者皮鞋什么地方夹脚。

格里菲思先生:蒙哥马利先生在向您推荐海登时说了些什么?——他对我说:“爱得文爵士,您的裤子往往不如大衣和燕尾服做得好”。

格里菲思:您能否在这里试穿一下燕尾服和大衣?——为什么不能?(他把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好了,请看吧!(笑声)

马丁(法官):这里陪审员中有一位裁缝。可否劳他的驾仔细看一看 corpus delicti(物证)?

被提到的那位裁缝从陪审员席上站起来,走到爱得文爵士跟前,请他把燕尾服和大衣穿好,很在行地看了一下,摇了摇头。

格里菲思:爱得文爵士,您是否觉得燕尾服很紧?——是的!(笑声)——我想再问一下:是不是窄了?——哼,如果我穿着这件衣服去参加宴会,那我非把它脱下来进餐不可。

巴兰坦:既然如此,爱得文爵士,您不用再继续穿着它了。请您脱下它来吧。——非常感谢您。(脱去那两件衣服)

在双方的辩护人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之后,法官做出了有趣的结论,强调指出不能牺牲英国民族的舒适来迁就海登商号的创作标准,接着,法庭便做出了爱得文·兰西尔爵士胜诉的判决。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2 月 3 日
左右
载于 1862 年 2 月 9 日“新闻报”
第 3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

1862年2月7日于伦敦

这次议会开幕式表现为一个十分平淡的仪式。女王缺席，国王演辞由大法官宣读，使这个仪式失去了任何戏剧效果。国王演辞本身简短而不精炼。它略述了对外政策的 *faits accomplis* (既成事实)，而在估计这些事实时则介绍参看已经提交议会的文件。只有一句话引起了某种耸动，这句话是说，女王《trusts》(希望、相信)“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欧洲的和平会被破坏”。实际上，这句话是意味着把欧洲的和平寄托到希望与信念的领域里去了。

按照议会的惯例，在两院对国王演辞作答词的先生们在三星期以前就已经由大臣们付与了委托。他们的答词都是照样罗罗嗦嗦地重复一下国王演辞，此外就是恭维夸奖，这是大臣们以议会的名义给自己的奖语。1811年**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曾经抢在官方的致答词的人之前，抓住这个机会对国王演辞进行尖锐批评，那时，*Magna Charta*²⁸³本身看来也岌岌可危。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发生过这种怕人的事情。

所以，关于国王演辞的辩论就只限于官方反对派的“暗示”和大臣们的“反暗示”。不过这一回是学术的意味多于政治的意味。所谈的是谁的阿尔伯特亲王悼词说得最好的问题。这位亲王在世

时是非常不愿意服从英国寡头政治的桎梏的。Vox populi (人民的呼声)把这次学术优胜奖断给了得比和迪斯累里两位，——前者作为天生的演说家而得奖，后者作为修辞专家而得奖。

辩论的“事务”部分是围绕着美国、墨西哥和摩洛哥进行的。

在美国问题上，Outs (在野派)大大颂扬了一番 Ins (在朝派) (beati possidentes (官星高照的人))的政策。上院的保守派领袖得比和下院的保守派领袖迪斯累里并没有组成反对内阁的反对派，而是组成自相反对的反对派。

得比首先发泄了他对于没有《pressure from without》(“外界压力”)这种情况的不满。他说，他“赞扬”工厂工人的坚忍的和尊严的风度。可是，说到厂主们，他实在不能有所褒奖。对厂主们来说，美国的冲突来得特别凑巧，因为生产过剩和所有市场的过分膨胀反正是会迫使他们压缩工业生产的。

得比接着便猛烈攻击联邦政府，说它“已使自己和人民蒙受了耻辱”，没有“君子风度”，因为它没有表现主动，自动地交出梅森、斯莱德耳一行并表示悔改。他的在下院的副手迪斯累里先生立刻领会到，得比的攻击会对保守党人执政的希望造成多么大的损害，所以他就反过来说：

“当我考虑到北美的政治家们必然遭遇的巨大困难时，我必须得出结论：他们已经勇敢地大胆地克服了这些困难。”

另一方面，得比以他固有的一贯性又反对海上法的“新理论”。英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坚持与中立国的要求作对的交战国权利。诚然，1856年克拉伦登勋爵在巴黎作了一个“危险的”让步²⁸⁴。幸而这个让步还没有被国王批准，所以“在当前问题上国际法没有丝毫改变”。迪斯累里先生显然是根据与政府的协议，根本不去谈这

一点。

得比赞成内阁的不干涉政策。承认南部同盟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但是他要求提供可信的文件，以便判断“封锁究竟有效到什么程度，因而是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对这个问题，**约翰·罗素勋爵**宣称：联邦政府已经把足够数量的舰艇用于封锁，但并不曾在每一个地方都严格地实现了封锁。**迪斯累里**先生对封锁的性质不作判断，但要求内阁提供文件以了解情况。他特别警告不要太急于承认南部同盟，因为英国此刻正由于威胁一个美洲国家（墨西哥）而名声不好，这个国家的独立还是它本身首先承认的。

在美国之后就轮到了**墨西哥**。没有一个议员谴责不宣而战的战争，但是却反对在“不干涉政策”的口号下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反对英国和法国及西班牙联合起来去压服一个半无防御的国家。实际上，**在野派**的发言只不过是暗示他们想把墨西哥作为党派角逐的借口保留下来而已。**得比**要求提供关于三强协议以及关于履行协议的方式的文件。他赞成这个协议，**因为**，在他看来，谈判中的每一方**独立地**坚持自己的要求是正确的做法。某些公开的流言使他担心：至少这些强国中的一个——西班牙——正企图采取超出协议范围的行动。仿佛得比真正相信大强国西班牙有胆量**违反**英国和法国的意志行事似的！**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三个强国所寻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它们将小心避免妨碍墨西哥人处理应由本国政府处理的事务。

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拒绝在研究已提供的文件以前作任何判断。不过，他觉得“政府的声明**有问题**”。英国承认墨西哥的独立比哪一国都早。这个承认使我们回想起英国外交史上一个声名卓著的政策——反神圣同盟的政策，和一个声名卓著的人物——坎

宁。那末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原因使英国要第一个去打击墨西哥的独立呢？而且，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干涉的借口也改变了。起初是一个赔偿英国臣民的损失问题。而现在却悄悄谈论确立新的施政原则和建立新的王朝了。帕麦斯顿勋爵援引所提供的文件，援引三国协议，说什么这个协议禁止同盟国“奴役”墨西哥或强制实行人民所不喜欢的政体。但与此同时，他却为自己开了一个外交上的藏身洞。他风闻墨西哥有一个政党想用君主制代替共和制。这个政党的实力如何他不知道。他，“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只希望墨西哥成立某个政府，使外国政府可以和它打交道”。由此可见，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体。他宣称现政府不存在。他要求英法西三国同盟像神圣同盟那样有决定外国政府是否存在的特权。他还谦逊地说：“这就是大不列颠政府想要达到的最大的目的。”别无其他！

外交政策上最后一个“待决问题”牵涉到摩洛哥。英国政府和摩洛哥曾经订立一个协议，以便使摩洛哥能清偿它对西班牙的债务，——本来，这笔债务若没有英国的允许，西班牙是根本不可能把它压在摩洛哥身上的。大概是某些人给了摩洛哥贷款，让它如期偿付西班牙，这样就使西班牙失去了继续占领泰图安和重启战端的借口²⁸⁵。英国政府通过某种形式为这些人保证他们得到贷款利息，同时它自己则接管摩洛哥的海关作为抵押品。得比认为这种保证摩洛哥独立的方式《rather strange》（颇为奇怪），但是没有得到大臣们的答复。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进一步地谈到这项交易，说它“相当不合宪法”，因为政府背着议会使英国承担了新的财政义务。帕麦斯顿干脆只叫他去查阅已提出的“文件”。

国内事务在辩论时几乎没有被提到。得比由于关注“女王的

心情”，仅仅警告议员们不要提出像议会改革那样“令人激动的”争论问题。他准备照例向英国工人阶级献出他的赞扬，条件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要用它那忍受美国封锁的自我牺牲的坚忍精神，来忍受自己被剥夺了选举权。

如果根据议会的这个牧歌式的开幕式，就推断它有一个牧歌式的未来，那就错了。正相反！议会解散或是内阁辞职——这就是本届议会会议的主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论证一下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2 月 7 日
载于 1862 年 2 月 12 日“新闻报”
第 42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墨西哥的混乱

1862年2月15日于伦敦

刚刚公布的关于干涉墨西哥一事的蓝皮书²⁸⁶，罪证确凿地暴露了现代的英国外交，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残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视。关于唐宁街和不列颠驻墨西哥的代表之间的往来书信，我不得不留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详细分析，借以确定无疑地证明，现今的混乱是英国制造的，是英国首先发起干涉，并且还找了一些十分虚假和自相矛盾的借口，因此根本掩盖不了它的做法的真正的、只不过被矢口否认的动机。用这样可耻的手段发动对墨西哥的干涉，只有这一点可以超过，这就是：英国政府用一种老糊涂的态度，对它自己一手策划的丑恶阴谋的执行假装惊讶，竭力回避。我现在所想要谈的，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

1861年12月13日，西班牙驻伦敦公使伊斯土里斯先生向约翰·罗素送去了一份照会，其中附有西班牙的古巴镇守司令给墨西哥远征军各指挥官的指令。约翰·罗素把这份照会搁置起来，保持沉默。12月23日，伊斯土里斯先生又给他送去一份照会，试图解释西班牙的远征部队在英法军队到来之前离开古巴岛的原因。约翰·罗素把这份照会又搁置起来，继续顽强地保持沉默。伊

斯土里斯先生想弄清楚，培德福德家族的这个喜欢噜嘛的后代为什么一反往常，这样长时间不开口，是否预兆着什么坏事情，于是就坚持要当面会一会。这次会晤得到了同意，遂于1月7日举行。

这时，关于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单方面军事行动，约翰·罗素已完全得知一个多月了。从伊斯土里斯先生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他的时候起，也差不多已有一个月。尽管如此，在同西班牙公使会晤时，约翰·罗素对于“塞拉诺将军所采取的为时过早的步骤”仍然没有流露一句哪怕稍微表示不满或惊异的话，而且他的话也根本没有使伊斯土里斯先生产生丝毫怀疑，而是使他深信，一切都很顺利，西班牙的行动不列颠政府完全赞同。伊斯土里斯先生充满着加斯梯里亚人的骄傲，当然一点也不会想到西班牙是它强大盟国手中的玩物和盲目的工具。

但议会开会日期接近了，约翰·罗素必须编写一整套专供议会使用而不是供国际谈判使用的公文。因此，他于1月16日拟出了一份公文，用怒气冲冲的语调对西班牙擅自采取单方面行动提出质问。在他心中安然沉睡一个多月，甚至在1月7日同伊斯土里斯先生会晤时也没有表现出来的疑虑和动摇，突然打破了那位自信的、诚实的和毫无疑人之心的政治家的平静的幻梦。伊斯土里斯先生像被雷震似的吃了一惊，于是便在1月18日的复信中稍带讽刺地提醒勋爵阁下，说勋爵错过了机会表达他那过时的愤懑。他实际上是对勋爵阁下也照样来了一手，他在为西班牙擅自行动进行辩护时，也装出约翰·罗素要求解释时所装的那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

伊斯土里斯先生说：“古巴镇守司令到得太早，因为他怕到委拉克路斯晚了。”下面他又嘲弄了约翰勋爵一下：“此外，远征早已在各方面做好准备

了”，只是镇守司令在12月中之前并“不知道条约的细节，也不知道约定的舰队会合地点”。

而条约在11月20日以前并没有签订。因此，如果说，镇守司令“在12月中以前已经在各方面准备好”他的远征，那就是说，从欧洲送达给他的远征出发令是在条约签订以前发出的。换句话说，三国之间的最初协议以及为实现这个协议而拟定的措施早在条约签订前就已经执行了，而协议的“细节”则与条约的各项规定不同，因为条约从最初时起就不是一个行动纲领，它不过是一个用以使舆论容忍丑恶计划的体面款式而已。

1月23日，约翰·罗素给伊斯土里斯先生一份不太客气的复照，复照指出：“不列颠政府对所提出的解释不完全满意”，不过它并不怀疑西班牙有不顾英法而行动的轻率意图。整整一个月昏昏沉沉一动不动的约翰·罗素勋爵，随着议会会期的临近，开始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和最大的警觉来了。一分钟也不能放过。1月17日，他同法国驻伦敦大使弗拉奥伯爵举行会晤。弗拉奥告诉他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法皇认为必须“向墨西哥增兵”，认为西班牙轻举妄动已把整个事情弄糟。

“联军现在应该进入墨西哥腹地，不仅预定的兵力现在不够调度，而且远征本身也有了不同的性质，因此路易·波拿巴不能同意让法国国力弱于西班牙，或者让法军冒丧失声誉的危险。”

弗拉奥的论据是根本说不通的。如果说西班牙擅自越出协议的范围，那末只要从圣詹姆斯宫或土伊勒里宫发出一份照会到马德里，就足以使它放弃它那些可笑的奢望，使它仍旧充当条约给它规定的小角色。但是并没有这样做。鉴于西班牙已违反条约，——这种违反纯粹是形式上的违反，算不了什么，因为西班牙军队提早

到达委拉克路斯丝毫也没有改变远征的官方目的和使命，——鉴于西班牙敢于当英法军队未到场的时候在委拉克路斯下锚，所以法国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学步西班牙，违反协议，不仅增派远征部队，而且改变军事行动的整个性质了。当然，这些同盟国本来不需要什么托词，就可以把真货色端出来，在远征之初就一古脑儿抛掉那些曾经提出来为这次远征辩解的官方的借口和目的。

据此，约翰·罗素虽然对法国所采取的“步骤”也表示了“遗憾”，但仍然予以赞同，他对弗拉奥伯爵说：“他代表女王陛下的政府，对法国的理由有充分根据这点没有任何异议。”在1月20日的公文中，他把这次同弗拉奥伯爵谈话的内容通知了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伯爵。在此前一天，即1月19日，他给英国驻马德里公使费·克兰普顿爵士一封公文，这封公文是一种奇异的混合物，里面既有预定讲给不列颠议会听的伪善的废话，同时又巧妙地向马德里宫廷暗示了他这样大量使用的自由主义词句的真实价值。他说：“塞拉诺元帅的行动，意在引起某种不安”，这样说的根据不仅在于西班牙远征军过早地从哈瓦那出发，而且还在于“西班牙政府所公布的文告的语调”。

但与此同时，我们的 bon homme (好心人) 却给马德里宫廷悄悄提示一个漂亮的论据来辩护它公然违反条约的行为。他坚信马德里宫廷没有什么恶意；只是那些远离欧洲的将领们有时表现“轻率”，须要“非常仔细地加以监督”。这样，好心人罗素就自请效劳，把责任从马德里宫廷的身上转移到西班牙那些“远离欧洲的”、就连好心人罗素的说教也鞭长莫及的不谨慎的将领们身上去了。他的公文的另一部分也很奇异。联军不应当剥夺墨西哥人“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这就是暗示在墨西哥“不存在政府”，墨西哥人在

结盟的征服者的庇护下不仅必须选举新的总督，而且必须确立“新的政体”。“由他们来建立新的政府将使”不列颠政府“感到高兴”；不过，征服者的军队当然不得影响全民投票的过程，他们只是向墨西哥人推荐用全民投票的办法建立新的政府。自然，入侵军队的统帅自己可以判断什么样的新政体“是墨西哥人可以接受的或者是不可以接受的”。

不管怎么说，好心人罗素是在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企图卸脱责任。他把外国的龙骑兵派往墨西哥，去强迫墨西哥人民“选举”新政府；但是他却期待龙骑兵会彬彬有礼地这样做，会细心地考察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政治情绪。这种明显的鬼把戏值得一看吗？不必谈好心人罗素的公文的内容，只要读一读 10 月间即 11 月 30 日的伪善的条约签订前 6 个星期内的“泰晤士报”和“晨邮报”，大家就会看出，英国的政府报纸早就把罗素似乎在 1 月底才知道的一切未能如意的事情全部预言过了，并且早就拿某些远离欧洲的西班牙代表的“轻率”来解释这些事情了。

罗素所玩弄的把戏的第二部，就是把英法的宠儿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弄上台来，作为墨西哥王位的要求者。

1 月 24 日，即在议会开幕前 10 天左右，考莱勋爵写信给罗素勋爵说，不仅巴黎的饶舌婆娘们都在谈论大公，而且连那些率领增援部队去墨西哥的军官们也说他们远征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立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国王。考莱认为必须向图温奈尔询问这个微妙的问题。图温奈尔回答他说，就这一点同奥地利政府进行的谈判，并不是由法国政府倡议举行的，倡议者乃是“为此目的前来并已启程去维也纳”的墨西哥特使。

大家会以为，这位毫无疑问人之心的约翰·罗素，既然在 5 天以

前还在致马德里的公文中大谈协议上面的规定,甚至后来在2月6日的国王演辞中还宣布实行干涉的唯一原因和目的是“要求赔偿”欧洲侨民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大概终于要勃然大怒,大发脾气,痛责别人用前所未闻的欺骗来报答他那好心的轻信吧?根本没有这回事。好心人罗素研究了考莱于1月26日告诉他的那些流言,第二天就赶紧坐下来拟了一份公文,表示愿意协助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王位的候选人。

他通知他派驻墨西哥的代表查·魏克爵士:法国和西班牙的部队“马上”就要向墨西哥首都进发;还说,“据传”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是墨西哥人民所崇拜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则协议中就不包含任何足以妨碍他登上墨西哥王位的东西”。

在这些外交界的启示录中,有两件事情最为突出:第一,西班牙被愚弄了,第二,罗素脑子里连想都没有想,他对墨西哥是不能不宣而战的,他只有根据一切有关方面都必须遵守的一定的条约才能同外国结成同盟来进行这次战争。两个月以来使人腻烦地、伪善地说什么严格的国际法规神圣不可侵犯和自己尊重这些法规的人们就是这个样子!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2月15日

载于1862年3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53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美国近事

林肯总统在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所向都不许再拖以前，是从不冒险朝前走一步的。但是，只要《old Abe》（“老阿伯”（阿伯拉罕·林肯））一旦相信这样一种转折点已经到来，他就会采取某种突然的、尽可能不声不响的行动而使朋友和敌人都同吃一惊。最近，他就用极其平静的方式干出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这件事如果放在半年以前，可能要以他的总统职位作代价，即使在几个月以前，恐怕也会引起一阵辩论的风暴。这里我们指的是**麦克累伦被免除了指挥联邦所有军团的 commander in chief(总司令)的职务**一事。首先，林肯用一个精明强干而不讲客气的律师**爱得文·斯坦顿**先生替换了陆军部长凯麦隆。接着，斯坦顿就向布埃耳、哈勒克、巴特勒、薛尔曼等将军及其他各军区司令官和讨伐军长官发出指令说，今后一切命令，无论是通告性的或机密性的，一律直接自陆军部取得，同时，他们必须直接向陆军部报告。最后，林肯发布了几项命令，用宪法授予他的《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陆海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用这种“不声不响”的办法，那位“年轻的拿破仑”²⁸⁷就被解除了他对**所有军团的最高指挥权**，只有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留给他指挥，虽然《commander in chief》的头衔还给他保留着。在林肯总统接收最高指挥权之初，

就顺利地由肯塔基、田纳西和大西洋海岸传来了一些捷报。

迄今为**麦克累伦**所担任的《commander in chief》这个职位，是英国传给美国的，它大约相当于旧时法国军队中的 grand connétable (大元帅) 的称号。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甚至英国也看出了这个过时的制度不妥。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把以前属于《commander in chief》的一部分职权移交给陆军部。

要评论**麦克累伦**在波托马克河一线的费用战术²⁸⁸，现在还缺乏必要的材料。但是，他对整个战争的进行起着阻碍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可以用**马考莱**评论**艾塞克斯**的话来评论**麦克累伦**：

“**艾塞克斯**的军事上的错误主要是由于他政治上不坚定。他很正直，但是对议会的事业完全没有热诚，因此除了大失败之外，他最害怕的是大胜利。”²⁸⁹

麦克累伦和大多数基干军官们一样，是西点军校²⁹⁰出身的；一种 esprit de corps (小团体观念把他多多少少同敌方的老伙伴们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人对“非军人”出身的后起之秀怀着嫉妒。在他们看来，战争应当按照纯业务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目的始终应当是在旧基础之上恢复联邦，因此，战争首先必须排除原则性的和革命性的倾向。对于一场本质上是原则之战的战争抱着这种看法真是妙极。当年英国议会军的第一批将军们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

“但是”，——**克伦威尔**在 1653 年 7 月 4 日在向长期议会的“渣滓”致词时说——“一当信奉 a principle of godliness and religion (虔敬和宗教原则) 的人们起来领导，一切都变化得多么大呵！”²⁹¹

华盛顿的报纸“星报”²⁹²——**麦克累伦**专用的机关报——在最近的一号报纸上宣称：

“**麦克累伦**将军的一切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要把联邦恢复到完全同叛乱

爆发以前一样。”

因此，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在这位总司令的眼下被用来捕捉奴隶，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仅在最近，麦克累伦还特别下令把音乐家卡特钦森家族驱逐出营，因为他们唱了反奴隶制度的歌曲。

除开这种“反倾向的”示威之外，麦克累伦还利用他的大权包庇联邦军队中的叛徒。举例来说，他曾把梅纳德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虽然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表明梅纳德充当着脱离派的奸细。所有的军事叛徒，从私通敌方而造成马纳萨斯之败的帕特逊将军起，到直接做敌人的内应而造成了博耳斯—布拉夫之败的斯通将军为止，麦克累伦将军都使之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甚至使其中大多数人不被撤职。在这方面，国会调查委员会已经揭露了最惊人的事实。林肯决心要用有力的行动来证明：随着最高指挥权转到他手里，那些带着将官肩章的叛徒们的丧钟就响了，军事政策上的**转折点**就来到了。按照他的命令，斯通将军于2月10日深夜2时还在睡觉的时候被捕，并被解往拉斐德堡垒。数小时后，由**斯坦顿**签署的逮捕令出现了；逮捕令宣布被捕者犯了叛国罪，应交军事法庭审判。斯通的被捕与交付审判，是没有事先通知麦克累伦将军就执行了的。

只要麦克累伦自己还按兵不动，并且戴着一顶不过是预支的桂冠，他显然是决心不让别的将军超过他的。哈勒克将军和波普将军曾经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以迫使那位由于华盛顿的干预才得从弗里芒特手里逃脱的普莱斯将军进行决战。但是，麦克累伦一封电报禁止了他们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的另一封电报“废止了”哈勒克将军关于攻占哥伦布堡垒的命令，而这个堡垒当时已经被攻陷一半。麦克累伦曾经断然禁止西部的将领们互相联系。每一位

将领打算进行联合行动，都要首先向华盛顿请示。现在，林肯总统把必要的行动自由还给他们了。

最清楚地证明麦克累伦的总的军事政策如何有利于脱离派的，是“纽约先驱报”无所吝惜地不断给他的赞词。他是一个符合“先驱报”心意的英雄。“先驱报”的业主和主编、臭名远扬的贝奈特，以前曾经通过他的驻华盛顿的“特别代表”，alias（或者叫做）通讯员，操纵皮尔斯政府和布坎南政府。在林肯政府下，他又企图用一种迂迴的方法来取得这种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他的“特别代表”艾夫斯博士——南方人，逃往同盟派方面的一个军官的弟兄——设法取得了麦克累伦的宠信。这位艾夫斯由于得到麦克累伦的庇护，在凯麦隆主持陆军部时肯定是享有很大特权的。显然他指望斯坦顿也给他同样的厚待，因而于2月8日又去陆军部，恰巧遇见陆军部长、他的主任秘书和几个国会议员正在那里商讨战事。人家要他出去。他发起脾气来，但最后终于退出，同时威胁说，如果剥夺了他的“特有的权利”，不让他去陆军部里了解政府会议的结果、电报、公函及战讯，“先驱报”就要对现在的陆军部开火。次日即2月9日上午，艾夫斯博士在自己家里举行香槟酒会，邀集麦克累伦总参谋部的全体人员。“但是灾星走得快”^①，一个军士带着六个兵走了进来，逮捕了大有力的艾夫斯，并且把他解到麦克亨利堡垒，根据陆军部长的明令，他在那里“将作为一个间谍而受到严密的监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2月26日

左右

载于1862年3月3日“新闻报”

第6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① 席勒“钟之歌”。——编者注

卡·马克思
脱离派的朋友们在下院。——
美国的封锁被承认

1862年3月8日于伦敦

Parturiunt montes!^①从议会开幕的时候起,脱离派的英国朋友们就威胁着要就美国封锁问题提出“质询”。质询终于以十分平常的动议的形式在下院提出来了,它敦促政府“提供关于封锁实况的补充文件”。但是,甚至这样一项普通的动议也没有经过分组表决的手续就破否决了。

提出这项质询的高尔威的议员**格雷哥里**先生,在美国内战爆发后不久,在去年议会的会议上,曾经提出一项承认南部同盟的动议。对于他今年的演说,是不能否认其有某些诡辩之妙的。这个演说只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分成了互相否定的两部分。一部分描述了封锁对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毁灭性的影响,因此要求打破封锁。另一部分则根据内阁所提供的文件,包括杨西和曼两先生和梅森先生的两份声明,证明这个封锁除了在纸上以外根本不存在,因此不应再被承认。格雷哥里先生不断地引用“泰晤士报”来给自己的论证增添滋味。为了表示感谢,“泰晤士报”——在此刻提起它那

① Parturiunt montes, nascetur ridiculus mus! (大山分娩,生出个耗子!)(贺雷西“诗论”)——编者注

宣谕官的宏论对它是完全不合适的——发表了一篇社论，结果不过是使格雷哥里先生受到公众嘲笑。

格雷哥里先生的质询得到了**本廷克**先生的支持，本廷克是一个极端的托利党人，两年以来一直努力在保守党阵营内针对迪斯累里先生搞脱离运动而未成功。

所谓英国工业的利益竟由爱尔兰西部的一个不重要的海港高尔威的代表格雷哥里和一个纯粹农业地区诺福克的代表本廷克来代表，这件事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

英国工业中心之一的布莱得弗德的代表**福斯特**先生起来反对他们两人。福斯特的演说应当得到更密切的注意，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脱离运动的朋友们在欧洲散布的那种关于美国封锁的性质的谈论是不真实的。他说：首先，美国已经履行了国际法所规定的一切手续。美国宣布各港口处于封锁状态，这些港口没有一个不是经过预告、特别通知开始封锁的时间并给以 15 天的期限（期满后即禁止各中立国船只出入）之后才宣布封锁的。

因此，关于这个封锁在法律上“无效”的谈论所根据的，仅仅是据说封锁常被突破。在议会开幕之前，据说有 600 艘船突破了封锁。格雷哥里先生现在把这个数目减少到 400。他的根据是两份表册，一份是南部特使**杨西**和**曼**于 11 月 30 日提交政府的，另一份补充表册是**梅森**提出的。根据杨西和曼的材料，从宣布封锁起，到 8 月 20 日止，进入和驶出都包括在内，突破封锁的船只已超过 400 艘。但根据海关的正式报告，进入和驶出的船只总数只有 322 艘。在这个总数中，有 119 艘是在宣布封锁以前离开的，有 56 艘是在规定的 15 天限期期满以前离开的。还剩下 147 艘，在这 147 艘中，有 25 艘是从内地开往新奥尔良的内河船舶，到了新奥

尔良它们就停泊下来；106艘是近海船舶，这些船舶除其中的3艘外，用梅森先生自己的话来说，都是《quasi inland》（“准内河”）船舶。在这106艘中，有66艘是航行于谋比耳和新奥尔良之间的。凡是了解这条海岸线的人都知道，把某个在浅海湾内航行，即差不多不接触公海而仅仅沿着海岸移动的航行叫做突破封锁是何等荒谬。往来于萨凡那与查理斯顿之间的船只也是这样，在那里它们是在岛屿和狭长的海角之间溜来溜去。根据英国领事本奇的证明，这些平底船在公海上出现只有几天。在减去106艘近海船舶之后，就剩下16艘开往国外港口的船只了，其中，15艘开往美洲诸港，主要是开往古巴，一艘开往利物浦。在利物浦停泊的那艘“舰只”，是一条小帆船；所有其余的“船只”也是这样，只有一艘海岸炮舰是例外。

福斯特先生高声说，关于虚假封锁谈得很多。但是，难道杨西先生和曼先生提供的这份表册不是虚假的吗？他又把梅森先生的补充表册作了同样的分析，指明偷航出去的巡洋舰的数目一共只有三、四艘，而在上次英美战争²⁹³中至少有516艘美国巡洋舰突破了英国的封锁，扰乱英国海岸。“恰恰相反，这个封锁从宣布以来就是完全有效的。”

进一步提供了证明的，是英国领事们的报告，特别是南部的行情表。1月11日，新奥尔良给予向英国运送棉花的奖励金达到了100%，输入食盐的利润达到1500%，战时禁运品的利润更是其高无比。尽管有这样诱人的利润，但无论是运棉花去英国还是运食盐到新奥尔良或查理斯顿都同样不可能。实际上，格雷哥里先生所埋怨的倒不是封锁没有效力，而是它太有效了。他要我们去打破这个封锁，以便结束工商业的停滞局面。这里只要这样问就够

了：“是谁向议院建议打破封锁呢？是身受其苦的地区的代表吗？是被迫关闭工厂的曼彻斯特发出了这种呼声呢，还是由于船只无货可装而停在船坞里的利物浦？恰恰相反。这种呼声是高尔威发出而为诺福克支持的。”

在脱离派的朋友们当中，还有一位北希尔兹的大造船厂厂主**林赛**先生出头引人注目。林赛曾经建议联邦使用他的造船场，并且曾经为此到华盛顿去了一趟，在那里尝到了他的生意被拒绝的失败滋味。从那时起，他就把他的同情转到脱离运动方面去了。

这场辩论以副首席检察官**朗·帕麦尔**爵士的长篇演说作结束，他是以政府的名义讲话的。他从国际法的角度，用法律的根据证明了这个封锁的实在性和有效性。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彻底撕毁了1856年巴黎宣言所宣布的“新原则”，正如塞西耳勋爵对他指责的那样。他还有一段话对于格雷哥里之流竟然在英国议会中以**奥特弗伊**先生为权威表示惊异。的确，这是一个新出现的“权威”，他是在波拿巴主义阵营里新近被发现的。奥特弗伊在“现代评论”²⁹⁴上发表的关于中立国海上权利的文章所证明的，若不是完全无知，就是奉上面命令而制造：mauvaise foi（毒计）。

随着议会里的脱离派朋友们在封锁问题上完全失败，指望英美关系破裂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3月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2年3月12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70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美国内战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美国内战都是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壮观。争夺的土地幅员广大;作战线的正面极长;敌对的军队数量庞大,而创建这些军队时却没有旧有的组织基础可以凭借;军队的费用浩大;再加上指挥这些军队的方法以及进行战争的一般战术战略原则,——这一切对于欧洲的观察家来说都完全是新的东西。

脱离派的阴谋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便策划好了,并且得到布坎南政府的庇护和支持,这就使南部得到了先发制人的机会;只是凭着这个有利条件,南部才觉得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居住在南部土地上的奴隶和很大一部分维护联邦的白人使南部受着威胁,南部所拥有的自由居民又比北部少三分之二,但是它窝藏着许多无业的冒险家,进行袭击比北部更有条件些,所以南部唯有实行一个迅速的、大胆的、几乎是蛮干式的进攻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南军假如夺取了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华盛顿、巴尔的摩,或许再加上费拉得尔菲亚,就可以指望造成一种慌乱局面,趁这个时候通过外交和收买来使所有蓄奴州的独立得到承认。假如这开头的一次攻击失败了,至少在决定性的地点失败了,那末,在北部力量的发展同时,南部的地位一定会日益恶化。这一点是那些用真正的波拿

巴精神策划脱离阴谋的人正确估计到了的。他们就用这一类方法开始了战争。他们的冒险家匪帮袭击了密苏里和田纳西,而他们的比较正规的部队则向东弗吉尼亚进攻,准备对华盛顿来一个 coup de main (突然袭击)。由于这一步失利,南部的整个战局**从军事观点来说就是输了**。

北部是勉强地、无力地走上战场的,在它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本来也应当是这样。北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远非南部可比,因而需要多得多的时间才能使它沿着这条不平常的道路运动。用3个月之久的时间招募志愿兵是一个大错误,但这个错误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北部的政策是:起初只限于在所有决定性的地点进行防御,组织自己的部队,用小规模的战斗行动训练他们,不使他们冒险去决战;一旦组织充分巩固,同时又从军队中大体清除了叛卖分子,就最后转为奋力的、不停的进攻,首先夺回肯塔基、田纳西、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把平民变为兵士的过程在北部势必要比在南部长些。而一旦这个转变完成,就可以指望北军在兵员方面占有优势。

大致说来,除开那些大半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由于军事原因所产生的错误以外,北部是按上述原则行动的。在密苏里和西弗吉尼亚的小型战争,一方面保护了拥护联邦的居民,同时又使军队不冒大败的危险而习惯了野战勤务和射击。布尔河之耻²⁹⁵在某种程度上是用3个月时间招募志愿兵这一早期错误的结果。在地形不利、敌军人数仅仅稍逊于自己的情况下用未经训练的新兵从正面去攻击一个坚固的阵地,是做了一件蠢事。联邦军队在决定性时刻陷入慌乱(其原因迄未得到说明),并不能使大致熟悉人民战争的历史的人感到惊异。这样的事情在1792—1795年的法国

军队中经常发生,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蒙特诺特、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地的会战²⁹⁶中获得胜利。欧洲报纸嘲笑布尔河会战中的慌乱,它们的这种愚蠢只有一条辩解的理由,那就是一部分北美报纸事先说过大话。

随着马纳萨斯之败而来的6个月的喘息时期,北部比南部利用得好些。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北军兵员比南军得到更大补充方面。北军的军官也获得了更好的训练;军队的整顿和训练也没有遇到像在南部的那种障碍。混入军队中的叛徒和不可用的分子逐渐被清除出去,于是布尔河的慌乱时期便成为陈迹了。当然,对于双方的军队,是不能用大规模欧洲军队的标准,甚至也不能用从前美国正规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不错,拿破仑能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在补充队里训练出新兵营,第二个月行军,第三个月就投入战斗;但是他每一个营都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每一个连都有一些老兵,而在战斗的时候把新兵和老兵编在一起,可以说,把新兵装在老兵框子里。所有这些条件,在美国都是没有的。如果不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结果使大批有军事经验的人移居美国,组织联邦军所需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在参加战斗的军队的总人数中,死伤的比例很小(一般20人中有1人),这说明大部分的战斗,甚至最近在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战斗,主要是用火器而且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进行的,偶尔的白刃冲锋若不是在敌人的火力下迅速中止,便是在进入白刃冲锋之前敌人已经溃逃。在这个时候,由于布埃耳与哈勒克经过肯塔基向田纳西胜利推进,就比较顺利地开始了一个新的战局。

联邦方面夺回密苏里和西弗吉尼亚之后,便向肯塔基进攻,揭开了这一战局。在这里,脱离派控制着三个坚固的阵地,即三个营

垒：密西西比河上的哥伦布在左，博陵—格林居中，康伯兰河上的米尔—斯普林所在右。他们的战线由西到东长达 300 英里。这样长的战线使三个地方的部队无法互相支援，并且使联邦军有可能用优势兵力把他们各个击破。脱离派在兵力配置上犯了这个重大错误，是由于他们企图保持住所有阵地。如果只把坚固的中央营垒这一个地方选作决战的战场，并由主力加以扼守，这样做对于肯塔基的防守是利得多的。这样做就会把联邦军的主力吸引过来；如果联邦军不顾敌军如此强大的集中，企图继续前进，那末这样做又会置联邦军于危险的境地。

在上述情况下，联邦军决定依次攻击这三个营垒，把敌人从营垒里诱出来，迫使他们在开阔地上应战。这个符合军事学术的一切规则的计划被坚决迅速地实行了。约在 1 月中，15000 人左右的一支联邦军部队便向 10000 名脱离派军队驻守的米尔—斯普林斯挺进。联邦军巧妙地进行机动，努力给敌人造成一种这仅仅是一支薄弱的侦察部队的印象。佐利科弗尔将军立即上了圈套，从营垒里冲了出来攻击联邦军。他很快就发现：面对着他的是一支优势的敌军。他本人阵亡，他的部队则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同联邦军过去在布尔河一样。但是，对胜利的利用，这一次却完全不同。胜利者跟踪追击败军，一直到它溃不成军、狼狈沮丧、不剩一门野炮和一件辎重逃回米尔—斯普林斯营垒为止。这个营垒位于康伯兰河北岸，所以如果再一次失败，部队除乘少数汽船和帆船渡河而外便别无退路了。我们大体上看到，脱离派军队的所有营垒差不多都是设置在**敌方**的河岸上的。如果后方有桥梁的话，采取这种配置不仅是合乎规则的，而且也是非常实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营垒可以用作桥头堡，使指挥部能够随自己的便利把营垒里的

部队调向河的任何一岸,这样就保证了对河流的完全控制。但是,如果营垒位于敌方的河岸而后方没有桥梁,一旦战斗失利便没有退路,部队就不得不投降,或者是被歼灭和淹死,联邦军在波托马克河敌方河岸上的博耳斯—布拉夫就曾遭到这样的命运,当时是斯通将军的背叛行为把他们引到那个地方去的²⁹⁷。

被击败的脱离派军队逃回米尔—斯普林斯营垒之后立刻就明白了:必须击退敌人对他们的工事的攻击,否则很快就得投降。有过早晨的教训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抵抗力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当第二天联邦军发起进攻时就发现,敌军已利用夜间,抛弃营垒、辎重、火炮和各种储备品渡河而逃。这样一来,脱离派军队的战线的极右翼就被推回到田纳西,而居民大多敌视蓄奴党的东肯塔基就被联邦派收复。

与此同时(约在1月中),也开始了把脱离派军队赶出哥伦布与博陵—格林的准备工作。一个由白炮舰和装甲炮舰所组成的强有力的区舰队已经作好准备,同时到处扬言这支区舰队将护送一支大军自凯罗沿密西西比河开赴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但是,所有这些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佯动都只是迷惑敌人视线的机动。在决定的时刻,这些炮舰被调到俄亥俄河,由此开往田纳西河,沿该河上溯,到了亨利堡垒。这个地方,和康伯兰河上的唐纳尔逊堡垒一起,构成脱离派军队在田纳西的第二道防线。这个阵地是选择得很好的,因为在向康伯兰河背后退却时,该河能掩护正面,田纳西河则掩护左翼,而两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则有上述两个堡垒充分掩护着。但是,由于联邦军的迅速行动,在第一线的左翼与中央受到攻击以前,第二线就被突破了。

在2月的第一周,联邦军的炮舰驶抵亨利堡垒,经过短时间的

炮击，这个堡垒就投降了。但是守军逃往唐纳尔逊堡垒，因为讨伐军的陆上兵力不足以包围亨利堡垒。此后，炮舰又沿田纳西河回驶，入俄亥俄河，由此溯康伯兰河而上，到达唐纳尔逊堡垒。有一艘炮舰大胆地溯田纳西河上行，经田纳西州的正中心，驶过密西西比州的边缘，挺进到亚拉巴马州北部的弗洛伦斯，那里有许多沼泽和浅滩（名为 Mussel Shoals^①），阻止了它向前航行。单独一艘炮舰作了至少有 150 英里这种远程航行并接着折回而没有受到任何攻击，这一事实证明沿河地区多是拥护联邦的，如果联邦军推进到这里，会得到很多好处。

这支区舰队在康伯兰河的行动同哈勒克和格兰特两将军统率的陆上部队的动作配合起来了。博陵—格林的脱离派军队没有察觉联邦军的运动，他们仍然安静地留在他们的营垒里；而唐纳尔逊堡垒在亨利堡垒陷落一星期之后，就被 4 万联邦军从陆地一边包围起来，同时在沿河一边又受到强有力的炮舰区舰队的威胁。像米尔—斯普林斯营垒和亨利堡垒一样，唐纳尔逊堡垒也是背靠着河，而没有桥梁以备退却。它是联邦军迄今所攻击的要塞中的最坚强的一处。它的工事构筑得极为周到，而且这个要塞本身也很大，足以容纳它的 2 万守军。在攻击的第一天，炮舰压制了朝河的炮台的炮火，并轰击了内层工事，而陆上的部队则逐退了敌军的前哨，并迫使敌军主力退到他们堡垒的火炮射程以内去寻找掩蔽。第二天，炮舰因为在前一天遭受了严重损失，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而陆上的部队则与企图突破联邦军右翼以打通一条退向纳希维耳的路线的守军进行长久的战斗，有几处战斗十分激烈。但是，

^① 马斯耳—朔尔斯（介壳滩）。——编者注

由于联邦军右翼随后向脱离派军队左翼奋力进攻，联邦军左翼也得到大量增援，最后就取得了胜利。有一些外围工事被攻占。被迫转入内围防线的守军既没有退却的机会，又显然不能抵挡次日早晨的攻击，所以就在第二天无条件投降。

随着唐纳尔逊堡垒的陷落，敌人的火炮、辎重和各种军用物资都落入联邦军之手；脱离派军队 13000 人在堡垒被攻占的当天投降；第二天又有 1000 人投降；并且当胜利者的先头部队一出现在康伯兰河上游的一个城市克拉克斯维耳城下时，该城就立刻开门投降了。在这里也储存着为脱离派军队准备的大量物资。

在攻占唐纳尔逊堡垒时，只有一件事情令人不解：弗洛伊德将军带着 5000 人在炮击的第二天逃走了。逃走的这伙人为数如此之多，在夜间乘汽船溜走是不容易的。联邦军稍有防范他们就逃不了。

唐纳尔逊堡垒投降后 7 天，纳希维耳被联邦军攻占。这两个地方相距约 100 英里，联邦军在一年中最不利的季节里沿着非常坏的道路每日行军 15 英里，这给他们增光不少。在接到唐纳尔逊堡垒陷落的消息后，脱离派军队便撤出了博陵—格林；一星期后，他们放弃了哥伦布，撤退到南边 45 英里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小岛上。于是肯塔基州便被联邦完全收复了。至于田纳西，脱离派军队只有进行一次大会战并赢得这次会战才能保得住。据说他们确实已为此目的而集中了 65000 人。不过，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联邦军拿出更优势的兵力来对付他们。

从索美塞特前进到纳希维耳的肯塔基战局的指挥，是值得大大赞扬的。收复这样广大的一片领土，在仅仅一个月內从俄亥俄河进展到康伯兰河，像这样的毅力、坚决和迅速是欧洲正规军队很

少达到的。例如，可以拿这一点比较一下 1859 年联军从马振塔到索尔费里诺的缓慢的前进²⁹⁸——当时既没有追击退却的敌人，也完全没有试图截断掉队的敌人或者迂迴和包围全部敌军。

哈勒克，特别是格兰特，提供了坚决的军事指挥的优秀范例。他们根本不管哥伦布或博陵—格林，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的地点亨利堡垒和唐纳尔逊堡垒，向这两个地点发动迅速而猛烈的攻击；这样就使哥伦布和博陵—格林陷入无法防守的境地。然后，他们立刻向克拉克斯维耳和纳希维耳进军，不使退却的脱离派军队有时间在北田纳西取得新阵地。由于这次迅速的追击，在哥伦布的脱离派军队同他们的中央和右翼的联系便完全被切断了。英国报纸批评这次行动是枉然的。对唐纳尔逊堡垒的攻击即使失败，在博陵—格林的脱离派军队也由于受到布埃耳将军的牵制，仍然派不出足够的兵力使唐纳尔逊的守军能够进入开阔地，追击被击败的联邦军，或者威胁他们的退却。另一方面，哥伦布又隔得这样远，完全不可能干扰格兰特的行动。事实上，在联邦军肃清了密苏里的脱离派军队以后，哥伦布对于脱离派军队来说便丧失了任何意义。该地的守军为了避免不光荣地放下武器的危险，势必要匆忙撤退到孟菲斯或阿肯色。

由于廓清了密苏里和收复了肯塔基，战场就大为缩小，因而各军团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沿着整个战线协同动作，为取得一定的结果而努力了。换句话说，战争现在才开始带有**战略**的性质，而南部地区的地理形势就有了新的意义了。现在，寻找各植棉州的致命弱点，就是北军将领的任务。

直到占领纳希维耳之前，在肯塔基的军团和在波托马克河上的军团之间还不可能在战略上一致。他们彼此相距太远了。他们

在同一正面上,但是他们的作战线却完全不同。只是在胜利地进入田纳西以后,肯塔基军团的军事行动才对整个战场起作用。

麦克累伦指使下的美国报纸极力鼓吹“大蛇”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军队应摆开广大的阵线来包围叛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窒息敌人。这完全是儿戏。这是1770年左右在奥地利发明的所谓“封锁线体系”²⁹⁹的重复;在1792—1797年间,人们曾经十分顽固地采用这种体系来对付法军,结果总是失败。在热马普、弗略留斯,特别是在蒙特诺特、密雷栖摩,德果³⁰⁰、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地的会战中,这个体系都曾被打烂。法军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把这个“大蛇”切成两段。接着,这条“大蛇”的各段便被——切碎。

在人口稠密并且或多或少地实现了集权制的国家,总有这样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一经敌人占领,全国的抵抗就要停止。巴黎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各蓄奴州却没有这种中心。它们人口稀,大城市很少,而且都在沿海一带。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各蓄奴州是不是仍然有一个军事的重心,攻占了它就可以摧毁它们抵抗力量的脊骨呢?或者是:它们是否像1812年的俄国那样,不把它们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块地区占领,一句话,不把它们整个外省地区占领,便不能征服它们呢?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脱离派占有的、包括大西洋沿岸的漫长地带和沿墨西哥湾的漫长的沿海区这一片领土的地理。当同盟军握有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时候,全部地区曾是一大块紧密相连的土地。随着这两个州的丧失,在他们的领土内便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把大西洋北部沿岸各州和墨西哥湾沿岸各州分在两边。从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到得克萨斯、路易西安纳、密西西比,甚至部分

地到亚拉巴马的直接通路，都经过现时已为联邦军占领的田纳西。在联邦完全征服田纳西以后，联系蓄奴州这两部分的**仅有的**道路便经过乔治亚。这说明，**乔治亚成了脱离派地区的锁钥**。乔治亚一旦丧失，南部同盟便被切成彼此失去一切联系的两部分。而脱离派军队再夺回乔治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联邦军的作战力量将集中于一个中心阵地，而被分割成两个营垒的敌军则很难聚集足够的兵力来作一次联合的攻击。

为了采取这一行动，是不是需要征服整个乔治亚以及佛罗里达海岸呢？根本不需要。在一个交通（特别是远地间的交通）大半是依靠铁路而不是依赖公路的国土上，占领铁路便够了。墨西哥湾沿岸各州与大西洋沿岸各州之间最南面的铁路线经过米勒吉维耳附近的梅肯和戈登两地。

把这两个地点占领，就可以把脱离派地区分成两部分，而使联邦军部能够予以各个击破。同时，从上面所说还可以看出，任何南部共和国不掌握田纳西便不能生存。没有田纳西，乔治亚的首府便处于距边境仅有 8 日或 10 日的行程之内；这样，北部将经常有一个拳头放在南部的头上，南部在极小的一点压力下便得后退；否则，它就要在只打一次败仗就永无胜利之望的条件下重新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

波托马克河不是战场上最重要的阵地。拿下里士满，使波托马克河一线的军队进一步向南推进（由于有许多河流横断行军线，这一推进是有困难的），是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的。但从纯粹军事观点来看，却不解决**任何问题**。

战局的结果全系于目前驻在田纳西的肯塔基军团。一方面，

这个军团离决定性的地点最近,另一方面,它又占领着脱离派的国家无此即不能生存的一片疆土。因此,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小的军事行动,从所有其他军团中抽调力量来加强这个军团。它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应当是田纳西河上游的恰塔努加和多耳顿,即整个南部最重要的铁路中心。占领它们以后,脱离派诸州东西两部分的联系就将仅限于乔治亚州的一些联络线。以后的任务应当是夺取阿特兰塔和乔治亚州,以切断另一条铁路线,最后则是攻占梅肯和戈登,破坏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最后联系³⁰¹。

如果不这样做而采取“大蛇”计划,那末,即使在单个的地方甚至在波托马克河上都取得胜利,战争仍然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这也就会给财政困难和外交阴谋大开方便之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62
年 3 月

摘要载于 1862 年 3 月 14 日“郎卡郡
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 80 期,全文
载于 1862 年 3 月 26 日和 27 日“新
闻报”第 84 号和第 8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并
根据“郎卡郡和柴郡志愿
兵杂志”校对过

卡·马克思 国际性的米勒斯案

1862年4月28日于伦敦

法国在墨西哥的行动成了此间外交界的主要话题。人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路易·波拿巴恰好在他允诺减少军队的时候增加了远征军,同时又在英国向后撤的时候准备进军。这里的人们都很清楚地知道,远征墨西哥³⁰²的发动者是圣詹姆斯内阁而不是土伊勒里内阁;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路易·波拿巴愿意在英国的盾牌庇护下实行他的各种企图,特别是实行他在海外的冒险。如所周知,复辟的帝国还没有它的原版那样的本事,能够把法国军队驻扎在现代欧洲各国首都。作为一种 pis aller (下策),它才把法军开进了古代欧洲各国首都,即君士坦丁堡、雅典和罗马,除此之外还有北京³⁰³。因此,如果能到阿兹蒂克人^①的首都做一趟有戏剧效果的旅行,并且有机会 à la (仿效)蒙多邦做一番军事的考古采集^②,难道可以放过不干?但是,如果考虑到法国财政的现状和路易·波拿巴在墨西哥的进攻可能引起的与美国和英国的未来的严

① 阿兹蒂克人是居住在墨西哥的土著印第安人,以较高的古代文明著称。——译者注

② 指1860年蒙多邦指挥法国军队伙同英国军队攻占北京后抢掠并烧毁圆明园一事。——译者注

重冲突,那就立刻会看到,用上述的理由来解释他的举动,像各种英国报纸津津乐道的那样,是根本说不通的。我觉得,我可以把底细向诸位做个报道。

在 1861 年 7 月 17 日会议³⁰⁴的时候,曾必须解决英国债权人的要求问题,而英国的全权代表也同时要求向他提供墨西哥债务或罪行的清单,在这个时候,墨西哥的外交部长曾把对法国的债务确定为 20 万美元,即区区 4 万英镑。而法国现在所提出的账单即使这个小小的框子怎么也容纳不了。

在苏洛阿加和米腊蒙的天主教政府时期,曾经以瑞士的让·巴·热衷尔银行为中介订立了发行墨西哥国家债券 1400 万美元的协定。此项债券第一次发行时实付总数只有票面数值的 5%,即 70 万美元。所发行的全部债券很快就落入“显要的”法国人之手,其中包括皇帝的亲戚以及参预《haute politique》(“大政”)的人们。热克尔银行把这些债券以远较其原来的票面价格为低的代价卖给了这些先生们。

米腊蒙是在他握有首都的时候订立这笔债务的。后来,当他变成了不过是一个游击队首领的时候,他又通过他的所谓财政部长佩萨—伊—佩萨先生发行了票面价值达 3800 万美元的国家债券,这次的中介人又是热克尔银行,但是该银行这一回仅仅垫付了 50 万美元的区区之数,或每元 1—2%。瑞士的银行家又一次尽可能迅速地处理了他们在墨西哥的财产,而这些债券也就又一次落入那些“显要的”法国人手中,其中包括皇帝宫中的某些座上客,他们的名字将同欧洲交易所纪录上的米勒斯案³⁰⁵一样长久地流传。

胡阿雷斯总统的政府也就是拒绝承认这一笔至今连 420 万美元也没有付给的为数 5200 万美元的债务,理由是:一方面,它对此

事毫无所知,另一方面,米腊蒙、苏洛阿加和佩萨—伊—佩萨这几位先生并没有订借这样一种国债的宪法权力。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显要的”法国人却在决策的地方贯彻了相反的看法。至于帕麦斯顿勋爵,他已经及时地得到了某些议员的通知,说整个这件事会在下院引起极不愉快的质询。这里还有一个可虑的问题,即是否应当允许用大不列颠的海陆军来支持拉芒什海峡彼岸某些 rouge et noir^①的政客们的投机活动。因此,帕麦斯顿渴望抓住俄利萨巴会议³⁰⁶,以便从可能变成肮脏的国际性的米勒斯案的事件中脱身。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4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5 月 2 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 120 号

① 直译是:红与黑(一种轮盘赌的颜色),借以指赌徒。——编者注

卡·马克思 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

1862年5月16日于伦敦

在新奥尔良陷落³⁰⁷的最初消息到来的时候，“泰晤士报”、“先驱报”、“旗帜报”、“晨邮报”、“每日电讯”和英国的其他一些南部 nigger—drivers (奴隶主)的《sympathisers》(“同情者”)曾经从战略上、战术上、文学上、训诂学上、政治上、道德上积筑城学上证明，这个消息是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³⁰⁸及其 understrappers^①经常捏造的《canards》(“谎言”)之一。这些报纸说，新奥尔良的天然防御手段已经加强，不仅有新筑的堡垒，而且还有各种水下定时炸弹和装甲炮舰。其次，这些报纸还强调新奥尔良人的斯巴达精神和他们对林肯的雇佣兵的刻骨仇恨。最后是：英国当年不是曾在新奥尔良城下吃了败仗，从而使它对美国的第二次战争(1812—1814年)得到了一个可耻的结局吗？因此，没有理由怀疑新奥尔良将成为第二个萨拉哥沙或“南部”的莫斯科³⁰⁹而名垂青史。此外，在新奥尔良还贮存有15000包棉花，很容易用来燃起一把不可扑灭的自焚之火，更不用说适当浸湿的棉花包在1814年曾经表明它比塞瓦斯托波尔的土质工事更能抵挡炮火这个事实了。所以，像

① 直译是：部下；这里是：应声虫。——编者注

白昼一样地明显，新奥尔良陷落乃是北方佬又一次吹牛。

两天以后，当最初的消息已随着来自纽约的轮船得到证实的时候，大多数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仍然坚持怀疑论。例如“旗帜晚报”的怀疑态度就是这样坚不可摧，以致使它在同一号报纸上先在一篇社论中白纸黑字地证明这个半月城³¹⁰牢不可破，而在“最后消息”栏内又用大号字体报道了这个牢不可破的城市的陷落。相反的，一向认为审慎是勇敢之最大要素^①的“泰晤士报”则改变了腔调。它固然继续在怀疑，但同时却准备好应付一切变故，因为新奥尔良实在是一个《rowdies》（“无赖”）的城市，而不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这一回“泰晤士报”是说对了。新奥尔良是法国 bohème（浪人）的渣滓建立起来的，它是道地的法国罪犯移居地，而且在时代的转变中从来也没有忘过本。只是“泰晤士报”post festum（事后）才悟出这个差不多尽人皆知的事，未免令人遗憾。

不过，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终于使最不信的多马也相信了。怎么办呢？于是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现在又来证明：新奥尔良的陷落是同盟军的胜利和联邦军的失败。

它们硬说，新奥尔良的陷落使拉弗耳将军能够用他的部队去增援博雷加德的军队；博雷加德是需要增援的，因为，哈勒克将军在他的正面据说已经集结了 16 万人（显然的夸大！），另一方面，密契尔将军已经破坏了孟菲斯与恰塔努加之间的铁路，切断了博雷加德与东部的交通线，因而也切断了他同里士满、查理斯顿和萨凡那的联络。在这次突破以后（关于这次突破的战略上的必要性，我们在科林斯会战以前很久就已指出了^②），博雷加德控制下的科林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21—523 页。——编者注

斯除开与谋比耳和新奥尔良的铁路联络以外，已没有任何铁路联络。而新奥尔良陷落以后，博雷加德只剩下单独一条通到谋比耳的铁路，当然无法再使他的军队得到必需的给养，因此就退到了土珀洛去；按照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报刊的看法，拉弗耳的军队一到，博雷加德的补给能力自然就增加了。

另一方面，这些宣谕官则说，联邦军在新奥尔良将被黄热病消灭，而且，假如新奥尔良归根到底并不是莫斯科，难道它的市长不是一个布鲁土斯吗？只要读一读（参看“纽约报”^①）他给分舰队司令法腊格特的传奇剧式的勇敢的信就知道了。《Brave words, Sir, brave words!》（“豪语呵，先生，豪语！”）^②不过豪语是打不断骨头的。

而南部奴隶主的报纸对新奥尔良陷落的看法却不像它们的英国安慰者们那样乐观。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所搞的几段话中看出来：

里士满的“电讯报”³¹¹写道：

“我们曾指望装甲炮舰‘密西西比号’与‘路易西安纳号’拯救我们的半月城，两艘炮舰怎么样了呢？它们的作战效果原来却像玻璃制造的船一样。否认新奥尔良的陷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这个打击，同盟政府已经与西路易西安纳、得克萨斯、密苏里和阿肯色隔断了。”

诺福克的“日记报”³¹²指出：

“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它预示着社会各阶层的困苦，而更坏的是，它将威胁我们军队的供应。”

在阿特兰塔出版的“通报”³¹³这样埋怨：

① 指“纽约先驱报”。——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三场。非原句。——编者注

“我们曾经期望一个不同的结果。敌军迫近本来并不是意外之事，我们早就预见到这一点了，而且我们一再听到这样的保证：即使敌军绕过了杰克逊堡垒，可怕的炮兵火力也将迫使他们退却或歼灭他们。这一切结果都成了自欺，像每一次我们认为某个据点或某个城市有要塞工事足以保证该地安全时那样。看来，现代的发明已经使要塞工事无益于防御了。装甲炮舰可以摧毁它们，或者安然驶过它们。我们担心孟菲斯也遭到新奥尔良的命运。用空洞的希望来安慰自己难道不是愚蠢吗？”

最后，彼得斯堡的“快报”³¹⁴说：“新奥尔良被联邦军攻陷乃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和最致命的事件。”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5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5 月 20 日“新闻报”
第 138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1862年5月18日于伦敦

美国报纸现在 *in extenso* (全文) 发表了美国和英国今年4月7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这个重要文件的要点如下。双方互有检验权,但双方的检验权只能由缔约国之一所特别赋予此项权利的战舰行使。缔约国双方时时互相提供关于被指定来监视买卖黑人的那一部分海军的详细统计资料。搜查权只能对商船行使,行使地区为距非洲海岸200英里以内,北纬32度以南,以及距古巴海岸30海里以内。无论是美国巡洋舰检查英国船只,或者是英国巡洋舰检查美国船只,都不得在英国或美国的领海内(即距海岸3海里之内)进行;也不得在其他国家的港口或属地附近进行。

被拘留的船只由混合法庭审判,混合法庭设在塞拉勒窝内、卡普施塔德和纽约,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在船只被判有罪时,如不需过多的费用,应将船上人员交予该船旗帜所表明的国家的司法当局。此时,不仅船上人员(船长、大副等等),而且船只的所有者,都要受到依该国法律所判的惩罚。被混合法庭宣告无罪的商船,由前往搜捕的战舰所属的国家于一年内给予赔偿。不仅被掳黑人的存在构成拘捕船只的法律根据,而且船上如有贩卖黑

人的特殊装置、手铐、锁链、其他防范黑人的器械以及显然超过船上人员所需要的食物，也都构成拘捕的法律根据。被发现有此等可疑物件的船只，应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且，即使该船被宣告无罪，亦不得要求任何赔偿。

逾越条约所授权限的巡洋舰指挥官应由本国政府处罚。如果缔约国一方的巡洋舰指挥官怀疑缔约国另一方一艘或多艘战舰护送下的某艘商船载有黑人，或参预贩卖非洲奴隶，或有贩卖奴隶的设备，则应将其怀疑通知护航舰的指挥官，同他一起对所怀疑的船只进行搜查；如果根据本条约该商船属于有嫌疑的船只之列，则应将该船带到一个混合法庭的所在地。被判有罪的船上发现的黑人，应交由进行搜捕的国家的政府处理。这些黑人应立即予以释放，他们人在哪国领土上就由哪国政府保障他们的自由居留权。这个条约满十年始可停止生效。自缔约国一方声明停止生效之日起的一年内，这个条约仍继续有效。

这个英美条约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它是对买卖黑人的致命打击。参议员萨姆纳最近提出的法案将更增强这个条约的效力，该法案要求取消 1808 年法律中有关在美国沿海地区买卖黑人的条款，在美国各港口之间运送奴隶也将以犯罪论处³¹⁵。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各个繁殖黑人的州 (border slave states) (边界蓄奴州) 同消费黑人的州 (真正的 slave states (蓄奴州) 之间的买卖大部分就将陷于瘫痪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5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5 月 22 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 140 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美国战场的形势

正如现在得到的详细报道所表明的,新奥尔良被拿下乃是舰队所建树的一个几乎无比勇敢的大功。联邦军的舰队是完全由木质舰船组成的:战舰约6艘,每艘有炮14—25门,还有许多由炮舰和白炮舰组成的小舰队予以支援。在这支舰队前进的路上有两个堡垒,封锁着密西西比河的航道。在这两个堡垒的100门炮的射程以内,河流被一道坚强的浮栅封锁着,浮栅的后面则布有水雷、纵火船和其他破坏物。因此,要从堡垒之间通过,就必须克服这第一道障碍。过了两个堡垒,还有一条由装甲炮舰组成的第二道很厉害的防线,在这些装甲炮舰中有装着铁撞角的“马纳萨斯号”和威力强大的浮动炮台“路易西安纳号”。联邦军在对完全控制着这条河流的两个堡垒轰击了6天而无效果以后,便决定冒着堡垒的炮火,分三路冲过浮栅,沿河而上,试寻《Ironsides》(“铁边舰”)一战。这个勇敢的尝试获得了成功。而一当小舰队出现在新奥尔良城下,胜利自然就决定了。

博雷加德这时在科林斯便没有什么可以防守的了。他在那里的阵地,只有在它还掩护着密西西比和路易西安纳、特别是新奥尔良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战略上他现在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次失利的战斗就会使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散成小股游击队,别的出路是

没有的,因为在他的军队的后方没有一个作为铁路线和补给线中枢的大城市,无法再把大量军队掌握在一起指挥。

麦克累伦无可置辩地证明了,他是一个军事上无能的人,只是机缘凑巧才升到高位;对他来说,作战并不是为了击败敌人,而只是为了避免自己被敌人击败,从而丧失所僭取的权势。他的举动像那些老朽的所谓“机动将军”,他们怯于作战,避免采取任何战术决定,却强辩说是用战略迂迴的办法迫使敌人放弃阵地。同盟军总是从他面前逃脱,因为他从来不在决定性的时刻攻击他们。因此,虽然同盟军的退却计划在10天以前就已经宣布,甚至纽约的报纸(例如“论坛报”)也已经刊载,但他仍然让他们从容地从马纳萨斯退到里士满。随后,他分兵从同盟军翼侧作战略迂迴,而自己则带着一个军到约克镇前面构筑工事,一直借口进行要塞战来拖延时间,逃避会战。及至他集中了超过同盟军的兵力以后,他又让他们从约克镇退到威廉堡并从该地再往后退却,结果还是没有迫使他们应战。用这样可怜的方式进行战争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说,威廉堡附近的后卫战并没有造成联邦军的第二个布尔河,而是以同盟军后卫部队的失败而告终,那与麦克累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在24小时的倾盆大雨之下,在十分泥泞的路上行军约12英里以后,海因策耳曼将军(原籍德国,但生于宾夕法尼亚)率领下的8000联邦军士兵到达威廉堡近郊,在那里只碰到敌人的兵力薄弱的前哨。但是,当后者确信到来的军队数量不多的时候,便从威廉堡的精锐军队中调来援军,逐步把自己的兵力增加到25000人。到上午9时,战斗趋于激烈;到12时半,海因策耳曼将军发觉战斗的进展对敌人有利。他接连派遣传令兵到卡尼将军处,卡尼将军

在他的后方 8 英里，但因道路完全被雨“溶化”，只能极其缓慢地向前推进。海因策耳曼整整一小时没有得到援军，而第七和第八泽稷团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弹药，开始向道路两边的森林里逃跑。于是海因策耳曼命令孟尼尔上校率领一个宾夕法尼亚骑兵连占领森林两侧的边缘，用开枪射击来威胁逃兵。这才使兵士停止逃跑。

此外，一个马萨诸塞团的榜样对于秩序的恢复也起了作用，这个团同样用尽了它的弹药，但是却装上刺刀，镇静地等待着敌人。终于，由贝里准将（缅因州人）率领的卡尼将军的前卫部队在远处出现了。海因策耳曼的军队用雷鸣般的欢呼“万岁”声迎接了援救者，他命令团的乐队高奏“北方人之歌”³¹⁶，并把新来的贝里的部队在他的疲惫的部队前面配置成差不多长达半英里的一线。贝里的一旅人先用步枪射击，随即投入了白刃冲锋，把敌人由战场上赶到了他们的战壕里，其中最大的一个战壕经过反复争夺，最后落入联邦军队手中。于是战场上的均势又恢复了。贝里的到达拯救了联邦军队。下午 4 时，随着詹姆森和伯尼的两旅人到达，联邦军的胜利就决定了。晚间 9 时，同盟军开始从威廉堡向里士满方向退却，次日仍继续后退，而海因策耳曼的骑兵则猛力追击。这次战斗之后的次日上午 6 时至 7 时，海因策耳曼便已经用詹姆森将军的部队占领了威廉堡。逃敌的后卫部队在半小时以前才从另一端撤出该城。海因策耳曼打赢的这场会战是一场道地的步兵战。炮兵几乎没有参加。步枪射击和白刃冲锋起着决定作用。假如华盛顿的国会要表示感谢的话，那它应该感谢的是把北方人从第二个布尔河拯救出来的海因策耳曼将军，而不是那个照例回避“战术决定”并且第三次放走了数量上居劣势的敌人的麦克累伦。

弗吉尼亚的同盟军所处的地位比博雷加德的部队走运一些，

首先,这是因为他们的对手不是哈勒克,而是麦克累伦;其次是因为,在他们的退却线上有许多从山上流入海洋的河流。但是,为了使这支军队不致不战而溃,它的将军们迟早会被迫而接受一场决战,正如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和博罗迪诺曾经被迫作战一样,虽然这样做违反那些正确地判断了形势的俄国将军们的本意。不论麦克累伦的军事指挥多么不行,但同盟军由于不断退却,并且损失枪炮、弹药及其他军需品,同时还有许多小规模的后卫战失利,至少士气已经极端沮丧了,这种情况到决战那一天就会显示出来。

因此,可以做个总结:如果博雷加德或杰弗逊·戴维斯在决战中失败,他们的军队就会溃散。假如他们中间有一个赢得了一次决战——而这是完全无望的——,顶多也不过把他们的军队的瓦解推迟一下。他们甚至从胜利当中也无法取得一点点牢靠的好处。他们前进不了 20 英里就得停下来,再次等待敌人的攻击。

还需要估计一下游击战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惊异的是,正是在这个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中,居民很少参加,或者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参加。1813 年,法军的交通线常常被科隆布、吕措夫、车尔尼晓夫以及其他 20 个志愿兵领袖和哥萨克首领所破坏,受到他们不断的攻击。1812 年在俄国,法军所到之处找不着一个居民;1814 年,法国农民曾武装起来,杀死联军的巡逻兵和掉队者。但在这里,却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事。人们对大规模会战的结局都听之任之,以《*victrix causa diis placuit, sed victa Catoni*》(“**胜者得到诸神赞助,败者得到卡托欢心**”)^①的话来安慰自己。进行海战的大话正在像轻烟一样消散。不过,大概无需怀疑,《white trash》(“白

^① 语出琉善“谐趣歌”。——编者注

种废物”)——这是种植场主自己对“白种贫民”的称呼——会出来一试身手,打游击抢劫。但是,这种尝试会立刻把富有的种植场主变成**联邦派**。这些种植场主甚至会向北方人的军队求援。关于在密西西比河上烧毁棉花等等传闻,完全是两个肯塔基人传出的,这两个人据说已来到路易斯维耳,但肯定不是从密西西比河来的。在新奥尔良烧起一场火是不难的。新奥尔良的商人们之所以怀抱着狂热情绪,是因为他们曾经被迫用现款换了南部同盟所发的许多债券在手里。新奥尔良的大火也会在其他城市里重演,肯定还会烧掉一些什么;但是,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举动只能使种植场主与《white trash》之间的裂痕达到顶点,那时也就是 *finis seces- siae!* (脱离运动的末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62年5月23—25日
载于1862年5月30日“新闻报”
第14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英国的人道与美国

1862年6月14日于伦敦

人道在英国像自由在法国一样，现在已经成了 traders in politics (政治商人) 的一种输出品了。我们回想起，有一年，沙皇尼古拉曾命令自己的兵士鞭打波兰妇女，而帕麦斯顿勋爵则认为某些议员对这件事情表示道义上的愤慨“与政治无关”。我们回想起，大约 10 年前，伊奥尼亚群岛发生叛乱³¹⁷，该地的英国总督利用这个机会下命令鞭打了不少的希腊妇女。那时，当政的帕麦斯顿和他的辉格党同僚们说：probatum est (可以这样做)。仅在几年以前，在议会里还根据官方的文件证明，印度的收税官对莱特^①的妻室采取了难以细说的十分丑恶的强迫手段。不错，帕麦斯顿及其同僚没有敢为这些丑恶的事辩护，但是，如果有一个外国政府敢于公开对这些英国人的丑行表示愤慨，而且毫不含糊地暗示帕麦斯顿及其同僚如不立即否定印度的收税官的行为，它就要进行干涉，那他们该会发出怎样的一阵叫嚷。然而，英国贵族和他们的大臣们却非常热心地监督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北方人的“人道”，比监察官卡托监督罗马公民的德行更为热心！

① 农民。——编者注

新奥尔良的女士，黄皮美人，俗不可耐地用珠宝装饰着，除了不 *in natura* (活生生) 吃掉自己的奴隶以外完全和古代墨西哥人的妻子一样——就是这些女士，这一次（上一次是查理斯顿的港口）成了英国贵族们炫示他们的人道的借口。郎卡郡正在挨饿的英国妇女（不过她们既不是女士，也没有占有奴隶）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一次议会演说中被荣幸地提到过；爱尔兰的妇女由于绿色艾林^①的小块租佃土地日益加剧的集中化而半裸着身体流落街头，走到哪里被哪里驱逐，就像鞑靼人洗劫了她们的家乡一样，她们的哭声直到现在只从上院、下院和女王陛下的政府那里唤起了唯一的一声回响——关于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的说教³¹⁸。但这里是新奥尔良的女士们！这，确实应当另作别论。这些女士们很有教养，所以不会像奥林帕斯山上的女神们那样参加扰攘的战事，也不会像萨贡的妇女们那样纵身跳入烈火堆中³¹⁹，她们发明了一种新颖而又安全的表现英雄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只能由女奴隶主发明，而且，还得在这样的地方来发明，在这地方的居民中，自由人这一部分由以开小店为职业的人以及贩买棉花、糖或烟草的商人们所组成，他们不像古代的公民一样自己拥有奴隶。当这些女士们的丈夫从新奥尔良逃走，或者爬进她们的马桶间躲藏起来的时候，她们就冲到街上来，向胜利的联邦军队的脸上吐唾沫，伸舌头，或者普普通通学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样子，一面做“不雅观的姿势”，一面破口辱骂。这些泼妇们以为她们可以撒野而“不受惩罚”。

这就是她们的英雄主义。巴特勒将军出了一个布告，警告她们说，如果她们仍然像荡妇那样不自检束，就要用对待荡妇的办法

^① 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来对待她们。巴特勒虽然有法律家的才能,但是看来他并没有好好地研究过英国的 statute law³²⁰。否则,他一定会仿效在卡斯尔里时期强加于爱尔兰的法律³²¹,根本禁止她们在街上出现。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女士们”的警告,引起了卡纳尔文伯爵、约·华尔希爵士(此人在爱尔兰曾经扮演非常可笑可憎的角色)、以及一年以前就要求承认南部同盟的格雷哥里先生如此严重的不满,结果,这位伯爵在上院,这位骑士和这位《without a handle to his name》(“名上无衔”)的人在下院,都质问政府,问它打算对被蹂躏的“人道”采取什么步骤。罗素和帕麦斯顿把巴特勒大骂一场,他们两人都表示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否定巴特勒的行为;而心肠软到十分的帕麦斯顿——他曾经背着女王,也不告诉他的同僚,完全出于“人道的”赞美之情而承认了1851年的十二月 coup d'état³²²,当时有一些“女士”被枪杀,另一些则被朱阿夫兵强奸——就是这位心肠软到十分的子爵,直截了当地把巴特勒的警告称为“可耻的事情”。可不是吗,这些女士,而且还是占有奴隶的女士,竟然不能不受惩罚地向普通联邦军士兵——农夫、手艺人等等下贱东西发泄一下她们的狂怒和愤恨!这真是“可耻的事情”!

这种人道滑稽剧在此间公众中欺骗不了任何人。它的目的一部分在于挑起,一部分在于支持主张干涉、首先是由法国进行干涉的情绪。果然,在最初的戏剧表情做过以后,上下两院的这些卫护人道的骑士们像听到口令一样一齐丢开了他们的动人的假面具。他们的慷慨陈词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质询的前奏:法国皇帝是否已向英国政府建议实行仲裁,这个建议是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已为英国政府所同意和接受。这时,罗素和帕麦斯顿两人宣称,他们对这样的建议毫无所知。罗素宣称,他认为现在非常不宜于实行

任何仲裁。帕麦斯顿更为谨慎与保留,仅仅说英国政府目前无意实行仲裁。

计划是这样的:在英国议会休会期间,法国将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到秋天,如果墨西哥的局面稳定了,它就开始干涉行动。美国战场上的沉寂又使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的做干涉买卖的人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这个沉寂本身,乃是北部军事指挥方面的战略错误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肯塔基的军团在田纳西奏捷之后不醉心于向南沿密西西比河直下,而是迅速向乔治亚的铁路中心挺进,那末,路透社之流现在是不能拿“干涉”和“仲裁”的传言做投机勾当的。不管怎样,欧洲希望得最热切的事情,莫过于让 *coup d'état* 的法国作一番尝试,去“恢复美国的秩序”,同时也在这个国家里“拯救文明”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6 月 1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6 月 20 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 168 号

弗·恩格斯 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

约三个半月以前，即 1862 年 3 月 8 日，“梅里马克号”同“康伯兰号”及“国会号”这两艘巡航舰在汉普敦湾进行的海战结束了木质军舰的漫长时代。1862 年 3 月 9 日，“梅里马克号”同“蒙尼陀号”在同一水域进行的战斗开创了装甲舰在海上进行战争的时代。³²³

从那时起，华盛顿的国会就大量拨款来建造各种装甲舰和完成斯蒂文斯先生的巨大的铁的浮动炮台的建造（在纽约附近的霍布根）。另外，埃里克森先生也快要造好 6 艘与“蒙尼陀号”同型的军舰，不过排水量更大些，而且有两座旋转炮塔，每座都装有两门巨炮。还有一艘不是埃里克森建造、而且结构也不同于“蒙尼陀号”的装甲舰“加利纳号”也下水了。“加利纳号”配属于“蒙尼陀号”，最初是负责监视“梅里马克号”，后来就负责制压叛乱分子在詹姆士河岸上的一座座炮台。除里士满地区的一段 7—8 英里长的河流外，这项任务各处都已完成。在詹姆士河上活动的第三艘装甲舰是“班加卢奇号”，这艘装甲舰最初叫做“斯蒂文斯号”，是以它的发明者和当时的所有者的名字命名的。

第四艘装甲舰“新铁边号”正在费拉得尔菲亚建造，大概过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造好起航。“万德比特号”和另一艘大蒸汽舰

已改装成“撞击舰”。其他许多木质军舰，例如“罗阿诺克号”，都将改装成装甲舰。此外，联邦政府还在俄亥俄河上造好了四五艘铁皮炮艇，这几艘炮艇在亨利堡垒、唐纳尔逊堡垒附近，在匹兹堡—兰丁，都有不小的战功。最后，埃勒特上校和他的同僚一起，在辛辛那提和俄亥俄河上的其他地点装备了各种“撞击舰”。为此利用了旧有的蒸汽舰，把舰首部分弄尖，包上了铁甲。埃勒特并没有用大炮来装备这些军舰，而是为它们配备了西部所富有的精锐射手。然后，埃勒特亲自率领了这些“撞击舰”以及全体舰上人员来为联邦政府效劳。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些临时装就的“撞击舰”第一次作战的情况。

在对立的营垒中，同盟派也并没有把时间白白放过。他们开始在诺福克建造新的装甲舰和改装旧的军舰。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在这里开始的工作，诺福克就被联邦军队占领了，这些军舰全部被毁。后来，同盟派在新奥尔良建造了3艘强大的装甲“撞击舰”；在第四艘——体积大装备好的一艘——快要造成时，新奥尔良却被攻陷了。据联邦海军军官的鉴定，这艘军舰如果来得及完成战斗准备，对联邦军的整个舰队是最严重的危险，因为华盛顿政府没有可能用威力相当的手来对付这个怪物。这艘军舰价值200万美元。大家知道，是叛乱分子自己把这艘军舰毁掉了。

在孟菲斯，同盟派造好的“撞击舰”不下8艘，每艘装有4—6门大口径炮。6月6日，就在孟菲斯附近的密西西比河上发生了第一次“撞击舰会战”。顺密西西比河而下的联邦军的舰队虽然有5艘装甲炮舰，但决定战斗结局的并不是这些炮舰，而是埃勒特上校的两艘“撞击舰”——“王后号”和“国王号”。敌人的8艘“撞击舰”4艘被击毁，3艘被缴获，1艘逃跑了。先是联邦军舰队的炮舰向叛

乱分子的军般进行了一些时候的猛烈炮击，后来“王后号”和“国王号”就直插敌舰阵内。炮舰几乎完全停止了射击，因为埃勒特上校的“撞击舰”同敌舰搅在一起，炮手们无法分清敌我双方的军舰。

上面已经指出，埃勒特的“撞击舰”没有大炮，但舰上却有许多优秀射手。这些“撞击舰”的蒸汽机和汽锅上面盖的只是木头。“撞击舰”的全部装备其实就是功率强大的蒸汽机和弄尖了的舰首部分，舰首部分是用柞木制成，外面包上了铁板。数以千计的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从孟菲斯跑到密西西比河的峭岸上，隔着一定距离（有些地方最多不过半英里）屏住气来观看“撞击舰会战”。会战大概不超过1小时。叛乱分子损失了7艘军舰和100人，其中淹死的约40人，而联邦军只有1艘军舰受损较重，只有1人受伤，没有死亡。

除了在孟菲斯海战之后保全下来的一艘装甲“撞击舰”以外，同盟派目前在谋比耳区大概还有几艘“撞击舰”和装甲舰。在维克斯堡还有少数炮舰，它们同时受到沿河而上的法腊格特舰队和顺流而下的戴维斯舰队的两面威胁。除了这些军舰以外，同盟派就再没有舰队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2年6月底
载于1862年7月3日“新闻报”
第18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中国记事

在桌子开始跳舞³²⁴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①。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

① 指太平天国革命。——译者注

信摘录如下^①。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結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

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饷，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饱喝足；如果穷，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個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么不喜歡？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们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

^① 夏福礼此信发表在1862年6月17日“泰晤士报”上，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译者注

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太平军禁止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个城市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 *carte blanche*（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种妙计的效用。他们吓人的方法，首先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现大批人马。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惊人的谣言，到处放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那末马上就由别人来代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有过的情况一样，直到已经发生的惊惶现象能帮助叛乱者获得胜利。

主要的吓人方法，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一种奇效。因此，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给予叛乱者们的的好处，是线膛炮也比不上的。此外，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成万的太平军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荡个干干净净，像不久前在上海

发生过的情形那样。

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 (nothingness) 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 in persona (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6 月
下半年—7 月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载于 1862 年 7 月 7 日“新闻报”
第 185 号

卡·马克思 一场丑剧

现在伦敦正在演一场丑剧，一场只有在旧式贵族传统长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度里才能发生的典型丑剧。Corpus delicti (犯罪构成、物证) 是议会委员会的蓝皮书，和其中的一份报告，——关于修筑太晤士河堤岸，并在市中心沿河岸修一条新马路把韦斯明斯特桥同黑袍僧桥接通的报告³²⁵。这项计划开支很大，但一举可以解决好几项任务：美化伦敦市容，浚清太晤士河，改善卫生条件，造成一条漂亮的人行道，和一条新的交通干线。这可以解决滨河街、小河街和其他几条与太晤士河平行的街道车马过多等问题——这种车马拥挤的现象已越来越危险，使人想起尤维纳利斯的一篇讽刺诗，写一个罗马人出门先立遗嘱，因为他很可能被车轧死，或者被什么东西砸死^①。可是，就在这个要作这种变化的地方——太晤士河北岸、韦斯明斯特以东和白厅的尽头——有几家大贵族的市内府邸，包括一些宫殿和一直伸展到太晤士河的花园。这些老爷们总的来说当然欢迎这项计划，因为这项计划靠国家的钱实现之后，可以改善他们的《mansions》（“别墅”）附近的环境，因而也就提高这些“别墅”的价值。但只有一件事使他们担心。

①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三篇。——编者注

他们要求，在新建街道预定要紧靠着他们的地产走过从而使他们同《misera contribuens plebs》（“纳税的可怜虫”）相接触的地方，原定的建筑工程必须中断一下。这些《fruges consumere nati》（“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①的超凡绝俗的奥林帕斯仙境，决不能被忙于俗务的小民的目光、喧声以及呼出来的浊气所污染。在这些养尊处优的贵人们当中，为首的乃是一位最有钱、最有势、因而在提出“小小的”要求时比谁都厉害的巴克鲁公爵。结果怎样呢？议会委员会竟按照巴克鲁公爵的要求拟定了报告！新的建筑工程必须在那些可能打扰巴克鲁公爵的地方中断一下。下院的这个委员会里面有公爵的亲戚罗伯特·蒙台居勋爵，还有伦敦韦斯明斯特区的议员约翰·雪莱爵士。后者现在就该设法做一套铠甲，好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保护自己，防备那些专为他准备的、用烂苹果和臭鸡蛋制成的阿姆斯特朗式炸弹的袭击。

就连“泰晤士报”也这样评论委员会的报告：

“这本蓝皮书是一座迷宫。报告本身只占 8 行。其余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各种证人和鉴定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毫无意义和偏颇。既没有索引，又没有分析，也没有论据。废话连篇，没有一个经得起核对的事实，没有一条信得过的判断。有时你好像就要听到真正权威的意见了，但委员会却突然插进来，拒绝听取任何与巴克鲁公爵的愿望不符的意见。这是一本篇幅很大、沉甸甸的 *suppressio veri*（掩盖真相）的书。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显然是要把事情弄乱，使议会根本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一问题。为此甚至抽掉了所有施工图纸，只答应 *post festum*（事后）才予以公布——大概是等议会辩论结束以后才公布吧。”

这件丑事使伦敦居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这位巴克

^① 贺雷西“书信集”。——编者注

鲁公爵，这位以个人怪癖同 300 万人的利益对立的大人物是什么人呢？这个独自一人要同整个伦敦决斗的巨人是什么人呢？回想任何一次议会斗争都不会想起这个名字。他高踞在上院，但很少参预上院的事务，像塞拉尔宫^①里的太监不参预宫闱的欢乐一样。他给委员会的回答，证明他大脑特别缺磷。那末，《that man Buccleuch》（“那个巴克鲁”）究竟是什么人呢？——伦敦居民这样放肆地发问。回答是：《merry monarch》（快乐的君主）查理二世同他最无耻最下流的情妇之一露西·帕森斯的私生子的后人。这就是《that man Buccleuch》！伦敦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位巴克鲁公爵是怎样弄到这座太晤士河上的“别墅”呢？因为伦敦人记得这所“别墅”占用的土地乃是国王的财产，早在八年以前就归皇家 lands and woods（土地森林）管理局所管。

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回答。这里的报刊碰到这种情况是不会客气的。为了不仅说明事情本身，而且说明英国报刊是用的什么语气来讨论这样微妙的问题，我把上星期六“雷诺新闻”上的两段话逐字逐句地摘录如下：

“巴克鲁公爵得到阻挠伦敦城市美化的特权，只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1854 年，公爵租下了蒙台居在白厅的住宅，而所采取的手法却很不正当，如果是一个穷人，那一定要成为旧堡^②被告席上的被告。但公爵大人的年收入为 30 万英镑，另外，他还有这样的功劳，即他是‘快乐的君主’的无耻的宠姬露西·帕森斯的后人。蒙台居的住宅是国王的财产，所以在 1854 年的时候就很清楚，这所住宅座落的那块地方是预定用来修建公用建筑物的。因此当时的财务大臣迪斯累里先生拒绝签署公爵的那份租赁契约。然而，d' une manière ou d' une autre（通过某种方式）契约还是签署了。迪斯累里先生很是

① 土耳其苏丹的后宫。——译者注

② 见本卷注 155。——译者注

愤怒，在下院直截了当地说，他的继任者**格莱斯顿**为了公爵的私人利益而牺牲社会利益。格莱斯顿先生用他特有的半讽刺半谄媚的口吻回答说，签署这个契约的确是不应当。然而，看来是有一些理由必须这样做。议会进行调查，——啊，糟糕！原来签署契约的不是别人，正是**迪斯累里先生自己**。

但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上面提到的那个手法，即露西·帕森斯的高贵后人的有刑事罪味道的、甚至应当在旧堡受审判的手法问题！迪斯累里先生说，他根本不记得契约是他签署的。但同时他承认这个签字的确是他的手笔。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诚实，任何人都不会有怀疑的。这个闷葫芦究竟怎样才能打开呢？原来，露西·帕森斯的高贵后人托一个代理人或朋友把租赁蒙台居住宅的契约偷偷地夹在一堆由大臣不阅读就签署的文件之中。这样迪斯累里先生就签署了这份文件，而对它的内容却一点也不了解！露西·帕森斯的后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弄到用个人怪癖对抗 300 万伦敦人的利益的特权的。议会委员会为他的厚颜无耻充当了百依百顺的工具。如果挡在路上的不是一个巴克鲁用欺骗方法所弄到的别墅，而是 1000 个工人的住房，这些住房马上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拆除，它们的主人就会被赶到街上去，连一文钱的补偿也得不到。”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7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7 月 11 日“新闻报”
第 189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
和同法国的联盟

1862年7月16日于伦敦

英国议会制度的最奇怪的发明之一是 count out (查数休会)。什么是 count out 呢? 如果下院到会议员不足 40 人, 便不能构成法定人数, 就是说, 不能构成一个有权做出决定的集会。如果某个无党派的议员提出一个动议, 这个动议使寡头政治的两派即 Ins 和 Outs (在朝派和在野派) 都同样不能接受, 那末, 这两派就达成协议, 使双方的议员在辩论那一天逐渐对消, alias (换言之), 就是溜之大吉。当座中的虚席达到必需的最大限度时, government whip (政府方面的督导员), 即被本届内阁委托负责监督议会纪律的一位议员, 便向事先为此目的指定的一个同伙使个眼色。这位同伙议员站了起来, 用十分和悦的声调请求 chairman (主席) 清查一下在场的议员人数。清查进行了。结果呢? 结果发现, 在场的不足 40 人。问题到此就算了结。讨厌的动议被取消了, 而两个政党, 在朝的和在野的, 也就无需投票反对, 避免了一次尴尬和丢脸的事情。

在昨天的会上, 用特别有趣的方式来了一个《count out》。罗·蒙台居勋爵曾经通知, 他将在这一天要求讨论最近的关于干涉

墨西哥问题的外交文件。他用下面一段话开始他的发言：

“关于墨西哥问题的最新的蓝皮书已在上星期六提交议院，所以议员们现在是能够讨论墨西哥问题的。我知道，执政党和反对党已经商妥，要用 count out 的办法来打消我的动议。但是，我希望议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不容许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用这种手段。”

然而，罗·蒙台居勋爵却失算了。在他发言完毕，累亚德代表政府对他作了答复，菲兹吉拉德代表托利党说了一些官场话以后，金累克（一个自由派议员）站起来讲话。他的发言的开场白部分最后是这么一段话：

“提交出来的文件现在所揭露出的这种种谈判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它说明法国政府是采用什么方法企图利用它和我国的关系，作为它维持皇帝权位的手段。

法国政府迫切需要的是转移法国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问题，其方法就是向他们指出它在国外的大事业；但是，法国政府最迫切需要的事情则是表明，它是同一个可敬的大国协议做这些事业的。”

金累克刚刚说出这几句话，一位“尊贵的”议员便提议“清查”出席议员人数。结果呢？结果发现，议院已经溶化了，统共才剩下 33 个人。蒙台居勋爵的提案恰好被他在辩论开始时反对过的 count out 扼杀了。

除了金累克被打断的发言之外，只有罗·蒙台居勋爵的发言有些味道。在他的发言中包含有对实际情况的下述重要说明：

“查理·魏克爵士和墨西哥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没有被约翰·罗素勋爵批准，其原因在于对路易·波拿巴抱屈从态度。查·魏克爵士签订上述条约，是在法国与反动政党首领阿尔蒙特建立联系，从而取消了英法西三国的共同协议以后。约翰·罗素勋爵本人曾经在一个正式函件中宣称，这个条约满足了英国的一切合理要求。但是，在他和图温奈尔的通信中，他却顺

从波拿巴的愿望，答应暂不批准这个条约。他允许图温奈尔将此决定通知法国立法团。尤其是，罗素勋爵竟然卑屈到这样的程度，竟答应图温奈尔，在1862年7月1日以前，他将同查·魏克爵士断绝一切联系——这是留给图温奈尔作答复的一段时期。图温奈尔答称：波拿巴对于英国单独行动的权利并无异议，但是他反对查·魏克爵士所签订的英墨条约。于是，罗素便不顾魏克，命令推迟批准这个条约。”

蒙台居勋爵接着说，英国是在运用它的影响向墨西哥国库追逼债款，而这笔债款却是莫尔尼和“大概还有法国的更为显要的人物”以瑞士的交易所骗子热克尔为中介非法地弄到自己手中的。

“整个这一墨西哥事件，——他继续说——都是没有让议会知道而着手进行的。第一次未经议会批准的战争发生在1857年。帕麦斯顿说这次战争是在亚洲进行的，以此来为这件事情辩护。现在，又把这个原则运用到美洲。最后还会运用到欧洲。这样一来，议会制度就会变成一出无聊的闹剧，因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对钱袋的监督权也同对战争的监督权一起丧失了。”

蒙台居勋爵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我谴责政府，它已经使我国成了扼杀法国自由的刽子手的盟友，而现在又使这个寡廉鲜耻的冒险家有可能在别的国家建立专制制度。政府正在把我们的命运同那个人憎恶而最后必遭天谴的人的命运联在一起。”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7月1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2年7月20日“新闻报”
第198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评美国局势

目前美国所遭到的危机，是由双重原因即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引起的。

假如上一个战局是根据**统一**的战略计划进行的，那末，西部的主力军势必要像本报早先说明过的那样^①，利用自己在肯塔基和田纳西获胜的形势，通过亚拉巴马北部进入乔治亚州，并在那里夺取迪克特、米勒吉维耳等等铁路中心。这样就会打断脱离派东部军队和西部军队之间的联系，使他们无法相互支援。但是，肯塔基军团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向新奥尔良方向前进；他们在孟菲斯附近的胜利只不过使博雷加德把大部分军队调到了里士满，结果使同盟军在这个地方突然造成了一个在数量上和地位上胜过麦克累伦的优势；麦克累伦是没有利用敌军在约克镇与威廉堡的失败的，而且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得七零八碎。麦克累伦的指挥我们过去已经评论过^②，单是他的指挥就足以断送最强大和最有训练的军队。最后，陆军部长斯坦顿也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为了在国外造成一种好印象，在征服田纳西之后停止了招募，这样一来，就使军队正当最需要增强，以便

① 见本卷第 521—523、541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05—508、533—537 页。——编者注

进行迅速的、坚决的进攻的时候，陷入了不断削弱的境地。尽管有战略的错误，尽管有麦克累伦那样的指挥，只要新兵不断补充进来，那末，战争即使现在还没有胜利，也仍然会迅速接近胜利的。斯坦顿的措施因下述情况而更为有害：恰好在那个时候，南部征召所有 18 岁到 35 岁的男子入伍，把所有的本钱押到了一张牌上来。正是这些在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兵士，现在使同盟军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居于优势，稳操主动。他们挡住了哈勒克的前进，把柯蒂斯赶出了阿肯色，击败了麦克累伦，并且在石壁将军杰克逊的率领下发出了打游击的信号，这种游击行动现在已经远达俄亥俄河了。

危机的军事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的政治原因联系着的。政治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党的势力，这个党把麦克累伦这样一个无能的人捧到了北部所有军团 commander in chief(总司令)的职位上，因为他以前是布雷金里季的支持者。另一个原因在于对**边界蓄奴州**(border slave states)的首领们的愿望、便利和利益抱着怯懦的关照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削弱着内战的原则性锋芒，可以说是夺去了它的灵魂。这些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使得在南部操纵下制定的 fugitive slave laws(逃亡奴隶法)³²⁶保持着效力，而使黑人对北部的同情受到暴力的镇压；使得哪一个将军都不敢把一个由黑人兵士组成的连派到战场上去；最后，使得奴隶制度由南部的致命弱点变成了它的坚不可破的甲冑。由于有奴隶负担着所有的生产劳动，南部就可以把所有适于作战的人都投入战场了！

目前，由于脱离派的行市不断看涨，各边界州的首领们也开始抬高自己的要求了。但是，林肯向他们的呼吁³²⁷——他在这个呼吁中用废奴派势力的蓬勃发展来威胁他们——表明，现在的局面正在发生一个革命的转折。林肯知道欧洲所不知道的事，那就是：

他的征召 30 万人的号召之所以得到冷淡的反响，完全不是由于在战败的形势下所产生的消极和退缩。问题在于，为军队提供主要人力的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决心要强迫政府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在星条旗上写上“废除奴隶制度！”作为战斗口号。对于这种 pressure from without (外界压力)，林肯缓慢地、迟迟疑疑地作着让步，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长久地反抗这个压力。因此，他才向各边界州发出恳求式的呼吁，要求它们自动地在互利的条件下放弃奴隶制度。他知道，只是由于在各边界州中保存着奴隶制度，才无法触动南部的奴隶制度，并且使北部不能采取真正激进的割治手段。但他要是设想可以用善意的言词和理智的论辩来说服“忠诚的”奴隶主，那他就错了。他们只对实力让步。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同时，现已休会的国会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已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令。让我们在这里扼要地叙述一下。

除了财政方面的法律之外，国会通过了北部人民大众久盼而未得的宅地法³²⁸；这项法律规定，把一部分国有土地免费给予垦殖者耕种，不论是美国出生的或迁入的。国会废除了哥伦比亚地区和联邦首都的奴隶制度，对以前的奴隶主付给金钱补偿³²⁹。宣布奴隶制度在美国全部领地内是“永远不可能的”。在接受西弗吉尼亚作为新州加入联邦的法案中，规定了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并宣布所有 1863 年 7 月 4 日以后出生的黑人儿童是自由人。这种逐步解放奴隶的条例，大体上是以 70 年前宾夕法尼亚州为着同样的目的所颁布的法律为蓝本的。第四个法案宣布，叛军方面的所有奴隶一到共和党的军队手里就是自由人。另一个还是现在才第一次实

施的法案规定,可以把这些获得解放的黑人组成军队,开赴战场对南军作战。利比里亚、海地等黑人共和国的独立获得了承认³³⁰,最后,和英国签订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条约。

因此,不管军事上谁走运气,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说,黑奴制度的寿命不会比内战长。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8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8 月 9 日“新闻报”
第 218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罗素抗议美国无礼。——谷物
价格上涨。——意大利的状况

1862年8月20日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英国人中国是以《letter-writer》(书信作家)而知名的。他在最近给斯图亚特先生的一封信中大发牢骚,说是北美报纸侮辱了“老英国”。Et tu, Brute! (连你也反对我,布鲁土斯!)对于这种 tour de force (巧妙的手法),没有一个正派的英国人在同你交谈时不表示惊讶。大家知道,1789—1815年时期的英国新闻界在对法兰西民族进行凶狠的、敌意的攻击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最近一年来它对美国所表现的《malignant brutality》(凶残的仇恨)比这一传统犹有超过!只要举几个最近时期的例子就够了。

“泰晤士报”写道:“我们必须给予我们的同族人(南部奴隶主)以一切道义上的支持,他们是如此英勇和顽强地为自己的自由、为反对强盗和压迫者的杂种而战斗着。”

纽约“晚邮报”³³¹(废奴派的机关报)就这一点指出:

“难道英国的这些诬蔑者,这些不列颠人、丹麦人、萨克森人、凯尔特人、诺曼人和荷兰人的后裔,就具有那么纯净的血液,以致所有其他民族和他们一比就显得是杂种吗?”

在那一段文字出现后不久，“泰晤士报”把林肯总统叫做“可敬的丑角”；把他的部长们叫做“一帮流氓和恶棍”，而对美国军队则称之为“军官是北方骗子，兵士是德国小偷的军队”。所有这些都用黑体字印在报纸上。而约翰·罗素勋爵也不满足于他给德勒穆主教和驻都灵的詹姆斯·赫德逊爵士的信³³²给他带来的荣誉，竟然又敢在给斯图亚特的信中谈论“北美报刊侮辱了”英国！

但是，凡事都有自己的界限。不管报刊怎样蛮横无礼，存心找岔子，英国官方人士仍得和“北方骗子”保持和平，而他们对南部那些大方的人血贩子的深切同情也将归结为毫无用处的废话和单独的走私性质的交易，因为谷物涨价是开不得玩笑的，而与北方人发生任何冲突目前都会在棉荒之上再加上粮荒。

英国早就不靠本国生产的谷物来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了。在1857、1858和1859年它进口的谷物和面粉价值6600万英镑，在1860、1861和1862年是11800万英镑。至于进口谷物和面粉的数量，1859年是10278774夸特^①，1860年是14484976夸特，而1861年是16094914夸特。由此可见，仅最近5年，谷物进口量就增加了50%。

的确，英国所需谷物现在就将有一半要由国外输入。同时有充分根据预计，明年谷物的进口还将增加30%——我们指的是成本的30%，因为美国的大好收成将使谷物价格不会过度上涨。而今年英国的谷物收成几乎可以肯定将比中等年景低 $\frac{1}{4}$ — $\frac{1}{5}$ 。刚在“粮食交易所快报”³³³和“园艺纪事和农报”上发表的各农业区的详细报道所证明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说，在1815年和约缔结后，布

^① 1夸特=12.7公斤。——编者注

鲁姆勋爵曾断言,英国 10 亿英镑的国债对欧洲来说可保证英国《good behaviour》(行为良好),那末,今年的粮食歉收对美国来说就最好不过地保证了英国《will not break the Queen' s peace》(将不破坏公众安宁)。

有人转给我一封加里波第的知己从热那亚寄来的信,让我在这里做一些摘录。信中说:

“昨天(8月16日)这里收到加里波第及其军队中的一些军官的最近来信。发信日期是8月12日。所有这些信件,都渗透着将军的百折不挠的决心:坚决维护自己的纲领‘誓死解放罗马!’;还有一些具有这种精神的给他的朋友的坚决指示。另一方面,库贾将军昨天收到都灵来的关于采取非常手段的紧急命令:如果加里波第在24小时内拒绝放下武器,就全力攻打志愿兵,捉住加里波第和他的朋友。如果军队服从了这道命令,那就要发生一场可怕的灾难。关于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是由于巴黎的一封电报而做出的。电报称:‘如果不解除加里波第的武装,皇帝将不会屈尊与意大利政府谈判。’如果腊特塔齐爱自己的祖国甚于爱自己的职位,那末,他就应该辞职,让里卡索利或其他名声好一些的大臣来接替他的位置。他就应该考虑到,跟路易·波拿巴一起去反对意大利,而不是跟意大利一起去反对波拿巴,——这意味着使他自己声称为之效力的君主国遭到危险。如果在西西里,意大利人在屠杀意大利人,那末,这不应该怪罪加里波第,因为他的口号是‘意大利军队万岁!’这支军队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这就证明了加里波第享有何等的声望。如果军队将屠杀志愿兵,那末,谁又敢说,人民会安然地容忍呢?”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8月20日

载于1862年8月24日“新闻报”
第2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美国废奴派的示威

以前本报已经有文章指出^①，林肯总统——一个在法律上小心谨慎、从宪法来谋求和解、出生在肯塔基这个边界蓄奴州的人——总是很不容易挣脱“忠诚的”奴隶主的控制，极力避免同他们公开决裂，因此，他就要同北部的一些坚持原则的并且日益被事变进程推向前台的党派发生冲突。温德耳·菲利浦斯于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解放纪念日在阿宾顿(马萨诸塞)发表的演说，可以说是这个冲突的序幕。

温德耳·菲利浦斯，是同葛利逊、贾·斯密斯齐名的新英格兰废奴派的领袖。30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冒着生命的危险以奴隶解放作为战斗口号；报纸的嘲笑，被收买的 rowdies (无赖们) 的狂叫，好心的朋友们的劝告，他一概视作等闲。甚至他的对手，也都承认他是北部的最卓越的演说家之一，是一个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把过人的毅力和最纯真的信念结合于一身的人。伦敦“泰晤士报”——不知还有什么能更有力地表明这个心地宽宏的报纸的特色——今天向华盛顿政府告发了温德耳·菲利浦斯在阿宾顿的演说。“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演说是“滥用”言论自由。

^① 见本卷第 505—506、557—558 页。——编者注

它说：“简直不可能做出比这更放肆的事情。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凡是头脑正常并且稍微重视自己的生命或自由的人，都不会在内战时期说出这样疯狂的话。读了这篇演说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演说者是诚心要政府来检举他。”

看来，“泰晤士报”是不顾自己对联邦政府的痛恨——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痛恨——很乐意来充当检察官的角色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德耳·菲利浦斯在阿宾顿的演说比任何战报都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把最突出的几节摘录在下面。

温德耳·菲利浦斯在这篇演说中说：“政府是为维护奴隶制度而战，所以徒劳无功。林肯正在打政治战。但是他一直到今天还是惧怕肯塔基更甚于惧怕整个北部。南部战场上的黑人在被问到是否害怕那些把周围土地翻起并把树木打成碎片的如雨的炮弹和炸弹时，往往回答说：‘不，massa^①，我们知道那不是要打我们的！’叛乱分子对麦克累伦的炸弹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知道，这些炸弹根本不是要伤害他们的。我并不是说，麦克累伦是一个叛徒；但是我说，假如他是一个叛徒，他一定完全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去做事情。请不要为里士满担心吧，麦克累伦是不会拿下它的。如果战争继续照这个样子打下去，没有一个合理的目的，那就是白白地损失鲜血和金钱。倒不如今天就让南部独立，也比再牺牲哪怕一个人去进行以现在这种可恶的政策为基础的战斗要好些。要是继续进行迄今为止这种规模的战争，每年需要 125000 人，每天需要 100 万金元。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南部。杰弗逊关于奴隶制度曾经这样说过：‘南部各州抓住了狼的耳朵，但是它们既不能制伏它，又不能放走它。’同样，我们抓住了南部的耳朵，但是我们既不能制伏它，又不能放走它。明天承认它吧，那你就得不到和平了。它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整整 80 年了，整个这一时期它畏惧我们，其中有一半时间它仇恨我们，经常给我们找麻烦，并且诬蔑我们。如果对它的当前要求让步，它就狂妄起来，它不会在一个设想的边界线内留上一年——不会的，它将在我们谈论和平条件的时候高呼胜利！不从根铲除奴隶制度，我们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只要你们还让

① Massa——这是南部的黑人在说英语时对《master》（主人）一词的错误发音。
——编者注

现在这个乌龟式的人物做我们政府的首脑，那你们就是用一只手挖洞而用另一只手去填塞它。让全国都来赞同纽约商会的决议吧，这样军队才有某种值得为之而战的東西。即使杰弗逊·戴维斯有力量拿下华盛顿，他也不会去拿下它。他知道，落在这个索多玛^①城头的炸弹会激怒全国的。

那时，整个北部将同声怒吼：‘打倒奴隶制度，打倒一切有碍于拯救共和国的东西！’杰弗逊·戴维斯是十分满意自己的成就的。这些成就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料！只要他利用这些成就维持到1863年3月4日，那时英国将——而这也是合乎常理的——承认南部同盟……总统没有把没收法案付诸实施。他也许是诚实的，但是他的诚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用？他既不能察近，又不能察远。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得知林肯在3个月前就已写好解放一切奴隶的文告了，而麦克累伦迫使他放弃了自己决定，肯塔基的参议员们又迫使他雇用他所不信任的麦克累伦。林肯恐怕要过多少年才能学会把他那律师的疑虑和内战的要求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府的可怕状况和它的最大祸害。

在法国，100个坚信自己的事业正确的人就会带动全国；但是哪怕使我们的政府采取一个步骤，预先就得1900万人行动起来。而在这千百万人中，又有多少人被宣传了多少年，说是奴隶制度是上帝所规定的制度呵！怀着这些偏见，手和心都被麻痹着，你们恳求总统把你们从黑人那里拯救出来！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那末就只有奴隶主的专制制度才能够带来一个暂时的和平了……我了解林肯。我曾经在华盛顿估量过他。他是一个第一流的二流人物（《a first-rate second-rate man》）。他诚实地等待着全国把他当做一把条帚拿起来扫除奴隶制度……在以往的年代里，离我现在说话的讲台不远，辉格党人曾经打小炮来压倒我的声音。而结果如何呢？

现在，这些辉格党人的儿子们葬身于契卡霍米尼的沼泽了³³⁴！求上帝帮助你们解散这个联邦吧，并且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在它的奠基石上写着：‘给世界上所有的公民以政治平等’……在我逗留芝加哥期间，我问过曾经同林肯一起办过律师事务的伊利诺斯州的律师们，我问他们：林肯是怎样一个人，他会不会说‘不’。回答是：‘他是一个缺少脊骨的人。如果美国人要选举一个完全无力领导和缺乏首倡精神的人，那末他们必然要选举阿伯拉罕·林肯。’

① 索多玛是圣经传说中被“火雨”毁灭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没有一个人听见他说过“不”！我问：‘那末，麦克累伦能够说“不”吗？’芝加哥中央铁路公司（麦克累伦在那里做过事）的经理回答说：‘他什么决定都做不出来。问他一个什么，总得过一小时他才能回答。在他主管中央铁路公司期间，他没有解决过一个重要的争论问题。’

而这就是两个比任何人都重要、现在掌握着北部共和国命运的人！熟悉军队情况的人告诉我们，如果统率波托马克河上的军队的这个废物不从中作梗，里士满已经可以拿下五次了；但是他宁愿在契卡霍米尼沼泽里挖掘污泥，以便然后可耻地放弃这个地方和那里的污泥工事。林肯由于对边界州的奴隶主抱着可怜的畏惧态度，仍然把这个人放在他现在的职位上；但是林肯自认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麦克累伦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让我们希望这战争一直打到把我们变成真正的男子汉的时候。那时我们将迅速地获得胜利。为了粉碎叛乱，上帝已经把解放奴隶的雷霆放在我们手里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8 月 2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8 月 30 日“新闻报”
第 239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弗·恩格斯

英国的志愿兵检阅

自从你们给我机会在贵报发表关于 1860 年 8 月志愿兵在牛顿检阅的报道^①以来,已经有两年了。隔了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再来听我谈谈英国民兵的状况和战术训练,这对贵报读者来说或许不无兴趣。

关于志愿兵的人数和目前编制,我可能不久另找机会来谈;现在我只报道一个消息,即据官方统计,志愿兵部队的现有人数为 162800 人,这就是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部队的战斗训练情况。

8 月 2 日,全国志愿兵总监麦克默多上校在离曼彻斯特 1 小时路程的希顿公园检阅了该市派出的全部志愿兵。部队由曼彻斯特第一、第二和第三“团”(郎卡郡第六、第二十八和第四十营)及阿

^① 见本卷第 149—156 页。——编者注

德威克利索尔福两郊区派出的“团”（郎卡郡第三十三和第五十六营）组成。但这些所谓的“团”只有3个（曼彻斯特第一和第三“团”及阿德威克“团”）是按营的编制组成的，其余的2个加在一起才顶1个营。在这些营里，连的队列数为18—21不等^①；每8个连组成1个营，平均人数，包括军官在内，为400人。此外，还有1个志愿兵马队（32人）和1个炮队（从惠特沃思先生那里借的2门一磅炮，约150名步兵作掩护），也是来自曼彻斯特。大多数本来是可以多派100—150名以上的人来的，但是看来是指挥官们把那些训练不够的志愿兵留在家里了。

举行检阅的那一块地方（威尔顿伯爵的公园的南部，以前在这里赛过马），是一个由西向东倾斜的小山坡；左右两边都是凹地，在小山东麓连成一片，形成一块平坦的草地，面积约有800平方步。一条小溪顺着小山的北麓流过，山后面地形又高起来了，这条小溪就从这一面把这块地方围起来；其余几面顺着公园的墙长满了小树，地形本来很开阔，只是由于小灌木林这儿一堆，那儿一团，再加上几棵大树，数处沼泽，地形的开阔性就被破坏了。

麦克默多上校的检阅与大多数通常的志愿兵检阅不同，从来不给部队预先规定和宣布检阅计划，因此志愿兵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但是在他的指挥下所作的运动，往往只是真正面临敌人才加以采用，而且不许有任何战术上的自作聪明。麦克默多是信德的征服者查理·纳皮尔爵士的女婿，也是他在印度的参谋长。他决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军人，而且他在志愿兵部队中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完全称职的。

^① 指二列的队形。——编者注

受检阅的部队像通常那样，列成横队迎接了总监。敬礼仪式过后，他就命令排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英国部队在敌人火力圈以外运动时通常都排成这种纵队），向中央靠拢，然后向右转改变纵队的正面，这样一来，上面提到的那块草地和公园东墙的小树林就出现在正面之前。在快而不乱地进行这些队形变换时，马队成散兵线，从小树林驰过，并向假想敌人射击，但很快就转回来了。之后，右翼 1 个营（郎卡郡第六营）被调上前去，同时该营的 4 个连布成了散兵线，另外 4 个连留在原地作为支援队，另外 2 营（第二十八混成营和郎卡郡第五十六营及郎卡郡第三十三营）也展开了，而左翼 1 个营（郎卡郡第四十营）仍然保持纵队队形，并同马队一起在 200 步距离处殿后，作为预备队。2 门火炮设在小山边上，即散兵线的右翼。在下达命令以前，散兵、支援连及展开横队的各营都俯卧在地上。这样，受检阅的部队就显得非常神气，这种场面在通常的志愿兵演习时是不常见的；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在指挥。

散兵线前进并射击的信号发出了。以散开队形进行的战斗并不十分成功。志愿兵习惯于在自己的练兵场的开阔平坦的地形上老一套地布成散兵线，过分计较于保持队列整齐而忽略了隐蔽。天然地线和灌木丛都是他们初次遇到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无法通过的密密层层的灌木丛更把他们弄糊涂了；有一个连在狭窄的凹地中的这种灌木丛前停住了，竟然向灌木丛射击起来，而散兵线上其余的人早已绕过了灌木丛，走到灌木丛的后面了。另外，散兵线整个地向左翼逐渐转移，因此马队所扑向的那个小树林受到的攻击就大为减弱，而已经展开的各个营的正面就越来越明显了。既然完成机动的整个计划和过程根本不要求作这样的运动，所以我

认为这是由于粗枝大叶而造成的。炮队同步兵右翼一起向前移动，一直在射击，而且往往没有隐蔽。如果我的望远镜没有使我看错的话，火炮的轮子往往是歪斜着放在山坡上的。

后来，猎兵又有一段时间得到成散兵线的支援连的加强，之后他们就被调回来了；展开的各营随即向前移动并进行速射。右翼的火力，特别是郎卡郡第二十八营方面的火力，是很猛的，但看来有些性急；在中央，在郎卡郡第三十三营的右翼，对射进行得有气无力，而且间歇很长；左翼的射击相当紊乱。正面的一部分在这里直接处在一个差不多有两人高的山脊的后面，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志愿兵灵活地朝着正前方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后备队的郎卡郡第四十营被拉到离战线 200 步远的地方集结并且展开；它的右方是重新集合起来的郎卡郡第六营。在 2 个营中，连的左翼排向后转，以便给现在开始以连为单位成复列撤退的第一梯队让路。老实说，我完全不能同意操典针对这个情况所规定的这种变换队形；这一次这样做我尤其不欣赏。操典要求退却的第一梯队向后转，并成横队向第二梯队（也以连横队的长度为距离展开）靠拢，然后以连为单位散开，并通过用上述方法构成的间隔。如果第一梯队退却只是由于弹药不足，它的队伍也没有溃乱，也不必担心敌人立即攻击，那末这种机动看来是可以跑步来完成的；但是，对采取攻势的敌人来说，这是把自己的主力调上前去的最好时机。在这里，这一切甚至不是按照操典来完成的。第一梯队马上以连为单位散开了，并且排着这样的队形，而且还是马马虎虎排好的队形，向后整整撤了 200 步，毫无猎兵掩护。

现在轮到郎卡郡第六营和第四十营进行速射，这次射击比前面 2 个营更稳更密。每人约打了 4—5 发子弹（炮队一直从每个第

一梯队的右翼进行射击)以后,停止射击的信号发出了,演习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在此之前,麦克默多上校是把这支检阅部队看做是同假想敌人独立进行战斗的独立兵团的;部队的部署和机动都是针对着敌人在前面占据的地形而安排的。在此之后,他就把所有4个营排成一个横队,作为一个上级的部队的第一梯队进行活动。空间的限制不允许他顾到他前面的地形的特点,而且,为了把志愿兵集中在一起进行整个部队的机动,他也没有去考虑散兵线整个更远的射击。

第一梯队先向左转改变了正面,这样它就出现在我们说过的那个北面凹地的延长线上。其余各营在它的左方成横队,整个横队进行了速射。然后,整个横队开始越来越向左伸展,为此右翼各营先后以连为单位分开,从正面的后面向左翼行进,并在那里重新整队。左翼这样快伸展到公园西墙的小树林以后,战线从右翼开始向后拉,并且以左翼为旋转轴心划了一个四分之一圆圈。跟平常一样,这个运动是通过把各营(左翼的1个营除外)编成四分之一距离的纵队来完成的,随即转到新的方向展开,而且又快又好,尽管是在陡坡上进行的。正当各营重新展开的时候,我恰好经过郎卡郡第四十营的正面,看到各连是怎样出动到战线上去的,我应该说,我们大陆上最好的基干部队完成这一切或许会更漂亮更“神气”,但决不会这样又稳又快。在变换队形的时候,麦克默多上校好几次向这个营大声表示衷心赞赏。郎卡郡第六营展开得也很快很好;我曾经看到过,法国的基干部队完成这个机动要马虎得多。

几次齐射以后,受检阅的部队从左面成梯队向前运动,营与营之间的距离为100步,然后停下,以跑步编成方队队形。有些地方做得不太齐,因为通过灌木丛时队伍就有点乱了。各营重新展开,

向左翼营的所占一线推进，每营进行了一次齐射，大体上很整齐，然后整个受检阅的部队排成一个横队向前运动。我很希望德国的许多认为年轻的部队不能完成成横队运动的军官们有人能看到这个由 640 个复列组成的横队的正面行进。地形是极不平坦的。正面横穿三面相当陡峭的山坡而过；地面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和土堆；另外还有许多分散的树木。然而志愿兵走了好几百步还是很有秩序，非常整齐，靠得很紧，没有偏离，特别是中央的 2 个营（第六营和第四十营）是这样，所以麦克默多上校在现场和后来同参谋军官们谈话时都对这次运动表示完全满意。最后他下令吹冲锋号，所有的人以纯粹志愿兵的劲头顺着斜坡往下向开阔地很快地跑了约 100 步；这与其说像冲锋，不如说像赛跑。停止号一响，即卡郡第四十营便停了下来，虽然不很整齐，但还是保持了完整的密集队形，而第六营就稍微要差一些。可是在翼侧，特别是在左翼，秩序大乱；你挤我我挤你很多人跌倒了，第一列的一个志愿兵甚至伤了小腿肚，因为第二列的一部人的枪刺在这里是向前倾斜的。演习到此结束，部队排成分列式，一队队隆重地走过，然后解散各自回家。

我觉得，这样的实例比任何空谈都更能让“军事总汇报”³³⁵的读者清楚得多地了解这些志愿兵的训练的性质和水平。虽然在目前情况下集中检阅的部队人数不多，但正是这样才能进行一系列实际采用的运动，而在这里集中更多的志愿兵就不行了；在英国，进行这些运动的场地从来不够。况且，参加检阅的营已经使我们很好地了解到整个英国志愿兵部队的情况；我们看到，2 个营在训练方面大大超过另外 2 个，它们是大城市中组织得很坚强的营；而另外 2 个在训练方面较差的营，从成分比较杂这一点来看，就表

明这是在乡村和小城市组成的。大体上可以说,志愿兵已经相当熟悉了营的主要队形变换:他们排成纵队,或者以纵队和横队展开或行进,都相当稳定,有时甚至十分稳定。但是,如果能使他们摆脱英国操典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操典还明文规定的那些矫揉造作的展开和反转行进,那是一件不坏的事。散兵战始终是英国人的弱点,对于这样的战斗,志愿兵所知道的也只限于他们在练兵场上所能学到的,但就是在这里,不同的营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次检阅中所出的差错,同天天都可以在我们大陆基干军队作业时见到的差错毫无区别,尽管这些军队有这样的优点,即指挥它们的军官都是练兵场上的老手。但是仍然不能否认,英国志愿兵部队的军官毕竟还是整个组织中薄弱的环节,尽管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些对分列式感到满意的人会发现,志愿兵在这门技艺中做出的成绩比预期的要大得多。最后,谈到他们在射击场上取得的成就,那他们绝对可以同欧洲任何一支常备军较量,而且无疑每个营的优秀射手平均要比大多数基干部队的多。总之,现在,经过3年以后,可以认为实验是完全成功了。在英国,国家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花费就为国防建立了一支163000人的有组织的军队,这支军队已经有相当的素养了,只要再进行3—6周的兵营训练(视各营的训练程度的不同而定),就能成为一支完全有战斗力的野战军了。即使在外国人企图入侵的最坏情况下,英国人也还是有这么多的时间供自己支配的。

弗·恩格斯写于1862年8月

载于1862年11月1日和8日

“军事总汇报”第44号和第4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军事总汇报”

卡·马克思 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目前在伦敦正筹备召开援救加里波第的大会³³⁶；这样的大会昨天已经在格茨黑德召开了一个，还有一个确定在北明翰举行。这一系列的人民示威，是星期二由新堡开始的。简短地报道一下新堡的大会，就足以表明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特有的情绪。这一类的大会总是引人注目的。这次大会在新堡市政厅大厦举行。牛顿先生（市参议员）宣布开会并致词，他说：

“当意大利不自由的时候，在欧洲就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当法国在欧洲中心保持着大量军队的时候，甚至我们现在引以为骄傲的那些自由也没有保证。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加里波第遭受挫折的真正原因，不应该在意大利寻找，而应该在巴黎寻找。法国统治者，——这就是使加里波第遭到挫折的真正罪魁。（热烈鼓掌）正是这个政权完全不许报刊和论坛说话，正是这个政权窒息了、束缚了、褫夺了法国的勇气。我深信，报应的日子，复政变之仇的日子即将到来，天命将要求清算这次政变的一切罪恶和罪行！需要最大的克制，才能平静地谈论法国对意大利的行为。从查理八世时起，法国就一贯致力于掠夺意大利，用它做借口破坏欧洲和平……我在某一本书上看到，古罗马人不敢在卡皮托里山前审判曼利乌斯。在意大利能找到一小块审判加里波第的地方吗？……”

约瑟夫·考恩建议向罗素勋爵递交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促使法国皇帝撤离罗马。

他说：“罗马是意大利古老的、光荣的首都……这一古老的文明中心怎么会外国统治者的军队占领了呢？难道法国军队对罗马比对那不勒斯、都灵和伦敦有更多的权利吗？（热烈鼓掌）教皇逃走了，拒绝返回，使罗马三个月没有政府。因此，罗马人便自己选举了一个政府。可是，当他们还忙于组织政府的时候，那些在一年前为他们作了一个榜样的法国人便向他们大举进攻。

把这样的行为称做自相矛盾是不够的。这是卑鄙的行为（暴风雨般的掌声），历史将谴责每一个参加这种丑恶勾当的法国人。除瓜分波兰以外，民族独立和国际法的一切原则恐怕从来还没有受到像法国御用匪军捉杀罗马共和国时那样无耻的蹂躏！1849年6月罗马陷落，被路易·波拿巴一直控制到今日，已整整13年了！……他的大臣们在法国国民议会宣布，远征是罗马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他们撒谎！（Hear, hear!（对，对!））他的军官在土伦向拒绝反对兄弟共和国的士兵宣布，不跟罗马作战，而是跟奥地利作战，他们撒谎。军队在契维塔未克基亚登陆后，他们又撒谎，他们装成人民之友，而不是人民之敌，并且虚伪地把法国旗帜同意大利旗帜交插在一起。法国的特派员和他的爪牙撒谎，他们以进行谈判为借口要求与执政官会晤，实际上是为了了解城防情况。乌迪诺将军撒谎，他曾答应6月4日以前一定不攻城，实际上2日就进攻了，因而使罗马人措手不及。法国人在进行这种丑恶勾当时的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蓄谋已久的、口是心非的欺骗。（掌声如雷）

从路易·波拿巴起，到他的最后的一个爪牙止，全都是对罗马、法国人民和欧洲进行欺骗。路易·波拿巴从来也不希望意大利成为自由的国家。他所希望的是：在北部是撒丁王国，在南部是缪拉特当国王的王国，在意大利中部是他的堂弟普隆—普隆的王国。（掌声和笑声）这三个小君主国和波拿巴王朝连上亲属关系，并从土伊勒里宫得到鼓励，就可以保证路易·波拿巴在欧洲的势力显著加强。计划是不坏的，它的实现会使波拿巴的伎俩获得称赞，但是它被加里波第撕毁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现在加里波第却被解除了武装。这就使英国人民负起了更大的义务——制止法国专制王朝的横行霸道，对篡位者的御用匪帮锁上罗马的大门……波拿巴主义是欧洲一切灾难的源泉。但是，它耀武扬威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死硬的意志，几十万的士兵，很多的杀伤武器，挤满了奴颜婢膝的肥缺钻营者的参议院，由宪兵和行政官鸣鼓召集的众议院，——可是，在另一方面，是捍卫着自己永恒权利的人类本

性!”(暴风雨般的掌声)

接着考恩先生说明和宣读了致罗素勋爵的备忘录,备忘录被一致通过。某个鲁耳先生要“维护拉芒什海峡彼岸的我们的高贵同盟者”的试图失败了,被淹没在一片刺耳的嘘声、口哨声、不满的喊声和笑声之中。

然后腊瑟弗德先生(牧师)提出第二个决议案:

“大会邀请加里波第将军定居英国,并请他确信英国人民始终不渝和日益增加的景仰。”

腊瑟弗德先生在说明自己的动议时指出:

“如果教皇在罗马感到热不可耐,他也可以在英国找到安身之地。我们甚至欢迎他——但不是把他作为世俗的君主,而是把他作为最大教会的首脑。”

动议一致通过。主席宣布大会结束时又对“巴黎的暴君”作了尖锐的暗示。

“让他回忆一下古意大利以及它的布鲁土斯和卡西乌斯;让他回忆一下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涅墨西斯;让他像麦克佩斯那样地想一想:持刀的手和戴盔的头可能会突然从地下冒出;让他牢记,并不是所有的奥尔西尼都被砍了头。”

这话是市参议员牛顿先生说的。

目前英国报纸和群众大会的语言,使人想起 coup d'état (政变)后的最初时期的情况,而和以后对“社会救主”的歌颂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9 月 1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9 月 17 日“新闻报”
第 256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英国工人的贫困

此间报刊上的论战已经进行两个月了,这方面的资料,对于未来的研究英国社会的历史学家来说,恐怕要比世界展览会³³⁷的带说明和不带说明的所有目录都有价值。

我们记得:在议会闭会前不久,在大工业家们的压力之下,两院以十分匆促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增加捐税以救济郎卡郡和约克郡的穷人的法案。这项本身意义很小的措施,主要是触犯工厂区的小资产阶级,几乎碰不到 landlords(大地主)和 cottonlords(棉纺大王)。在讨论法案时,帕麦斯顿攻击了棉纺大王们,说他们让工人们饿死街头,而自己却做棉花投机生意大发横财。他还用“投机的”动机来解释他们在危机时期的《masterly inaction》(巧妙的停工)。得比勋爵早在会议开幕的时候就说,棉花不足对厂主们来说业已成了一种 deus ex machina^①,因为,即使不是美国内战突然打断了原料的运输,惊人的市场膨胀现象反正也是会引起最可怕的危机的。科布顿以工业家代表的身分作答复,他发表了三天演说狠狠地攻击了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

① 直译是:“从活动装置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剧院里,扮神的演员借特殊的机械装置之助出台);转义是:突然出现的解救急难的人物或情况。——编者注

议会会议闭幕以后，斗争在报刊上继续进行。要求英国公众援助贫苦工人的呼吁书，以及各工厂区中不断增长的贫困，每天都为继续斗争提供越来越多的理由。“晨星报”和其他的工业家机关刊物告诉人们：得比伯爵和整个贵族集团从工厂区的地产中每年得到 30 多万英镑的地租，那里的本来没有任何价值的地产像魔术一样达到了现在的价格，这一切仅仅归功于他们本身并不参加的工业活动。“晨星报”甚至确定了得比和别的大地主应该捐助多少救济费。例如，它规定得比的救济费为 3 万英镑。议会散后不久，得比勋爵果然就在曼彻斯特召开了一个捐募救济费的大会。他本人施舍了 1000 英镑；别的大地主也认捐了相应的数目。结果并不怎样，但是土地贵族总做了那么一点事情。它拍着胸膛大喊：《Salvavi animam meam!》（“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但是，棉纺织工业的巨头们却顽固地保持“斯多葛派”的姿态。在任何地方也无法找到他们——无论在地方上为了周济穷人而建立的委员会里，或者在伦敦的委员会里。伦敦一家报纸写道：《They a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but they are on the Liverpool market》（“他们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是在利物浦的市场上”）。托利派各报和“泰晤士报”现在天天都在大肆攻击棉纺织业的暴君们，说他们从“工人的血肉中”榨取了数百万，而现在竟拒绝捐助一文钱来维持“他们财富的来源”。“泰晤士报”派记者去工厂区：记者们的非常详细的报道是根本不会有利于《cotton— lords》的威信的。所以工业家的报纸——“晨星报”、“经济学家”、“曼彻斯特卫报”等等——都指责“泰晤士报”挑起阶级斗争以掩饰政府的罪过，掩饰政府在印度的专权，等等。而且，“泰晤士报”还被指责有“共产主义倾向”。“泰晤士报”显然很高兴有这个恢复自己名

声的机会，它用辛辣的讽刺语调回答说：《cottonlords》利用目前棉花不足的情况进行投机，从经济观点来说很有头脑，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是头号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最劣等的共产主义者”。这些有钱的先生们很希望英国承担一切费用，为他们维持他们资本中的最宝贵部分，而自己却不破费分文。要知道，他们的资本不单单是工厂、机器和银行存款构成的，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是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有良好训练的工人大军构成的。这些先生关闭自己的工厂，以五倍利润出售原料，同时仍然要求由英国人民来养活这支被他们溃散的大军。

在土地贵族与工业贵族之间的这次不寻常的吵闹——争论他们当中谁较多地榨取了工人阶级的血汗，谁应该最少地援助贫困的工人——期间，在最穷困的工人那里发生了一些大陆上的《great exhibition》（“大展览会”）崇拜者们根本不能理解的事件。下面我要叙述的这个事件，是曾经官方证实的。

离帕德蒙登（约克郡西区）不远，在哥克斯霍尔姆的一间小屋里，住着一位老大爷和两个女儿；老大爷已经年迈，而且身体很弱，女儿靠在哈利韦耳先生的棉纺织厂做工谋生。他们住在底楼的一间可怜的小屋里，离脏水沟只有几步；他们窗户上面是个楼梯，供楼上的人行走。这个楼梯夺去了他们这间可怜小屋的阳光。在最好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挣到“仅得不死”的工资，但是在最近的15个星期里，唯一的工资来源也没有了。工厂关闭了；全家生活费用完全断绝。贫困一步一步地把他们拉进它的深渊。时间每小时都在逼他们走进坟墓。一点微薄的积蓄很快花光了。接着就把破烂的家具、衣服和衬衣——一切可以卖掉或当掉的东西，全都换了面包。别人都知道，他们在14个星期内没有挣到一法寻，但一次也

没有找教区求过帮助。

祸不单行，老大爷又病了已经一个月，不能起床。乌哥利诺和他儿子们的悲剧在帕德蒙登的小屋里又重演了，只不过是没吃人的场面罢了。8天以前(12日)，两个姑娘中身体比较好些的一个在极端绝望中最后决定去找济贫所监督，向他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而这位先生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回答说，他在下星期三以前为这家人什么也不能做。三个不幸的受难者在这个有力的刽子手最后开恩给予帮助以前，还得忍受5天。全家只好等待，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盼望很久的星期三终于到了，官方救济机关应该给挨饿的一家人扔下一点面包渣了；这时，村里的居民就被一个消息震动：一个姑娘已经饿死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饿死的姑娘的尸体直僵僵地躺在一张破板床上，周围是一片可怕贫困的象征，她的虚弱无力的老父在自己床上痛哭；那个还活着的姑娘几乎没有力气讲述他们的苦难。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个在现代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可怕事件将怎样结束。将进行一次验尸。Coroner(验尸官)将大谈英国济贫法的慈善精神，将再次称述执行机关的完美，举出 *prima facie* (初步) 证据说明法律对这个悲惨事件决不能负责。济贫所监督也能找出理由为自己辩护；就算法庭不对他说一堆恭维话，至少他也将很欣慰地听到人说他没有丝毫罪过。最后，陪审官们将用这样一句庄严的判决词来结束这出法庭喜剧：《Died by the visitation of God》(遵上帝旨意而死)。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9月20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载于1862年9月27日“新闻报”
第266号

卡·马克思
加里波第派的大会。——
棉纺织工人的贫困

1862年9月30日于伦敦

继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报道的加里波第派在新堡举行的大会^①之后，在散德兰、丹第、北明翰、伦敦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这样的大会。这些大会的性质各地一样，最后一句话也都是：“法国人必须撤离罗马”。现在，伦敦各区正在筹划选举代表，派他们 en masse（一齐）去会见约翰·罗素勋爵，迫使他出来反对法国军队长期占领着罗马。《Pressure from without》（外界压力）乃是英国人同他们的政府进行斗争的 ultima ratio（极端手段）。

与此同时，土伊勒里内阁对英国的这些人民示威是既不满意，又不淡漠的，这从“新堡报”³³⁸的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

“法国人的皇帝曾提起英国政府注意加里波第派最近在新堡举行的大会的语调。曾强调指出：有两个发言人，包括会议主席市参议员牛顿在内，暗示地提到谋害皇帝的阴谋，并且非常明确地以死来威胁他，叫他放弃对意大利采取的政策。因此政府认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声明：对于同奥尔西尼、贝尔纳博士等等人的密谋相类似的一切密谋，无论从预防或从惩罚来说，英国法律都将毫不宽假，尤其是，在上述大会上已经完全公开表示要重复奥

^① 见本卷第 574—576 页。——编者注

尔西尼的谋刺行为。政府提出这种警告的根据,就是最近在马志尼主义者小组里有人发表言论,进行威胁,暗示要采取行动,其情况都与奥尔西尼的密谋发生以前相似。最后,我们可以告诉读者:司法当局已就新堡的大会采取了最初步骤。”

这就是“新堡报”的报道。凡是多少了解一点英国的情况和此间情绪的人都知道,现内阁对人民示威进行任何干涉,都只能像过去发生奥尔西尼谋刺事件的时候一样,以它本身的垮台而告终³³⁹。

由于严冬将至,工厂区的情况日益危急。“晨星报”今天警告说,如果现在所采取的“官方救济”的办法不加改变,到冬天就会发生比 1842—1843 年的激烈场面³⁴⁰厉害得多的风潮。作这种珈桑德拉预言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各报刊登的一个以前在机织厂(棉纺织厂)做工而现在被抛到街头的曼彻斯特工人的一份声明。要想了解这份声明,——声明的内容我将在下面扼要叙述——就必须知道什么是《labour test》(“劳动试验”)。英国 1834 年的济贫法试图通过把赤贫作为可耻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的办法来根除赤贫现象,它要求申请补助的人在获准补助以前先要证明自己确有“劳动愿望”。为此他必须去砸石子或者《picks oakum》(搓开旧船缆等等),——这些无聊的工作乃是用来惩罚英国监狱里那些被判处苦役的囚犯的。经过这种“劳动试验”以后,贫困者全家每人每周才能得 1 先令,而且半先令是付现钱,半先令以面包支付。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英国织工的“声明”。他一家共有 6 口人。先前他挣的钱不少。但后来有 18 个星期他的工时减少了一半或四分之三。在这段时间里,全家每周收入几乎不到 8 先令。最近一个星期,他工作的那个工厂完全停工了。他每周要付房租 2 先令 3 辨士。他抵押和变卖了一切可以从家里拿出来的东西,后来

口袋里连一文钱也没有了；他和他的全家都有饿死的危险。于是他不得不向济贫所求助。上星期一的清早，他就去求见《guardians》（“济贫所监督”）。

经过“严厉讯问”以后，他们打发他去见他那个区掌管补助事宜的官。整整等了一个钟头，这个官才放他进来参见大人。之后这个官对他进行了第二次讯问并且……拒绝给他补助，理由是他上星期挣过3先令，尽管“请求者”向他报了如何花掉这笔“财产”的细账。这样一来，这个工人和他的全家就要挨饿到下星期三。到了星期三，他又跑到《guardians》的事务所去。到那里他才知道，要想得到补助，他必须先经受“劳动试验”。要到workhouse（习艺所）（穷人的巴士底狱）去，在那里同其他300个工人挤在一块约30码长的狭窄地方，空着肚子搓开缆索，干到下午五点半。就在这热得难以忍受的地方，在窒闷的空气和灰尘之中，互相挤坐在板凳上的“受劳动试验的蒙难者”——这些熟练工人，英国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不得不干着人只有被强迫才能去做的那种最屈辱的工作。这大概同要求一个钟表匠去打马蹄铁，或者要求一个风琴手用嘴去吹风琴的风箱相似。做完这种工作以后，我们的这位“织工”得了整整5先令——一半是现钱，一半是面包。付了房租以后，他就只剩下不到2辨士（约合普鲁士的2个银格罗申），作6口人每天糊口之用。而下星期三他还得再经受通常每周一支的“神的试验”。但是这个“织工”现在公开声明，他宁肯同他的全家一起饿死，也不愿再蒙受这样的耻辱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9月3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2年10月4日“新闻报”
第273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北美事件

对马里兰的短命的进军³⁴¹，已经决定了美国内战的命运，尽管战争的红运还可能有一个或短或长时期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摆不定。在本报上以前已经指出，争夺各边界蓄奴州的斗争，乃是争夺联邦统治权的斗争^①，而同盟在这一斗争中已经遭到了失败，尽管它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这次战争的，这种条件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马里兰理应是各边界州蓄奴党的头，而肯塔基则是他们的手。马里兰的首府巴尔的摩的“忠诚”一向是仅仅靠着戒严来维持的。不仅在南部而且在北部人们都深信，同盟军在马里兰出现，将成为举行大规模人民起义反对“林肯的仆从”的信号。这件事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军事胜利，而且还在于一种精神上的示威，这种精神上的示威将能鼓动所有边界州中拥护南部的人，把他们卷入漩涡。同盟军如果占领马里兰，就意味着华盛顿陷落和费拉得尔菲亚遭到威胁，纽约的安全也会大成问题。

在同一时间内入侵肯塔基州一事³⁴²——肯塔基州由于它的人口密度、地理位置和经济资源，在各边界州中最为重要——如果孤

① 见本卷第 357—366、556—559 页。——编者注

立地来看,不过是一种牵制行动。但是,依靠马里兰的决定性胜利,这次入侵就可以导致镇压田纳西州的联邦拥护者,从两翼包抄密苏里,保障阿肯色和得克萨斯的安全,造成对新奥尔良的威胁,而最主要的则是可以把战争引到北部的中央州即俄亥俄;占领了俄亥俄就可以控制整个北部,正如占领了乔治亚就能保证控制整个南部一样。同盟派在俄亥俄的军队可以切断北部的西部各州同东部各州的联系,并且以敌人的中心为根据地来粉碎敌人。由于叛乱分子在马里兰的主力遭到失败,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且到处都得不到人民同情的入侵肯塔基的行动便成了一些不大的骚扰活动了。即使占领路易斯维耳,现在也只能使“西部巨人”³⁴³——来自艾奥华、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和俄亥俄的人群汇成一股“巨流”,猛烈地迎头冲击南军,像第一次向肯塔基胜利进军时那样。

这样一来,马里兰的进军表明,脱离运动的浪潮没有足够的冲力能越过波托马克河达到俄亥俄。南军已被迫进行防御,虽然只有进攻才能使它获胜。南军失去了各边界州,被压在西起密西西比东到大西洋之间,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没有争夺到,所争到的只是一个葬身之所而已。

一刻也不要忘记,南方人在举起叛乱旗帜的时候是掌握着各边界州,在政治上统治着这些地方的。他们提出了领地要求。但和领地一起,他们连各边界州都失掉了。

但入侵马里兰毕竟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势下开始的:北军遭到一系列屈辱的空前未闻的失败;联邦派的军队士气涣散;石壁将军杰克逊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林肯和他的政府成了众口嘲笑的对象;民主党在北部重新加强,并且已经认为可以选杰弗逊·戴维斯当总统了;法国和英国准备公开宣布他们早已秘密承认了的奴隶

主政府合法。《E pur si muove!》（“但它仍然转动着！”）。理性在世界历史上终究是无往不胜的。

较之进军马里兰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林肯的宣言。林肯是史册上《sui generi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别的人在为几平方英尺土地行动时可以宣布“为理想而奋斗”，而林肯即使在为理想而行动时，他所谈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像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他向敌人迎面投掷过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都像——他本人也力求使它们像——一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传票，像在法律上玩弄狡计，像小气地附有种种保留条件的 *actiones juris*（诉状）。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³⁴⁴，也具有这种性质。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像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 *tutti quanti*（之流）所做的那样，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

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黑格尔曾经说过，实际上，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³⁴⁵。如果说，林肯不具有历史行动的激情，那末，作为一个来自人民的常人，他却具有这种行动的幽默。林肯是在什么样的时刻颁布关于从1863年1月1日起取消同盟领地内的奴隶制度的宣言呢？恰恰是在同盟作为独立国家正在里士满的国会上通过关于“和谈”的决议的时刻。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各边界州的奴隶主深信，随着南军入侵肯塔基，《the peculiar instituion》（“特殊制度”）^①已经像他们对自己的同乡、华盛顿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控制一样，也有了担保。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0月7日

载于1862年10月12日“新闻报”
第28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8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5期

① 奴隶制度。——编者注

卡·马克思 面包的制作

加里波第、美国内战、希腊革命、棉纺织业的危机和威亚尔的破产³⁴⁶——所有这一切如今在伦敦都退到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面包问题**，一个地地道道的面包问题了。以“钢铁和蒸汽领域中的思想”自豪的英国人忽然发现，他们是在用古代法兰克人的方法制作《staff of life》（“生命支持物”），像诺曼人入侵时期那样。唯一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借现代化学之助制作掺假的食物。英国有一句古语说，每个人，甚至最好的人，一生都得吃《a peck of dirt》（一斗脏东西）。但是，这句话是在转义上被理解的^①。约翰牛想不到，在最直接的物理意义上，他天天都在吞食一种不可思议的由面粉、明矾、蜘蛛网、蟑螂和人的汗水做成的 *mixtum compositum*（混合物）。他熟读圣经，当然知道人是汗流满面才取得面包的；但是，人的汗水必须当做一种不可缺少的调料加在和好的面团里，这对他来说还是一件大大的新闻。

大工业占领各种存在着手工劳动、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厂的生产部门的次序，乍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培植小麦是农村的事情，而烤制面包是城市的事情。工业生产将首先占领城市的行

^① 转义是：受辱、吃亏。——译者注

业,然后才占领农村的行业,这不是人们本来所预料的事情吗?然而,实际的发展进程却正好相反。不管我们往哪里看,我们到处都能见到: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迄今为止差不多没有受到大工业的影响,人们的日常需要是通过古老的、极度笨拙的手工操作来满足的。不是英国,而是北美第一次而且是现在才把这个传统打开一个缺口。美国人首先在裁缝、制靴这一类生产部门里开始采用机器,甚至把机器从工厂转到私人家庭里去。但是,上述的那个现象是很容易说明的。工业要求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是为了商业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而生产,所以实质上原料和半成品是工业所要征服的**第一个**部门,而用于直接消费的成品则是**最后的**部门。

但是现在在英国,看来面包房师傅的丧钟已经响了,面包厂主的时代到来了。不过,如果仅仅是特里门希尔先生揭发“面包秘密”³⁴⁷而引起了恶心和恐惧,如果被美国危机大规模地从它早就独占的各部门中排挤出来的资本不是这样贪婪地为自己寻找新的投资场所,那是不足以造成这种革命的。

伦敦面包房的帮工们向议会申诉他们极其困苦的状况,申诉书淹没了议会。内务大臣委派特里门希尔先生做关于这些申诉书问题的报告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查员。特里门希尔先生的报告也就成了风暴的信号。

这个报告主要分为两章。第一章叙述面包房工人的极端困苦,第二章揭发烤制面包过程中各种令人恶心的秘密。

报告的第一部分把面包房工人描述为“文明制度下的白种奴隶”。他们的平常工作日从晚间 11 点钟一直延续到次日下午 3—4 点钟。周末工作日更长。大多数的伦敦面包房在周末都是从星期五晚间 10 点钟开始,中间不休息,一直延续到星期六晚上。工人

多半死于肺结核，平均寿命是 42 岁。

至于烤制面包工作本身，它通常是在窄小的、通风不良或者干脆不通风的地下室里进行的。除不通风以外，破脏水管子还不断冒出臭气，而“面包在发酵时就吸收着它周围的各种有害的气体”。蜘蛛网、蟑螂、大老鼠和小老鼠全都“混在和好的面里”。

“不管我多么恶心”，——特里门希尔先生说，——“我不得不得出结论：面团里差不多总是含有汗水，而且常常含有和面工人的更有害的排泄物。”

即使最好的面包房也都免不了这种令人恶心的丑事。但是这种丑事达到不可思议程度的地方，则是那些给贫民做面包，同时特别风行在面粉里掺入明矾和骨粉的偏僻角落。

特里门希尔先生建议颁布惩罚面包掺假的更严厉的法律。其次，他建议把面包房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限制“年轻人”（即年龄未满 18 岁的人）的工作日为从早 5 点到晚 9 点，等等。但是他也很有头脑，他认为，他所揭发的弊端是用老办法制作面包的直接后果，这种弊端议会消除不了，只有大工业才能消除它。

的确，有些地方已经采用**斯蒂文**的机器来和面了。在工业展览会上也有另一种这样的机器。但是，在烤制面包过程中，这两种机器还给手工劳动留下很多的地盘。所以**道格利希**博士便使整个的面包生产制度革命化。从面粉运出仓库起一直到面包入炉，人的手一次也不碰。道格利希博士完全不用酵母，而是用碳酸发酵。他把整个面包制作过程的时间（包括烘烤）从 8 小时缩短到 30 分钟。完全用不着夜里干活。碳酸气的采用排除了食品掺假的任何可能性。新的发酵方法可以达到很大的节约，特别是在使用道格利希博士发明的机器的时候再结合采用美国发明的去谷物硬皮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像目前这样，把硬皮破坏四分之三（硬皮含有麦

胶,据法国化学家梅日—穆尔埃斯的意见,这是谷物最有营养的部分)。道格利希博士算出,他的制作面包的新方法能使英国每年在面粉上节约 800 万英镑。此外,还能节约用煤。煤的费用(包括蒸汽机用煤)每炉可以从 1 先令降到 3 辨士。用上等硫酸制造的碳酸气的成本费按每袋面粉计算大约为 9 辨士,而面包房主目前的酵母费按每袋面粉计算则需要 1 先令以上。

前些时候,在伦敦的一个区——多克海德(百蒙得锡),就已经开设了一家按照现在大大改善的道格利希博士的方法工作的面包房,但由于当地条件不利,很快又停业了。据说,这种类型的面包房,在朴次茅斯、都柏林、里子、巴特和考文垂等地非常成功。在伊斯林顿(伦敦市郊),一家着重在训练工人而不是出售面包的特别的面包房,在道格利希博士的亲自指导下不久前开工了。巴黎市的面包房正在大规模地进行机器生产的筹备工作。

道格利希博士的方法的普遍推广,将把现有的大多数面包房师傅变成几家大面包厂主的普通代理人。他们将只做零售生意,与制作面包毫无关系了,不过,这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说来,将不是一个太痛苦的改变,因为他们现在实际上就已经是较大的面粉工厂的普通代理人。用机器生产面包的胜利将是大工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大工业将这样征服中世纪手工业生产的被牢靠地保护到现在的偏僻角落。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0 月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10 月 30 日“新闻报”
第 299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马克思 北美形势

1862年11月4日于伦敦

在肯塔基统率南军的布莱格将军(该地其余的南军部队只是些游击队)在入侵这个边界州时曾经出了一个文告,这个文告清楚地说明了南部同盟最近的一些妙计。布莱格的这一个针对西北各州出的文告,把他在肯塔基的成功说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明显地预计南军将胜利地进入位于北部中央的俄亥俄州。首先,布莱格声明,南部同盟愿意保证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的自由通航。这个保证只有在奴隶主掌握了各边界州的时候才有意义。可见,里士满方面估计,李将军向马里兰州与布莱格向肯塔基州同时入侵,将一举而取得各边界州。接着,布莱格便企图证明南部有理,说它仅仅是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总的来说它是要和平的。可是,这个文告的真正的意思,它的目的,则是向西北各州建议单独媾和,建议它们脱离联邦,加入同盟,说是西北部和南部的经济利益一致,而和东北部则正好相反云云。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南部刚一觉得自己有把握占领各边界州,就正式道出了它的进一步的目的——一个把新英格兰各州排除在外而重建联邦的计划。

但是,入侵马里兰和入侵肯塔基同样都遭到了失败——前者是在安提塔姆河会战中,后者是在路易斯维尔附近的佩里维耳会

战中。像在安提塔姆河一样，同盟军在佩思维耳也采取了攻势，攻击了布埃耳军团的前卫。联邦军的胜利归功于前卫部队的指挥官麦库克将军，他坚守阵地抗击占很大优势的敌人，一直到布埃耳能够把主力调来投入战斗的时候。毫无疑问，同盟军在佩里维耳失败以后，势必撤出肯塔基。摩尔根将军统率的、由肯塔基最狂热的奴隶制度的支持者所组成的最大的游击队，也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法兰克弗特（在路易斯维耳与累克辛顿之间）被消灭。最后，罗斯克兰斯在科林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以后，布莱格将军指挥下的败军只好急忙退却了。

这样，同盟军为了重新夺回业已丧失的边界蓄奴州而在最有利时机所进行的、在军事上计划得很巧妙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就完全失败了。除开直接的军事后果之外，这些战斗还在另一方面帮助解除了一个主要的困难。各个真正的蓄奴州之所以十分重视各边界州，显然是因为在这些边界州里有奴隶制成分，正是这个成分，才迫使联邦政府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不断作外交的和宪法的妥协。但是，这个成分在内战的主要战场上，即在各边界州，实际上正被内战本身消灭。很多奴隶主带着他们的《black chattel》（黑色牛马）不断地迁往南部，借以保全自己的财产。随着同盟军的各次失败，这种迁移的规模便愈来愈大了。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星条旗下连续在密苏里、阿肯色、肯塔基和纳纳西作过战的一位德籍军官^①，写信告诉我，这种迁移和1847—1848年的爱尔兰大逃亡十分相像。此外，奴隶主当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一方面是青年，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军事首领

^① 约·魏德迈。——编者注

——都和他们本阶级的主体分开了，这些人有的是在本州组成游击队并作为游击队而被消灭，有的是离开家乡投入军队或行政机构。结果就是：一方面，各边界州奴隶数目大量减少，而在这些州中，奴隶制度原是要经常和与之竞争的自由劳动的《encroachment》（侵犯）作斗争的。另一方面，奴隶主当中最活跃的那一部分人及其白人随从都离去了。这样，只剩下了“温和的”奴隶主，他们很快就会贪婪地去抓取华盛顿为赎出他们的《black chattel》而付给他们的过高的补偿费，因为这些《black chattel》在南部市场一旦向他们关门的时候终究是值不了钱的。这样，战争本身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它实际上把各边界州的社会关系改造了。

对南部来说，进行战争的最有利季节已经过去了；而对北部来说，有利的季节却正在开始，因为内河现在又可以通航了，行之有效的陆战与海战结合的做法又可以实行了。北部十分积极地利用了喘息时机。建造 10 艘在西部河流上航行的装甲舰的工作正迅速接近完成；此外，还正在建造两倍于此数的在浅水航行的半装甲舰。在东部，许多新装甲舰已经下水，同时还有一些正在建造。这些舰船到 1863 年 1 月 1 日将全部造成。‘蒙尼陀号’的发明人和建造人埃里克森正在指导建造 9 艘这样的新军舰。其中 4 艘已经在“游水”了。

在波托马克河上，在田纳西和弗吉尼亚，以及在南部的各个据点——诺福克、新伯恩、罗耶尔港、彭萨科拉和新奥尔良——，军队每天都得到新的增援。林肯 7 月间宣布的第一次征集的 30 万人已经征齐，并且一部分已经开到战场。第二次在 9 个月内征集的 30 万人也逐渐在集中。有些州用招募志愿兵代替了征兵，不过，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严重的困难。无知和恶意的人曾经宣传美国历史

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征兵。这是最大的胡说。在独立战争和第二次对英战争(1812—1815年)中,都曾实行过大量的征兵;在同印第安人进行的各次小战争中,也曾经实行过征兵,这些从来都不曾遇到什么严重的反对。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今年欧洲向美国的移民差不多已达1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英国《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科学促进协会”)最近在剑桥举行的年会上,经济学家梅里威耳不得不提醒他的本国同胞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晨邮报”和“先驱晨报”(更不必说那些 *dii minorum gentium*^①)完全忘记了,或者说,是它们想从英国人记忆中抹掉的,这就是:大部分英国的过剩人口在美国找到了新的家乡。

卡·马克思写于1862年11月4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2年11月10日“新闻报”
第309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① 直译是:小神;这里是:二流报纸。——编者注

卡·马克思 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

英国报刊比南部本身还要“南”。在英国报刊上，北部的一切都是黑的，阴暗的，而《nigger》（“黑鬼”）^①地区的一切全是白的，美妙的，但在蓄奴州本身，人们却不用“泰晤士报”所吹嘘的“胜利的凯旋”来安慰自己。

南部报刊同声悲哭科林斯城下的失败，抱怨普莱斯和范多恩两位将军³⁴⁸“既无能又过分自信”。“谋比耳纪事报”提到第四十二亚拉巴马团，这个团星期五加入战斗时有 530 名兵士，星期六有 300 人，而星期日晚上只剩下 10 名兵士了。其余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或者行军时失踪。弗吉尼亚的报纸也是用这样的调子说话的。

“里士满辉格党人报”写道：“显然，我们出征密西西比的直接目的没有达到。”“里士满消息报”声称：“应该担心的是，这次失败的后果对我们的西征会产生最坏的影响。”

这个预感实现了，正如布莱格退出肯塔基和同盟军在纳希维耳（田纳西）附近的失败³⁴⁹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从同一来源即从弗吉尼亚、乔治亚和亚拉巴马等州的报

① 种族主义者加在美国黑人头上的侮辱性绰号。——编者注

纸上获悉里士满中央政府和各个蓄奴州的当局之间发生冲突的趣闻。这次冲突是由最近的一项征兵法引起的，因为国会通过的这个征兵法大大扩大了通常的兵役年龄限度。在乔治亚，根据这项法律一个叫列文古德的人被征，但他不肯去，因此被同盟的一个代表 J.P. 普鲁斯抓起来了。列文古德向艾伯特郡（乔治亚）的最高法院上诉，后者便发出了一道立刻释放被捕者的命令。在法院判决书的一大篇理由中有一段说道：

“同盟的宪法序言里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个州都是自主的和独立的。如果可以强迫每个民兵脱离他的总司令的监督，那末乔治亚的自主和独立还有什么可谈呢？如果里士满国会可以颁布一项有例外的征兵法，那末有什么东西妨碍它颁布一项无例外的征兵法，即把州长、立法会议委员和司法人员都动员起来从而撤销整个州的行政机构呢？……有鉴于此，并根据别的理由，法院作出本判决，并且通令认为国会通过的征兵法是无效的和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这样，乔治亚州就在自己的辖区以内禁止了征兵，而同盟政府也不敢取消这项禁令。

“分立州”与“分立州同盟”之间的这类摩擦，在弗吉尼亚也发生了。争吵的原因是州的行政当局拒绝授权杰弗逊·戴维斯先生的代表们动员弗吉尼亚的民兵并把他们编入同盟军。就这个问题，陆军部长同约·布·弗洛伊德将军曾交换过非常不客气的信件。后者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他在布坎南任总统期间当联邦陆军部长的时候，就准备了南部各州的分立，同时把一大笔公款也“分”进他的私囊。这位在北部大名鼎鼎的绰号叫做《Floyd, the thief》（窃贼弗洛伊德）的脱离派首领，现在扮演着一个为弗吉尼亚权利而斗争，反对同盟的战士的角色。“里士满观察家报”就陆军

部长同弗洛伊德的通信发表了一段评论：

“整个通信很好地证明那些滥用里士满同盟权力的人是反对和敌视我州（弗吉尼亚）及其军队的。弗吉尼亚正苦于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但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自己的限度的，如果再发生不公正的事情，那末本州就忍无可忍了……弗吉尼亚几乎提供了全部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因此贝瑟耳会战和马纳萨斯会战才打赢了。弗吉尼亚从自己的军用仓库和军械库里拿出75000支步枪和火枪、233门火炮及一个头等兵工厂交给同盟使用。能拿武器的男人一个不留地全部提供给同盟服务。弗吉尼亚不得不用自己的兵力把敌人从自己的西部边界赶走；而同盟政府的亲信们现在对弗吉尼亚州竟敢大肆嘲笑，难道不是岂有此理吗？”

在得克萨斯，由于一再把该州的成年男人派往东部，也引起了对同盟的不满。得克萨斯的代表奥尔丹先生9月30日在里士满国会提出了下面的抗议：

“为了讨伐萨布利的威尔德甘斯，曾派出3500名得克萨斯的精干兵士到新墨西哥的无水平原去送死。结果敌人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到我州的边界上来，他们冬季就要过边界。你们把精锐部队从得克萨斯调到密西西比以东，你们把他们送到弗吉尼亚，你们把他们派到最危险的地段，结果他们在那里被歼灭了。每个得克萨斯团都有四分之三的人进了坟墓或者因病从军队除名。如果现政府还要继续这样从得克萨斯抽调能作战的那部分居民来补充这些受到损失的团的缺额，那末得克萨斯就会破产，而且是无法挽救的破产。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我的委托者们应该保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故乡。我代表他们抗议把密西西比以西地区的男子派到东部，因为这会使他们自己的州给敌人从北东西南四方入侵大开方便之门。”

根据上述南部报纸的几段摘录，可以做出两点结论。第一，同盟政府为了补充部队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走得太远了。兵源枯竭了。第二，也是决定性的，里士满的篡国分子企图用来使脱离运动具有宪法形式的那种《state rights》（州权）论，已经开始把自己的

矛头转向他们本身。杰弗逊·戴维斯先生终究没有能够“使南部成为一个国家”，不管他的英国崇拜者格莱斯顿怎样吹牛³⁵⁰。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1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11 月 14 日“新闻报”

俄文译自“新闻报”

第 313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58 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 5 期

卡·马克思 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

选举确实是华盛顿政府的失败³⁵¹。以前的民主党首领们巧妙地利用了由于财政问题上的失策和军事问题上的错乱而引起的不满；毫无疑问，正式落入西摩尔分子、伍德分子和贝奈特分子之手的纽约州，会成为策划危险阴谋的中心。但是，另一方面，也用不着夸大这一反动的实际意义。现在的共和党的众议院继续开着会，新当选的继任者要到 1863 年 12 月才来接替它。因此，这次选举就它涉及华盛顿国会的范围而言，暂时只不过是一个示威而已。州长的选举，除纽约州之外，其他任何州都没有进行。所以，共和党依然领导着一些州。共和党人在马萨诸塞、艾奥华、伊利诺斯和密歇根选举中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他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所遭到的失败。

稍为仔细地分析一下民主党所取得的胜利，就可得出与英国报纸所宣扬的截然不同的结论。纽约市被爱尔兰人的败类腐蚀得很厉害，直到最后仍积极参加奴隶买卖，它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和南部种植场抵押券持有者的巢穴，它老早就无条件地是“民主党的”了，就像利物浦迄今仍是托利党的一样。纽约州的农村选区这一次还是投共和党人的票，它们从 1856 年起一直没有改变，不过没有 1860 年那样热心。此外，这些地方很多享有选举权的男人在

前线。如果把城市选区和农村选区作一个总的计算,那末,就可发现,民主党人在纽约州所获得的多数,不超过 8000—10000 票。

在宾夕法尼亚,长期摇摆于辉格党³⁵²和民主党,后来又摇摆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民主党多数,总共只有 3500 票,在印第安纳还要少些;而在达到 8000 票的俄亥俄,被揭发同情南部的民主党首领们,例如臭名远扬的伐兰狄甘之流,已失去在国会中的位置。爱尔兰人认定黑人是危险的竞争者。印第安纳和俄亥俄的活跃的农民除了憎恶奴隶主以外,还憎恶黑人。黑人在他们看来是工人阶级被奴役被侮辱的象征,而民主党的报刊也天天恫吓他们,说《nigger》(“黑鬼”)将大批涌进他们州的领土。加之,由于在弗吉尼亚的军事指挥糟糕透顶,也正好在这些州引起特别强烈的不满,因为这些州提供的志愿兵名额最多。

但上述一切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在林肯竞选期间(1860年)是没有内战的,解放黑人的问题也没有提上日程。那时共和党没有联合废奴派,它在 1860 年竞选运动中除了反对把奴隶制度向各领地扩展之外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目标,同时还声明它不干涉已经依法实行了奴隶制度的州实行这一制度。如果当时林肯把**解放奴隶**作为战斗口号提出,他毫无疑问会一败涂地。这样的主张是被坚决排斥了的。

在刚结束的选举中,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共和党人已与废奴派做同样的事。他们坚决主张立即解放奴隶,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作为平息叛乱的一种手段。如果估计到这一情况,就会发现,无论是政府在密歇根、伊利诺斯、马萨诸塞、艾奥华和德拉韦等州得到的多数票,或者是在纽约、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得到的虽居少数然而数量很多的票,两者都是惊人的。在战前,这样的结果甚

至在马萨诸塞也是不可能的。只要政府和下月举行会议的国会表现出应有的毅力,那末,废奴派——现在就等于共和党——将到处获得道义上和数量上的优势。路易·波拿巴的干涉阴谋³⁵³正“从外部”巩固着他们的阵地。现在唯一的危险就是继续任用麦克累伦那样的将军,他们除无能之外,还是公开的 proslavery men (奴隶制拥护者)。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1 月 18 日
载于 1862 年 11 月 23 日“新闻报”
第 32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1958 年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 5 期

卡·马克思 麦克累伦的免职

麦克累伦免职！——这就是林肯对民主党人选举获胜的回答。

民主党报刊曾经十分肯定地断言，西摩尔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以后，林肯所发布的自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在脱离派地区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将立即取消。但是，这个预言上面的油墨还没有干，他们心爱的将军——他们喜爱他，是因为“除了大失败之外，他最害怕的是大胜利”——就被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回到平民生活里去了。

读者们记得，麦克累伦曾针对林肯的这个宣言发表了一个反宣言，这就是他向他的军队发布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中，他虽然也禁止对总统的指示有任何反对举动，但同时里面也有这样的不祥的语句：“公民的职责是使用选票箱来纠正政府所犯的错误或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样，统率着美国主要军团的麦克累伦就迈过总统诉诸即将进行的选举了。他把他的显要地位的重量投到了天平盘上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他对总统政策的敌视，其逼人之甚，除了发动一个西班牙式的政变之外，再不能有更厉害的了。因此，在民主党人选举获胜之后，林肯就只剩下一个抉择：或者堕落为同情奴隶主的妥协派的工具，或者除掉麦克累伦，把妥协派在

军队中的支柱拔掉。

可见，麦克累伦在现在这个时候被免职，乃是一个政治示威。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说，这件事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Commander in chief(总司令)哈勒克在给陆军部长的报告中，曾控告麦克累伦公然不服从命令。情况是这样：10月6日，同盟军在马里兰失败后不久，哈勒克即下令渡过波托马克河，这是因为，正好波托马克河及其支流水浅，为军事行动造成了有利的条件。麦克累伦违抗这个命令，借口他的军队缺乏给养无法前进而按兵不动。哈勒克在上述报告中证明，这是虚伪的通词，东路军比起西路军在供应上享有很大的优先权，而且在波托马克河南岸可以像在北岸一样得到所缺少的物资。除了哈勒克的这个报告以外，还有一个报告。在这第二个报告中，奉命调查哈帕尔斯渡口的军械库被放弃给同盟军一事³⁵⁴的委员会，控告麦克累伦在集结军械库附近的联邦军去解围时缓慢得不可思议——他让他们每天仅行进6英里(约合1.5德里)。这两个报告，即哈勒克的报告和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在民主党人选举获胜之前就已经到了总统手里。

关于麦克累伦的统帅才干，本报的文章已经多次谈过了^①，所以只要回忆一下他曾经怎样力求用战略迂回来代替战术决定，怎样不知疲倦地发掘一些参谋部的审慎考虑来为自己既不能利用胜利又不能预见失败作辩护，也就够了。短暂的马里兰之战使他获得了非份的光荣。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他当时是从哈勒克将军那里接到总的进攻命令的，哈勒克也就是拟定第一次肯塔基战役计划的人；至于联邦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则完全是由于下级的

^① 见本卷第505—508、533—537、556—559、563—566页。——编者注

将领，特别是阵亡了的**勒诺**将军和伤势尚未痊愈的**胡克**将军的勇敢作战。拿破仑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在战场上，处处都同样有危险；谁想要躲避它，谁就一定会落到它的口里。麦克累伦显然熟知这条公理，但是他却没有从里面得出拿破仑想要他的哥哥得出的实际结论。麦克累伦在其全部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到过战场，**从来没有**置身于炮火之下——这是**卡尼**将军在一封信中曾经尖锐地指出过的他的一个特点，这封信是卡尼在波普指挥下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以后，被他的兄弟发表出来的。

麦克累伦善于用审慎持重、沉默寡言和摆架子不与人往来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平庸。使他获得北部民主党无限信任和脱离派方面的“衷心感谢”的，正是他的缺点。他用组成一个在军事史上空前庞大的总参谋部的办法在高级军官中弄到了许多拥护者。一部分西点军校出身、曾经在以前的联邦军中服务过的老军官鄙视后起的“平民将领”，并暗中同情敌方的“伙伴”，这些人在他那里找到了支持。至于兵士，只不过是传闻中知道他的军事才能，但是他们却把军需供应方面的一切功劳都算给了他，并且非常称许他审慎宽厚。一个统帅必须具备的品德，麦克累伦只具备一种：善于在军队中为自己博得人望。

麦克累伦的继任者**伯恩赛德**不大为人所知，所以不能对他有所评论。他属于共和党。但是，接管麦克累伦亲自指挥下的那个军团的指挥权的**胡克**，则无可争论地是联邦方面的最有才能的猛将之一，在军队中被人称为《Fighting Joe》（“善战的约”），他在马里兰的胜利中起了最大的作用。他是一个**废奴主义者**。

向我们报道了麦克累伦免职消息的那些美国报纸，也向我们报道了林肯的坚定的声明：他一丝一毫也不从他的宣言后退。

“晨星报”公正地评论说：“林肯向世界表明了自己是一个迟缓然而坚定的人，他行动特别谨慎，但是从不退缩。他执政以来的每一步都迈得正确，而且每一步都努力坚持。从决心消灭各领地内的奴隶制度开始，他终于走向整个‘反奴隶制运动’的主要目标——从联邦的全部土地上根除奴隶制度，并且现在就已经建树了一个伟大的功勋，那就是：他使联邦对于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再也不负任何责任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1 月 24 日
载于 1862 年 11 月 29 日“新闻报”
第 32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晨星报”公正地评论说：“林肯向世界表明了自己是一个迟缓然而坚定的人，他行动特别谨慎，但是从不退缩。他执政以来的每一步都迈得正确，而且每一步都努力坚持。从决心消灭各领地内的奴隶制度开始，他终于走向整个‘反奴隶制运动’的主要目标——从联邦的全部土地上根除奴隶制度，并且现在就已经建树了一个伟大的功勋，那就是：他使联邦对于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再也不负任何责任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1 月 24 日
载于 1862 年 11 月 29 日“新闻报”
第 32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报纸“里士满观察家报”。它载有一篇详细谈论当前实况的文章，现在我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摘录如下：

“敌方海上实力骤然大增，我们的前途实堪忧虑。这一种实力增长得这样多，在许多方面都比敌人的陆上实力对我们更危险。北方佬现在握有的战舰较战争爆发时多 200 艘。他们正在大力准备即将到来的冬季海战，同时，除开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船只之外，还有约 50 艘装甲军舰在建造中。我们有充足理由预计，今年冬季攻打我们沿海地区的北方佬的舰队，其装备与构造将远远超过以前。即将开始的远征有十分重大的目的。它意在夺取我们最后的一些海港，完成封锁，最后则是选择几个地点侵入南部地区，以便在新年开始时在那里实行解放奴隶的法律。如果否认我们的敌人在拿下我们最后的一些海港之后必将获得的优势，或者轻率地安慰自己，以为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在内陆地区的战斗中击败敌人，都是荒唐的……如果查理斯顿、萨凡那和谋比耳陷于敌手，封锁即将十分严格地实行起来，其严格程度将是我们根据先前的痛苦经验所不能设想的。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在大西洋这边建设一支舰队的想法，再一次面临这样的屈辱性的抉择：或者拱手把船只交给敌人，或者亲手将它们毁坏。我们产棉诸州纵横交织的铁路网将受到一定的破坏，而那时我们会相信（可能已经太晚），我们寄以如此巨大希望的陆战，不得不在大军的供应、给养与集中都已不可能的环境下进行……可是我们的海港被占的致命后果，还比不上另一个更大的危险，这次战争中最严重的一个危险，即敌人在产棉各州占领若干地点，从这些地点实行解放奴隶的计划。当然，为了保证废奴派的这个得意措施能够实现，为了林肯先生在 1 月 1 日以前紧紧塞在瓶子里的复仇精神不致于像苏打水似的无害于人地啾啾消散，正在作着巨大的努力……他们的努力现在是指向我们最容易受害的阵地，他们想毒害南部的人心……预言未来的厄运，是会引起盲目信任政府并把吹嘘当做爱国的群众的不满的……我们并不断言查理斯顿、萨凡那和谋比耳没有防御准备。在南部，自然有不少的军事权威，他们都谈这些港口比直布罗陀还要坚固；但是军人们和他们的附和者是太好用骗人的保证来安慰我们的人民了……我们就听到过人们对新奥尔良说过这样的保证。从他们所描写的来看，新奥尔良的工事比泰尔城抵抗亚历山大的时候还要坚固。可是，人们在一个早晨醒来，却看见敌人的旗帜在它的港口上飘扬着……我们

的港口的防务成了官方的秘密。但是最近的一些迹象是十分令人难安的。几个星期以前,加尔维斯敦差不多未经战斗就陷于敌手。当地的报纸被禁止谈论这个城市的防御手段。除此之外,政府的聋耳朵听不到一个求援的呼声。人民一直平静着。对他们的要求是安于无知,信任领袖,顺从天命,说这就是爱国。就这样,另一个胜利又送给了敌人……这种把一切军事问题都用极端秘密的幕布包裹起来的办法,已经给南部招致了恶果。诚然,这个办法可以使批评化为沉默,把政府的错误遮盖起来,但是它没有迷惑住敌人。敌人一向都准确地知道我们的防御工事的状况,而我们的人民只是在它们陷落到北方佬手中的时候才知道它们的弱点。”

卡·马克思写于 1862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2 年 12 月 4 日“新闻报”
第 332 号

俄文译自“新闻报”

卡·尔 马克思

卡·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手稿)

卡·马克思
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信

贵报第 83 号上所谈的 1861 年我在柏林期间的一件趣事³⁵⁶，只有“一个毛病”：纯属臆造。特据实更正如上。

卡尔·马克思

1863 年 4 月 13 日于伦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手稿
已与“柏林改革报”核对

载于 1863 年 4 月 17 日“柏林
改革报”第 89 号

卡·马克思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支援波兰的呼吁书³⁵⁷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波兰国民政府³⁵⁸代表的同意下，授权以下诸人组成的委员会在英国、德国、瑞士和美国的德意志工人中为波兰组织募捐。即使这样做只能给波兰人带来很少的物质援助，但对他们仍将是很大的道义上的支持。

波兰问题就是德国问题。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统一的德国，就不可能使德国摆脱从第一次瓜分波兰³⁵⁹时开始造成的对俄国的从属地位。德国贵族阶级早就承认沙皇是幕后的最高的国家统治者。德国资产阶级一声不响，消极冷淡地坐视英勇的人民遭到屠杀，而只有人民仍在俄国人的侵犯面前保卫着德国。一部分资产阶级了解到眼前的危险，但他们却甘愿牺牲全德的利益而保全单个的德意志各邦的利益，而这些邦的继续存在是同德国的四分五裂、同俄国霸权的继续保留有不解之缘的。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认为专制制度在东方，就像波拿巴制度在西方一样，是秩序的必要支柱。最后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则是那样专注于发财致富的大事，以致完全丧失了理解伟大历史事件和看出它们的相互联系的能力。在1831年和1832年，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还通过喧嚷一时的声援波兰的示威³⁶⁰强迫联邦议会采取坚决行动。现在，波

兰的最疯狂的敌人——因而也是俄国的最好的工具，就是所谓**民族联盟**³⁶¹的自由派的名公。任何人都能自己作出结论，这个自由主义的亲俄派和**普鲁士上层**有着怎样的联系。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德国工人阶级对波兰、对国外的职责——也是它本身荣誉的要求——就是大声疾呼，抗议德国对波兰同时也是对德国和对欧洲的背叛。**恢复波兰**，这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从自己的旗帜上勾掉这一光荣口号之后应该大书特书在德国工人阶级旗帜上的口号。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

虽然警察制度不许可工人阶级在德国组织这样的群众发动声援波兰，但它决不能强使工人阶级由于旁观和沉默而在全世界面前背上参予背叛的恶名。

由以下诸人组成的委员会请求将捐款寄给协会的房主**博勒特**先生，地址是：伦敦索荷区拿骚街 2 号。经费在协会监督下开支。一当这次募捐的目的许可，报告即行公布。

博勒特	贝格尔	埃卡留斯
克吕格尔	列斯纳	利姆堡
林登	马茨腊特	塔奇基
图普斯	沃尔弗	

卡·马克思写于 1863 年 10 月底
1863 年 11 月以传单形式在伦敦
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弗·恩格斯 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数

致“曼彻斯特卫报”编辑

阁下：

关于丹麦战争³⁶²中作战军队的比较人数，目前正流传着十分荒唐的谣言。一般都认为，德国部队对丹麦部队的人数优势至少是三比一。为了指明这不大符合实际情况，我想详细报道一下每支军队的人数，至少是步兵的人数，因为现在很难得到有关骑兵和炮兵的确切材料。

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驻扎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部队如下：

第一师 (师长格拉赫中将)：	营：
第一旅——第二和第二十二步兵团·····	4
第二旅——第三和第十八步兵团·····	4
第三旅——第十七和第十九步兵团·····	4
第二师 (杜普拉特少将)：	
第四旅——第四和第六步兵团·····	4
第五旅——第七和第十二步兵团·····	4
第六旅——第五和第十步兵团·····	4
第三师 (施泰因曼少将)：	
第七旅——第一和第十一步兵团·····	4
第八旅——第九和第二十步兵团·····	4
第九旅——第十六和第二十一步兵团·····	4
共 计 (营) ·····	36

或者, 每营 800 人 (满员是 870 名兵士和军官)	约 28800 人
骑兵, 4 ¹ / ₂ 团, 每团 560 人	2500 人
炮兵, 约	3000 人
<hr/>	
总 共 (丹麦部队)	34300 人

这个材料不包括 2 月份头几天派到什列斯维希的那几个基干营和预备营, 但是已经不可能查明它们的任何详细情况。

奥地利人派赴战场的是第六军, 该军由以下部队组成:

贡德雷库尔特将军的旅:	营:
普鲁士国王步兵团	3
马提尼男爵步兵团	3
第十八猎兵营	1
诺斯提茨将军的旅:	
比利时国王步兵团	3
黑森大公步兵团	3
第九猎兵营	1
托马斯将军的旅:	
科罗尼伯爵步兵团	3
霍尔施坦亲王步兵团	3
猎兵营 (番号不详)	1
多尔木斯将军的旅:	
2 个步兵团和 1 个猎兵营 (番号和名称不详)	7
共 计 (营)	28

或者, 每营 800 人 (奥军目前编制中的相当大的数字)	22400 人
骑兵, 约	2000 人
炮兵, 约	2600 人
<hr/>	
共 计 约	27000 人

普鲁士人派出的部队如下:

1、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联合军：	
第六师：	营：
第十一旅，第二十和第六十团	6
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四团	6
此外，第三十五轻步兵团	3
第十三师：	营：
第二十五旅，第十三和第五十三团	6
第二十六旅，第十五和第五十五团	6
第七猎兵营	1
2、米耳贝将军的近卫师：	
第一旅，第三和第四近卫步兵团	6
第二旅，第三和第四近卫掷弹兵团	6
近卫猎兵	1
共 计	41
或者，每营 800 人	32800 人
骑兵	3000 人
炮兵	3000 人
	38800 人
奥军	27000 人
联军总数	65800 人

由此可见，丹麦兵士和联军兵士的比例是一比二弱。如果注意到丹麦在丹涅维尔克、杜佩尔和弗雷德里西亚的工事的防御能力，那末现有的人数优势只不过是保证胜利所必需的。现在的力量对比，同 1815 年决定了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对拿破仑的优势的那种力量对比，差不多是一样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84 年 2 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64 年 2 月 16 日“曼彻斯特卫报”

俄文译自“曼彻斯特卫报”

署名：弗·恩·

弗·恩格斯 英国的反德兵力

1864年6月27日于曼彻斯特

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英国用战争威胁着德国³⁶³。据“联合勤务报”报道，已经下令品利科（伦敦）军用仓库和乌里治军械库准备3万人所需的服装和装备，以应急用；而不过几天，我们可以指望，将听到拉芒什海峡舰队开赴松德海峡或贝耳特海峡^①（？）的消息。

关于英国现有的武装力量，“陆海军报”已向我们作了报道。在该报6月25日的那一号上说道：

“准备就绪和我们可以立即下令起锚的海军力量如下：

	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埃德加号’，木制战舰·····	600	71	3094	810
‘勇士号’，装甲舰·····	1250	40	6109	705
‘黑亲王号’，装甲舰·····	1250	41	6109	705
‘皇夫号’，装甲舰·····	1000	35	4045	605
‘赫克脱号’，装甲舰·····	800	28	4089	530
‘卫国号’，装甲舰·····	600	16	3720	457
‘曙光号’，木制巡航舰·····	400	35	2558	515
‘加拉蒂亚号’，木制巡航舰·····	800	26	3227	515

① 大贝耳特海峡和小贝耳特海峡。——编者注

	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狼獾号’, 木制轻巡航舰……	400	21	1703	275
‘探索号’, 装甲舰……	200	4	1253	135
‘兴业号’, 装甲舰……	160	4	993	121
‘喷泉号’, 木制明轮式蒸汽舰……	280	6	1054	175
‘保险号’, 木制战舰……	200	4	681	90
‘萨拉密斯号’, 木制明轮式蒸汽舰……	250	2	?	65
‘屈林鸠罗号’, 木制炮舰……	60	2	268	24

另外,为了在波罗的海和丹麦沿海水浅而狭窄的航道上吃水量较小的特种舰船,海军部已下令以下战舰准备出海:

	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科第丽霞号’, 木制轻巡航舰……	150	11	579	130
‘小鹿号’, 木制轻巡航舰……	100	17	751	175
‘赛跑者号’, 木制轻巡航舰……	150	11	579	130

此外,以下的新制战舰即将造好:

	马力	炮数	吨数	人数
‘阿基里斯号’, 装甲舰……	1250	30	6121	705
‘英王号’, 炮塔装甲舰……	800	5	3963	500
‘凯利多尼亚号’, 装甲舰……	1000	35	4125	605
‘大洋号’, 装甲舰……	1000	35	4047	605

这里还应该加上许多后备蒸汽舰,最后,还有一些岸防船舰,其中包括15艘60马力、装有2门重炮的炮舰。”

在“陆海军报”看来,这15艘炮舰将像牛虻一般骚扰敌人,它们是怎么也摆脱不开的。(好像普鲁士人在波罗的海没有22只同样的牛虻似的!)

这就是“陆海军报”关于舰队所说的一切。去年我们曾到装甲舰队的几艘战舰上去看了看,另外,也很注意地观看了它们的试航。原来这些装甲舰没有一艘能在暴风雨的大海里支持得住。“皇夫号”去年冬天在爱尔兰海航行时遇到风暴差一点沉没,而这种风

暴任何一只木制战舰也是容易经受住的。可见这些战舰只能用于个别的、事先策划好的行动(进行海战或袭击岸防工事),这种行动一完成,就得返回港口。它们不适于进行封锁之类的行动。这些战舰的装甲大部分是 $\frac{1}{2}$ 英寸的,用各种轧制铁制成,用各种方法镶上,但不管怎样总是镶在2英尺厚的木垫上,连完全用铁制成的战舰也不例外。但没有一块装甲能经得住惠特沃思七十磅平头钢质弹,大多数甚至经不住状似炮弹的惠特沃思七十磅钢质爆炸弹。在普鲁士现在正在铸造这种口径的线膛炮,以及旧式的四十八磅炮,这种炮的口径与上述惠特沃思炮的口径大致相同。用这种炮发射的筒式平头(无尖)钢质弹能够穿透这种装甲,即使这种炮弹的后半部是空的,并装有炸药。惠特沃思的试验证明,向铁甲射击时这种爆炸弹**不需要任何传爆装置**;在穿甲时产生高温,使炮弹自热化,其中的火药就会燃烧。

装甲舰的装备通常由六十八磅滑膛舷炮(8英寸口径)和用基轴安装在舰首和舰尾的阿姆斯特朗式一一〇磅炮(7英寸口径)组成。其中有些还装有阿姆斯特朗式四十磅和七十磅舷炮,但不知道是否能用六十八磅炮代替。旧式的六十八磅炮是一种很可观,很安全,口径也很合适的炮,它在2000步以内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无疑是英国舰队最好的一种炮。相反,后装的阿姆斯特朗式炮却很不安全,因为炮膛内的膛线由于炮弹的铅皮包得不好而很快就蒙上一层铅,特别是因为炮门毫不中用。炮门是由从上面快嵌到炮口底壁的一块用螺丝从后面拧紧的长方形铁板构成的。炮的口径7英寸,炮弹就要重110磅,而炮门总共不过135磅,所以很自然,发射几下以后,由于火药灰的关系,炮门就不能嵌得很紧了,因此一当火药气体从下面罩住炮门,炮门就要蹦出来,高高地飞到

空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舰队都不大喜欢用阿姆斯特朗式炮,尽管这种炮打得很准。

在“英王号”上,有4座圆顶或炮塔将装上5门很重的炮,这些炮的性能还不清楚。它的装甲不是嵌在木垫上。这艘舰在大海上能有多大作用,将来就会看到。

较小的,而且一般是木制战舰主要装有三十二磅滑膛炮,炮身長9英尺6英寸或10英尺。这是一种与六十八磅炮不同的很好的炮,它能很好地承受重量达实心弹 $\frac{1}{3}$ 的装药,就它的口径来说,它能很准确地击中目标。但在大型舰船的船舷也装有几门口径8英寸的轻掷弹炮。基轴上的炮有的是8英寸滑膛炮,轻型或较重型,有的则是可以发射40、70或110磅重的椭圆形炮弹的阿姆斯特朗式炮。

大型装甲舰的吃水量至少是25英尺,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把它们与战列舰和最重型巡航舰等同看待。因此它们不适用于狭小的和水浅的地区,航道很深的狭湾和河口例外,在这里它们可以用来轰击岸防炮台和要塞。在这里,如果防御方面的炮过轻,而炮弹又不是钢制的,则它们是有危险性的。普鲁士的二十四磅线膛炮的钢弹是否能穿透它们的装甲,这还是个问题。但对于四十八磅线膛炮说来,这无论如何是可以做到的,只要炮弹由钢制成而且弹头削平,只要炮能够承受炮弹重量的 $\frac{1}{6}$ 到 $\frac{1}{4}$ 的装药,而且射程在600—800步以内。我们用克虏伯铸钢就能很容易地制成7英寸或8英寸线膛炮,如果把这些炮安在适当的地点,即使数量不多,也会很快使英国的重型装甲舰无伤于我国海岸。不过炮弹必须是钢制的,呈圆筒状,不要有任何尖头或圆头,这样,即使炮弹在成倾斜角度射击时也能用它那锋利的边沿刮住铁甲。惠特沃思甚至从50

度以上的入射角也能用这种炮弹穿透铁甲。同样，这样重的炮最好是完全不要进行后装药的试验，因为当火炮的口径大于一定口径时这样做无疑是危险的；但要进行长期的试验又没有时间。

这就是舰队的情况；现在我们听听“陆海军报”关于现有陆军的报道：

“骑兵。第四、五、六近卫龙骑兵团，第一、二（龙骑兵）团，第三、四、八（骠骑兵）团，第九（枪骑兵）团，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骠骑兵）团。每团 650 人，包括军官在内，共 10700 人。

炮兵。10 个骑炮连（每连 6 门炮），26 个野炮连（行军的），每连也是 6 门炮，还有 25 个要塞炮兵连。总共 216 门野炮，13700 人。

工兵。20 个连和 2 个辎重连，共 2700 人。

步兵。第二、三、五、六、八、十、十一、十三、十四、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五十三、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四、六十九、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各团的第一营，第一、十二和六十团的第二营。另外，还有第二十一、三十九和六十二团的第一营正在从美国归国途中，总共 39 个营。把后备连除外，每个营在出征时约有 780 人，或者说大致有 3 万训练好的人。此外还要加上整个陆军的后备部队，共 18000 人，作为第一次补充，最后，还有近卫部队（1300 名骑兵和 6000 名步兵）。

总计：骑兵 12000 人，炮兵 13700 人，工兵 2700 人，步兵 54000 人，共 82000 人。但是要想确定有多少力量可以立即出征，就必须首先把作为后备的 18000 人除外，然后还要扣除 25% 的非战斗人员和国内所不可缺少的部队。这样一来，训练得很好而且有战斗经验的仍有 48000 人左右，他们已准备好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情，只要辅助机关和管理机关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援。这个数目差不多有一半是由新兵组成的轮值后备队。我们不知道刚刚结束今年集训的民军有多少人，但看来要比 1863 年多，当时参加检阅的民军就有 102000 人。最后，志愿兵约有 160000 人。”

这就是“陆海军报”所报道的。今天，看来这个统计大概足够

了,因为我们除此而外还想向诸位读者提供有关英国陆军的确切材料。但愿我们德国军队确信一点:一旦他们同英国人发生冲突,他们的对手是会与那些勇敢有余而训练不足的迟钝的丹麦人完全不同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4 年 6 月 27 日
载于 1864 年 7 月 6 日“军事总汇报”
第 2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军事总汇报”

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³⁶⁴

金累克论克里木战争一书³⁶⁵在英国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是应该的。这本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作者手头有英军司令部的文件,有英国高级军官写的许多札记,还有不少专为他写的俄军将领的回忆录³⁶⁶。尽管如此,这本书从它对战争事件的叙述来说,不像是一部历史著作,倒像是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英军总司令腊格伦勋爵,而其最终目的就是夸赞英国军队,以致达到荒谬的程度。

金累克的书很可能在德国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本书把法国人在阿尔马河胜利³⁶⁷中的作用贬到了极点,对俄国人抱着表面上可敬的无偏私的态度;它引用的是来自所有三个参战国已经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也没有梯也尔及其同伙所特有的那种又讨厌又可笑的法国式的吹嘘。但是我们的英国朋友也并不反对吹嘘;尽管他们吹嘘得比法国人更妙,但过分渲染的程度在这里仍然不下于法国人。仅仅从这一点来说,把那层小说文学的外衣从这部至今已出两卷的书中的唯一战争事件——阿尔马河会战的描述上剥下来,把真正新的历史材料同金累克先生著作中连篇累牍的渲染、夸大和捏造分开,就是很有趣味的事。

但是,除此而外,从战术的角度来看,阿尔马河会战还是具有

非常特殊的意义的，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应有的评价。在这次战役中，两种不同的战术队形在滑铁卢之役以后第一次重新相遇，其中一种基本上为所有的欧洲军队所采用，而另一种则为他们所摈弃，只有英国军队例外。在阿尔马河上，英军以横队对付俄军的纵队，没有特别费劲就把它们打垮了。不管怎样，这证明旧的横队还没有完全过时，像大陆上一些战术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所以，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比较详细地加以探讨的。

—

金累克所引用的关于双方兵力的数字材料极不确切。关于英军，他手头有官方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确定投入战斗的步兵和炮兵共 25404 名，骑兵 1000 名稍多，还有 60 门火炮。这些数字可以说是可靠的。法军的人数，他概算为 3 万人，有 68 门火炮；还应该加上 7000 名土军。按整数算，联军共 63000 人，128 门火炮，这大体上看来是相当正确的。但在计算俄军的时候，金累克先生却发生了困难。诚然，阿尼奇科夫的“克里木远征”一书（德译本 1857 年柏林米特勒出版社版第 1 册）³⁶⁸ 现在是把团、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的名称和番号都罗列出来了，其根据显然是官方资料，其中任何一个重要之点直到目前都没有被否定过。按照这个统计，俄军在阿尔马河上有 42 个营，16 个骑兵连，11 个哥萨克百人队和 10 个半炮兵连的 96 门火炮，总计 35000 人。但这并不能使金累克先生满意。他进行了专门的统计，并且经常把阿尼奇科夫的书当做自己的资料来源，而所得出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但是又不认为必须有凭有据地论证他的那些与资料来源有出入的数字。一般说来，全

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总是在谈到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地方引用目击者的证词，而不是在提出新的大胆的论断的时候引用这样的证词。

就步兵来说，两个统计相差无几。据阿尼奇科夫统计，共有 40 个基干营，1 个猎兵营和半个海军陆战营。金累克把后面这半个营变成 2 个营，并且引证了霍达谢维奇（塔鲁提诺步兵团少校）这个似乎看到过这 2 个营的人的材料³⁶⁹。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金累克自己也承认，俄军认为这些部队无足轻重。此外，他还把阿尼奇科夫提到的 2 个工兵连变成了整整 1 个营，并到处把他们当做步兵来算。

但是在骑兵方面，金累克的夸大就突出得多了。在谈到整个战役的时候，一遇到适当的机会，他就强调指出，俄军在战场上有“3400 杆长矛^①”，而在每个会战计划中俄军右翼后面都有一个大纵队，并且注明在这里有俄军骑兵 3000 人。书中时时提醒我们想到这 3000 人惊人地无所作为，想到他们在近旁对于只有 1000 多名骑兵的英军是危险的。金累克百般提防我们去注意这支骑兵中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哥萨克，而这些哥萨克，人人都知道，他们是不适于以密集队形同正规骑兵作战的。由于全书暴露出对整个军事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个大错误应当说是出于无知，不便说是出于恶意。

至于炮兵，在这里金累克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上面已经指出，照阿尼奇科夫统计，火炮共有 96 门，分别属于 10 个被详细记述的轻重野炮速，外加 4 门系驾舰炮。他还确切地指出其中每个

^① 指哥萨克骑兵。——译者注

炮兵连作战时的位置。金累克也提到了这些炮兵连(个别在番号上稍有出入),但除此之外,他还另加了3个炮兵连。阿尼奇科夫所提到的第十七旅第五炮兵连,在金累克的最初阵地上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左翼(第231页),紧接着又在总预备队中再一次出现(第235页)!同样地,据阿尼奇科夫记述,第十七旅第三炮兵连那里根本没有,但在金累克的书中又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左翼,第二次是在中央作为“阵地炮兵连”!大家都知道,照克里木战争时期俄军炮兵的编制来看(参看哈克斯特豪森“俄国概论”³⁷⁰),每个炮兵旅只有1个由12门火炮组成的重炮连,后来炮兵连由8门火炮组成时,旅里看来也只能有第一和第二重炮连,决不会有第三重炮连,——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却根本不去管它。他只顾把英军在阿尔马河上的英勇功绩写得尽量更不平凡一些,为此他就必须有尽量更多的俄军的火炮。所以,只要他在俄国人的报告(除阿尼奇科夫的以外,这些报告对于了解这些细节都不太适用)里找到任何一个阿尼奇科夫没有提到的炮兵连,他就认为是阿尼奇科夫忘记提到这个炮兵连了,于是不慌不忙地把这个炮兵连同阿尼奇科夫提到的炮兵连加在一起。如果同一个炮兵连他是在不同的资料里两个不同的战场上找到的,他就满不在乎地算它两次,万不得已时就说一次是指轻炮连,另一次是指重炮连。

金累克要了所有这些戏法之后,才不过弄到13个半炮兵连,每连按8门火炮计算,总共108门,而且由于他忽略了阿尼奇科夫所说的第十六旅的3个炮兵连仍然是旧编制——12门火炮(由此可见金累克的工作是多么表面),所以同阿尼奇科夫的统计相比,总共只多了12门火炮。总之,金累克不得不特别卖力,以便使阿尔马河上的高地布满俄军的火炮。在这方面,被英国人过甚其辞

地叫做“大多面堡”的一个野战工事帮了他的忙。阿尼奇科夫所说的只是：

“道路右方的有利阵地由那个旅（第十六旅）的第一炮兵连驻守，以横墙作掩护。”

金累克虽然也十分正确地记述了这个不太重要的工事，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它的后面都是一些普通的十二磅炮，所以他断言这是一些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重炮。不错，霍达谢维奇也断言那里有第十六旅第二炮兵连的火炮（他把第一炮兵连和第二炮兵连弄混了），但是那些至今尚保存在乌里治的加农炮和榴弹炮的口径证明，这些火炮并不是正规的野炮（第 233 页）。金累克并未就此罢休。在第 229 页上他十分明确地说：

“这是些三十二磅炮和二十四磅榴弹炮。”

1849 年普法尔茨起义时，起义者的某些首领总是把他们的部队节节败退的原因归之于他们受到“二十四磅实心燃烧弹”的射击。说这种话的人当然决不会料到用来发射这种可怕的实心弹的榴弹炮会被金累克先生在阿尔马河上缴获。这些二十四磅实心弹对于……意味着什么……^①

^① 手稿下缺两页。——编者注

二

……火炮距离康罗贝尔(他的师受到俄军火炮的牵制)有1500步,而康罗贝尔自己的炮兵至少要迂回半德里^①才能到达那里;最后,拿破仑亲王被阻在离康罗贝尔1200步远的河谷,拖延了渡河。他的部队这样分散在宽6000步的正面上,特别是博斯凯的处境危险,终于引起了圣阿尔诺元帅的很大恐惧,以致他决定采取拚命的手段——把自己的全部预备队调上去。鲁尔梅耳旅继布阿之后被调了上去,而德·奥雷耳旅则不得不去加强拿破仑亲王。圣阿尔诺把他的2支预备队派往2个早已挤满了部队的隘口,这样他就把自己的兵力最后完全分散了。如果这一切不是出自法国官方报告(“东方战争历史图集”³⁷¹),几乎令人不能置信。

这一切在俄军的眼中是怎样的呢,是什么把法军从这种危险处境中救出来的呢?

俄军左翼由基尔亚科夫指挥。他是这样对付康罗贝尔和拿破仑亲王的:第一线是4个预备营(属布列斯特团和别洛斯托克团)——部队质量中等,第二线是塔鲁提诺团的4个营,预备队是莫斯科团的4个营和明斯克团的第二营,后者配备了4门火炮(第十七炮兵旅第四炮兵连)进一步向左方移动,以监视海岸地区。博罗迪诺团的4个营也归他指挥,这4个营更靠近东边,紧挨着通往

^① 1德里(地理里)=7.420公里。——编者注

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他们的任务决不是仅仅限于参加散兵战，他们差不多是专门打英军的。所以，对付法军的总共是 13 个营 8 门火炮。

当波斯凯的迂回纵队开始出现在阿尔马河以南的台地上时，缅施科夫公爵本人就转向左翼，并带走总预备队中明斯克步兵团的其余 3 个营，1 个步炮连和 2 个骑炮连，还有 6 个骠骑兵连。在此以前，战斗只限于散兵战和炮战；俄军大部分稍向后退，法军——拿破仑和康罗贝尔——甚至还未出现在台地上，或者说离得很远（波斯凯、布阿、鲁尔梅耳），暂时还不能投入战斗。因为拿破仑亲王的部队深深陷在隘口尚未走出，所以，除了隐蔽在台地后面的康罗贝尔师以外，俄军就没有任何别的进攻点了。为了对付康罗贝尔师，缅施科夫用明斯克团和莫斯科团的 8 个营编成一个庞大纵队——正面 2 个营，纵深 4 个营，全部成进攻纵队在中央取齐。他被召回到自己的中心地点以后，就把这支孤立无援的一大群人交给基里亚科夫指挥，并下令立即进攻。当这个纵队接近了法军，到步骑枪射击距离时，法军“再也不能支持住巨大步兵纵队逼近时施加于大陆兵士的心脏的压力了”（第 400 页）。

他们沿斜坡进一步往下撤退。但这时越过了起伏地走到稍偏右方的康罗贝尔的 2 个炮兵连和波斯凯的炮兵连一同走来了；他们迅速把火炮拉入阵地，并对这一大群俄军的左翼展开了有效的射击，俄军急忙逃匿。法军步兵没有追击。

基里亚科夫的 4 个预备营，照霍达谢维奇的说法，在散兵射击和火炮射击下“消失了”；塔鲁提诺团的 4 个营损失也很大；庞大纵队的 8 个营肯定已不能立即恢复攻击。德·奥雷耳和康罗贝尔的法国步兵在炮兵的掩护下现在已在台地展开，波斯凯也接近了炮

兵；最后，拿破仑亲王（原由他指挥的朱阿夫兵第二团余部已并入康罗贝尔的部队）的部队也开始攀登高地。力量的优势已经不可比了；集中在电报局高地上的俄军几个营，在法军炮兵的交叉火力下消失了；最后，俄军右翼，如基尔亚科夫自己所说，“开始了十分明确的后移”。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没有受到敌人追击的”撤退（基尔亚科夫的回忆录手稿）。

据法国作者们的记述，法军这时接着进行的总攻击是以对电报局塔楼的一次不存在的强攻结束的，据说还进行了白刃格斗，这样一来，全部战斗就具有一个很漂亮的传奇性的结局了。俄军是根本不知道这次战斗的，所以基尔亚科夫完全否认发生过这次战斗。那时，这个塔楼可能是由射手占领着，应当强攻，此外，它的周围还可能还有其他俄军散兵必须逐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必强攻，更不必整个师赛跑；这段经过在“历史图集”中无论如何是大大夸大了。

会战至此结束，腊格伦要求追击被圣阿尔诺拒绝，“因为部队把他们的背包都留在河的对岸了”（第 492 页）。

会战以后圣阿尔诺和后来巴赞库尔向我们讲的那些英勇功绩³⁷²，经过这样一写就大为减色了。全部法军，包括 37000 土军和 68 门火炮在内，有……^①

① 手稿下缺一页。——编者注

三

英军从联军的左翼进攻，他们的第一线由伊文思师和布朗的轻步兵师组成；他们的第二线是英格兰和剑桥公爵的 2 个师。抽出了 1 个营的卡瑟克特师和 1 个骑兵旅作为左方预备队在暴露的左翼后面运动。每个师由编成 2 个旅的 6 个营组成。英军的进攻正面在布尔留克村附近同拿破仑亲王的左翼紧挨着，宽约 3600 步，第一线的 12 个营每个合 300 步。

纵队一走上斜向阿尔马河的缓坡，就遭到对面俄军炮兵连的射击，根据英国人习惯，第一线立即展开。但是由于正面太窄，轻步兵师的右翼被伊文思师的左翼遮住了，这样一来，整个 1 个营（第七团的）被挤出战线。炮兵在正面前占领阵地。在第二线剑桥公爵师也展开了，由于这个师的各营（近卫军和苏格兰兵）人数较多，所以单是这一个师就差不多组成了整个第二线；英格兰师成纵队留在火炮射程以外，完全像是预备队。俄军是在一点半钟开火的。当法军展开进攻时，英军为了减轻炮火带来的损失，都躺在地上。在河谷的丛林和葡萄园中作战的射手慢慢地迫使俄军退却；俄军在退却时放火烧了布尔留克村，这样就更加压缩了英军的进攻正面。

英军面对俄军的整个其余的部队，即 25 个半（按阿尼奇科夫统计）或 27 个（按金累克统计）营和 64 门火炮。英军用 29 个营和 60 门火炮进攻；他们的营在人数上比俄军多。俄军在第一线有 2

个苏兹达尔团(在最右翼)和1个喀山团(或称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大公团,在右中),与其邻接的是博罗迪诺团。在第二线是弗拉基米尔团,作为特别预备队的是乌格利奇团,留作总预备队的是沃伦团,每个团4个营,此外,还有1个猎兵营和一些海军陆战队。

在三点钟以前,法军的进攻就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波斯凯和康罗贝尔的纵队登上了台地,拿破仑亲王的纵队进入了谷地;预备队显然也已经出动了。这时腊格伦下令英军进攻。第一线起立并像过去一样成横队向谷地推进。由于有葡萄园和丛林,部队队形很快就被打乱了,甚至在那些根据英国条令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以排为单位分成复纵队的地方,也是如此。伊文思师派出2个营和1个炮兵连向右迂回起火的村子,其余的部队在村子左边沿着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运动。在这里英军很快就遭到掩护道路的2个俄军炮兵连的近距离射击;这2个炮兵连成功地阻止了伊文思师前进,尽管英军有18门火炮在对它们射击。与伊文思师对峙的俄军步兵由博罗迪诺团的4个营及第六猎兵营组成;关于他们的行动我们一无所知。

轻步兵师继续向左移动。与之对峙的是喀山团的4个营,这4个营位于横墙后面的第十六炮兵旅第一炮兵连的左右两侧;在第二线与之对峙的是弗拉基米尔团的4个营,这4个营全排成纵队,据金累克说,甚至排成由2个营组成的纵队。英军在可能的限度内顺利地许多浅滩上渡过了河,在南岸发现了一条被高8—10英尺的峭壁掩护着的15步宽的天然护道;在这个掩体的掩护下,他们重新整顿了队伍。在峭壁的对面,地形开阔,朝着约300步远的炮兵连的方向上微微高起。英军在这里只有几个地方遇到了射

手的抵抗；他们自己的人数不多的散兵远远走向左方去了，暴露了整个正面。但是他们既没有把自己的射手派向前去，也没有重新整队；布朗本人不侦察就下令前进，“他依靠部队的英勇”（第 315 页）。左翼的旅留下了 2 个营反击俄军骑兵可能的侧击，而其余 4 个营则会同伊文思师的 1 个营（属第九十五团）向炮兵连前进，一半成横队，一半是散乱的。

他们刚刚顺着斜坡往上爬，喀山团的 2 个纵队就向他们迎面冲来。我们的作者就是在这里开始对不列颠军队的无比素养大加赞赏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兵士在差不多 40 年和平时期以后的现在，仍然具有无可估价的素养，致使他们不像外国军队那样感到步兵纵队的压力……他们开始用自己英国的方式，半开心半生气地向一大堆密集的趾高气扬地向他们逼近的人群射击。纵队没有表现出惊慌的迹象，但看来是一支指挥不当或很差的训练得过于机械的部队。无论如何，它的指挥官不可能给那群开心地迎头痛击他们的英国青年 (lads) 留下他们有威力的印象。很快纵队停住了，退后了，并且在起伏地隐蔽下去了。”（第 325 页）

我们不再多谈这些吹嘘了，只指出一点：金累克津津乐道的这些“青年”和这些“年轻的部队”（这些部队我们见得够多了，参加这次战斗的第三十三团就是前不久才开赴克里木的），从英国现行的 12 年服役期和经常把这个期限延长 9 年的情况来看，那时的平均年龄最少是 27 岁；我们还要指出，从克里木战争和东印度起义时这些了不起的团被消灭以来，每个英国军官方图再度率领这样一些老“青年”都是白费力气的。不过还是打住吧！这个纵队（东边的，在俄军右翼）在作了刺刀冲锋的无力尝试以后，看来甚至不得不在不规则横队的火力面前撤退。另一个纵队向第七团进攻，很

快就转入立射战，并且继续了很久没有散开，自然，损失很大。

英军中央 3 个营向炮兵连进攻，炮兵连的火力看来很弱，阻挡不住进攻。当他们已经很接近，足以向火炮冲锋时，炮兵连进行了一阵齐射，就把火炮挂上前车，疾驶而去。在土质工事里发现一门七磅榴弹炮，另一门只由 3 匹马拉着的三十二磅榴弹炮被第二十三团的上尉贝尔截获。英军占据了横墙的外胸墙，并且在左右两翼集结起来。弗拉基米尔团现在更加接近了，但它不是用刺刀冲向那些溃乱的人群，反而受诱射击，并且站住了。在英军宽广得多的正面的火力下，密集的纵队可能要遭到喀山团的同样命运，但英军却在这时一连两次发出退却信号，在正面的全线上重复了两次；部队开始撤退，起初是个别点，然后是全面，有些地方沉着，有些地方十分混乱。参加战斗的 4 个营共损失 46 名军官和 819 名列兵。

第二线(剑桥公爵的)跟第一线跟得非常缓慢，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它先是过河，然后是在上面提到的护道中隐蔽下来。现在它才开始向前移动。右翼旅的中间一个由苏格兰步兵和近卫步兵组成的营首先发起进攻，但它的左翼被轻步兵师退却逃跑的人所冲乱，而右翼又吃不消弗拉基米尔团的火力；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这个营也在混乱中后退了。这正是在法军的进攻开始缓慢下来，8 个营组成纵队对付康罗贝尔的时候发生的。

联军到处碰壁的这个时候正好成了金累克先生向我们讲述奇迹的大好机会，这个奇迹不亚于“一千零一夜”里的奇迹，并且使希腊伦勋爵得到了意外的荣誉。如果这一情况对会战进程确实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一情况不是由于金累克在这里作为一个目击者(诚然，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目击者)说话而具有某种意义，那我们

就不会谈它了。

当英军开始准备渡河时，腊格伦连同他的司令部骑马从英法两军战线接连的地方急速地越过阿尔马河，到对岸后开始沿着狭谷往上爬，除了遇到一些散兵射击以外，几乎没有遇到其他任何抵抗。很快就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圆的山顶，他爬了上去，在这里可以从翼侧观察俄军针对英军的整个部署情况，甚至可以发现他们的预备队。说进攻军队的将军不要任何掩护部队就出现在敌人翼侧的小山岗上，听起来不管多么奇怪，但既然有许多目击者，这一点就可以不用怀疑了。可是金累克并不满足于把他的主人公直接安置在敌人翼侧之前或其延长线上，他还把所说的那个小山岗移到敌人正面之后，把它摆在这个正面和俄军预备队之间，并说腊格伦勋爵一个人在那里一出现就使全部俄军失掉活动能力。书中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就其戏剧性来说，丝毫不亚于会战计划上对它们的描绘，——在这个计划上，红星标出腊格伦勋爵的位置距英军右翼 1200 步，在绿色的俄军纵队中间。这些俄军纵队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而他则像“雷神宙斯”一样指挥会战。

要我们准确指出这个小山岗位于何处是办不到了，但无论如何它不是在金累克所放的地方，尽管如此，这个小山岗仍然给炮兵提供了良好的阵地，所以腊格伦立即派人去拉火炮，还派人去调步兵。过了些时候，差不多是与英军拿下炮台同时，2 门火炮调来了。其中一门好像打散了俄军预备队（据金累克说，俄军预备队仅在 1100 步以外！），另一门则以侧射拿下了掩护通往塞瓦斯托波尔道路上的一座桥梁的炮台。这个早就遭到比它占优势的炮队（18 门火炮）从正面射击的炮兵连，发射了若干发之后就撤走了，这样一来，伊文思师前进的道路就被打通了。伊文思师慢慢地迫使这里

大部分分散战斗的俄军步兵退却，并会同英格兰师（它的炮队已并入伊文思师的炮队）把自己的火炮布置在上面那个小山岗的顶上。

这时剑桥公爵师正在从左方远处进行着决定性的战斗。该师右翼 3 个近卫营里中间的近卫营（苏格兰步兵）过早地发起了冲击，乱成了一团。现在近卫掷弹兵成横队从右方开始进攻，左方科耳斯特里姆近卫营进攻再度被弗拉基米尔团占据的横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营正面的间隙地，这个间隙地本应由苏格兰步兵来填充，而现在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由重新集结在更后面的该营和轻步兵师余部来掩护。但是在科耳斯特里姆营的左方有科林·坎伯尔的 4 个苏格兰营在行进，也是成横队，从右翼开始呈梯队，秩序井然。

近卫掷弹兵的对面是喀山团的 2 个已被第七团击退的左翼营，以及弗拉基米尔团的 2 个左翼营，这 2 个营现在在掷弹兵和科耳斯特里姆营之间的接合部向左翼进攻；掷弹兵坚持住了，把左翼稍向后撤，并以火力迫使这个纵队立即站住。自然，过了很短的时间纵队就在横队的射击下动摇起来，甚至指挥俄军右翼的哥尔查科夫公爵也不能再使它转入刺刀冲锋了。由于英军掷弹兵的正面稍有改变，纵队遭到了他们全线的射击；它支持不住了，所以一当英军向前推进，它便撤退了。这时，弗拉基米尔团的另外 2 个营同科耳斯特里姆营正进行着对射，直到苏格兰旅终于登上那个高地为止。俄军极右翼苏兹达尔团的 4 个营现在调到更接近于有决定性的战斗地点即炮兵连的胸墙附近，但在这次侧敌行军时突然遭到苏格兰横队的射击，没有认真抵抗就撤退了。

由于哥尔查科夫公爵从被打死的坐骑上摔下来而离开队列，

第十六师师长克维泰斯基将军现在指挥俄军右翼。英军横队对他来说是如此的新奇,以致他根本无法判断敌人的兵力。他自己在金累克所提到的他的回忆录中说道:他看见英军成3个互相掩护的横队(显然,这是3个苏格兰梯队),在这种优势面前他必须撤退,何况弗拉基米尔团的4个营的进攻已经被打退。乌格利奇团的4个营只向前推进到能够止住逃跑的人的地方。炮兵和骑兵根本没有再用,俄军就开始撤退了,英军没有追击,因为他们想保存自己的骑兵。剑桥公爵师损失近500人。

总之,在决定性时刻这里进行战斗的是剑桥公爵师的6个营,支援它们的是轻步兵师的余部,总共11个营(轻步兵师的2个左翼营后来也未转入进攻)对付俄军喀山团、弗拉基米尔团和苏兹达尔团的12个营,如果再加上乌格利奇团的4个营,——尽管它们是否积极参加了战斗还大成问题——则是对付俄军16个营,而且经过很短时的战斗就把他们完全击退了。

作者甚至断言,步兵列队进行的全部战斗为时不过35分钟;无论如何,会战的结局在4点钟以前就已经完全定下来了。对防御阵地坚固、人数至少相等甚至也可能超过的步兵部队这样迅速地取得了胜利,原因究竟何在呢?

英军在指挥上显然是不无缺点的。伊文思根本就没有试图攻击敌人的左翼,而只限于进行消极的正面战斗,除此而外,很明显,第二线的司令官剑桥公爵也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当第一线向炮兵连的胸墙强攻时,第二线不是在那里进行支援;它只是在第一线已被打退以后才来,这就必须从新开始行动。但是一个英国指挥官一旦接近了敌人而又没有接到任何明确的反命令,他就力求尽可能协同友邻部队向敌人进攻,这也就使两次主攻具有果断

性,从而保证了胜利。

俄军方面在指挥上表现了很大的犹豫不决。诚然,缅施科夫不幸在很短的决定性关头远离主要的会战地点,但无论是哥尔查科夫还是克维泰斯基,据他们自己承认,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更加有力地抗击攻击。第一次进攻是喀山团的4个营对英军的5个营,被打退了;第二次进攻也是4个营(弗拉基米尔团的),也被打退了。乌格利奇团的4个营是否作过严重的进攻,我们没有任何资料,而苏兹达尔团的4个营在侧敌行军时却被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作为总预备队的沃伦团,看来完全没有用上。炮兵很快就沉寂下来,而骑兵根本没有动。或许是怕负责,或许是有命令不让拿军队去冒险,总之,俄军在英军的侧翼活动时也没有那种唯一能保证较弱一方获胜的毅力与积极性。

当然,促使英军获胜还有其他原因。俄军是以长的密集纵队作战的,英军则以横队作战。俄军由于敌军炮兵的射击而损失惨重;而英军即使受到霰弹的射击,损失也很小。当步兵群接近时,纵队只有进行最猛烈的、势不可当的刺刀冲锋,才可以免遭敌军横队的猛烈射击,但是我们到处看到的却是进攻中止,变成了射击战。后来怎样呢?如果在敌军的射击下展开,谁也不能说这会导致什么后果,而如果还要保持纵队,以1枝步枪对敌人的4枝,纵队就必被歼灭。正是这种情况在阿尔马河上的每一个场合都发生过。而且,纵队哪怕只有一次遭到射击,也是永远不能重新转入坚决进攻的;进行射击的横队则随时都可以转入进攻。

大家知道,敌对双方——俄军也好,英军也好——散开战斗都很差;因此会战纯粹是由兵群解决的;如果我们不想同意金累克所说的英军好像是半神人,我们就应该承认,在比较开阔的地形上无

论进攻还是防御，横队要大大优越于纵队。

英国人的整个现代军事史……^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63 年 6 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 年第 1 版
第 12 卷第 2 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手稿在此中断。——编者注

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³⁷³

“军事总汇报”不久前详细地分析了皮特里和詹姆斯的一本小册子³⁷⁴，对英国军队的编制作了论述，之后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英国军队在英国国家中的地位。尚待考察的只是英国军队近70年来的历史发展，它的现状、人员、内务规定、战术训练以及独特的战斗样式。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英国军队引起军事观察家特别大的兴趣。这是世界上唯一仍然坚持采取旧的线式战术的军队，直到现在，在步兵的火力战斗的情况下，完全不采用纵队（隘口战斗例外）。它不仅以横队进行射击，而且也只以横队进行刺刀冲锋。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它无疑是一支失败次数最少的军队。无论如何应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支军队的作战方法，尤其是现在，当英国以战争威胁我们德国人从不可能成为可能而使全世界震惊的时候。

—

我们自然是先从步兵开始。Robur peditum（精锐步兵）是英国军队的主力 and 骄傲。从威廉·纳皮尔时代以来，在全英国就有这样一个信条：英军横队的密集火力比任何其他部队的火力都优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一文手稿的第一页

越,英国的刺刀是抵挡不住的;的确,英国人——其实,别国人也一样,——胜利的得来首先应该归功于步兵。

英国步兵有 3 个近卫团包括 7 个营, 109 个基干团, 其中前 25 个团每团各有 2 个营, 第六十团(猎兵团)有 4 个营, 其余的每团只有 1 个营。此外还有 1 个由 4 个营组成的猎兵旅; 总共是 141 个营。基干团里营的数目——1 个或 2 个——完全视需要而定; 一旦情况许可, 则前 25 个团的第二营就只得解散。军官晋级也是在团内进行, 因此常常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 例如现在的第十三团, 它的第一营在牙买加, 而第二营却在新西兰。

精锐的预备部队首先要算近卫军和 8 个苏格兰步兵团, 它们总是光荣地不负这一盛名。9 个所谓“轻”步兵团和 5 个“火枪”团算是轻步兵, 但它们同基干部队的区别不大, 只有 8 个猎兵营才真正是轻步兵。番号从 101 到 109 的各团原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欧洲团, 只在印度服役。

除了这 141 个英国步兵营以外, 在本国内地还有各种部队(这些部队我们以后再谈), 以及各殖民地的部队:

在北美——英国部队 1 个营和 2 个连	1350 人
在西印度——4 个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组成的营	3700 人
在圣海伦岛——1 个英国步兵营	560 人
在马尔他岛——土著要塞炮兵	640 人
在好望角——猎骑兵, 其中 $\frac{5}{6}$ 是霍屯督人, $\frac{1}{6}$ 是欧洲人, 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和瑞士人	900 人
在锡兰岛——3 个土著猎兵营	1460 人
总计	8610 人

最后, 在印度——土著军队; 151 个营, 总计 11 万人。这些部

队除少数外都由英国军官指挥，其整个组织很像英国的基干部队。不过印度军队早在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日就保持着某种特点；例如，那里没有实行官职出售制度³⁷⁵，至少没有正式实行，虽然非正式地也搞这些事情。

截至今年 2 月 5 日，英国步兵在印度有 58 个营，在中国有 3 个营，在毛里求斯岛（弗朗斯岛）有 2 个营，在好望角有 4 个营，在加拿大及其他北美属地有 12 个营，在百慕大群岛有 1 个营，在西印度有 2 个营，在新西兰（由于同土著居民的战争³⁷⁶）有 10 个营，在直布罗陀有 5 个营，在伊奥尼亚群岛有 4 个营，在马尔他岛有 5 个营，在英国本土和归国途中有 42 个营。这 42 个中 6 个在伦敦，9 个在阿尔德肖特兵营³⁷⁷，10 个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杜弗，1 个在泽穆岛，2 个在英国内地，2 个在苏格兰，10 个在爱尔兰，2 个在归国途中。在这里舰队对军队的巨大支援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舰队的保护，没有舰队提供的快速运输工具，这些力量薄弱的警备部队是远远不够的。但在舰队只能给予不太大的支援的地方，例如在印度和加拿大，警备部队则很强；在地中海的各战略阵地也是如此，因为在那里必须预防同欧洲军队发生冲突。

以前的通例是只有在战争的情况下才派近卫军到国外去，但现在却有 2 个近卫营驻在加拿大。

作战步兵总数目前已达 133500 人，平均每营 884 人；1 营分 10 连，每连有 1 个上尉、1 个中尉和 1 个少尉（ensign）。此外，每个营——近卫军除外——还有 2 个后备连，以训练新兵；由 6—8 个这样的后备连组成后备营，共有 23 个，总计约 18000 人。所有这些后备部队都驻扎在英国本土，主要驻扎在沿海或近海地区。这样，英国步兵总数为 15 万人稍多。

二

军官都是从国内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当中征来的。对应征者并不要求有很好的理论修养：规定的考试所提出的要求会使普鲁士的少尉发笑。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桑德赫斯特军事学校³⁷⁸里仍然被尽量地吸引到军队中来，特别是让那些考得最好的人不用买就获得少尉的职位。语言知识要求不高，而且应征者在某几种欧洲语和印度语之间有很大的选择自由；数学的要求极低；但对于根据实用性的题目用通顺、明白的文笔写英文作文这一点，却比德国军队更加注意得多，在德国军队里，差不多每个军队都用自己独特的德文书写，并不是始终都使用正常头脑都能理解的德文。不问政治信仰如何，在这个国家里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贵族阶级中，两个主要政党的代表几乎是相等的；英国最有名的军人世家纳皮尔家族过去和现在就差不多都是毫无掩饰的激进派。总的说来，所注意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性格的勇敢；既然英国军官肯定可以指望被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并迅速地参加战斗，那就可以清楚地想像到，英国军队并不像某些其他军队那样，是一个差不多完全缺乏兵士的一切体质上精神上的素质的人们的收容机关。而正是这些素质才是好的军官队伍的主要保证；因为，尽管有上述这些好规章，像英国军队中的那种徇私情、拉亲族关系的现象还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没有权势关系，谁也不可能进入军官队伍，而没有钱谁也不可能晋升上去，除非是幸运地碰到紧挨着自己的

那个资格较老的军官阵亡。诚然，这里也同样常有光荣的例外；去年逝世的克莱德勋爵，在他再度征服丧失了印度以后当了元帅，他就是格拉斯哥一个鞋匠的儿子；但是，就是这位贫穷的科林·坎伯尔，早在 1807 年远征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就已经是军官了，在 1854 年被派往克里木时才不过是一个上校，而且，如果他没有一个远亲当团长的话，恐怕他一辈子也当不上军官。

英国军官，特别是在英国本土，形成了一个十分密闭的团体。他们像普鲁士军官一样，甚至也有自己的行话，或者说腔调；他们同他们的警备部队驻在地的城市的居民很少联系。单身军官住在营房里（即住在营房院内的各厢房里），而且要在军官公共食堂里吃饭，这更促成了这种密闭性。在军队犯了不具有严格军事性质的一切罪过都要受民事法庭审理的国家里，这样一起住营房是必要的。年轻的军官如果在城里犯了足以引起同民政当局的冲突的狂暴罪行，就要严加惩治，但是在营房里却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可以随意接近任何女人，可以大吃大喝大赌，年轻人还可以用最粗野的方式互相恶作剧。谁要是在那里假装正经，那他就要更加倒霉了。几年以前，在某些团里，这些 practical jokes（恶作剧）达到了极点，以致弄到军事法庭上大出其丑，所以从此以后颁布了一些严格的命令，加以禁止；但实际上大家往往还是很喜欢观看这样的玩笑，只是留心不弄成公开的丑事而已。政府每年给军官食堂的津贴是每连 25 英镑；军官食堂必须节省，但也得像个样，好让钱少的军官们不致于入不敷出。尽管如此，花钱的理由还是很多，在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高利贷者用期票和借据使许多年轻的军官都陷入困境。

这种生活方式给英国军官的行为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们在

非军人面前——尽管他们自己不执行职务时差不多总是穿便服——保持着贵族的矜持态度；只有在朴次茅斯这样的设防城市，或者在军官成堆或军官左右一切的步兵学校里，这种对平民的高傲自大态度才少见一点。总之，军官必须表现出他是个“军官和绅士”；他随时都可能“因行为不合军官和绅士的身分”而被军事法庭传讯，被革职，甚至被降级；只要某个军官当众丢丑，他又不先呈请辞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受到这种处罚。大家知道，公开的丑事在德国常常被掩饰起来，在英国是不行的，而这对提高士气只能有好处。

军官不执行职务时可以穿便服，这对我们德国人来说不管多么不习惯，毕竟是有其非常可取之处的，而且英国的例子也完全证明这样做决不会影响军官们的军人精神。不过，应该指出，在主要的警备部队中，如查塔姆、朴次茅斯等地的警备部队，军官们的勤务很忙，他们不常穿便服出现。

决斗在英国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军官之间最后一次决斗是20年以前在一个少校和一个中尉之间发生的，两个人还是姻兄姻弟，少校被打死了，中尉被陪审员宣判无罪，因为他是遭到了前所未闻的挑拨。在威灵顿本人的热心参加下所确立的英国军官们的荣誉观的原则是：谁无缘无故侮辱了别人，谁就使自己失掉了荣誉，而不是使被侮辱者失掉荣誉；谁只有尽自己的力量来改正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谁才能恢复自己的荣誉。因此，谁要是首先侮辱了同事，而又不纠正自己的过错，或者这种侮辱已经无法洗清，那末他就要得到行为不合绅士身分的罪名；军事法庭很快就会加以妥善处理。这些观点在某些人看来，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看来，会觉得相当奇怪，但其中所包含的理性无疑要比某些把决斗狂热地誉

之为 point d'honneur (荣誉攸关的事) 的人所估计的要多。这里完全保持了军人的荣誉感, 能够在这方面经得起任何比较的英国军官就证明了这一点。

官级的提升在团里到处都是根据资格加上职位购买。就是说, 只要一出缺, 下一级的校官就可以选择他是否买这个职位; 如果不买, ——只有在缺钱的情况下他才不买——, 那就再轮到下一级, 等等。这种职位出售无疑是英国军队的一项最坏的制度, 是别国军队的军官从来不会容忍的。英国人往往提出种种轻松的理由为这种制度辩护, 说什么这种制度可以使年轻的军官更快地升上去, 这种制度是传统的制度, 很难废除, 等等, 但是即使估计到这一切, 这种制度仍然是荒谬的, 可恶的。英国军队不能取消这种制度, 这是英国军队的耻辱, 而有才能的军官由于他们只有薪饷没有资本就只能屈居于很低的官级上, 这无疑会大大伤害军官们的情绪。

一张基于步兵少尉的军衔证书的价格是 450 英镑 (3000 塔勒); 如果少尉要想得到中尉军衔, 他必须再付出 250 英镑 (1700 塔勒); 要得到一张上尉的军衔证书, 还得再付 1100 英镑 (7030 塔勒); 一张少校的军衔证书, 再加 1400 英镑 (9030 塔勒); 一张中校的军衔证书, 再加 1300 英镑 (8700 塔勒)。因此, 这张军衔证书总共要值 4500 英镑, 也就是 3 万多塔勒, 而这笔钱, 军衔证书的持有人在得到上校军衔以后, 再从自己的继任者那里收回。在近卫军和骑兵中价格还要高; 在炮兵和工兵中没有出售职位的现象。如果一个军官死了, 全部投资也就丢掉了, 他的下一级军官就可以不用买而接替他的位置。从上校开始, 出售职位就已经不实行了; 每一个当了三年中校的军官可以依法升为上校。禁止用高于规定的

价格购买军官职位，违者免职，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仍然层出不穷。

因为考少尉时所提出的要求一般不包括任何军事知识，所以在晋级中尉和上尉以前还要举行专门考试，如实际勤务、勤务条令、军事法规及队列教练等方面的知识。不要求战术理论知识。

近卫军军官的军衔较高：近卫军的少尉相当于基干部队的中尉，中尉相当于上尉，上尉相当于中校。这在基干部队里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军士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升为军官。每个营里的主要日常工作由副官、军需官和财务官这三个军官来做。因此这些职位常常是挑选老的、可靠的军士来担任，此后，这些军士就永远也升不到免费取得的中尉以上了。一般说来，升军官的机会是极少的，除非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英国军队实行招募，这决定了它是一个由下流的粗野的分子组成的大杂烩。英国军队的这个性质、由此而来的部队风气，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需的纪律形式，就必然造成军官的社会阶级高于兵士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官兵的距离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所以在这里下级军官顺着职务的阶梯往上升是很困难的，而且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出售职位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招募制度，则这样的事情就只能是罕见的例外。有教养的年轻人作为志愿入伍者加入军队，以便服务到一定期限而取得军衔，这在普鲁士和法国是常有的事，在英国却不可能；部队的性质如此，大家就会以为年轻人当兵完全是出于另外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因此，英国军官差不多都是由一些被培养成绅士的人组成的，而兵士们也就更加尊敬军官，军官显然是他们的“天然尊长”，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

因此,官兵之间说话的声调也是冷冰冰的,干巴巴的。两个等级只是用命令和服从的关系联系着。从来不表示亲热,不开玩笑,也不发火。军官很少直接称赞或斥责兵士,有称赞或斥责时总是用那种平淡干巴的声调。这当然只是就队列教练等等勤务上的相互关系而言;有时英国军官也会骂得很凶,这样的事他们的勤务兵可以说个不完。

英国军队所独有的特点之一,就是军官可以有两个军衔:在自己的团里有一个较低的军衔,在全军中又有一个较高的军衔。第二个军衔如果是永久授予的,不带任何限制条件的,则是“名誉军衔” [Brevet-Rang]。这样,上尉在全军中可能是“名誉少校”,或者是“名誉中校”;甚至常常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印度非正规部队的指挥官):在自己的团里他们只是中尉,但在全军中却是少校。这样的上尉兼“名誉少校”在自己的团里执行上尉职务,但在执行警备勤务或兵营勤务时就算是参谋军官。这个较高的军衔可能也有薪俸,但只在一定的时期内,或者在一定的部队里,或者在一定的战场上。例如,在最近10年来,某些上校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或者无论如何在他们驻在近东期间,是被授予了“准将”或“少将”军衔;在印度也是这样。这种制度是不依资格限制而鼓励某些优秀的或特别有用的人的手段,但是很明显,它会引起许多烦恼和误解。英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在克里木的法国人讲清楚,为什么同一人而能兼任上尉和少校。

晋级时有这样一条规定:少尉和中尉现役不满2年者不能升上尉,军官不满6年者不能升少校。

非桑德赫尔斯特学校学员的军官的军事训练,是在排连教练中进行的,完全像兵士的训练一样;只有通过营长提出的考试后,

他们才可以免除队列教练，担任军官的职务。营的全部中少尉军官每年在营的春季训练开始前要编成队，由一个参谋军官来训练；就这样，他们要手拿着枪，全部学完各个教练和排连教练的课程。但这通常只是极其表面地做一下而已。

三

大家知道,军士和兵士的补充是靠招募来实现的,而且仅限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只有第一〇〇团是在加拿大进行招募的。招募工作归军的主任副官管辖,用两个办法进行。第一,各独立团和各后备营可以在它们的驻地招募。第二,此外,设招募处在全国有组织地招募。为此目的,把全国划分为9个招募区(英格兰4个,苏格兰2个,爱尔兰3个)。每个区都由一个督察参谋军官(通常是“名誉上校”)经管;必要时,区还可以划小,由中尉或上尉主持。招募处共有:8个参谋军官,9个副官,9个财务官,9个医生,11个招募中少尉军官(半薪),8个司务长,48个军士和相应数量的兵士。此外,近卫军可以例外自行招募。每个新兵有权选择他愿意在里面服役的部队。每个部队应该尽可能在它冠名的郡里进行补充,这种说法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外国人只有得到特许才能被录用,所以他们常常冒充“苏格兰人”混过去。

战时,民军主要是充当训练基干部队的学校;根据民军转为基干部队每次规定的一定人数,有关民军团的军官取得基干部队的军衔证书。1857年印度起义时,甚至每一个曾经招募过1000名新兵的参谋军官,即使退了役,也被授予中校的军衔证书。

每个新兵或超期服役兵都可以免费得到全套服装和一份服役金,多少根据新兵的需要而变,但决不低于1英镑,超过10英镑(67塔勒)的情况也很少。不同兵种的服役金往往也不同;工兵发

的最多,因为这里所用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材。服役金有时在宣誓以前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到达团里以后和在团长接收了新兵以后才发。所谓宣誓,就是新兵在他被招募的24小时以后到治安法官那里宣读誓词,说他参军是自愿的,他服兵役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骑兵、骑乘炮兵、工兵、辎重兵,以及驻扎在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圣海伦岛的步兵部队招收新兵,年龄规定从18岁到25岁,其余炮兵和步兵部队则从17岁到25岁。身高规定如下:

骑兵:

近卫胸甲骑兵	从5英尺10英寸至6英尺
重龙骑兵团	从5英尺8英寸至5英尺11英寸
中龙骑兵和枪骑兵	从5英尺7英寸至5英尺9英寸
骠骑兵	从5英尺6英寸至5英尺8英寸

炮兵:

炮手——最低限度	5英尺7英寸;如果小于18岁,则为5英尺6英寸
驭手	从5英尺4英寸至5英尺6英寸
射手——最低限度	5英尺6英寸

步兵——最低限度:

近卫军	5英尺8 ¹ / ₂ 英寸
基干部队	5英尺6英寸

但是这个最低限度是变化无常的;每次严重的战争威胁都会迫使政府立即降低这个限度;由于把服役期限从12年缩减为10年,不久将有大批兵士复员,这个情况就足以使政府在几个星期以前把步兵身高的最低限度降低到5英尺5英寸了。总的看来,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标准越来越降低,尽管实行募兵制所招募的兵士的身材总是平均比实行普遍兵役制或征兵制所征募的兵士高。在英国也是如此,从上面所引数字就可看出,这个数字很容易

折算为莱茵的尺寸：只要从 5 英尺至 5 英尺 6 英寸这个规定标准减去 $2\frac{1}{4}$ 英寸，从 5 英尺 7 英寸至 6 英尺这个标准中减去 $2\frac{1}{2}$ 英寸，——这是相当确切的。

除了身高，还规定了起码的胸围：身高 5 英尺 6 英寸至 5 英尺 8 英寸者，胸围 33 英寸；身高 5 英尺 8 英寸至 5 英尺 10 英寸者，胸围 34 英寸；超过 5 英尺 10 英寸者，胸围 35 英寸。驭手、辎重兵和射手的胸围不得小于 34 英寸。不过，有的驭手虽然不能完全达到这个条件，但只要他们有养马的经验，也可以被录用。

不小于 14 岁的男孩，如果父母同意，可以招募来当鼓手和号兵。他们不领任何服役金。

步兵的服役期限为 10 年，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的服役期限为 12 年；服役期满后，如果仍被认为可用，可以超期服役，步兵再服役 11 年，其他兵种再服役 9 年。再度期满后，可以在服役期满的通知下达后继续服役 3 个月。如果服役期满时该部队驻在国外，则警备部队的指挥官有权把这一期限延长 2 年。

每个兵士只要操行良好，通常都可以准许赎免服役。赎金数目视已服役的时间和尚余的时间以及操行等等而定，骑兵最多不超过 30 镑，步兵——20 镑，殖民地部队的有色兵士——12 镑。

21 年的服役期满后，每个兵士都可以得到养老金。金额视服役长短、操行好坏和服役期间身体损失轻重而定；兵士和军士每天不少于 8 辨士（6 银格罗申 8 分尼），也不多于 3 先令 6 辨士（1 塔勒 5 银格罗申）。根据情况，虽然服役期较短，也可领取养老金。

那些招兵的军士及他们的随从兵士多半在大城市最差的街区逗留，主要留心那些小饭馆。他们也常常沿街游行，戴着有带子的军帽，跟有几个鼓手和吹长笛的，这样来招徕人群，然后设法在他

们当中猎取自己的对象。如果追求的猎物找到了,就赶快设法把它诱进小饭馆里,在那里施展全部诡计怂恿它接受一个签订合同的象征性先令。如果功名心追求者已经拿了这个先令,那末,他要想再不受约束,就只有向治安法官交纳 1 镑“赎役金”(smart-money)。不错,法律规定,未来的英雄必须至少在他被招募的 24 小时以后向法官声明,说他参军是自愿的,自己的决定不变。同时法律还完全正确地认为,被招募者在他拿那个先令时往往是喝醉了酒,并且给他提供先清醒过来的机会。但是,除非招兵的军士不中用,否则他是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猎物放走的。招兵的军士和他的那帮人死盯住新兵不放,而且在新兵去找法官以前,烧酒和啤酒已经又发生足够的作用了。最有趣的是,酒钱大部分往往是由新兵自己付,即军士慷慨地代他垫付而记在他的服役金的账上。在这种情况下,明确规定招募勤务只用单身汉兵士和鼓手去做,万不得已时才用已婚军士去做,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身强力壮,这虽然是可笑的,但是正确的。不能喝酒的人是不适于执行这个勤务的。

当你看到这种招募办法的时候,就会真的像回到了十八世纪。尽管法律用种种形式上的障碍来限制这种做法,但是经过调查,在“完全由自愿者组成的英国军队”中,大多数人在加入这个机构时都是极不自愿的;至于归根到底是不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一般说来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样到军队中来的都是哪些居民阶层,是相当明显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军队像我国以前的雇佣军一样,仍然是 *refugium peccatorum* (罪犯避难所),里面集合了人民当中大部分最有资格的冒险分子,用一种沉重的机械训练和非常严格的纪律使他们在 这里就范。因此,英国军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比那些采用征兵制

(甚至准许代役)或完全采用普遍兵役制(不许代役)而组成的军队要低下得多。只有法国的外籍军团³⁷⁹和法国的那些主要是由朱阿夫兵之类的代役兵组成的部队才可以说同英国军队水平一样,不过不能否认,整个法国军队由于给予职业兵士的特权越来越多,所以按其性质来说已经越来越接近英国军队。但是,甚至法国的 remplacant (代役兵)从社会的、外部的教养来说,也比英国兵营中起主导作用的、从大城市的败类中收罗来的粗野放荡的小伙子好得多。在法国,仍然会有有教养的年轻人作为志愿入伍者加入军队,以便服务到一定期限而升上军官,而且做列兵的考验期对他来说也不是完全不能熬过;在英国,要迈出这样的一步,就非得发疯不可。英国人以自己的整个军队而自豪,而对每一个列兵却很鄙视;甚至在下层居民中,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被招募或者有当兵的亲属是不体面的。不过,近 10 年来应募者的成分无疑大有改善。有关方面力图尽可能得到新兵最充分的历史材料,不让坏透顶的人混入军队。克里木战争和印度起义所引起的大招兵,很快就把军队通常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用以补充自己的道德堕落的居民吸收完了。于是不仅需要降低身高的最低标准(有一次甚至把步兵的身高最低标准降到 5 英尺 3 英寸),而且要使兵士生活比较能有一些吸引力,改善兵营环境,才能从工人阶级中招募一些比较可靠的人。还有就是缺少适当的人去担任许多新的军士职务(克里木战争期间,营的数目几乎增加了 1 倍)。此外,已很明显,像威灵顿在西班牙曾经采用的战法,即一定要洗劫所有攻占的要塞,现在看来,对欧洲是不再适用了。兵士受到报刊的注意,对部队行善之风在高级军官中不久也成为时髦了。人们竭力使兵士的生活变得愉快一些,筹款给他们闲暇时在兵营或营地开展文娱活动,好把他

们同小饭馆隔远一点。这样，特别是最近7年来，主要是靠私人捐款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兵士俱乐部等等。在法国式的营地上，尽可能给兵士们留一块小园地，还试图演戏和开演讲会，有时也举办兵士们自己做的各种小玩艺的展览。这些事情虽然还在初办阶段，但是已越来越流行了。这无疑是必要的。克里木战局和印度战局时期入伍的新兵，水平无疑比过去高得多，因为这两次战争是深得人心的。他们使军队的作风大为改善。在克里木同法国兵士的接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就是要保持这种精神，以便在漫长的和平时期也能招募到这样好的新兵，不再专门依靠一些在平时总是首先自请效劳的无业游民。

尽管如此，军队的大部分仍然是由这些无业游民组成的，一切内务规定也都得适应着他们。有厢房和院落的英国兵营，四面用高墙围起来，通常只有一个大门。军官宿舍是在一个单独的楼里，兵士们则住在另外一座或几座楼里。楼里兵士住处的窗户朝街的那一面，在建筑新的建筑物时通常都是用一道深沟隔开，并且在沟的外沿安上一道牢固的铁栅栏。在有军城库的大城市的兵营中，特别是民军的兵营中（民军1年只集训4周），大楼的整个临街的立面往往是用枪眼代替窗户，而拐角上则筑有小塔楼，好用步枪火力进行侧防，——这证明当局不再认为工人的起义是那么不可能了。兵士们就在这个大的监狱式的兵营中过着他们的全部生活，只有闲暇时候例外。非军人的接近受到严密监视，整个大楼尽量弄得与外人的视线隔开，使兵士尽可能地处在监视之下并且同非军人隔绝。在德国是很平常的那种城市居民与兵士之间的亲热关系、每个人进入兵营的那种方便，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而为了使任何长久的联系都建立不起来，警备部队通常是一年一换。

根据军队的性质,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来哪些违法乱纪行为最普遍。这就是酗酒,晚点名号以后擅自外出,偷伙伴的东西,打架,不服从和用行动侮辱长官。比较轻微的过失不经法庭审理而由营长给予处分。他有惩处的特殊权利,但也可以授权连长给予营内禁闭3天的处分。他本人有权给予以下处分:(1)监禁7天,单独监禁或不单独监禁,罚工或不罚工。受此处分的兵士有权通过营长向军事法庭上诉;(2)关黑洞(black-hole)48小时;(3)营内禁闭1个月,被拘禁的人除担负全部勤务外,还要执行营长交给他的特别任务。此外,每种营内禁闭都附有14天惩罚性的全付武装的队列教练。这种惩罚性的教练不得无间歇地超过1小时,但可以在一天内反复进行4次。在(2)和(3)的情况下,营长可以准许向军事法庭上诉。单独监禁或黑洞监禁应尽可能用来处理酗酒、打架和侮辱长官的情况,情况严重时还可以加上营内禁闭的处分,整个禁闭期不超过1个月。

我们看到,英国军队中的营长掌握着他那些蛮横的小伙子们当中维持秩序的足够的手段。如果这些手段不够用,军事法庭就发生作用了,在这个终审法庭上反叛者就有尝“九尾皮鞭”的可能。这是现存的最野蛮的刑具之一:一条系有9根又长又硬又有结子的皮绳子的短把鞭子。受罚者剥去上身,绑在一个三角框上接受死命的鞭打。第一鞭抽下去就抽出血来了。抽几鞭后再换一条鞭子和一个抽打的人,不让罪犯缓一口气。医生这时当然总是在场的。这样的50鞭,通常会招致长期住院的后果。但往往有人在挨了这50鞭后仍然不哼一声,因为喊痛被认为比挨打还要可耻。

12年以前,使用鞭子是常事,而且可以打到150鞭。如果我没弄错的,说,当时甚至团长就可以不经法庭审理而决定打多少鞭。

后来才以 50 鞭为限,而且只有军事法庭有权决定鞭数。最后,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主要是由于阿尔伯特亲王的主张,开始把兵士按普鲁士方式分为两等³⁸⁰,并规定:只有那些由于从前的过失降为二等,并且在一年时间内表现不好不能转到一等的兵士,才可以因新的过失而受到体罚。但在战场上这种区别就没有了;在这里,每个列兵又要受到鞭子的支配。1862 年,军队中就有过 126 起体罚事例,有 114 人挨了最高限额的 50 鞭。

总的看来,使用鞭子的需要和意愿都大大减少了。同时,既然同样一些原因继续在军队中起着作用,那就可以预料,以后还会如此,而且“九尾皮鞭”也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非常的、特殊的恐吓手段,只准备在战斗情况下对付严重事故。现在已很明显,诉诸兵士的荣誉感比给予丧失名誉的惩罚更有帮助,而且整个英国军队一致认为,兵士被鞭笞以后已经一钱不值了。然而,英国最近一个时期还不会完全废除“九尾皮鞭”。我们都知道,在体罚方面成见有多么深,甚至在社会成分比英国军队好得多的军队里,这种成见现在也还是相当深的;在靠招募组成的军队里,这种极端的恐吓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得过去。不过,英国人认为,既然必须实行体罚,那就应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非常严肃地加以采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某些军队里,很遗憾,也在德国军队里,永远是形式上比较轻的打棍子;而这种只能减少对惩罚的恐惧的办法……^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64 年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 年第 1 版
第 12 卷第 2 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手稿的结尾缺。——编者注

附 录

附 录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关于恢复普鲁士 国籍的申请书³⁸¹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
诺伊基尔希男爵先生

阁下：

敬启者，从 1849 年起我作为政治流亡者寓居伦敦，因王室大赦，我由伦敦重返普鲁士，暂住柏林。

恳请阁下：

(1) 根据王室大赦令和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法令汇编第 15—18 页）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按上述法案第五条，此事属于阁下职权范围；并请

(2) 签发按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八条即关于接收重新迁入者条（法令汇编第 5 页）所规定的证明书，证明我已向本地王室警察局申请迁入。为此，我特报告，我有完全独立的生活来源；如果需要，当即呈上我作为在纽约出版的“纽约论坛报”的编辑之一与该报签订的合同，也可通过其他办法作证。

我暂住贝尔维街 13 号我的朋友斐·拉萨尔先生处，恳请将我所申请的两项证明寄往该处。

谨致崇高的敬礼

忠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61 年 3 月 19 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就恢复其普鲁士 国籍问题所作的声明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男爵先生

阁下：

我很荣幸地答复您本月 21 日的来信，并对您认为我 3 月 19 日的信不十分清楚一事，表示惊讶。

我的请求原话如下：

“根据王室大赦令和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

正是这一请求，阁下感到不十分清楚，并认为其中有矛盾，因为我同时还援引下述论据：按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五条，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属于阁下的职权范围。对于非由军事法庭判决的所有政治流亡者，王室大赦令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我属于这样的流亡者，并且按出生说是普鲁士人（兹将我的出生证——特利尔城户籍簿的抄本（1818 年 5 月 7 日）——作为正式文件附上备查）；而且，我离开祖国是 1849 年，而在此之前我在科伦任“新莱茵报”³⁸²编辑，并且根本未受过军事法庭审讯，仅曾作为该报编辑，招来几起报刊案件，被普通地方法院审讯。因此，很清楚，上述大赦也适用于我。

以上所述，同时也回答了阁下在信中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但是,看来还可能产生另一个问题。王室大赦不仅宣布已依法判决的人免于处分,并保障尚未宣判的人的自由,同时还准许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这除了意味着免于刑事处分外,是否也意味着恢复流亡者因寓居国外 10 年以上而丧失的普鲁士国籍呢?

按照我的解释,按照所有法学家的解释,按照舆论和整个报界的一致结论,无疑是有这个意思。有两个论据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一,大赦令不仅保证流亡者不受处分,而且还明确地保证“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第二,如其不然,大赦就成了完全虚幻的,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所有流亡者都是从 1848 和 1849 年起侨居国外的,即已侨外 12 年,他们全都丧失了普鲁士国籍,如果大赦不予恢复,那末,所谓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实际上就是谁都不准返回。

总之,毫无疑问,虽然普鲁士公民权利因流寓 10 年而丧失,但这些权利应由王室大赦予以恢复。

尽管我的解释和法学家的解释是这样,但实际上的权威和能采取实际步骤的可靠基础还只是当局的解释。

王室当局意欲如何解释王室大赦呢?

当局是否会对大赦作这样的解释:大赦是大赦,而不受阻碍地返回是不受阻碍地返回呢?或者对它作这样的解释:准许不受阻碍地返回就是阻止返回,不管大赦令如何而流亡者仍应没有祖国呢?阁下只要公正地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就会承认,这样的怀疑未必是毫无道理的。

近 12 年来,法令如此之多,随之而来的出乎意外的解释也如此之多,以致到后来任何解释都不完全可靠,任何解释都不会绝对

不可能。

因此，完全可靠的根据，可据以采取实际步骤的根据，只是当**局本身**对某个人所作的解释。

总之，阁下是否承认：虽然根据法律我应失去普鲁士国籍，但根据王室大赦我应重新得到它呢？

这就是我想而且一定得向阁下提出的非常简单而明了的问题。

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还由于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我就不能把妻儿从伦敦迁来。情况很明显：我不能先携带全部家当和家口贸然迁居，**然后**才开始斗争。相反地，如果一般需要进行斗争的话，这个斗争必需在我携带妻儿花很多钱搬回祖国之前结束。

我提的这个十分自然而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合理，还由于阁下本人在本月 21 日来信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根据什么要求“不管 10 年流寓而保留”普鲁士国籍。

从以上所说，阁下可以看到，我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有所提到的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五条作根据。因为，根据这一条，阁下既然是批准入籍的主管当局，那末，阁下同也 *a fortiori* (更加) 是 *interpretando* (经过解释) 而后宣布是否能否由于大赦恢复我失去了的普鲁士国籍的主管当局了。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援引了上述法案第五条。最后，我所以应该找阁下解决这个问题，还由于我正是想在柏林住下，而承认我是普鲁士臣民又是批准住在这一城市的法律前提。阁下是本市的警察局长，因而居住权的批准也取决于作为当局的您对上述问题的意见。

当然，阁下决不会希望(而且对我也不能这样要求)，让我既得不到消息，又不能采取相应的实际步骤，空等三四个月或更长时

间，一直到最后决定迁居问题时才让我知道您怎样解释王室大赦以及您是否愿意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如果这样，几个月都得不到消息，我将在所有安排上、事务上和经济上遭到莫大的损失。自然，我也有权知道，主管当局愿意或不愿意承认我的国籍，而这个主管当局却不能认为自己对我拒不答复或拖延答复是合理的和尽职的。

因此，我直接、坦率、诚恳地向阁下提出问题：

根据王室大赦，您承认不承认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

并盼望您对我的问题作同样直接、坦率、诚恳的答复。我非常希望尽快得到答复，然后，我才能在问题得不到顺利解决——当然，这是不会的——时，赶上在本届会议期间向议院提出这个问题。顺便说明，本届会议还将讨论一个关于大赦的法案，这项法案是因为对大赦令的解释不明确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我非常希望尽快得到答复是因为目前我能呆在这里的时间很短，家庭情况要求我速返伦敦。总之，恳请阁下于最近期间给我坦率的和明确的答复，然后，我才能按规定的方式提出居住本城的申请书。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61年3月25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因申请恢复普鲁士 国籍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书

1861年4月6日于柏林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男爵骑士先生

阁下：

昨天收到您3月30日的来信，我很荣幸地对您作答。我在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阁下认为仍属有效，想必阁下对与此有关的种种事实，尚欠明察，否则，阁下决不会跟着做出3月30日的决定。

下面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将会使阁下相信，目前不应拒绝给我普鲁士国籍。

1、1844年我寓居巴黎时，莱茵省王室总督因我任编辑的“德法年鉴”³⁸³出版一事发出逮捕我的命令，并把此项命令转达边防警察当局，一当我进入普鲁士国土时，即予执行。因而从这时起，我便处于政治流亡者的地位了。

但普鲁士王国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它在1845年1月设法使基佐政府把我逐出法国。

我来到比利时。但普鲁士王国政府又在那里对我继续迫害。普鲁士政府要求驱逐我出境，其借口仍不外乎是，我是普鲁士臣

民,因而它有权通过自己的驻外使节提出对我作何种处理的要求。

由于逮捕令阻碍我返回祖国,所以,属于普鲁士籍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处于被迫害者的地位;这也意味着,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我在其他国家也遭到了迫害和驱逐。

这使我不得不设法使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不能对我继续迫害,因此,便在 1845 年递交了退出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

但即使在那时,我也根本不想放弃普鲁士籍。这可以在**手续上得到证明**。凡是想放弃自己国籍的人,总是因为想取得另一种国籍。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入籍,而且,1848 年法国临时政府还**建议**我入籍,但是被我拒绝。

可见,1845 年的退出普鲁士国籍的申请书,并不像阁下信中所错误地断定的那样,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这一申请仅仅是在残酷迫害下**被迫提出**的口实,好使自己摆脱那个经常被用来进行这种迫害的口实。这是一种**借口**,其目的是反对另一种借口,决不是真想放弃我的普鲁士国籍。由此可见,阁下不应引用 1845 年所发生的事。

引用这件事就意味着为那个迫害德国著作家的万恶专制制度的时代作辩护,意味着使这些迫害继续为虐并从中取利。这意味着,为了剥夺我的普鲁士籍,可以根据那个时候的政治压迫,可以根据:我曾经为了避免经常的迫害而利用了逼着我采取的手段,虽然我从来没有真心地想放弃自己的普鲁士籍。

最后,谈到阁下所提及的 1849 年我被驱逐一事,我必须特别指出,在 1848 年 3 月以后我立即返回普鲁士并定居科伦,当时科伦市政府无条件地同意接受我为该市的公民。诚然,曼托伊费尔的内务部曾于 1849 年下令驱逐我,说我是外国人。但是这种做法

纯系该内务部的极端违法的强暴举动，因此完全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有效的先例来引用。即使在那时，如果不是一系列报刊政治案件本来就迫使我流亡国外（这与这次驱逐完全无关），那我是不会服从这一命令的。

在这些说明之后，我认为，阁下不应援引这些事实，同样，客观上也不可能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于我不利的结论。

2、根据王室大赦令，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大赦令保障所有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因而也保障在这一时期内依法丧失了普鲁士国籍的人不受阻碍地返回，无论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丧失了这一国籍——是由于流寓 10 年而依法自行丧失的，还是由于另外还附带作了退出普鲁士国籍口头声明的。大赦在这两种普鲁士国籍丧失的方式之间没有做出区别。它在 1848—1849 年的流亡者和较早时期的流亡者之间也没有做出任何区别；它在因 1848 年冲突和因前些年的政治冲突而丧失公民权的人之间没有做出区别。

所有政治流亡者，不管他们的政治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公民权的丧失发生在哪个时期，都应得到“不受阻碍地返回”的保障；他们过去的公民权都应根据指令予以恢复。

既然王室在因几年流寓依法丧失国籍和因另外还附有个人声明而丧失国籍之间没有做出区别，所以企图通过解释把王室大赦中从未规定的限制和区分加进去，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对大赦**决不容许作有限制的解释**，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阁下当然是知道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的法学都空前一致地阐明了这一原则。如果这一原则是所有负责执行和解释大赦令的司法机关不可违反的原则，那末，在那些由行政当局负责解释的地区，同

样也应该奉行这一原则。任何限制性的解释都意味着**事后删削大赦令和部分地取消大赦令**。

阁下是极少可能有这种意图的。如果说,我适可而止地引用我所掌握着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材料,那是因为,我感到只要提醒阁下注意对王室大赦的任何其他与我相异的解释都意味着对大赦的限制就够了。阁下从上述可以看出:实际上,正如我在最近的声明^①中所指出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就是王室大赦是否恢复由于10年擅离而依法失去这一国籍的流亡者的普鲁士国籍。如果同意的话(其实阁下本人在3月30日来信中已承认了这一点),那末,除了依法的国籍丧失(它应由大赦撤消)之外,是否还附有某人过去所作的某种声明,就完全无关紧要了,要是对此强加区分,那就是不可容许的对大赦的限制。

3、情况就是这样,这不仅由于大赦的**条文**和由于解释大赦时经常所应有的宽厚的**精神**,而且也由于上述情况的法律实质。实际上,公民权的丧失(现应予恢复,这一点阁下也没有什么异议),究竟是依法自行丧失,还是另外因附有某人的声明而丧失,对于王室大赦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如流亡者个人声明不管法律如何他不愿失去普鲁士国籍不能阻止依法丧失国籍的情况一样,这种声明同样也不能取消或加重国籍的丧失。某人声明了一件本来依法就会发生的事情,即声明退出普鲁士国家,是 *déclaration surérogatoire* (分外的声明),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多余的声明,这种声明无固无碍,有亦无妨。

看来阁下是认为,就是“自愿地”放弃普鲁士国籍的,而其他的

^① 见本卷第668—671页。——编者注

流亡者是非出本愿地由于 10 年流寓而丧失的,因此有所不同。但是,这也不对。流亡者的 10 年流寓也是在手续上**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人阻碍任何流亡者在这一期限届满的时候回国和到普鲁士法院受审。流亡者不这样做,也就是他**自愿**丧失普鲁士国籍。因此,擅居国外 10 年的**最后一天**完全等于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愿意退出普鲁士国籍的书面声明。由于寓居国外 10 年像向政府递交书面声明一样是**自由意志**的表示,所以寓居国外 10 年的最后一天,从每一个流亡者方面来说就意味着他 voluntas tacita (默认) 递交了像我曾经递交过的声明(我的声明已于 1845 年归档并掌握在你手中)。可见,从**手续**上说,所有流亡者也像我一样有过自愿放弃公民权的举动。

当然,这些流亡者如果不愿遭到逮捕和刑事迫害,他们实际上是**不能**回来的,因此,实际上是**被迫**留在国外。但正如阁下从前述第一点中想必看到的,我的情况也是同样的**实际**被迫。我也是实际上被种种侦讯令阻止回国,我也是被迫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和他在 10 年流寓最后一天放弃普鲁士国籍的流亡者的情况一样,何况使我被迫表面上放弃普鲁士国籍的种种迫害还推行到普鲁士范围之外呢。

总之,阁下无论是从手续方面考虑问题,还是从实际情况考虑问题,我的情况都同所有其他流亡者完全一样。所以如果像阁下所不否认的那样,流亡者因 10 年流寓而失去的公民权应因大赦而恢复,那末也应该不管我曾被迫作过退出普鲁士国籍的声明而恢复我的公民权,因为这一声明与依法丧失普鲁士国籍的情况完全相同。

我曾经书面声明放弃本来依法就该失去的普鲁士国籍,但这

种情况，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项声明由于普鲁士国籍已 *lege ipsa* (依法自主) 丧失而不具有任何效力。在我和其他流亡者之间若要找出区别，即使是没有道理的区别，顶多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我在其他某处取得了新国籍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只有这一情况才能认为是**自愿的**举动。放弃普鲁士国籍这件事本身是**被迫的**，这件事本来也会 *lege ipsa* 发生。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入籍。有许多流亡者实际上是这样做了。如果对于这些流亡者来说，一旦他们愿意回籍，王室大赦就应该被理解为给他们回籍的必然权利，那末，对于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国家入籍的我来说，更应该承认恢复公民权是实施大赦的必然结果。

4、我在上面已向阁下说明了：即使我在 1845 年失去了普鲁士国籍，而由于王室大赦，我无论如何^①已取回了国籍。但是，我的申请应获批准还有一个具有同样决定意义的论据，这就是：我已由于**联邦议会 1848 年 3 月 30 日的决议重新取得了普鲁士国籍**。

根据这一决议，凡愿意回到德国并声明愿意恢复自己公民权的政治流亡者，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入德国国民议会的权利。因而，根据普鲁士政府参与制定同时普鲁士也必需遵守的这一决议，凡过去是某邦公民或现在愿意在某地居住的政治流亡者，都恢复其公民权。

由于这一决议，我立即从巴黎回到科伦，在那里恢复了自己的普鲁士公民权，并且同样毫无阻碍地得到科伦市政府同意居住该市。由此可见，无论如何我从这时起又有了**法律根据行使普鲁士公民权**，而曼托伊费尔的内务部对我强行驱逐，这种违法的、违反

① 在原稿中，该处显然是被策德利茨划了一杠，而在页边上写着：“无论如何都不是”。——编者注

联邦议会决定的企图不能使这种情况有任何改变。

这一法律事实是如此具有决定意义,补充一个字都是多余的。

阁下一定会像我一样深信这一点,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地认为,强迫我向联邦议会控诉普鲁士政府违反它的决议,并不是为普鲁士政府着想。如果普鲁士一方面仍然承认**重新行使职权**的联邦议会,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先前的原有的联邦议会**本着人民利益和爱好自由的精神所通过的为数不多的决定,这个矛盾就太大了。

这样的行为方式,无论在法律上或是在政治上,都非同小可和过分离奇,是万万试不得的。

正如阁下所看到的,我甚至不需要引用不以联邦议会决议为转移的、事实上也是得到普鲁士政府承认的预备议会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甚至这一时期已在其他国家**入籍**的德国流亡者,也能重新恢复自己以往的公民权利。

因此,如果说我在 1845 年失去了普鲁士公民权,那末依照联邦议会 1848 年 3 月 30 日的决定,以及我随后迁居科伦,还有我于 1848 年 8 月 22 日向普鲁士政府递交的已在阁下那里存档的声明³⁸⁴,我从 1848 年起已重新享有普鲁士公民权。

由此可见,我现在还具有这种国籍,因为,正如阁下本人所不否认的,由于从那时起流寓 10 年而导致的国籍丧失,应由现行的大赦取消。

我在上面论证了我已经享有普鲁士公民权,它必须得到承认。不管这种论证是多么明显和确凿,但我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是回到祖国,而不是想进行毫无成果的法学理论上的争论。

如果阁下在审理本案时,认为我应当先要求重新入籍,那末,这样的处理办法,只有在阁下声明同意我入籍的条件下,我才能接

受,而根据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五条,您又是此事的主管当局。只有阁下肯无阻碍地给我重新入籍的权利,那时我才能放弃自己已有的法定权利,两者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在此之前,我必须保留这种权利,因此,请求阁下同时也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这样的保留条件之下,把本信件作为一种可能的重新入籍的申请加以审处。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 所得到的答复

条件,即日

送交柏林贝尔维街 13 号

马克思博士阁下

兹对您本年 4 月 6 日的呈文答复如下:这次呈文中所举的种种理由,也决驳不倒下述信念,即您应当算做外国人。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二十条即关于取得和丧失普鲁士国籍条中规定,退出国籍文件一经提出,该国籍即行丧失。因此,无论是您请求退出国籍的动机如何,或是没有在任何其他国家入籍,都于事无关。其次,无论是联邦议会 1848 年 3 月 30 日的决议,或是本年 1 月 12 日陛下的大赦,都不能恢复您的普鲁士国籍。对于德国国民议会选举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上述的决议,而是 1848 年 4 月 11 日的命令,这一命令毫不有利于您。本年 1 月 12 日陛下的大赦令是一种恩诏,因而只施用于免刑和减刑(宪法第四十九条)。普鲁士国籍的丧失从来不是法院判决的结果,因而也不能由恩诏取消。

因此警察总局只能把您看做外国人。如果您想请求取得普鲁士国籍,那末,根据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第七条各款,您享有按

通常手续向所在地区警察局呈递申请书的权利,但您不可能预先得到有关您申请结果的任何保证。

王室警察总局

1861年4月10日于柏林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关于入籍和 居住柏林的申请

第三十三警察分局的鉴定

1861年4月10日作于柏林

1861年3月1日卡尔·马克思博士来到此地^①。

他曾申请想居住此地，并想通过入籍取得普鲁士国籍，今天，他对自己个人的情况作了如下的陈述：

我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信奉新教，根据我以前祖国的法律，具有权利能力。最近12年来，我住于英国，在那里靠写作的收入为生，没有享用过社会济贫基金的津贴。我曾经由于几起报刊政治案件受过数次侦讯，但我可以用附件证明我没有问题。我还没有向任何其他普鲁士机关申请入籍和定居，因而在这方面从未遭到拒绝。我也已被告知：如有隐匿我或我的亲属受过侦讯，不实报我的一般情况，或隐匿已向某某其他普鲁士机关申请入籍等情，将使申请书无效，入籍证明被收回；居住此地问题如何解决与市政府的声明和入境税的征收无关，仅仅取决于王室警察总局；因此，我应当在得到入籍和居住证明之前不作任何安排。

^① 文件中所载显然不确。马克思到柏林是1861年3月17日。——编者注

我在这里还没有赁下住宅，暂住贝尔维街 13 号拉萨尔博士处，并拟用写作所得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

我的收入为 2000 塔勒；我和我的妻子都没有财产。

至于我的兵役情况，我的年龄已使我不承担任何兵役义务。

我没有勋章。

请求：

发给我入籍证明和批准我住在此地。

经本人听取、同意和签名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给警察总监 冯·策德利茨的信

致王室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先生阁下

阁下：

您 4 月 10 日的大札^①已于昨晚收到。

阁下在上次来信中持有这样的意见：虽然大赦应恢复因 10 年流寓而丧失的普鲁士国籍，但由于我 1845 年的申请，这种情况对我也没有意义，而现在，由于我最近提出的理由，阁下又持有相反的意见，即大赦只包括免刑，所以它不恢复任何时候因任何原因而丧失的普鲁士国籍。

诚然，为了我的权利不被损害，我不得不指出：从本人的法律意识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这封信是 (1) 部分地撤销了王室大赦，(2) 不承认联邦议会及其决议，从而破坏了联邦条例³⁸⁵所规定的德国国法基础，(3) 最后，同样肯定地否认了普鲁士的整个公权。

但是，鉴于我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我不想麻烦阁下再听我叙述这三个从法律观点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论点，我同意，在我上一次呈文的末尾已向阁下陈述的那种意义上，照阁下所说，并通过重新入籍的手续，接受我的和我必须维护的权利。

^① 见本卷第 680—681 页。——编者注

由于家庭情况,我必须速离此地,昨天上午我已就此事向我所在地区的警察局提出重新入籍的申请^①, in omnem eventum (以备一用)。

同时谨向阁下通知,由于我将离开此地,我特委托住在此地的斐·拉萨尔先生代收入籍证,代递各种必要的呈文,采取在这件事上所需要的一切步骤,并充分行使属于我的权利。

因此,恳请阁下将最后决定送交住在此地的斐·拉萨尔先生。

谨致崇高的敬意

忠于阁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61年4月11日于柏林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① 在此处手稿的页边上有一个不知是谁的笔迹的批语:“马克思的此次请求已被拒绝”。——编者注

注 释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卡·马克思于1860年1月17日写的“法国的状况”一文，发表在同年2月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了一系列论述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文章。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在自己的某些文章上标有“于巴黎”或“于柏林”的字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

- 建议马克思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从 1861 年年中起,由于美国内战,美国读者对欧洲事务的兴趣大为减少。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1 年期间和 1862 年头两个月,马克思给该报的通讯显著地减少了,至 1862 年 3 月事实上已停止了撰稿。——第 3 页。
- 2 战栗教派(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战栗教派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第 3 页。
- 3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 年至 1901 年在巴黎出版;1799 年至 1869 年是政府官方的机关报。——第 3 页。
- 4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是贝列拉兄弟在 1852 年创办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银行。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它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 年该银行破产,1871 年倒闭。
- Crédit Foncier(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 1852 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Crédit Foncier 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五十年)。Crédit Foncier 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
- 马克思称波拿巴法国的银行企业为 Crédits ambulants(游荡银行),是强调这些银行企业的不稳固性。——第 3 页。
- 5 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6—1857 年巴黎版第 1—3 卷(Colins.《L'Économie politique. Source des ré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Vol. I—III, Paris, 1856—1857)。——第 4 页。
- 6 土伊勒里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府邸。——第 4 页。
- 7 《L'Empire c'est la paix》(“帝国就是和平”)是 1852 年 10 月 9 日路易

·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说中的话。——第8页。

- 8 议会答词是上院和下院根据英国宪法，继每届议会开幕时的国王演辞之后所提出和讨论的答词。像国王演辞一样，议会答词提出施政纲领的基本问题。这里指的是讨论1860年1月24日的议会答词，在讨论进程中谈到了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

英法商约是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它是两国自由贸易拥护者的胜利并符合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关于条约的详情，见本卷第15—19页）。

意大利纠纷：1859年奥意法战争后，意大利争取民族统一的运动加强了，这个运动遭到欧洲列强的反对。早在1859年春，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各公国以及罗马尼亚的起义人民就已推翻了自己的统治者，消灭了暴君的统治并表示要合并于皮蒙特。后来，这些公国在1860年3月举行了全民投票，结果并入皮蒙特。——第9页。

- 9 在葡萄牙的战争指英国干涉葡萄牙内战（1828—1834），这次内战是在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领导的专制派（封建教权派）和立宪派（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英国政府力图巩固自己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影响和摧毁专制派所支持的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阵地，便在1831年把舰队派往葡萄牙海岸，封锁了塔霍河和杜罗河的河口，因而促成了立宪派的胜利。

在希腊的战争指由于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而起的英希冲突。1847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焚。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后来就以此为借口，把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亚洲实行侵略性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阶段。战争的借口是1856年10月波斯的统治者企图占领赫拉特公国。英国政府利用了这件事对阿富汗和波斯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目的是奴役这些国家。英国政府向波斯宣战，派遣军队到赫拉特。但是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爆发了，迫使英国不得不赶紧和波斯缔结和约。1857年3月，根据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波斯放弃自己对赫拉特的要求。1863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的艾米尔的

领地。

在阿富汗的战争指 1838 年英国政府挑起的对阿富汗战争。英国没有能够把阿富汗变为自己政策的工具，便决定用武装干涉的方法使自己的傀儡舒扎沙赫登王位。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占领并蹂躏了国土，俘虏了沙赫；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 1841 年 11 月人民起义，英军被击溃和歼灭。1842 年英国人又一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果也完全失败。——第 12 页。

- 10 指 1858 年 6 月 13 日(1 日)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特别规定：俄国使臣可以从白河口通过大沽进入北京。——第 12 页。
- 11 1856 年 10 月广州遭到英国人的野蛮炮击。借口是中国广州当局逮捕了悬挂着英国旗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的水手。炮击广州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第 13 页。
- 12 指代表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罗马统帅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争夺古罗马政权反对平民派(奴隶主民主派的集团)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公元前 82 年建立了苏拉的独裁。马克思在文中提到的苏拉暗指拿破仑第三。——第 14 页。
- 13 奥白朗仙王和他的妻子蒂姐妮亚(威·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的“可爱的换来儿”是奥白朗恶作剧的起因。马克思在此借指 1860 年的英法商约(见法 8)，该商约在两国关系中成为复杂的政治倾轧的根源。——第 15 页。
- 14 1815 年在英国，为了大地主的利益实行了谷物法，目的在于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为废除谷物法的斗争系由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一斗争的结果，于 1846 年 6 月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标志着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第 16 页。
- 15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于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18 页。

- 16 指 1859 年 4 月 29 日至 7 月 8 日法国和撒丁王国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奥意法战争)。拿破仑第三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口号的掩饰下,实际上进行了具有侵略目的的意大利战争。他害怕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不希望促成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国家,于是在 7 月 11 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
-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是俄国跟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它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第 20 页。
- 17 小型战争是十八—十九世纪军事书籍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指正规军小股部队结合着游击队和民兵的行动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指 1830 年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开始的掠夺性殖民战争。法国殖民者的行动遇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猛烈反抗。只是经过 40 年以后,他们才得以把阿尔及利亚变为法国殖民地。——第 20 页。
- 18 指 1859 年奥意法战争期间进行的两次会战。在 1859 年 6 月 4 日马振塔会战中,法军打败了奥军。在 1859 年 6 月 24 日索尔费里诺会战中,奥军败于法意两军。——第 21 页。
- 19 德意志联邦是 1815 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它的成员包括 34 个邦和 4 个自由市。在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即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进行了接连不断的争夺霸权的斗争。——第 23 页。
- 20 1805 年 12 月 2 日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战胜了奥俄联军。1806 年 10 月 14 日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部队击溃了普鲁士部队,从而迫使普鲁士投降。1809 年 7 月 5—6 日在瓦格拉姆附近,拿破仑打败了查理大公的奥地利军队。——第 24 页。
- 21 指卡·马克思评述格莱斯顿的预算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瑞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

- 预算”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5—71、72—76、77—86、87—95页)。——第27页。
- 22 霍·道格拉斯“海军炮兵论”(H. Douglas,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指1851年伦敦第3版。——第43页。
- 23 暗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8年3月19日的告柏林市民书,这里开头的一句话是“我亲爱的柏林市民们”(《An meine lieben Berliner》)。——第45页。
- 24 维拉弗兰卡和约是1859年奥意法战争后缔结的,和约规定建立一个由罗马教皇领导的意大利各邦的邦联,同时,仍属奥地利的匈牙利也加入这个邦联;伦巴第转归法国(后来又被法国转交给皮蒙特,用来交换萨瓦和尼斯两地);在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各公国中恢复了被人民推翻的君主制度。这个条约完全符合拿破仑第三的计划,它并没有解决意大利民族统一这个课题,相反地却加深了国家的政治分裂,在它的某些地区保存了外国统治。
- 这里所说的蓝皮书是指普鲁士政府1859年7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公布的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外交文件,稍后,在7月30—31日,这些文件又在奥格斯堡的“军事总汇报”上转载。
-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通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材料。——第46页。
- 25 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1795年4月5日同法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
- 耶拿大祸指耶拿会战,见注20。——第46页。
- 26 指亚历山大二世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1859年10月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举行的会晤。虽然普鲁士和俄国两国官方都不指明这次会晤有任何政治目的,但是两国的报刊都指出,这次会见对于加强两国君主的联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第46页。

- 27 奥斯特利茨会战,见注 20。——第 47 页。
- 28 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艾希霍夫 1859 年的文章中以及 1860 年的审判案中,揭露了施梯伯在 1852 年普鲁士政府制造科伦案件暗害共产党人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这个案件中担任主要证人,他用假证词来证实在他的参加下捏造的起诉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第一次揭露了施梯伯所起的这种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
- 洪堡同恩赛的通信指“1827—1858 年亚历山大·洪堡致万哈根·冯·恩赛书信集”1860 年莱比锡版(《Brief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 Varnhagen von Ense aus den Jahren 1827 bis 1858》.Leipzig, 1860)。——第 48 页。
- 29 西库利人是西西里的古老部落之一,最初居于该岛东部。——第 49 页。
- 30 西西里晚祷是 1282 年 3 月 30 日举行复活节晚祷时在巴勒摩发生的反对法国侵略者的人民起义。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兵士胡作非为。起义席卷了整个西西里,结果法国人被赶走,从 1266 年起统治西西里的昂茹王朝被推翻。——第 50 页。
- 31 那不勒斯国王弗兰契斯科二世及其走卒看到人民痛恨波旁王朝压迫的情绪日益增长,于 1860 年春在西西里各地挑起了流血冲突。为了回答这种行为,1860 年 4 月西西里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是在统一意大利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巴勒摩和墨西拿,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是大部分起义者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很快就加入了加里波第的军队。——第 51 页。
- 32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日报,1848—1915 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遵循着自由主义的方向。
-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他曾在 1846 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第 53 页。
- 33 布耳埃通讯社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创办的一家巴黎新闻社,后来与哈

- 瓦斯通讯社合并。——第 53 页。
- 34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 1834 年由普鲁士主持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 54 页。
- 35 指法国与战胜拿破仑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参加国(俄、英、奥、普)于 1814 年和 1815 年签订的两个和约。依据 1814 年 5 月 30 日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法国除某些边境要塞及西萨瓦以外,失去了它在 1792—1814 年各次战争中夺取的所有土地。依据第二个巴黎条约,法国恢复了 1790 年的疆界,并且失去了东部边界上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包括兰道要塞在内。——第 54 页。
- 36 指沙皇俄国向奥地利政府提供军事援助镇压 1848—1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使尼古拉一世恐慌万分;根据他的命令,俄国军队于 1849 年 5 月开进了匈牙利,这就决定了匈牙利革命的命运,巩固了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胜利,并加强了沙皇政府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第 54 页。
- 37 马克思指的是亚·米·哥尔查科夫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15 日)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的外交代表的急电,电文载于“比利时独立报”,转载于 1859 年 6 月 16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167 号。——第 55 页。
- 38 普鲁士的后备军是 1813 年在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后来,后备军由 40 岁以下服满 3 年现役和 2 年预备役的人组成。与常备基干部队不同,后备军是由在特别需要时才被征的预备役军人组成的。1860 年普鲁士军事改革以后,后备军的作用降低了:规定后备军只用于警备勤务,预备役期限增加为 4 年,后备役军人的年龄减到 32 岁以下。——第 56 页。
- 39 指俄国和普鲁士于 1714 年 6 月签订的同盟保证条约,条约保证普鲁士领有东波美拉尼亚,其中包括施特廷市(兹杰辛)。条约是在 1700—1721 年俄国与瑞典的北方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俄国力图用瓜分德意

志境内的瑞典领地的办法把普鲁士拉到自己方面来。——第 58 页。

- 40 七年战争 (1756—1763) 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 (普奥俄法) 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1756—1757 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 1757—1760 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俱为俄奥军队占领，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 1762 年 1 月 5 日 (1761 年 12 月 25 日) 逝世，彼得三世即位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签订胡贝尔茨堡和约 (1763)，从而为自己保存了西里西亚。——第 58 页。
- 41 1772、1793 和 1795 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 (波兰贵族共和国) 进行了三次瓜分。俄国得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鲁士得到了波兰本土 (滨海、大波兰区、马索维亚的一部及华沙等)，奥地利得到了乌克兰西部和小波兰区的一部分。由于这三次瓜分，波兰遂不复为独立国家。——第 58 页。
- 42 在维也纳会议 (1814—1815) 上，奥地利、英国和沙皇俄国，违反各国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利益，为了使各个正统王朝复辟而改划了欧洲地图。维也纳会议不顾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抵抗，决定把莱茵河东西两岸的土地以及北萨克森划归普鲁士。——第 59 页。
- 43 见“意大利问题书信汇编 (自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签订起至会议召开止)” 1860 年伦敦版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 from the signing of Preliminaries of Villafranca to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Congress》. London, 1860)。书信汇编共两卷，所收的书信自 1859 年 7 月起至 1860 年 4 月止。——第 59 页。
- 44 指拿破仑第三对莱茵河西岸的领土要求，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就把莱茵河西岸说成是法国东部“自然疆界”。详见弗·恩格斯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及“萨瓦、尼斯与莱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 文版第13卷第247—299页和第633—680页)。——第60页。
- 45 指卡·马克思“德国的动荡局势”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96—600页)。——第60页。
- 46 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50年11月29日签订的奥里缪茨协议,是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和支持下订立的。这是奥地利的重大胜利,因为普鲁士被迫放弃了它对德意志领导地位的贪求,而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及黑森等问题上向奥地利作了让步。
- 旧的德意志议会是指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见注19)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它由德国许多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只是德国各邦反动政策的工具。——第60页。
- 47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主义的报纸。——第63页。
- 48 指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于1860年2月发给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信。摄政王在自己的信中写道,他同意接受英国关于英奥普联盟的建议,并希望吸引俄国参加。英国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对莱茵河左岸德国土地的侵略野心加强,以及萨瓦和尼斯归还给法国。——第64页。
- 49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缔结的条约。条约具有防御同盟的性质。根据沙皇政府的要求,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第65页。
- 50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65页。
- 51 指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罗马共和国在1849年4—7月实际上是加里波第领导的。在几个月当中,共和国的军队胜利地击退了前来镇压革命的法军、奥军和那不勒斯军的进攻。由于反革命势力占优势和法军将领

乌迪诺背信弃义地撕毁停火协定并占领了罗马城，在人民起义中诞生的罗马共和国遂于1849年7月3日灭亡。——第70页。

- 52 1860年6月16日和17日，德意志的诸侯们和普鲁士的威廉摄政王为一方，拿破仑第三为另一方，在巴登—巴登举行了会晤。会晤并没有满足拿破仑第三的愿望，他力图侵占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的领土，千方百计靠牺牲德意志小邦的办法去勾结普鲁士；同时，由于这次会晤，普鲁士开始在德意志的对外政策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第74页。
- 53 指英国政府和撒丁王国政府所奉行的向拿破仑第三献媚的政策。英国和撒丁都力求和法国结成排他的同盟。——第76页。
- 54 1857年9月拿破仑第三和亚历山大二世在斯图加特举行会晤的目的，是在外交方面建立俄国和法国的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早在1856年巴黎会议上就已显示出来了。在这次会晤中，讨论了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多瑙河各公国问题、意大利的命运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拿破仑第三曾企图提出波兰问题，但没有成功。斯图加特会晤的结果并没有缔结什么外交协定，但却暴露了俄国和法国想进行双边合作的意图。——第76页。
- 55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方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建立了这个联邦。有16个邦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遭到失败以后，莱茵联邦便瓦解了。——第76页。
- 56 荷兰的社会救主是马克思对拿破仑第三的称呼，因为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第一之弟路易·波拿巴的儿子。路易·波拿巴于1806—1810年僭居荷兰王位。

维也纳会议，见注42。

神圣同盟（反动的欧洲君主联盟，1815年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所创）的几次会议于1818年在亚琛、1820—1821年在特劳波（奥帕瓦）和莱巴赫（柳布梁纳）、1822年在维罗那分别召开。所有这些会议都力图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莱巴赫会议正是为了

- 这个目的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国军队到意大利的决议,而维罗那会议则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涉的决议。——第76页。
- 57 指艾·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1860年巴黎版(Ed. A bout. 《La Prusse en 1860》.Paris, 1860)。——第77页。
- 58 这里指的是通讯“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这篇通讯是马克思对阿布的抨击文所作的摘要,马克思没有加任何评论或意见,所以没有收入本卷。——第77页。
- 59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从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80页。
- 60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从1821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81页。
- 61 “陆军海军报”(《The Army and Navy Gazette》)是英国的一家周报,陆军部的半官方刊物,从1860年至1921年用这个名字在伦敦出版。——第82页。
- 62 指1857—1859年印度为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人民起义。起义是1857年春季在隶属孟加拉军、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所谓西帕依部队中爆发的,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贫穷手工业者。在当地封建主领导下的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宗教和种姓的差别以及殖民主义者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而遭受失败。——第84页。
- 63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关于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报告书”1860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0》.London, 1860)。——第88页。
- 64 英法商约,见注8。——第98页。

-
- 65 加里波第于1860年夏给马克思的一个熟人——英国人格林的信证明：加里波第力图使意大利人民争取国家的民族统一和国家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不依赖于拿破仑第三的政策而独立地进行。——第100页。
- 66 指朱·拉法里纳的著作“1815—1850年的意大利史”1851——1852年都灵版第1—4卷《Storia d' Italia dal 1815 al 1850》.Vol. I—VI, Torino 1851—1852)。——第102页。
- 67 指“民族协会”，它是自由保皇派的政治组织，1856年由意大利政治活动家朱·帕拉维契诺和卡富尔的代理人拉法里纳创立于都灵及其他城市，其目的是宣传在萨瓦王朝统治下统一意大利的主张并利用国内民族力量达到这一目的。加里波第也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他代表了这一组织中革命的一翼，但在“民族协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卡富尔的走卒。——第102页。
- 68 1859年秋，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和罗马尼亚居民争取合并于皮蒙特的运动达到颇大的规模。在这些邦中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军队由加里波第统一领导。面临着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王国进攻的威胁，加里波第在10月5日向全意大利居民发出号召，组织全民捐献，购买武器，并宣布自己打算向双西西里王国进行解放战争。——第103页。
- 69 “调查联合王国防御工事的特派员的报告；附证词记录和附录”1860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consider the Defenc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London 1860)。——第105页。
- 70 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塞瓦斯托波尔遭到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军队的围攻。1854—1855年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继续了349天。该城在战斗进程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第106页。
- 71 “康希耳杂志”《The Cornhill Magazine》，是文学月刊，从1860年起在

伦敦出版。——第108页。

- 72 “1858—1860年文件汇编：关于叙利亚过去的或面临的骚乱”第4集（《Papers 1858—1860, respecting past or apprehended Disturbances in Syria》. 4parts）。h

1860年叙利亚发生了屠杀基督教马龙派教徒的事件，从5月底至7月初，叙利亚的穆斯林——德鲁兹人得到土耳其军队的支持，烧毁了不少马龙派教徒居住的城市和乡村，杀害了数千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屠杀是法国密使和土耳其政府挑拨起来的。法国政府利用这些事件，占领了叙利亚，但于1861年被迫从这个国家撤出军队。——第110页。

- 73 P. Dolgoroukow. 《La vérité sur la Russie》. Paris, 1860. ——第110页。

- 74 1859年12月底，法国出版了在拿破仑第三示意下写成的拉·格隆尼埃尔的小册子“教皇和代表大会”。该书被教权派解释为皇帝想限制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庇护九世于翌年初在他的教皇通论里公开谴责这本小册子，法国的高级天主教僧侣随之发动了一个反对法皇的运动。——第111页。

- 75 “日党”是法国对正统派保皇党和奥尔良派保皇党的称呼，这些党派形成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正统派联合了大地主，主张在法国恢复波旁王朝；在七月王朝时期统治过的奥尔良派联合了大金融资本和大工业资本的代表，主张恢复波旁王朝的幼系奥尔良王朝。——第112页。

- 76 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联盟于1867年11月解散。——第112页。

- 77 1860年7月26日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于特普利策会晤。奥皇企图预先得到普鲁士的支持，以便准备同法国和撒丁进行新的战争。结果达成了关于在拿破仑第三侵略瑞典、比利时、荷兰或德

- 意志各邦时共同还击的口头协议。——第112页。
- 78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法国和英国从土耳其那里争得了对黎巴嫩行政管理的改组，黎巴嫩被分割为两个管区，分别由代表地方封建贵族利益的德鲁兹族和马龙派的省长治理。黎巴嫩在土耳其帝国范围内只获得在司法、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某些自治权。欧洲列强为了争夺黎巴嫩市场而挑起了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人之间的宗教仇恨，英国依靠德鲁兹族封建主，法国则依靠马龙派封建主。——第112页。
- 79 英国于1688年政变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它是建立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和其他法令进一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这样就对议会更有利了。——第113页。
- 80 指1858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的“改进印度的行政管理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印度转归国王统治，而东印度公司则予撤销。法令规定印度事务部下面设立印度事务参事会作为谘询机关。印度总督改称副王，其实只是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的意志的执行人。——第113页。
- 81 指1844年出版的茹安维尔亲王的小册子“论法国海军的现状”（《De l'état des forces navales de la France》）。——第115页。
- 82 《La Syrie et l'alliance russe》. Paris, 1860. ——第121页。
- 83 指1860年7月25日拿破仑第三写给法国驻伦敦大使培尔西尼的信，此信曾在法国各报公布。拿破仑第三在信中否认自己对英国的敌对立场，企图消除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对其对外政策的戒心和不信任。——第121页。
- 84 自由党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上半叶在英国形成的，它的成员包括辉格党人、曼彻斯特派（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和皮尔分子（温和的托利党人）。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与自由党对立的是同时期形成的、接替了托利党的保守党。——第127页。
- 85 伦敦圣斯蒂凡教堂是韦斯明斯特宫的一部分，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英

- 国下院的会议就在此举行。——第128页。
- 86 指1860年8月成为法律的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原由东印度公司管辖的印度军队中的欧籍兵员变成替英国皇家服役的军队。英国兵士在印度军队中的数目激增。这个在1857—1859年印度起义（见注62）被镇压后通过的法律是英国政府为改组印度的管理、以求巩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第128页。
- 87 见注80。——第129页。
- 88 指法国政府于1860年准备武装干涉叙利亚，以便在这个国家巩固自己的地位。法国政府利用1860年春夏的叙利亚事件（见注72）为借口，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同意，派军队到叙利亚，军队在那里一直留驻到1861年6月。——第129页。
- 89 “罗伯尔·马凯尔”是法国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同剧作家安基耶和圣阿芒合写的社会喜剧。喜剧的主角罗伯尔·马凯尔是个狡猾投机的骗子手，他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金融贵族的讽刺。——第130页。
- 90 指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24）签订后法国转让给皮蒙特的伦巴第，以及通过1860年3月的全民投票而合并于皮蒙特的罗曼尼亚和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各公国。——第136页。
- 91 《Partant pour la Syries》（“向叙利亚出发”）是第二帝国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的庆祝会上演唱的正式歌曲。这里指的是远征叙利亚。——第138页。
- 92 在巴登—巴登和特普利策的会晤，见注52和77。——第141页。
- 93 马克街即伦敦粮食交易所。——第145页。
- 94 “园艺纪事”（《Gardeners' Chronicle》）是英国农业“园艺纪事和农报”（《The Gardeners' Chronicle and Agricultural Gazette》）的简称；1841年起的伦敦出版。——第146页。
- 95 “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是爱尔兰日报，于1763—1924

- 年在都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取消同英国合并的要求，维护爱尔兰佃农的权利。——第146页。
- 96 指“独立报”（《Independent》），该报是爱尔兰的一家报纸，从1830年起用此名称在威克斯弗德出版，每周出版两次。——第146页。
- 97 指1860年法国提出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西班牙应被准许进入大国之列。由于英国的反对，该方案被拒绝。——第148页。
- 98 拿破仑第三给培尔西尼的信，见注83。——第148页。
- 99 “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一文最初发表于“军事总汇报”，此后该报登载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略加改动后发表于“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和“志愿兵读物”。恩格斯从这篇著作开始，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志愿兵的文章。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是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1860—1862年在曼彻斯特出版。恩格斯从1860年8月至1862年3月为这个杂志撰稿。——第149页。
- 100 志愿兵部队的副官是军训教官，他是正规军的军官，由总司令部根据区司令的推荐任命。——第150页。
- 101 市民自卫团是1848年三月革命后在普鲁士建立的，由居民中各资产阶级阶层的居民组成。市民自卫团首先应该担任维持秩序的任务，没有明确的组织和军事素养，在1848年11月德国反革命力量进攻时期被解散。——第150页。
- 102 “残废者”（《Иррацид》）是沙俄陆军部的机关报即“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ий иррацид》）的简称，该报在1813—1917年于圣彼得堡出版，从1816年起每日出版。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发表在1860年7月31日和8月2日“俄国残废者”第164号和第165号的“东方问题”一文。——第159页。
- 103 由于法国的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复灭，从这时起，法军就留驻罗马，直到1870年。——第163页。

- 104 “褐色的拜斯”（《Brown Bess》）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军队对于明火枪的叫法，这种枪的枪身呈褐色。——第169页。
- 105 圣战是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布德—艾尔—喀德领导下反对法国占领者的解放斗争，从1832年开始继续到1847年为止。阿布德—艾尔—喀德依靠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广大阶层，并把单个的阿拉伯部落团结在他的领导下，于1834年迫使法国承认西阿尔及利亚（除几个沿海城市外）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1839—1844年间，阿布德—艾尔—喀德的国家经过顽强斗争之后被法国殖民者征服，他本人也不得不逃往摩洛哥。但此后反对殖民者的起义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还是西部都没有停止。——第179页。
- 106 法军中盛行的代役制是有产阶级的特权之一。每个应服兵役的有钱人，都可缴付一定数量的钱来雇人代服兵役。代役金归入“军队补贴”特别基金。法国的代役制于1872年被废止。——第180页。
- 107 指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的几次会战。在1859年5月30日和31日的帕勒斯特罗会战中，法国和撒丁军队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关于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见注18。——第184页。
- 108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是一家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政论性的双周刊，从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90页。
- 109 民族联盟，见注76。
华沙会议是指俄国皇帝、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摄政王子186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的会晤。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由于要阻挠意大利的统一，对抗为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撑腰的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企图互相拉拢。——第192页。
- 110 1859年3月3日（2月19日）俄国和法国在巴黎签订秘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一旦发生法国、撒丁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的战争，俄国必须对法国采取善意的中立立场。法国则允诺提出修改1856年巴黎和约的条文问题，这些条文限制了俄国在黑海的主权并从它那里割走了贝萨拉比亚的一部分。俄国履行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而拿破仑第三虽从

条约中得到了各种好处,但却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而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冷淡起来。——第194页。

- 111 哥达党是1849年6月在哥达(绍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194页。
- 112 *Via sacra* (神圣之路)是指古罗马获胜而归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Via sacra*》这一术语的转义是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军。——第197页。
- 113 指加里波第1860年9月10日的告巴勒摩居民书。
克维里纳尔山是罗马位于其上的七座小山之一。——第198页。
- 114 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在五十一六十年代是约瑟夫·波拿巴(普隆-普隆)亲王的官邸。——第199页。
- 115 “民论报”(《L'Opinion nationale》)是从1859年至1874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第199页。
- 116 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853年2月19日在柏林签订的通商条约。这一条约消除了大部分有碍两国发展贸易的关税壁垒。
关税同盟,见注34。——第200页。
- 117 弗·奥·格黑菲思“炮兵教范和英国兵士简明指南”(F. A. Griffiths. 《The Artillerist's Manual, and British Soldier's Compendium》)。1840年第一版。——第204页。
- 118 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60年10月20日颁布的十月恩诏,恩诏准许帝国的各民族区享有某种自治权。恩诏压一压集权派即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利益,对联邦制的拥护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让步。但是,这个让步并没有满足匈牙利人进一步发展1848年以前的匈牙利宪法的要求。翌年初,十月恩诏由于1861年2月26日颁布特许诏而被取消,后者重新提出了奥地利帝国的集权制原则。——第205页。

- 119 1849年3月4日，奥地利的权臣背着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举行了政变，在全国强力推行新的反民主宪法；在克罗梅尔日伊希开会的国会解散了。三月四日宪法规定了上院占优势的两院制，实行了选民的高度财产资格和年龄资格限制，皇帝被授予有对议院决议的否决权等等。但是，三月四日宪法仍然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以后就被废除了。——第205页。
- 120 指欧洲最古老的匈牙利不成文宪法，它是据旧的传统和王国的法令而形成的；这些旧传统和法令保障了议会的独立，以利于匈牙利贵族，也保障了议会有权决定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包括信贷和征兵的问题。——第205页。
- 121 英国的斯特腊弗德勋爵，国王查理一世的宠臣和专制政体的狂热卫士，被判叛国罪，并于1641年根据伦敦及其郊区的人民群众所支持的议会的要求处死。——第207页。
- 122 马克思这样称呼普鲁士的地主，是把他们比做常以猎狐取乐的英国地主。——第208页。
- 123 指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1775—1783）。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的原因，是新形成的美国资产阶级民族力图争取独立和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起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由于北美的胜利，成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革命战争指经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为反对欧洲列强——英普奥俄等国的反革命同盟于1792年发动的战争。——第210页。
- 124 1844年英国政府由于力求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方面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一项英格兰银行改革法，将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固定的银行券黄金保证率。没有黄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限定为1400万英镑。——第243页。
- 125 见注118。——第249页。
- 126 州议会是匈牙利大行政区单位（州）的等级会议，它是国内的民族自治

- 机关。1848年匈牙利革命改革的后果之一是：国内全体居民的代表参加了州议会，没有等级之分。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州议会解散，国家分为州的制度也被取消。——第250页。
- 127 指1860年底南部各蓄奴州掀起叛乱并脱离北美联邦，从而开始了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详见本卷第346—366页。——第253页。
- 128 文中所指的大概是下述事实：1860年7月在反英运动正炽的法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麦克马洪，爱尔兰国王”。小册子号召爱尔兰人推翻英国的统治，推举爱尔兰侨民的后裔法国元帅麦克马洪登爱尔兰王位。——第253页。
- 129 1851年丹麦国王对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所承担的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等公国的国家制度方面的义务，规定在1852年1月28日的宣言中。——第253页。
- 130 指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的。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改革，一项也没有实行。“新纪元”实际上为1862年9月俾斯麦执政时起开始的容克地主的公开专政做好了准备。——第255页。
- 131 “日报”（《Dagbladet》）是一家丹麦资产阶级的报纸，从1851年起在哥本哈根出版。——第255页。
- 132 本文起初是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后经修改寄给了“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257页。
- 133 “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是一个外交和统计年刊，从1764年至1929年在哥达（德国）用法文出版。——第257页。
- 134 见注7。——第258页。
- 135 指“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Principes physiques et moraux du combat de l' infanterie》），这是毕若“略论作战的几个问

- 题”（《A percus sur quelques détails de la guerre》）一书的一章。该书第一版于1832年在巴黎出版。——第262页。
- 136 恩格斯“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包括1860年至1861年初发表在“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上的下列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法国轻步兵”、“志愿兵炮兵”、“步枪史”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恩格斯对编入单行本的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单行本于1861年3月问世。——第273页。
- 137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英国的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英国的保守派的日报；1855—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从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出版。——第281页。
- 138 “伦敦评论”（《The London 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60—1869年出版。——第293页。
- 139 《Die französische Armee auf dem Exercirplatze und im Felde》. Berlin. 1861. ——第307页。
- 140 指“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作俘虏的将军们编于圣海伦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手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sous Napoléon, écrits à Saninte - Hélène, par les généraux qui ont partagé sa captivité et publiés sur les manuscrits entièrement corrigés de la main de Napoléon》. Paris, 1823）。——第309页。
- 141 美国女作家、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哈·比彻·斯托，曾经写给英国贵族舍夫茨别利勋爵一封信，于1861年9月初在报刊上发表。斯托在自己的信中正确地评价了美国内战，认为它是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并揭露同盟派的行为是非正义的。斯托对英国在美国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愤慨，她呼吁援助北方。
- 美国内战是1861年4月到1865年4月经济和社会方面进步的北部各

州和南部各蓄奴州之间的战争。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在北部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南部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度的斗争。从北部各州来说，战争具有进步的和革命的性质。内战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保全联邦的宪法战争时期和消灭奴隶制度的革命战争时期。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点是林肯政府于1862年9月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通过宅地法（土地无偿分配法），清洗军队和政府机关中的变节分子，接受黑人参加军队，封闭反动报纸和采取了其他一些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措施。战争向革命方式的转变，造成了军事行动中的根本转折，保证了北部在内战中的胜利。在粉碎南部奴隶主势力的军事行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民群众——工人、农民、黑人。较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资源和人员后备上的显著优势，是北部各州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这一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第321页。

- 142 “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是英国保守派的周刊，1855—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321页。
- 143 “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321页。
- 144 共和党是1854年反奴隶制人士为了回击南部种植场主越来越大的野心而组成的。共和党代表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广大劳动群众——农民、工人等的支持，它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根除奴隶主的政治权力，限制并逐步消灭奴隶制，以及开放西部土地无偿供农民移住。1856年共和党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但只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1860年共和党的候选人林肯被选为总统。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该党是大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捍卫者。目前，共和党同民主党一起是美国垄断资本的两个政党，两党轮流执政。——第322页。
- 145 指脱离北美联邦的6个南部蓄奴州——南卡罗来纳、乔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西安纳——在1861年2月4日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的国会上通过的临时宪法。蒙哥马利的国会宣布成立奴隶主的国家——美利坚同盟，并选杰弗逊·戴维斯为同盟的临时总统。1861

- 年3月2日得克萨斯参加同盟,1861年5月4个边界蓄奴州(弗吉尼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也参加了同盟。——第322页。
- 146 克里滕登妥协案是参议员克里滕登于1860年12月18日在美国国会上提出的和平解决南北冲突的方案,对美国宪法提出六条修正,其中主要的修正是要求在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36度30分一线以北各州禁止奴隶制,而在这一线以南使奴隶制合法化,并要求禁止国会消灭美国蓄奴州的奴隶制。最后一条规定:凡违背前五条的修正均不得列入宪法。这一条剥夺了国会改变各州现有的奴隶制度的权利。1860年12月22日克里滕登妥协案被一个特设的参议院委员会所否决。——第323页。
- 147 民主党成立于1828年,最初它联合了种植场主、某些资产阶级集团,以及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该党越来越代表种植场奴隶主和与之有联系的主张保持并扩展奴隶制的北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在1854年以后,由于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而使奴隶制有扩展到美国全部领土的危险,民主党开始分裂为扩展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两派。这是民主党在1860年总统竞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223页。
- 148 密苏里妥协案是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在美国全国和国会中展开激烈斗争之后于1820年达成的协议。根据妥协案,密苏里领地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缅因领地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确定一条界线——北纬36度30分,线以北禁止奴隶制。妥协案暂时和解了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一方和拥护奴隶制的一方,但是并不能消除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之间的矛盾,而且矛盾一年一年地尖锐化了。1854年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密苏里妥协案事实上已被废除。——第324页。
- 149 托·杰弗逊“回忆、通讯和私人文件”1829年伦敦版第4卷(Th·Jefferson.《Memoirs Correspondence, and Private Papers》.Vol IV, London, 1829)。——第324页。
- 150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185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它废除了

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界线。从此以后，每一个州，可以不需国会的决定，也不管自己的地理位置，在本州建立奴隶制度。——第324页。

- 151 指布坎南；他作为美国驻伦敦公使，会同美国驻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使节，于1854年发表了奥斯坦德宣言。宣言建议美国政府购买或侵占属于西班牙的古巴岛，1856年布坎南由民主党提名被选为美国总统。——第324页。
- 152 德雷德·司各脱案件是黑奴德·司各脱的审判案。司各脱曾经跟他的主人住在伊利诺斯州，后来住在威斯康星州，根据密苏里妥协案，这两州禁止奴隶制，所以在1848年他提出诉讼，要求解放本人。案子拖到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这个人黑人的诉讼。这个判决使奴隶制在全国合法化，在1861—1865年内战前夕被美国废奴派用作鼓动材料。——第324页。
- 153 堪萨斯战争是1854—1865年力求变堪萨斯为蓄奴州的奴隶制拥护者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奴隶制反对者在堪萨斯进行的武装斗争。虽然奴隶制的反对者获得许多胜利，但堪萨斯仍落在奴隶制拥护者的手中，因为这一方得到联邦政府的武装支持。但是该州的居民多数仍继续斗争，要求使堪萨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堪萨斯的斗争事实上是美国内战的开始。——第324页。
- 154 “雷诺新闻”（《Reynolds' s Newspaper》）是英国的激进派的周报；从1850年起由雷诺在伦敦出版；在五十年代初支持过宪章派。——第325页。
- 155 旧堡是伦敦新门监狱的主堡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第326页。
- 156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是美国的日报；从1835年至1924年用此名称出版；美国内战期间主张与南部的奴隶主妥协。——第326页。
- 157 1859年10月16日，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战士约翰·布朗试图在各蓄奴州

- 发动奴隶起义。他带领一小队伙伴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帕尔斯渡口的国家军械库。但是，布朗没有能够掀起更广泛的起义。这次发动的参加者（共22人，其中有5个黑人）在向政府军队作了殊死反抗后，差不多都牺牲了。约·布朗和他的5个伙伴被绞死。约翰·布朗的起义是美国革命危机增长的一个标志，它促进了黑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的加强，推动了美国废奴派力量的团结。——第327页。
- 158 1832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宣布废除1828年1832年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联邦关税法令。1832年11月24日颁布的“关于废除国家税则的决定”号召该州公民维护自己不受联邦当局管辖的独立性，并以南卡罗来纳脱离北美联邦相威胁。总统杰克逊得到国会批准使用武力，派遣军队去南卡罗来纳，但在种植场奴隶主的压力下，于1833年3月2日批准了一项妥协的降低了的税率。该州不久也取消了关于废除国家税则的决定。——第329页。
- 159 摩里耳税则是共和党人摩里耳在国会提出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该税则于1860年5月由众议院通过，并于1861年3月2日经参议院批准后成为法律。摩里耳税则规定大大增加美国关税。——第329页。
- 160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29页。
- 161 “加尔各答行情报”（《Calcutta Price Current》）是印度的一家周报，从1818年起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第332页。
- 162 1845—1847年在爱尔兰，马铃薯由于病害连年歉收。这种灾难，加上这几年由于欧洲歉收而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就造成了一场毁灭性的饥荒。有100多万爱尔兰的穷人饿死和病死，穷人向海外流亡的也有100多万。——第334页。
- 163 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4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

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

议会改革法案于1831年由英国下院通过并于1832年6月经上院最后批准。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这次改革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开辟了道路。争取改革斗争中的主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得到选举权。

谷物法的废除，见注14。

印花税是1712年英国实施的一种对报纸的征税，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以及与反对派报刊作斗争。印花税使报纸成本猛涨，限制了报纸的传播，使得广大群众读不起报。1836年议会被迫降低印花税，1855年废除了它。

纸张税是1694年英国实施的税收，主要目的是阻止英国报刊减价，亦即阻止它民主化。该项税收每年给国家带来收入约140万英镑，它全部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英国反对纸张税的广泛运动持续几年之久，结果到1861年该项税收被废除。——第335页。

164 “光荣革命”一词是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著作对1688年政变的叫法。这次政变之后，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第335页。

165 指“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它是从1802年至1835年在伦敦的出版激进派周报。——第336页。

166 1839年英国议会发表了一本蓝皮书，内载关于英国—波斯和英国—阿富汗的关系的外交文件，其中包括英国在喀布尔的代表亚·白恩士的有关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9）的信件。这些信件是被外交部别有用心地挑选和伪造过的，目的是掩盖英国在发动战争方面所起的挑拨作用。白恩士在死前不久把它的信件的副本寄往伦敦，一部分未收入蓝皮书的信件被他的家属发表。这样，英国政府的伪造行为就被揭穿了。——第337页。

167 丹麦条约即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

该条约是以1850年8月2日伦敦会议的上述参加国(普鲁士除外)所通过的确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的议定书为基础的。伦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给被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的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觊觎丹麦王位造成了先例。沙皇俄国签署伦敦议定书是想阻止普鲁士把什列斯维希以及霍尔施坦从丹麦分割出去和占领基尔湾。因此,在围绕着丹麦王国完整问题的斗争后面,隐藏着欧洲各国在波罗的海上争夺霸权的斗争。——第337页。

- 168 In usum delphini ——直译是“供皇太子用”,转义是:经过删削、篡改。1668年,为法国王位继承者(皇太子)出版了一批经过大事篡改的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此后,这一用语便流传起来。——第338页。
- 169 从1861年10月6日至8日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贡比昂(法国)举行会晤。——第341页。
- 170 “国家报,帝国报”(《Le pays, Journal de l' Empir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创办于巴黎;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341页。
- 171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说在该处。——第341页。
- 172 麦克唐纳案件指1860年9月英军上尉麦克唐纳在波恩以不服从地方当局的罪名被捕并交付法庭审判一事。英国政府利用这一事件作借口来加强反普鲁士的宣传,这个事件到1861年5月才得到解决。——第341页。
- 173 指奥马尔公爵为回答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于1861年春天在法国参议院的演说而写的反波拿巴的小册子“关于法国历史的信”(《Lettre sur l' histoire de France》)。按照拿破仑第三的命令,小册子被立即没收,小册子的出版者和印刷者也被判处监禁并罚款5000法郎。——第

342页。

- 174 指奥尔良王室的亲王——茹安维尔亲王、潘提埃夫尔公爵、巴黎伯爵和沙特尔公爵——站在北方人一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42页。
- 175 暗指路易—拿破仑，他在1848年留居英国的时候，曾自愿参加特别警察（由国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特别警察曾与警察共同行动，反对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所组织的工人示威。——第342页。
- 176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见注123）期间，法国革命家支持了起义殖民地的斗争。著名的剧作家博马舍曾参加从法国运送武器和志愿兵到美国的组织工作。在参加战争的法国志愿兵中负有盛名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拉斐德。——第343页。
- 177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不止一次地试图渗入印度支那。1858年，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在西班牙的参加下，以保护天主教传教士为借口在印度支那开始了新的殖民战争。这次战争于1862年结束，结果法国先占领了印度支那南方（即交趾支那，今称南部）的三个省，而在1867年就占领了整个交趾支那。——第344页。
- 178 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是从本篇文章开始的。

“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报是1848年7月作为温和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创办的，1848—1849年奥地利革命失败后曾暂时被封，这就使它得到了一些“反对派立场”的名声。六十年代初它在所有用德文出版的报纸中销路最广（3万订户）。它在这些年代大受欢迎的原因是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反波拿巴立场以及它反对奥地利政府的反动对内政策的言论。从1856年起，德国政论家麦·弗里德兰德参加“新闻报”为该报编辑之一；他早先出版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马克思曾在1855年期间作为该报驻伦敦通讯员为它撰稿。“新闻报”的编辑部一再企图拉马克思来为该报撰稿。1861年10月，在“新闻报”开始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派的政府之后，马克思才最后同意。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的文章——编辑部在发表时通常都注有：“本

报伦敦通讯员”或“特约通讯员”——接触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国际国内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并向奥地利和德国读者介绍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和民主运动。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论述美国内战及其对欧美各国的局势的影响的。评述军事行动，马克思照例都是运用恩格斯供给他的材料。马克思为“新闻报”撰稿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一时期，该报共登载了马克思的52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一篇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的文章和通讯有相当多一部分未被报纸编辑部刊载。这是马克思在1862年底停止为该报写文章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写作“北美内战”一文，看来早在1861年6—7月，即当他收到弗里德兰德关于为“新闻报”写稿的建议的时候就已开始。同时，“美国内战”一文基本上也已写好，这篇文章同样也于1861年10月寄往编辑部。——第346页。

- 179 指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废1828年和1832年的联邦关税法令（见注158）。——第347页。
- 180 凡尼耳会堂是1742年商人凡尼耳献给波士顿城的一所大厦。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见注123）时期美国爱国者常在这里举行大会。——第348页。
- 181 1787年颁布的大陆会议法令规定，俄亥俄河西北的各个领地在居民人数达到6万时，就可以以州的资格参加联邦，与旧有各州享受同等的权利。——第349页。
- 182 德雷德·司各脱案件，见注152。——第350页。
- 183 指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Act），1850年9月由美国国会通过，作为对1793年的逃亡奴隶引渡法的补充。根据这个新法律，在所有各州任命了追捕奴隶的特派官员。捕到一个黑人，并判他重做奴隶，可得奖金10美元。如果把一个被抓的黑人开释，只能得到5美元。北部各州当局和居民必须给予特派官员以一切协助。违反法律则判处罚金1000美元和6个月徒刑。该法律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使废奴运动加强，因而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事实上就已行不通，最后于1864年被废除。——

第351页。

- 184 无偿分配国家所有的西部自由土地，乃是1848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群众性的民主主义的农民政党的党员——自由土地党人的基本要求之一。自由土地党人还要求在夺自墨西哥的新领地上禁止奴隶制，禁止把这些土地卖给大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家。自由土地党人的要求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遭到各蓄奴州代表的一贯反对。例如，1854年第一次在国会中付诸表决并被众议院通过的宅地法案，就被参议院否决了。当1860年国会两院终于通过一项关于移民缴纳较小的一笔土地开垦费的法案时，布坎南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第351页。
- 185 奥斯坦德宣言，见注151。——第351页。
- 186 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诺拉是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北方州，是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侵略野心的对象。——第351页。
- 187 1787年的美国宪法使黑奴制度在它已经存在的各州合法化，允许在宪法通过时起20年的期限内向这些州自由输入奴隶。到1807年3月2日国会才通过了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入奴隶的法律。1808年1月1日生效的这个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其中包括没收运送奴隶的船只及其所有货物。但是，法律实际上常被破坏，因而私贩奴隶有了广泛的发展。结果，在美国内战前的一些年代里，黑人的输入反而有增无已。——第351页。
- 188 指支援堪萨斯移民协会，它们是1854—1855年期间在北部和西北部许多州（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斯等）先后成立的。第一个支援协会在1854年4月成立于马萨诸塞州。协会规定自己的任务是制止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新领地并协助自由小农移居堪萨斯。协会从事的工作有：招集和资助移民，运送农具和设备到堪萨斯，为迁移者建筑公寓，供给他们粮食、衣服、药品等等。此外，协会还运送武器到堪萨斯。
- 支援运动在1856年夏天由于堪萨斯武装斗争（见注153）激化而达到最高潮。1856年7月在布法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但是，由于运动参加者的成分不一，几番尝试想按照一个统一计划

- 援助堪萨斯都未能成功。协会的活动对国内的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推动了组成共和党的力量的集结。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协会从事往俄勒冈州和佛罗里达州移民的工作。协会存在到1897年。——第352页。
- 189 指英国和汉诺威从1714年起组成的君合国由于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个代表死亡而于1837年分离一事。——第357页。
- 190 新英格兰是由美国东北部工业高度发达的6个州（缅因、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德岛、佛蒙特、新罕普什尔）构成的地区。它是废奴运动的中心。——第364页。
- 191 赫罗泰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们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须向斯巴达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毫无区别。——第364页。
- 192 密苏里文告是弗里芒特将军于1861年8月30日发表的。文告除宣布没收密苏里州支持同盟的人的财产外，并宣布解放叛乱分子的奴隶。林肯建议弗里芒特使这个文告符合没收法，删去解放奴隶一款（1861年8月6日国会通过的没收法只规定解放叛乱分子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奴隶）。弗里芒特拒绝总统的要求，因而在1861年10月被免去密苏里军团司令之职。——第365页。
- 193 1833年，在牙买加岛黑奴起义之后，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废除殖民地奴隶制的法律。为了给西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种植场奴隶主补偿，曾拨款2000万英镑。——第366页。
- 194 指“布朗逊氏评论季刊”（《Brownson's Quarterly Review》），它是美国的天主教杂志。奥·布朗逊从1844年至1855年在波士顿、1856—1865年和1872—1875年在纽约用此名称出版。——第366页。
- 195 “世界报”（《The World》）是美国的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860年至1931年在纽约出版。——第366页。
- 196 摩里耳税则，见注159。——第380页。

- 197 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以及萨瓦和尼斯归并于法国之后，拿破仑第三企图占领瑞士的部分领土。1861年10月28日，一支法国军队侵入瑞士所属的窝州（瓦得州）达普谷地，并占领了克雷松尼埃尔村。瑞士政府随即提出抗议，抗议得到许多欧洲国家的支持。1862年12月签订了协定：达普谷地的一部分归法国，而法国让出同样大的领土给瑞士，作为交换。——第381页。
- 198 干涉墨西哥或1861—1867年的墨西哥远征，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所进行的武装干涉，目的在于推翻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并把墨西哥共和国变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干涉者还打算利用墨西哥的领土作为站在蓄奴州一方干预美国内战的基地。在干涉开始（1861年12月）后不久，干涉的参加国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结果英国和西班牙于1862年4月召回了自己的军队。法国干涉者继续侵略行动，1863年夏天占领了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是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墨西哥人民在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忍不拔和大无畏的精神，大败殖民者。1867年3月干涉者被迫离开墨西哥。拿破仑第三的墨西哥冒险在法国极不得人心，加之国际局势由于美国北部在1861—1865年内战中获胜而起而变化，这也是这次冒险失败的原因。——第382页。
- 199 1859年11月，极力在北非进行殖民掠夺的西班牙向摩洛哥宣战。但是，军事行动继续到1860年3月，西班牙人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成功，因为他们碰到爱好自由的摩洛哥人民的顽强反抗。1860年4月缔结和约，西班牙得到赔款和不多的割地。
- 圣多明哥是海地岛的东部，1821年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44年宣布为独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861年，该岛的这一部分重被西班牙占领，因为亲西班牙的党在国内获胜，并在1861年3月宣布“自愿”合并圣多明哥于西班牙所属的西印度领地。西班牙在圣多明哥的殖民统治继续到1865年，这一年西班牙人被全部赶走。——第382页。
- 200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

- 分子的机关报。——第382页。
- 201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82页。
- 202 圣詹姆斯内阁是马克思根据伦敦圣詹姆斯宫（英国国王的旧府邸）的名称对英国政府的称呼。——第382页。
- 203 指1823年夏天法国外交大臣沙多勃利昂提出的组织武装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计划，其目的在于恢复西班牙在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以及扩充法国的殖民地。沙多勃利昂的计划规定把西班牙各殖民地变为由波旁王族的亲王们，其中也包括法国的波旁亲王们统治的自治王国。这一计划主要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而破产，当时英美力图利用西班牙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来造成自己在这些地方的势力。——第385页。
- 204 门罗主人是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致美国国会的著名咨文中所宣布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则，旨在反对欧洲列强使美洲领土殖民地化和干涉美洲国家内政的企图。后来，门罗主义被美国扩张主义者用来在美洲大陆建立美国的霸权。——第385页。
- 205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388页。
- 206 “星期日报”（《Courrier du dimanche》）是法国资产阶级反波拿巴派的周报；从1858年至1866年在巴黎出版。——第390页。
- 207 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9。——第393页。
- 208 英国波斯战争，见注9。——第393页。
- 209 本文标有“于巴黎”的字样，实则是马克思在伦敦写的。在有些取材于欧洲大陆某些国家的文章上，马克思有时则相应地注明写于巴黎、柏林或维也纳，同时用一个或早或晚的日期代替真实的写作日期。——第

394页。

- 210 马克思称维隆为《bourgeois de Paris》（“巴黎小市民”），系指他的书“巴黎小市民回忆录”（《Mémoires d' un bourgeois de Paris》）而言，该书于1853—1855年在巴黎以六卷本出版。——第394页。
- 211 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产生于法国。重农学派坚决拥护大资本主义农业，主张取消等级特权和保护关税政策。重农学派懂得取消封建秩序的必要性，但希望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来进行，以免损害统治阶级和专制制度。按照他们的哲学观点来说，重农学派接近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见诸实现。——第395页。
- 212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保持奥尔良王朝执政和避免革命的方法。——第395页。
- 213 阿·富尔德“打倒阿西涅币！”1848年巴黎版（A. Fould《Pas d' as- signats!》. Paris, 1848）。——第395页。
- 214 Drapeau blanc（白色旗）是波旁王朝时期以及复辟时期法国的国旗。当资产阶级七月王朝确立，奥尔良王朝执政的时候，又恢复了三色旗（蓝、白、红），这是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国国旗。——第399页。
- 215 见注192。——第401页。
- 216 指1846—1848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战争是由于美国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土地的侵略野心而引起的。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几乎占领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其中包括得克萨斯、上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地区。——第401页。
- 217 《Irrepressible conflict》（“不可制止的冲突”）是西华德于1858年10月

在罗彻斯特(纽约州)演说中所使用并得到广泛传播的用语;西华德此语是指南部和北部的矛盾不可调和以及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第402页。

- 218 《Pathfinder》(“开路人”)是菲尼莫尔·库伯的一部驰名小说的名称;这样称呼弗里芒特是由于他曾远征加利福尼亚。——第403页。
- 219 1861年7月21日在马纳萨斯城(华盛顿西南)附近的布尔河上进行了美国内战期间的第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南军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但训练很差的北军。
- 1861年10月21日南军在博耳斯-布拉夫(华盛顿西北)会战中击溃了渡到波托马克河右岸并在那里孤立无援的斯通将军的几个团。两次会战暴露了北军在组织和战术上的严重缺陷。——第403页。
- 220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
-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409页。
- 221 1812年开始的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实行不承认美国国家主权的政策并企图在北美恢复其统治地位而引起的。美国向英国宣战的理由是英军非法截夺美国船只和捕捉海员。美国武装力量在对英斗争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认为英国人的行动有使殖民制度恢复的危险,并把这次斗争看成是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4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对美军来说是失利的。英国虽然在1814年8月暂时占领了华盛顿,但由于同拿破仑作战已弄得精疲力尽,并由于美国舰队作战顺利而受到很大损失,被迫于1814年12月在承认战前状态的基础上签订了根特和约。在美军大败英军于新奥尔良之后,军事行动在1815年1月停止。——第409页。
- 222 弗·托·普腊特“战时禁运法”(F. Th. Pratt. 《Law of Contraband of War》)。第一版于1856年在伦敦问世。——第410页。
- 223 托·杰弗逊“回忆、通讯和私人文件”1829年伦敦版第3卷(Th. Jef-

ferson. 《Memoirs, Correspondence, and Private Papers》. Vol. III, London, 1829)。

英法战争指1792—1815年法国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当时，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06年拿破仑宣布大陆封锁，禁止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贸易，英国为了回答这一行动，对中立国的海上贸易实行控制，并乘走私交易广泛开展之时，在公海上截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第410页。

224 邓斯·司各脱式的争论是通过相互排斥的论据即“赞同”和“反对”（《pro et contra》）意见的对比进行经院式争论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因中世纪苏格兰的唯名论哲学家邓斯·司各脱而得名的，并在他的著作中得到最广泛的运用。——第410页。

225 王室法官 (law officers of the Crown) 是英国最高的司法代表——首席检察官和副首席检察官。——第412页。

226 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见本卷第431—432页）是1861年5月13日为回答合众国于1861年4月宣布对同盟港口实行封锁而发布的。文告宣布仅仅在封锁有效的情况下承认对南部的封锁，同时又承认南部有在公海上截夺北美船只的权利。实际上文告意味着承认同盟是交战的一方。——第412页。

227 战利品裁判所是交战国在自己领土上为裁决捕获战利品的合法性而设立的。在战争时期被交战一方截夺的敌方商船或货载，叫做海上战利品。运载战时禁运品的中立国船只也可以算做战利品。——第412页。

228 詹·斯宾斯“美利坚联邦：关于它对合众国福利的实际影响及其分裂原因的调查和从宪法观点对脱离的探讨”1861年伦敦版 (J. Spence. 《The American Union; an Inquiry into its Real Effect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o the Causes of its Disruption; with an Examination of Secession 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London, 1861)。——第413页。

- 229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从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417页。
- 230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从1856年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417页。
- 231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1770年至1862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派的机关报。——第417页。
- 232 指美国内战初期肯塔基州的中立（见本卷第361页）。——第422页。
- 233 威·弗·帕·纳皮尔“1807年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I—VI, London, 1828—1840》。——第424页。
- 234 联邦派（联邦的拥护者）是美国内战时期对北部各州的拥护者的称呼，其敌对方面即南部蓄奴州同盟的拥护者则被称为脱离派或同盟派。——第424页。
- 235 1763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威尔克斯在他办的“北不列颠人报”（《The North Briton》）上批评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国王演辞，因而被下院除名，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他被迫逃往法国。在1768年返回祖国后，威尔克斯四度被选为议员，但每次选举都被宣布无效。他在第五次当选后，才进入议院。“威尔克斯事件”是英国政治危机增长的标志。威尔克斯成为伦敦郡长和市长后，于1780年残酷地镇压了伦敦下层人民的发动，暴露了自己的煽动家的面目。
从1768年底至1772年在“大众报”（《The Public Advertiser》）发表

的、署名为尤尼乌斯的书信，因“威尔克斯事件”而远近闻名。书信的作者为恢复威尔克斯的名誉、为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进行了斗争。1772年尤尼乌斯的书信以单行本出版。后来，肯定书信的作者是英国政论家菲·弗兰西斯。——第427页。

- 236 查·威尔克斯“1838、1839、1840、1841、1842年美国考察队记述”1845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1—5卷(Ch. Wilkes. 《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Expedition. During the Years 1838, 1839, 1840, 1841, 1842》. Vol. I—V. Philadelphia 1845)。——第427页。
- 237 查·威尔克斯“美国西部(包括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1849年费拉得尔菲亚版(Ch. Wilkes. 《Western America, including California and Oregon》. Philadelphia, 1849)。——第427页。
- 238 在1651年9月3日伍斯特战役中英军在克伦威尔指挥下使查理二世所率领的苏格兰保皇派军队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查理二世逃入法国。——第427页。
- 239 英国枢密院产生于十三世纪，最初由封建贵族和高级僧侣的代表组成。枢密院是国王属下的最高谏议机关，十七世纪之前在治理国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意义。——第428页。
- 240 1845年11月斯莱德耳被派往墨西哥，他带有总统波克的秘密使命：设法扩展被兼并过来的得克隆斯的南部边界以及购买新墨西哥和上加利福尼亚。在墨西哥政府拒绝接待作为全权公使的斯莱德耳之后，美国在1846年4月开始了对墨西哥的军事行动，结果上述两个地区被美国夺去。——第429页。
- 241 逃亡奴隶法，见注183。——第429页。
- 242 亨·惠顿“国际法原理和这门科学的简史”(H.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第一版于1836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

版。——第432页。

- 243 提·沃克“美国法律绪论”(T. Walker.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aw》)。第一版于1837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第432页。
- 244 詹·肯特“美国法律释义”第1—4卷(J. Kent. 《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 Vol. I—IV)。第一版于1826—1830年在纽约出版。——第432页。
- 245 罗·菲利莫尔“国际法释义”(R. Phillimore. 《Commentaries on International Law》)。第一版于1854—1861年在伦敦出版,共四卷。——第433页。
- 246 赛·约翰逊“英语辞典”(S.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第一版于1755年出版。——第434页。
- 247 约·沃克“标准英语语音辞典”(J. Walker 《A Critical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第434页。
- 248 艾·瓦特耳“国际法,或运用于民族和国君的行为的自然法原则”(E. 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ou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第一版于1758年在来顿出版,共两卷。——第435页。
- 249 “最后的一个英国人”是“最后的一个罗马人”一语的套用。后一语通常是指在罗马共和国衰亡时期为保存古代共和制罗马的风尚和观念而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或卡西乌斯。马克思称乌尔卡尔特是“最后的一个英国人”,是嘲笑他拥护古老的、早就过时的英国制度。——第435页。
- 250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是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5年至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发行于伦敦;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435页。
- 251 指美国总统麦迪逊于1812年6月1日致国会的咨文,咨文谴责英国对美国的敌视行动,特别是捕捉美国船上的海员和封锁美国大西洋沿岸。

咨文建议回击这种行动。不久，在18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便向英国宣战（见注221）。——第439页。

252 根特和约，见注221。

1842年英国代表阿希伯顿勋爵和美国代表韦伯斯特进行了谈判，结果于1842年8月9日签订了关于美国和英属美洲领地之间的疆界、关于禁止奴隶买卖和关于引渡逃犯的条约。但是，这一条约没有限制英国搜查有限卖奴隶嫌疑的美国船只的权利。——第439页。

253 指美国将军温菲尔德·司各脱发表在1861年12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的信。司各脱叙述了自己对“特伦特号”事件的态度，声明美国任何人都不愿意与英国作战，并主张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第441页。

254 黑色禁运品是美国内战时期对那些从叛乱的奴隶主那里逃到北军军营来寻找避难所的黑人的称呼。北军某些将领违反华盛顿政府的命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就拒绝把这些黑人交给他们原先的主人，理由是：奴隶既然是叛乱分子的财产，就应该被看做战时禁运品。——第442页。

255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民主党摄政集团是指纽约州的美国民主党领导集团。该集团存在到1854年，通称沃耳巴尼摄政集团。它的所在地是纽约州的行政中心沃耳巴尼市。沃耳巴尼摄政集团曾起了美国民主党全国中心的作用。——第443页。

256 1861年11月19日，同盟派的巡洋舰“纳希维耳号”在公海上攻击了北美商船“哈维氏桦树号”，并把它烧毁。11月21日“纳希维耳号”开进英国的南安普顿港口，逃避追究。——第444页。

257 1861年1月6日纽约市长费·伍德向市议会提出例行的年度咨文，在咨文中提出使纽约脱离北部各州并宣布它为自由城市的计划。——第444页。

258 指堪萨斯州武装斗争（见注153）时期在美国参议院发生的一件事。1856年5月19—20日，共和党参议员查理·萨姆纳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对

- 堪萨斯所犯的罪行”的演说，揭露了奴隶主在堪萨斯的阴谋。萨姆纳的演说激起了奴隶主和国会中的奴隶主拥护者的狂怒。演说发表两天以后，萨姆纳就在参议院里面的一个地方遭到南部的一个奴隶主布鲁克斯毒打，身受重伤多处；到1859年萨姆纳才能够重新进行政治活动。——第445页。
- 259 康伯学院——工业家和慈善家彼·库伯于1858年在纽约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第445页。
- 260 Court of Exchequer（高等控诉院）是英国最老的法庭之一，起初主要担负财政职能，在十九世纪实际上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之一。——第448页。
- 261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News》）是英国自由派报纸“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的简称，1843—1918年用此名称出版。——第448页。
- 262 指1856年4月16日（4日）巴黎会议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言禁止私掠并保证保护中立国商船不受交战国的侵犯。宣言的通过是俄国外交上的胜利。俄国从1780年起就反对英国要求检查和截夺中立国船只的权利。——第451页。
- 263 指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780年3月11日（2月28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所表述的维护海上中立权利的原则。宣言宣布中立国与交战国自由贸易的权利和挂有中立国国旗的敌方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以这一宣言为基础，俄国在1780—1783年间和一些国家（丹麦、瑞典、荷兰、奥地利等）组成了第一个武装中立联盟并签订了公约。
- 后来，在1800年12月18日（6日）俄国的倡议下所签订的关于在英国对拿破仑法国战争期间成立第二个武装中立联盟的俄普条约，又重申并补充了1780年宣言的原则。丹麦和瑞典也参加了这一条约。——第451页。
- 264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

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初，自由贸易派加入了英国自由党。这一派代表着力图摧毁南部蓄奴州的棉花垄断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反对英国站在南部一面干涉美国内战。——第452页。

- 265 指1861年5月1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中立文告（见注226）。——第453页。
- 266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55页。
- 267 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话：《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顿宣称，正如罗马公民的公式《civis roma-
nus sum》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第455页。
- 268 Low church men 即低教会派的信徒，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低教会派信徒主张简化敬神仪式和强调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第455页。
- 269 辉格党的战争是马克思用来称呼英国阿伯丁联合内阁发动的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因为内阁中一切最重要的职位都属于辉格党首领。——第456页。
- 270 Penny paper（一辨士报纸）是1855年英国废除印花税（见注163）后广为流行的一种新式的日报。这种报纸与价昂的老报纸的区别在于它的价廉和大众化。“一辨士报纸”接受了美国新闻业的方法，以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和记载丑闻为主要内容。——第456页。
- 271 “地球报”（《The Globe》）是英国的一家日报“地球和旅行家”（《The

-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456页。
- 272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57页。
- 273 “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杂志,从1859年至1907年在伦敦出版。——第457页。
- 274 暗指拿破仑第三在1859年1月由于准备奥意法战争(见注16)而掀起的战争叫嚣。这些事件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论文“欧洲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5—199页)中作了详细记述。——第457页。
- 275 *Ceterum censeo* 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他的每一次讲演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几个字。这句话是:*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此外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第459页。
- 276 美国政府力求避免对英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在1861年12月25—26日会议上通过决议,释放在“特伦特号”轮船上捉到的同盟特使梅森和斯莱德耳。1862年1月初,斯莱德耳和梅森及其秘书被送到英国轮船上。罗素在获得这一消息之后声明英国政府感到满意,并认为“特伦特号”事件已经解决。——第463页。
- 277 “纳希维耳号”事件,见注256。——第465页。
- 278 “官报”(《Gazette》)是英国政府机关报“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的简称;1666年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476页。
- 279 取缔阴谋活动法案(外侨管理法案)是帕麦斯顿1858年2月8日在下院提出的,借口是法国政府进行威胁,责备英国给予政治流亡者避难所。根据这一法案,流亡者参加政治阴谋,同英国人一样受到严厉惩处。在群

- 众抗议运动的压力下，法案被下院否决，而帕麦斯顿被迫辞职。——第480页。
- 280 见注275。——第481页。
- 281 “每日邮报”（《Daily Post》）是英国的报纸，工商界的机关报，从1855年至1879年用此名称在利物浦出版。——第484页。
- 282 见注80。——第489页。
- 283 Magna Charta——Magna Charta Libertatum（自由大宪章）是骑士和市民所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约翰提出的一个文件。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做了一些让步。直到十九世纪，宪章在英国资产者眼中仍然是英国立宪制度的象征和基础。——第494页。
- 284 指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见注262）。——第495页。
- 285 根据1859—1860年西班牙摩洛哥战争（见注199）结束后签订的和约的条件，在赔款缴清之前，泰图安城继续由西班牙军占领。——第497页。
- 286 指“墨西哥问题信件汇编”1862年伦敦版，共三册（《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Mexico》. 3 Parts, London, 1862）。——第499页。
- 287 “年轻的拿破仑”是民主党队伍中拥护麦克累伦的人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比较年轻（34岁）时就做总司令的将军。——第505页。
- 288 费边式战术是因古罗马统帅费边·孔克达特而得名的。他以实行观望战术出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期间避而不与汉尼拔决战。——第506页。
- 289 马考莱“短篇史评”（Macaulay.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第一版于1843年出版，共三卷。——第506页。

- 290 在西点(纽约附近)有一所军事学院,创办于1802年,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唯一的高等军事学校。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培养军官的制度,促进了学院学员的小团体观念的发展。——第506页。
- 291 这里是指克伦威尔在1653年7月4日开幕的由独立派教团的代表组成的小议会上的演说。
托·卡莱尔“奥列佛·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Th. Carlyle. 《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第一版于1845年在伦敦出版。——第506页。
- 292 指“晚星报”(《Evening Star》),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52年创办于华盛顿。——第506页。
- 293 见注221。——第511页。
- 294 “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是法国波拿巴派的双周刊;1851—1870年在巴黎出版。——第512页。
- 295 布尔河会战,见注219。——第514页。
- 296 1792年11月6日法军在杜木里埃指挥下在热马普(比利时)击败奥军,取得巨大胜利。在1794年6月26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法军击溃奥军。1796—1797年意大利战争期间在蒙特诺特、卡斯提奥涅和里沃利等会战中,法国打败了皮蒙特和伦巴第的奥军和皮蒙特军。——第515页。
- 297 博耳斯-布拉夫会战,见注219。——第517页。
- 298 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见注18。——第520页。
- 299 封锁线体系(封锁线战略)是十八世纪西欧广泛采用的作战方法,即沿整个战线平均布防,以防止敌人侵入本国领土。这样部署军队使敌人有可能比较容易地在任何一点上突破防线。从理论上为“封锁线体系”奠定基础的是奥地利元帅弗·拉西。——第521页。
- 300 在1796年4月13—14日和14—15日密雷栖摩和德果(意大利北部)两次会战中,波拿巴的军队击溃了皮蒙特联军中的一个奥地利兵团,另一个

奥地利兵团前来增援也被击溃。此后，法军猛攻皮蒙特军，使它遭到一系列的失败，迫使皮蒙特国王签订单独的和约。——第521页。

- 301 美国内战的后来进程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文中所阐述的粉碎南部同盟的战略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南军只是在北军司令部于1864年下半年实行了类似的计划后，才遭到彻底的失败。托·威·薛尔曼将军所实行的著名的“向海洋进军”把同盟的领土切成两部分，给格兰特将军的军队击溃南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865年春天，南军全部投降。——第523页。
- 302 远征墨西哥，见注198。——第524页。
- 303 指1849年法军占领罗马（见注103）以及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期间法军驻留雅典和君士坦丁堡。1860年10月在中国的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第524页。
- 304 指墨西哥议会1861年7月17日关于暂停支付外国债款两年的决定，这一次定成了英、法和西班牙干涉墨西哥（见注198）的借口。胡阿雷斯所领导的墨西哥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于1861年11月取消了7月17日的决定，并表示同意满足三国的要求。——第525页。
- 305 1861年夏在巴黎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对法国著名银行家米勒斯的诉讼案，他被控进行欺骗性的交易所投机和违反信托公司法。这一案件揭露了丑恶的金融诈骗，而且牵涉到第二帝国的许多显贵。米勒斯被判罚款和5年徒刑，但在1862年被上级法院宣告无罪。——第525页。
- 306 1862年4月9日英法和西班牙的代表在俄利萨巴（墨西哥）举行会议，策划三国在墨西哥的下一步的共同行动。但是在会上暴露出干涉参加国的重大分歧。法国代表宣布拒绝与墨西哥政府谈判，并宣布解除1862年2月19日在拉案勒达德签订的初步和约。英国和西班牙的全权代表借口法国干涉墨西哥内政，宣布不再参加共同干涉。在俄利萨巴会议后不久，英军和西班牙军撤出墨西哥。——第526页。
- 307 新奥尔良在扼守密西西比河上通往该城要道的两炮台陷落后于1862年

- 4月29日失守。5月1日北军入城。新奥尔良是蓄奴州联盟的政治军事中心，该城被攻占是北军的巨大军事胜利。——第527页。
- 308 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弗社分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通讯社。——第527页。
- 309 萨拉哥沙是西班牙人民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以英勇保卫战抗击两度围攻该城（1808年和1809年）的拿破仑军队而同闻名于世的城市。萨拉哥沙第二次被围攻了两个月之久，最后才于1809年2月21日陷落。
- 莫斯科在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的1812年卫国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成了举国抗战的象征。1812年9月13日（1日）俄军为了保存军队和准备反攻，放弃了莫斯科。在法军占领城市时莫斯科烧起大火，延续了5昼夜之久。——第527页。
- 310 半月城是新奥尔良的通称。该城旧市区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圆弯形地带。——第528页。
- 311 指“每日电讯报”（《Daily Dispatch》），它是美国的一家日报，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从1850年至1883年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出版。——第529页。
- 312 “日记报”（《Day Book》）是美国的一家报纸，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从1857年至1867年用此名称在诺福克（弗吉尼亚州）出版。——第529页。
- 313 指“每日通报”（《The Daily Intelligencer》），它从1854年至1871年在阿特兰塔（乔治亚州）出版，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第529页。
- 314 指“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它从1852年至1869年在彼得斯堡（弗吉尼亚州）出版，南部奴隶主的机关报。——第530页。
- 315 1808年1月1日生效的禁止输入黑奴的法律（见注187）保留了美国领土上的奴隶买卖，这种买卖是在南部和西南部各蓄奴州之间，主要是在美国南部沿海城市进行的。与禁止自国外输入黑奴同时，国内奴隶买卖扩大了，南部的一些州，如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变成了养

奴待售的州。1862年5月2日参议员萨姆纳提出的法案，取消了1808年法律中调整美国沿海地区奴隶买卖的条款并禁止从一州向另一州转运奴隶。——第532页。

- 316 “北方人之歌”是美国内战时期北部流行的一支美国民歌。——第535页。
- 317 指1848—1894年伊奥尼亚群岛上的起义。群岛从1815年起受英国保护。伊奥尼亚群岛上希腊居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旨在反对英国统治，争取合并群岛于希腊。起义被英国人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第538页。
- 318 大概是指不止一次地在英国议会中提出的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的讨论。在这些法案中，爱尔兰土地出租的条件都有所放宽。1853年这些法案在下院通过，但遭到上院的反对。在以后几年，法案从这届议会转到那届议会，并作了各种不同的旨在保护大地主特权的修改。但是就连这样改过的法案，仍然遭到大地主代表的顽固抵制。1855年7月，对这些法案的讨论又被不定期地推迟下去。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议会新闻：布尔韦尔提案，爱尔兰问题”和“辛普森将军的辞职。——议会新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01—404、539—540页）中评述了两院对上述法案的立场。——第539页。
- 319 萨贡人是古代西班牙萨贡城的居民。公元前219年，与罗马结盟的萨贡遭到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军的攻击，在八个月的持续围攻之后被占领。该城的居民拒绝了投降的建议，举火自焚。——第539页。
- 320 Statute law（成文法）是以法令——英国议会的立法法令——为根据的法律规范。——第540页。
- 321 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后，英国议会根据卡斯尔里的倡议于1801年通过了关于在爱尔兰实施戒严和关于 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护法）暂停生效的反动法令。根据人身保护法，每一项逮捕令都必须说明根据。——第540页。
- 322 Coup d'état 是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在与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中同意了路易·波拿巴的篡位。

帕麦斯顿采取这一步骤并没有征求其他阁员的同意,因而于1851年12月被免职。其实,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无分歧,并且它是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制度的政府。——第540页。

- 323 1862年3月8日,在汉普敦湾发生了南军第一艘装甲舰“梅里马克号”与北军由木质军舰组成的区舰队的战斗。在战斗中,北军的巡航舰“康伯兰号”和“国会号”被击毁,其余的军舰也损伤惨重。3月9日清晨,北军的装甲舰“蒙尼陀号”赶到,经过4小时的战斗,终于迫使“梅里马克号”逃窜。与“梅里马克号”不同,“蒙尼陀号”的炮火是装在军舰中部一座旋转的装甲炮塔上。“蒙尼陀号”是按照工程师埃里克森的设计制造的。——第542页。
- 324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欧洲、特别是德国,广泛迷信降神术。——第545页。
- 325 指“关于修建太晤士河堤岸的工程,以及便利车马行人或改善白厅和桥街之间的交通的方案文件汇编”1862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orks under the Thames Embankment Bill and to Plans for facilitating the Passage and Traffic or opening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Whitehall and Bridge Street》. London, 1862)。——第549页。
- 326 逃亡奴隶法, 见注183。——第557页。
- 327 指1862年7月12日林肯总统致美国国会边界州代表的呼吁书。呼吁书建议,为了最快地停止战争,这些州应在给奴隶主补偿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解放黑奴。——第557页。
- 328 1862年5月20日通过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是林肯政府以民主主义精神解决土地问题的最重要措施。根据这一法律,凡美国公民或声明愿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缴纳不多的10美元赋税之后可以从国有土地中无偿地领取160英亩(65公顷)土地。在耕种5年之后,或在5年内每英亩缴纳125美元的条件,这块土地便转归农民完全所有。在人民群众压力下颁布的宅地法,是使战争进程发生有利于北部的转折的革命

措施之一。——第558页。

329 指联邦直辖区哥伦比亚，该区包括作为独立行政单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其郊区。在美国首都废除奴隶制的要求，是1775—1783年独立战争以来反奴隶制力量的基本要求之一。1862年4月16日的法律在补偿法规定的条件下解放了3000黑人。根据补偿法，政府必须向占有者交付偿金，解放一名奴隶偿给300美元。——第558页。

330 利比里亚是西非洲的共和国，成立于1847年，它是美国殖民促进社为了从美国迁出自由黑人而建立的移民地点。

海地是海地岛西部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从1859年起成为共和国。

1862年6月美国与两个黑人共和国利比里亚和海地建立外交关系（在此之前，它们已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是废奴派的一个胜利。同时，在外交上承认利比里亚和海地也有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鼓励黑人从美国向这些国家迁移。在美国疆界之外建立被解放的黑人的移民区，是林肯纲领中的一条，这一条曾遭到废奴派中革命一翼的激烈反对。——第559页。

331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是美国的一家日报，1801—1934年在纽约用此名称出版；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土地党人的要求，从1856年起是共和党的机关报；从1934年起，用“邮报”（《The Post》）这一名称出版。——第560页。

332 在1850年11月4日给德勒穆主教的信中，罗素（当时任首相）假充新教的维护者，反对教皇庇护九世颁发任命英国天主教主教和大主教的敕令的“僭越行为”。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文“约翰·罗素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29—455页）。

在1860年10月27日给英国驻都灵公使赫德逊的信中，罗素（当时任外交大臣）反对俄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立场，赞同把南意大利并入撒丁王国，赞同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利用意大利人民革命运动为自己王朝利益服务的行为。这封信还肯定人民有权在任何时候罢免自己的政府。这个旨在反对拿破仑第三的声明，同时也触犯了罗素勋爵所效忠的君主统治原则。——第561页。

- 333 “粮食交易所快报”（《Mark-Lane Express》）是“粮食交易所快报和农业报”（《The Mark-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这个周刊的简称；它是商界的机关报，从1832年至1924年用此名称在伦敦出版。——第561页。
- 334 在通往里士满的进路上发生了七天的会战（1862年6月25日—7月1日），会战地点是沼泽很多难以通行的契卡霍米尼河畔。结果是麦克累伦率领的北军败退。——第565页。
- 335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是一家有关军事问题的德国报纸，德国军官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从1826年至1902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恩格斯这段时期在“军事总汇报”发表的文章有“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英国的志愿兵检阅”和“英国的反德兵力”。编辑部在发表恩格斯的文章时通常都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恩·”。——第572页。
- 336 指加里波波在1862年7—8月为从教皇和法国侵略者统治下解放罗马而进军之后发生的事情。8月29日在阿斯普罗蒙特山地与王国军队交锋时，加里波波重伤被俘，并遭到长期拘禁。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对意大利人民英雄的可耻迫害，在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引起了广泛的抗议的浪潮。——第574页。
- 337 指1862年5月到11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工业展览会。——第577页。
- 338 “新堡报”（《Newcastle Journal》）是“新堡日报”（《Newcastle Daily Journal》）的简称。该报于1832年创刊，从1861年至1920年用此名称出版。——第581页。
- 339 指1858年2月帕麦斯顿内阁由于下院否决他所提出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见注279）而辞职一事。提出这项法案的借口，是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于1858年1月14日谋刺拿破仑第三，而奥尔西尼在此以往在伦敦。——第582页。
- 340 指1842年夏秋宪章运动由于1842年春英国经济危机加剧而普遍高涨。

1842年8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曼彻斯特附近）爆发了罢工，很快就席卷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区。罢工最初提出经济要求，但很快就转变为政治性的罢工，在争取宪章的口号下进行。统治阶级借助于正规军才把罢工者镇压下去。斯泰里布雷芝的罢工失败后，政府采取了种种镇压手段，宪章运动暂时低落了下去。1843年在工业中开始的某种复苏现象也促成了这一点。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曾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8—523页）。——第582页。

- 341 1862年9月4日同盟派在马里兰州发动进攻，这次进攻以9月17日在安提塔姆河的失败而告终。——第548页。
- 342 1862年9月12日入侵肯塔基州同盟派军队在10月8日的佩里维耳一战中被北军击溃。——第584页。
- 343 “西部巨人”是马克思对十九世纪名为大西部（The great West）的美国西部各州的农民的称呼；西部农民在1861—1865年内战时期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第585页。
- 344 林肯于1862年9月22日颁布的解放宣言，宣布属于南部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黑奴从1863年1月1日起为自由人。同时所有黑人都被赋予在陆军和舰队服务的权利。在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解放黑人，标志着北部转向革命战争。然而，在保持种植场主在南部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分配土地的解放，并没有使黑人免于原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的种族歧视。——第586页。
- 345 马克思大概指的是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第3册“悲剧、喜剧和正剧的原则”一节中所表述的思想。见“黑格尔全集”1838年柏林版第10卷第3册第526—540页（G. W. F. Hegel. Werke, Bd. X, Abt. III, Berlin, 1838, S. 526—540）。——第587页。
- 346 指希腊1862年2月开始的革命事件。运动的发生，是由于1854—1857年英法占领希腊，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经济状况。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了反对外国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的斗争。1862年10月

22日，雅典的城防军举行起义，全体居民都起来响应。当即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推翻国王巴伐利亚的奥托。但是，后来英国政府利用希腊资产阶级软弱性，重新强加给希腊人民一个英国傀儡——号称乔治一世的丹麦亲王威廉。

威亚尔的破产——威亚尔是与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见注337）组织委员会有联系的法国企业主。1862年9月间，在展览会闭幕前不久，传出了威亚尔破产的消息，在报上轰动一时。——第588页。

- 347 指蓝皮书“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epro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London, 1862），休·西·特里门希尔拟定。——第589页。
- 348 1862年10月3日，普莱斯和范多恩两位将军指挥的南军攻击了科林斯附近的北军阵地。两天的会战以同盟军的败退而结束。——第596页。
- 349 指同盟军要在1862年10月间收复他们在1862年2月间失守的纳希维耳的企图没有成功。——第596页。
- 350 指1862年10月7日格莱斯顿在新堡的演说，他在演说时声称，南方人“不但建立了陆海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国家”。——第599页。
- 351 指1862年11月4日北部各州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以及同时举行的纽约州州长选举。共和党人虽然在大多数北部州中取得了胜利，但因纽约和西北各州投民主党人的票，与上届选举相较失去了相当多的选票。民主党的首领之一西摩尔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第600页。
- 352 辉格党是主要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美国政党，一部分种植场主也参加了该党。辉格党存在于1834年至1852年，当时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的尖锐化引起国内各个政党的分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民主党的一部分以及自由土地党（见注184）一起，于1851年组成了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参加了维护种植场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第601页。

- 353 指1862年10月31日法国政府致书英俄外交代表一事，法国政府建议三国共同行动，以期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取消封锁，为欧洲贸易开放美国南部港口。拿破仑第三的干涉美国内政的建议于1862年11月8日（10月27日）被俄国拒绝，后来也被英国政府拒绝。——第602页。
- 354 杰克逊所率领的南军在入侵马里兰期间于1862年9月15日占领了波托马克河岸的一个重要居民点——哈帕尔斯渡口，那里有一支万人的驻军和一个大军械库。——第604页。
- 355 “亚拉巴马号”是根据南部同盟的订货，在英国建造和装备的一艘巡洋舰。1862年6月23日，即在该舰下水后不久，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就建造和装备“亚拉巴马号”事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英国政府仍然让该舰驶往亚速尔群岛，在那里获得武器装备。这艘巡洋舰在两年内（1862—1864）消灭了约70艘北美舰队的兵船。同英国政府进行的关于赔偿“亚拉巴马号”和英国建造的其他私掠船带来的损失的谈判，继续到1872年，结果，签订了一项英国赔偿美国1550万美元的协定。——第607页。
- 356 马克思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下述原因而写的：1863年4月10日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歪曲地叙述了马克思1861年春在柏林期间同拉萨尔进行的关于合办一个报纸的谈判。
-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柏林出版。——第613页。
- 357 支援波兰的呼吁书是马克思受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托而写的，协会组织了一个募捐委员会，帮助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成后，在协会中超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与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

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614页。

- 358 指中央民族委员会，1863年1月它领导了沙皇俄国所属的波兰地区的解放起义。1863—1864年的起义是由于波兰王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而引起的，起义的目标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贵族阶级分子组成的民族委员会在起义之初，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土地问题和民主问题的要求。1863年5月委员会采用了国民政府（《rząd narodowy》）这个名称。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的农民群众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到1863年秋天，起义基本上被沙皇政府镇压了下去。个别起义队伍的斗争继续到1864年底。——第614页。
- 359 瓜分波兰，见注41。——第614页。
- 360 1831年和1832年，在德意志联邦的几乎所有各邦中，反对情绪都由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影响而增涨了。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汉巴赫城堡附近，举行了由德国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组织的巨大的政治示威。除了提出宪制改革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要求之外，示威的参加者还悬挂波兰国旗表示声援正在进行斗争的波兰人民。——第614页。
- 361 民族联盟，见注76。——第615页。
- 362 指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丹麦的失败而告终的。根据1864年10月30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和约，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劳恩堡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共同领地。——第616页。
- 363 指帕麦斯顿1863年7月23日在下院的声明。丹麦与德意志联邦为了德国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当时受丹麦国王的最高权力管辖）的问题而加剧了冲突，帕麦斯顿对此作了声明。声明说，如果德国做了破

坏丹麦的不可侵犯性的任何尝试，则它的对手就不仅仅是一个丹麦。帕马斯顿的发言，目的只不过是稳定一下英国的舆论，舆论要求英国政府根据1852年5月8日关于丹麦君主国的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见注167）履行自己的义务。——第619页。

- 364 本文手稿我们收集的不全，缺第一部分的末尾和第二部分的开头（手稿的第5、6两页），及第二部分的末尾（手稿第9页）。德国的“军事总汇报”上刊登的恩格斯的文章都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恩·”，这证明“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一文是恩格斯为在该报发表而写的。但文章手稿未完，也未寄送编辑部。——第627页。
- 365 指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开始以及以后直到腊格伦勋爵逝世时的发展”一书的头两卷。1863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A. W.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Edinburg and London, 1863）。全书共出八卷。——第627页。
- 366 从金累克为他的书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参加阿尔马河会战的俄国将领们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以前在俄国报刊上发表过，后由一个俄国军官译成英文手稿送给金累克。金累克在他的书里利用了以下的回忆录：
奥·克维秦斯基“又一新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给‘俄国残废者’编辑的信”——1856年4月12日“俄国残废者”第84号；
彼·哥尔查科夫“评‘俄国残废者’第84号上刊载的‘又一新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一文”——1856年5月8日“俄国残废者”第101号；
瓦·基里亚科夫“新的阿尔马河会战纪详”——1856年6月21日“俄国残废者”第136号。——第627页。
- 367 1854年9月20日（8日）在阿尔马河上发生了俄军和英法联军之间的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第一次大会战，会战联军获胜，因为他们除了人数上的优势外，还有许多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虽然俄军指挥犯了错误，但俄军的反击使联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很大损

- 失。——第627页。
- 368 Anitschkof. 《Der Feldzug in der Krim》. Erster Theil, Berlin, 1857 (译自俄文版:阿尼奇科夫“克里木远征军事历史文集”1856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628页。
- 369 指R. 霍达谢维奇“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呼声”(R. Hodasevich [Chodasiewicz].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一书,该书于1856年在伦敦出版。——第629页。
- 370 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52年柏林版第3册第255—292页(A.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Dritter Theil, Berlin, 1852, S. 255—292)。——第630页。
- 371 “1854、1855和1856年东方战争的历史和地形图集”1859年 [巴黎版] (《Atlas historique et topographique de la guerre d' Orient, en 1854, 1855 et 1856》. [Paris], 1859)。——第632页。
- 372 指克里木法军总司令圣阿尔诺元帅于1854年9月21和22两日向拿破仑第三和陆军大臣所作的报告,报告发表于1854年10月7和8两日的“总汇通报”。
- 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Bazancourt 《L' 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 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第一版于1856年出版,共两卷。——第634页。
- 373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一文手稿也和上文手稿一样,我们收集的不全,缺手稿的末尾。文章上附有通讯员的记号“弗·恩·”,这证明该文也是为“军事总汇报”写的。——第644页。
- 374 指马·皮特里“大不列颠军队的人数,编制和组织”1863年伦敦版(M. Petrie. 《Strength,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Army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63)一书。——第644页。

- 375 军官官衔证书的出售制度在英国产生于十七世纪末，随后得到国王批准。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1871年，它保障了英国贵族在军队中的垄断地位。——第648页。
- 376 指1843年开始的英国殖民者对新西兰土著居民毛利人的战争。在战争期间毛利人使英国殖民军队吃了许多败仗。直到1872年，英国人把大部分土著居民消灭以后，才把毛利人赶到荒岛上饿死。——第648页。
- 377 阿尔德肖特兵营是距离伦敦75公里的一个常设军营，是1856年为克里木战争训练英军兵士设立的。——第648页。
- 378 桑德赫尔斯特学校是距离伦敦78公里的桑德赫尔斯特的一所军事学校，创办于1802年，为步兵和骑兵培养军官。——第649页。
- 379 法国的外籍军团是为进行殖民战争和镇压宗主国的革命运动而于1831年建立的一支雇佣军队。外籍军团主要是由侨居在法国的外国人中的游民和刑事犯组成的，但其军官职务只能由法国人担任。外籍军团曾参加过在阿尔及利亚和克里木的军事行动；1871年曾被凡尔赛军用来反对巴黎公社。——第660页。
- 380 按照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军事制度，军队中的兵分作几等。兵士如果违犯纪律，就要从一等降到二等，对二等可以采用体罚。——第663页。
- 381 附录中所发表的马克思请求恢复普鲁士国籍的几篇呈文是斐·拉萨尔于1861年春在马克思逗留柏林时应他的请求写的，并由马克思本人签名。马克思的申请被柏林警察总监拒绝，后来在同年11月，被普鲁士的内务大臣拒绝。——第667页。
- 382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 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

欧洲的革命的重要问题的立场的那些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执笔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揭露，——这一切使得报纸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特别是在普鲁士1848年11—12月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这种攻击和迫害更加厉害了。

尽管有这些迫害和警察局的百般刁难，“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取得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刷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668页。

- 383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第672页。
- 384 见“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1—454页）。——第678页。
- 385 指德意志联邦条例，它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根据这个条例，为数众多的德国邦形式上联合成为所谓“德意志联邦”（见注19）。——第684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60年1月—1864年9月)

1860

- | | |
|----------------|--|
| 1月—2月初 | 马克思继续写研究资本诸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为此，他经常到英国博物馆去研究1855—1859年工厂视察员的工作报告，研究斯密、魁奈、杜尔哥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重新阅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
| 1—2月 | 恩格斯研究军事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各种武器的创造和发展的历史。 |
| 1月11日—26日 |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密切注视美国和俄国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美国黑奴为争取消灭奴隶制的斗争和俄国废除农奴制的运动是当代最重大的事件。 |
| 1月17日 |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法国的状况”一文，揭露路易·波拿巴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新手法；文章发表于2月7日该报。 |
| 1月27、28日和2月11日 | 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英国的政治”、“法英之间的新条约”和“英国的预算”等文章中指出英国政府内外政策的反人民实质；这些文章发表于2月14日和25日该报。 |
| 1月30日左右 | 恩格斯写“萨瓦与尼斯”一文，揭露拿破仑第三对意大 |

利这两个省份的强求是毫无根据的。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2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1月底—2月初

由于波拿巴的爪牙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控诉”出版，马克思开始收集文献材料撰写反击福格特的文章。为此，他翻阅了1848—1859年期间他所收藏的所有书信和报纸，并请求一些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如沙佩尔、威·沃尔弗、列列韦尔、波克罕、伊曼特等人，把有关揭露福格特的材料寄给他。

恩格斯写“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该文嘲笑了德国各邦军队中盛行的学究气和检阅式的练兵。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2月上半月

马克思接到朋友和战友们对福格特的诽谤表示愤怒的许多来信，并收到他们寄来的一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

2月3日

恩格斯翻阅他新收藏的为揭露福格特所必需1850—1852年间的所有文件。

2月4—20日

恩格斯写作“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它是“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再次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意大利以及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的立场。这本小册子于4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

2月6日

马克思应特别邀请（这项邀请是尊敬他在发展共产主义原则方面的功绩的表示），出席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成立周年庆祝会。在会上一致通过关于谴责福格特的诽谤的决议。

马克思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声明，宣布他将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为该报在两篇社论中刊登了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的摘录并简述了它的内容。这篇声明刊载于“科伦日报”、柏林的“人民报”（《Volkst-Zeitung》）和“政论家”（《Publicist》），汉堡的“改革报”和奥格斯堡的“总汇报”。

-
- 2月13日—3月27日 马克思就控告“国民报”事同法律顾问维贝尔通信，把控告“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材料以及这一案件所需的许多其他文献和材料寄给柏林的维贝尔。
- 2月16日—3月25日 马克思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同威·沃尔弗一起讨论在报刊上抨击福格特的计划，为此，马克思重新阅读了有关福格特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活动情况的信件和材料，并进行广泛的通信搜集材料。
- 3—4月 恩格斯撰写“论线膛炮”这一篇长文，该文发表于4月7、21日和5月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3月初 恩格斯请拉萨尔帮助给出狱不久的诺特荣克（他是在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罪的）安排工作。
- 3月23日—4月6日 由于父亲逝世，恩格斯住在巴门。
- 4月9日—7月24日 马克思接到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来信请求为“人民呼声”（《Die Stimme des Volks》）（该报将由“工人协会”在芝加哥出版）聘请欧洲通讯员，马克思致书英国、法国和瑞士的革命流亡者代表——李卜克内西、波克罕、约·菲·贝克尔、洛美尔以及德国的拉萨尔，请他们向该报投稿，并同魏德迈通信商谈报纸出版问题。
- 4月10日 马克思写“柏林的情绪”一文，指出德国各阶层人民中的革命风潮正在加强。该文发表于4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4月中—6月2日 马克思应匈牙利政治活动家瑟美列的请求，阅读了他的论述恢复匈牙利独立的道路的小册子“1848—1860年的匈牙利”；马克思在给瑟美列写信谈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尖锐地批评他为波拿巴和帕麦斯顿辩护。
- 4月18日—10月5日 以马克思的名义提出的控告“国民报”编辑察贝尔诽谤的诉讼，遭到柏林一级和二级检察机关、柏林市法院以

及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拒绝。

- 4月底—5月初 由于巴勒摩起义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撰文指出西西里居民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压迫的不倦斗争。文章以“西西里和西西里人”为题作为社论发表于5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5—11月 为了撰写抨击福格特的文章，马克思研究十九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有关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的书籍、报纸和议会报告书中做了札记。
- 5月初 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两篇论普鲁士国内状况的通讯，这两篇通讯以“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为题发表于5月19日该报。
- 5月10日 恩格斯函告马克思他在父亲逝世后在欧门—恩格斯公司今后的工作条件。
- 5月12日左右—25日 恩格斯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后，启程去巴门。在返回曼彻斯特的途中，到伦敦马克思处作了短时期的逗留。
- 5月中 马克思接到俄国作家尼·伊·萨宗诺夫的来信，信中对福格特的诽谤表示极大的愤怒。萨宗诺夫指出1859年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莫斯科大学某教授在一次专题讲演中叙述了这本书的内容。
- 5月28日—6月7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注视着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在报刊上阐述这一运动的主要阶段，马克思论述加里波第部队远征的文章发表于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恩格斯的“加里波第在西西里”一文作为社论发表于6月22日该报。
- 6月2日 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在评述英国政治活动家戴·乌

- 尔卡尔特的支持者的对外政策立场时，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资产阶级阵营的临时盟友的某些策略原则。
- 6月13日 马克思写“普鲁士新闻”一文，论述即将召开的、有拿破仑第三参加的德国各邦君主会议。该文发表于6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6月19日左右 马克思拜访德国政论家波克罕，并建议他著文反驳波拿巴主义者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〇年的普鲁士”；在随后的数月里，马克思对波克罕著作的内容提出许多建议，还阅读了校样。
- 6月25日左右 恩格斯写“英国的志愿兵部队”一文，评述志愿兵的阶级成分。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6月底、7月10日和14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不列颠的贸易”一文和以“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作标题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在分析1860年上半年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的基础上，表明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强了。第一篇文章作为社论于7月16日在该报发表；其余两篇于8月6日和24日发表。
- 7月23日 马克思著文论述加里波第同卡富尔的决裂，该文发表于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标题是“西西里新闻。——加里波第和拉法里纳之争。——加里波第的信”。
- 7月24日左右和7月底 恩格斯联系着波拿巴法国的侵略计划写“不列颠的国防”和“伦敦会不会落入法国人之手？”两文，文中分析了英国官方的国防计划。两文作为社论发表于8月10日和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7月28日—8月3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一篇论叙利亚的骚动

- 的文章和“俄法同盟”一文，强调指出，法国和俄国国内矛盾的尖锐化迫使两国统治集团在战争中寻找出路。两文于8月11日和16日发表。
- 8月7日 马克思写“纸张税。——皇帝的信”一文，分析英国议会中不民主的法案通过程序。该文发表于8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8月8日 恩格斯写“加里波第的运动”，文中对加里波第革命部队的战斗品质给予很高评价，此外还指明那不勒斯王室军队的反人民性。该文发表于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8月11日 恩格斯观看在牛顿举行的志愿兵猎兵检阅并收到英国军事杂志“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的编辑诺德耳和霍尔的建议，请他写关于在牛顿举行的志愿兵猎兵检阅的文章。
- 8月14日—9月8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4篇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新的撒丁公债。——行将举办的法国公债和印度公债”、“欧洲的收成”、“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和“不列颠的贸易”。这些文章发表于8月28日，9月6、10和29日该报。
- 8月16日 恩格斯写“奥地利病夫”一文，指出奥皇对内对外政策的反动性以及奥地利帝国中革命力量的增长。该文作为社论发表于9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8月24日左右 恩格斯写“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一文并将该文寄给达姆斯塔德“军事总汇报”的编辑部，于9月8日发表。恩格斯将该文的英译稿寄给“志愿兵杂志”，由编辑部加上按语并以“德国报纸报道在牛顿举行的检阅”为题于9月14日发表。
- 9月初 恩格斯写两篇论述革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的进展的文

- 章：“加里波第的进军”和“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两文作为社论发表于9月21日和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9月中—10月中 恩格斯写“法国轻步兵”一文，发表于9月21日、10月5日和20日“志愿兵杂志”。
- 9月17日和27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分析法国和俄国的对外政策并对革命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前提作了详细叙述。“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和“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两文发表于10月10日和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0月上半月—11月底 恩格斯为“志愿兵杂志”写了两篇文章，论述志愿兵炮兵和工兵的组织问题，这两篇文章的标题是“志愿兵炮兵”和“志愿兵工兵，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发表于10月13日、11月24日和12月1日该杂志。
- 10月15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军事总汇报”编辑部约请他给该报经常撰稿的建议。
- 10月23日 由于普鲁士军队改组，马克思写“普鲁士备战”一文，该文发表于11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860年10月底—
1861年1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步枪史”一文，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了这种主要的小型火器的发展。该文从1860年11月3日起至1861年1月19日分八章载于“志愿兵杂志”，其中有一章为1861年1月27日的英国“陆海军报”转载。
- 11月8日 马克思写完抨击文“福格特先生”。
- 11月10日 马克思著文论述英国财政状况，文章以“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为题发表于11月2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11月17日 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一文的序言。

- 11月19日—12月 燕妮·马克思患危险的天花,在她患病期间孩子们寄居威·李卜克内西家里,马克思服侍重病的妻子。
- 11月22日左右 恩格斯结束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海军”一文,该文于1861年载于百科全书第12卷。
- 11月24日 由于普鲁士各级法院均拒绝马克思对“国民报”的控诉,马克思将声明寄给许多德国报纸编辑部,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于12月1日发表该声明。
- 11月底—12月19日 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将此书描述为他的世界观的“自然历史的基础”。
- 12月1日 马克思的抨击文“福格特先生”出版,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反击了资产阶级的诽谤性的进攻。他根据确凿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实,福格特是领波拿巴津贴的走狗。
- 12月20日 恩格斯接到诺德耳通知,说“志愿兵杂志”编辑部打算将恩格斯发表在该杂志上的文章印成单行本,以“志愿兵读物”为书名出版。
- 1860年12月24日和
1861年1月底 恩格斯写了两篇文章论述奥地利和德国革命危机的增强。“奥地利革命的发展”一文发表于1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德国的运动”一文作为该报社论于1861年2月12日发表。

1 8 6 1

- 1月18—22日 由于在普鲁士宣布王室大赦,马克思请恩格斯写一篇文章批评这种大赦,因为它实质上并没有普及到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流亡者。马克思将恩格斯写的文章寄给“泰晤士报”和“旗帜报”,但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拒绝刊登。

-
- 1月28日 马克思接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的通知,说停止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马克思的通讯六星期,此外,该报未发表的文章,出版人不付稿酬,因此,马克思全家在经济上遭到严重的困难。
- 1月底 恩格斯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但该报没有发表的文章“法国的武装力量”加以修改后寄给“志愿兵杂志”,该文2月2日发表于该杂志。
- 2月初 恩格斯阅读毕若元帅的著作“略论作战的几个问题”并对该书论述步兵战斗中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这一章作了摘录,恩格斯对毕若这本书摘要的英译文连同自己加的按语,以“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为题发表于2月9、16日和3月2日“志愿兵杂志”。
- 2月下半月—5月底 马克思研究古代世界史;阅读阿庇安用希腊文写的“罗马史”一书中关于国内战争这一章;重读修昔的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2月28日—3月16日左右 马克思到扎耳特博默耳(荷兰)去舅父莱·菲利浦斯处。
- 3月16日左右 “志愿兵读物”单行本出版,该书包括1860年和1861年初“志愿兵杂志”上刊登的恩格斯的5篇军事论文。
- 3月17日—4月12日 马克思住在柏林。他同拉萨尔商谈关于在德国共同出版报纸的问题并根据大赦令为恢复普鲁士国籍问题采取步骤。马克思接到王室警察总监策德利茨对自己请求的否定答复后,又向所住地区警察局提出接受他重新加入普鲁士国籍的申请并委托拉萨尔行使在这方面采取必要步骤的权利。马克思坐在记者席上出席了普鲁士议会下院的一次会议。
- 4月16日左右—19日 马克思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作短时期逗留后来到科伦,

- 会晤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卡·施奈德律师以及这个案件的前被告约·雅·克莱因；马克思还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领导人之一罗·丹尼尔斯的孀妇。
- 4月19—29日 马克思到特利尔母亲处住了两天，然后取道亚琛、扎耳特博默耳、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回到伦敦。
- 5月初—6月初 马克思同法国流亡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西·贝尔纳以及宪章派领袖厄·琼斯商定在伦敦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在巴黎逮捕布朗基和在监狱里虐待他；同时马克思采取措施，通过报刊报道布朗基在狱中受苦的情况。
- 5月7—1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德国出版报纸的问题通信交换意见，他们决定拒绝拉萨尔关于共同办报的建议，因为拉萨尔所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他要求编辑部由他领导）。
- 5月20日左右—23日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家作客。马克思将他去德国的结果详尽地告知恩格斯。
- 6月10日 马克思又接到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编辑麦·弗里德兰德的约稿建议。他请求马克思先寄两篇论美国内战及英国状况的文章。马克思考虑到该报在德国读者中享有很大名声，以及该报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反波拿巴派的立场，便接受了撰稿的建议；但又因该报对奥地利施梅林的假立宪政府持同情的态度而没有立即寄稿。
- 1861年6月中—
1862年11月 由于美国爆发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研究美国内战发生的原因。马克思在周密研究美国报刊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美国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奴隶制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美国人民反对黑奴制

- 的斗争具有很大意义，他们在文章及通信中强调指出北部各州所进行的战争的进步性。
- 6月18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柏林来的消息：市警察总监拒绝他加入普鲁士国籍的请求。
- 6月19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收到好友布朗基和法国政论家路·瓦托（德农维耳）的信，并且对他们又同法国的革命政党建立了直接联系一事表示满意。
- 1861年8月—1863年7月 马克思继续致力于他所计划的经济学巨著，预定在这部著作中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并且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研究结果和摘录分载在23本笔记中，构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 8—12月 马克思在写作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过程中，详细地研究了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问题，并开始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 8月底—9月上半月 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从那里向“新闻报”编辑部函询该报对奥地利政府危机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并在9月4—11日“科学促进协会”年会期间出席经济科学和统计学小组的会议。
- 9月18日和21日 马克思重新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1861年1月间曾停止撰稿），并为该报写“美国问题在英国”和“不列颠的棉花贸易”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0月11日和14日该报。
- 10月3日—10月底 恩格斯在德国亲人那里度假。
- 10月5日和12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文章，揭露帕麦斯顿报刊就美国事件所捏造的谎言。“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和“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

美”两篇文章发表于10月21日和11月7日该报。

- 10月20日和10月底 马克思开始给“新闻报”撰稿，寄给编辑部两篇文章——“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他在这两篇文章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了美国国内战争的前提、性质和动力。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0月25日和11月7日该报。
- 10月29日 马克思接到弗里德兰德的通知：从11月1日起马克思被聘为“新闻报”常驻伦敦的通讯员。
- 11月—12月初 恩格斯继续给“志愿兵杂志”撰稿，他的“志愿兵军官”和“美国战争的教训”两篇文章发表于11月22日和12月6日该报。
- 11月1日左右—18日 马克思写了5篇论英国经济的危机现象和论法国财政危机的文章。“英国的危机”、“经济短评”、“富尔德先生”、“法国的财政状况”等文章发表于11月6、9、19和23日“新闻报”；“不列颠的贸易”一文刊登在1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1月7日和8日 马克思写两篇论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的文章，揭露武装干涉的殖民性质，并指出英国的帕麦斯顿政府是武装干涉的真正组织者。这两篇文章以“对墨西哥的干涉”为题发表于11月12日“新闻报”和11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 11月10日 马克思汇款给路·瓦托，这笔款项是为了出版有关布朗基案件的小册子而从德国流亡工人中间募集的。马克思在给瓦托的信中称布朗基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杰出活动家”。
- 11月19日左右 由于废奴主义者弗里芒特将军被免除密苏里军总司令之职，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关于美国内部政治状况的文章。该文以“弗里芒特的免职”为题发表于11月

26日该报。

- 11月26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拉萨尔的通知：关于他要求加入普鲁士国籍的申请被普鲁士内务大臣最终拒绝。
- 11月28日—12月31日 由于英国邮船“特伦特号”被美国军舰拦截，马克思写了一系列论述英美冲突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揭露了同情奴隶主的英国执政寡头的立场，并表示相信英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特伦特号’事件”、“英美的冲突”、“‘特伦特号’剧中的几位主角”、“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和“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等文章发表于1861年12月2、3、8、11、25日和1862年1月4日“新闻报”。“‘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一文刊登在12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 1861年12月7日—1862年1月31日 由于“特伦特号”事件发生后英美关系的尖锐化，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指出英国反对战争情绪的增长。“英国国内同情心的增长”和“英国的舆论”两篇文章刊登在1861年12月25日和1862年2月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一个同情美国的大会”和“反干涉的情绪”等文章发表于1861年12月31日和1862年1月5日、2月4日“新闻报”。
- 12月10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约·威·维贝尔请求马克思写文章批判地分析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维尔特的观点及其所办的“雇主报”（《Der Arbeitgeber》）的立场，以便在德国的报刊上批判维尔特。
- 12月10日和13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奴隶制问题的危机”和“美国近况”两篇文章，指出北方要求消灭奴隶制的行动在发展。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2月14日和17日该报。

1862

- 1—2月 马克思着手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在这部著作中他批判地探讨了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在写“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过程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诸问题，批判地分析了所谓“斯密信条”，并表达了他自己关于再生产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后来在“资本论”第2卷里作了详尽的分析。
- 1月14日和17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西华德的公文被隐匿的经过”和“约翰·罗素勋爵的一次政变”两篇文章，揭露帕麦斯顿政府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计划。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862年1月18日和21日该报。
- 1月中和2月初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铁路统计资料”和“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两篇文章，分析英国政府和曼彻斯特商会的官方统计报告。这两篇文章发表于1月23日和2月8日该报。
- 1月28日 马克思写“伦敦的工人大会”一文，对英国工人阶级在面临武装干涉美国的威胁时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场给予高度评价。该文发表于2月2日“新闻报”。
- 2—6月 马克思同德国的社会主义流亡者威·艾希霍夫进行频繁的通信，因为后者在伦敦周报“海尔曼”（《Her-mann》）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金克尔开始论战。马克思寄资料给艾希霍夫和在德国的纽施塔特体操联合会会员威·维贝尔，帮助他们揭发那些加入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派民族联盟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 2月7日 马克思写“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一文，指出英国执政寡头对外政策的反动性质。该文发表于2月12日“新闻报”。

-
- 2月15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墨西哥的混乱”一文，文中指出，波拿巴企图在墨西哥建立以他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首的帝国，这就使武装干涉墨西哥的参加者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该文发表于3月10日该报。这是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 2月26日左右 马克思写“美国近事”一文，文中尖锐地批评了以总司令麦克累伦为代表的北军军事领导，并分析了林肯巩固北方军队的措施。该文发表于3月3日“新闻报”。
马克思收到德国革命运动的老战士约·菲·贝克尔从瑞士写来的信，信中请求马克思帮助出版他的论德国统一问题的著作“怎样与何时？”。为此马克思采取了一系列援助贝克尔的措施。
- 2月底 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论述沙皇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政策的文章。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 3月 恩格斯写关于美国的战争进程的文章，该文以“美国的战争”为题发表于3月14日“志愿兵杂志”。马克思把这篇文章译成德文，作了一些补充，并寄给“新闻报”，以“美国内战”为题发表于3月26日和27日该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发挥了自己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能够保证北部在战争中取胜。
- 3月30日—4月25日左右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他们同从利物浦到此作数日逗留的艾希霍夫一起，讨论关于反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金克尔的问题。
- 4月13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查·德纳的建议，要他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稿，因为该报在最近两个月一共只登载了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德纳还说他自己打算退出该报的编辑部。

- 4月28日左右 马克思拒绝弗里德兰德要他为“新闻报”写一篇关于5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工业展览会的专门报道的建议,因为到展览会采访一下要很多费用。马克思接受了关于以后每周给该报寄一篇文章的建议。
- 4月28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撰写论述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冒险的文章。该文以“国际性的米勒斯案”为题在5月2日发表。
-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新闻报”写一篇关于科林斯附近会战的文章,并请他以后经常报道美国的国内战争的主要事件。
- 马克思寄信给拉萨尔,信中建议他为布罗克豪斯在德国出版的“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杂志写一篇关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评论。
- 5月5日 为了研究印度土著军队的组织,恩格斯请求马克思把有关这一问题的议会报告以及英国陆军部的资料寄给他。
- 恩格斯继续注视着北美的战争,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周详地描写了科林斯附近的会战和弗吉尼亚战斗。
- 5月16、18日和6月14日 由于北军部队占领新奥尔良——蓄奴州同盟的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马克思为“新闻报”写“英国报刊与新奥尔良的陷落”、“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和“英国的人道与美国”等文章。他在文章中分析了美国国内战争和最终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前景。这三篇文章发表于5月20、22日和6月20日该报。
- 5月23—25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地分析了美国主要战场上的局势。马克思利用恩格斯的材料为“新闻报”写“美国战场的形势”一文,该文发表于5月30日该报。
- 6月 马克思重读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和论证新

-
- 的地租理论”。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判了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 6—7月 马克思的家庭由于他停止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而遭到极大的物质贫困。燕妮·马克思试图卖掉丈夫的一部分藏书，但徒劳无补。在恩格斯的帮助下，马克思清偿了一部分债务。
- 6—8月 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过程中，发展了他关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理论。马克思在8月2日和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详细地告诉了他。
- 6月6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德国流亡者威·施特芬从波士顿寄去的消息，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因岑在“先驱者”（《Der Pionier》）杂志上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要求把有关海因岑的过去政治活动的材料寄去，以便在报刊上予以还击。
- 6月中 为了在自己的经济著作中批判马尔萨斯的反动观点，马克思重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指出达尔文的理论是对马尔萨斯主义的驳斥。
- 6月底 恩格斯写“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一文，该文发表于7月3日“新闻报”。
- 7月5日左右 马克思访问曾在意大利加里波第部队里作过战的前奥军上尉施韦格尔特。马克思从施韦格爾特的谈话中了解那种为拉萨尔所赞同的、德国军官吕斯托夫制定的关于“解放”德国的计划，并尖锐地批判了这些计划的冒险性。
- 7月9日—8月4日 马克思时常访问来伦敦参观世界工业展览会的拉萨尔。拉萨尔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告诉马克思，他打算在德国的工人中间开始进行争取实现普选权的鼓动和借

容克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国家之助组织生产协会，以期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尖锐地谴责拉萨尔的纲领和策略的改良主义实质，同时着重指出他们在政治上除开某些极其遥远的最终目的以外毫无共同之处。

- 7月16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作论述英国政府的反动对外政策的文章。该文以“关于墨西哥问题的辩论被压制和同法国的联盟”为题于7月20日发表。
- 7月30日—9月1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美国的事件，就美国国内战争的前景通信交换意见。尽管恩格斯由于北军在军事上严重失利而对战争前景的估价稍有怀疑，但马克思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全部总和，坚决地相信北部的最后胜利。马克思在“评美国局势”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该文发表于8月9日“新闻报”。
- 8月2日 恩格斯出席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希顿公园里举行的英国志愿兵检阅。恩格斯在“英国的志愿兵检阅”一文中评价了志愿兵的训练状况。他把该文寄给“军事总汇报”，发表于11月1日和8日该报。
- 8月9日以后 马克思向在纽约出版的废奴主义报纸“晚邮报”的编辑部提出撰稿建议。
- 8月22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美国废奴派的示威”一文，指出争取立即消灭黑奴制的力量日益成长和团结。文章发表于8月30日该报。
- 8月27日 马克思以“新闻报”通讯员的资格取得参观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的长期出入证。
- 8月28日—9月7日左右 马克思为了安排财务，到扎耳特博默耳舅父莱·菲力浦斯和到特利尔母亲那里去了一趟。马克思在归途中于科伦会见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弗·卡普，他是从美国来的。卡普把德国革命流亡者站在

- 北部各州的一边参加美国的国内战争的情况告诉了马克思。
- 9月 马克思在批判分析李嘉图的积累理论的过程中,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发展了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危机的理论。
由于家庭的物质状况极端困难,马克思试图通过表兄奥·菲利浦斯的介绍到一家英国铁路营业所工作,但是没有被录用。
- 9月11日 艾希霍夫请求恩格斯帮助在德国流亡者中间推销为德国禁止的、威·维贝尔的小册子“我被纽施塔特体操联合会开除”,这本小册子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的。
- 9月11—30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了3篇文章,论述英国工人因棉纺织业危机而产生的困难状况和论述英国人民声援加里波第的群众大会。“援救加里波第大会”、“英国工人的贫困”和“加里波第派的大会。——棉纺织工人的贫困”等文章发表于9月17、27日和10月4日该报。
- 9月12—29日 恩格斯取道比利时和卢森堡去德国休养。在沿摩塞尔河、莱茵河畔和在绍林吉亚旅行后,停留于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亲人处。
- 1862年10月上半月—1864年9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从流亡中回到德国的威·李卜克内西保持经常通信,从他那里得到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现状的消息;马克思指导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工人中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活动。
- 10月7日 马克思写“北美事件”一文,他在文章里欢迎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权宣言。该文发表于10月12日“新闻报”。
- 10月下半月 马克思访问从巴黎来的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

加者维·席利。

- 10月底 马克思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写“面包的制作”一文，叙述了英国面包业工人的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该文发表于10月30日“新闻报”。
- 11月4—29日 马克思为“新闻报”写5篇文章，总结美国国内战争的第一阶段。“北美形势”、“南部同盟势穷力竭的迹象”、“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麦克累伦的免职”和“英国的中立。——南部各州的状况”等文章发表于11月10、14、23、29日和12月4日该报。马克思给“新闻报”撰稿就到这几篇文章为止。
- 11月18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军事总汇报”编辑部要他更多地寄稿的建议并打算把他的稿件刊登在“来自英国的军事书信”栏。编辑部还请求恩格斯向德国读者报道英国军事方面的技术成就。
- 12月 马克思撰写“资本和利润”章的初稿，这一章的内容相当于后来的“资本论”第3卷头三篇。
- 12月5日左右—13日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作客数日，并访问在利物浦的艾希霍夫。
- 12月28日 马克思在给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库格曼的信中说，他打算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下一分册作为单独的著作出版，用“资本论”做书名，并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副标题。马克思同时要求库格曼谈谈德国的事态。从此以后，马克思和库格曼之间开始了经常的通信。
- 1 8 6 3
- 1月 马克思结束了“剩余价值学说史”主要篇章的写作，他打算以后把这一著作作为“资本论”的结论部分、历史

批判部分出版。同时他编写“资本论”第1和第3部分的提纲，这两部分成了后来“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基础。马克思打算在第1篇里研究资本生产的过程，在第3篇里研究资本和利润的问题。

马克思在回头写作自己经济著作里的论机器的一章时，重新阅读他先前写成的技术史摘要笔记，并且在地质学院听讲工艺学实用课。

由于停止给“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家庭遭到极大的物质贫困。恩格斯了解到马克思家境困难之后，给他相当大的金钱援助。

- 1月6日 恩格斯的妻子玛丽·白恩士逝世。
- 1月28日 马克思阅读了拉萨尔的“工人纲领”之后，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它是“共产党宣言”的庸俗化。
- 2月上半月 马克思由于经常的过度疲劳患了眼炎。医生建议他暂停工作。
- 2月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热烈的同情欢迎了波兰开始起义的消息。他们认为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问题的意义特别重大，于是决定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就波兰起义问题发表呼吁书。他们预定在小册子“德国和波兰。论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的军事政治性质”里更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负责小册子的政治部分，恩格斯负责军事部分。马克思希望“熔岩这次将由东方向西方奔流”，并请求恩格斯注意俄国革命流亡者的机关报“钟声”对波兰起义的言论。
- 2月下半月—5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撰写论述波兰的小册子而搜集资料，从报纸上和从波兰、普鲁士和俄国的历史书籍中作了许多摘录。马克思根据这些资料，为小册子写了两篇预拟稿，在草稿中他详细地探讨了普鲁士和沙皇俄

国对波兰的侵略政策,以及霍亨索伦王朝兴起的历史。但小册子没有写完。

- 3—7月 马克思长时期在英国博物馆写作。马克思联系着他的经济学著作——未来的“资本论”——中已经写成的部分,从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书籍中作补充摘录,这些摘录积成八本笔记。马克思利用这些资料写作单独的历史批判论文和短评,其中包括论配第的详尽论文,这些文章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主要篇章的补充。
- 3月26日 马克思出席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人数众多的工人群众大会,这是伦敦工联理事会为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声援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而组织的。
- 1863年4月初—
1864年9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密切地注视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拉萨尔开始鼓动问题拟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拉萨尔的活动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拉萨尔的鼓动对德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进步派政党的影响有某种良好作用,决定暂时不公开地反对拉萨尔。他们努力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首先是李卜克内西,来影响全德工人联合会,帮助加入该联合会的工人站到革命立场上来。
- 4月8日左右 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问题,阅读赖尔的“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和赫胥黎的“论人类在有机界中的位置”。
- 4月13日 马克思写辟谣启事寄给“柏林改革报”编辑部,因为该报对1861年春马克思同拉萨尔关于在德国共同办报的商谈作了不正确的报道。启事发表于4月17日该报。
- 5月 恩格斯重新研究塞尔维亚文,阅读武克·卡腊季奇出版的民歌集。
- 6月 恩格斯阅读金累克“入侵克里木”这一著作的已经出版

-
- 的头两卷，并为“军事总汇报”写作题为“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的书评。手稿没有写完。
- 7月初 马克思多多地研究了数学，特别是微分学和积分学。
- 7月6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作了说明和图解。
- 1863年8月—1865年12月 马克思决定用更有系统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经济著作的理论部分，着手撰写新稿。他在工作过程中写成了“资本论”（共3卷）的新手稿。
- 8月21日 马克思会见波兰上校拉品斯基，他来伦敦是为了组织一支德国军队帮助正在战斗的波兰人。马克思协助拉品斯基在德国流亡者中间募捐，作为军队的经费。
- 9月底 恩格斯参观利物浦港，并为“军事总汇报”撰写文章，论述美国装甲舰队和炮兵在国内战争中的发展。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 10月中 恩格斯在德国他母亲那里休养。
- 10月底—11月 马克思受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写声援波兰的呼吁书，号召为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募捐。马克思在呼吁书中强调说：“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的、统一的德国。”呼吁书由博勒特、列斯纳、威·沃尔弗、约·格·埃卡留斯和其他会员签名，以传单的形式印出，并分发给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代表。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瓦耳泰希的请求和马克思的委托，给在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寄去了50份呼吁书，以便在联合会的各组织中间散发。
- 11月 马克思患严重疝病。
- 12月3日 恩格斯通知马克思说，他打算写一本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小册子，并请马克思在德国为小册子

找出版者。恩格斯的这一打算没有实现。

- 12月7日 马克思因母亲逝世去特利尔。
- 12月19日左右 马克思离开特利尔，顺便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亲戚那里去住了一天。
- 1863年12月21日—
1864年2月19日 马克思因遗产事住在扎耳特博默耳舅父莱·菲利浦斯(母亲的遗嘱执行人)处,在那里疴病复发。恢复健康以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住了两天返回伦敦。

1864

- 1864年初 恩格斯为“军事总汇报”写“英国军队”一文。该文手稿没有写完。
- 2月上半月 由于爆发丹麦战争,恩格斯写“什列斯维希的军队人数”一文。该文发表于2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
- 3月 马克思迁入新居,地址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 3月12日 马克思去曼彻斯特小住数日,以便把他的德国和荷兰之行的结果告诉恩格斯。
- 4月21日 伦敦报纸“自由新闻”的出版者科勒特访问马克思,交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 5月3日 由于自己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威·沃尔弗患重病,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马克思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会见了艾希霍夫、施特龙和德朗克等同志,并同厄·琼斯恢复了友谊。
- 5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同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一道参加沃尔弗的葬礼。在沃尔弗的墓前,马克思致诀别词。

-
- | | |
|------------|---|
| 5月19日 | 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返回伦敦。恩格斯在马克思处作客四天。 |
| 5月底—6月 | 马克思编写沃尔弗年谱，他打算写沃尔弗的详细传记。由于缺乏沃尔弗的早期活动材料，马克思请求“布勒斯劳晨报”（《Breslauer Morgen-Zeitung》）编辑埃尔斯纳寄给他所缺的资料。马克思的这一打算没有实现。 |
| 6月1日—16日左右 | 取道伦敦去美国的佐林根流亡工人——弗·莫尔和尤·梅耳希奥尔数度访问马克思。他们把莱茵省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告诉了马克思。马克思帮助他们筹集赴美国的用费，并交给他们一封致居住纽约的德国流亡者阿·雅科比的介绍信。 |
| 6月3日 |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对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是经济学的尤利安——资本和劳动”一书的批评意见，认为它是对自己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抄袭。 |
| 6月27日 | 恩格斯为“军事总汇报”写作“英国的反德兵力”一文，该文发表于7月6日该报。 |
| 6月底—7月初 | 马克思为“自由新闻”撰文论述俄国对1864年丹麦战争的立场，该文一直没有发表。 |
| 6月底—8月上半月 | 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阅读卡本特尔、洛尔德、克利克尔、施普尔茨海姆、施旺和施莱登的著作。 |
| 1864年下半年 | 马克思继续写“资本论”的新手稿，但因健康情况的恶化而几度中辍。 |
| 7月7日 | 恩格斯被选为曼彻斯特德国政治流亡者席勒协会理事会的委员。 |

-
- 7月20日左右—8月10日 马克思在兰兹格特休养。
- 9月8日—10月上半月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那里和在兰兹格特休养的母亲的母亲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前往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了解国家的政治情况和奥地利—普鲁士军队的状况。
- 9月12日左右—14日 马克思收到李卜克内西的信。由于拉萨尔身死，李卜克内西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许多会员的请求，建议马克思担任联合会的领导，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回信中表示同意在一定条件下担任联合会主席的职务。

人名索引

三 画

万哈根·冯·恩赛, 卡尔·奥古斯特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85—1858)——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文学批评家。——第48页。

四 画

牛顿 (Newton)——新堡 (英国) 市参议员, 曾主持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1862年9月)。——第574、576页。

丹屠, 爱德华·昂利·茹斯坦 (Dentu, Edouard - Henri - Justin 1830—1884)——法国出版商, 波拿巴主义者。——第121页。

韦伯斯特, 丹尼尔 (Webster, Daniel 1782—1852)——美国国家活动家, 美国辉格党领袖之一, 曾任国务卿 (1841—1843和1850—1852)。——第439页。

韦瑟罗耳, 乔治·奥加斯特斯 (Wetherall, George Augustus 1788—1868)——英国将军, 1860—1866年任英国北部军区司令。——第152页。

尤尼乌斯——见弗兰西斯, 菲力浦。

尤斯提斯, 乔治 (Eustis, George 1828—1872)——美国外交官, 斯莱德尔的秘书。——第409页。

尤维纳利斯 (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

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六十年代—死于127年后)——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399、549页。

邓恩 (Dunne)——英国军官,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34页。

邓斯·司各脱, 约翰 (Duns Scotus, Johannes 1265左右—1308)——中世纪经院哲学家, 唯名论 (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 的代表人物, “牛津文集”这一巨著的作者。——第410页。

邓洛普, 亚历山大·默里 (Dunlop, Alexander Murray 1798—1870)——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第337、338页。

比耳斯, 艾德蒙 (Beales, Edmond 1803—1881)——英国法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55年为主张议会改革的宣传家之一, 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 美国内战时期支持北部; 1865—1869年为改革同盟主席。——第483页。

比彻—斯托, 哈里埃特·伊丽莎白 (Beecher—Stowe, Harriet Elizabeth 1811—1896)——美国女作家, 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 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第321、323、324页。

比约, 奥古斯特·阿道夫·玛丽 (Bil-lault,

- Auguste— Adolphe— Marie 1805—1863)——法国政治活动家, 律师, 奥尔良党人, 1849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内务大臣 (1854—1858、1859—1860)。——第394、395页。
- 比克西奥, 吉罗拉莫 (尼诺) (Bixio, Girolamo (Nino) 1821—1873)——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和1849年4—7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1862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 1870年为占领罗马的加里波第部队的指挥官。——第165、169页。
- 巴兰坦, 威廉 (Ballantine, William 1812—1887)——英国法学家。——第448、449、491—493页。
- 巴罗什, 比埃尔·茹尔 (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第15页。
- 巴特勒, 本杰明·富兰克林 (Butler, Benjamin Franklin 1818—189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 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 美国内战时期夺取新奥尔良时为远征军的指挥官, 新奥尔良的军事长官 (1862)。——第505、539、540页。
- 巴赞库尔, 塞扎尔 (Bazancourt, César 1810—1865)——男爵, 法国军事著作家, 波拿巴主义者。——第634页。
- 巴克鲁公爵, 瓦尔特·弗兰西斯·蒙台居—道格拉斯—司各脱 (Buccleuch, Walter Francis Montagu—Douglas—Scott, Duke of 1806—1884)——英国贵族, 托利党人。——第550—552页。
- ## 五 画
- 汉诺威王朝——英国的王朝 (1714—1901), 这个王朝的国王同时是德国汉诺威邦的选帝侯 (1815年以前) 和国王 (1837年以前)。——第427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1825—1855)。——第112、538页。
- 叶卡特林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 (1762—1796)。——第451页。
- 古赞—蒙多邦, 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都昂, 八里桥伯爵 (Coursin—Montauban, Charles—Gillaume—Marie—Appolinaire—Antoine, comte de Palikao 1796—1878)——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 (1860), 1870年为陆军大臣和政府首脑。——第524页。
-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78页。
- 丘纳德, 赛米尔 (Cunard, Samuel 1787—1865)——英国船主, 经营英美邮务的轮船公司的创办人。——第413页。
- 本廷克, 乔治·威廉·皮埃尔庞特 (Bentinck, George William Pierrepont)——英国议会活动家, 托利党人。——第510页。
- 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 (Saint—Arnaud, Arman—Jacques—Achille Leroy de 1801—1854)——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

- 陆军大臣(1851—1854),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632、634页。
- 兰西尔, 爱得文·亨利(Landseer, Edwin Henry 1802—1873)——著名的英国画家。——第491—493页。
- 兰尼勒, 托马斯·赫伦·琼斯(Ranelagh, Thomas Heron Jones 生于1812年)——子爵, 英国军官, 曾参加志愿兵运动。——第280—283、304页。
- 加里波第, 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 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阿尔卑斯猎兵; 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1862年组织了从罗马教皇军和法国占领者手中解放罗马的远征。——第63、64、69—73、100—103、132—135、142、144、148、163—171、197—200、253、562、574—576、588页。
- 司各脱, 德雷德(Scott, Dred 1810左右—1858)——美国黑奴, 1848—1857年曾设法从美国司法机关求得解放, 未能成功。——第324、350页。
- 司各脱, 温菲尔德(Scott, Winfield 1786—1866)——美国将军, 曾参加1812—1815年英美战争; 美国陆军总司令(1841—1861年11月)。——第441页。
- 司各脱, 威廉, 斯托威耳男爵(Scott, William, Baron Stowell 1745—1836)——英国法学家, 托利党人, 国际航海法专家, 曾任海军裁判所法官(1798—1828)。——第409、419、432页。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 首相(1834—1835、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243页。
- 皮尔斯, 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家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美国总统(1853—1857); 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401、429、508页。
- 皮特(小皮特), 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第11、480页。
- 皮特里, 马丁(Petrie, Martin 1823—1892)——英国军官, 写有许多欧洲军队编制和装备方面的著作。——第644页。
- 瓦伊, 米克洛什(Vay, Miklos 1802—1894)——男爵, 匈牙利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1848年为驻特兰西瓦尼亚的政府专员, 1860—1861年任首相, 实行同奥地利君主国妥协的政策。——第252页。
- 瓦扬, 让·巴蒂斯特·菲利贝尔(Vailant, Jean-Baptiste-Philibert 1790—1872)——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陆军大臣(1854—1859), 皇廷事务大臣(1860—1870)。——第395页。
- 瓦特耳, 艾梅尔(Vattel, Emer 1714—1767)——瑞士法学家, 在萨克森当外交官, 为国际法专家。——第435页。
- 瓦德西, 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Walderssee, Friedrich Gustav 1795—1864)——伯爵,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陆军大臣(1854—1858)。——第307—309、

- 312—313、317页。
- 瓦廉多夫 (W ahrendorff)——男爵,瑞典厂主和军事发明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34、35页。
-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伦纳 (W alewski, A lexan dre — Florian — Joseph Colonna, comte de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曾任外交大臣(1855—1860)和国务大臣(1860—1863)。——第395页。
- 弗拉奥·德·拉·比拉尔德里伯爵,奥古斯特·沙尔·约瑟夫 (Flahaut de la Billarderie, A uguste — Charles — Jo seph, comte de 1785—1870)——法国外交家,1860—1862年任驻伦敦大使。——第501、502页。
- 弗洛雷斯 (Flores)——那不勒斯将军,1860年为驻阿普利亚军队指挥官。——第164页。
- 弗洛伊德,约翰·布坎南 (Floyd, John Buchanan 1807—1863)——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弗吉尼亚州州长(1850—1853),曾任陆军部长(1857—1860),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南部方面。——第519、597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 —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5、20、76、112、141—144、205、206、249、251、252、256页。
- 弗兰西斯,菲力浦 (Francis, Philip 1740—1818) (笔名尤尼乌斯 Junius)——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过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章。——第427页。
- 弗兰契斯科二世 (Francesco II 1836—1894)——那不勒斯国王(1859—1860)。——第51、100、142、144、163、196、384页。
- 弗里芒特,约翰·查理 (Frémont, John Charles 1813—1890)——美国探险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1856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内战时为密苏里州(1861年11月以前)和弗吉尼亚州(1862)的北军指挥官。——第324、353、365、401—403、442、445、507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iedrich — Wil helm I 1688—1740)——普鲁士国王(1713—1740)。——第58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58、232、314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 — Wil 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59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 — Wil 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22、45、208页。
-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 (Friedrich — Karl, Prinz 1828—1885)——普鲁士将军,后为元帅。——第232页。
- 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第78、253页。
- 布阿 (Bouat)——法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年任法军旅长。——第632、633页。
- 布坎南,詹姆斯 (Buchanan, James 1791—1868)——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曾任国务卿(1845—1849),驻伦敦公使(1853—1856),美国总统(1857—

- 1861); 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325、326、349、351、352、360、361、366、401、429、453、508、513、597页。
- 布埃耳, 唐·卡洛斯 (Buell, Don Carlos-1818—1898) ——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曾任田纳西和肯塔基两州的一个军团指挥官 (1862)。——第505、515、520、593页。
- 布里冈蒂 (Briganti, 死于1860年) ——那不勒斯将军; 1860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 被那不勒斯起义士兵击毙。——第166、170页。
- 布吕歇尔, 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 ——普鲁士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618页。
- 布雷金里季, 约翰·卡布耳 (Breckinridge, John Cabell 1821—1875) ——美国国家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领导人之一; 副总统 (1857—1861), 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 美国内战时是南军的将军, 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 (1865)。——第349、355、361、362、557页。
- 布卢姆菲耳德, 约翰·阿瑟·道格拉斯 (Bloomfield, John Arthut Douglas 1802—1879) ——男爵, 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柏林公使和全权代表 (1851—1860), 驻维也纳大使 (1860—1871)。——第65页。
- 布莱特, 约翰 (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 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 历任自由党内阁各部大臣。——第417、435、457页。
- 布莱格, 布拉克斯顿 (Bragg, Braxton 1817—1876) ——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时为肯塔基州的南军指挥官 (1862)。——第592、593、596页。
- 布鲁姆, 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 ——男爵, 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名活动家, 曾任大法官 (1830—1834); 五十年代起在政治生活中不起重大作用。——第562页。
- 布鲁土斯 (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左右—42) ——罗马政治活动家, 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贵族共和派阴谋的发起人之一。——第529—560页。
- 布朗, 乔治 (Brown, George 1790—1865) ——英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英军师长。——第635、637页。
- 布朗, 约翰 (Brown, John 1800—1859) ——美国农民, 废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之一; 堪萨斯反奴隶武装斗争 (1854—1856) 的积极参加者; 1859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 被送交法院, 后被处死。——第327页。
- 布朗逊, 奥列斯特斯·奥加斯特斯 (Brownson, Orestes Augustus 1803—1876) ——美国神学家, 属于民主党, 曾先后在波士顿和纽约两地出版天主教杂志; 美国内战时期主张保存联邦。——第366页。
- 卡诺, 拉查尔·尼古拉 (Carnot, Lazare—Nicolas 1753—1823) ——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派, 抗击欧洲各

- 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第395页。
- 卡瓦利, 卓万尼 (Cavalli, Giovanni 1808—1879)——意大利军官, 1860年起是将军; 军事发明家。——第30—32页。
- 卡富尔, 卡米洛·本佐 (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和领袖; 撒丁政府首脑 (1852—1859和1860—1861), 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而下地统一意大利的政策, 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仑第三的支持, 1861年领导第一届意大利政府。——第100、102、103、197—199页。
- 卡尔洪, 约翰·科德威尔 (Calhoun, John Caldwell 1782—1850)——美国国家活动家, 民主党领袖之一, 奴隶占有制寡头政体的思想家; 曾任美国陆军部长 (1817—1825), 副总统 (1825—1832), 参议员 (1832—1844, 1845—1850), 国务卿 (1844—1845)。——第328、354、391页。
- 卡瑟克特, 乔治 (Cathcart, George 1794—1850)——英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英军师长。——第635页。
- 卡拉姆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家, 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编纂家。——第193页。
-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 卡纳尔文伯爵, 亨利·霍华德·莫利纽·赫伯特 (Carnarvon, 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 Earl of 1831—1890)——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曾任殖民大臣 (1866—1867和1874—1878)。——第540页。
- 卡利奥斯特罗, 亚历山得罗 (Cagliostro, Alessandro 1743—1795) (真名为朱泽培·巴尔扎莫 Giuseppe Balsamo)——伯爵, 冒险主义者, 骗人的神秘论者。——第7页。
- 卡托 (老卡托) (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 (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贵族特权的维护者; 公元前184年被选为监察官, 他监察之严格是人所共知的。——第341、538页。
- 卡托 (小卡托) (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 (Marcus Porcius Cato (Minor) 公元前95—46)——罗马国家活动家, 贵族共和派领袖。——第536页。
- 卡尼, 菲力浦 (Kearny, Philip 1815—1862)——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波托马克河军团某部指挥官 (1861—1862)。——第535、605页。
- 卡尼茨, 卡尔 (Canitz Karl 生于1812年)——男爵, 普鲁士外交家, 1859—1863年任驻罗马公使。——第196页。
- 卡斯, 路易斯 (Cass, Lewis 1782—1866)——美国国家活动家、将军和外交家, 属于民主党; 曾任陆军部长 (1831—1836), 国务卿 (1857—1860); 美国内战时期主张保存联邦。——第366页。
- 卡斯尔里子爵, 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797—1801), 陆军和殖民大臣 (1805—1806和

1807—1809), 外交大臣(1812—1822)。——第540页。

六 画

托蒂(Totti)——波拿巴的警探,原籍科西嘉岛。——第100、102、103、198页。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第89、427页。

吉耳平, 查理(Gilpin, Charles 1815—1874)——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帕麦斯顿内阁阁员(1859—1865)。——第477、478页。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Lef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15页。

伐兰狄甘, 克雷门特·勒尔德(Vallandigham, Clement Laird 1820—1871)——美国政治活动家, 北部民主党的领袖之一, 国会议员(1858—1863); 曾在北部策划一系列支持南部奴隶主的阴谋活动。——第601页。

老迪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the Elder 公元前431左右—367)——叙拉古暴君(公元前406左右—367)。——第50页。

毕若·德·拉·比贡利, 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1843年起), 奥尔良党人; 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 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 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战争组织者之一; 写有许多军

事著作。——第262、263、265、313页。

多尔哥鲁科夫, 彼得·弗拉基米罗维奇(Долгоруков, Пет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16—1868)——公爵, 俄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自由主义者, 1859年流亡国外, 六十年代出版了一些反对派报刊杂志, 曾为赫尔岑的“钟声”撰稿。——第110页。

华盛顿, 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的总司令; 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第322、348、427、586页。

华尔希, 约翰·贝恩(Walsh, John Benn 1798—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国会议员。——第540页。

考恩, 约瑟夫(Cowen, Joseph 1831—190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 资产阶级激进派, 追随宪章派; 新堡援救加里波第大会(1862年9月)的组织者之一。——第574、576页。

考莱伯爵, 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巴黎大使(1852—1867)。——第15、502、503页。

伊文思, 乔治·德·雷希(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 自由党政治活动家, 国会议员;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英军师长。——第635—637、639、641页。

伊斯图里斯, 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Isturiz, Francisco Javier de 1790—1871)——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

- 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曾任政府首脑（1836、1846和1858），驻伦敦公使（1848、1858—1862）。——第499—501页。
- 安德森，罗伯特（Anderson, Robert 1805—1871）——美国军官，1861年5月起为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萨姆特堡垒卫戍司令（1860年12月—1861年4月）。——第348页。
- 安凡丹，巴特利米·普罗斯比尔（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亲信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四十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第15页。
-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第50页。
- 西摩尔，霍雷修（Seymour, Horatio 1810—1886）——美国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党领袖之一，纽约州州长（1853—1855和1863—1865），美国内战时期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600、603页。
- 西华德，威廉·亨利（Seward, William Henry 1801—1872）——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右翼领袖之一；纽约州州长（1839—1843），1849年起为参议员，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曾任美国国务卿（1861—1869）；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401、402、410、453、458、465—467、470、471、476—478页。
- 艾夫斯，马尔康（Ives, Malcolm）——美国新闻记者，属于民主党，自五十年代末起是“纽约先驱报”的撰稿人。——第508页。
- 艾释华特，亨利（Ashworth, Henry 1794—1880）——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487页。
- 艾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佛罗（Essex, Robert Devereux, Earl 1591—1646）——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属于长老会派，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总司令（1642—1645）。——第506页。
- 伍德（Wood）——英国工人，布莱顿反干涉大会（1861年12月）的参加者。——第460页。
-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第128、139、140页。
- 伍德，费南多（Wood, Fernando 1812—1881）——美国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党领袖之一，曾任纽约市市长（1854—1858、1860—1863），美国内战时期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444、600页。
- 伍耳，约翰·爱里斯（Wool, John Ellis 1784—1869）——美国将军，废奴主义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的北军指挥官（1861年8月—1862年5月）。——第442页。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59页。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10、46、59、76、112页。
- 亚当斯（Adams）——英国军事发明家（十

- 九世纪中叶)。——第229页。
- 亚当斯, 约翰 (Adams, John 1735—1820)——美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 (1775—1783) 是资产阶级温和派领袖之一; 曾任美国驻伦敦第一任公使 (1785—1788), 美国总统 (1797—1801), ——第322页。
- 亚当斯, 查理·弗兰西斯 (Adams, Charles Francis 1807—1886)——美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 美国驻伦敦公使 (1861—1868)。——第408、416、418、440、470、471、476、477、483页。
-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纳 (Minie, Claudette 1804—1879)——法国军官, 新式步枪的发明者。——第24、217—221、235页。
- 米格尔, 唐 (Miguel, Dom 1802—1866)——葡萄牙国王 (1828—1834)。——第11页。
- 米尔纳·基卜生——见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
- 米索里, 朱泽培 (Missori, Giuseppe 1829—1911)——意大利军官,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六十年代曾在加里波第革命军队里作战。——第165、166、169页。
- 米腊蒙, 米格尔 (Miramón, Miguel 1832—1867)——墨西哥将军, 保守党领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导人之一, 叛乱政府首脑 (1859—1860); 1862—1867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儡马克西米利安, 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毙。——第525页。
- 米勒斯, 茹尔·伊萨克 (Mirès, Jules Isaac 1809—1871)——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 “立宪主义者报”等报纸的所有人, 1861年被控从事证券投资活动而被送交法院。——第524—526页。
- 米哈伊尔·尼古拉也维奇 (Михаилъ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909)——俄国大公, 尼古拉一世的第四个儿子。——第636页。

七 画

- 怀特, 詹姆斯 (White, James)——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家, 布莱顿反干涉大会 (1861年12月) 的参加者。——第460、462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199、580页。
- 吕措夫, 阿道夫 (Lützow, Adolf 1782—1834)——男爵, 普鲁士军官, 后为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536页。
- 亨尼西, 约翰·波普 (Hennessy, John Pope 1834—1891)——爱尔兰保守党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第338页。
- 杜尔哥, 安·罗伯尔·雅克 (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 财政总稽核 (1774—1776)。——第395、396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 (1846—1878)。——第111、193页。
- 里卡索利, 贝蒂诺 (Ricasoli, Bettino 1809—1880)——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 意大利政府首脑 (1861—1862 和 1866—

- 1867)。——第562页。
- 佐利科弗尔, 费里克斯·柯尔克 (Zollicoffer, Felix Kirk 1812—1862)——美国新闻记者,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南部方面, 1861—1862年为肯塔基州的南军指挥官。——第516页。
- 车尔尼晓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Черныш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86—1857)——俄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28—1852年领导陆军部。——第536页。
- 坎宁, 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07—1809、1822—1827), 首相 (1827)。——第11、385、393、497页。
- 坎伯尔, 科林, 1858年起为克莱德男爵 (Campbell, Colin, Baron Clyde 1792—1863)——英国将军, 1862年起为元帅,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镇压印度1857—1859年民族解放起义的英军总司令。——第640、650页。
- 利姆堡 (Limburg, W.)——德国工人, 职业是鞋匠,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 1868—1869年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615页。
- 利美腊克, 波伦 (Limayrac, Paulin 1813—1868)——法国新闻工作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为“祖国报”和“国家报”撰稿, 1861—1868年为“立宪主义者报”主编。——第394、395页。
- 辛格尔顿, 奥托 (Singleton, Otho 生于1814年)——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南部民主党; 美国国会议员, 1861—1865年为南部同盟国会议员。——第327页。
- 辛凯尔迪, 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普鲁士官员, 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 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第48页。
- 李, 罗伯特·爱德华 (Lee, Robert Edward 1807—1870)——美国将军, 美国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参加者, 1859年参加镇压约翰·布朗的起义, 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 (1862—1865), 南军总司令 (1865年2—4月)。——第592页。
-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杰出的德国学者, 农业化学的创始人之一。——第97页。
- 狄金逊, 丹尼尔·斯蒂文斯 (Dickinson, Daniel Stevens 1800—1866)——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民主党领袖之一, 美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积极拥护者。——第442页。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杰出的古希腊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第402页。
- 沙多勃利昂子爵,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著名的法国作家, 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22—1824), 法国出席维罗那会议 (1822) 的代表。——第385、393页。
- 苏舍, 路易·加布里埃尔 (Suchet, Louis-Gabriel 1770—1826)——法国元帅, 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第263页。
- 苏拉 (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 (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138—78)——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曾为执政官(公元前88), 独裁者(公元前82—79)。——第13页。
- 苏洛阿加, 费里克斯(Zuloaga, Felix 1814—1876)——墨西哥将军, 保守党领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导人之一, 叛乱政府首脑(1858—1859)。——第525页。
- 伯尼, 戴维·贝尔(Birney, David Bell 1825—1864)——美国将军, 废奴主义者,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1862年为北军波托马克河军团的旅长。——第535页。
- 伯德特, 弗兰西斯(Burdett, Francis 1770—1844)——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后为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494页。
- 伯恩赛德, 安布罗斯·埃弗雷特(Burnside, Ambrose Everett 1824—1881)——美国将军, 属于共和党;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1862年11月—1863年1月)。——第445、605页。
- 沃克, 约翰(Walker, John 1732—1807)——英国语言学家, 写有许多语言和语法方面的著作。——第434页。
- 沃克, 提莫蒂(Walker, Timothy 1806—1856)——美国法学家, 写有许多法学方面的著作。——第432页。
- 沃克, 莱罗伊·波普(Walker, Leroy Pope 1817—1884)——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南部民主党, 曾任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1861)。——第348页。
- 沃尔弗(Wolff)——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615页。
- 麦迪逊, 詹姆斯(Madison, James 1751—1836)——美国国家活动家, 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中起显著作用, 曾任国务卿(1801—1809), 美国总统(1809—1817)。——第439页。
- 麦库克, 亚历山大·麦克道厄耳(McCook, Alexander McDowell 1831—1903)——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2年为肯塔基州的北军军长。——第593页。
- 麦克法兰(MacFarland)——美国外交官, 詹·马·梅森的秘书。——第409页。
- 麦克累伦, 乔治·布林顿(McClellan, George Brinton 1820—1885)——美国将军和大铁路实业家, 追随民主党,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总司令(1861年11月—1862年3月)和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1862年3—11月), 1864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423、505—508、521、534—536、556、557、602—605页。
- 麦克默多, 威廉·蒙台居·司各特(McMurdo, William Montague Scott 1819—1894)——英国军官, 后为将军; 四十至五十年代在印度的英国军队里服务, 1860—1865年是志愿兵部队的总监。——第80、81、119、284、285、287、304、567、568、571、572页。
- 麦克马洪, 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de 1808—1893)——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1859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克里木战争和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 1870年率十万法军在色当投降,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 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第117、253页。

- 克莱德——见坎伯尔, 科林。
- 克吕格 (Krüger) ——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 615 页。
-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 ——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领袖,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506 页。
- 克兰普顿, 约翰·费恩斯·特威斯累顿 (Crampton, John Fiennes Twisleton 1805—1866) —— 英国外交家, 1860—1869 年任驻马德里公使。——第 502 页。
- 克罗斯威尔, 爱得文 (Crosswell, Edwin 1797—1871) —— 美国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 三十至四十年代为纽约州民主党领袖之一, 五十年代中起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 442—443 页。
- 克维泰斯基, 奥努弗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Квицкинский, Онуф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94—1862) —— 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 年任俄军师长。——第 627、641、642 页。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爱尔兰总督 (1847—1852), 残酷地镇压了 1848 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 (1853—1858、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452、495 页。
- 克里滕登, 约翰·约旦 (Crittenden, John Jordan 1787—1863) —— 美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属于美国辉格党, 参议员; 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 323 页。
- 克里斯比, 罗莎丽亚 (Crispi, Rosalie) —— 弗·克里斯比的妻子, 曾参加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1860)。——第 103 页。
- 克里斯比, 弗兰契斯科 (Crispi, Francesco 1818—1901) ——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曾参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和 1860 年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六十年代末起, 意大利完成统一后, 转到拥护君主立宪的立场上去。——第 102、103 页。
- 贝里, 海勒姆·乔治 (Berry, Hiram George 1824—1863) —— 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2—1863 年初为波托马克河军团的旅长。——第 535 页。
- 贝格尔 (Berger) ——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 615 页。
- 贝兹利, 托马斯 (Bazley, Thomas 1797—1885) —— 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 曼彻斯特商会会长 (1845—1859), 议会议员。——第 487—489 页。
- 贝奈特, 詹姆斯·戈登 (Bennett, James Gordon 1795—1872) —— 美国新闻工作者, 民主党的拥护者, “纽约先驱报”的创办人和发行人; 美国内战时期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第 508、600 页。
- 贝瑟耳, 理查, 威斯特伯立男爵 (Bethell, Richard, Baron Westbury 1800—1873) —— 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副首席检察官 (1852—1856)、首席检察官 (1856—1858、

- 1860—1861)、大法官(1861—1865)。——第128页。
- 贝列拉, 艾米尔 (Péire, Emile 1800—1875) ——法国银行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之一; 伊萨克·贝列拉之兄。——第377、396页。
- 贝列拉, 伊萨克 (péire, Isaac 1806—1880) ——法国银行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之一。——第15、377、396页。
- 贝克, 罗伯特 (Baker, Robert) ——英国官员,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工厂视察员。——第88、95—97、98页。
- 贝克莱, 乔治·克兰菲尔德 (Berkeley, George Cranfield 1753—1818) ——英国舰队司令,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467页。
- 贝尔, 乔治 (Bell, George 1794—1877) ——英国军官, 1854—1855年参加克里木战争。——第638页。
- 贝尔奈 (Bernier) ——德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 (十九世纪中叶)。——第211页。
- 贝尔纳, 西蒙·弗朗斯瓦 (Bernard, Simon — François 1817—1862) ——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派; 1858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第三的同伙犯, 但被英国法庭宣布无罪。——第581页。
- 八 画**
- 奇坦, 约翰 (Cheetham, John 生于1802年) ——英国厂主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第488页。
-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伟大的法国作家。——第75页。
- 门罗, 詹姆斯 (Monroe, James 1758—1831) ——美国国家活动家, 美国总统 (1817—1825), 1823年发表阐明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 后称门罗主义。——第385、393页。
- 味吉尔 (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 ——杰出的罗马诗人。——第342、456页。
- 坦普尔, 威廉 (Temple, William 1628—1699) ——英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的近臣。——第430、466页。
- 果鲁霍夫斯基, 阿格诺尔 (Goluchowski, Agenor 1812—1875) ——伯爵, 波兰贵族,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加里西亚总督 (1849—1859、1866—1867、1871—1875); 内务大臣 (1859—1860)。——第251页。
- 奈斯勒 (Nessler) ——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 (十九世纪中叶)。——第221页。
- 奈恩多夫 (Neindorff) ——普鲁士军官和军事发明家 (十九世纪中叶)。——第220页。
- 肯特, 詹姆斯 (Kent, James 1763—1847) ——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第409、432页。
- 肯宁格姆, 威廉 (Conningham, William 生于1815年) ——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家, 布莱顿反干涉大会 (1861年12月)的参加者。——第460、461页。
- 居莱, 费伦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 ——伯爵, 奥地利将军, 原系匈牙利人, 曾参加镇压意大利1848—1849

- 年革命, 1859年奥意法战争时为奥军总司令。——第314页。
- 居歇瓦尔-克拉里尼, 菲利浦·阿塔纳兹 (Cucheval-Clarigny, Philippe-Athanase 1823—1895) ——法国政论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为“祖国报”和其他期刊撰稿, 五十年代领导“立宪主义者报”和“国家报”的编辑部。——第394页。
- 金凯德, 约翰 (Kincaid, John 1787—1862) ——英国官员, 1850年起为苏格兰的工厂和监狱视察员。——第88、92、93、95页。
- 金累克, 亚历山大·威廉 (Kinglake, Alexander William 1809—1891) ——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1857—1865)。——第554、627—631、635—642页。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 ——1682年起为俄罗斯沙皇, 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58页。
- 彼得鲁一世 (Pedro I 1798—1834) ——巴西皇帝 (1822—1831), 葡萄牙国王, 称彼得鲁四世 (1826), 后把葡萄牙王位让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第11页。
- 舍伐利埃, 米歇尔 (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 ——法国工程师,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后为自由贸易派, 第二帝国时期为参议员, 积极支持拿破仑第三的经济政策。——第15页。
-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艾释黎·库伯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 ——英国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 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第321、455页。
- 法里尼, 鲁伊治·卡洛 (Farini, Luigi Carlo 1812—1866) ——意大利国家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主张在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统一意大利, 曾任教育大臣 (1851—1852); 撒丁内政大臣 (1860), 意大利政府首脑 (1862—1863)。——第197页。
- 法夫尔, 加布里埃尔·克劳德·茹尔 (Favre, Gabriel-Claude-Jules 1809—1880)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五十年代末起为资产阶级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 1870—1871年任“国防政府”外交部长, 同梯也尔一起带头镇压巴黎公社。——第111、139页。
- 法腊格特, 戴维·格拉斯哥 (Farragut, David Glasgow 1801—1870) ——美国海军军官, 1862年7月起为舰队司令,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在夺取新奥尔良时 (1862年4月) 任分舰队司令。——第529、544页。
- 佩萨-伊-佩萨, 卡洛斯 (Peza-y-Peza-Carlos) ——墨西哥反革命叛乱 (1858—1860) 的参加者, 叛乱政府的财政部长。——第525页。
- 佩庞舍-泽德耳尼茨基, 威廉 (Perponcher-Sedlnitzki, Wilhelm 1819—1893) ——伯爵, 普鲁士外交家, 六十年代初任驻那不勒斯公使。——第196页。
- 佩利西埃, 让·雅克 (Pelis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 ——法国元帅, 三十至五十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以极端残酷著称;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 (1855年5月—1856年7月), 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 1860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第24页。

- 林登 (Linden)——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615页。
- 林赛,威廉·肖 (Lindsay, William Shaw—1816—1877)——英国船主和商人,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第512页。
- 林肯,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共和党领袖之一,美国总统 (1861—1865); 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实行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意味着转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 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322、323、326、348、349、356、365、382、401、402、453、505—508、527、557、558、561—563、585—587、594、601、603、605页。
- 杰弗逊,托马斯 (Jefferson, Thomas 1743—1826)——杰出的美国启蒙运动者,社会和国家活动家,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期 (1775—1783) 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家,独立宣言 (1776) 的起草人,美国总统 (1801—1809)。——第322、324、348、410、427—428、564页。
- 杰克逊,安德鲁 (Jackson, Andrew 1767—1845)——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民主党创建人 (1828); 1812—1815年英美战争时期美军在他的指挥下在新奥尔良重创英军; 美国总统 (1829—1837)。——第329、347、401页。
- 杰克逊,托马斯·卓纳森 (Jackson, Thomas Jonathan 1824—1863)——美国将军,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南军指挥官 (1861—1863), 布尔河会战 (1861年7月) 后获绰号“石壁”。——第557、585页。
- 杰克逊,克累本·福克斯 (Jackson, Claiborne Fox 1806—1862)——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密苏里州州长 (1860—1861)。——第360页。
- 帕特逊,罗伯特 (Patterson, Robert 1792—1881)——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美国内战初是北军的将军,布尔河会战 (1861年7月) 后,被免去指挥官职务。——第507页。
- 帕麦尔,威廉 (Palmer, William 1824—1856)——英国医生,为谋取保险赔偿费而毒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被判处绞刑。——第417、456页。
- 帕麦尔,朗德尔 (Palmer, Roundell 1812—1895)——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 副首席检察官 (1861—1863)、首席检察官 (1863—1866)、大法官 (1872—1874和1880—1885)。——第512页。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9—13、16、27、59、65、107、108、112、127—129、332、335—340、381—383、386、387、389—393、417—419、430、431、433—436、437—441、452—457、462、464—465、468、471、476—478、485、489、497、526、538、540、577、607页。
- 罗伦兹,约瑟夫 (Lorenz, Joseph 1814—1879)——奥地利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223、225页。

- 罗曼诺夫王朝——俄国皇朝（1613—1917）。——第78页。
-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第46、53、55、59、65、121、357、382、386、389、390、417、440、457、465、470、471、476—478、496、499—504、540、554、555、560、561、574、576、581、607页。
- 罗素，威廉·霍华德（Russell, William Howard 1820—1907）——英国记者，1861—1862年为“泰晤士报”驻华盛顿通讯员。——第444页。
- 罗斯利埃斯，克里斯提安（Roselius, Christian 1803—1873）——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美国辉格党，路易西安纳大学教授，主张保存联邦。——第363页。
- 罗斯克兰斯，威廉·斯塔克（Rosecrans, William Starke 1819—1898）——美国将军，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北军指挥官（1862—1863）。——第593页。
- 图尔，伊什特万（Türr, 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军官，意大利和德国的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站在联军方面，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1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第165、199页。
- 图普斯（Toups）——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615页。
- 图姆斯，罗伯特（Toombs, Robert 1810—1885）——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民主党，曾任南部同盟国务卿（1861），美国内战时期为南军将军。——第327、354页。
- 图温奈尔，爱德华·安都昂（Thouvenel, Edouard-Antoine 1818—1866）——法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5—1860），外交大臣（1860—1862）。——第76、382、386、395、503、554—555页。
- 图温南，路易·埃蒂耶纳（Thouvenin, Louis-tienne 1791—1882）——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215—218、238页。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律师，1848—1849年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667、683、685页。
- 拉弗耳，曼斯菲尔德（Lovell, Mansfield-1822—1884）——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南部方面，新奥尔良卫戍司令（1861—1862年4月）。——第528、529页。
- 拉斐德，玛丽·约瑟夫·保尔（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 1757—1834）——法国将军，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的参加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第343页。
- 拉图尔·多韦尔尼-洛腊盖，昂利·戈德弗鲁阿·贝尔纳·阿尔丰斯（La Tourd'Au-

- vergne Lauraguais, Henri—Godefroi—Bernard—Alphonse 1823—1871) ——公爵, 法国外交家, 曾任驻柏林大使 (1859—1862), 驻罗马大使 (1862—1863) 和驻伦敦大使 (1863—1869)。——第64、75页。
- 拉罗凯特——见福尔卡德—拉罗凯特, 让·路易·维克多·阿道夫·德。
- 拉夫焦伊, 欧文 (Lovejoy, Owen 1811—1864) ——美国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废奴主义者, 国会议员。——第482页。
- 拉法里纳, 朱泽培 (La Farina, Giuseppe 1815—1863) ——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1848—1849年西西里岛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860年 (7月以前) 为卡富尔驻西西里岛特使, 1860年10月—1861年1月为西西里岛总督顾问。——第100、102、103、198页。
- 拉摩里西尔, 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 ——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年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 被驱逐出国, 1860年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第163页。
- 波普, 约翰 (Pope, John 1822—1892) ——美国将军, 属于共和党,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1862年先为密西西比后为弗吉尼亚的北军指挥官之一。——第507、605页。
- 波克, 詹姆斯·诺克斯 (Polk, James Knox 1795—1849) ——美国国家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曾任美国总统 (1845—1849); 美国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组织者之一。——第401、429页。
- 波特尔, 艾德蒙 (Potter, Edmund)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六十年代初是曼彻斯特商会会长, 国会议员。——第487、488页。
- 波德维耳斯, 菲利浦 (Podewils, Philippe 1809—1885) ——男爵, 巴伐利亚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221页。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385、393页。
- 波旁王朝——西班牙王朝 (1700—1868和1874—1931)。——第385、393页。
- 波旁王朝——那不勒斯王国的王朝 (1735—1806 和 1815—1860)。——第51、143、144、165页。
-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 约瑟夫 (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 ——拿破仑第一之兄长, 那不勒斯国王 (1806—1808) 和西班牙国王 (1808—1813)。——第605页。
- 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eon 1822—1891) ——日罗姆·波拿巴之子, 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1854年为克里木法军师长; 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199、342、632、633、635、636页。
- 阿布, 艾德门 (About, Edmond 1828—1885) ——法国新闻记者, 波拿巴主义者。——第77、121页。
- 阿布德—艾尔—喀德 (Abd el Kader 1808—1883) ——1832—1847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 1847年被法国人所俘, 1852年得到拿破仑第三的许可, 移居士

- 耳其。——第179页。
- 阿贝尔, 斐迪南 (Eber, Nándor 1825—1885) ——匈牙利政论家, 1848—1849年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65页。
- 阿腊贡王朝——阿腊贡王国的王朝(十一至十五世纪)。——第50页。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Earl of 1784—186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1841—1846)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第65页。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441页。
- 阿姆斯特朗, 威廉·乔治 (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 ——英国发明家和厂主, 以发明特别的线膛炮而出名。——第40—44、621—622页。
- 阿尼奇科夫,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 (Аничк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30—1877) ——俄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第628—630、635页。
- 阿希伯顿男爵, 亚历山大·贝林 (Ashburton, Alexander Baring, Baron 1774—1848) ——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追随托利党; 同美国商业界有联系。——第439页。
- 阿尔伯特 (Albert 1819—1861)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64、65、74、494、663页。
- 阿尔蒙特, 璜 (Almonte, Juan 1804—1869) ——墨西哥国家活动家和将军,

1857年起任驻巴黎公使, 在法国的墨西哥流亡分子反动集团的首脑, 大力策动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 (1862—1867)。——第554页。

阿尔文斯累本, 古斯塔夫 (Ahlvensleben, Gustav 1803—1881) ——普鲁士将军, 普鲁士摄政王 (1861年起为国王威廉一世) 的亲信之一。——第74页。

九 画

咸丰 (1831—1861) ——中国皇帝 (1850—1861)。——第13页。

品得 (Pindaros 约公元前522—442) ——古希腊抒情诗人, 曾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第487、586页。

耶茨 (Yates) ——伦敦工人反干涉大会 (1862年1月) 的参加者。——第482页。

娄, 罗伯特 (Lowe, Robert 1811—1892) ——英国政论家和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1843—1850年为澳大利亚一个州的立法会议员, 六十年代为“泰晤士报”编辑, 曾任财政大臣 (1868—1873), 内务大臣 (1873—1874)。——第335、455页。

洛埃, 瓦尔特 (Loë, Walther 1828—1908) ——男爵, 普鲁士军官, 摄政王 (1861年起为国王威廉一世) 的副官。——第74页。

洪堡, 亚历山大 (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 ——伟大的德国学者, 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48页。

英格兰, 理查 (England, Richard 1793—1883) ——英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英军师长。——第635、640页。

范多恩, 厄尔 (Van Dorn, Earl 1820—1863) ——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

- 者,站在南部方面,1862年为密西西比州的南军指挥官。——第596页。
- 柏立子爵,威廉·库茨·克佩尔 (Bury, William Couetts Cappel, Viscount 1832—1894) ——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参加组织志愿兵部队。——第280、281、284页。
- 胡克,约瑟夫 (Hooker, Joseph 1814—1879) ——美国将军,废奴主义者,属于共和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波托马克河军团军长 (1862),后为波托马克河军团司令 (1863年1—6月)。——第605页。
- 胡阿雷斯,贝尼托·帕布洛 (Juárez Benito Pablo 1806—1872) ——杰出的墨西哥国家活动家,争取本民族独立的战士,内战 (1858—1860) 和武装干涉墨西哥 (1861—1867) 时期为自由党的领袖,墨西哥总统, (1858—1872)。——第384、445、525页。
- 约翰逊,赛米尔 (Johnson, Samuel 1709—1784) ——英国作家和语言学家;第一部英语详解辞典 (1755) 的编者。——第434页。
- 约翰逊,安德鲁 (Johnson, Andrew 1808—1875) ——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田纳西州州长 (1853—1857 和 1862—1865),参议员;美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拥护者,美国副总统 (1864—1865年4月),总统 (1865—1869),实行和南部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第360页。
- 柯克伦,约翰 (Cochrane, John 1813—1898) ——美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国会议员 (1857—1861),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442、443、445页。
- 柯蒂斯,赛米尔·赖安 (Curtis, Samuel Ryan 1807—1866) ——美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议员 (1857—1861),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和阿肯色州的北军指挥官 (1861—1862)。——第327、557页。
- 迪恩 (Deane) ——英国军事发明家 (十九世纪中叶)。——第229页。
- 迪克斯,约翰·亚当斯 (Dix, John Adams 1798—1879) ——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属于北部民主党;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的北军指挥官 (1861)。——第442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1871年起为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首相 (1868和1874—1880)。——第16、19、337、440、495—497、510、551、552页。
-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英国国王 (1660—1685)。——第551页。
- 查理十二 (Charles XII 1682—1718) ——瑞典国王 (1697—1718)。——第58页。
- 查理十五 (Charles X V 1826—1872) ——瑞典和挪威国王 (1859—1872)。——第78页。
- 查耳迪尼,恩利科 (Cialdini, Enrico 1811—1892) ——意大利将军,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克里木战争和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1860—1861年指挥撒丁军队同那不勒斯军队作战。——第197页。
- 哈勒克,亨利·韦哲 (Halleck, Henry W a-ger 1815—1872) ——美国将军,温和的

- 共和党人；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州军区司令（1861年11月—1862年3月）和密西西比军团司令（1862年3—7月），北军总司令（1862年7月—1864年3月）。——第442、505、507、515、518、520、528、536、557、604页。
- 哈登堡，卡尔·奥古斯特（Hardenberg, Karl August 1750—1822）——公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4—1806和1807）；为巩固普鲁士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1810—1813）；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成为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者。——第46页。
- 哈弗洛克，亨利（Havelock, Henry 1795—1857）——英国将军，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1842）和英国对锡克教徒的战争（1845—1846）的参加者；1857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462页。
- 哈布斯堡王朝——自1273年起至1806年（断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朝、奥地利帝国王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的王朝（1867—1918）。——第50、54、58、61、195、206页。
-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630页。
- 施，威廉（Shee, William 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第448页。
- 施梅林，安东（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奥地利国家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任帝国内务大臣（7—12月），首相兼外交大臣（9—12月）；奥地利首相兼内务大臣（1860—1865）。——第251、252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官员，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第48页。
-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第46、55、58—61、64、65、75、197、200页。
- 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1800—1852）——公爵，奥地利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10月维也纳起义被镇压后为首相兼外交大臣。——第60页。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15、16、435、457、577—578页。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465页。
- 科耳特，赛米尔（Colt, Samuel 1814—1862）——美国厂主和军事发明家。——第229页。
- 科散兹，恩利科（Cosenz Enrico 1820—1898）——意大利将军，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1860年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革命进军时期为师长；意军总参谋长（1882—1893）。——第165、166、170页。
-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

- 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第199、252页。
- 科隆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Co-lomb, Friedrich August 1775—1854)——普鲁士军官,后为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536页。
- 科兰,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Colins, Jean-Guillaume-César-Alexandre-Hippolyte 1783—1859)——男爵,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原籍比利时。——第4页。
- 威恩(W hynne)——伦敦工人反干涉大会(1862年1月)的参加者。——第482页。
- 威亚尔(V eillard)——法国商人,1862年破产。——第588页。
- 威金森(W ilkinson)——英国兵工厂厂主和发明家(十九世纪中叶)。——第223页。
- 威耳伯福斯,威廉(W ilberforce, W il-liam 1759—1833)——英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慈善家,议会议员,曾进行反对英国殖民地的奴隶买卖和奴隶制度的斗争。——第484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 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和1815年对拿破仑法国战争中为英军指挥官;曾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28、285、618、651、660页。
- 威廉一世(W 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45、46、58—60、64—66、74—77、111、112、196、197、205、207、208、255、256、341页。
- 威廉斯(W illiams)——英国海军军官,1861年为海军部驻“特伦特号”轮船代表。——第412、416、417页。
- 威尔逊,詹姆斯(W 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853—1858年任财政部秘书长,1859—1860年为财政部印度财务大臣。——第85、139、172、489页。
- 威尔克斯,查理(W ilkes, Charles 1798—1877)——美国海军军官和旅行家,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方方面,“圣贾辛托号”军舰舰长(1861)。——第412、413、420、427、433、434、437、439、465—467、476页。
- 威尔克斯,约翰(W ilkes, John 1727—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写了许多反对乔治三世专制制度的抨击性文章。——第427页。

十 画

- 泰勒,汤姆(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记者,许多定期刊物的撰稿人,1874—1880年为讽刺性杂志“笨拙”的编辑。——第81、119页。
- 库伯,菲尼莫尔(Cooper, Fenimore 1789—1851)——美国著名长篇小说作家。——第403页。
-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396、508页。
- 夏福礼 (Harvey)——六十年代初任英国驻宁波 (中国) 领事。——第545—548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1820—1895) (传记材料)。——第203、273、287、288、319、320、405、567、570—572、620、637页。
-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约公元前497—40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古典悲剧作者。——第394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 (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 1855—1865年出版“自由新闻”报。——第435页。
- 热克尔, 让·巴蒂斯特 (Jecker, Jean-Baptiste 1810左右—1871)——瑞士银行家, 1862年入法国国籍; 与波拿巴法国统治集团勾结在一起, 策动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 是被巴黎公社社员枪毙的一批人质中的一个。——第525、555页。
- 班克罗夫特, 乔治 (Bancroft, George 1800—1891)——美国历史学家,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属于民主党; 十卷本的“合众国史”的作者, 美国内战时期支持北部。——第445页。
- 茹安维尔亲王, 奥尔良的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利浦·路易·玛丽 (Joinville, Franc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路易·菲利浦之子, 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国; 1861—1862年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115、341—345页。
- 纳皮尔, 查理·詹姆斯 (Napier, Charles James 1782—1853)——英国将军,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 1842—1843年率领军队攻占信德、1843—1847年为信德执政者。——第568页。
- 纳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 (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 (1808—1814) 的参加者。——第424、644页。
- 哥尔查科夫, 彼得·德米特利也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785—1868)——公爵, 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俄军军长。——第627、640、642页。
-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1854—1856), 外交大臣 (1856—1882)。——第46、110、200页。
- 纽曼, 弗兰西斯·威廉 (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写有许多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著作。——第607页。
- 纽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费恩斯·佩勒姆·克林顿 (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分子,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 (1852—1854), 陆军大臣 (1854—1855), 殖民大臣 (1859—1864)。——第11—12页。
-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 (1804—1814和1815)。——第31、51、62、76、135、177、260、261、309、312、398、399、468、515、605、618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3—10、13、15、18、32、46、48、51—54、58、59、64、74—78、85、101、111、112、120、121、127、129、131、141、143、148、178、184、194、195、197—199、242、243、252、255、256、259—261、341—344、381、382、385—387、395、396、398—400、421、431、440、457、501、524、554、555、574—576、602页。
- 特纳,詹姆斯·阿斯皮纳耳(Turner, James A spinall 1797—1867)——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年代接近自由党,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议会议员。——第414、487页。
- 特雷伊·德·博利约,安都昂·埃克托·太扎(Treuille de Beaulieu, Antoine—Hector—Thésée 1809—1886)——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36页。
- 特里门希尔,休·西摩尔(Treme ‘nheere, Hugh Seymour 1804—1893)——英国官员和政论家,曾多次参加政府工人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第589、590页。
- 埃勒特,查理(Ellet, Charles 1810—1862)——美国工程师和军事发明家,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543、544页。
- 埃里克森,约翰(Ericsson, John 1803—1889)——美国工程师和军事发明家,原籍瑞典。——第542、594页。
- 埃特韦什,约瑟夫(Eötvös, József 1813—1871)——男爵,匈牙利作家和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鲍蒂扬尼政府的宗教和教育大臣(1848年3—9月)。——第252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裁缝工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615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431页。
- 海斯,亨利希(Hess, Heinrich 1788—1870)——男爵,奥地利将军,1859年7月起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马振塔会战(1859年6—7月)败北后统率奥军。——第141页。
- 海瑙,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 1786—1853)——奥地利将军,曾残酷地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运动。——第466页。
- 海因策耳曼,赛米尔·彼得(Heintzelmann, Samuel Peter 1805—1880)——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1862年任波托马克河军团军长。——第534、535页。
- 马丁,赛米尔(Martin, Samuel 1801—1883)——英国法学家,1850—1874年为高等控诉院法官。——第493页。
- 马哥芬,比赖亚(Magoffin, Beriah 1815—1885)——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南部民主党,肯塔基州州长(1859—1862)。——第361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在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第102、103、198、481页。
- 马凯斯,列奥纳多(Marques, Leonardo 约生于1820年)——墨西哥将军,保守党领袖和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领导人之一,1862—1867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儡马克西米利安。——第384、445页。
- 马里奥,阿尔伯托(Mario, Alberto 1825—1883)——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04页。
- 马考莱,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506页。
- 马茨腊特(Matzrath)——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615页。
- 马瓜伊尔,约翰·弗兰西斯(Maguire, John Francis 1815—1872)——爱尔兰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117页。
-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第199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593、613、667—685页。
-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en II 1811—1864)——巴伐利亚国王(1848—1864)。——第74页。
- 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Maximilien von Habsburg 1832—1867)——奥地利大公,在意大利的奥国领地总督(1867—1859);1864年被法国武装干涉者宣布为墨西哥皇帝,1867年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毙。——第503、504页。
- 格里舍利,雅克·弗朗斯瓦(Griscelli, Jacques—Francois)——波拿巴的警探,原籍科西嘉岛。——第100、102、103、198页。
- 格里菲思,弗雷德里克·奥加斯特斯(Griffiths, Frederick Augustus 死于1869年)——英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第204页。
- 格朗基奥,阿尔西德·比埃尔(Grandguillot, Alcide—Pierre 1829—1891)——法国政论家,波拿巴主义者,1859年起是“立宪主义者报”主编,1863—1865年为“国家报”主编。——第394、395页。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1870),站在极右翼立场;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五十年代为“国家报”主编。——第394页。
- 格雷,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46—1862)。——第9—14页。
- 格雷哥里,威廉·亨利(Gregory, William)

- Henry 1817—1892)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追随自由党, 议会议员。——第509—512、540页。
- 格雷和里彭伯爵, 乔治·弗雷德里克·赛米尔·罗宾逊 (Grey and Ripon, George Frederick Samuel Robinson, Earl of 1827—1909) ——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陆军副大臣 (1859—1861年1月和1861年7月—1863年), 陆军大臣 (1863—1866); 曾积极参加组织志愿兵。——第304页。
- 格兰特, 詹姆斯 (Grant, James 1802—1879) ——英国激进派记者和作家, “晨报”编辑 (1850—1871)。——第455页。
- 格兰特, 乌利士·辛普森 (Grant, Ulysses Simpson 1822—1885) ——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 1861—1862年为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北军指挥官, 1864年3月起任陆军总司令; 陆军部长 (1867—1868), 美国总统 (1869—1877)。——第518—520页。
- 格兰维耳伯爵, 乔治·鲁森—高尔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1815—1891)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六十年代起为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51—1852、1870—1874 和 1880—1885), 枢密院院长 (1852—1854、1855—1858、1859—1866), 殖民大臣 (1868—1870、1886)。——第13页。
- 格娄弗诺, 休·鲁普斯 (Grosvenor, Hugh Lupus 1825—1899) ——伯爵, 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参加志愿兵运动。——第284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10、15、26—28、30、112、127、128、435、440、552、599、607页。

十一画

- 清朝——中国王朝 (1644—1911)。——第545、546页。
- 琉善 (Lucianus 约120—180) ——杰出的古希腊讽刺作家, 无神论者。——第536页。
- 雪莱, 约翰 (Shelley, John 1808—1867) ——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 议会议员。——第550页。
-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曾任首相 (1836、1840),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394、627页。
- 累亚德, 奥斯丁·亨利 (Layard, Austin Henry 1817—1894) ——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为自由党人; 外交大臣助理 (1861—1866), 议会议员。——第461、554页。
- 密契尔, 奥姆斯比·马克奈特 (Mitchel, Ormsby MacKnight 1809—1862) ——美国天文学家, 辛辛那提天文台台长 (1845—1859);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的将军 (1861—1862)。——第528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490、528、529页。
- 康罗贝尔, 弗朗斯瓦·塞尔坦 (Canro-

- bert, François — Certain 1809—1895)——法国将军, 1856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 后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4—1855)。——第632—634、636、638页。
- 培尔西尼, 让·日尔贝尔·维克多 (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 驻伦敦大使(1855—1858, 1859—1860)。——第65、121、129、148、375、377、395页。
- 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第14、495—497、577、578页。
- 莫扎特, 沃尔夫冈·亚马多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357页。
- 莫尔尼伯爵, 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 立法团议长(1854—1856, 1857—1865)。——第555页。
- 朗迪 (Landi)——那不勒斯将军, 1860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第70—73页。
- 朗扎, 斐迪南多 (Lanza, Ferdinando)——那不勒斯将军, 1860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第64、65页。
- 曼, 安布罗兹·达德利 (Mann, Ambrose Dudley 1801—1889)——美国外交家, 1861—1862年为南部同盟驻伦敦代表。——第410、421、456、464、482、509—511页。
- 曼托伊费尔, 爱得文 (Manteuffel, Edwin 1809—1885)——男爵, 普鲁士将军, 1857年起为军事办公厅长官, 1861年起为国王威廉一世的主任副官。——第74页。
-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 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第47、60、673、677页。
- 勒诺, 杰西·李 (Reno, Jesse Lee 1823—1862)——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2年为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北军军长。——第605页。
- 勒维, 约瑟夫·莫泽斯 (Levy, Joseph Moses 1812—1888)——英国“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第456页。
- 勒奈, 朗贝尔·阿梅德 (Renée, Lambert-Amédée 1808—1859)——法国政论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7年起领导“立宪主义者报”和“国家报”的编辑部。——第394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394、672页。
- 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 (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贸易大臣 (1859—1865和1865—1866)。——第86、127、435、440页。
- 基尔亚科夫, 瓦西里·雅柯夫列维奇 (Кирияков, 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年任师长。——第627、632—634页。
- 梅恩, 理查 (Mayne, Richard 1796—1868)——伦敦警察局局长 (1850年起)。——第304页。
- 梅日—穆尔埃斯 (Mége Mouriés)——法国化学家 (十九世纪中叶)。——第591页。
- 梅森, 乔治 (Mason, George 1725—1792)——美国政治活动家, 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 (1775—1783) 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弗吉尼亚权利法案 (1776) 的起草人, 该法案宣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第428页。
- 梅森, 詹姆斯·默里 (Mason, James Murray 1798—1871)——美国政治活动家, 大种植场主—奴隶占有者, 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1861年秋带着外交使命被南部同盟派往英国, 1862—1865年为同盟驻伦敦代表。——第409—412、421、427—430、433、434、454、466、468、481、482、485、495、509—511页。
- 梅纳德 (Maynard)——美国军官, 美国内战时期为南部密探。——第507页。
- 梅希亚, 托马斯 (Mejia, Thomas 1815左右—1867)——墨西哥将军, 印第安人, 反自由党政府的反革命叛乱积极参加者, 1862—1867年支持法国干涉者及其傀儡马克西米利安; 被墨西哥共和党人枪毙。——第384页。
- 梅迪契, 扎科莫 (Medici, Giacomo 1817—1882)——意大利将军, 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和1849年4—7月罗马共和国保卫的积极参加者;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00、133、165、170页。
-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76页。
- 梅兰德兹 (Melendez)——那不勒斯将军, 1860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第166、170页。
- 梅里威耳, 赫尔曼 (Merivale, Herman 1806—1874)——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自由党人, 殖民副大臣 (1848—1859), 印度事务副大臣 (1859—1874)。——第595页。

十二画

富尔德, 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849—1867年曾多次任财政大臣, 后任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 (1852—1860年11月)。——第3、4、19、376、377、394—396、398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第587页。
- 策C 德利茨-诺伊基尔希, 康斯坦丁 (Zedlitz-Neukirch, Konstantin 生于1813年)——男爵, 普鲁士官员, 柏林警察总监。——第667、668、670、672、681、684页。
- 提梅尔汉斯, 沙尔·弗雷德里克·德奥多 (Timmerhans, Charles - Frederic - Théodore 1800—1865)——比利时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221页。
- 贺布, 詹姆斯 (Hope, James 1808—1881)——英国舰队司令, 1859年任英国侵华远征军指挥官。——第14页。
- 贺雷西 (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509、550页。
- 惠顿, 亨利 (Wheaton, Henry 1785—1848)——美国法学家和外交家, 写有许多国际法著作。——第432、434页。
- 惠特沃思, 约瑟夫 (Whitworth, Joseph 1803—1887)——英国厂主和军事发明家。——第40—44、233—238、240、293—297、568、621、622页。
- 凯麦隆, 西蒙 (Cameron, Simon 1799—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 陆军部长 (1861—1862年1月)。——第442、443、445、505、508页。
- 凯尔恩斯, 休·麦卡蒙特 (Cairns, Hugh MacCalmont 1819—1885)——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为保守党人; 大法官 (1868和1874—1880), 议会议员。——第128页。
- 莱希堡, 约翰·伯恩哈特 (Rechberg, Johann Bernhard 1806—1899)——伯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保守党人; 曾任首相 (1859—1860), 外交大臣 (1859—1864)。——第200页。
- 莱昂斯, 理查·比克顿·皮美尔 (Lyons, Richard Bickerton Pemell 1817—1887)——男爵, 英国外交家, 1858—1865年任驻华盛顿公使。——第417、458、476、477页。
- 莱布尼茨, 哥特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第490页。
- 菲利浦斯, 温德耳 (Phillips, Wendell 1811—1884)——美国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卓越的演说家, 废奴运动革命派领袖之一, 1865—1870年是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主席; 七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 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1871年加入第一国际。——第563、564页。
- 菲利莫尔, 罗伯特·约瑟夫 (Phillimore, Robert Joseph 1810—1885)——英国法学家, 温和的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1852—1857), 国际法专家。——第433、434页。
- 菲兹吉拉德, 威廉·罗伯特·西摩尔·维齐 (Fitzgerald, William Robert Seymour Vesey 1818—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党人, 曾任外交副大臣 (1858—1859), 孟买总督 (1866—1872), 议会议员。——第554页。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 由于1848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

- “炮弹国王”的诨号。——第163、196页。
-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784—1838)——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第11页。
- 斐迪南, 奥尔良公爵 (Ferdinand, duc d'Orléans 1810—1842)——国王路易-菲利浦的长子, 1835—1840年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32、179页。
- 腊瑟弗德 (Rutherford)——英国牧师, 曾参加新堡援救加里波第大会 (1862年9月)。——第576页。
- 腊特塔齐, 乌尔班诺 (Rattazzi, Urbano 1808—1873)——意大利国家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 曾任撒丁王国的内务大臣 (1855—1858和1859—1860), 意大利政府首脑 (1862和1867)。——第562页。
- 腊格伦男爵, 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索美塞特 (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 1854年11月起为元帅, 1808—1814年和1815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曾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 (1854—1855)。——第627、634、636、638、639页。
- 博斯科 (Bosco)——那不勒斯军官, 1860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第132、167页。
- 博斯凯, 比埃尔·约瑟夫·弗朗斯瓦 (Bosquet, Pierre - Joseph - Francois 1810—1861)——法国将军, 1856年起为元帅,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三十五至五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法军师长 (1854), 后为军长 (1854—1855)。——第632、633、636页。
- 博勒特, 亨利希 (Bolleter, Heinrich)——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5)。——第615页。
- 博雷加德, 比埃尔·古斯塔夫·土坦 (Beauregard, Pierre Gustave Tou - tant 1818—1893)——美国将军, 对墨西哥战争 (1864—1848) 的参加者, 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 (1861—1862年初)、密西西比州 (1862) 和查理斯顿 (1862年9月—1864年4月) 的南军指挥官。——第348、423、528、529、533、535、536、556页。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 普雷拉, 约瑟夫 (Prélat, Joseph 生于1819年)——瑞士枪械技工, 1854年改进了米涅式步枪。——第219页。
- 普莱斯, 斯梯林 (Price, Sterling 1809—1867)——美国将军, 密苏里州州长 (1853—1857),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南部方面, 1861—1862年为密苏里、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州的南军指挥官。——第507、596页。
- 普腊特, 弗雷德里克·托马斯 (Pratt, Frederick Thomas)——英国法学家, 写有许多国际航海法方面的著作。——第410页。
- 普鲁斯, 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 (Bruce, Frederick William Adolfl 1814—1867)——英国殖民官和外交家, 驻北京公使 (1858—1865)。——第545页。
- 普伦尼斯, 威廉 (Plönies, Wilhelm 1828—1871)——黑森军官和军事发明家, 写有许多步兵武器方面的著作。——第

221页。

斯通, 查理·波美罗伊 (Stone, Charles Pomeroy 1824—1887)——美国将军, 1861年为弗吉尼亚的北军指挥官, 在博耳斯-布拉夫败北后 (1861年10月), 以叛国罪被捕, 1862年底获释。——第507、517页。

斯宾斯, 詹姆斯 (Spence, James)——英国商人, 利物浦要求干涉的大会 (1861年11月) 主席; 美国内战时期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拥护南部奴隶主。——第413—415页。

史密斯, 贾勒特 (Smith, Gerrit 1797—1874)——美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美国废奴运动革命派的领袖之一。——第563页。

斯坦顿, 爱得文·麦克马斯特斯 (Stanton, Edwin M cMasters 1814—1869)——美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属于共和党左翼, 曾任首席检察官 (1860—1861), 美国陆军部长 (1862年1月—1868), 拥护对南部奴隶主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第505、507、508、556、557、597、604页。

斯托威耳——见司各脱, 威廉。

斯普腊特 (Spratt)——在蒙哥马利召开的南部各州代表大会 (1861年2月) 的代表。——第348页。

斯塔布斯 (Stubbs)——伦敦一家从事商业情报活动的私人公司的老板。——第448—450页。

斯图亚特, 威廉 (Stuart, William)——英国外交官, 曾任驻华盛顿代办 (1862年6—11月)。——第560、561页。

斯卡利特, 詹姆斯·约克 (Scarlett, James Yorke 1799—1871)——英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60年任陆军主任

副官。——第282页。

斯特拉本 (Strabon 约公元前63—公元前20)——古希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第123页。

斯特德曼 (Steadman)——伦敦工人反干涉大会 (1862年1月) 的主席。——第481页。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坎宁 (Stratford de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1810—1812、1825—1828), 后为大使 (1841—1858)。——第110页。

斯特腊弗德伯爵, 托马斯·温特沃思 (Strafford, Thomas Wentworth, Earl of 1593—1641)——英国国家活动家, 1628年起为查理一世的近臣, 君主专制制度的死心塌地的卫士; 1641年被处死。——第207页。

斯蒂文 (Steven)——英国工程师, 曾发明和面机。——第590页。

斯蒂文斯,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Stephens, Alexander Hamilton 1812—1883)——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 国会议员 (1843—1859), 南部同盟副总统 (1861—1865)。——第348页。

斯蒂文斯, 爱得文·奥加斯特斯 (Stevens, Edwin Augustus 1795—1868)——美国企业家, 工程师和发明家, 他第一个提出军舰装甲法。——第542页。

斯蒂芬逊, 罗伯特 (Stephenson, Robert 1803—1859)——英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第472、474页。

斯莱德耳, 约翰 (Slidell, John 1793—

1871)——美国政治活动家,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1861年秋带着外交使命被南部同盟派往法国;1862—1865年为同盟驻巴黎代表。——第409、412、421、427—430、433、434、454、466、468、481、482、485、495页。

十三画

摄政王——见威廉一世。

杨西,威廉·朗兹(Yancey, William Lowndes 1814—1863)——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南部民主党,1861—1862年为南部同盟驻伦敦代表。——第410、421、456、464、482、509—511页。

葛利逊,威廉·劳埃德(Garrison, William Lloyd 1805—1879)——美国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美国废奴运动领袖之一,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创始人(1833);在反对奴隶制斗争中主张采用说服的方法,美国内战时期拥护用革命的斗争方法解放黑人。——第563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252页。

蒙多邦——见古赞·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都昂,八里桥伯爵。

蒙台居,罗伯特勋爵(Montagu, Lord Robert 1825—1902)——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337、338、550、553—555页。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

闻”的发行人。——第325页。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 Alexander)——英国官员,英国工厂视察员。——第88、92、95页。

塔奇基(Tatshky)——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曾参加救济1863—1864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募捐委员会。——第615页。

塔米济埃,弗朗斯瓦·罗朗·阿尔丰斯(Tamisier, Francois-Laurent-Alphonse 1809—1880)——法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军事发明家。——第36、217页。

詹尼森(Jennison)——美国军官,废奴主义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上校。——第443页。

詹姆斯,亨利(James, Henry 1803—1877)——英国军官,1857—1870年任陆军部地形测绘统计局局长。——第644页。

詹姆斯,查理·戴维斯(Jameson, Charles Davis 1827—1862)——美国将军,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1861—1862年为波托马克河军团的旅长。——第535页。

道格利希,约翰(Daughlish, John 1824—1866)——英国烤面包机器的发明人,职业是医生。——第590、591页。

道格拉斯,霍华德(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写有炮兵和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39、42页。

道格拉斯,斯蒂文·阿尔诺德(Douglas, Stephen Arnold 1813—1861)——美国政治活动家,北部民主党领袖之一,主张同奴隶主妥协;参议院领地事务委员会主席(1847—1858),堪萨斯—内布拉

- 斯加法案(1854)起草人,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第324、349、351、352、355页。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至六十年代流亡国外,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第77页。
-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340、510、511页。
- 福尔卡德—拉罗凯特,让·路易·维克多·阿道夫·德(Forcade—Laroquette, Jean—Louis—Victor—Adolphe de 1820—1874)——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1860—1861年任财政大臣。——第395页。
- 塞钦,安塔耳(Szécsen, Antal 1819—1896)——伯爵,匈牙利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奥地利反动派的帮凶;曾参加1860年十月恩诏的制定工作。——第252页。
- 塞拉诺—伊—多敏格斯,弗朗西斯科(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1810—1885)——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陆军大臣(1843),1856年政变的参加者;古巴镇守司令(1859—1862),外交大臣(1862—1863),政府首脑(1868—1869、1871、1874),王国摄政(1869—1871)。——第500—502页。
- 塞西耳,罗伯特·阿瑟·塔波特·盖斯康,1868年起为索耳斯贝里侯爵(Cecil,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Marquess of Salisbury 1830—1903)——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1878—1902年多次担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第512页。
- 塞桑纳,阿梅德·巴特米·盖埃·德(Cesena, Amédée—Barthélemy—Gay—et de 1810—1889)——法国政论家,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为“立宪主义者报”和其他定期刊物撰稿,1852—1857年为“立宪主义者报”主编。——第394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第139、179、258、377、395、399页。
- 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第402页。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143、395页。
- 路易斯,乔治·康瓦尔(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1855—1858年任财政大臣,内务大臣(1859—1861),陆军大臣(1861—1863)。——第435、440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345、375页。
- 奥利维耶,艾米尔(Olivier, Emile 1825—191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7年起为立法团议员;六十年代末起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1870年1—8月)。——第

- 111页。
- 奥特弗伊, 朗朗·巴集耳 (Hautefeuille, Laurent-Basile 1805—1875) —— 法国法学家, 波拿巴主义者, 写有许多国际航海法方面的著作。—— 第512页。
- 奥马尔公爵, 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利浦·路易 (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éans, duc d' 1822—1897) ——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之子, 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写过几本反波拿巴的小册子。—— 第190、342页。
- 奥雷耳·德·帕拉丹, 路易·让·巴蒂斯特·德 (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 1804—1877) —— 法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1855年任法军旅长。—— 第632、633页。
- 奥尔丹, 威廉逊·辛普森 (Oldham, William Simpson 1813—1868) —— 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积极参加者, 南部同盟国会议员。—— 第598页。
- 奥尔西尼, 费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 ——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 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行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 第576、581、582页。
- 奥尔洛夫,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 —— 公爵, 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 外交家; 曾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 (1829) 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 (1833), 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 (1856)。—— 第65页。
- 奥尔良王朝——法国的王朝 (1830—1848)。—— 第342页。
- 奥尔良公爵——见斐迪南。
- 奥尔良亲王——见茹安维尔亲王, 奥尔良的弗朗斯瓦·斐迪南·菲利浦·路易·玛丽; 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浦·阿尔伯, 巴黎伯爵; 奥尔良的罗伯特·菲利浦·路易·欧仁·斐迪南, 沙特尔公爵。
- 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浦·阿尔伯, 巴黎伯爵 (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 —— 路易-菲利浦的孙子, 法国王位追求者, 1861—1862年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 第341—345页。
- 奥尔良的罗伯特·菲利浦·路易·欧仁·斐迪南, 沙特尔公爵 (Robert-Philippe-Louis-Eugène-Ferdinand d'Orléans, duc de Chartres 1840—1894) —— 路易-菲利浦的孙子, 1861—1862年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 第341—345页。

十四画

-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 (Maria II da Gloria 1819—1853) —— 葡萄牙女王 (1826—1828和1834—1853)。—— 第11页。
- 歌德, 约翰·沃尔夫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第539页。
- 赫伯特, 悉尼 (Herbert, Sidney 1810—1861) ——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是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海军部秘书长 (1841—1845), 军务大臣 (1845—1846 和 1852—1855) 和陆军大臣 (1859—1860)。—— 第42、81、115、117页。

- 赫德逊,詹姆斯(Hudson, James 1810—1885)——英国外交家,驻都灵公使(1851—1863)。——第561页。
- 维隆,路易·德吉烈(Véron, Louis—Désiré 1798—1867)——法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第394页。
- 维亚勒(Viale)——那不勒斯将军,1860年参加反对南意大利加里波第革命军的军事行动。——第166、170、171页。
- 维尔德(Wild)——瑞士军官和军事发明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第211页。
- 维特尼,伊莱(Whitney, Eli 1765—1825)——美国的轧棉机发明者。——第368页。
-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第64、76、101—103、164、196、375、377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75、412、431—434、464、494页。
- ## 十五画
- 剑桥公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 Duke of 1819—1904)——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年任英军师长,英军总司令(1856—1895)。——第113、299、303、635、638、640、641页。
-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1853—1855年2月)。——第633、642页。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402页。
- 鲁艾,欧仁(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司法部长(1849—1852年断续地);1855—1863年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第15页。
- 鲁尔梅耳,弗雷德里克·昂利(Lourmel, Frédéric—Henri 1811—1854)——法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年为法军旅长。——第184、632、633页。
- 摩莱,路易·马蒂约(Molé, Louis—Mathieu 1781—1855)——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1836—1837、1837—1839)。——第394页。
- 摩根根,约翰·汉特(Morgan, John Hunt 1826—1864)——美国军官,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和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南部方面。——第593页。
- 摩里耳,杰斯丁·斯密斯(Morrill, Justin Smith 1810—1898)——美国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国会议员(1855—1867),起草了保护关税制的税则(1861)。——第329、347、380、481、487页。
- 德亚克,费伦茨(Deák, Ferenc 1803—1876)——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主张同奥地利君主国妥协;鲍蒂扬尼政府的司法部长(1848年3—9月),1860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252页。

德尔文, 昂利·古斯塔夫 (Delvigne, Henri — Gustave 1799—1876)——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179、213—218、238页。

德雷泽, 约翰·尼古劳斯 (Dreyse, Johann Nikolaus 1787—1867)——普鲁士军事发明家和厂主。——第229、231页。

德弗洛特, 保尔 (De Flotte, Paul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 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布朗基的信徒, 法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立法会议员 (1850—1851);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66、170页。

十六画

诺特荣克, 彼得 (Nothjung, Peter 1823左右—1866)——德国裁缝,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第56页。

鲍蒂扬尼, 拉约什 (路德维希) (Batthyányi, Lajos (Ludwig 1809—1849)——伯爵, 匈牙利国家活动家, 匈牙利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 曾领导匈牙利政府 (1848年3—9月); 革命被镇压后遭枪杀。——第252页。

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e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 “改革报”编辑; 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 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395页。

赖辛巴赫, 格奥尔格 (Reichenbach, Georg von 1772—1826)——巴伐利亚军官和

发明家。——第23页。

霍纳, 莱昂纳德 (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任工厂视察员 (1833—1856), 维护工人利益。——第88页。

霍斯曼, 爱德华 (Horsman, Edward 1807—1876)——英国自由党国家活动家; 1855—1857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议会议员。——第113页。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 (1415—1701), 普鲁士王朝 (1701—1918) 和德意志皇朝 (1871—1918)。——第45、58、60、61、206—208、341页。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 卡尔·安东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Karl Anton 1811—1885)——亲王, 普鲁士将军, 曾任首相 (1858—1862)。——第74页。

十七画

薛尔曼, 托马斯·威斯特 (Sherman, Thomas West 1813—1879)——美国将军,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1年10月—1862年3月为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的讨伐军总指挥。——第442、505页。

缪拉特亲王, 拿破仑·律西安·沙尔 (Murat, Napoléon—Lucien—Charles, princ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61年那不勒斯的王位追求者; 拿破仑第三的堂兄。——第52页。

戴维斯, 杰弗逊 (Davis, Jefferson 1808—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民主党, 南部奴隶主叛乱的组织者之一; 对墨西哥战争 (1846—1848) 的积极参加者, 曾任美国陆军部长 (1858—1857),

南部同盟总统(1861—1865)。——第322、327、361、441、445、536、565、585、597、599页。

戴维斯, 查理·亨利(Davis, Charles Henry 1807—1877)——美国海军军官, 1863年起为海军上将,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部方面, 1862年为密西西比河区舰队指挥官。——第544页。

十八画

魏克, 查理·伦诺克斯(Wyke, Charles Lennox 1815—1897)——英国外交家, 驻墨西哥公使(1860—1861)和特派代表(1862—1863)。——第504、554、555页。

魏德迈, 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上校; 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93页。

萨基(Sacchi)——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第133页。

萨瓦王朝——意大利的王朝之一, 从1720年至1861年统治撒丁王国, 从1861年至1946年统治意大利联合王国。——第102页。

萨姆纳, 查理(Sumner, Charles 1811—1874)——美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党左翼领袖之一, 1851年起为参议员, 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1861—1871), 主张对南部奴隶主采取革命的斗争方法, 内战中北部获胜后, 主张赋予黑人以政治权利。——第445、532页。

萨克雷, 威廉·麦克皮斯(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464—467页。

十九画

庞沙腊侯爵, 沙尔·路易·塞扎尔·杜·波尔(Poncharra, Charles-Louis-César du Port, marquis de 1787—1860)——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179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四 画

不应的多马——新约全书中的十二使徒之一；以不愿相信基督复活而出名；他的名字成了审慎多疑者的代名词。——第528页。

五 画

丘必特——据罗马神话说，为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429、477、639页。

加西莫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形象已成了丑陋的化身。——第75页。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亚哈随鲁——中世纪时代出现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哈随鲁因不敬基督受到惩罚，注定永世流浪；亚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广泛采用。——第57页。

六 画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仆人。——第357页。

七 画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第397页。

八 画

宙斯——见丘必特。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特点是善于

大吹大擂，胡说八道。——第441页。

阿拉丁——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神灯的所有者。——第159页。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贵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第396页。

波利菲米斯——据古希腊神话说，是居住在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吃人的独眼巨人。——第49页。

九 画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年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18、121、338、388、464—467、490、588页。

珈桑德拉——古希腊叙事诗中的女预言家。——第162、582页。

十 画

唐璜——莫扎特的同名歌剧中的主要角色。——第357页。

乌哥利诺——但丁的“神曲”中的人物（“地狱篇”第33首歌）；他同儿子、孙子一起被皮萨主教鲁吉里囚禁于“饥饿之塔”中，乌哥利诺吃掉了孩子们的尸体，结果仍然饿死。——第580页。

铁列西阿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中的人物，预言家。——第394页。

十一画

黄裤奴——萨克雷在1837—1838年用黄裤奴笔名发表的讽刺随笔“黄裤奴札记”中的主人公；黄裤奴这个人物在英国文学中成了卑躬屈节的代名词。——第464—467页。

十三画

詹金斯——卑躬屈节者和谄媚者的普通典型——第441、455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中的主要角色；因命运的安排犯下了罪。——第394页。

十七画

赛丽斯（古希腊神话中为德美特）——古罗马的女农神。——第49页。

十九画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539页。

期 刊 索 引

四 画

- “太阳报”（《The Sun》）——伦敦出版。——第417页。
 “日报”（《Dagbladet》）——哥本哈根出版。——第255页。
 “日记报”（《Day Book》）——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出版。——第529页。

五 画

-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电讯报”（《Dispatch》）——见“每日电讯报”。
 “世界报”（《The World》）——纽约出版。——第366页。
 “北方报”（《Le Nord》）——布鲁塞尔、巴黎出版。——第66、441页。
 “民论报”（《L'Opinion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199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63、111、258、394页。
 “加尔各答行情报”（《Calcutta Price Current》）——第332页。
 “布朗逊氏评论季刊”（《Brownson's Quarterly Review》）——波士顿、纽约出版。——第366页。

六 画

- “观察家”（《The Examiner》）——伦敦出

版。——第321、323、325、328、329、347、357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伦敦出版。——第457页。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伦敦出版。——第408、417、440、456、467、527、595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伦敦出版。——第435、436页。

“自由人报”（《The Freeman's Journal》）——都柏林出版。——第146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er》）——伦敦出版。——第456、471页。

七 画

“快报”（《Express》）——见“每日快报”。

“邮报”（《Post》）——见“晨邮报”。

“陆海军报”（《The Army and Navy Gazette》）——伦敦出版。——第82、246、619、620、623页。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巴黎出版。——第190页。

“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

- zine)——伦敦出版。——第457页。
- “园艺纪事和农报”(《The Gardeners' Chronicle and Agricultural Gazette》)——伦敦出版。——第146、561页。
- “劳埃德氏周刊”(《Еженедельник Ллойда》)——见“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
-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448页。
- “里士满消息报”(《Richmond Enquirer》)——第596页。
- “里士满观察家报”(《Richmond Examiner》)——第597、608页。
- “里士满辉格党人报”(《Richmond Whig》)——第596页。
- “每日邮报”(《Daily Post》)——利物浦出版。——第484、485页。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出版。——第417、457、466、470、471页。
- “每日通报”(《The Daily Intelligencer》)——乔治亚州阿特兰塔出版。——第529页。
- “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出版。——第530页。
-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伦敦出版。——第281、284、408、417、456、527页。
- “每日电讯报”(《Daily Dispatch》)——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出版。——第529页。

八 画

- “官报”(《Gazette》)——见“伦敦官报”。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53页。
- “国家报,帝国报”(《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巴黎出版。——第341、

342、394、466页。

- “波罗的海月刊”(《Baltische Monats-schrift》)——里加出版。——第66、67页。

九 画

- “独立报”(《Independent》)——威克斯弗德出版。——第146页。
-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382、385、386、394、441、458、466页。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3、157、382、394页。
-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417、418、456页。
-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第613页。
-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第156、568、572、573、624、644页。
-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ий инвалид》)——圣彼得堡出版。——第159页。
- “威克斯弗德独立报”(《Wexford Independent》)——见“独立报”。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388页。
-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伦敦出版。——第336页。
- “星报”(《Star》)(伦敦)——见“晨星报”。
- “星报”(《Star》)(华盛顿)——见“晚星报”。
- “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伦敦出版。——第321、322、327、347、457、467、586、595页。

“星期日邮报”（《Courrier du dimanche》）——巴黎出版。——第390页。

十 画

“旁观者”（《The Spectator》）——伦敦出版。——第329、457页。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80、81、106、116、121、276、284、325、326、335—338、341、345、347、378、380—384、386—392、395、397—399、408、410、412、416—417、418、420、421、440、444、457、461、462、464、466、477、478、483、486、488、503、509、527、528、550、560、563、564、578、586、595、596页。

“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德国哥达出版。——第257页。

“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曼彻斯特出版。——第156、191、204、241、248、261、269、273、279、286、287、292、293、298、302、303、306、313、317、320、405、407、426、523页。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第476、477页。

“伦敦评论”（《The London Review》）——第293页。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第326、339、402、508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8、14、19、25、30、44、48、52、62、68、73、79、82、87、99、100、104、109、114、120、126、131、135、140、144、148、162、167、171、172、176、195、

200、208、243、252、256、330、334、340、345、376、393、421、441、445、469、504、534、667页。

十一 画

“通报”（《Intelligencer》）——见“每日通报”。

“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巴黎出版。——第512页。

“康希耳杂志”（《The Cornhill Magazine》）——伦敦出版。——第108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81、119、578、616、618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455页。

“晚星报”（《Evening Star》）——华盛顿出版。——第506页。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纽约出版。——第560页。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伦敦出版。——第417、455页。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伦敦出版。——第417、418、457、466、470、471、578、582、606、607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出版。——第382、386、387、389、408、410、417、419、455、464—467、470、471、477、503、527、595页。

十二 画

“评论”（《Обзорение》）——见“布朗逊氏评论季刊”。

“残废者”（《Пинальц》）——见“俄国残废者”。

“联合勤务报”（《United Service Gazette》）——伦敦出版。——第619页。

“斯特拉斯堡记者”（《Straßburger Korrespondent》）——第67页。

“斯塔布斯氏报”（《Газета Стюбса》）——见“斯塔布斯氏周报和债权人一览表”。

“斯塔布斯氏周报和债权人一览表”（《Stubbs' Weekly Gazette and List of Creditors》）——伦敦出版。——第448页。

十三画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出版。——第18、136、172—174、321—323、325—328、339、347、375、384、400、437、458、485、578页。

“雷诺新闻”（《Reynolds' s Newspaper》）——伦敦出版。——第325、464、481、551页。

“粮食交易所快报和农业报”（《The Mark—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伦敦出版。——第561页。

“新闻报”（《Die Presse》）——维也纳出版。——第356、366、370、380、385、396、400、403、411、415、430、436、443、446、450、453、457、459、462、471、475、479、483、486、489、493、505、512、523、526、530、532、537、541、544、548、552、555、556、559、562、563、566、576、580、583、

584、587、591、595、599、602、604、606、609页。

“新堡日报”（《Newcastle Daily Journal》）——第581、582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668页。

十四画

“旗帜报”（《The Standard》）——伦敦出版。——第408、417、440、456、527、528页。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见“旗帜报”。

十五画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672页。

十六画

“谋比耳纪事报”（《Mobile Advertiser and Register》）——亚拉巴马州出版。——第596页。

地名索引*

三 画

上海——第13、547页。
 广州——第13页。
 小贝耳特海峡——第619页。
 大西洋——第334、342、358、364、367、
 382、393、409、419、422、432、437、438、
 466、505、521、522、585、586页。
 大贝耳特海峡——第619页。
 土伦——第106页。
 土耳其——第110、129、159、175、373、379
 页。
 土珀洛——第529页。

四 画

戈登——第523页。
 牛顿——第152、154、274、277、318、319、
 567页。
 日内瓦——第77页。
 牙买加岛——第647页。
 不伦瑞克——第211页。
 毛里求斯岛——第648页。
 匹兹堡—兰丁——第543页。
 孔卡—多罗——巴勒摩的一个谷地。——
 第72页。
 中国——第9、12、175、253、332、344、438、

459、545、548、648、657页。
 中亚细亚——第253页。
 丹第——第581页。
 丹涅维尔克——第618页。
 什列斯维希——第253、616、617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第60、254页。
 韦累特里——第70页。
 韦斯明斯特——伦敦的一个区。——第
 550页。
 太平洋——第358、364、427、459页。
 太晤士河——第408、549、551页。
 太恩河——第463页。
 太恩河畔新堡——第463、574、581页。
 切兰察——第165页。
 切腊腊山——第70页。
 切萨皮克湾——第422页。
 切林—克罗斯——伦敦的一个区。——第
 108页。
 切维厄特丘陵——第118页。
 巴特——第591页。
 巴黎——第3、15、53、75、77、108、111、
 129、148、159、166、186、198、199、242、
 386、451、495、502、521、672、677页。
 巴登——第23、76、212、221页。
 巴登—巴登——第74、75、78、141页。
 巴塞尔——第46页。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 巴勒摩——第47、50、63、64、69—73、100、102、133—135、164、198页。
- 巴尔的摩——第513、584页。
- 巴伐利亚——第23、74、76、142、221、226页。
- 巴齐利卡塔——第164页。
- 巴哈马海峡——见旧巴哈马海峡。
- 巴尼亚腊—卡拉布腊——第170页。
- ## 五 画
- 白河——第9、12、13、462页。
- 宁波——第546、547页。
- 兰道——第54页。
- 古巴岛——第324、351、499、511、531页。
- 卢森堡——第124页。
- 卢瓦尔河——第7页。
- 印度——第20、84、113、114、128、139、140、172、173、178、190、332—333、370、430、459、481、488、489、538、568、578、647、648、650、654—657、660、661页。
- 印第安纳——美国的州。——第362、585、600、601页。
- 东印度——第83、84、86、172、373、379、489页。
- 东田纳西——第360、361页。
- 旧金山——第459页。
- 旧巴哈马海峡——第408、412、417、421、453页。
- 田纳西——美国的州。——第358、360、505、514、515、517—523、541、556、585、593、594、596页。
- 田纳西河——第517、518、523页。
- 汉堡——第159、242、375、377页。
- 汉诺威——第75、225、357页。
- 汉普敦湾——第542页。
- 瓦得(窝州)——瑞士的州。——第382页。
- 瓦瑞克郡——英国的郡。——第95页。
- 瓦格拉姆——第24页。
- 瓦克斯霍耳姆——第35页。
- 皮佐——第166页。
- 皮蒙特——第33、101、102、136—138、141、213、373、379页。
- 皮亚纳——第72页。
- 皮亚勒——第167页。
- 尼斯——第64、101、199、489页。
- 尼门河——第78页。
- 尼科特拉——第165页。
- 尼古拉也夫——第159页。
- 北京——第524、545页。
- 北明翰——第96、449、474、574、581页。
- 北安普顿——第478页。
- 北希尔兹港口——第512页。
- 北卡罗来纳——美国的州。——第357、360、443、514、522页。
- 圣海伦岛——第309、647、657页。
-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375、377页。
- 圣多明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第382、386页。
- 圣路易斯——第513页。
- 圣卓万尼镇——第166、170页。
- 加来——法国的一个居民点。——第65页。
- 加拿大——第373、379、439、440、459、647、648、656页。
- 加埃塔——第196、253页。
- 加里西亚——第206页。
- 加尔各答——第85、113、172—174、333、489页。
- 加利福尼亚——第4、158、364、398、401、427页。
- 弗贾——第164、165页。
- 弗吉尼亚——美国的州。——第348、353、357、359、360、424、428、442、514、

- 521、535、594、596、597、601页。
 弗洛伦斯——第518页。
 弗略留斯——第515、521页。
 弗朗斯乌——见毛里求斯岛。
 弗雷德里西亚——第618页。
 卡赖尔——第474页。
 卡瓦洛塔堡——第171页。
 卡斯提奥涅——第515、521页。
 卡普施塔德 (开普敦) ——第531页。
 卡塔尼亚——第72页。
 卡塔黑纳——第106页。
 卡拉布里亚——第132、134、142、163、165、166、168、170页。
 卡拉塔菲米——第70、71、135页。
 布朗特——第165页。
 布卢山脉——第358页。
 布勒斯劳 (佛罗茨拉夫) ——第46、56、59页。
 布鲁塞尔——第242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650页。
 布尔河——第403、514—516、534、535页。
 布尔留克 (维利诺) ——第635页。
 布莱顿——第280—282、460、474页。
 布莱克本——第331页。
 布莱得弗德——第340、510页。
- ## 六 画
- 地中海——第118、648页。
 乔治亚——美国的州。——第349、360、363、368、522、523、541、556、585、596、597页。
 好望角——第647、648页。
 考文垂——第98、591页。
 匈牙利——第141—144、194、200、206、249—253页。
 朴次茅斯——第35、105—107、245、591、648、651页。
 托斯卡纳——第69、373、379页。
 交趾支那 (南部) ——第344页。
 多瑙河——第112、192页。
 多耳顿——第523页。
 伍斯特——第427页。
 伍斯特郡——英国的郡。——第95页。
 艾伯特——美国的郡。——第597页。
 艾奥华——美国的州。——第327、585、600、601页。
 华沙——第192、194、195、200页。
 华盛顿——第348、350—352、360、401、403、413、427、433、444、459、465、477、507、508、512、513、514、531、535、542、558、584、587、594、600、605页。
 安提塔姆河——第592页。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第65页。
 百慕大群岛——第648页。
 百蒙得锡——伦敦的郊区，现为区。——第591页。
 亚琛——第76页。
 亚拉巴马——美国的州。——第350、358、360、361、368、518、522、556、596页。
 亚得利亚海沿岸——第165页。
 达普谷地——第381、382、387页。
 达尔马威亚——第110页。
 达姆斯塔德——第221页。
 伊利诺斯——美国的州。——第352、362、566、585、587、600、601页。
 伊斯林顿——伦敦的郊区。——第591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538、648页。
 米拉措——第100、132、133、135、165页。
 米集耳美里——第72页。
 米勒吉维耳——第522、556页。
 米尔—斯普林斯——第516—518页。

西区——第579页。
 西点——第506、605页。
 西印度——第421、563、647、648页。
 西里西亚——第58页。
 西西里岛——第49—51、63、64、69、70、72、100—103、132、164、165、197、198、373、379页。
 西弗吉尼亚——美国的州。——第360、422、514、515、558页。

七 画

劳恩堡——第254页。
 亨利堡垒——第517、518、520、543页。
 辛辛那提——第513、543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65、524页。
 佛罗里达半岛——第522页。
 麦克亨利堡垒——第508页。
 希拉——第135、166、169、170页。
 希罗普郡——英国的郡。——第95页。
 杜弗——第105、648页。
 杜佩尔（杜贝尔）——第618页。
 苏格兰——第80、88、367、463、648、656页。
 苏伊士运河——第253页。
 贝耳特——见大贝耳特海峡和小贝耳特海峡。
 贝萨拉比亚——第158页。
 那不勒斯——第51、63、64、69、70、101、133—135、143、163、165、167、171、196、198、199、373、379页。
 那不勒斯王国——第163—166页。
 利物浦——第152、332、370、378、409、413、440、554、474、484、485、511、600页。
 利比里亚——第559页。
 里加——第66、67页。

里夫兰——第66页。
 里沃利——第515、521页。
 里子——第474—475、591页。
 里士满——伦敦的郊区。——第280页。
 里士满——美国的一个居民点。——第359、522、528、534、535、542、556、587、592、597、598页。
 克里木——第342、637、650、654、661页。
 克罗地亚——第206页。
 克伦地亚——第249页。
 克拉克斯维尔——第519、520页。
 克雷塔罗——墨西哥的州。——第384页。
 克雷松尼埃尔——第381页。

八 画

近东——第654页。
 阜姆（里耶卡）——第199页。
 昆兹敦（科夫）——第465页。
 肯塔基——美国的州。——第348、357、361、362、365、422、424、443、505、514—517、519—521、556、563、584、585、587、592、593、596、604页。
 直布罗陀——第118、648页。
 旺斯特德——伦敦的郊区。——第280页。
 彼得波罗——第474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619页。
 委拉克路斯——墨西哥的一个居民点。——第382、388、502页。
 门罗堡垒——第433、442页。
 门的内哥罗——第110页。
 法罗——第165、170页。
 法兰克福特——第593页。
 罗马——第50、70、73、101、163、196、199、524、574、581页。
 罗耶尔港——第594页。

- 孟买——第172、489页。
 孟加拉——第333页。
 孟菲斯——第517、520、528、543、544、556页。
 拉尼河——第164页。
 拉芒什海峡——第118、121、129、261、341、377、381、386、526、619页。
 拉斐德堡垒——第507页。
 佩斯——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左岸部分。——第252页。
 佩佐——见佩佐角。
 佩佐角堡垒——第166、170页。
 佩里维耳——第592页。
 佩诺布斯科特湾——第364页。
 帕丁顿——伦敦的郊区。——第463页。
 帕尔科——第72页。
 帕耳米——第165页。
 帕蒂尼科——第71页。
 帕德蒙登——第579页。
 帕勒斯特罗——第184页。
 波河——在意大利。——第144页。
 波兰——第58、194、251、614、615页。
 波斯（伊朗）——第10、12页。
 波士顿——第348页。
 波尔多——第8页。
 波特兰——第105页。
 波坦察——第164、165页。
 波罗的海——第620页。
 波美拉尼亚——第58页。
 波托马克河——第359、405、422、423、505、507、517、520、522、585、594、604页。
 波利卡斯特罗湾——第133、134页。
 阿贝丁——第474页。
 阿宾顿——第563、564页。
 阿富汗——第12、178页。
 阿肯色——美国的州。——第352—354、358、360、364、520、557、585、593页。
 阿朗契湾——第163页。
 阿穆尔河——第78页。
 阿耳卡莫——第71页。
 阿韦利诺——第165页。
 阿特兰塔——第523、529页。
 阿得雷德——第85页。
 阿德威克——曼彻斯特郊区。——第568页。
 阿普利亚——第164、165页。
 阿姆斯特丹——第159、242页。
 阿拉-菲尤马勒——第170页。
 阿勒格尼山脉——第358、364页。
 阿斯普罗蒙特山——第165、168页。
 阿尔马河——第627、628、630、631、633、635、639、642页。
 阿尔及利亚——第20、32、178—180、184、189、191、258页。
 阿尔德肖特——第246、299—301、648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70、143页。
- ## 九 画
- 香港——第175页。
 耶拿——第24、46页。
 信德——巴基斯坦的省。——第568页。
 品利科——伦敦的郊区。——第619页。
 恰塔努加——第523、528页。
 施梯里亚——第249页。
 拜尔法斯特——第97页。
 柏立——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92页。
 柏林——第45、47、56、64、65、75、77、195、197、200、307、375、377、613、628、667、670、671、680、682、685页。
 约克镇——第534、556页。
 约克郡——英国的郡。——第92、95、98、

172、203、368、577、579页。
 迪耳——第43页。
 迪克特——第556页。
 叙拉古——第50页。
 叙利亚——第110、111、121、138、148、253页。
 查塔姆——第107、245、293、297页。
 查理斯顿——第347、348、409、511、528、539页。
 契瓦沃——墨西哥的州。——第351页。
 契卡霍米尼河——第566页。
 英属北美——见加拿大。
 英属印度——见印度。
 威尔士——第90、115、118页。
 威尼斯——第142、144、206、253、256页。
 威廉堡——第534、535、556页。
 南港——第43页。
 南安普顿——第408、412、413、416、444、454页。
 南卡罗来纳——美国的州。——第347、349、353、361、429、442、522页。
 俄勒冈——第427页。
 俄亥俄——美国的州。——第362、585、592、600、601页。
 俄亥俄河——第349、364、517—520、543、557、592页。
 俄利萨巴——墨西哥的一个居民点。——第526页。
 美国西部——第543、585页。
 美国西北部——第324、352、356、403、558、592页。
 美国东北部——第592页。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95页。
 哈瓦那——第409、413、502页。
 哈德逊河——第358页。
 哈特腊斯岛（角）——第443页。

哈帕尔斯渡口——第327、604页。
 科堡——第192页。
 科伦——第56、107、668、673、677、678页。
 科林斯——第528、533、593、596页。
 科阿韦拉——墨西哥的州。——第351页。
 科布伦茨——第107页。
 科尔勒托—佩蒂卡拉——第164页。
 科尔累奥内——第72页。

十 画

根特——第439页。
 柴郡——英国的郡。——第95、152页。
 贡比臬——第341页。
 乌里治——第105、619、631页。
 泰图安——第497页。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43、92、95、97、152、172、203、318、303、368、369、487、539、577、579页。
 库尔兰（库尔泽姆）——第66页。
 席尔涅斯——第105、107页。
 纳希维耳——第518—520、596页。
 宾夕法尼亚——美国的州。——第534、558、600—601页。
 唐纳尔逊堡垒——第517—520、543页。
 桑德赫尔斯特——第649、654页。
 海特——第155、296页。
 海地岛——第559页。
 伦敦——第3、15、59、65、74、80、83、103、106—108、113、115、118、128、148、154、159、242、275、276、279、280、303—305、325、347、408、410、412、415、416、421、440、444、447—449、456、458、463、466、470、473、474、480—482、499、501、549—551、574、581、588、591、613、615、619、648、667、670、671页。

- 伦巴第——第101、138、317页。
 热那亚——第35、63、69、101、106、107、163、562页。
 热马普——第515、521页。
 高卢——第77、123页。
 高尔威——第509—512页。
 高加索——第20页。
 埃德尔河——第256页。
 埃特纳火山——第49页。
 埃克恩弗尔德——第254页。
 纽约——第380、413、416、427、428、444、445、458、476、528—531、542、584、600、667页。
 纽约——美国的州。——第21、25、184、256、314、520页。
 纽伦堡——第31页。
 哥伦比亚——美国的区。——第558页。
 哥伦布堡垒——第507、516、517、519、520页。
 哥克斯霍尔姆——第579页。
 格拉斯哥——第449、650页。
 格茨黑德——第574页。
 格林维耳——第360页。
 格罗斯特郡——英国的郡。——第95页。
 索诺拉——墨西哥的州。——第351页。
 索美塞特——第519页。
 索尔福——曼彻斯特的郊区。——第568页。
 索尔费里诺——第21、22、25、76、141、184、256、314、344、520页。
 爱丁堡——第274、449页。
 爱斯兰——第66页。
 爱尔兰——第80、88、90、95、97、115、117、146、253、334、367、463、510、539、540、593、648、656页。
 爱尔兰海——第620页。
 爱米利亚——第144页。
 特利尔——第74、668、682页。
 特劳波（奥帕瓦）——第76页。
 特普利策——第112、141、142页。
 特腊帕尼——第70、72页。
 特兰西瓦尼亚——第206页。
 马里兰——美国的州。——第348、353、357、359、584—586、592、593、604、605页。
 马振塔——第21、25、184、256、314、520页。
 马纳萨斯——第507、515、534页。
 马萨诸塞——美国的州。——第445、563、600、601页。
 马德里——第501—504页。
 马德拉斯——第172页。
 马尔他岛——第118、647、648页。
 马尔萨拉——第69、70页。
 马斯耳—朔尔斯——第518页。
- ## 十一画
- 悉尼——第85页。
 教皇国——第143、163、164、197页。
 累克辛顿——第593页。
 莎姆伯里——第197页。
 得克萨斯——美国的州。——第350、354、360—364、390、391、522、585、598页。
 曼彻斯特——第90、152、245、273、277、278、303、305、332、333、449、463、475、487、512、567、568、578页。
 都灵——第34、63、102、142、197、561页。
 都柏林——第449、591页。
 莫利泽——第165页。
 莫斯科——第527、529页。
 梅肯——第522页。
 梅里勒榜——伦敦的区。——第481页。

梅利托·迪·波尔托—萨耳沃——第166页。
 康瓦尔——第118页。
 康伯兰河——第516—520页。
 康伯兰高原——第358页。
 康波巴索——第165页。
 康涅狄格——美国的州。——第368、429页。
 密苏里——美国的州。——第348、349、352—355、358、360、362、364、401、403、422、424、442、443、514、515、520、585、593页。
 密苏里河——第364、422页。
 密西西比——美国的州。——第327、349、361、518、522、533页。
 密西西比河——第358、364、516、517、519、533、537、541、543、544、556、585、592页。
 密歇根——美国的州。——第600、601页。
 密雷栖摩——第521页。

十二画

雅典——第524页。
 凯罗——第517页。
 喀布尔——第178页。
 提罗耳——第250页。
 散德兰——第581页。
 堪萨斯——美国的州。——第352、355、364、429、443页。
 温伯耳登——第280、284页。
 费拉得尔菲亚——第513、543、584页。
 菲尤马腊·迪·穆罗——第170页。
 普法尔茨——第631页。
 普利茅斯——第105、107、648页。
 彭布鲁克——第105、107页。
 彭萨科拉——第594页。
 博陵·格林——第516—520页。

博罗迪诺——第536页。
 博耳斯·布拉夫——第403、507、517页。
 黑海——第159页。
 黑塞哥维那——第110页。
 黑森—达姆斯塔德——第23、76、221页。
 斯图加特——第76页。
 斯泰福郡——英国的郡。——第95页。
 斯特拉斯堡——第67页。
 斯摩棱斯克——第536页。
 斯帕提万托角——第166页。
 莱巴赫（柳布梁纳）——第76页。
 莱斯特郡——英国的郡。——第95页。
 莱茵河——第24、53、55、256页。
 莱茵省——第56、124、672、682页。
 莱茵河各省——第58、59、111、112、145、341页。
 莱茵普鲁士——见莱茵省。

十三画

瑟堡——第106、107页。
 滑铁卢——第380、628页。
 落基山脉——第364页。
 詹姆士河——第542页。
 雷焦·迪·卡拉布里亚——第166、169、170页。
 路易西安纳——美国的州。——第347、354、363、428、522、533页。
 路易斯维耳——第361、537、585、592页。
 塔拉莫涅——第69页。
 塔奥尔米纳——第164、165页。
 塞纳河——第77页。
 塞尔维亚——第206页。
 塞拉勒窝内——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第531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106、184、344、527、631、633、636、639页。

奥列塔——第165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60页。
 奥斯坦德——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第65页。
 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第24、47页。
 蒙哥马利——第347、348、354、363—364页。
 蒙雷阿勒——第64、72页。
 蒙塔尔托山——第168页。
 蒙特诺特——第515、521页。
 蒙特列奥涅（维博—瓦兰提亚）——第166、167、171页。
 新西兰——第647、648页。
 新伯恩——第594页。
 新英格兰——第364、429、558、563、592页。
 新奥尔良——第363、428、510—511、517、527—530、533、537、539、543、556、585、594页。
 新墨西哥——第350、360、361、364页。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州。——第85页。

十四画

绿岛——见爱尔兰。
 赫兰（埃斯特果姆）——第251页。
 赫勒弗德郡——英国的郡。——第95页。
 维也纳——第47、75、76、142、144、195、205、206、252页。
 维罗那——第76页。
 维克斯堡——第544页。
 维斯拉河——第192页。
 维尔腾堡——第23、76、212、221页。
 维拉弗兰卡——第46、54、55、58—60、76页。

十五画

剑桥——第595页。
 缅因——美国的州。——第535页。
 黎巴嫩——第111、112页。
 摩洛哥——第382、386、495、497页。
 慕尼黑——第31页。
 撒丁——见皮蒙特。
 撒丁岛——第101、163、165页。
 德果——第521页。
 德拉韦——美国的州。——第348、357、359、601页。
 德拉韦湾——第364页。
 墨西哥——第327、350、351、356、381—393、425、429、445、495—497、499—504、524、541、553、554页。
 墨西哥湾——第364、383、388、521、522页。
 墨西拿——第63、64、132、133、165、170、196—198页。
 墨西拿海峡——第163页。

十六画

澳大利亚——第4、85、158、373、379、398、455、459、488、489、657页。
 锡兰岛——第647页。
 霍布根——第542页。
 霍尔施坦——第253—255页。
 霍利赫德——第475页。
 泽稷岛——第535、648页。
 泽默达——第229页。
 诺福克——英国的郡。——第510、512页。
 诺福克——美国的一个居民点。——第543、594页。
 诺定昂——第96页。
 诺乌斯利——第274页。

谋比耳——第511、529、544页。

十八画

萨克森——第59、75、225、256页。

萨利切——第170页。

萨拉哥沙——第527页。

萨姆特尔堡垒——第348页。

萨瓦——第51、55、59、101、489页。

萨凡那——第511、528页。

萨尔茨堡——第249页。

萨尔布吕肯——第74页。

萨累米——第69、71页。

萨累诺——第165页。

萨累诺湾——第134页。

译 后 记

本卷中有关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文章，凡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一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朱鸿恩译）的，都核对英文原文和德文原文，并参考其他版本和译本，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英国的政治”和“中国记事”两文，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现根据英文原文和德文原文作了校订。其他文章，在译校过程中也都核对原文，并参考了其他版本和译本。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是徐若木、高叔眉、单志澄、韩文臣、刘功勋、谢惇；参加资料工作的是刘功勋、王锦文、冯如馥、陈家英、陈瑞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